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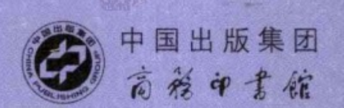
法国史

中卷

[法] 乔治·杜比 主编　吕一民 沈坚 黄艳红 等译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Histoire de la France :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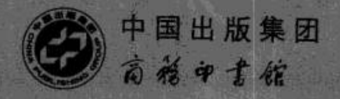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法国史

中卷

[法] 乔治·杜比 主编
吕一民 沈坚 黄艳红 沈衡 顾杭 杨庭芳 田军 译

Histoire de la France :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sous la direction de Georges DUBY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史/(法)杜比著;吕一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6904-5

Ⅰ.①法… Ⅱ.①杜… ②吕… Ⅲ.①法国-历史 Ⅳ.①K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6571号

责任编辑 郭 可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32½
字 数 1800千字
印 次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8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十九章　大革命

第三部分　新的时代：从1852年到当今

第二十三章　一种新文明的演进

第二十四章　第二帝国

第二十五章　第三共和国

第二十六章　知识传播和文化变革

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三十一章 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

第三十二章 文化表述与传播

第三十三章 最近四分之一世纪



第二章　史前时代

第三章　罗马征服前的高卢

第四章 罗马高卢人

第五章 蛮族大迁徙

第六章 墨洛温王朝时代

第七章 加洛林王朝的建树

第十章 12世纪的飞跃

第二部分　王朝与革命：从1348—1852年

第十三章　苦难时代

第十四章　重　建

第十五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纷争

第十六章　巴洛克时代的法国

第十七章　古典主义时代

第十八章　启蒙运动

第十八章　启蒙运动

476

1715—1789 年

旧制度在游乐画式的场景、

哲学思想的激荡中缓慢地衰败。

时代精神

18 世纪是旧制度下最难从整体上加以理解与阐释的时期之一。它似乎确实缺乏实行专横统治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坚实的统一性，在那些历史时期里，生命似乎在行为的狂热中，或在屈从于某种强加的秩序之时，获得了一种意义。

除了摄政期间那段狂乱的插曲，或者路易十六统治最后几年日益衰败的时期之外，这个时代（大约 70 年的光景）表面上看是无忧无虑的。路易十四通过血腥的、耗资巨大的战争夺取了领土，扩大了版图，路易十五把这些领土作为成熟的果实采摘下来：洛林是有先见之明的老者、红衣主教弗勒里死后留下的礼物；科西嘉是从陷入绝境的热那亚共和国转移过来的。在这片扩大了的版图上，似乎是偶然地建立起了一种长久和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或七年战争期间的若干时刻除外）。外国入侵的威胁，如同国内的"投石党运动"，似乎只是遥远的记忆，造反的城市，以及巴黎与外省的反叛和骚动，统统都在"减

少”。路易十五所谓的“卓越机构”好歹在运转。在某些“坏”年景——而且越来越局限于某些地方——这里或那里的“人民”仍偶尔出现骚动，但它们均没有到达扰乱凡尔赛宫之宁静的地步。法国的许多部门都更加有效地运转着；法国人口与其产品同步增长；由于物价上涨，1730 年后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地租也随之上扬，靠租金生活的人——贵族和资产者——从没有向他们的地产征收过如此之多的地租。尽管存在脾气执拗的人和落后于时代的人，社会流动在加剧，而且超越了那些昔日分隔各个“等级”的种种障碍。那些拥有钱财，拥有才能或智慧的人，可以踏上许多种向上流动的跳板，而且这样的跳板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令人炫目的文明（其中人民大众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是拥有财富、影响和闲暇者的文明，如果说这一文明充分体现了富有阶层及其拥护者的活力与品味，那么它的声望与美丽却也遮盖住了那些逐渐使这座美丽的政治与社会大厦产生震动的裂缝。

事实上，表面完好无损的这一事物的秩序——其主宰是位于空前奢华的凡尔赛宫的绝对君主制——在其深处已受到一些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逐渐改变了各种经济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引发了种种紧张与失衡，对此当局只是在为时已晚时才认识到其严重性，同时，这一政体的本质与风格使其只有通过背弃近乎两个世纪的古老传统才能产生补救方法。商业繁荣、食利者发财都解释了贵族文明的光辉，但国家并未获得相应的益处。国家时常拮据，随后终于被一直未整顿好的财政状况所撼动，又因所采取的不够成功的外交政策而丧失信誉，各种政治手段的软弱与前后不一致使国家不能裁决——除非是最后有利于控制它的贵族——各种对抗关系，这些对抗关系已随财富的快速增长与分配的不平等而加剧。政府也几乎不再听取农民的抱怨，价格上扬带给农民的好处微乎其微或者说是不稳定的，他们感觉受到令人憎恶的领主及其乡下同伙之贪欲的威胁。由此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加剧，在城市中那些食利者炫耀奢华并且享受着一种新式的舒适生活。城市是贵族或资产者文明的中心；城市也是一个熔炉，各种批判观点在其中凝聚，随后汇聚了毁灭传统秩序的人，以及各种思想潮流，而

477

那些相互对立的野心就是从中获取武器的：世袭贵族阶级的野心，怀念绝对主义之前的社会，当时他们是社会的栋梁；穿袍贵族及其同盟的野心，他们在扩大了政治胃口的同时，也巩固了其后天获得的地位，当然首先是穿袍贵族自身的地位；富有的资产者的野心，他们有教养、有抱负，然而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处于次要地位。从各个方面来看，绝对主义国家成为下列人士嘲弄的对象：利益已受到侵占或将受到侵占者；雄心壮志被忽视或不被赏识者；还有新式“哲人”，他们质疑国家为自身辩护时所用的超自然的基本原则，质疑其社会与经济机构运转的效率及公正性。在那些将他们无可挽回地分离开的裂痕显露之前，贵族野心和资产阶级野心是联合起来反对主宰这些运动的骄傲而又犹豫不决的政治体制的，而后者对于这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并不明白。贵族以传统和所有权的名义攻击这一体制；第三等级则以根本变革的名义攻击之，启蒙哲学为这一变革提供了方法，并确定了应用范围。在这一普遍不满的氛围中，启蒙精神在要求改革的同时，通过揭露社会、政治创伤而激起了愤怒情绪、暴露了不公正现象，使怨恨与愤怒得到了表达，并为其提供了武器。

政府并不敌视改革，摄政王曾指出其惟一希望的就是建立新的政治或财政管理形式；奥里和杜尔哥这样的行政官员则更为慎重，他们试图通过不断尝试来改善某些行政部门，使得某些税收的征收更为公正。所有这一切依然是不充分的和局部的，总体影响较弱。与依旧野心勃勃和耗资巨大的总体政策相比，国库收入已然越来越难以满足其要求。自 1750 年起，某些敏锐的领导人已看清这一事实：法国的国际地位，乃至政治体制的延续，取决于某些结构的彻底改变，首先就是国家收入的分配。然而，很少有人敢于筹划全面改革，它对王权的神圣性提出质疑，并在国家的运转中引入平等，促使国家成为人所共有之物，而不是某一社会等级的财产。某些大胆的人曾尝试去除政体所具有的矛盾和邪恶之处。马绍、贝尔坦、杜尔哥等开明的财政大臣已试图通过迫使享有特权者纳税来对政体作根本改变。1771 年至 1774 年间，通过取消高等法院——一切反对意见的策源地，一些政治人物

甚至试图开辟一条君主制的新道路。结果依然是昙花一现：存在运气因素，而路易十五也可能去世得太早了一点。路易十六政府，比以往478任何时候都受困于贵族，尤其是穿袍贵族的利益，它由于对特权者联盟的妥协而最终投降。面对类似情形，其他时期的国王选择与“人民”结盟来反对“大领主”。路易十六的犹豫不决、多虑，尤其是失策，促使他选择支持“自己的”贵族。由于路易十六及其顾问们拒绝重塑特权者和各阶层相互分离的社会，这样已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一、旧制度的困境

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

商业

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特勒支条约》与《拉斯塔特条约》，终止了法国对外扩张的勃勃野心，它们所造成的损失一直延续。不过，实际上，收支差额并非像显现的那样具有灾难性。对于王家海军来说糟糕透顶的战争却鼓励了私人企业，以及在新的层面展开交易并获取新的收益的“竞争”。此后，法国商业扩展了活动领域、增加了船舶数量、采用现代化方法，并通过法英协约而免受英国竞争者的制裁，这一协约是由摄政王的精明能干的迪布瓦首相建立的，并为红衣主教弗勒里所延续，在20年间都左右了伦敦与凡尔赛之间的关系。

约翰·劳的制度——国家为解决财政危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巴黎显现为法国与国际财政世界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的开端，同时也是由于财政结构的陈旧和王国国库经常性危机而产生的一种必要干预。随着财政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社会显现出来，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工业生产也处于转变之中，但是没有那么波澜壮阔，而是更为缓慢。关注国外销售市场的政府，布置保护措施和分配利益，但是也对讲究质量的生产作了严格规定，如“联盟行会”(同业公会)的生产、享有特权的工场或王家工场的生产。相反，在其产品由国内市场消化的

“自由”或是日常生产领域，宽容程度则随着法国市场的吸收能力的显露而不断提高。由此商业、财政和工业生活似乎已摆脱了在前任统治者治下所经历的兴衰。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部门，但也是脆弱的部门，它受到海上运输的风险、外国商业的竞争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但这也是一个为那些特殊商品（小商品、面粉和白兰地）确保了市场的主要部门，它不仅带回了奢侈品，而且还有工场的原材料（例如糖和废糖蜜），尤其是为王国提供了交易所必需的银币。由此商业和工业部门在国家的监视下发展，但还没有被征税，因此税收的全部负担必然再次落在了生产的主要部门，即农业部门身上。

农村

几乎全部土地都是由农民（路易十四去世时数量为 1900 万）耕作的，但他们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也只能获得微弱部分，不过这仍是领主权、什一税、租金和人头税所提取部分的一倍。在这部分中，农民还必须留出 1/3 作为未来收成的种子。除了最富裕的农民——阔绰的“耕作者”或农民财主，其耕作面积使其拥有可转让的剩余，绝大多数耕作者只保有仅供生存的最低收成。剩余的土地收入（总数的 60%—70%）首先由国王收取，他因征税而成为“特权”地产主，随后是地租征收者，无论他们属于贵族、教士或第三等级中的哪个等级，他们都是领主或地主，或集二者于一身。此后，领主们不再都属于贵族等级了。其中大量——比例不断在增加——是富裕平民，他们投资于领地，这使得他们已购买或准备购买的贵族身份得到确认。然而，在该等级的底部，还有一些相当贫穷的领主，拥有一小块领地或是地产，因同样贫困而与他们的承租者联系在一起，但更为贪婪和好吹毛求疵，而且小心翼翼地与那些奠定乡村绅士道德认同之基础的荣誉权力依附在一起。

479

与工商业部门相反，农业部门依然受那些整个世纪中未曾发生根本改变的生产和分配结构所统治。农业保守主义受到乡村资金匮乏的影响，出租土地获利者得到的资金实际上从未回归土地，农民手中的资金则更愿意购买土地，或是用于获得某一政府“职务”而转向官僚

体制及其相关的一切好处。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农业深刻改良的前景是暗淡的。

税收状况所依赖的农业形势的这种持续不稳定，使其成为令政府忧虑的一个敏感部门。在歉收年份，价格的突然上涨对大地主和谷物商人有利，而农民则未曾受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剩余可用于销售。相反，收成好的情况可能在乡村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受其影响，工业生产也因为工业品消费的下降而蒙受重创。由此，监督和指导始终是政府活动的特点：集市和面包店的"警察"；限制流通；建立储备；控制面包价格或对其征税，廉价面包是维持城市稳定的条件，因为面包是社会最低阶层和工人们的主要食物。然而，政治需要总是导致与农民利益相悖的财政举措，它似乎自然而然地注定是始终为对农业问题漠不关心的国家生活提供费用，而更不公平的是，富裕的和有影响的纳税人（尤其是乡村贵族）成功地只支付很少比例的钱。因此，农民始终怀疑和激烈反对"囤积居奇"或是"充裕粮仓"，认为它们是导致自己贫困恶化的投机行为。

近18世纪中叶之际，这一动荡加剧了，整体层面的两个现象加速了某些演变，加重了某些问题。首先是人口飞速发展，由于高"死亡率"的结束，其结果是：生产增长和平均寿命延长，尽管婴儿高死亡率依然存在。1789年，农民的数量较之1770年增加了200万，而在1770年之前的十年里农民的数量也有相同增长。至1750年左右，农业经济和人口之间勉强实现了平衡：人们称之为生存经济。但是在1720年至1740年间，当生产率由于各种复杂的农业改变而趋于超过5：1时（1770年左右是6：1至7：1），"变革"终于开始了。当时，尽管有捐税，但农民已不再是仅仅维持生计。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进步却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对于农民来说它是体现为生活中的这一主要收益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持续至1770年左右。自那时起，人口相对过剩对于农民地产主来说意味着小块土地在数量更多的继承者中愈加碎化，它们不再足以确保生存了，而对于农业工人来说，则意味着难以维持生活的低工资、失业和最终成群的流浪汉的增加。

480

1730年以后最终凸现的价格上涨，结束了“悲惨的”17世纪的长期停滞，还在农村中导致了其他造成重大后果的改变。除了农民以外，它还有益于领主、征收什一税的教士、富裕的独立“农夫”或是承租者。由此，农民收入和食地租者或大生产者收入之间的差距增大，这加速了乡村富人的发展和野心的膨胀。

贪欲大涨的贵族和领主希望分文不花地增加自己“地产”的面积，保留自己的全部收成，其长期以来一直彰显无遗的对市镇土地的觊觎之心愈加突出，并声称要限制农村共同体已获得的“使用权”。但是他们并非惟一想从土地中获取更大收益的人。对农民征收人头税，并在南方对平民土地收入征收相当比例的税收的政府，也重视农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增长带来的更多利益，因为它有益于王朝国库收入。受重农学派宣传的鼓舞，一个宏大的税收计划将带来“改善”和利益，这最终是以损害乡村中的大多数而实现的。在价格高涨的快乐和支持“新农业”的宣传下，农业问题的发展掩盖了农村世界已敏锐觉察到的严重威胁。由此，自50年代经济大“转折”起，这一农业——依然是王国绝大多数居民的生计和收入的首要供应者，而这些居民是国家税收和“警察”（即全面管理）领域的所有政府计算的基础——问题再次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那些卑微的农业机构以及对其利益的巧妙、复杂的侵占，得以解释旧制度为何以明显不一致的形式在法国舞台上激起如此多的问题。

“‘等级’社会的含糊不清”

在将法国社会正式分裂的三个等级内部，各种结果并不相同的演变也日显明确。使社会分裂并纵向排列的这三大部分在数量上极不匀称：教士大约有15万人，贵族约为50万，而第三等级在大革命前夜是2450万。在每个等级内部，从此之后，财富将成为区分的主要标准。也正是财富将各等级中的人分为各种层次、各个“类别”。在因为贫穷或平庸而被剥夺一切获得升迁能力的基础之上，在各等级的顶

端，层层排列着各个差异细微和渐进的类别，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富人。尽管继续将这些上层类别予以区分的法律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已超越这些障碍而携手同行。

贵族

在贵族内部，长期以来建立在土地财富、姓氏、职位或军衔之上的传统职责之行使，已因为其中“新”贵族，即官职贵族的出现而发生改变。“穿袍贵族”中的新贵，利用金钱的不可抗拒力量，在等级中获得了很好位置。作为地主和领主（对土地的细心和有效管理体现了他们的资产阶级起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租收入的影响之外，还加上了他们作为国家辅助人员或是代表的官方地位而获得的重要影响。由此，尽管“真正的”贵族最初有保留，但是贵族中的富裕阶层间通过联姻而形成的同盟，在 18 世纪初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与政治结果。首先，它使得乡绅被禁锢在小领主和卑微职业者的次要前景中。由此，被遗弃的外省小贵族成为未被政权充分使用的人。

481

在等级的顶端，尽管老阶层和涌入的新阶层之间还存在“语调”差异，但是相互支持的利益间的融合几乎完成，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金钱。由此，“奇异的圈子”形成，其中真正的贵族——老的和新的，世俗的和教士的，与被推定的或是被许可的贵族，以及富裕平民混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一奇异的圈子通过种种与每个阶层相应的渠道，使阶层中身居高位的人吸收了大部分农业收入，此外还有财政、司法、行政或商业活动的收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受这一统治阶级的利益推动，并为其服务的。由此，18 世纪的这一上层社会（金钱在其中使各个“等级”和各种身份变得平等，并联合一致），它与旧的炫耀、仪式的和迷恋“区分”——就像圣西门这位落后于时代的代表——的贵族秩序是明显不同的。这一上层社会中的贵族——与平庸或贫穷的大多数贵族相分离，并有着明显区分——以一种奢华的混合形式，将出生所带来的举止、财富所赋予的自在、对优雅舒适的爱好和对文化的尊重融合在一起。

这一演变同样赋予18世纪的法国“文明”（我们所理解的上层社会的文化）以含糊不清的特点。一方面，是高雅、魅力、精细、崇高的理想和华丽的风格；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一味追逐金钱。然而，正是属于这一“享有美誉”的等级所具有的威望，使得资产阶级着迷，以至于这些新来者否认自己的起源，并狂热地赞同“正宗的”贵族得意地在延续的一整套“历史”和神话观念，尤其是“门第”和“血统”优越的观念。除此之外还受到颂扬的是“荣誉”观念——贵族权利的宣传者与捍卫者孟德斯鸠将成为它的理论家，而不是启蒙哲学家将要界定的公共“服务”和对共同体的责任的观念。对于贵族来说，这一“荣誉”观念意味着整个一套举止、仪态、时尚和语言规则，它们注定将使他们与“平民”，也就是先天“下贱”的世界的人“区分”开来。

贵族的生活舞台不再是乡村（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庄园，乡绅抱着已经过时的关于忠诚和正直的观念不放，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而是变成了城市，后者的某些主要功能，往往是外貌，是由贵族的喜好标准决定的。正是在那时，美轮美奂的“府邸”，亦即为波尔多、艾克斯、第戎等地方首府增色不少的高等法院法官们富丽堂皇的住宅不断增加。巴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地体现了这一变化。正是在那里，“时尚”，也即贵族的永恒创造，被设计出来。它将维系自己的地租收入投入于府邸、“豪华花园宅第”和美丽物品——由殖民公司和奢侈品工业（由其资本也来自于土地的股东和富人领导）为其提供。正是它的“环境”、喜好在城市规划中得到表达，尤其是在沙龙、喜剧和歌剧院这些贵族生活的实验室中，它看到自己的愿望、世界被移植入这些实验室中，而它又从中提取了自己的神话，往往还有姿态和语言。所有奢侈品都是为它服务的，甚至其堕落和思想上的兴趣爱好，既然它将把那些使其丑事公布于众的夸夸其谈或是理论看作饶有趣味的“创新”。

此种“惬意生活”有它的反面。首先，它需要花钱，除非极其富裕或是有来自金融的稳定收入，地租收入已不足以维系。而且，正是

这一苦恼将使得贵族屈尊进入经济舞台，在那里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
482 并且以更为隐晦，但却同样坚决的方式与农民发生冲突，后者将成为首先对其进行身体攻击的人。长久以来它也准备回归政治舞台，而摄政时期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救星。它的那些将路易十四统治看作陪衬的理论家们，想恢复贵族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演变中，贵族利用了自己与高等法院法官和金融家们的联盟，而它对后者来说也是有用的。制订法律的宫廷，不再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那种国家机关了，而成为上层贵族和大批团体——各个“党派”和阴谋集团，每个都有自己的野心——的特殊利益的工具。它成为奢华的竞争场所，由于各种阴谋诡计而深深腐烂。各种小集团在路易十五时期已然活跃，但却受到国王情妇们或某些忠实拥护者的眼线监视之牵制而更为隐蔽，到路易十六时期则聚拢在普罗旺斯伯爵、阿图瓦伯爵和王后身边，变得蛮横和恬不知耻。1780 年后出现的一系列丑闻（罗昂 - 格莫内破产；阿图瓦伯爵垮台；项链事件）使得王权受到牵连，并揭示了贵族与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通过大量占据政府的主要职位和运用高等法院中的策略来确保自己的职业，贵族就逐渐将国家据为已有。最高法院拒绝让那些新近成为贵族的人进入，进入宫廷的可能也日渐缩小。在军队，尤其是海军中，几部法令都是有利于贵族军官的，或是将某些官阶留给贵族。贵族政治试图留给外省小贵族的只是一些次要的“好处”或军人职业，除此之外别无任何有利可图的出路。确实，与旧制度下所有事情一样，这些限制措施包含许多例外，而且尽管更难实现，贵族并不总是构成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过，这一印象凸现出来，即贵族试图在其领域排除一切竞争，此时也正是其侵占资产阶级领域的时刻。

他们在金融领域的盟友约翰·劳所建立的制度，将相当一部分贵族吸收进“商业”中，并使得他们在不降低身份的情况下变富。很多人投资于重大的殖民地贸易；各岛屿，尤其是圣多明各为大地主带来了数目可观的收入。旧制度末年的法国，一些贵族甚至获得了采矿特许权，经营煤炭公司，并对冶金、化工等新工业感兴趣。贵族也为

“工业革命”作了准备。至1770年，当农业价格回落威胁到地租收入时，由与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贵族进行“封建反动”的想法在各地都显现出来。

资产阶级

贵族的这种更新在资产阶级中激起了深刻骚动，后者的地位上升依然在继续，而且还更为顽强，这与它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时考虑得更远有关。勤劳、节俭和朴实，并以“詹森教派”道德为特点的资产阶级，自发指责贵族肆意挥霍、追求享受和腐化的生活方式。食利资产阶级在18世纪系统地重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通过外省学院、思想社团、共济会中的资产阶级支部（区分于贵族支部）的讨论，将自己的时间花在这种文化上，并在书籍、研究和实验中投入了很多金钱。它展现了认知欲。由此，通过将在沙龙这一甚至是对立世界的核心中传播思想的任务留给自己最杰出的代表，资产阶级强力渗入了新思想的堡垒。

教士

教士面临的问题分为两个层面：物质的和精神的。首先，利益的分配是在一个越来越贵族化的框架中进行的；1760年以后，所有主教都是贵族。正是高级教士占有了什一税的主要收入，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以“本堂神甫薪俸”的形式重新分给了本堂神甫和副本堂神甫。严格的修会已很少见，修会中的生活普遍懈怠，而修道院中最终亦已没有多少修道士。这些修道士绝大多数出身贵族，他们由此拥有了大量收入，在18世纪的进程中将之用于大兴土木，有时是奢华的修院建筑和修道院宫殿。这一变化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抗议。高级教士除了自己的主教责任以外，在18世纪下半叶对更为世俗而非宗教的“管理”形式颇感兴趣。乡村信徒尤其对他们神甫的状况深感痛惜，可能是由于其生活方式而与之接近，不过后者对精神救助的义务准备不足。下级教士屈辱地感到自己地位低下，这也加强了他们的“长老派”倾向。最后，对这一变化感到不知所措、并受新思想影响

483

的公共舆论，有时会对“祭坛使者”的作用提出质疑，后者的功能似乎相当模糊和乏善可陈。其他人则要求移归教士的所有职能世俗化，而只把它看作蒙昧主义和恶习之堡垒的观点，则是坚定的反教权主义思想的体现。

18世纪，詹森主义已成为反对政府绝对主义的宗教表述。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坚定地反对《乌尼詹尼图斯通谕》，这首先意味着高等法院中法国天主教教会自主论思想的持续反抗、民众对罗马教廷干涉的反对，以及指出政府顺从罗马教廷（这就违背了王室的法国天主教教会自主论传统）是受了耶稣会士的有害影响。詹森主义的民众示威活动（巴黎和外省的中的虔信者、狂热詹森派教徒的极端主义）表现了对继承自反宗教改革运动之专制的宗教形式的内在反抗，或是相反，对耶稣会士及其帮凶的被认为过于“肤浅的”教理的内在反抗。但是它们也表达了对社会与政治信仰的不耐烦，而正是这一点被高等法院们抓住。通过试图介入有关拒绝圣事、告解证的可笑争论、贪婪地抓住“反教皇法支持者”（anti-constitutionnaires）的教士的“反对滥用的呼吁”，高等法院法官们——本身往往也是一种更隐秘和更严肃的宗教传统的信徒——试图反对王权绝对主义，利用这种迂回的办法，恢复自己的权力，并进而维护自己的特权。但是詹森派争论不仅质疑罗马教廷或君主制“传统”。它也为关于由教会垄断教育所强加的思想和文化框架的争论提供了借口。从这一视角看，在这场要求更多自由的争论中，很多支持奥拉托利会会员（多为詹森教派教徒）反对耶稣会士（尽管他们在教育上很大胆）的人是出于策略原因。1764年，解散耶稣会以作为对高等法院和启蒙运动（此外还有《家族协约》）让步，这就必然造成詹森派的相应混乱，他们不无理由地成为一个从此以后总体上受到质疑的宗教的另一面。大的教理争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宗教生活的结束。某些人得意地指出源自17世纪的这种“一致实践”几乎在各地都持续存在。不过，许多征兆表明宗教危机是深刻的：在某些地区，詹森主义起到了加速非基督教化逐渐显现的作用；宗教思想慢慢让位于对

教义漠不关心的本能的宗教感情。尤其是“启蒙哲学”不仅在已准备接受它的下级教士中取得显著进展，而且在高级教士中同样如此，后者的行列中有著名的反教权人士和确实的“启蒙思想家”。悖论在于法国教会继续——这是它的地位和官方“团体”组成的必然结 484 果——主张镇压一切异端，首先是镇压新教徒，强烈反对某些高级教士在沙龙中支持的这种启蒙哲学思想。不过，尽管有下级教士的要求或此种主教们的偏离，以及社会混杂，但是极为忠诚的教士依然是旧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一。

边缘团体

有一些社会力量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处于“体制边缘”，并提出一些问题，由于它们并没有立即让人感到可怕，因此有时候人们不太把它当一回事。属于这类社会力量的，首先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城市或乡村的“有才能的人”，从他们原本所处的环境向雇用或欢迎他们的富人阶层摇摆，而且他们似乎已以此为基础。不过并非都是如此；指出以下这一点是饶有趣味的，即正是在接近18世纪中叶之时，可以更为明确地观察到狄德罗所属的某种“放荡不羁的人”，对于这类“放荡不羁的人”，他的《拉摩的侄儿》曾描述了其轮廓：咖啡馆、公园和广场的常客，而这些地方正是各种新闻传播、各种观念争论不休、获取各种信息和滋生某些阴谋的场所。它首先发挥了思想作用，然后是艺术作用，而政治作用也不容忽视。在这个别致生动的世界里，还应把艺术家和演员群体与手段高明的廷臣联合起来。这种独特的社交性在某些省份甚为明显，在那里，在“等级”和身份的边缘，存在着依据自身动力推动的混合性极大的团体：青年团体、苦修者的“报刊”、或多或少常设的“寝室”；或是对民事和宗教权威抱有怀疑的“手工业行会”；上述被当权者不无道理地视为互助与联合组织的团体，以秘密的传授来掩盖自己，其中不少人在思考时显得有些过于自由；当然还有共济会的支部，虽然它们的目标长期以来一直甚为模糊，但在招募人员方面却一直保持持续性。欢迎背弃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明确，并通过“双重附属”手法而使旧结构内部得以重新

安排。

更为边缘的是被宗教或社会排斥的人。长期以来新教徒一直受到迫害，“狂热”的不妥协像在王家议事会中一样，在社会中始终存在，而在这之外则是启蒙运动越来越具强制性的影响。但是，尽管法国新教徒的身份及由此而来的合法生活直至 1787 年才获得承认，外国新教徒——尤其是银行家——却相反，不仅没有由于他们的宗教而遭受任何歧视，反而还得到了社会和迫害他们法国教友的政府的支持与喜爱。在 18 世纪，犹太人也逐渐重新显现，这是与商业的加强和兼并（拥有大量犹太人的）洛林相伴的，由此，整个一类外国人在这一世纪的影响将不容忽视。在体制中，工人的地位是低微的，他们的数量在一个工业集中尚属例外的经济中相对有限。城市工场中的工人比“我的三分之一”（mes-tiers）这一共济会中的成员更加受到严格监视（1781 年的工人登记簿），但这并未阻止暴动和骚乱发生：1744 年里昂丝织工人举行罢工，1789 年圣诞前夜出现彩色糊墙纸工场的动乱，后者宣告了巴黎骚乱的开始。位于乡村的大企业、矿山、铸造厂等等中的工人，实际上是半个农民，他们未提出与物质状况有关的问题。不过，一些人已开始对工人处境产生兴趣，尤其是狄德罗，他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以嘲讽的口吻将之与贵族辩证学家关于“幸福”的美好看法进行对比。最后，还有一些其罪行和邪恶尚不为人知，但确实非常现实的世界，这类世界组织完善，有自己的等级制、语言、习惯和领袖。例如，妓女的世界，它在巴黎、马赛这样的城市里是一个真正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机构，其成员不仅有萨德的受害者，还有项链事件的同谋者；拦路抢劫的强盗的世界，他们引发民众的流言蜚语，其中的卡图什、芒德兰、加斯帕尔·德·贝斯等人，还成为民歌中的“主角”。这些团体中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对具体现状构成真正威胁。不过，当不满在乡村爆发或抗议响彻街头时，他们有时也为气氛作了铺垫，并提供了人员。

485

金钱问题

高等法院和“自由”

绝对主义已使“特权”继续存在，而维护特权事实上正是构成君主制本质的这些“根本法”的一个方面。因为尽管君主制曾试图实现中央集权，但它从未想平均化。不过，它的发展确实威胁到了不平等的这一根本原则。已丧失其历史与实践理由的“等级”，只是作为社会原则继续存在，其具有的权力日益缩小，而且他们的特权还被“超根本法的”权力和强制——监察官和税收——所削减。王权是享有完全独立性的最高立法者和管理者，三级会议已被搁置或取消，它只可能受一个根本和不可触犯的观念的限制。由此法官们利用了财产权概念，这是惟一能够对抗国王意愿的权利。仍然是反对派惟一可能的代言人的法庭，正是依据这一观念来阻止国王的专制权力及其所体现的直接威胁。自此以后，任何权力的“组织”行动、任何结构性改革尝试都会发现“自由”和“特权”的愤怒反抗横亘在“革新”道路上，高等法院法官们的政策将私有财产（终生职务和领主权）看作已获得所有物的一致“屏障”，而绝对主义政府的尝试因这一屏障而失败。18世纪法官们的基本角色就是充当已获得权利的警惕守卫者，此外就是“事件当中的首要当事人”。在这一借口是维护各等级的“特权”的政治中，使高等法院法官们尤其感兴趣的，首先是永远维护终身职务权；另外就是反对将减少他们收入份额的税收，严格维护地租的现有形式。法官们将引领那些受到威胁的利益和政治欲望反对绝对主义，这就解释了他们声称将在君主制中承认自己地位的新计划。

当高等法院表现为这些“中间团体”——坚持不懈地清除这些团体确实使得绝对主义得以建立——中的最后一个时，它是受欢迎的，而且它代替了——没有更好的——第三等级依然怀念的那些选举产生的议会。它同时得到了贵族和富人的支持，后者更有理由将其看作自己共同特权的壁垒。此外，当巴黎高等法院构思将全体高等法院统一起来的论点，并增强外省法院的反抗——其中某些法院，特别是雷恩

的法院在1763年至1770年成为斗争先驱——之时，这一壁垒就得到巩固。1771年司法大臣莫普摧毁高等法院，并以单一法庭取而代之的做法只是一个插曲，这一插曲随着路易十五的去世而告终。老的高等法院显得与君主制如此紧密相连，以至于路易十六在1774年将其恢复，而杜尔哥对它们也听之任之，目的是借此获取法官们对他的改革的支持，但正是这些法官迫使其在几个月后放弃。此后，高等法院一直不断地反对路易十六政府的财政政策，并且程度越来越激烈。1788年，高等法院取得对王权的控制的时刻似乎已来临，它与显贵们一起要求依照1614年形式召开三级会议，其中已有一整套策略和理论的特权者将占主导地位。第三等级也由此明白了作为贵族反动工具的穿袍贵族所具有的深层多变性，而分裂也在这一如此不同利益间的同盟中产生。因为法官们愈益烧毁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判处拉巴尔、卡拉斯、拉利－托朗达尔死刑，以及反对取消酷刑的举措，他们所具有的保守、反动和蒙昧主义思想在不断地展现出来。这又揭示了另一个悖论，即贵族世界，尤其是法官们对启蒙思想的迷恋，他们通过自己的著作、沙龙而成为启蒙思想的最重要的宣传者。毫无疑问，他们对于作为等级制——建立在社会用途、才能，以及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权利”在社会中的确立之上——的新证据的赞同是发自内心的。然而，当1788年将这些观念付诸实践的时机来临时，穿袍贵族们又退缩了。事实上，诚如弗朗索瓦·孚雷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哲学时尚与自由主义的模棱两可，已在观念天空中抹去了诸多团体的深层动机”。“精神贵族”，曾为自由，也就是自己的自由而斗争，但它是不可能承认平等的。

486

财政压力

18世纪的一切王国政府都始终面临金钱的迫切需求。而增加税收在这一时期是不可忽视的事情。首先，战争需要组建军队，而军队人数越来越多和复杂，这就要求新的开支：兵营、要塞、扩编的兵员和大量军官、现代化的炮兵。事实上，战争和拥有一支引以为傲的军队构成了法国君主制的特点，法国始终是军事君主制，这与哲学家的愿望可谓是背道而驰。这一君主制不仅是军事的，而且还是海军的，因

为在莫勒帕治下，尤其是舒瓦瑟尔任首相期间（1758—1770 年），法国海军进入了壮大时代。此后，它依然是王室开支的大头之一，因为只有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使法国继续享有头等强国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与法国君主制不可分离的。在政府和军队的某些阶层中起支配地位的骑士和贵族荣誉观，推动政府在一个能为贵族的天职提供最好舞台的领域花钱。华丽也是与王权绝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在摄政王时期和弗勒里谨慎管理时期业已停止的有魅力的建筑工程，在蓬巴杜①夫人影响下又重新开始。此后，昂贵工程的不断增加，虽然有些是有用的（协和广场），但往往也是耗资巨大的华丽工程：军事学校、小特里亚农宫、圣热纳维埃芙教堂（先贤祠旁）、圣绪尔比斯教堂、凡尔赛的圣路易大教堂、凡尔赛歌剧院。宫廷，这一“民族的坟墓”，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增加其过分奢华的排场：加造的小套房，比大套房还要富丽堂皇；频繁而又奢华的宴会，在弗勒里去世后不断发展；维持众多人员，尤其是年金和“恩赐”的开支巨大。此外还有重要性小得多的其他花费，如官员、使团的薪水，以及给省、市的借款或赠品。

始自柯尔伯时代，法国政府就已充分意识到，战争和其他庞大开支得依赖于税收所获取的金钱，而这些税收又取决于其所课税的财富。“国家财富”有两个源泉，即农业和工业，柯尔伯及其继任者们仿效荷兰与英国，将关切点主要——并非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完全地——集中在工业和商业上。从那时起，开启了这样一种趋势（它在大约从 1660 年至 1760 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占优势地位），即将农业的地位局限在提供生活必需品，以及为普通工业产品，尤其是低档纺织品提供买主。由此必然造成国家取代或引导了私人积极性，承担起了负责服从于凡尔赛任命的监察官之命令和指示的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加拿大、波旁岛、毛里求斯岛、安的列斯群岛）的发展与保护的任务。在这一国家框架中，私人利益如愿以偿。尽管有欧洲大陆的大规

487

① 一译蓬帕杜尔。

模战争和海军遭受的挫折，从未中断的殖民地贸易和欧洲奢侈品贸易在《乌特勒支和约》签订之后迅速复苏。毫不奇怪的是这一既富裕又脆弱的领域始终受益于政府的热心关怀，政府不大考虑对其课税和阻止这一能够为国王带来辉煌、为民众带来就业、将这些或多或少整体转移的财富吸引到法国的活动。税收也落到那些更明确、更容易界定和评估的财富身上，即源于土地的财富。间接税（针对日常消费品，如酒和盐的间接税和进出关税）的增加，从 1738 年以后包税协议租金的不断增长即可看出。通过为国王征收大量税收、组织公用事业（由此减轻了政府的责任）、发给其无数雇员的薪水以及其领导者的奢华，它就成为法国最为重要的财政力量。40 位总包税人——相互之间通过联姻建立联系——组成的超级寡头势力，在政府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后者没有他们将一事无成（这也是相互的），由此这些人真正构成了一个特别的世界。

税收与经济发展

但是，王室从土地收入中提取的主要部分来自于直接税，即人头税，它几乎完全压在农民身上。享有特权者可能和其他臣民一样，被迫支付人口税。但是，他们在缴纳此税方面的表现甚为不佳，这样一来，该税所得甚微。在与收入成正比的土地税（二十分之一税，1749 年确立，尽管种种官方声明充斥“煽情的”华丽而空洞的词藻，它依然长期遭受质疑，而且，它在收益上进展不快）建立之前，人头税在继续压榨农民。

在传统土地框架内征收的人头税，促使收益微薄的农业的“惯例”长久流传，而这一农业的基础是：休耕地占了很大一部分的原始轮作，分散为小块并服从于集体的强制与束缚的土地上不太理想的开发利用，以及市镇土地的延续——后者是这一“旧体系”必不可少的补充。在这一背景下，增加农业产量或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兴趣始终匮乏，因为直至 1730 年，农产品的价格一直都低得可怜，无利可图。由此，实际上没有任何一部分地产收入被用于再投资。事实上，直至 1750 年，法国未能像同时代的英国那样经历一场变化，这一变化正在

使英国农业发生变革，而且它是以工具的改善、人工牧场的发展（因此导致饲养和肥料的发展），以及消除休耕为基础的。由此，法国农村、耕作者和土地租金受益者似乎囿于停滞之中，当然，最富有或是最大胆的人不在此例。

这一状况对某些经济和政府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农民过于微弱的购买力使其无法像英国一样促进日用品工业的重大发展，由此也使得制成品的消费无法增加。法国的工业形式——其特点是集中程度低和工场在农村的分散状态——在农产品的增长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而且即使奢侈品工业提供了一个其收入大多来自土地收益的顾客群，它实际上对农村也没有任何回馈。商业——除了某些专用于面粉和烧酒等旨在出口的食品生产的土地——对于农业发展的影响很有限。直到那时，人们根本不相信存在对农业进行合理变革的可能，而科学研究则往往被应用于“工业”技术。不过，在 1750 年左右，一个运用“乡村哲学”的农学家与思想家学派，在英国经验中找到了依据，他们将证明“加以改良的”农业在法国是可能的。由于军事失败造成政府更加脆弱，以及正如魁奈所反复强调的国家的财富，即国家力量，有赖于该国的农业，因此这一学派越发显得恰逢其时。 488

正是在此时，这一观念——以重农主义的计算和理论为基础——出现，即对农业的“纯产品”征收比率税，而这一农业在生产和交换自由的系统中得以促进、改善和再安置，并掌握在非封建化的“地产主”阶级手中。沦为雇佣劳动者的农民，受那些此后将成为“地产主”而不再是定期租金受益者的雇用。这一理论将英国农业的发展与整个封建形式已消失的“合法专制主义”政府联系在一起。依据这一有创造性的但却野心勃勃的计划，政府引发了谷物贸易的自由化和反对集体地役（共同放牧场、市镇土地）的斗争，但是并没有摧毁封建社会。因此，重农主义政策导致了乡村百姓的损失，而只是在价格高涨阶段（1760—1770 年）增加了那些最大的经营者和土地租金收入者的收益。在领主体系反抗的阻碍下，重农主义只是引发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的杜尔哥改革，以及在受到威胁的乡村小民中增加了对“改

良”和被认为纯粹仅仅是帮凶的政权的怀疑。

绝对主义末期

路易十四确立的“古典”绝对主义——君主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条件下，似乎作为一个协调者，以及依然如此对立的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角色来行事——在18世纪逐渐失去了这种仲裁者特点，而成为一个社会与道德事务越来越不平衡、不公正和最终难以忍受的秩序的后盾与帮凶。

绝对主义的矛盾

与行使君权相容的“自由”和特权已被保留，而且君主本人也服从“根本法”，就此而言，政府的权力尽管是绝对的，但却不是专断的。不过，在这些制衡——相当含糊和无关紧要——之外，正是国王成为了法律的化身，法官们则只是一些执行者，各种案件可能被避免交给他们，而是给了其他机构：特别法庭、最高法庭或监察官。这一绝对权力——仅仅受到团体特权的限制——不受限制地扩展到个人身上，而在这种政府形式下，这些个人被剥夺了面对君主的任何保障和外在参照，因为，君主就是法律，他将所有他“希望的”都确定为“合法的”（“国王想要的，就是法律想要的”，谚语如此说道；路易十六则说：“这就是合法的，因为我就这么想的”）。国王也可以仅仅依据其个人意志和以国家利益为托词，通过一封密札将那些他想将其囚禁的人投入监狱或拘禁起来，此外，由于它自然地属于整个“朕意”体系中，因此这也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事实上，这一体系在路易十四时已存在，当它出现之时，并未引发强烈争议，在当时情况下，489 它被看作是最好的体系，满足了政治与社会需要，也是与静止的、等级制的和超自然的世界秩序观相一致的。而到了18世纪，随着形势的变化，它逐渐丧失了信仰的力量，以及人们对它的尊重：君主们毫无疑问缺乏风度；权力的行使受到诸多限制，即特权的扩散，社会与经济的转变，内部力量的作用，最后则是更有效、更灵活和更“合理的”其他方式的制定——这些方式尤其是依照英国体系来加以制订的。

特权

在有关特权的问题上，18 世纪的制度发展依然是既悬而未决，又在很大程度上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有益的”特权——尤其是那些与税收有关的——处于不断的削弱之中，而且不管怎样，都周期性地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贵族保留了足够的特权，这些与从未遭受争议的荣誉性特权联系在一起的好处，使得贵族继续，并且越来越吸引平民阶层中的有钱人士。事实上，乡绅是个例外，他们因太穷以至于只能渴望维持空洞的“荣誉”。跻身于贵族行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地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以及与此相连的大量好处的可能，如进入高等法院，获得市政高级官职、教会高级圣职尤其是主教职位、陆海军中的最高职位；在最为有限的例子中，甚至是跻身于宫廷的圈子里，这也就意味着能对“恩赐”和各种好处的缘起产生直接影响。

由此，18 世纪的绝对主义政府，远没有进行针对特权的旨在将其全盘废除的系统斗争，相反，在表面次要的领域里不断增加特权，以至于它们将通过违反、例外和豁免权的不断增多而使得政府权力的行使在实践中变得不可能。尽管政府官员不断抱怨——尤其是监察官，但仍必须重视高等法院的政治，后者打着所有权的旗号，将那些最滥用的特权看作是最“应受尊重的”，并维护它们的不可触犯性。始终面临财政短缺的当局，饱受以宗教争论为幌子进行的反对绝对主义的游击战的折磨，而且在 1740 年以后，其上层已完全丧失了权力和威望，而后者原本可以赋予它一种成功的对外政策，由此，在面对结成同盟以试图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并进而永远确保对“所有权”的掌握的高等法院愈益大胆的行为时，当局惟有不断退缩，这一状况一直延续至 1771 年。

政府构成本身的演变，也使其在面对享有特权者的欲望时，无法进行有效地反对。自摄政时期——在政府高级职位中重新引入贵族，而且尽管在各部会议制垮台以后，明显重新回归之前的由穿袍贵族技术专家管理的政府“形式”——以来，法国政府始终或多或少由贵族控制，他们的野心空前膨胀。首先是行政官僚家族（菲利波、拉穆瓦

尼翁、富凯、达让松等等，他们出了如此多的大臣）此后完全属于最大贵族行列。这些最大贵族自身也进入了内阁：两位王族（前摄政王和波旁公爵）成为首相；最显赫的姓氏则占据了国务秘书的要职，如塞居尔、蒙巴雷、蒙莫兰，尤其是舒瓦瑟尔家族。由此看来，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政府有如对路易十四的大臣们的“卑贱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一种报复。丝毫不会令人惊讶的是，政府权力被一些人垄断，并专门用来服务于官员和财政贵族寡头统治的利益（后者通过他们的女人们而在幕后效力，如蓬巴杜夫人）。尽管总监们对此持保留意见，但他们通常地位没有那么高，而且自那时起也很少能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承认。当政府面临的困难使其衰弱时，高等法院对绝对主义的要挟在这一政府中也找到了盟友。达格索，法兰西的一位掌玺大臣，已为法官们提供了——虽然可能并非其本意，但却是饶有意义的方式——他们1690年以后使用的措辞；由此轻易地就减轻了自己的“哲学”意识的舒瓦瑟尔，在晚些时候通过“牺牲”耶稣会士来向其让步。

490

督办官

针对绝对主义的贵族抗议在外省也同样凸显。可能应该重提督办官“统治”的绝对权力，这一统治在18世纪中叶达到顶点。

所有这些“分派的特派员”，其目的是在司法、治安，尤其是财政领域执行国王的命令，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已成为众多研究的对象，非常引人关注。正是由于督办官们的努力，外省才能在18世纪获得很多现代化的工具：道路、建筑、桥隧工程、港口等等。督办官们鲜有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尤其是涉及通过废除共同使用权或是瓜分市镇土地而“改良”农业的计划时的关心程度，确实只在征税官中才能找到。他们同样反对某些地方利益堡垒中存在的腐败或是不公正，如市政会议、商会、农业协会或是排水团体等等。此外，仅仅把他们看作专制权力的盲目执行者是错误的。他们不仅知道如何使来自凡尔赛的指示与地方现实相适应，而且他们往往表现为所处财政区面对中央政府时的保护人。再则，他们的任期往往较长，这一点使人确信他们对传统权力，如高等法院、等级制会议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特殊

的环境与他们的性格有时也阻碍了——作为国王的特派员，原则上最终决定权属于国王——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们显然始终是这些总自以为遭受剥夺的团体的眼中钉。但是随着这一世纪的时间流逝，以及中央政府之原则的演变，督办官逐渐丧失了他们曾一度拥有的具有绝对权力的总督的特点。此外，他们往往必须重视那些出身于宫廷大贵族的省长们的意见，后者又部分重现了似乎已被路易十四最终剥夺的光荣与影响。

最后，甚至督办官一职也将在政府中受到质疑。作为行家里手的杜尔哥根本就不喜欢他们；内克削减了他们的特权，并考虑取消它们。1778 年至 1787 年间成立的各省议会最终夺去了它的很多光彩和权力。

中央政府

在这些情况下，往往与绝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集权化的概念本身也应该认真地重新考察。与政权中如此多的事情一样，它是一种趋势，一种事实上组织了其网络、宣布了其目标的原则，而不是运行中的现实。地方层面整个一套复杂的影响体系确实有如刹车或是缓冲器横亘于中央政府的意愿——它本身是犹豫不决的、交替的和矛盾的——和理论实施范围之间。由此，尽管有监察官及其代理人（他们自然筛选信息，再缓慢地传至其收信人），凡尔赛及其各个机构在王国的日常生活管理上仍很不完善。结果，他们的指令根本无法影响外省生活，各种利益集团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地方主义的，并且相互之间不完全地联系在一起。由于缺乏上层指令的有效传播，尤其是整个组织“结构”的缺失，法国——尽管存在中央集权化的绝对主义的幻想——在 1789 年依然只是相互分裂的民众的集合体。 491

此外，政府行动所必须依赖的数据资料的准确评估，由于社会与经济现实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整个 18 世纪，法国政府都是在对王国的组成力量茫然无知——绝对的无知——的情况下行事的。然而，绝大多数财政总监将实施各种调查，其目的在于深入研究，并在不同程度上对那些真实问题有准确认识，至少是大致状况。他们的工作始终是不完全的和有依赖性的，因为那些靠不住的、片面反映情况的官

员或权力机关提交的信息不准确。无论是 1745 年后变动频繁的财政总监，还是“负责”这些事务的各个机构，都未能制定“统计表”，即使是非常粗略的都没有，而这些统计表的意图比其使用更应得到称赞。有关人口的准确估计很晚才出现，是在特雷任财政总监时。而那些推动社会团体的深层运动至多只是被臆测。甚至涉及生产的也只是个大概，如不同类型、不同价值的产品及其重新分配；由此根本不可能对税收进行公平分配。一直要到 1781 年内克的《财政报告》（初步的、不完全的，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提供客观信息），预算草稿才被公布，不难想见，这引发了那些认为财政秘密是最小心翼翼保护的国家机密的人的惊愕与愤怒。除了远未能逃避指责的财政负责人外，那些“爱花钱的”大臣——陆军、海军和外交大臣——与国王始终傲慢地对一切财政事务漠不关心，而贵族出身的宫内侍从们也花钱“大手大脚”。在政府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正是这种放纵贵族阶级的心态。

由此，绝对主义统治方法的矛盾与缺陷将在 18 世纪的历程中显现无遗。与所有官僚体制一样，法国行政体系比路易十四时期更为复杂且有很大不同，因此更加需要稳固的原则以及合法、持久的权力运转。然而，当旧制度下最后一位真正的首相弗勒里去世以后，无论路易十五还是路易十六，这两位都是极端珍惜自己权力的人，从未想过将其长久授予别人。没有哪位大臣能够自信不会突然失宠，或是确信自己的权威不会因为以下两种原因而受挫：一是来自同僚的竞争，它往往由君主暗中煽动；二是那些没有政治身份，但却对国王有很大影响者，如国王的情妇、王后或是亲信的阻挠。喜欢得知秘密以及秘密行事，同样也是绝对主义政府的特点。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就利用书信检查处对私人通信秘密的破坏来获悉——此外有时是以可笑的方式——其臣民的思想与道德状况。在外交领域，秘密外交使团（由摄政王创立，为路易十五所固执地恢复，并由路易十六延续至铁柜事件）阻挠了外交大臣的公开外交，未能在君主与其大臣或是交谈者之间的关系上引入真诚可信。在这一状况下，为了在国务会议之外处理与解决事务而数量增加的大臣委员会，虽然能带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技术革新，

但是却没有像英国那样标志着迈向内阁政府的政治结果。从政治角度看，它们的特性至多只是让其成为另一个宫廷小集团，暂时更有权势，但却从未有确定的未来。因此，在日渐高涨的怀旧、怨恨和急躁浪潮中，绝对主义似乎越来越具有专制主义的特点——可能有所简化，但却非常相似。臣民们过于简单化或是外交上的忠诚并不想将这一进程归咎于君主，君主是民众的父亲，受根本法的束缚。相反，那些持最为坚决反对态度的利益集团自然聚集起来以揭露“大臣的专制统治”。 492

危机临近

事实上，在18世纪下半叶，政权已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即它的权力形式、源泉、实施方式，似乎都不再能在社会、经济、宗教乃至国家领域中遏制、阻碍那些与其作为基础的原则相违背的利益的扩散。启蒙哲学虽以辛辣的文笔揭露时弊，但是也知道提供榜样和构想补救措施，以及在政权的有关方面内寻找那些受到体制削弱所带来的直接好处诱惑的盟友，因为这一体制所具有的专制有一天也可能转而针对那些“所有者”。由此，那些最为敏锐、往往也是最为仁慈的大臣们将为了挽救政权而赞成启蒙哲学家的某些建议，然而，他们至多只能尝试部分改革或是试验，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攻击缺陷的深层根源，甚至是绝对主义权力的根源，也就是说王权神授这一整体。

莫普与特雷推行的改革在司法领域是有效的，在社会层面则是公平的，它们恰好与“开明君主制的”改革相对立，后者将绝对主义推至“纯粹”权力的顶点，没有任何相抗衡的力量。王权神授的此种专制，惟有依赖国王与刚毅决绝的大臣、民众——能从这一政府形式中获得足够多的利益，并发现其优于之前的政体，从而毫无保留地加以支持——的紧密协调才能持久。路易十五的去世（1774年）以及实验的突然中止几乎使人无法想象原本最终留给它的是何种命运。对于一个不受限制、没有平衡力量的权力的超越个体的根本问题，很难想象能够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

最后，这也是当时的最大矛盾：对于国王职责的深刻含义，君主们没有能力理解，即便是以过于简单化的术语来表述也是如此。被安

置在凡尔赛宫这一与世隔绝的人造世界中心的国王，成为陈旧过时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囚徒。人们难以相信，把时间优先用于狩猎、仪式和外交——完全是“骑士的”活动——的君主，会在深入研究政府的技术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间。无论是路易十五——尽管性格上存在严重缺陷，但头脑更敏锐、个性更复杂，还是路易十六——性情冷漠，政治上极其天真，都未曾接受过足够的智力教育，使自己得以承担在这一时代下变得复杂和沉重的责任。行使权力对于他们来说既没有吸引力，也提不起兴趣——除了以基本方式，然而他们明确意识到上帝授予他们的王冠所带给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责任，因此他们固执地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损害。这一姿态并非不威严，但是，这再一次地属于一种道德风雅——颇具古风，而不是与之相似的政治训诫。仅靠高傲姿态已不能阻止日益高涨的批判浪潮，后者来自各个方面，对政权进行攻击。以武力手段行事也已不可能；1789年，路易十六在饱受教训后才明白，甚至在国王可作为绝招来使用的军队中，也不存在盲目的忠诚了。

493

二、观念的统治

追求理性

启蒙运动

如果所谓的启蒙运动是指一种系统的、一致的和排他的哲学的话，那么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种哲学。人们可以说有多少位“启蒙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丰特内尔是机械论者，伏尔泰是位心有不安的有神论者；爱尔维修是位“自私的”唯物论者，狄德罗则是过于讲究道德的唯物论者。布丰是博物学家，拉美特利是医生，达朗贝尔是几何学家，孟德斯鸠则是法学家。然而，所有这些人都共同具有一种由科学方法而激发产生的思想态度，并在对事物的实证研究中寻找直至当时仍被各种“偏见”遮蔽的事物间的相互关联，从而取得新的更

为深入的解释。启蒙运动哲学是一种经过更新的“才智”，一种新的“视角”。这一视角的原动力不再是信仰，而是真正具有启示作用——启蒙一词即源于此——的理性。在 18 世纪，这一理性还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是为固有观念、人性的公理原则提供了辩护的笛卡尔哲学的理性；另一方面，是同时缓慢发展的实验理性，两者相互之间得到启发。笛卡尔哲学的唯理主义为思想与文化界提供了精神氛围。另一方面，不论牛顿和洛克的实验主义已对它作了多少修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仍将遵循笛卡尔主义喜爱概括的理性形式。事实上，对具体事物充满激情的启蒙运动哲学并不敌视各种论断，而且往往假设有关大写的自然、进步、幸福、自由等新的一般概念的固有观念论，由此常常导致一种新的“正统观念”、新的因循守旧，而各种事实被认为是屈服于它们的。结果这种精神状态——由于擅长运用各种观念而表现为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思想上的精湛技艺——显然属于世界哲学财富的一部分。但是，这种“笛卡尔主义”的结果更具深远意义。处处都以作为手段的理性和作为真理保证的事实为替代，并正在摧毁教条、传统和遭人厌恶的“形而上学”帝国的哲学论据，在物质世界中寻找真理，首先是在实践中。在它所偏好的这一人与事物的有形世界中，在最坏的情况下，真理与功利混淆在一起。由此这种“经验的”笛卡尔主义提出了一种其意愿与理由皆外在于教条的道德。因此，启蒙哲学家更多的是有理性的人，以及好推理的人，而不是真正的推理者（raisonnants，在这一词语的经院式词义上），人们可以说启蒙运动时代并不是理性的时代，而是反抗唯理主义的时代。

哲学家们相信：知比无知要好；社会问题可以通过理性行动加以解决，这一行动是以研究和分析，而不是祷告、遁世、听任全能的先知先觉为基础的；争论比狂热崇拜要好，宗教或传统的所有论据、教条主义哲学的反对意见，事实上都是禁锢知识和支持蒙昧主义的。但如果说，事物的真实性或至少是合理性清楚显现了理性的公正论证，那么它也源自——而且还更为直接地，哲学家们将越来越如是说——那些自然状态、天性、觉醒的感觉和正直所迫切要求的内心认识。伏

尔泰、狄德罗、卢梭都赋予了内心世界和感觉以一种比理性更大的价值，以此来领会、解释或是指引现实。另一方面，尽管哲学家们将直到那时应用于物质的规则运用到有关人和存在的事实中，尽管某些哲学家，如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认识到大量人类现象是由物494 质——正在起作用的物质——决定的，但很多人并没有将他们的前提推演到底，而是将继续与一种或多或少显现的自然神论联系在一起。无神论是如拉美特利那样的“机械论者”或是诸如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这样的“实验主义者”的业绩，抑或是那些在其有关“整体的”人的研究中最为大胆者之业绩，狄德罗依旧位列其中。其他人，因为他们并未完全摆脱社会习俗，尤其他们的理性观是更为道德的、社会的或是实用的，而不是完全科学的，所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为上帝保留一个最低位置。

因为它涉及更新整个世界，至少是更新整个世界观：不再是围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的神启——晦涩的、不可思议的、历史上不一致的、有害的，总之是站不住脚的，而是围绕着恢复自由的受理智控制的人来组织这一观念。它所涉及的人不再是其本质通过形而上学教条得以解释，或是为政治、社会传统决定和限制的神学“创造物”，或是传统制度与团体的“臣民”，而是它所产生于其中的物质的、有形的和可测的“自然”的一部分，并且分享了其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一自然，不仅是牛顿所揭示的事物不可抗拒的秩序，而且也是当人们考察那些被指责为“野蛮的”、“哥特式偏见”、“愚蠢的狂热崇拜”世纪——绝大多数政治、社会制度即源于此——时，重新发现的残余的起源基本上是好的。因此，运用理性和自然的人应该将它们应用到当下的物质、道德、政治、社会现实中去，总之就是运用到与其本人以及与社会相关的实际对象中去，从而使它们摆脱教会教条和国家所阐述的历史传统的权力影响。由此，启蒙运动的批评——基础的或是应用的——导致了摧毁各种“习俗”的权威，并很快摧毁了那些最为脆弱的制度的权力。被迫处于防御地位、以锈钝的兵器进行战斗的神学论据和历史论据，是理性的两个首要的不可调和的对手，它们必须

让位于基本论据的重新界定。这种从“狂热崇拜”或“偏见”中解放出来，也是具有某种略带悲观主义，甚至是斯多噶式的顺从的怀疑论的。这种顺从态度在启蒙运动中并非就不存在，正如伏尔泰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过分的“睿智”，其结果即便不是痛苦，那也是忧愁。

进步

但是，当启蒙运动处于顶峰之时，即大约在1750年至1760年间，“哲学家的”态度是最为乐观的。这种态度就是相信——在某些人那里则是信仰——理性能够指明通往使事物与存在得到改善的道路；相信进步是可能的。这种乐观主义仅持续了一段时间，幻灭取代了自信。对于进步的最后颂歌由孔多塞所作，他本人很快成为新的狂热崇拜的受害者。随后，由于敏锐意识到可能是人所固有的弱点对理性胜利所造成的阻碍，这种乐观主义始终处于克制状态。启蒙运动的悲剧性的人文主义，盖伊如是写道。这一清晰的目光、不愿受骗的意愿，以及没有超自然回报的“服务”信心，它们是艰难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这使得哲学姿态首先可能是一种勇气。人们容易不怎么在乎哲学家或知识渊博者的日常生活，事实上，除了卢梭是个例外，这些哲学家或知识渊博者很少遭受痛苦折磨。他们人人都是贪图安逸与舒适的贵族或资产阶级，并诉诸于跨越他们拥有一席之地——往往是显要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人性，而且他们是想在没有轻率地受牵连的情况下为之服务。然而，还是有很多人遭受了始终能进行恶意的突然袭击的当局的起诉和迫害。说到底，即使人们承认没有——尽管存在流亡、投入巴士底狱、烧书和各种纠缠——被“诅咒”的哲学家（而且因为他们自身之间也几乎不讲情面而更不可能），但是，拥有如下意愿，即参加思想领域的重大冒险，对如此多的已有知识和思想提出质疑，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更为自在地加以保存，摆脱如此多的习俗等等，至少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中是需要勇气的。

495

在一个如此广阔的运动中当然也存在不确定、不足和糟粕。这并不重要；正是由于这一运动，那个时代极力寻求促进对未来的认识。不论是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理性或情感，在进步中寻求幸福或信仰，

这都只是一些力量形态，它们联合起来以摧毁那些自然、功利、公正都不许可的习俗、惯例和制度。正是由此，人数虽少，但却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即哲学家和其信徒们制定了一系列动力线，这一时代的某些主要方面就是围绕着它们而逐渐排列的。

迈向启蒙

18 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对教会所提供的古老解释，以及对传统社会与政治秩序所要求的顺从公开提出质疑的行为，有其深远根源。长久以来，很多人拒绝，或者只是适可而止地在智力上，甚至是在思想或政治上赞同某些思维或生存框架，对于这些思维或生存框架，迅速转变的世界的各种条件，似乎已不再能对它们加以解释和证实。

虽然所有这些趋势都正在加快，但也反映了英国思想带来的深刻转向，以观察和实验技术为起点的归纳推理在英国思想中表现得远比在法国思想中突出。从牛顿和洛克那里，18 世纪这一法国的世纪接受了对于理性和自然权利的无法抑制的信仰，同时还有对于经验和感觉的绝对信任。

自然、幸福、法律、进步

洛克主张的实验经验主义对于重要的思想发展具有最大影响。它在各个最为分散的领域内改变了受困于传统的思想态度，并由此对真正科学精神的出现产生了首要影响，这就是将古老的博学研究传统与英国思想相结合。科学领域的巨大发现刺激了精神冲动，产生了通过应用相互关联的发现来改善人类状况的思想。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进步。在这一世纪里，巴黎和外省的公共与私人实验中心、实验室、工作室、杂志、书信、研究考察团、研究室、学院、协会等不断增加，这一繁荣景象对于科学的促进作用，就如同哲学争论对精神与真理所作的促进一样。甚至相对独立的严密科学也为观察科学的发展所触及，后者对于那些在新实验环境中产生的发明的调校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新环境已成为该世纪的突出特点。这依然是与洛克的思想直接

相关的，后者以诸如孔狄亚克——在科学方法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的继承者为中介。而它对于那些依然有如此多的经院的或是神话般的公设（化学直至拉瓦锡时都受到燃素说的束缚）的实验与自然科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同样地，重农主义，或是以自然力量为基础的统治——以科学的观点来看，是以农业的生物学研究为基础的——也属于这一姿态，而作为这一运动的领袖的魁奈是位医生。农业本身也成为“供实验的”。但是在观察和实验的所有对象中，人自然是首要的。有关自然人的研究始终是“应用”哲学的关注焦点，而医学和生理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都应归功于它，例如其中非常突出的对注重分析性格的临床观察（如拉瓦特尔将使之系统化），以及对“病例”——将为文学提供一个新的领域——研究的偏爱；由此卢梭描述了自己的受虐狂，莱斯迪描写了自己的恋物癖，拉克洛剖析了道德败坏，萨德则草拟了一份人性中极端可怕行为的目录。这种对于性格的物质基础的强调导致了道德依赖于物理学的观念的出现，由此产生对于医学——对一个事物的作用是通过另一个事物实现的，以及教育以相似方式起作用——的兴趣。这些观念甚至将改变对艺术的理解，如狄德罗在《关于演员的与众不同之见》或《沙龙》中提出的观点将对绘画产生重要影响。对性格的分析很自然地加入了对习俗的分析，有如此之多的风俗剧和世态画涉及到了后者，其整体有如这一出现戏剧热的世纪的“人间喜剧”。同样构成勒萨日、普雷沃、杜克洛、卢梭等人众多小说的主题的习俗研究，也成为色情小说的借口，法律研究（从《论法的精神》中的气候理论直至卢梭为科西嘉和波兰构想的宪法）的基础，以及经济研究（有关奢侈品的研究提出了习俗与道德之间关系的问题）的基础。

496

在通过这种人性的现象学所显现的众多行为之下，哲学家们强调或是揭示了能够解释人的根本特性问题的某些深层结构。某些更感情用事或更乐观的人，在其中发现了自然的同情。数量更多的其他人则重新发现了霍布斯的观点，即作为自然创造的人，在其活动中是受自卫的本能驱动的（整个一套统治理论由此展开），而理性则确定了最

佳使用。即使同情与本能构成了人性中不能减少的核心，自卫的本能也仅仅是更为广阔的人力——追求幸福——的一部分。

幸福

这一幸福至善的观念既表明了一种精神态度，同时也必然意味着否定传统观念，如基督教的通过不幸或痛苦来得到净化的观念，抑或贵族和军人的英雄气概优先的观念。幸福成为存在原则和生活习性的观念意味着以科学精神分析幸福的条件，同时从幸福的视角对存在状况——依据不同的个体和社会集团——作系统复查。除了它的情感或文学蕴涵，以及模棱两可之处，幸福的观念为哲学打开了一个从卫生学到心理学、社会学的巨大观察领域，并为其提供了一种清晰有力的“社会”意识。即使由于强调幸福的重要性和新的获取权利，使得他们只是将基督教态度看作社会统治的借口，哲学家们仍然以各种具体名词对平淡无奇的幸福提出了动人的和令人生畏的问题。

由此人类活动的主要道德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利己心（爱自我，或是人追求己利）来加以分析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与人性或宇宙特性一样，能够包含价值判断，并且加速道德与宗教的分离。497 由此，整个人类组织、法律、政府都从上帝创造中解脱出来，成为追求幸福的人类理性的结果。孟德斯鸠也能如此写道：法律是“人类理性，当后者支配地球上的各个民族之时”。

对于这一普遍观念的最为直接的异议之一，就是思考生活在社会中的数百万个人如何才能在相互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寻求每个人自己的幸福和利益。答案——无论以何种方式——由社会契约理论提供，根据这一理论，“自然状态”的人相互合作以组成公民团体或是社会，并且服从于一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法律。无论其动机是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对相互摧毁的担心，还是卢梭所说的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善每个人生活状况的意愿，18世纪的理论家们一致认为原始契约已经形成，由此社会生活能够以有利于组成它的个人的形式发展。不过，当涉及人类合作的实践基础时，哲学家们之间产生了深刻分歧。孟德斯鸠，以及卢梭与其信徒们，在这一问题上与英国伦理学家观点一致，

倾向于相信对于他人本能和固有的同情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因而，愿意与其他人合作乃是他们的天性；而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甚至认为，这一同情是自然的目的。然而，大多数思想家，如伏尔泰、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和其他人等，则确信事实上合作只是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利用，它们以个人私心为基础，但其普遍结果显现了社会关系上的用处，并最终是有益的。无论是谁，都接受这一观念，即法律和政府——其建立是为了实行积极的合作，或是为了控制并最终阻止个人间的竞争——应该以它们对人类幸福的贡献为标准来证实自己的特点与存在。

在有关世界的精神、心智、具体和有形的态度，以及有关其解释和行动者上发生的所有这些变化、动荡，都伴随着反抗和不安，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意识到新时代的巨大活力、汲取其他力量以使之更新的可能性，甚至是依据其他标准重组旧的社会结构。对于改进是可能的、更好的尘世生活是能够实现的确信，将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确定为主要工具。然而，正是对新力量的反抗使得政治、社会气氛既能提高效率，同时又减少往往针对它们的刻毒批评，尤其是减少宽容。由此人们看到，在政府中间同时存在迫害异己（1724 年、1752 年、1762 年针对新教徒，以及直至 1770 年左右的不断针对哲学著述）和更为现实主义的思想潮流，后者是在思想与政治世俗化中获得的，意味着观点的多样性。在绝对权力必须保持与传统宗教秩序之联系的体制内，这种态度不容易获得承认。很多人继续认为世俗社会与政治秩序的统一是与信仰一致紧密相连的。相反，对于已赞同宽容的其他人来说，多少应对将神启看作解释整个世界的观点表示异议，并转而接受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认识的可能性。

不过，还存在最后一个困难。如果社会世界是注定为人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因此注定增加了人类幸福——的人类理性的创造，那么对于世界依然存在如此多的苦难与不幸又该作何解释？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纠缠他们的问题，哲学家们着手批判法国社会。他们所有的著作都揭露愚昧无知在过去是如何通过欺骗而创造了那些无法实施，确

498　切地说是与所有人的幸福和谐生活直接相悖的制度与信仰的。几乎没有人否认，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已在迈向幸福上取得进步；没有任何人声称进步只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开始的。但是，所有人都确信，在此之前的进步是缓慢的、游移不定的，而且往往纯粹是偶然的。所有的人，甚至包括伏尔泰，最终都承认，人类理性可能迷失，或是被错误地引导。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诸多人士并不否认，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和对历史的认识为基础的悲观主义，能够使迅速改善人类状况的乐观思想有所减弱。甚至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对进步作了最为系统的思考的孔多塞，也只是得出相对进步的结论，而他有关自己所处时代之人性的看法流露出的是一种希望，而人们根本无法将之称为乐观主义。但是，所有哲学家都认为，人类状况的改善取决于哲学观念在社会中的传播。

由此，启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特指天主教会），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新学说传播的持久和根本障碍，而且在历史进程中还始终起了本质上是蒙昧主义的作用。由于其心智贫乏、过分和不恰当的虔诚狂热，或仅仅是出于贪婪，教士阶级总是利用人们的希望、畏惧、无知来阻碍人类精神的进步，并使自己的精神权威以及等级、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永存。

反对法国天主教会

与法国天主教会似乎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该教会所具有的官方地位、审查和引导舆论的广泛权力、对如此多的社会阶层的决定性影响，都是对哲学观念传播的障碍。事实上，天主教会——不论其内部如何分裂、变节者数量多少，甚至是其宗教学说如何缓和——不忘利用自己所有的政治或社会优势条件来强烈反对此种传播。

没有哪个人像伏尔泰那样，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摧毁教会权威和粉碎“无耻行为”的斗争，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他撰写的各类相关著述达 100 多种。正是他——依据时代口味及其文学特性对那些不信教者已有论述的各种主题加以改编——对辛辣讽刺的技巧加以调整，从而不仅嘲笑教士：过分虔诚、盲目狂热、社会缺陷，而且还嘲笑基督

教信仰的荒谬：圣经文句的不可靠、宗教仪式的蒙昧主义。他的追随者和门徒们还将它们与世界各宗教相比较，试图证明它们能够简化为一些简单的道德原则，并进而推断出自然法则，而无需昂贵的宗教仪式、宗教礼仪书、教条和教士，所有这些添加物使得有组织的宗教成为人类的沉重负担。其他人，尤其是孟德斯鸠，还专门对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作了攻击，并通过同时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历史教训来揭露天主教会在社会生活中的潜在影响。

尽管方法和观点上存在不同，但所有这些人都一致要求宗教和精神宽容。由此，横亘在思想自由——如哲学家们所阐释的那样——道路上的天主教会，自始至终被看作头号死敌。然而，如果天主教会变得被驯服、开明和净化，那么，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几个激进的、长老会的思想家，或是卢梭那样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会提出取消这一法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基本组成部分的主张。 499

反对哲人者

有关启蒙运动的研究，即使篇幅不长，也应给启蒙哲学家的对手留出位置。农诺特、帕利索、弗雷隆、莫罗等人，对于“哲学阴谋集团”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反感，而后者对于他们也百倍厌恶。二者相互关系的历史的突出特点就是这些厌恶，它们贯穿了整个鲜活观念的运动。但是，除了个人问题以外，启蒙哲学家的对手们还担心启蒙哲学的道德与政治后果，以及过分的推理，尤其是他们对宗教的攻击。弗雷隆并没有因为依然信奉天主教，就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的《文学年报》是当时的一份重要刊物，载满是值得注意的书评和敏锐的文章。事实上，启蒙哲学家的对手们并不反对启蒙运动。他们体现了启蒙运动的一个方面。莫罗在与启蒙哲学争论之时，在大臣贝尔坦的赞助下负责收集中世纪证书，并组织了对中世纪古文字学的研究。由此，他重新回到铭文学院所关注的问题，该学院在“哥特式”声名扫地的时刻，以拉居尔内·德·圣帕莱伊和布雷吉涅为中心，聚集了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本笃会研究人员的推动者，他们有关法国历史

史料的工作，与同为贝尔坦组织的东方学研究一样，是这一世纪最大的知识冒险之一。在正式的启蒙运动之外，亦有许多知识渊博的人。

事实上，在沙龙和文人圈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并没有将一种17世纪末以来始终存在的思想潮流加以消除。虽然与幸福、自然纯洁等原始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哲学”、美德的观念已由众多作家详尽论述，但是在一定范围内，对于古代人的赞美和对基督教的依恋仍然显而易见。这一与启蒙哲学相对的潮流，显得像是启蒙哲学的较不引人注目的补充。它的很多主题将在卢梭那里重新出现，并进而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前期这些启蒙运动的反常产物中重现。

《百科全书》

启蒙运动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在《百科全书》中得到集中体现，人们称它既是一部书，也是一种“行为”。始于1750年的这一庞大事业，试图为这一世纪中已获得的知识予以总结，并且比培尔的《辞典》或当时刚在英国出版的钱伯斯的《百科全书》更为完整。作为科学著作，《百科全书》是有缺点的，往往更新不够或是非常保守。这是由于数量众多的撰稿人缺乏一致造成的，其中最有名的人——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杜尔哥只提供了少量稿件——的数量仅为那些最低微的埋头苦干者的一半。但是，该书的总体目标令人激动。它展示了人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认识所可能达到的非凡程度。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书中鼓励读者们展开自己的思考，在科学与历史而不是《圣经》或天主教会的教义中寻找真理。这一事业的创新之处在于指出了人的幸福掌握在人自己手中，他能够理解一切和实现一切，只要他从直至当时仍然阻碍其进步的事物中解放出来。尽管伏尔泰给该书的供稿甚少，但每一篇都体现了他的追根究底和批判精神。自其问世起，《百科全书》——尽管定价高昂，但其预订者仍达到可观的4300人——就遭到了天主教会的猛烈抨击，并在1759年一度被查禁。1765年，最后10卷同时出版，随后在1772年出版了10卷插图、有关当时“艺术”和技术的无与伦比的文献。达朗贝尔于1758年退出。但狄德

罗得到了蓬巴杜夫人、尤其是时任书报总监的马尔泽尔布的支持。此外，迫害反而促进了该书的成功，使其成为一项巨大的生意。

百科全书的信条在达朗贝尔撰写的著名的《绪论》中淋漓尽致地得到阐述，成为新姿态的格言："应该毫无保留地、直截了当地研究一切、撼动一切"。道德视角是以普遍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与个人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公用事业和美德的必要性之间的必要协调这一论题为基础的。幸福是与个人的安全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人在一个稳定而开明的政府统治之下，作为"公民"而努力实现普遍繁荣。这些《百科全书》所谓的"公民"——就像绝大多数启蒙哲学家一样——是些"知识渊博"和"聪明"的人，受过教育，总之是些资产者。尽管在伏尔泰晚年的思想中将看到相关发展——变得对民众的要求更为同情，尽管狄德罗对民众具有本能的同情，但是，过于粗鲁的民众必须从权力的直接实践中被排除出去。甚至卢梭也认为，最好的秩序是由"最聪明的人统治民众"。因此，以非常保守的方式思考社会结构的百科全书派，并没有对其进行直接攻击。对于与政府相关的那些观念亦是如此。传统的君主制形式被保留，因为它最适合法国。法律应该成为对于使整个政府堕落的"事态的力量"的抵消力量。总之，《百科全书》表达的是一种"英国式的"君主制观念，然而它有时也以比卢梭更有力的方式，界定了民族及其代表的权利的不得转让。总之，尽管启蒙哲学的思想纲领认为，无尽的发展是可能的（但很多哲学家本人将对革命者从他们的争论中得出的结果感到害怕和惊讶），他们的改革计划是非常有节制的，其导致的结果是，要求政府更大程度地开放、停止宗教迫害和宽容少数派，以及最终通过魁奈的文章要求农业生产的改革，后者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革。

启蒙的国度

启蒙哲学家们梦想有一个完美的国度。这一世纪已有众多乌托邦，它们的重要性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启发意义。除那些延续了《忒勒马

科斯》[1] 和萨兰特王国[2]传统（其主题是关于社会组织、农业的神圣地位、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在整个世纪引起反响的公正与和谐的建立）的乌托邦外，还应该提及《波斯人信札》中的穴居人故事，甚至是狄德罗对塔希提的回忆，在那里居民们只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事实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更多的是表述了对失去纯洁的遗憾，而不是阐述一个具体的规划，或是简朴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社会契约论》不是以其十分严格的演绎推理而产生了一种难以实现，因此也是乌托邦的社会形式吗？尽管他们在人类学或地理学方面所作的调查了解非常肤浅，甚至在他们的推理中，仍延续了相当多从经院哲学继承而来的态度，但是，启蒙哲学家们已指出了方向，并确立了一种将一切都系统化的社会道德氛围。他们憎恨一切恶习：一部分人生活贫困，另一部分人则奢侈享受，压榨民众的毫无根据的种种特权，以及奴役人们精神的专制主义。某些人，如伏尔泰，鼓吹奢华，认为它给制造业提供了工作，是文明的完美结局；其他人，如狄德罗，则希望适度；很少有人提倡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他们同样参加宗教仪式，而他们的思想应当说也是一种宗教，它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民族，是一种完全社会的和发泄心理的宗教，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避免使教士离开宗教领域，并永远不让他们与国家联系在一起。

501

批评

在这一理想国里——通过法律得以保障的自由使人成为“公民”；维持在公正范围内，并且绝对纯洁的财产权，除了在卢梭、马布利或摩莱里那里以外，都完全被保留下来——涉及奴隶问题时就变得畏畏缩缩，只有天主教士雷纳尔充满激情地讨论了这一问题。

在批评其他“偏见”的同时，哲学家们——除了作为贵族的孟德斯鸠——严厉批评继承自中世纪的军事和“封建”价值（而且还与基督教价值、勇敢、朴实无华、忠诚和牺牲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认

① Telemaque，费奈隆 1699 年出版的哲学小说。
② Salente，《忒勒马科斯》中的国家。

为它使军队和天主教会成为互为补充的、平行的和同样显要的“职业”。启蒙哲学的反军国主义自然成为它反对贵族的传统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也往往是与对政府的真正优先领域毫无所知——尤其是伏尔泰——而产生的分析的结果。这种反军国主义不仅表现为缺乏爱国主义，而且还体现为政治抗议以及对和平、“开明”的法国的向往，而不再是好战的和传统的。

建议

所有这些批评和比较并没有构成一个“规划”，如果人们将后者看作是一系列基本改革的有机整体的话。至于哪些基本改革是最为人所希望的，哲学家们的立场同样有细微差别。绝大多数倾向于接受对现存政治模式作或多或少地调整。与绝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伏尔泰也是位“主张立宪的绝对主义者”，他们认为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君主制的现实的替代物。贵族阶级过于自私，而大众又太过愚昧。君主制应该是有用的；它拥有善治所需的各种手段，只要它包含了保护个人权利、尊重公共舆论和遵循“根本法”。这一保守立场维持了强大君主制的传统，只是通过遵循一些常识而对其有所改善。第二种立场，则经孟德斯鸠而得到严密论述，主张贵族君主制，其中国王权力将受制于贵族和贵族“团体”的具体控制。这里体现的是毫不改悔的封建主义、穿袍贵族的傲慢和反对专制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传统。

第三种立场，在当时最受争议，是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代表，其中以“笛卡尔哲学式的”严谨阐述了这一根本问题：“找到一种联合形式，从而能够以所有共同力量捍卫和保护每个合作者的人身和财产，而且通过它联合起来的每个人，仍然只服从自己，并与此前一样是自由的。”通过寻找使个人自由与社会组织的要求完全一致的模式，卢梭就提出了人民主权和政治民主制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政府只是人民公意的行政机关，并完全受其控制。关键在于这一主要观点：人民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代表主权的国家权利高于个人权利、宗教不能不受束缚。具有同样重要结果的是卢梭赋予感情和感觉的重要性，将它们看作是新事物秩序的完全不同的心理基础。

502

重农主义幻想

法国政府思考的唯一理论是重农主义，尤其是因为它就财政危机提供了解决办法。从财产——私人财产——的自然权利出发，重农主义者要求有权自由支配财产和通过在自由市场环境中买卖的权利来为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然而，只有农业（附带矿山和渔业）提供了增加财富的真正的或纯产品。工业仅仅转变了粗制品的形式，而商业只是将其重新分配。由这些前提引出所有土地和商业交换关系必须被赋予尽可能的自由，强调重点被意味深长地放在了谷物贸易，这导致了经过改良的农业生产重要性的增加，并且伴以中止政府对不同工业和商业部门的补助金，由此将实现一种更为平衡、自然和繁荣的经济体系。那些“所有者”，是新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同时也是主要纳税人，他们将因此而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在法国政治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框架下，这些建议——不仅以农业投资为基础，而且还以交换自由为基础——意味着推翻原有的法国经济政策。但是在如何使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真正付诸实施上还有待学习的重农主义者，并未考虑对已然存在的君主制政府作根本性的转变。相反，唯有君主的权力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结束“团体”的特权、特殊利益，以及不合理的经济原则，而一旦重农主义获得确立，这些都是注定要消失的。由此，重农主义者也称自己为“合法专制主义”，也就是说摆脱了团体的自私自利压力的君主的绝对权力，但是在强制自己的法律原则——受到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启示——的控制之下。总之，是开明君主制。

新观念的传播

即使他们的思想中包含了革命原则的萌芽，但启蒙哲学家们根本不能算是革命者。他们思想上的大胆，由于他们自身所属的以及他们著述或朗诵时所针对的社会阶层的规范而被削弱了。启蒙哲学家们既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个党派，更不是一个教派。如果人们只是以此来指那些重要思想家的话，那么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如果加上他们的弟子、注释者和模仿者，如果人们认为“哲学家”是指贵族和资产

阶级世界——在整个18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哲学都局限于此——中的“学识渊博”和“敏感”的人的话，那么，他们的人数就颇为可观了。

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或是重要的文人不是通过沙龙成名的。确实，正是经由上流社会人士与文人发生交往的沙龙，哲学表达方式逐渐形成。对于迅速达到并且出色地表述有效和相对的真实，而不是就绝对真实撰写长篇论文的考虑，以及对现实问题而不是永恒问题的喜好，奠定了哲学的基调。它首先涉及使人感兴趣、“吸引注意”、讨人喜欢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观念的统治，也即书籍的统治，是和宣传无法分离的。书籍——使出版商发家，并促进了作家们的物质独立，由此也就是思想独立——增强了某些人的“资产阶级特性”，而他们对安全的渴望引发了对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不满。

革命的临近

1760年左右，一切，或是几乎一切都已确定。孟德斯鸠的著作、伏尔泰和魁奈的主要作品要早于这一时间。《百科全书》的出版已经完成；卢梭的三部主要著作，即《新爱洛漪丝》、《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已在1761年至1762年间相继出版。由此，在随后的25年中，这些伟大作家的哲学思想深入传播。它赢得了贵族、教士、政府中的有影响人士的支持，这些人意识到了巴黎条约之后声誉扫地的国家的危机。关注点越来越转向小庇特治下的英国，并在“思想家”所谓的民众身上发现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已提到的政治与社会美德。法兰西学院[1]的常务秘书杜克洛，以及接替他的达朗贝尔，使这一学院成为启蒙哲学的堡垒。新思想渗入了各个社会阶层，从资产阶级直至地位低微的乡村神甫或是小学教师。鸿篇巨制（尤其是《百科全书》）出版的增加、它们在外省知识界的传播、雷纳尔和霍尔巴赫的大胆和猛烈批判的著作在私人图书室中所受到的欢迎、卢梭著作的深受喜爱，这些都是思想态度发生转变的征兆。报纸和杂志中科学文章——法学、农村经济

503

① L'Académie fuançaise，也译成法兰西学士院或法兰西科学院。

学、政治经济学——比例的不断增加充分显示了启蒙运动的进步。最后，在无数证词中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年轻一代资产阶级或贵族要么对宗教颇为冷淡，要么崇尚自然神论；喜爱大胆的讨论，甚至在通常更为保守的外省科学院和知识圈中也是如此；“学识渊博”或“感性的”措辞；逐渐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路易十六时期时尚的特点是深受英国影响、回归更为“自然的”的打扮，甚至是大胆挑逗，这些都体现了对于宫廷和保守贵族之标准的日益强烈的反抗。在教育领域，教学方法发生了变化，有关“近代”和法语的学习取得了进展，而在修道士中，人们甚至谈论“人的平等和蔑视毫无意义的区分”。

社会秩序与个人自治

确实，抵抗是强有力的。其中包括来自传统、惰性和惯例的抵抗，出于风格的抵抗，某些社会阶层的抵抗，如主教、监察官和地方当局。在路易十六的政府中，“反动行为”昭然若揭。在反对杜尔哥、马尔泽尔布、内克（所有这些人都很快被免职）的过程中，出现了如此多的莫尔帕、米罗梅尼尔、布勒特伊、巴朗丹之类的人物。但是，这一切无关紧要。新思想通过无数渠道得以广泛传播，改变了人们的精神和道德。当年轻一代开始大革命时，他们所拥有的词汇、阅读经历和“哲学”精神状态，不仅导向情感上的自然神论，而且也通向共和主义。哲学并不是一种反抗，而是一种倾向。在政治领域，深刻转变的机会已经逐渐减弱。哲学家的朋友蓬巴杜夫人，已于 1764 年去世；舒瓦瑟尔（不过他的作用是表面的）死于 1770 年；莫普推行开明君主制的尝试于 1774 年流产；自由派大臣，即 1776 年的马尔泽尔布和杜尔哥，1781 年的内克，都未能实现任何改变，他们的失败具有重要意义。但是，1760 年以后总体情绪的变化，如果说它源自于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话，那么它又加上了启蒙运动原则所缓慢造成的结果的影响，并达到更深程度。在很长时间里，哲学家们依然效忠君主制，相信一个唯一的神（与天主教的上帝不同，但也同样是神）的存在，并坚信社会区分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但事实上，启蒙运动哲学根本无法与作为旧制度根基的那些统治观念相一致。法国的各项体制只能继续建立在天主教会确保的权威

和传统之上，而不可能服从于理性或功利主义的标准，否则，一场可以预见的革命就可能发生。总之，一个金字塔形的、有机的“等级”社 504 会的旧理想，是不可能与新的涉及自主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的概念相协调的。因此，1760 年以后的哲学越来越意识到启蒙运动的蕴涵与旧制度的根本原则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1788 年贵族的态度已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当时，扔掉伪装的贵族们拒绝接受这一启蒙哲学所包含的平等，而他们在这一世纪中曾经是这一哲学的最为重要的推动者。

三、国家与政府问题

1788 年：处于尖锐危机中的政体

1788 年，一场对于君主政体来说极其严重的危机显然开始了。自 1778 年起，经济动荡、席卷社会与精神领域的骚动已然敲响了警钟。

卷入美洲战争的法国财力匮乏，内克必须通过举债来为战事提供资金，而这些沉重的债务压得国库难以喘息；农业灾害——葡萄酒过剩，以及随后 1785 年的旱灾——对 1770 年以来已出现的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谓是雪上加霜。农业动荡之外是工业动荡，后者源自于农业动荡，并且因为 1786 年法英商务条约造成的结果而进一步恶化，虽然这一条约似乎有利于英国商品，但是它更进一步揭示了税收对于法国产品价格的重要性。正是在完全萧条之中，1786 年价格的迅速上涨重新出现，导致破产和陷入困境，而且还造成两年的严重农业赤字和农村骚乱。

同时，在政治秩序领域出现了力量重新聚集的征兆。贵族开始报复绝对主义：显贵们拒绝支持卡隆；高等法院拒绝登记洛梅尼·德·布里埃纳的税收法令，并成为反对专制和名誉扫地的权力的核心。相信自己行动正确的高等法院，要求像 1614 年那样召开三级会议，也就是说第三等级代表人数没有倍增，维持各等级间分厅议事以及特权者的优势地位。突然显现为反动和特权者的支柱的高等法院，在舆论中

永远丧失了信誉，而面对第三等级阵营力量的加强——在从未被贵族真正接受的大资产阶级的召集下，高等法院法官们将进一步巩固贵族同盟。正是由于经济、社会和财政问题三者的结合，才使得 1789 年的危机成为一场根本性的危机。曾经声称已控制了这些问题，并且只有自己才能解决它们的绝对君主制，现在显示出其根本无能为力。因此这不再是人们以“赤字”参与其中的普通变迁，而是一场政体危机。贵族和资产阶级皆对其如此理解，二者都狂热地准备着整套解释。

外交政策的遗产

1789 年的破产并不是一场突发危机的结果。若撇开奥里政府（1730—1745 年）时经历的十年财政稳定时期，王室国库始终在困境中挣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加剧了动荡，而随后的七年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破产（1762 年和 1770 年），尽管是隐藏着的——则使之进一步恶化。1788 年诸多事件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政治的目标与其拥有的实施手段之间始终存在不一致。王国中最为重要的开支是外交和战争方面的花销，如果在维持一支庞大的陆海军之外还加上由此前的冲突产生的债务利息的话，那么其费用相当可观，远远超过了仅占“预算”微小部分的宫廷开支。由此，收入的巨大部分（1786 年全部支出的 74%，这是在和平时代，而世纪中叶各次大规模战争期间比例可能更高）被用于军事开销。然而，在这一时代，冲突中重要的不是国内财富状况，而是迅速为军队和作战行动提供资金的可能性。最有效的手段依然是借贷。如果说英国政府能够轻易地借款，那么偿付能力难以使人放心的法国政府处于更困难的境地。如果再加上领导的平庸、枢密院决断的变化不定，那么就不难理解当面对小庇特和伦敦城的商人，或者腓特烈二世这样果断的对手时，法国外交所表现出来的软弱，甚至是无能，以及与之必然相连的君主政体威望的减弱和财政的逐渐崩溃。

505

殖民政策

然而，这些自身如此脆弱的政府，其对外政策却野心勃勃，这是

路易十四对外政策的直接遗产和必然结果，即使这些政府是在和平意愿驱使下采取这些政策的，由此就再次凸现了这一时代的根本政治特点，即政府介于各种最为矛盾的倾向之间。摄政奥尔良公爵、弗勒里、路易十五、路易十六都将王国引入到各种似乎并非毫不相干的冲突中，而这也解释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由于1688年荷兰国王威廉三世登上英国王位而开启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必须在两国的殖民政策中寻找这一无尽争执的根源。始自柯尔伯时代，法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就依赖于商业和制造业，而后者的主要供应商与市场都在美洲、安的列斯群岛、印度这些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起建立的海外领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殖民地的鼓动者似乎是法国人，毫无疑问，在18世纪揭示法国人危害的伦敦商人们的畏惧是真实的。自17世纪末以来，路易斯安那，也就是通过俄亥俄河谷伸向加拿大的整个密西西比河盆地，在1748年后布满了法国要塞，其目的在于阻止英国移殖民向内地延伸，从而为国王留有建立庞大的北美帝国的前景。在安的列斯群岛海域几乎均分领土和人口，导致将竞争转移到非洲以获取供应奴隶的“岛屿”，同时，西班牙帝国在18世纪上半叶的衰落使得马德里成为英法两国继续争夺影响范围的一个对抗场所。在东方，从约翰·劳的制度破产中幸免的法国印度公司，尽管不如英国印度公司那样强大，但也足以在1740年左右开始其扩张主义政策。此外还应加上法国商业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非常明显的复苏，这是由于1740年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新订了“基督教徒权利协定”。所有这些潜在的冲突原因又由于移殖民或批发商的不和、政治与宗教激情、相互之间的残暴行为——程度之剧烈使得一方最终完全消灭另一方似乎成为惟一解决办法——而进一步恶化。美洲西部的法国发现者、新英格兰的移殖民，以及印度公司的代理人们——迪普莱克斯和克里弗——就是如此理解的。

不过，两个竞争对手的发展慢慢改变了竞争的结构。事实上，尽管在这一世纪里法国的人力资源和生产资源——价格上涨使其价值提高——不断增加，但是王国国库并未从这一增加中相应受益，税收收入依旧。另一方面，法国依然缺乏重要的信贷手段，它是首都所有银

506 行家——他们本身就是政权的寄生虫——都不能取代的，而这正是劳的制度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相反，在英国，更为迅速的经济增长、英国银行的行动、英国政府充当贷款人的信贷，还应加上英国国土的安全，这些都使得更为迅速的资源动员成为可能，并且是以比法国政府更低的利率。这也使得英国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收入超过法国的军事支持，并从 1740 年左右起始终保持一支数量相当于法国与西班牙之总和的海军舰队。

但是对于法国来说还有更严重的事。当其大陆边境只有一些通过外交或援款就能施加影响的弱小、分裂的对手时，法国就能在欧洲和海外事务上投入几乎相当的注意力，而与英国的长期和平对此是有促进作用的。相反，当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与殖民地冲突再次采取武力形式时，在中欧发生了一些重要转变，此后法国必须对普鲁士和奥地利这样的新军事强国刮目相看了。1748 年以后，法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消失了，与此同时，法国的商业和殖民地扩张引起了英国的真正担忧，尤其是在印度。1748 年以后，迪普莱克斯试图征服印度南部，由此威胁到了英国贸易的存续。同时，在美洲，俄亥俄河谷发生的事端不断增加。伦敦方面对此表示担心，凡尔赛和法国商人同样忧虑。然而，当海上事务势必成为英国政府的主要关注点时，法国政府却由于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王国的传统，对大陆事务更为关心，并使商业和殖民地问题从属于大陆事务。

战争

1740 年，随着皇帝查理六世的去世和玛丽亚－特蕾莎的继位，法国似乎终于有可能实现一劳永逸地摧毁奥地利王朝的力量这一根深蒂固的梦想，其手段是在法国的赞助下，组建一个以巴伐利亚为中心的德意志王公联盟，该联盟由腓特烈二世出任首脑。然而，英国不可能接受欧洲均势遭到这样的破坏，因为这将使法国得以在控制欧洲之后，完全转向殖民地，并迅速与英国作一了断。对于英国人来说，欧洲的盟国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它可以达到阻止法国完全投入殖民地战争的目的。阻止英国在欧洲影响的此种发展，对于法国来说是符合自己利

益的，为此，必须像路易十四在其最后的外交指令中所流露的，以及弗勒里曾经尝试的那样，放弃一切谋求欧洲霸权的企图。

但宫廷中的反奥地利派别并不理解这一点。受到贵族——将对17世纪辉煌的记忆和理解投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军事利益的操纵，这一廷臣利益同盟使法国卷入悲惨的战争之中。法国在欧洲处处受牵制和被动挨打，舰队也被数量更多、装备更好的英国海军以压倒优势胜出，由此法国于1760年丧失了加拿大，随后在1760年至1763年间，英国人又将法国和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主要据点悉数夺走。甚至将中立国也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英国，在1763年巴黎条约签订之时，已是无可争议的海上主宰，并且在欧洲大陆也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它将除加拿大——付出了昂贵代价，并且难以管理——以外的所有征服地都还给了法国，对此，舒瓦瑟尔也表示屈服以便收回安的列斯群岛，因为它对于黑奴贩子和圣多明各的大地产主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这一条约并不是一场灾难；复兴将是迅速的，而法国商业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依旧繁荣。最为严重的是法国君主制遭受了一次灾难性的屈辱，并在其他国家中信誉扫地。 507

韦尔让内试图通过一有机会就发动针对英国的报复战争来恢复君主制的国际声望。当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发生起义时，这一机会来临了。比其前任更为机敏的韦尔让内，懂得使欧洲的和平得到承认，这使法国能集中精力于海上和美洲战场，并在才干卓著的新军官的努力下，赢得了美洲战争。然而，这一胜利来临之时，正值法国无法再继续干预欧洲或世界事务。这一法英在旧君主制下长期争斗的最后插曲，导致王国财政的最终瓦解。在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这一旧制度战争的典型后遗症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果。它还加剧了财政不稳定，而这是强烈不满的根源，因为它造成新的赋税的出现。而可能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战争——绝对君主制介入是为了帮助起义者从其统治者那里获得解放，伴以那些主张自由的军官从美洲带回的支持自由和平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法国国内针对当局和特权者的攻击。

财政与政治

财政问题在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居第二位。鉴于现存的政府体制，也即它的需要和野心，如何使税收与之相适应，如何——通过增加民众的能力——使其能始终回报更多，遂成为问题。路易十四治下支出的随意性、对财政方面的意外情况的倨傲无知，已将国家引至这一地步，即它已经根本无法继续旨在基本以"普通"资源来补足（税收）的累人把戏，而在此之前，它已耗尽了"特别"资源（出卖官职、货币转移税、部分或是隐瞒的破产），尤其是借债之举，已使傲慢的君主受到金融家和出身低贱的总包税人，如贝尔纳、克罗扎或帕里斯兄弟的控制。

摄政王运用各种不同手段来减缓路易十四去世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沉浸于"解脱"带来的喜悦——上层人士鼓励摄政王用它来排解更严重的问题——的摄政王接连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为换取撤销限制其权力的路易十四的遗嘱，摄政王将谏诤权还给高等法院。通过将贵族吸纳入各种会议（各部会议制的政府），他就使贵族与政府责任结合到一起；他迫使总包税人"退赃"；尤其是他实行了部分破产这样的拆东墙补西墙措施。同时，与英国和好（海牙同盟，1716年）使其得以避开国内外的敌人。贵族的无能在各部会议中显现无遗，从而使得这一荒谬行为在1718年结束。正是在此时约翰·劳开始实施其自1716年起就已准备的重大实验。印度与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猛涨，将财富引入王国国库中。但是劳发行了过多的纸币。投机、阴谋甚至体制的脆弱促成了1720年的崩溃。确实，在输家和赢家之间有生活状况的变化，但是最终没有大的骚乱，而且对经济是一种刺激，并提供了结清部分债务的可能。从主要忧虑中解脱出来的摄政王恢复了路易十四形式的政体，推行《乌尼詹尼图斯谕旨》(1720年)，并恢复了帕里斯兄弟的影响。

摄政时期被看作是潘朵拉的盒子，从此之后，那些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已开始在夜间活动的恶魔们流入了18世纪。首先是反对摄政王

508

所谓的“老古董”，即陈旧的宫廷准则。不受拘束的道德习俗迈向自由，“新颖”成为时尚、康普拉的音乐、洛可可式的装饰。丰特内尔、现代派、伏尔泰所提倡的各种观点在圣殿骑士团驻扎的寺院、罗亚尔宫、普洛可庇咖啡馆盛行。相对于凡尔赛宫，一度被遗弃的巴黎又重新恢复了其在政治、物质世界和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贵族自以为已经战胜了令人厌恶的官僚专制制度。高等法院恢复了政治地位。詹森教徒重新振作，而耶稣会士则蒙受羞辱。如同人们一味贪图的就是消遣、奢侈享受、瞬间快乐，金钱，似乎前所未有地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四年中两次部分破产和约翰·劳的体制，已然无可挽回地摧毁了政府信誉以及建立大的信贷工具的任何前景。自此以后，国家前所未有地依附于金融家的诚意。

亲王波旁公爵接替了1723年去世的摄政王，而他负债甚多的金融集团也重获对权力的秘密控制。年迈的红衣主教弗勒里的温和绝对主义，在其漫长的政府任期（1726—1743年）里体现为谨慎的行政措施，其目的在于在所有领域都维持国家所需要的安定局面。他的去世（1743年1月29日）将实权重新交于路易十五之手，他的良好意愿是确定无疑的。尽管存在短暂的精力旺盛时期，但国王往往表现为懒散和持怀疑态度，耽于肉欲以至受其宠妃们的影响。在精力充沛的沙托鲁夫人深受宠幸之后，蓬巴杜夫人成为了正式情妇，她虽然可爱、机敏和有教养，但是却贪婪、自负，因此其政治作用是有害的。出身于金融家家庭的她，确保了这一集团的利益，虽然深受她所讨好的哲学家及其所保护的艺术家的欢迎，但是舆论指责她诱使国王大肆开支，尤其是干预国家事务。她在阴谋家小团体的支持下，促成了奥里政府的垮台（1745年）、莫尔帕的被免职（1749年）、达让松侯爵的被解职（1757年）。正是在这一因各种纷争而动荡不安、并开始感觉到启蒙思想传播的影响的法国，发生了达米安行刺国王事件（1757年），它将政治与财政混乱推至顶点。

在专注于战争和外交的舒瓦瑟尔内阁时期（1758—1770年）政治权力的堕落仍在继续。布列塔尼发生的反对省长埃吉永公爵的贵族反

抗，这一反抗所引发的暴力事件，以及与这些事件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巴黎高等法院，这些在当时都将激起国王迟缓的僵硬反应。路易十五将舒瓦瑟尔免职，并设立一个好斗的内阁。莫普—特雷—埃吉永这一“三头政治”，在恼怒的国王的支持下，采取了一些措施，是绝对主义的孤注一掷。但是深受杜巴里夫人恶劣影响的国王，于1774年5月10日被天花夺去了生命。过于年轻就登上王位的路易十六，试图恢复之前的秩序。他解散了深受厌恶的内阁，将大权交给杜尔哥，一位正直的人和“哲学家”，他试图在没有放弃探寻更为公正的税收的前提下，实施一项总的改革计划。结为同盟的利益集团再一次地中止了这一尝试，而且由于它恰好在金融萧条的背景下发生，似乎已没有任何事物能阻止美洲战争的爆发。

在大约1748年以后导致君主制崩溃——在国家经济飞速发展、政府技术部门已改进了方法、态度和效率的不合常理的气氛下，以及在思想、艺术和社会生活领域绚丽多彩的文明充分发展至顶峰的时候——的众多原因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由于无法找到解决财政危机的持久办法，而且，这一原因应置于首要地位。在现存社会关系，尤其是对权力特性的现有认识的背景下，可能存在这种解决办法吗？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以及避免在君主制最后岁月所萦绕的整体破产的威胁，补救办法只能是对整个政治与社会制度进行全面改造，而这成为大革命的任务。

509

改革的尝试与最终的失败

不过，在政府中并不缺乏改革精神和洞察力。在致力于遏制特权的君主制的威权传统中，最为重大的改革所针对的是贵族特权，后者是可征税收入的惟一拥有者，而这是在无限制地增加人头税显然已不可能之时，这一税收即使当它成为“现实的”时候，往往最终还是落到农民头上。二十分之一税及其之后的比例税，是由严厉的马绍创立的，并由他的继任者西卢埃特、贝尔坦、特雷、杜尔哥等延续，因此除了“预订的”教士外，对“特权者”打击尤甚。尽管在开征二十分

之一税后一片指责声，尽管有策略上的退让以及政治动荡的恶化，但是政府从未放弃自己的意图，并坚决地实现了对贵族和地产主课税。然而，各个地区存在的征税的不公平、份额的明显不平等（准确评估财产是如此的困难）都在“受害者”中激起了类似于农民抗议的奇怪抗议，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如此多的中等财产拥有者所抱怨的“毁灭”，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它往往妨碍了他们实现收支平衡。最富裕阶层的税额自然最高，但依然是有限的，首先是因为非常有钱的特权者的数量很少（仅为全部人口的1%—2%），其次是因为税收的特性——相对于中等财富的人来说其所占比重要比最富裕的人更大，以及征税形式——对待强者要比对待弱者更温和，这就造成一部分财富完全处于征税系统以外，尤其是工业或商业收入。最后则是因为最有钱的人（总包税人、金融家或廷臣）都与国家有密切联系，是体制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不可能触及他们。由此，实际的财政结果始终很难满足需要，与此同时又造成贵族内部压力的增加、增强了特权者对于这些侵犯所有权的行为的反抗，以及补偿自己损失的“封建反动”的企图。

解决办法不可能像各位财政大臣，尤其是杜尔哥所认为的那样，部分地存在于降低各项大的开支——远远超过其削减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宫廷支出——以及军事领域的节省开支。而是如卡隆向显贵会议所明确阐释的那样，在于对特权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由此就能使每一个人、阶层和等级、省份都从束缚生产的阻碍中解脱出来，相应地促进国家收入的增加。财政管理自身的混乱——缺乏总体预算，每个部门的过度开销，辅助金融机构的增多使得国库只能管理最多一半的国债，不能确立“优先领域”，以及最终轻率、冒失的浪费——同样也是危机和政府无能的重要原因。

对体制结构的全面改造无法想象，鉴此，政府官员始终只能限于通过局部修改来展开落后于时代的斗争。启蒙运动已经指出当时社会的一个根本弊端是：“习惯帝国”，亦即“成见”。那些开明的大臣们并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些“习惯”同样是体制的本质，并试图攻击它 510

们。此外，正是在工业和商业领域，古尔内的“自由放任”理论得到了不完全应用：工场稽查员直至旧制度结束都一直存在，国内关卡、行会管事会和行会也是如此，尽管杜尔哥曾短暂地将它们取消，但是在他之后很快又恢复了。此外，针对工业中的这些与农业集体束缚相对应的事物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垄断的“大工业”。不管怎样，这一法国财富的富有部门，即使它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国家的控制。可完全课税并是一切收入的根本源泉的农业，再一次地成为重农学派反对“惯例”的试验领域。在农学家和由贝尔坦建立的农业协会所提倡的土地的“英国式”再生的前景中，反对“习俗”和“公共放牧权”的斗争是以结束和分割某些市镇的土地的法令形式进行的。事实上，这些改变只可能对最大的地产主或领主有利，将激起严重的农业骚乱，使忧虑和不满在广大农民中扩散，并和其他不满情绪一起在 1789 年 7 月表达出来。此外，意识到这一“改善”的严重结果的政府官员，尤其是贝尔坦，只不过是部分地介入到“农业革命”的道路中，而后者的失败导致政治革命。正是此时农民暴动出现了，而不管怎样，他们生活状况的充分改善使得 17 世纪类型的反抗从未出现，甚至同时代俄国或波希米亚所经历的起义也没有。

因此大革命是“特权者”，即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的，他们的政治意识通过与启蒙哲学的联系而变得敏锐，此后由于与政府足够接近而对它的弱点有了认识，并渴望参加政府。直至 1788 年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相互竞争的野心产生重大分歧之前，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是“团体”的行动，它们在宫廷中得到那些阴谋集团的支持，而在舆论面前是由混合各个高等法院的大团体进行的，这些法院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内阁专制主义”，这一对手在理论上是全能的，但事实上则是孤立的。在反对绝对主义的斗争中，特权者们有了一个反常的盟友，这就是启蒙哲学，而它是“团体”的死敌。与宗教“传统”一样，哲学家们事实上是反对政治与社会“特权”、“先例”、“传统”、“习俗”的，尤其是“特殊礼遇”和不公正的、过分的好处。但是他们同样反对专

制权力；而他们夸张的文笔，除了促进反抗氛围的形成以外，还为每个集团都提供了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武器。然而，正是由于特权者所拥有的力量及其人数，使得任何局部行动似乎都不再能减少它的数量或危害性。

必不可少的重组不可能来自于“团体”自身，对于它们来说每个团体的利益都是与其他团体的类似利益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嫉妒和蔑视。甚至绝对主义权力的特性也阻碍了它摧毁这些团体；“开明的”方法也显现出不足之处。由于传统权力的无能和难以达成广泛的一致，政体无法通过合法、和平的手段改革自身这一点昭然若揭。通过在 1789 年 7 月 9 日宣布自己是制宪议会，国民议会剥夺了国王的统治权，而通过将它移交给代表们，则最终完成了这一根本“革命”，这一根本“革命”尽管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受束缚的绝对主义不可能自己着手进行。

四、启蒙时代的文明

511

富裕

在路易十五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尽管政权在政治上接连受挫，但是法国看上去显得颇为不错。在财富创造方面，满足感是毋庸置疑的。也许，并不是所有阶层都同样地从经济繁荣中获得好处。广大农民仍然受“惯例”的束缚、税收和佃租的重压，难以获得充分的或是可持续的收益。由于有节制并且得到控制的工业发展并不是一场“革命”，所以并没有像当时英国那样出现社会结构的动荡，由此传统的平衡依然延续，广大农民没有遭受大规模剥夺所有权和强制移民的影响。这一有着各种缺陷和不足的社会框架，在能使这一长期繁荣阶段持续的幻象中增强了一个好时代的印象。此外，尽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艰难经济形势——农业和工人世界中的苦难——重现，但是充满活力的印象依然持续。那些政权的仆人，即大臣、高级官吏、监察官、公务员、工程师等，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都确实受到王国、民族

尊严和公益的观念的激励。取得了各种成就：领土、道路、运河设施，城市治理，以及大工程和大项目，这些确实都表明这一时代是勤勉的、好学的、积极的，懂得如何使用财富并具有宏伟计划，渴望创造与认知。

在这一引人入胜的物质背景下，在社会的顶端绽放出这样一种文明，其特点是富足、多样性、热情活泼以及具有无可比拟的魅力。在摄政时期启动之后出现的刺激和运动来自于：启蒙时期的巨大思想运动；始终质疑准则、传统、观念与爱好；形成不同的感觉氛围，制定新的标准，后者将点燃文学与艺术创造的热情，并使它在这一运动——其中创造的快乐略带一种转瞬即逝的、故而有些不安宁的魅力，并进一步使之充实，尤其是在这一阶段的两端的边缘中——里展现出自己的千姿百态。这种什么都想去涉及的强烈愿望，使表达、尝试、试验、草图等等所涉及的领域不断增加。一旦思想和艺术的专横统治不复存在，以及如此多的新社会阶层构成了一个渴望体验、认识和享乐的顾客群、公众，就会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产生激励作用，让他们鼓起勇气，迫使他们崭露头角，自告奋勇。

交谈

在沙龙——妇女是其主宰，往往通过那些无聊的消遣打发时间，参加者的灵魂虽然空虚，但是外表举止无可指责，语言机智、尖刻——的雅致环境中，交谈技巧至关重要。交谈既有口头交谈，也有书面交谈；通过短笺、留言、草草写就或言语泼辣地口述的信件的不断交流，确实创造了这样一种表达风格，即灵活、清楚、直截了当、既不笨拙又没有无用的发挥。在这一时代具有如此鲜明特点的环境里，文人或是思想家、哲学家成为这些应当提及的集会的意义或荣耀所在。

曼恩公爵夫人（1676—1753年）在其位于苏城的城堡中提供了这些世俗聚会——自女雅士时代以来已被遗忘——的例证，其中节日聚会、嬉游曲伴随着高雅的文学。虽然那些由地位稍低一些的夫人主持的沙龙更为简朴，但是她们的思想品味却更高雅。唐森夫人（1682—1749年）的沙龙聚集了达让松、博林布鲁克这样的宫廷人士，以及丰

特内尔、爱尔维修、孟德斯鸠、马里沃、达让塔尔、马蒙泰尔这样的 512 知识分子。只有她的私生子达朗贝尔没有出现在其沙龙中。若弗兰夫人（1699—1777 年），一位女资产者，其丈夫是圣戈班的一位富有官员，每周举行两次晚宴。星期一，她接待艺术家（范卢、布歇、韦尔内、苏夫洛、勒穆瓦纳）；星期三，则是文人（达朗贝尔、马里沃、马蒙泰尔、莫雷莱、圣朗贝尔、霍尔巴赫）。虽然这些聚会的气氛是自由自在的，但是交谈不能逾越某些限制而变得放肆，而且，沙龙女主人明白该如何审慎地制止它们。德芳夫人（1697—1780 年）的沙龙是最为贵族化的。女主人曾是摄政时期的美女，她才华横溢、锐气逼人、大彻大悟，在有才华男子的陪伴下寻求消遣和减轻其难以抑止的烦恼。她接待舒瓦瑟尔、孟德斯鸠、达朗贝尔、伏尔泰（始终与其保持着联系），埃诺院长是其忠实信徒，霍拉斯·瓦波尔则让老迈的德芳夫人的芳心死灰复燃。莱斯皮纳斯小姐是德芳夫人的朗读者，于 1764 年弃她而去，并也开办了自己的沙龙，新开设的沙龙更为简朴，但对于那些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更为热忱，他们在此讨论着很多新观点。其他的小团体则围绕艺术组成，如慷慨地资助音乐事业的总包税人拉波普利尼埃尔的沙龙，它对品味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这样的已婚男子、“哲学总管”，以及稍后的拉瓦锡、孔多塞，同样都有自己的沙龙，在那里交谈更典雅、更严肃，是哲学精神的真正试验室。外省也有沙龙，虽然相对于巴黎的沙龙来说可能不是那么有钱，但是在净化道德、传播品味和时髦观点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阿瑟·扬格将在第戎和许多高等法院所在城市中发现，在一些寓所中，人们有着现代的思想，优雅的谈话。此外，每个沙龙均有自己的风格；这里是有着圣奥班雕刻作品的辉煌的会客室；那边则是更为私密的聚会，在这种聚会中，人们谈吐举止的自由度更大，卡蒙泰勒的水彩画再现了这一场景。但是，始终吸引人的是这样一种快乐，即有才智的人在没有强制礼节的情况下相见，并且能够致力于展开讨论、巧妙作答、尖刻批判，甚至是诽谤，构成了这一上流社会的风格，而且，即使可能未对观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亦已构成陈述观念和传播

观念方式的突出特点。此外，还有些更严肃的聚会，在那里的谈话和讨论会更连贯、更深入。由此，修道院长阿拉里的阁楼俱乐部以自由学院的形式，汇集了 20 多位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他们在那里尽情讨论各种问题，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就是在那里提出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关于改革的创造性方案。出于对其中散播的大胆思想的担心，弗勒里于 1731 年下令关闭了这一俱乐部。外省学院和思想社团中的言词与此类似，只是往往更加审慎、没有那么大胆，这些学院和协会在那些最小的城市中也不断增加，并且为启蒙哲学提供了听众和信徒。最后是咖啡馆，自摄政时期以来在巴黎和外省已不计其数，聚集了各个阶层的人，如政论作者和上流社会人物，在那里举止更为自由，而且尽管有警察局的“密探”，但是各种新闻、轶事、观点迅速、大胆地传播开来。

游戏嗜好

出色而又充满嘲讽的投石党人精神，巧妙回答、讽喻、暗示的艺术，都是这些数量众多的小册子、“剧本”、“乐曲”的突出特点，正是通过它们，这一社会的观点和品味得以表达，而且正如文学一样，哲学利用了它们的形式和方法，揭示了某种事实上已成为这一世纪特点的游戏嗜好。在很多作家和艺术家中，精通某种表达手法就掩盖了谈话内容的浅薄。然而，这一时代对于简练的即兴作品，如梗概、诙谐作品、草稿的嗜好不容置疑地促进了思想与心灵的精巧；它成为那些著名作品的特点，而后者往往是简短的。在思想和文学领域（艺术领域存在同样的优点），这一智力锻炼使创造工具和思想武器最终得以形成，这就是 18 世纪的语言，它朴实无华、刚劲有力、简洁，尤其是打上了这种雅致的烙印，而这是它永远也不会抛弃的，并以简练的形式体现于伏尔泰的俏皮话、布丰在庄重时期的作品或是卢梭的令人陶醉的和谐中。在这一内容并不丰富的艺术纲要中，或许亦不缺乏例外情形。在 18 世纪也有一些笨拙的或啰嗦的散文家、文笔生硬的诗人，他们的著作文字艰涩、令人厌倦，尤其是在情感流露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一 18 世纪上半叶的酸味糖果，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往往成

513

为了蛋白松糕。图书馆的目录中往往包含很多蹩脚得令人难受的作品，虽然相对于那些巨著来说，它们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些作品的作者的兴趣往往非常广泛（我们不妨想一想重农学派或詹森教派的大量作品），但人们难以将其看作是时代的样本。因此，应该清楚认识到上流社会及其效仿者的文化的特点，正是通过文学、艺术这样的世俗“技艺”的完善，以及不同作品和不同时代中存在的这种嗜好——在形式和外表上恰好体现为音调、礼仪和优美——的一致性体现出来。人们明白为什么已成为贵族文化、沙龙和贵妃小客厅之特点的这种嗜好的不可抗拒的统治，能使当时的人们感到厌倦。但是人们无法抵御这一“甜蜜生活”、“令人如此愉快的”时代的有时略带刺激的诱惑，它体现为如此高雅的举止和精心算计的礼貌；这一世纪是那些脸色红润、特点模糊、带着诙谐和满足的微笑者的世纪，他们滑稽可笑、自命不凡、神气活现抑或没精打采；这一世纪也是那些绚丽多彩的服装、精美的装饰品的世纪，它们将洛可可式的花边，随后是玫瑰花、箭筒、珍珠以及鸽子等混杂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贵族神话的附属品。确实，这一宫廷和沙龙的辉煌社会尽管是肤浅的、轻佻的、自私的和怀疑论的，但是它懂得赋予生活艺术以一种如此完美的风格和如此高雅的格调，以至于它使整个欧洲着迷，并且在200年后依然具有诱惑力。18世纪的这一创造是轻浮的、骑士风度的、喜爱享乐的，它不懂得任其无动于衷，而且对于妇女，特别是“漂亮女子”来说，它更不仅是一个首饰盒。

人们往往强调妇女在新精神产生中的作用。妇女们已然支持现代派反对古代派；支持启蒙哲学。正如范第根所敏锐指出的，妇女们感觉解放哲学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了依据，而采纳先锋观点则是成年的慰藉。同时，她们决定了风格和阐述观点的形式，并且要求最严肃的臣民们提防诱惑和殷勤。此外，她们的影响越出了沙龙，在政治、艺术、有时甚至是经济领域（资产阶级妇女或是平民妇女在各种各样的企业中获得了成功，有时成为企业负责人）都显现出来。正如凡尔赛宫或是罗亚尔宫花园、沙龙、时尚店铺所反映出来的，妇女们并不只是这

一世纪的装饰品，而且也对它起到了激励作用。

资产阶级文化

但是，启蒙运动时代并不能仅仅归结为沙龙。大众文化中长期被忽视的方面，时下已慢慢变得清晰起来。这不仅与民俗学者更熟悉的对物质装饰——家具、彩陶和服装——的研究有关，而且也与对叫卖、年历、故事、幻梦剧文献的研究有关，后者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致力于使民众“安于现状”的“令人恶心的逃避文学”，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仅仅是“梦想”的一部分而已。农村和城市中的这一小部分人，即有歌舞表演的咖啡馆中的顾客、仆人、手工业者，并没有被时代所忽略。夏尔丹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描绘卑贱者的人；普罗旺斯的弗朗索瓦兹·迪帕克留下了有关艺匠能够发现民众的灵魂之秘密的证词。为了认识民众，除了关注格勒兹画笔下的农民外，还应关注版画和技术书籍中的插图，它们往往在不经意间提供了有关民众世界的很好景象，它与贵族世界是如此的不同。同样，在文学领域里，人们在普雷沃、莱斯蒂夫·德·拉布莱托内、卢梭的著作中，也发现了这种对于老实人和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它使一个完全不包括贵族的文明层面变得完整起来。其重要性在这一世纪下半叶变得愈益明显的资产阶级文化，可能反映了贵族文化的某些特点，尤其是在最富裕的资产阶级中，不过是采用将它们有所缓和的方式；而且它越来越采取自己的规范，后者远胜于宫廷规范，并将形成这一世纪的文化结构。从事劳作、发明、创造，并领导了绝大多数近代大企业的资产阶级，拥有了很多可用于舒适和充满才智的生活的金钱。从此以后，文人、艺术家、手工业者将以它所代表的这一新的公众、新的人数众多的顾客为对象。房屋、家具更为简朴，但是有着令人赞叹的做工，氛围更具家庭气息，更有规律、更“高尚”的生活方式，但正是在那里消遣活动活跃展开，而阅读、戏剧或音乐会之快乐亦是如此，这些都是富裕自在的资产阶级之特点，就如马里沃或夏尔丹笔下的“詹森教徒的”单纯，抑或卢梭、布瓦伊、德比库尔笔下的豪华舒适和率真情感所体现的那样。狄德罗视作典范的正是这种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也正是由于他们，喜

歌剧和情感喜剧此后将上演。正是他们热烈欢迎音乐、绘画和文学领域喜好的转变。最后，时代的精华也将是针对他们的。此外，与贵族一样，资产阶级也有冷酷和头脑不清的一面。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人和“伙计”并不仁慈；在波尔多和南特，正是贩卖黑奴成就了他们的繁荣。他们的金融欺诈手段远非其良知那样纯洁，而他们也不像哲学偶像那样憎恶金钱。而他们如此，也正是因为其价值与道德标准不可能与贵族的一样。

理性主义的背面

纵览这一世纪，人们往往会注意到其理想或理性主义的背面同样有趣。即使它们是些非常有意思的发明，我们应该向它们表示敬意，如圣皮埃尔神甫的“摇摆”安乐椅、卡斯泰尔的光学羽管键琴以及埃博迪·德·弗伦的各项计划：将马归还给农业，使它们不再用于巴黎的四轮华丽马车和出租马车，打算像威尼斯一样以水道取代首都的街道。在礼仪的温室——社会必须保持其惯例，无视那些荒唐事——中，有些勇敢的人打碎了几片玻璃窗。小克雷比永或拉莫利埃尔的黄色书画并没有使任何人感到不快，尤其是当它们写得很好时，而且，书中雅致的色情并没有对它贯穿于其中的社会提出质疑。与之相反，狄德罗——其举止吓坏了若弗兰夫人——与爱尔维修一样，在性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真正焕然一新的观点，不仅与社会批评（如《论宗教》所体现的）相协调，而且是幸福与人的生殖层面所决定的要求。这一问题，卢梭在《忏悔录》，尤其是《新爱洛漪丝》中也曾提及。其他作家拒绝像莱斯蒂夫·德·拉布莱托内，尤其是萨德那样“雄伟壮丽”，而不管怎样，萨德的首要特点就是欲火过旺。

在这个人们往往过于贪图漂亮或才智的时代里，也不缺乏力量。如金银匠热尔曼的涡形装饰的生动作品，以及拉莫以闪闪发光的线条描绘的作品所显示的那样，在装饰和优雅的外表之下，也有强劲有力的双腿。大幅的作品，有时甚至是巨大的作品，在“蓬巴杜时代”并非不讨人喜欢。老克雷比永的“残酷”著作和血腥悲剧在此期亦一度受到欢迎。艺术并不就只是精致或可爱。在绘画中，“喜欢宏大”——相当引 515

人注目——始终存在，科瓦佩尔、卡兹、雷斯图、德·特鲁瓦、纳图瓦尔（直至弗拉戈纳尔的《卡利罗厄）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画中的巨大戏剧构图——带着悲剧或歌剧的矫饰姿态和夸张的模仿，在褶裥的摆动下展开，而且往往生动活泼且颜色艳丽。正是由此——绘画和文学中都一样——体现出人们继续尊重表现崇高的样式，并使人顺从地赞美克雷比永、康皮斯特龙、让·巴蒂斯特·卢梭、勒弗朗·德·蓬皮尼昂的相应绘画作品。此外，这种“宏大”传统在大约1770年后的绘画中逐渐失去活力。但是它又换作了巨大建筑物：先贤祠和圣绪尔皮斯教堂正面的有如大续唱的巨大柱型。同时，皮拉内兹的影响激起了佩尔和布雷的狂妄自大的计划，前者体现在其1765年的《建筑作品集》中，后者则梦想一种“真诚的”建筑，其特点是巨大和富有魔力。在其现实的建筑中，勒杜更为实际。但是，他的设计也往往近乎梦想。理性的世纪同时也是幻想的世纪，后者在社会、文学和艺术中都被接受。正是在那时，共济会接纳入会的秘密仪式形成，其中如此之多的“考验”和“诅咒”，再次使人想到由卡里奥斯特罗增添了东方和埃及色彩的歌剧世界。那位名噪一时，并自称是法老同时代人的圣日尔曼伯爵曾不无成功地贩卖过拙劣的幻想。18世纪下半叶所增添的这些喜好表明，通过梅斯梅尔治疗方法的风行、玫瑰十字会和圣马尔丁信徒的增加，可以看出神秘主义倾向，或至少是意识到传统宗教以及理性的不足依然延续，对此，狂热的詹森派教徒已显露无遗。在文学领域，虚构和幻想的作品揭示了对生活环境令人愉快的改变的喜好，以及不希望一切都成为丰特内尔笔下的机械世界的意愿。

但是，这只不过是幻想的一个确实的和基本的方面。艺术领域的洛可可风格，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这一深层趋势，它追求“奇异、独特和别致的效果，棱角分明和不同寻常的形式，往往任一部分与其他部分都不对称”。根据其症状，这种体现了对理性主义秩序的某种反抗的对于“别致样式”的喜好，在18世纪中叶趋于枯竭。科尚清楚地指出了为什么当他谈及“混乱”之时，其实也就是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根基提出质疑。

第十九章　大革命

516

1789—1799年，大革命，“我们历史上的传奇时代；它比路易十四时代更伟大；比圣路易时代更清晰”。

安德烈·马尔罗

大革命不仅在法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今天的人们强调它所处的历史背景：确实，它处于“大西洋革命”的洪流之中——从美国到英国，从佛兰德尔到瑞士，这场洪流成为1770年到1800年这个历史时期的标志；这种比较丝毫没有贬低大革命的意义，相反，它准确地指出了大革命的影响范围；它那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决定了这场作为创造近代世界的重大事件之一的风暴所具有的物质和思想上的重要意义。

大革命是场运动：应该追述它的进程，否则就找不到头绪。历史学家在着手这一任务时会考量一下乔治·勒费弗尔所确立的难以企及的典范，即永远不要忘记历史学也是一门叙述的艺术。把事件串起来后，还要对这场革命的短期的或长期的影响作出评价，也许这样才能估量它对法国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

517

一、大革命的历程

为什么会有大革命？

旧世界的危机

革命者要打倒的，是他们所谓的"封建制度"：从词义的纯洁性而言，这个术语特指中世纪的封君封臣制度，但目前人们已对这种含义提出质疑，至少是作了修正。但是革命派的法学家们很清楚自己的意图：在他们攻击的整个社会制度中，人们可以看出封建生产方式，或现代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在这个问题上，1789 年的法国很能说明问题，不过，当时的法国也具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法国革命的特征。

封建主义，它首先意味着一个受农村世界支配的法国的旧经济制度：农民约占法国人口的 85%，支配经济生活的仍完全是糊口经济的沉重节奏。在这个经济世界中，危机是农业歉收造成的危机：工业还处于次要地位，它依赖于农业状况，尽管前几个世纪的饥荒在 18 世纪逐渐远去。陈旧的农业技术使得乡村世界的停顿局面愈发沉重；农村的社会关系仍然反映出领主制度的重大影响力，而这种制度正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美体现。贵族作为一个团体占据了法国土地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接近 30%；教士，另一个特权等级，拥有 6%—10% 的土地；所以 1/3 以上的土地属于这些不能不称之为寄生者的阶层。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即使在特权者的领地之外，土地仍然附带着各种封建权益和领主权，这是人们所称的领主特有产权的主要残留：封建关系中包括普遍征收的捐税，如年贡，还有更为沉重的、形式各异的实物捐，即征收的部分收成。土地转移税、赠礼、效忠礼、专营税收、劳役等等，或是季节性的、或是不定期的，或是货币形式、或是实物形式的，或以劳务、或以债据支付，凡此种种，都以不同的方式让人注意到古老的依附关系。

以上的提法必定是粗略的，不过，它能使我们注意到欧洲封建主义危机时代法国的独特性。把法国的农业制度与已经解放的英国的农业制度作对照，这个做法业已成为一个传统，但它可能并非徒劳无益；在英国，资本主义农业已然确立，这与东欧和中欧的农业制度也形成对照，在后两个地区，贵族占有大部分土地，支配对他们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的劳役。法国看来处于这两种体制之间，这里的领主制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形苛刻；这里的农民较为富裕、较为多元化，足以在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斗争中给予前者有力的支持——与易北河以东的欧洲贵族比起来，法国贵族的经济和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并非那么无可争议。虽然人们也想把“大西洋”各社会纳入旧制度的范畴，但与这些社会相比，“封建”制度的存在使得法国大革命具有更为明显的社会特征。

但经济状况远非历史的全部：不久前有人曾极力强调旧制度是个“等级”社会，并与19世纪才确立起来的阶级社会相对立。与土地贵族的优越性相对应的是贵族和教士的特权等级的地位，以及被正式认可的、根据荣誉高低而等级化的社会组织模式。1789年的法国就是被展开的三级会议：教士是第一等级，但它自身分裂为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随后是贵族，最后是第三等级的无名而卑微的大众。这种等级制度远不是纯粹的表面现象：“特权者”一词很好地表达出了个中意味。税收特权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这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但它还不是全部。被确认、被感知的各种区分、隔阂、禁忌见证了这种等级制度的力量，当我们回想巴纳夫的家人在格勒诺布尔的剧院中受到的侮辱，回想小马农·罗兰被那个得体的贵族教母打发到餐具室里吃饭时[①]，这绝不是强调资产阶级看待贵族的小气心态。这些事情绝非无足轻重，用来形容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被社会排斥者”一说，其内涵比边缘化心理之类的说法要多得多。当阶级结构从

518

① 1770年，小巴纳夫同母亲一块儿去戏院看戏，订了一个包厢，但一个贵族军官蛮横地要求把包厢让给他的朋友，于是双方发生争吵，那个贵族以武力迫使巴纳夫母子离开。小马农·罗兰即后来的罗兰夫人，她幼时在一次宴会上曾受到贵族的轻侮，文中即指此事。

这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外衣下显露出来、从而使有关荣誉的社会心理等级变得缺乏根据时，这种社会心理等级就更加明显了。

绝对主义是这个旧世界的第三个基本事实。也许，封建体制和等级社会并非天然合一，而等级社会和绝对主义则更不可能存在一致性：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1789 年的法国仍有一个权力无限的国王，作为活的法律，路易十六毫无光辉色彩，但他居于社会结构的顶端，是为特权者服务的秩序的保护人。继西班牙之后，法国从 17 世纪起成了一种国家制度的典型，在这种制度下，议政会中的国王拥有一种并无任何实际制衡的权威：他强制推行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其中各财政区的督办就是其代理人，压制那些欲效仿高等法院但又迟疑不决的“中间团体”。在旧君主制的观念体系中，君权神授某种程度上是关键所在：受神涂油、制造神迹的国王，他是个神圣的人物，是主的影像。同样，这个头衔也使得他成为国家的精神支柱，虽然有时代精神的影响以及随后出现的裂缝，这个国家仍然只承认一种宗教，所有臣民都应信奉之。

1789 年的旧世界处于危机之中：除了我们应该重申的那些直接原因外，它还显露出一些突出的病症。最显而易见、但并非必然是最致命的病症，体现在绝对君主制的国家制度的不完善当中。我们儿时的课本曾告诉我们，行政、司法和财政区划叠床架屋：省和财政区，司法区和大小不一的盐税区纠缠在一起。我们还知道典型的绝对主义的弱点，即国家税收摊派的不公平及其悲哀的征收状况。从本质上说，税收这个具有古老历史的负担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但它的征收变得更为沉重了。为什么呢？正如有人指出的，因为“君主制失去了改革的意愿”，因为中央集权制的绝对主义逐步丧失了创造力。不管这些观点的说服力到底如何，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社会危机。

贵族的衰落既可以从绝对数字、也可以从相对地位上来考察。在绝对数字方面，相当一部分贵族因收入不足而陷入窘境，无法维持过分的排场；某些外省的中等贵族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上层的宫廷贵族也处境艰难，这些人的寄生性几乎被制度化了。当然，我们可以认

为，作为业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贵族也从18世纪大部分时期内一直延续的地租上扬“浪潮”中获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贵族属于当时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但是还应看到另一面：由于贵族习惯于依靠租金过日子的懒散生活，所以与积极而富有进取心的资产阶级相比，他们处于相对的衰落之中。

对于这种总体性的衰落，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旧制度末年，贵族当中的个人受排斥现象激增，其表现形式是地位的降低；每个人都有其行为方式，萨德和米拉波就是例证。不过，就整体而言，贵族的反应是强硬的，在乡村层次上，领主设法翻新“地籍”登记册，以图更为严格地征收那些古老的捐税。与这种领主反动相呼应的是国家和社会结构层次上的“贵族反动”。王权在强调其绝对主义特质的同时，并不屑于求助于圣西蒙公爵所称的“无耻的资产阶级”……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垄断地位反而更为强化了：内克这个资产阶级大臣是个著名的例外。所有社会层次上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似乎已是官方性质的了。一些法令封闭了平民获得某些军衔的道路，强化了贵族对陆海军的垄断。著名家谱学家谢兰是宫廷最害怕的人物，因为宫廷看重的就是贵族家世。投资产业的自由派贵族要想成为新“精英阶层”的核心，那简直是幻想。

519

领主反动和贵族反动是同一立场的两个方面，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农民而言，这都是他们深受伤害的根源。另一方面，绝对君主制与贵族体制的勾结鲜明地体现在旧制度末年的军事法令中。当然这只是旧世界危机的一个方面，危机还表现在绝对君主和贵族——即“他的贵族”——之间以政治对抗形式出现的内部紧张之上，后来国王还认为贵族有坚定的革命愿望。贵族革命的提法有些冒失，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贵族的反叛：1787年，当大臣卡隆召集显贵会议以解决财政难题时，他遭到了特权者的拒绝；与会者控诉绝对主义，抨击国王的权力和大臣的权威，还企图审判卡隆。当他的继任者洛梅尼·德·布里埃纳因财政问题而求助于高等法院时，他同样遭到另一些特权者的反对，这场运动颇得民心——即便它的目标含糊不清——并启动了一种

具有爆炸性的思想力量：召集三级会议。在贵族自由主义外表的背后是与国家税收机器的对抗，这说明了贵族捍卫特权的目标所在，但也揭示了旧世界内部的紧张。

攻击力量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繁荣催生的革命，还是一场因苦难而引发的革命呢？米什莱和饶勒斯曾就这个问题而展现了各自的文采，但就问题本身来说，它像对这场革命的全面解释一样的棘手。

米什莱曾述及法国农民的困难（可怜的短工睡在厩肥堆上……），让人们注意到大部分法国农民命运之脆弱，他这样做无可指责：从无地的日工到拥有小块地的短工和小分成农，所有这些人都可归入所谓的"消费"农民的行列。对他们而言，18世纪毫无光辉，价格上涨只对那些有剩余产品出售的农民有利，但对"消费农民"造成沉重负担。他们在这个世纪一无所获吗？有人认为，他们至少能够生存下来，因为从前威胁生存的严重危机已经远去，或危机间隔的时间逐渐拉长。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并未改变，这种新的平衡仍然是脆弱的；如果要借用经典史学著作中的一个比喻，我们会想到泰纳的描绘，他把农民比作一位艰难地涉水渡河的人：河底的一个坑（就是说，一次歉收）就意味着溺水和失足。因此大革命是源于苦难吗？对于那些即将被社会苦难动员起来的城乡小民来说，我们仍然要作一些区分；自宗教战争以来，各种反抗浪潮震撼了法国的城市和乡村，大革命的人民运动也可以被归入这一浪潮之中，不过，不管这种看法多么合理，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参与，远比任何原始反叛中偶然的联合行动都更有助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建设事业，而资产阶级革命是繁荣造就的革命。繁荣决定了这是一个经济进步的年代。长期的价格上扬运动开始于173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18世纪结束之后；当然，这期间并非没有顿挫，如剧烈的危机和为时较长的衰退，但总体走势无可争辩。18世纪后半叶的人口爆炸造成人口激增，也巩固了这个2600万人口的国家的地位，它已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场经济运动的受益者，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但今天大西

520

洋彼岸的一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阶级，至少1789年还不存在。这看来主要是一场言语之争，其积极的后果是迫使我们进一步明确这个社会范畴的轮廓。这个资产阶级，我们既不认为它占据压倒优势，也不认为它就是铁板一块。他们主要（但并非完全）聚居于城市，而城市只占法国人口的1/6；地产资本仍然对流动资本占据很大的优势；购买土地或能够受封为贵族的官职能为资产阶级带来荣誉，这是融入旧结构的另一种方式。若从资产阶级一词的现代意义上说，这个资产阶级是多元的，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符合当时所称的“资产阶级”的标准：靠定期收益生活，或所谓的“像贵族一样”地生活。这个资产阶级基本是生产性的，但其中包括大量的零售商兼工匠，他们是独立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界限不清；层次更高的是大商人，他们活跃于各商业港口——如南特、马赛和波尔多——靠大宗海外贸易发财；最后是巴黎和里昂的银行家们。工业资产阶级也已出现，但在一个生产技术发展缓慢、商业资本主义与各种城乡作坊调和在一起的时代，它仍处于次要地位。

但是，资产阶级中也有很多律师、公证人、诉讼代理人和医生，总之有很多自由职业者，他们将成为大革命的明星。这些从事服务业的资产阶级是第三等级关键性的代言人，但他们的立场有时让人诧异：法律界人士当中不是有传统和旧秩序的看门狗吗？但是经济上的依附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依附。

纲领的一致性也表明资产阶级的实在性，他们也和其他受旧制度压制的团体一样，期待实现自己的纲领。资产阶级在人数上居于少数地位，法律地位也多种多样，他们大部分仍来自“店铺和作坊”，雇佣劳动制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力量。不管经济和文化上的隔阂使得资产阶级内部如何等级化，资产阶级仍然是为大革命指引方向、提供纲领的力量。启蒙哲学是为资产阶级锻造的思想武器，它为后者提供了方案；舆论已经展示其力量，它体现在文学潮流中，也产生于一些交际

结构中，而共济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证。圣鞠斯特[①]说，“幸福是欧洲的一种新观念”，但有多少其他观念，如自由、平等，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它们将在1789年的危机中找到自我实现的条件。

爆发

经济危机是由来已久的不满情绪的催化剂，并且是引发大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直接因素。在80年代，农业已经显露出危机的迹象：小521麦价格不振，另一方面，葡萄生产过剩带来的严重危机造成行情急剧下跌，这些都对农业产生了明显影响；与此同时，1786年的英法商约使法国工业受到竞争的威胁。1788年，农业出现灾难性的歉收，多年的价格停滞之后突然爆发了饥荒，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骚动。1789年4月，巴黎的圣安托万区爆发了一场反对工场主雷维荣的剧烈骚乱；外省也发生了动乱。从这一刻起，社会战争进一步放大了政治危机，而政治危机最关键的因素是赤字。

财政赤字就像君主制一样古老：绝对主义总是靠权宜之计度日。不过此时的财政困难已经发展成为制度性危机的指示器。确实，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赤字不断增长；不过君主本人的威望不足、措施不力，这些也应是导致革命的直接原因。关于路易十六的性格，人们谈得够多了，这个平庸的国王能力有限，他远不能应付当时的局势；关于玛丽-安托瓦内特，我们知道的也够多了，很大程度上说，宫廷压力集团正是通过她来施加影响力的；但是，我们应该加以说明的重大因素实在太多了，它们的影响十分重大，以致个人的作为或失误难以改变历史的重大脉络。1787年和1788年，两位大臣，卡隆和洛梅尼·德·布里埃纳的税收改革计划相继失败，前者遭到显贵会议上的特权者的反对，后者碰到了各高等法院的联合抵制。

这场“预备革命”（prérévolution）充满贵族的怀旧色彩，但由此造成的局势发展远远超出了预备革命最初的要求：在贝阿尔内、布列塔尼、多菲内的维齐尔，对三级会议的要求具有革命的特征。1788年

① 一译圣茹斯特。

8月，国王终于向这一普遍要求让步，并把内克召进内阁。

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

1789 年

人们曾提到“1789 年的三个革命”：高等法院革命、城市革命、乡村革命。如果我们谨记它们只是同一革命运动的三个方面的话，这种说法在解释 1789 年革命的丰富性时还是有益的。

1789 年 5 月 5 日，国王在凡尔赛庄严宣布三级会议开幕；两个多月后，7 月 9 日，三级会议自称“制宪”国民会议，随后的日子里，巴黎人民 7 月 14 日的胜利使其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开幕式上的古老仪式并不能掩盖爆炸性局势的形成。法国人第一次有了广泛的发言机会：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来起草陈情书，这些文献或精致或朴素，它们仍是一卷宏大的见证书。在提出“按人头”还是“按等级”表决的问题之后，第三等级在最初的会议上就试图让多数持犹疑态度的贵族和分裂的教士阶层承认其在民族当中所占的分量：1789 年 6 月 20 日的网球场宣誓上，各选区的代表们起誓“决不解散……直至宪法制订为止”，但在6 月 23 日的御前会议上，国王试图采取主动，这次会议对第三等级的团结构成了考验，对此巴伊的回答是：“国民会议不需要接受什么命令”。6 月期间，由于三个等级联合组成的议会逐步形成，国民会议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机构，但它在面对王权的反动举措时却感到自身的脆弱：军队向巴黎集结就显示出这种反动企图，而内克也于7 月 11 日被解职。不过此时的主动权在大街上，在自行组织起来的巴黎群众手中：7 月初，日益增长的紧张气氛导致了7 月 12 日和 13 日暴动局面，到 14 日，巴士底狱被攻占。 522

不过，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外省，群众动员都不是从这一象征性的胜利开始的。从 6 月底开始，巴黎的资产阶级便利用三级会议的选举集会来建立事实上的新权力机构：在攻占巴士底狱的前几天，巴黎人民已经拿到了武器，并且一直保留到共和三年；7 月期间，群众的活跃还表现在谋杀巴黎督办贝蒂埃·德·索维尼一事上，10 月初巴黎

市民向凡尔赛的进军、把王室带回巴黎的举动也是如此，当时他们称呼王室为“面包店店主、老板娘和小伙计”。这些插曲有助于明确议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层表现以及群众革命之间的关系：从某些方面看，资产阶级显然很不情愿置身于群众暴力之中，对于群众的社会要求（对生存的忧惧在这些要求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某些要点，他们也同样不情愿。但同样明显的是，从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其中远非仅仅是一种不安的共存关系；正是群众的介入确保了议会革命的成就：7月14日的暴动迫使王权作出让步，召回内克，接受三色徽，从而使其象征性地认可了这场革命；10月的日子在回应宫廷挑衅的同时，也使国民会议避免了反革命威胁，这种威胁并非子虚乌有。此时群众的影响力已不仅限于巴黎了：在这几个月中，外省城市也效仿巴黎，开展了市政革命，有的是趁旧权威衰落之机和平地进行，有的则经过了激烈的对抗，如在波尔多和斯特拉斯堡。

农民革命也在进行，即使不是脱离城市革命的话，它至少也显然是有自己的节奏和特殊诉求的。农民反抗运动从1789年春天就已开始，波及埃诺、诺曼底林区和布列塔尼、上阿尔萨斯和弗朗什－孔泰以及马孔等地区：城堡被焚毁，但烧得更多的是领主契据，人们把这些东西当作起篝火的材料。这场暴动十分激烈（但杀人的情况很少见），到7月下半月，它演变成一场更为广泛（波及法国半数以上的地区）、但已有所变化、乍看起来十分混乱的运动，这就是“大恐慌”。从乔治·勒费弗尔那里，我们已经得知这种集体性恐慌的形式和传播路径——它是城市革命在农村的回响，虽然这种回响有些走样。恐慌的具体表现虽然很多，但模式都很简单：一旦得知那种假想中的危险（如皮埃蒙特人入侵阿尔卑斯山区，英国人在海岸登陆，还有无处不在的“盗匪”，等等），乡民便自行武装起来，但随后人们很快就得知了真相。不过在恐慌期间，消息传播得很快，以致几天之内恐怖气氛就传遍全国。有时候，恐慌还再次引发农村暴乱——多菲内就是如此——和洗劫城堡的行为，而在所有地方，它都激发和动员了农民。农村的这种恐慌，按米什莱的说法，“源自岁月的深处”，但它可能会

让我们感到困惑，正如它让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知所措一样。当国民会议于8月3日商议这个问题时，是第三等级的发言人塔尔热和杜邦·德·内穆尔鼓吹恢复秩序；资产阶级革命和农民革命之间这种明显的裂痕还会进一步扩大，但这并不能掩盖革命运动的统一性，因为我们看到，这场革命呈现出从城市向农村传播的壮阔画面：不管农民运动如何无序、如何突然、如何难以应付，但在某种层次上，它仍然是受组织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控制和引导的。

稳定、宪法、联盟……

把1789年末到1791年初的革命分离出来的做法是不妥的，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立宪”革命，是和平的、建设性的、没有眼泪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句话，真正的大革命。但是，首先，这个阶段一些最重要的成就触及最深层的社会制度，但这些成就是通过激烈手段取得的，1789年8月摧毁封建制度就属于这种情况；其次，新政治制度的创制远非是在善意妥协的基础上进行的，相反，它揭开并激化了越来越具有爆炸性的紧张局势；最后，良好的收成缓解了社会经济困难，因而造成了一些有利局面。

523

摧毁旧世界采取的是猛烈的方式，至少理论上是如此：8月4日晚上，面对大恐慌的局势，一些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和埃吉永公爵——带头谴责封建制度，引发了一场集体放弃封建权益和特权的运动，从而一夜之间摧毁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封建制度。我们可以从集体心理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正像考察大恐慌一样，而8月4日之夜就是对大恐慌的回应：但当时的放弃只是暂时的，最终的决议在宣称“国民会议完全废除封建制”的同时，在已取消的个人权益和宣布需要赎买的实物捐税之间作了仔细的区分。虽然国民会议的解释具有局限性，8月4日之夜仍催生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民法。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农民在没有得到后续条文的情况下自行执行有关的决议，事实上无偿地废除了古老的领主权益。

接下来要在新的基础上从事建设工作：国民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新宪法问题，虽然1789年8月26日提出了《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但

关于宪法的辩论经历了一些意想不到和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最初的几周就已出现了新式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生活将成为整个大革命的鲜明特点，而且它也肯定不是这一“制宪”阶段最不起眼的创造。三级会议的代表当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阶层，它分化为不同的派别，至少是分化为不同的集团：贵族，“君主派”，“爱国党”，各派都由名流支配，如右派的卡扎莱和莫里神甫，君主派的穆尼埃和马卢埃，而爱国党人则在米拉波可疑的雄辩和拉法耶特极力主张的无为路线之间摇摆，他们试图向左翼寻找一个更为可靠的方向，为此他们一度接近“三巨头”：巴纳夫、迪波尔、拉美特。未来的左翼领袖，如格雷古瓦和罗伯斯庇尔，也逐步确立起自己的声望。

宪法制订应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所以国民议会及其各委员会的大部分会议都是为此而召开的，会上关于战争及和平权以及否决权的辩论造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对立。但是，甚至在宪法文本敲定之前，财政困难就把革命拖入了指券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以教会财产的国有化为基础，为此制宪会议制定了教士公民组织法，对教士实行公务员化，从而确立了他们的新地位；但这一揽子举措带来的连锁反应十分巨大。若从动机上看，1789 年 11 月 2 日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的决定似乎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革命，事实上，它植根于一种高卢主义导向的传统之中。但从结果上看，这个决定是革命性的：从 1790 年春天开始，以国有财产为抵押的指券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纸币，这为注定要对整个革命时期都造成负担的通货膨胀拉开了序幕。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革命正在设法巩固自己，而销售业已成为国有财产的教会产业构成这一阶段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这次大规模的财产剥夺涉及全国土地的近 1/10，正是由于这个举措，资产阶级革命与获益集团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些集团在 1790 年和 1791 年的拍卖风潮中获得了意外之财。

524

一方面是巩固，另一方面是断裂：教会产业的国有化与教士公民组织法采取的公务员化政策不可分离，该法案于 1790 年 7 月 12 日表决通过。在新的行政区划框架内，主教和教区神甫成为选举出来的公务员，他们必须进行公民宣誓。教皇庇护十一的敌视、他于 1791 年 4

月正式发布的对“宣誓教士”的谴责，使得这个致力于维护民族一致神话的革命国家产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痕。宣誓教士和抗拒派教士之间立即出现了决然的分裂：高级教士当中宣誓的很少（130 个主教中只有 7 个），堂区教士的情况则要均匀得多：在有关教士宣誓的地图上，某些地区的宣誓教士众多（东南地区，巴黎盆地和阿基坦的部分地区），而另一些地区则属于抗拒地带（西部、东北部和中央高原东部）。在随后的岁月中，这种分裂将成为民众意识中的重要因素，因为在民众意识中，宗教是一个激化因素。不过，在制宪会议以 1791 年宪法来奠定新制度之根本法的那几个月中，人们甚至一度认为革命已大功告成，无论从主题还是从频率上看，当时的画像都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绘画都极为注重联盟节的意义。

联盟节的创意来自巴黎的一些社区，他们打算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在马尔斯广场举行庆祝活动，但这个想法不胫而走，法国各地都在举行联盟节，庆祝旧省区的终结和历经考验的民族统一。在巴黎，虽然天下着雨，也没有进行筹备（只有几千个公民志愿工作），而且路易十六的宣誓也缺乏热情，但联盟节（1790 年 7 月 14 日）仍是这场深信其完美的一致性的革命的最高表现形式。

出轨

一年之后，局面改变了，革命绘画在追忆联盟节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 1791 年 7 月 17 日马尔斯校场上的枪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推动下，巴黎的请愿者要求国王逊位。巴黎市长巴伊和国民卫队司令拉法耶特发布戒严令，并命令向示威者开枪：群众革命与某种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分裂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简单的解释实不足取；有人认为，革命在 1791 年开始出现转折，随后导致了 1792 年夏天君主制的垮台：这究竟是不可避免的、符合事物规律的趋势，还是越出了正常轨道的偶然事故、而事态本来应停留在 1791 年呢？一个出色的论证已为第二种解释提供了十分明晰的表述，它的作者（弗朗索瓦·孚雷）在提出论点的同时还创造了“侧滑”一词，但这位作者后来好像摆脱了此观点。群众的大规模介入阻

挡了几乎快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因而与历史的必然要求并不相符：体现在贵族阴谋论中的古老的恐惧感、立宪君主及其内外支持者的踌躇和失策，这些可能性再次推动革命的激进化，从而可能致使业已实现的妥协流产，并使得有产者精英内部发生分裂。

这种历史解释的重构引人入胜，但在我们看来，它没有充分考虑到反革命的因素，而反革命根本不是一个神话。仅仅关注巴黎就难以看到整个法国的真实状况，而当时，革命在法国远非一个已经成功的事业。1789 年夏天，国王的两个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图瓦伯爵外逃，随后贵族和教士掀起了第一次外逃浪潮，这时流亡势力的说法不再是个玩笑：流亡者聚集在孔代亲王周围，组成了如都灵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并试图让国王逃出法国，但没有成功（法弗拉阴谋），不过他们在外省找到了一些与他们阴谋串通的机构。南方部分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对抗局面与蒙托榜和尼姆之间的隔阂相呼应。阿尔代什、加尔和洛泽尔之间的雅莱兵营自 1790 年后就成为典型的反革命军营：1791—1792 年法国南方的城市骚乱表明，从没有哪个年轻的革命如此脆弱，旧势力的进攻如此猖獗——它还没有寿终正寝，远远没有。只是南方的局面吗？但愿如此！在南锡，1790 年 8 月，布耶侯爵严厉谴责士兵的“叛乱”，而他们的主要错误只是因为成了革命派，与此同时，侯爵还以一种很多人希望效仿的方式从事反革命活动。在这种背景下，王室和国王本人的立场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笨拙和不坚定：国王从来没有真心接受革命动荡，并同外国宫廷保持着秘密的书信联系，他在各个派别和议政会内部彼此竞争的参谋们——如早已卖身投靠的米拉波，拉法耶特和巴纳夫——之间周旋，但实际上他是在自行其是；6 月 20 日晚，国王一家化装逃出杜伊勒里宫，但路上被人认出，被拦在瓦莱纳[①]，22 日被带回巴黎，全城惊愕而愤怒。

及至此时，我们可以说，城市中所有最政治化的、头脑清醒的群

---

① 旧译“瓦伦”、“瓦楞”。

众都已经投入斗争：人们所称的“无套裤汉”就是在1791年到1792年间形成的。像1789年一样，经济压力在群众的不满情绪中扮演了重要作用：1791年部分地区农业歉收，再加上囤积居奇，各地的粮价都在攀升，这与纸券的贬值也有关系。除了这些直接因素外，更为深层的要求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社会紧张。在农民革命的社会史中，1791年冬天到1792年秋天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农民起义的爆发，其规模并不逊色于大恐慌：农民或在各个市场进行巡回定价（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或洗劫和焚毁大片邻近地区内的城堡（如整个东南地中海沿岸地区）。在1791年和1792年，重新活跃起来的群众运动处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俱乐部在蓬勃发展，各种兄弟会在当时的法国建立起了人民团体网络，其密度有时让人吃惊。在巴黎，马拉和丹东所在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吸纳的会员更平民化，而当时的雅各宾俱乐部则较为封闭。

反革命还是人民革命、至少是人民参与的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们进退两难，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政治力量才出现了重组，而重组就发生在瓦莱纳逃亡、马尔斯校场屠杀和国王（议员们还想维持他是被人拐走的谎言）最终颁布宪法法案之后，新的立法会议召开（1790年10月1日）之时。在杜邦·德·内穆尔等试图“粉碎暴乱机器”的人看来，革命应该停止了：这就是斐扬派，它的代表（745名议员中有263人）公开分裂为一些小团体，其中的一方是拉法耶特，另一方则是三巨头（巴纳夫、迪波尔、拉美特）。另一些人被称为“布里索派”，这个名称来自其领袖布里索，他们中间同样也少不了派系争吵：一方是以维尼奥、加戴、让索内和孔多塞为头面人物的集团，另一方则是以几个激进民主派为首，如夏博、默兰和卡尔诺。不过，在分歧暴露之前，巴黎市长杰罗姆·佩蒂翁的一番话看来事先就反驳了“侧滑”论：“资产阶级曾和人民联合创造了革命，现在也只有这种联合才能够保卫革命。”在很多左派人士（马拉和雅各宾派中的罗伯斯庇尔除外）看来，这种联合是合情合理的，但他们以布里索派谴责人民运动的方式来看待这　526

种联合，而不了解其中的经济社会诉求。

很快，战争就在内部的紧张之上平添了外部威胁，从而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各派的立场。人们已经预感到战争的来临：由于保守派的不安和王朝连带关系，1791年8月，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在皮尔尼茨呼吁组织君主联盟，以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力。在法国，各种压力集团都希望采取敌对行动，不过我们不能说它们形成了一个联盟：国王和宫廷处心积虑地推行浑水摸鱼的政策，希望君主们获胜；拉法耶特则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对于胜利必不可少的人物；最后是自1792年春天以来进入内阁的吉伦特派，他们梦想在战争中揭露国王的真面目。只有——或几乎只有——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提出了异议，指出外部冒险的危险性。

4月20日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① 的宣战一开始似乎证实了布里索派预测的合理性，战争至少迫使王室揭下了伪装，它拒绝批准议会的决议（特别是在巴黎设立"联盟"军营的决议），并解除了吉伦特派大臣的职务。战争也没有超乎国王及其朋友的期望，法军因军官流亡而陷于瓦解，最初的战斗对这支大变样的军队来说简直是场灾难。在这种局面下，反革命的狂热催生了著名的布伦瑞克声明，在这份7月15日发布的文件中，君主们威胁要把"巴黎交付给军事当局，并对其进行彻底的颠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但比较出人意料的是群众对新局势的反应，至少这种反应的形式、规模和老练有点出人意料：这仍是一场半自发的运动，6月20日，巴黎的示威者企图冲入杜伊勒里宫，但没有成功，但这预示着一场更严重的骚乱。外省来的请愿书纷纷要求国王逊位，"联盟派"——如著名的马赛的联盟派——前来保卫首都和祖国，7月11日，议会宣布祖国"在危急中"。

在这个麻烦无处不在的关键时刻，资产阶级的革命阵线因为群众运动的影响而产生了分裂，群众运动已经从次要力量上升为革命的首要动力；作为6月20日事件之同谋的吉伦特派，这时大部分已经投入

---

① 指奥地利帝国的皇帝。

秩序派的阵营。但是那天他们的举动掩盖了这一点，使他们得以转而支持巴黎人民的起义，站到社区民兵、科德利埃俱乐部一边，而吉伦特派一些公认的领袖则投靠几位人气飚升的人物：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8 月 10 日，巴黎社区民兵和联盟者进攻被王室遗弃的杜伊勒里宫，并与守卫那里的瑞士兵发生了流血冲突。议会决定暂停国王职务，新召集的立宪会议称为“国民公会”，将以普选方式产生：这是民主革命的象征性开端。

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一革命阶段的两幅画面割裂开，这就是瓦尔密和9月的屠杀。1792 年9 月20 日的瓦尔密战役粉碎了普鲁士军队在香槟地区的攻势，这是最初的失利之后的一个转折，当然，如果考虑到伤亡数字的话，人们可以说这是场平庸的战役；不过，这支未经炮火洗礼、仓促组建起来的年轻军队毕竟迫使可怕的普鲁士军队撤退了；从思想方面说，这是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欧洲的一次打击。而要理解9 月的屠杀，还是应该回到法国国内的局势上来。无论巴黎还是外省，当时都生活在入侵的威胁之下，生活在贵族阴谋的恐惧中，而这种恐惧通常根本不是捏造出来的。旧的权威已经逝去——国王被囚禁在坦普尔监狱——丹东领导的执行委员会暂行代理，这种局面为骇人之举提供了方便：9 月 2 日到 5 日，一群人涌入巴黎各监狱中，决心自己进行审判：教士、贵族、甚至一些普通的囚犯都成为这次“极端派”革命插曲中的牺牲品。 527

人民革命

1793 年

1792 年，我们曾听到佩蒂翁说，只有“人民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才能挽救革命。但到 1793 年春天，同一个佩蒂翁却说，“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这个游离在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人物，他的态度转变正记录着法国资产阶级在 8 月 10 日被证实的分裂状态。

有两个资产阶级：一个认为社会危险已成为头等重要的事，应该回归基本的秩序；另一个资产阶级则主张保卫革命，反对内外贵族势

力，故应联合人民运动，甚至需要满足这一运动的部分社会纲领，并在政治方面求助于一些绝非资产阶级民主的手段。在这两个资产阶级之间，只有选择之不同，即只有“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两个标签之间的对立吗？在我们看来，很容易观察到资产阶级内部相互变换的团体，即使有关议会团体的社会学不能描绘出整体性的分类：应该考虑到各种随处可见的团体，有关的研究可以更为深入；目前来看，单是一个选举地理学的研究就可能通过“受托人”的来源地来确认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那个商业资本主义发达、拥有外贸港口的省份选出的代表是吉伦特派，如维尼奥、加戴和让索内，吉伦特派也可能是朗格多克人和普罗旺斯人：拉博、巴尔巴鲁和伊斯纳尔，伊斯纳尔的行动尤其能代表格拉斯地区的商人。山岳派深深植根于巴黎的激进主义氛围中，它有一系列杰出的人物，其著名的领袖有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等人，此外还有一些新崛起的年轻人，如圣鞠斯特。

这两个资产阶级是在与第三种力量的关系中得以自我确认的，但是根据机械的分类而把双方对立起来，就像将各个不稳定的派系统一化的企图一样徒劳。这第三种力量就是群众，而各种社区和人民团体为群众提供了活动框架、组织形式和结构。一些首领和普通代言人从团体中脱颖而出：如瓦尔莱和“红色教士”扎克·卢等“愤激派”，他们代表下层人民的日常经济要求；以及由埃贝尔、肖美特和其他不太知名的人发起、以巴黎公社[①]为中心的不够“纯洁”的团体——但愿现在的历史学能揭示不知名者的面目。1792年秋，在国民公会的选举之际，头年春天开始的反贵族运动在外省掀起新的高潮；1793年春，城市发生食物骚乱；“小民”在这些运动中走上了街头，他们的政治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局面在大革命此后的岁月中也很少见。

审判国王、对外战争从胜利到失败、旺代内战，这些就是生死攸关的一年中的重大篇章，它们也标志着山岳派和吉伦特派对抗的各个

① 法语作Commune Parisienne，故译成巴黎公社，注意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立的Commune de Paris（巴黎公社）相区别。

阶段。国王的审判从1792年12月11日开始，两派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对立。吉伦特派主张从宽处理，并在审判过程中采用各种手段，以避免判处死刑（为什么不延期判决、不判处流放或请人民来决断呢？……），山岳派中有不同的言论，但最具影响力的通常是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马拉，他们认为必须判处死刑以拯救革命。表决结果是死刑被通过（占718票中的387票），延期判决被否决，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在完成这个“民族的天命”之后，国民公会的议员们深知，他们已使得革命的进程不可逆转了，正如冈蓬所说，革命的进程不是浪漫的抒情诗，它已经抵达一个新境界，随行的船只也已经被烧毁。 528

处决国王之后，战争又开始了，不过从瓦尔密战役之后，战局朝有利于法军的方向发展。列强关注这场战争当然有所企图，它们当时正忙着肢解波兰。但战争的推动力也来自吉伦特派的国民公会：11月，法军在热马普打开了通往奥属尼德兰的道路，接着又进逼尼斯和萨伏依以及莱茵河左岸，并占领法兰克福和美因茨。这也是一场宣传战，其口号是“对城堡开战，对茅屋和平”……但战争很快就演变成兼并行动：丹东还以自然疆界论来为这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处决国王给了各国君主（那不勒斯、西班牙、德意志诸王公）参加反法联盟的理由或口实，也给这个联盟提供了长达20余年的组织者：这就是威廉·庇特的英国，它一直担心法国的势力扩张到佛兰德尔。1793年冬天的征服代价是沉重的：尼尔文登战役失败后，杜穆里埃被赶出了比利时；叛国行为接踵而来，这位态度暧昧的将军投敌，与此同时，莱茵河左岸的地区也已丢失，残存的法国部队被围困在美因茨。

就在这几个星期，旺代发生了叛乱——准确的日期是3月10日。叛乱波及圣弗洛朗和舒莱地区，以及布列塔尼的马莱地区：开始起事的是乡村妇女，在平民出身的首领（如斯托弗莱和卡特里诺）的推动下，她们很快壮大起来，并有了贵族头领（如戴尔贝、夏雷特、拉罗舍雅克兰）；抵抗一开始只是零星现象，但到春天，整个西部矮林地带都已陷入叛乱中。关于旺代的战争，好像都说完了，但难题依然存

在……很早人们就知道，国民公会征召 30 万军队的决定是叛乱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无疑比实际存在的君主主义的或宗教的情感更为重要，这类情感并非首要的因素。但为什么有旺代叛乱呢？目前关于西部社会结构的研究，正帮助我们逐步理解反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反资产阶级和反城市情绪的缘由。

国民公会召集之时，吉伦特派处于强势地位，它是人数最多的一派，罗兰、克拉维埃尔和勒布伦等人还掌握着政府领导权，但是，此时的吉伦特派已经受不起连续的失败，如国王的审判、对外战争的溃败，以及随后的边境威胁和内战。吉伦特派的垮台不仅标志着一种政策上的失败：这个资产阶级派别既梦想结束革命，同时又冒失地进行外部扩张，因此它不可能承担起这些自相矛盾的事业，不可能为真正的革命政府奠基。立法会议初期，吉伦特派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它猛烈抨击三巨头——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指控他们向往独裁制；而到 1793 年 4 月，受到控诉的马拉却被革命法庭开释，胜利而归，反差何其大！

鉴于事态的发展，新的措施、乃至新的法制也建立了起来，其主要机构是特别刑事法庭（3 月 10 日）、各公社的监察委员会，4 月 6 日后又设立了第一届公安委员会，由丹东控制。吉伦特派被排除出革命之后，试图在退隐中进行战斗，设立 12 人委员会——针对巴黎公社的战争机器——和起诉马拉只是两个战斗插曲；伊斯纳尔还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无耻演讲，人们称之为“吉伦特派的布伦瑞克宣言”，他威胁说，“巴黎将被毁灭。不久以后，如果巴黎仍然存在的话，人们也只能到塞纳河的驳船上去寻找……”；面对这种威胁，巴黎人民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5 月 31 日的第一次起义失败后，6 月 2 日，被巴黎国民卫队包围的国民公会同意投票逮捕 22 名代表，他们是吉伦特派的头目。山岳派取得了胜利。

529

革命政府

但这是一次苦涩的胜利：正如巴雷尔向国民公会报告的那样，共和国只是一座被围困的大城市。瓦朗谢纳在奥地利手中，普鲁士人占

领了美因茨，英国人围攻敦刻尔克，西班牙人和皮埃蒙特人也向边境地带推进。在法国国内，朱安党人已经组成了“天主教和王党军队”，并在昂热和昂塞尼斯取得胜利，但后来在离南特不远的地方失败。

吉伦特派的倒台在外省引发了反对巴黎的叛乱：里昂发生了起义，并处死了山岳派分子夏利埃；在南方，分离主义者的叛乱波及朗格多克的部分地区、以马赛和土伦为中心的普罗旺斯西部、以及西南部的波尔多地区；西部的南特也受到冲击；最后，在诺曼底，一支军队从卡昂出发，声讨巴黎的“独裁政府”，但在维尔农附近被轻易驱散，而另一个单独行动的反革命者夏洛蒂·科黛也是从卡昂出发前往巴黎的，她在一次自杀性行动中刺死了马拉。

面对这危如累卵的局面，雅各宾分子代表的山岳派资产阶级、国民公会以及随后的公安委员会强化了与人民大众、特别是团结在无套裤汉运动中的巴黎人民之间的联盟。还能有别的选择么？这里的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至少要涉及人民运动。自1793年春天以来，愤激派为群众运动提供了原动力，随后埃贝尔派逐步取代了愤激派；在这些运动中，人们认为已经看到了另一种革命的苗头，它不再是民主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是确切意义上的人民革命，由于自身特有的持久的革命动力，它包含了超越资产阶级范畴的潜在因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谈论的联盟就成了一场骗局，只是罗伯斯庇尔派资产阶级的一种控制方式，他们利用群众运动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有人反对这一论点，认为这是削足适履的看法，是把阶级意识赋予一个并不存在的阶级。索布尔的研究指出，在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和由此产生的雇佣制度尚相当稀少的社会，无套裤汉仍是一个混合体，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货摊和店铺”中的独立小生产者，他们的平等主义还没有发展成独立的纲领。但这并不是说，1793年底的群众运动就不是关键性事件、不是政治斗争的推进器：这场运动以其持续而有效的压力而暂时确立起秩序，并有效地执行了一些维持秩序的措施：最高限价令（9月11日和29日），恐怖（9月5日）以及惩治嫌疑犯条例。但是，1793年秋天的高潮——上述措施就是其结果——也许是群众运动的最

后一次重大胜利。

在这几周之内，山岳派奠定了革命政府的一些基本要素，这个政府根本不符合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所梦想的、以群众自发性为基础的直接民主制的理想。1793年6月，即吉伦特派倒台后不久，新的宪法条文被拟定出来，经1793年8月10日的预备议会表决之后公布；但这部宪法从未实施过，因为1793年10月的一份决议宣布暂停实施该宪法，并称，“直到和平到来之前，法国临时政府是革命政府。”革命政府诞生于1793年夏，但正式组建于12月（共和2年霜月14日），它所面对的是极端危急的局势：“大革命就是自由反对其敌人的战争。”这一体制的关键机构是救国委员会，它出自国民公会，1793年夏开始召集，其成员一年之内没有变化、或几乎没有变化。我们不可能忽视这一群人，而且，鉴于这些革命英雄的历史地位，关注他们也是合理的。“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年仅26岁、少年老成的圣鞠斯特，库东：这主要的三人组合有淹没其他绝非二流的人物之嫌，而且以这种方便的标签来进行分类稍显武断。这当中有技术人员么？当然有。但卡尔诺（胜利的组织者）、让·邦·圣安德烈和两个普里厄尔也远非仅仅是技术人员。同样，巴雷尔，以及委员会的两个埃贝尔派：科洛·德·埃尔布瓦和俾约-瓦楞，都绝非次要人物。救国委员会以其不懈的工作、以直到最后几个月才出现裂痕的团结精神，协调和推动着革命运动。它的重要地位让其他中央机构相形见绌——部长成了普通的执行官员——甚至负责惩治嫌疑犯的公安委员会也是如此。

530

传递革命动力的轮系逐步运转起来：国家代理人派到区一级，各城市和乡镇设立了监察委员会。在救国委员会和各执行机构之间，特派员所扮演的角色与历史赋予他们的声望颇为切合。今天的历史学对他们的评价，激烈的褒贬都有之。哪种今天已过时的历史学不对那些以其顽固或残忍而著称的“罗马总督”大加发挥呢？如卡里埃在南特，勒本在北方省，富歇在涅弗尔和里昂，弗雷隆和巴拉斯在南方……当相关的记载在转向塔里安在波尔多的严酷行径时竟以颇为温和的方式加以叙述，倒是有些出乎意料。当前的历史学探讨的是革命

恐怖的代理人行动的环境和手段，以及带来的切实影响。根据最近的研究，革命军队是以巴黎的部队或其在外省的模仿者的形式出现的，它是“恐怖在外省的工具”之一，在其创建阶段，它是个半自发的组织，革命政府只能暂时持容忍态度，后来开始逐步缩减之，时机成熟后，这些部队被取消。

维持秩序的一个措施是恐怖，它的执行远远超出了简单的镇压。恐怖是有效的，共和2年牧月22日，在公诉人富吉埃-坦维尔的推动下，革命法庭通过了一项法律，强化了其活动，从而拉开了穑月“大恐怖”的序幕。但恐怖也体现在经济方面，以便将城市人民的自发要求付诸实践：食品定价须根据最高限价令（9月29日），最高限定措施也扩展到工资领域。此外还有搜查囤积、强制限定指券市价等措施，在革命的动荡岁月中，这些措施造就了一个相对有利于城市平民的时期。

一系列重大胜利见证了这种紧张的协同努力的成果。在国内，分离主义分子在头几个月内就被击溃；1793年10月收复里昂，9月收复马赛，12月19日，土伦在围攻之后终于被攻克，年轻的上尉波拿巴在这次战役中扬名；在勒芒和萨弗内战役胜利之后，旺代的叛乱即使没有被平息，至少也在当年的12月份被压制到游击战的层次上。在边境地带，士兵“混编”措施给新军队带来了新的团结，也给带来了革命热情，在行伍出身的年轻将军们的率领下，部队采取了大胆进攻的胜利战略：佛兰德尔战区的洪庶特和瓦蒂尼埃战役、东部战区的魏森堡和兰道战役拉开了春季攻势的序幕，这场大攻势导致了富勒吕斯大捷（1794年6月26日），这次胜利更多是来自勇敢，而非战术，此后比利时再度变成法国的了。

富勒吕斯大捷离热月9日只有一个月，也许人们尝试把热月政变和令人眩目的胜利联系起来——正如巴雷尔所说的，胜利使“罗伯斯庇尔冲昏头脑”——或至少可以认为，恐怖体制既然在特殊环境中诞生，它就不可能比这种环境存在得更为长久。但矛盾其实更为深刻：因为革命从此前的一段时间开始就已经冷却。

531

“革命冷却了”

圣鞠斯特的这句名言首先道出了群众动力与救国委员会政府的分离。1793年9月，无套裤可以推行他们的部分纲领：正是在无套裤汉运动的环境中，诞生了随后几个月中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它于雾月兴起于某些地区（涅弗尔），随后传到巴黎并扩展到整个法国。很早人们就知道，这场非基督教化的浪潮远非过去一些作者认为的那样，是革命政府的最高创造，相反，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很早就对此进行了谴责，而且怀疑这恰恰是让人民远离革命的反革命阴谋。但它既不是最高创造，也不是反革命阴谋，不过其群众性确实让人吃惊。巴黎主教格贝尔堪称去教士化运动的楷模，其他很多地方也有这种运动；此外，反宗教的假面舞会经常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类似的表演还有在改造过的教堂中上演的理性崇拜仪式。正如有人指出的，非基督教化是群众激情的派生物，更是一种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寻求满足的不安因素，这场被谴责的运动是使群众动力重新焕发的一个要素。自治社区（section）的永久性于9月被撤消，群众社团受到猛烈抨击，革命军被解散，巴黎公社被驯服……所有这些措施最终导致了对埃贝尔和埃贝尔派的审判，接着他们于共和2年芽月4日被处决，虽然此间爆发的群众骚动一度于风月达到高潮。愤激派则更为脆弱，他们在冬天就已经被清洗。此后，“职业化”的无套裤汉运动再也没有发起过真正有效的抵制或支持。

现在的抵制或支持力量只有依靠以丹东和卡米耶·德穆兰（《老科德利埃报》的创办者）为核心的宽容派了，这一派人组织了一个有时颇为暧昧的联盟，像法布尔·德格朗丁这样的唯利是图者也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此后罗伯斯庇尔派转而反对这个联盟了：1794年4月，丹东派分子及其或远或近的朋友被罗伯斯庇尔集团一网打尽。

在这个不幸的时期，掌权的雅各宾派收紧了自己的圈子，不过对于这些梦想以美德为基础建造一个新世界、以重新把握正在失控的局面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进行最令人惊叹的尝试的时期。为了平衡清洗埃贝尔派造成的影响，风月法令决定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将它分配

给赤贫的革命者，这一法令既标志着雅各宾派社会政策的顶点，也标志着这一政策的限度。这是一次重要的再分配，国民福利大典是其实施的依据，但是，这个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措施仍然尊重不可触犯的财产权。为平衡非基督教化的影响，人们提出了最高主宰崇拜，以罗伯斯庇尔的自然神论来对抗理性崇拜，由此便产生了共和 2 年芽月 20 日那次规模宏大的集体庆祝活动，某些人从中看到了对罗伯斯庇尔的神化。

于是形成了反对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的集团，反对派的厌倦感——实际上，恐怖的势头正猛，它在牧月法令中进一步强化——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国民公会内部，后来被称为“热月党人”的集团联合了“宽容派”和悔改或暧昧的“恐怖分子”，如富歇、塔里安、巴拉斯；甚至在救国委员会内部，领导集团也出现分裂，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热月 8 日，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说，控告“无赖们”，但他远没有震慑这些密谋分子，反而动员了他们。热月 9 日那天，国民公会已作好逮捕罗伯斯庇尔派的准备。巴黎公社支持罗伯斯庇尔的起义并不成功，而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的迟疑更增加了起义的困难。国民公会的部队重新占领市政厅，热月 10 日，罗伯斯庇尔、库东、圣鞠斯特和他们的 19 个支持者被送上了断头台。

回归秩序

532

热月党人

热月——如果我们置身于事实当中的话——包含着好几种发展趋势。有些人曾认为，它可以回到一个有利于人民大众的革命，不过应实行集体领导，因此这只需摆脱罗伯斯庇尔的控制。这可能是巴雷尔、科洛·德·埃尔布瓦和俾约 - 瓦楞等人的梦想，但它一开始就破灭了。这三位救国委员会成员遭到起诉和流放，富吉埃 - 坦维尔、卡里埃等恐怖体制的替罪羊经审讯后被处决，这些情况很快就宣告了上述梦想的破灭，与此同时，革命的政府结构被解散，监狱被打开。国民公会

卸掉了各委员会那些恼人的枷锁；雅各宾派及其各级革命机构遭到压制，随后被遣散。

但是，这丝毫不表明缺少令群众运动再度勃兴的潜在条件：共和3年和共和5年，城乡群众遭受的饥荒使局势再度激化，一直波及苦难的最深处。农业歉收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价格自由以及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灾难性。不知廉耻、毫无节制地炫耀财富，更平添了穷人的怨恨之情。不过这种刺激还远不充分，群众运动蓄势待发，但它已经失去了领导和组织结构，而它的参谋部现在只是一群组织分散的山岳党人，因而它们之间的联合只能是两个弱者的联合。共和3年芽月12日和牧月1日的场面就不幸证实了这种新局面，当时，无套裤汉冲入国民公会，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他们把经济要求和政治诉求结合到了一起。但失败的代价是沉重的：圣安托万区被解除武装，这标志着群众运动的死亡；忠诚的山岳派——“克里特人”——的最后一个方阵被清除了，这为政治反动提供了方便。

芽月和牧月的战斗是在反革命得胜时的退却战，外省（如在土伦）的此类篇章可能比巴黎更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热月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大多数热月党人期望的那种局面：把这场一度偏离了正轨的革命拉回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但这一时期的人民运动和反革命的胜利使得和平稳定的希望化为泡影。巴黎笼罩在反革命的氛围中，悔改的恐怖分子弗雷隆在那里组织“金色青年”团伙，其成员来自“纨绔子弟”；外省同样出现反革命行动，在南方，从里昂到马赛，“耶玉兄弟”团和“太阳兄弟”团猛烈攻击雅各宾分子、宣誓派教士和国有财产的获得者。新特派专员的串通行径经常加剧了这种反动。当然，要全面地评价这场反动，必须考虑到恐怖的紧张气氛过后的集体心态，那些先前惶惶不可终日的贵族和新富们，现在都咄咄逼人地展现他们骇人的生存热情。但这种反动并非都是自发的宣泄，远不是。表面上一度被绥靖的旺代又苏醒了，它为流亡者在基贝隆湾的登陆提供支持（1795年夏）：虽然是一次流血大溃败，但

这个事件本身提醒人们王党的战争目标，而王位的新觊觎者路易十八在维罗纳宣言中重申了王党的全部主张。

诚如人们所言，处于两种危险之中的狭隘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显得十分艰难。悔悟的山岳派、回归的吉伦特派，以终见天日的平原派或沼泽派的国民公会议员为中心聚集在一起，当然这其中不无矛盾和纠葛。西耶斯、布瓦西·当格拉、多努是典型的热月党人的化身，也许比焦虑不安、焦头烂额的巴拉斯还要典型。

533

从一次镇压到另一次镇压，从人为指引的暴力行为到受到宽容或鼓励的暴力行为，作为一种政策之特征的现实主义措施当然有一席之地：如1795年2月颁布的宗教自由法，这个大胆超前的法律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与国内和平政策相呼应的是欧洲和平理念。这个理念利用了革命军队借共和2年之动力而刚刚取得的胜利局面：皮什格吕占领荷兰，茹尔当重新占据莱茵河左岸地带，此外法军还进入了西班牙。1795年4—7月间与普鲁士、巴达维亚共和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巴塞尔条约和海牙条约承认法国占有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这无疑是个矛盾的选择，因为这种有限的兼并堵塞了进一步军事冒险的道路，但它已埋下了与奥地利和英国冲突的种子。

从这艰难但并非全是机会主义的摸索中，还是能看出一种明显的政策取向。无疑，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由于把整个司法、行政和教育方面的改革都归功于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因而热月党人的功绩被夸大了，实际上，上述改革措施的制定及其成就，很多时候要追溯到共和2年的山岳党国民公会。如果热月党人真的有一项属于自己的成就的话，那就是共和3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宪法，他们试图以这部宪法来结束革命。

这种向资产阶级正统观念的回归，体现在“义务宣言”中，人们认为这是与权利宣言并行的，正如某些人在表明自己的意图时所说的那样：“一个由有产者统治的国家才有社会秩序”——布瓦西·当格拉断言。实际上，只有大约20万纳税选民有权指定两院制立法机构的成员，即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的议员。在执行权方面，五名督政官权力

相等，以杜绝个人专权的危险。在这个表面看来一切都在追求平衡的体制下，一切都似乎是为了确立和平的、胜利的（资产阶级）自由制度，但偏偏革命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平息。热月党人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颁布"三分之二"法令，试图在新议会中持续、永久地保持多数地位。王党分子由于没有实现期望中的目标而深感挫折，转而在巴黎采取暴力行动，煽动首都的13个保守社区起事：葡月13日，叛乱者在国民公会部队的射击下溃散。根据巴拉斯的命令，拿破仑·波拿巴被任命为部队的指挥官：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他。暂时来看，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摆脱了人民运动这一讨厌的支持者；另一方面，通过共和3年的纳税人宪法，它把下层人民排除出政治舞台，现在它只能指望军事武力来维持其新的合法性了。这是督政府留下的一笔沉重的遗产。

督政府的反复

督政府留给人们的回忆是：一个声望扫地、没有荣光的时代，一段动荡而腐败的岁月，它最终的失败看来是咎由自取的判决。关于"督政府时代的政变"，有人曾写了整整一本书：政变已经被制度化，可以说每年都有，这种形象不就是这个时代留给法国人的最清晰的记忆吗？但这种历史判断是不公正的，在这一通常过于粗浅的事后评判中，执政府和帝国的传说被赋予了一个方便的陪衬品，我们应该考虑的是，督政府那尽人皆知的失败是否是必然的。

当时的人就已经看出这个政权内在的厄运，以及共和3年宪法的固有缺陷所造成的后果。立法者完全是从平衡的角度来构想宪法的，他们害怕从行政或立法机关中产生独裁；但他们根本没有设想到，一旦各权力机构发生冲突时，该以何种法律程序来解决。因此，政变已经潜藏在宪法中了。这种解释并非没有价值；但它仍然是形式上的。534 其他的政权会通过实践来减缓这种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之处。只有从社会矛盾和社会基础的角度才能描述和解释督政府的矛盾。掌权者不只是一个压力集团，虽然从表面、甚至实质上看，政治生活处于一个封闭的阶层之中。热月党人自己便是1789年和1791年的政治人物，作

为督政府时代的当权者，他们表达的是革命资产阶级的纲领和需求：“巩固”。从巴拉斯个人行为的层次上看，这个字眼看来很龌龊；但从一个志在捍卫其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阶级的集体立场上来说，它是有正当理由的。反革命远没有解除武装，纳税人体制又特别有利于反革命势力，面对这种局面，作为少数派的革命资产阶级必须寻求支持者：既然人民的影响力令人恐惧并被拒绝（且自牧月以来已处于衰落之中），现在就只能越来越依靠军队及其首领了。

经济局势无疑对事态发展产生了影响。督政府前期，指券走向了没落和死亡，尽管它一度以“地产凭证”的形式复活过。纸币在其最后几个月处于高通胀状态，但回归硬通货之后，由于农业连年丰稔，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又面临价格不振甚至下跌的局势。国家就是经济萧条的第一个受害者。督政府的国库空空如也，它必须利用征服战争来获取钱财。在逐步升级的战争中，热月党人的“自然疆界”理论已经被抛在了一边，政府日益依赖于军事当局的行动，因为从财政上说，它“控制”着民事权力机构。

根据各种力量因素构成的局面之不同，历史中通常有“前期”督政府和“后期”督政府之分，前者维系到共和5年果月18日，后者则直到雾月政变发生之日。前期督政府的统治集团试图在民主反对派和王党反对派之间维持脆弱的平衡，但这个集团又跟卡尔诺、勒贝尔、勒图尔纳尔和拉雷韦里埃尔－莱波等与新格局呈鲜明对照的人物有联系。原雅各宾山岳派，如兰代，先贤祠俱乐部的共和派和巴贝夫主义者，团结到了格拉古·巴贝夫的周围，他们构成了第一个威胁，也成为了第一个打击目标。这场运动无疑是共和4年的危机带来的。但是，它远非仅仅是对经济形势的简单反应。巴贝夫从前是个封建法学家，他和邦纳罗蒂等几个伙伴一起，给了1796年的平等派密谋以特别鲜明的色彩。共产主义制度的新颖性第一次被表达出来，它在寻求以暴力方式实现这一理想的同时，也确认了自己的历史意义。但是，从愤激派到巴贝夫，虽说从思想史来看，历史意识的把握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但就具体局势而言，人民运动衰落了。巴贝夫主义者是没有部队的首

领，他们宣告的革命运动将长期处于密谋状态。格勒内尔兵营起义的失败，巴贝夫主义者的审判以及巴贝夫被处决，使得这一人民运动的最后领导人也烟消云散了。

在共和 5 年选举中得胜的部分贵族的支持下，王党分子也给督政府带来了威胁，虽然它准备了很多妥协方案，但还是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在克利希俱乐部和博爱学社等正式团体的背后，掩藏着反革命的密谋网络，不过“白色雅各宾分子”，即彻底的反革命派，与立宪派王党分子也是对立的。不管王党分子的活动如何含糊不清，导致它失败的恰恰是它的成功：王党在议会占多数，并与皮什格吕一起密谋复辟君主制，督政府被迫于共和 5 年果月 18 日发动政变，撤消选举，并把王党分子和拒绝宣誓的教士送往被称作“不流血的断头台”的圭亚那。政变的具体操作由波拿巴委派的奥热罗将军负责：果月之后，军事政变终于成立一种习惯。由于果月中雅各宾派得以复兴，选举推出了大量左派人物，于是督政府只得采取平衡或两线作战的政策，于共和 6 年花月放逐了部分左派议员；但到共和 7 年，这一政策又导致议会反抗督政府的压制措施。鉴于雅各宾派崛起的趋势已很明显，督政府重新推行与新雅各宾分子和好的政策：迪科、戈耶和默默无闻的穆兰将军就是左翼多数派的代表，左派这时已在全国掀起了重返革命政策——如果不是恐怖政策的话——的运动。但是，这已经是一场迟到而徒劳的运动，因为，此时此刻，督政府政权已经无药可救了。

535

从内部来看，由于政府无能、局势动荡，政府的权威已走向衰落。当然，历史可以让我们回想起拉梅尔整顿财政的措施、弗朗索瓦·德·内弗夏托的经济政策，从而纠正关于混乱的督政府时代的传说。但总体而言，督政府的那几年是法国历史上赤足“暴徒”横行的年代：他们攻击车辆和偏僻农庄以获取钱财，他们是些没有多少想法的“原始造反派”，或是反革命军队的残留；然而他们的存在突出地反映了革命政权的虚弱。虽说督政府在国内受到了多方面的打击，但说来奇怪，外部一连串的胜利也对它造成了伤害，军事独裁就在胜利中诞生了。

通往军事独裁之路

在大革命的历史中，战争开始在督政府时期优先于内部事务。个人野心和才干在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一段很大程度上与波拿巴的崛起密不可分的传奇中，低估个人或事件的作用是不恰当的。但大事年表不能说明一切。战争不仅仅是督政府政策偶然的载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营养源，必须满足这个政权的急需，但反过来它也败坏了政府的机能。共和2年的军队受到严格监控，但此时的军队已经成为一个高级军事阶层，士兵开始依附于给他们生计的首领。因此，共和2年的军队经历了一次变革，这个变革使得它能够利用其特有的手段来对一个虚弱和分裂的政府施加影响。

卡尔诺已经拟定了1796年的作战计划，目标是要削弱奥地利的抵抗力。他准备从德意志方向发动进攻，威胁维也纳，在意大利的部队担任钳制角色。我们都知道，情况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对德国的攻势遭受失败，但负责指挥意大利驻军的波拿巴将军的胜利弥补了这个损失。这位皮埃蒙特的征服者（米勒西莫和蒙多维战役）把奥地利人驱逐出米兰地区，接着又在曼图亚附近打了胜仗（阿尔科尔和里沃利战役），1797年春天，他占领了威尼斯，从而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莱奥邦草约、特别是康波福米奥条约（1797年10月17日），既显示了这位将军的自行其是和勃勃野心，也标志着他迫使革命扩张走上的新航向：意大利各共和国（利古里亚、山南和波河河南共和国）的建立、威尼斯被让与奥地利，这些举动使得那些充满矛盾的神话（自然疆界、解放各国人民）烟消云散了，但到那时为止，革命战争一直靠这些神话支撑着。随后的几个月中，这种势头加快了：罗马共和国、帕尔特诺佩和赫尔维蒂共和国[1]最终缔造了一个“姐妹共和国”网。

埃及战役的正式意图是要反对法国的对手英国人，但有人认为，这是波拿巴实现其东方之梦的第一次尝试，或是督政府排除这个野心家的手段，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战役有点像毫无理由的异域猎奇。金

① 帕尔特诺佩共和国和赫尔维蒂共和国的前身分别是那不勒斯王国和瑞士。

字塔战役的胜利确保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但在阿布基尔海战之后，法国人被困在了埃及，纳尔逊在那次战役中摧毁了法国人开到埃及的舰队。叙利亚战役中，法军在圣－让－阿克尔遭遇挫折，伤亡惨重，这也决定了拿破仑的失败，他自己也认定了这一点。在这期间，英国、奥地利、俄国、那不勒斯和土耳其结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欧洲再次陷入战火之中。意大利丢失，姐妹共和国遭到入侵；奥俄联军在荷兰登陆后，法军在德国和瑞士连遭失败：所有这些失利使得法国在 1799 年夏天一度陷入灾难性的境地。不过，当波拿巴从埃及返回法国的时候，局面已经因为马塞纳对苏沃洛夫的胜利（1799 年 9 月的苏黎世战役）而有所好转。促使这个天定人物降临的，更多是因为国内的混乱局面亟需整顿，而非要挽救军事危局。共和 7 年雅各宾运动的兴起在督政府集团的资产阶级内部引发了一场反动，取代勒贝尔成为督政的西耶斯是反动运动的代言人和积极组织者。他梦想修改宪法，使其具有独裁色彩，但这需要借助于武装力量的支持。于是波拿巴被挑选为工具。策划得很细致、但实施得很糟糕的阴谋，这就是雾月 18 日政变。在督政府内部，除了戈耶和穆兰之外，其他人都已被争取过来或串通好了；议会已被迁往圣克鲁，借口是发现了“无政府主义”密谋；在这两个机构以及内阁和某些商界人士当中，政变都已找到了支持者。政变在雾月 18 日取得了一半的成功，但次日险些在议会遭受失败。吕西安·波拿巴的机敏、军队的介入确保了当天行动的成功。波拿巴一边蒙蔽那些自认为是其代理人的人，一边为自己的个人专权奠定基础。

536

于是另一个冒险开始了。这是革命时代的延续还是偏离呢？我们不可草率下结论：在此只想以总括的方式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的文明史。

二、革命的文明史

对于某些人来说，大革命可能只是一段糟糕的记忆，持这一看法

的不仅仅是那些从中“既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忘记任何东西”[①]的人。从一个十分不起眼的层次上、即一个规模很小的市镇的相关辩论上来看，我们有时可以估量出这个震撼世界的事件带来的冲击。我们可以感受到1789年大恐慌的痕迹，但随后一般来说就秩序井然了，只有几个短暂的插曲除外，如国民自卫军的出征和共和2年的征调。法国大革命难道不就是一次大恐慌或一次悲怆而又短暂的宏大节日么？

这当然是大革命的一个方面。这场危机自身带有太多波澜壮阔的画面——即便是稍纵即逝的——以致人们目览这些画面时无法保持沉默。但更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其地位之重要性和蕴含之丰富性给世界提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准则和框架。这些信念在那个风雷激荡的法国找到了其实验的空间，1789年给了那个法国以现代性的面目。法国大革命结束之时，除了那些已然取得的确定性之外，还有那么多尚待实现的期盼和希望——还有失落，因此大革命自身便包含着超越自己的种子。

瞬时性变迁

大灾变：大革命和人口状况

一场大灾变：这就是大革命留给人们的第一印象，这个印象虽然让人觉得很天真，但并不能因此说它肤浅。人们已经着手研究革命危机对城乡人口状况的影响。这一影响看来是重大的。当时一些人——通常带有敌意——认为大革命造成了人口停滞、甚至是减少；但在更为切近的观察过后，这个看法应稍作修正。大革命是个高结婚率的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婚姻都呈激增趋势。不难看出个中动因：旧的社会结构的崩溃、对单身汉的征兵带来的影响——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虽说这些原因是事件造成的，但其后果相当明显；出生率随结婚率走高，但死亡率则因为共和3年的生存危机、瘟疫和战争的冲击而陡增。总体情况来看，人口并非下降了，而是增速放缓。出生率 537

① 这句话是塔列朗关于流亡贵族的评论。

的走势显然不是完全遵循结婚率。从地方性人口资料看，当时肯定加强了生育控制。

这种一般性的结论必然是概括性的，但其中有多少相互龃龉的调整和演变呢！最近有些研究仍在强调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外逃”，但与这种景象相对的是，有些城市因为大批离乡背井的农村人口涌入而出现人口膨胀的现象——这是对“旧模式”的反动。位于通往边境的大道附近和动乱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人口出现了暂时性的恶性膨胀；相反，南方的一些城市则经历了明显的人口下降。城市在人口方面的反应虽然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它在经济上受到了保护，而农村的人口演变则见证了它对经济形势的敏感性，而经济形势尤其受生存问题的支配：1788年严重的危机就已预示着革命的到来，共和3年的危机也不相上下；在督政府那个盗匪横行的年代，很多流浪者漂泊在茫茫田野上，他们的审讯记录诉说着他们在那年“可怕的冬天”里离乡背井的情景。

当然，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责怪我们没有在研究中考虑到恐怖的影响：如果人们愿意的话，恐怖的影响从数量上说应缩小或降低到其应有的水平。大革命从肉体上消灭的敌人约3.5—4万人：这个数字既很高也无足轻重（不到法国人口的千分之二十一）。从社会分布来看，既定的说法也要作一点修正。死亡者中工人和手工劳动者占31%，农民占28%：特权者只占遇难者的少数：但从这个阶层的人口总数来看，这个比例要高得多。统计数字中主要的反差无疑是受恐怖影响严重的地区和实际上没有受恐怖波及的地区的差别：16%的判决发生在巴黎，71%出现在西部旺代（52%）和叛乱的东南部（19%）。这些枯燥的总数还应以被监禁者的数字来补充完善之（大革命时期监禁者最多时有300—500000人）。但是，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应该加上反革命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值；在南方的普罗旺斯，共和3年的第一次白色恐怖造成的杀戮与雅各宾恐怖一样严重。“大灾变”可以看作对大革命进行人口学评估的一个起点，在这一灾变中，流亡也是一个不容低估的因素。到1794年的头几个月，流亡人数达到其最高值，约6

万人。考虑到总体外流状况，即返回和新的外逃，流亡者总数当低于10万。正如恐怖牵涉的问题一样，流亡造成的影响及随之而来的效应不能仅从相关数据来考察：这种冲击属于另一个层次，具有另一种性质。

指券时代：经济危机和通胀危机

法国大革命以一次经济危机为发端。此后经济困难一再出现，对于被很多人认为一个仍属“稀缺时代”的时期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特征。持续的灾难性的经济萧条景象着实让一些人震惊，他们认为伟大的18世纪的经济发展，足以补偿从1730年至1817年持续近百年的物价上涨，因此大革命从经济意义上来看，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变故；而那些长期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因为已习惯性地把那个动荡的时代看作一片漆黑，反而不会为这种景象感到吃惊。但这次变故是重大的，人们也知道，就法国来说，这种变故的主要构成因素是什么。首先，在这个为生存而操劳、因饥荒而恐惧的世界里，反复出现的农业歉收再次构成了威胁：尤其是在1791年和1794年，收成不足导致了饥荒，像1792年一样，共和3年的危机是人民生存危机最深重的时刻。

538

除了这些传统因素外，指券的发行也产生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通货膨胀危机：1791年年底，流通中的指券价值15亿利弗尔，1793年为30亿利弗尔，热月9日前夕达到60亿利弗尔，而1796年年初则已超过340亿。通货膨胀引发的指券贬值成为革命运动各阶段的标志。指券政策直到1791年底都还是很明智的，但其价格曲线在1791—1792年之交首次呈现剧烈下跌，接着是在1793年的上半年；在革命政府对通胀采取的短暂遏制措施过后，指券又从1794年到1795年年底无可挽回地急剧贬值。与上述情况相应的是价格上涨和购买力的衰退；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头几年——直到1791年——价格曾因为收成良好而下跌；因此通货膨胀的洪流使得生存危机和城市贫困雪上加霜，并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正是在这种总体性的经济背景下，城市的经济危机才能得到充分理解。无疑，城市有时似乎受到温和派或雅各宾政府的保护，因为它

们深知街头骚乱的危险。但城市也经历了那些缺粮和物价昂贵的灾难性阶段，如 1792 年和共和 3 年。作为消费者，城市平民受缺粮和通胀之苦，但作为生产者他们亦是受害者：一方面是流亡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城市资产阶级和贵族把生活排场缩减到“生存、替换、但不要增添”的水平，这两个因素波及到相当一部分手工行业，而且它们不全是“奢侈品”工业。建筑业和纺织业这两个考察 18 世纪城市经济活力的指标出现衰退；失业加剧，恐怖时期为军事需要而展开的指令性生产只是一种短暂和不足以应付局面的权宜之计。国内消费市场萎缩导致的危机在巴黎、里昂、鲁昂和许多其他城市表现得十分明显，而 1793 年春天以后大型外贸活动的中断则是导致萧条的另一个因素。对于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各大港口而言，18 世纪咄咄逼人的对外贸易曾繁盛一时，但这时它们为经济转型或适应危机形势而被迫在近海进行转运远途货物的行当（如马赛）。对于这些商业资本主义的排头兵来说，这种隔绝状态在帝国时代的延续使得革命年代的困难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危机：曾持续百年的繁荣结束了，这种繁荣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重现。

社会危机表明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在农村，这段时期对于作为消费者的小农最为艰难。流民数量增加，他们当中产生了盗匪等不安定因素，这就是那些最脆弱的农民离乡背井带来的具体后果。在城市，货币波动反映了——虽说并不全面——工资暂时性的社会调整：来自农村的流动无产者激增，从而损害了专业化的生产阶层。

凡此种种都只是短暂现象吗？这种看法既对也错。它们至少在城市居民的集体心态中留下了一段痛苦的回忆。如果人们努力从当时人的感受和经历来理解大革命的话，那么在这种革命的画面中，经济和人口局势将支持和强化很多人所持的那种重大惨剧的观点，对无名群众和直接经历者而言，这场惨剧关涉他们的生存。

539

群众和英雄：大革命是场戏剧

关于大革命的集体参与，历史学长期以来记载的只是复数的群众。历史对他们不仅仅是不恭维。19 世纪那些头脑中萦绕着巴黎公社的保

守派历史学家、涂尔干派的社会学家留给我们的，就是这种以拟人化的手法重建出来的群众形象，一种非理性的、幼稚的、甚至堪与泰纳在一篇著名文章中谈到的狂人相比拟的集体存在。自从勒费弗尔奠定对群众的科学研究原则之后，我们了解到，根本不用为那些并不需要作出评判的集体行为恢复名誉，而是要更好地理解他们。首先是分层研究：从饥荒时期聚集在面包店门口而形成的自发联合，直到以明确的口号动员起来的战斗群众。群众类型不同，街道上的局面也就不同；群众当中首先有大量妇女，其次，他们中间的领导者主要是活跃的无套裤汉中的工匠和小资产者。传统史学家认为群众是由作恶者和惯犯构成，但实际上这种人很少，甚至不存在。当然，群众由于其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而置身于人民暴动的传统中——从天主教同盟到投石党运动以及整个旧制度期间，巴黎曾一次次地目睹了这一传统的再现。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大革命成熟的领导者队伍使群众成为了一个重要因素，群众对自己参与的这场宏大戏剧绝非处于半无知状态。

群众和英雄：这个浪漫主义留下的论证方式过于简单，而且以此来称呼行动参与者是不恰当的。大革命是第一场现代类型的群众运动，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它造就的有组织行动结构，而随后其领导者便走出了最初的无名状态，其形象也更为清晰了。我们知道，巴黎的无套裤汉团结在货摊和店铺经营者这一庞大的领导核心周围，他们属于中小资产阶级，也有一些最先进的工资劳动者。在作为“在外省的恐怖工具”的革命军中，我们还发现外省的无套裤汉、甚至“愤激派”，地方人民团体也是这样。过去关于大革命的图景完全是巴黎的，这与外省的麻木恰成对比；但实际上，外省的政治化通常十分深入，这就抹去了传统画面。当然，对此我们不能夸大。从其积极参加者的数目来看，大革命仍然只是少数活跃分子的现象：在马赛各城区，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也从未把超过 1/4 的成年男子动员到城区大会上来，无论是在 1792 年夏天还是在 1793 年那个分离主义的春天。如果要考察真正的“积极分子”的数量，那么相关的数字会进一步缩小。但在这一革命精英中，至少开始显露出一些面目特征，一种革命心态逐步清晰

起来：这将弥合革命群众和革命英雄之间的鸿沟。

确实，现在已经不是靠某种传记的形式把革命冲突简化为各个集团之对抗的时代了。奥拉尔的“丹东派”、马迪厄的“罗伯斯庇尔派”，现在都已不是研究大革命的方法了，但我们如果嘲笑这类方法，那肯定是错误的。不过，今天某些人提出革命领导人或头领“集团”的看法，真的总是更为令人满意吗？不管方法路数如何，大革命期间法国气质之多样化也像其特殊人物之丰富多彩一样，总是让人吃惊。我们还应提防那种已经过时的浪漫情怀，即关于大革命的奇特想像，

540 如说它是吞噬自己孩子的萨图恩神[①]……总是以为可以安定下来，但总是会出现新的威胁。然而，当我们来到一条安静而土气的街道上，站在据说布里索、佩蒂翁和西耶斯曾于革命前在那里聚会讨论王国改革的房子前面时，当我们来到某个为大革命奉献了马尔索将军的小城市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个非同寻常的人类历史时期的绚丽多彩。因为大革命以一个开放的社会（人们甚至不曾感受到它的限制）取代了封闭的社会，因为在它时而血腥、时而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活力中，充满大量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大革命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春天，是我们民族历史上集体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对于一个我们一直以“危机”来称呼的时代来说，上述首要的真相可能并非是它最无足轻重的方面。

革命节日

对于那些只把大革命看作一场死亡节日的人们来说，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是刺耳。我们远不是要提出一个抽象、单一的看法，从而忽略集体宣泄中的嗜血场面，尽管这种宣泄很少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从死亡和残害行为一下子过渡到自发的法兰多拉舞（1790年马赛发生的谋杀博塞少校的事件）[②]，我们看到的这种集体心理问题远没有得到澄

---

① 这个说法出自德国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大革命就像萨图恩，吞噬着自己的孩子。

② 博塞原是马赛一城堡的守备军官，1790年5月2日被革命群众杀死，头颅被割下示众，法兰多拉舞就是在这次杀戮后的群众聚会上出现的，大革命中的卡马尼奥拉舞是它的一种变体。

清。为什么这样呢？人们长期以来十分关注断头台，热衷于以绞刑架下的革命妇女之类的手法来描绘革命场景，以致我们没有必要为如此众多遵照传统的作家曾得体地论述过的节日恢复名誉；但最近的研究已经着手这一工作。

普里厄尔美妙的雕刻以及他同代人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学术化肖像史料。翻阅这些作品时，我们可以发现革命节日的组织模式：从 1790 年举国一致的大规模游行——其中联盟节就是典范——到大革命宣告其新创举（如 1791 年 9 月 14 日的宪法宣告）或纪念其先驱者（如伏尔泰和卢梭的遗骨搬迁）的仪式。举国一致的神话到 1792 年夏天已经很难维持，当时的庆祝活动接二连三，如纪念夏托维厄的瑞士革命者的自由节，法律节纪念的是埃当普的市长、维持社会秩序的英雄西摩诺；随着局势的紧张化，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更具战斗色彩的节日，如 1792 年 7 月“祖国在危急中”的号召和 8 月 10 日纪念死者的节日就表达了这种紧张局面。共和 2 年出现了某种断裂：非基督教化阶段是半自发性的节庆（如自由节和共和 2 年雾月在巴黎大教堂举行的理性节），与此相对的是官方形式的节日，共和 2 年牧月 20 日的最高主宰节也许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范例。看来应该在一本详细画卷中增加很多有关群众的材料，以见证上述节日活动。节庆活动的高涨一直持续到热月，但在热月和督政府时期，这类活动也很可观。此外，既墨守成规又追求革新的外省也出现了与巴黎类似的情况。这里只要知道大革命已经使节日成为各地的日常活动就够了。

稍纵即逝的激情：感受的革命？

节日从其本质上说是昙花一现的，但它也许能留下持久的记忆。革命节日在何种程度上与集体感受的转变相一致呢？或者说，在这场辩证法运动中，集体感受是被不断升温（可以说热烈）的意识推入革命熔炉的吗？

乍看起来，文学史或艺术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人们认为，大革命根本没有什么创造，很多人觉得那是一个艺术蛮荒的时代，

它把安德烈·谢尼埃①这样的诗人、拉瓦锡这样的学者变成了牺牲品。541 如果人们愿意走出以“共和国不需要学者”② 为主旋律的那种简单的成见，那么很多人将注意到，这个时代的短暂和其高度紧张的局势可以解释大革命留下的成就何以如此之少：革命不是从雕塑中创造出来的。但在这个简短的辩白之外，很明显的一点是，大革命在打乱过去的文学艺术创作模式的同时，它无法一下子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来。不过，指出民间文学的勃兴是很有意义的，尽管这种文学绝非新鲜事，但报纸、小册子、传单以及日常生活中无孔不入的肖像作品——从雕刻到彩釉——该如何大大扩充了这一文学啊！从这个层次上说，我们正应该在这些边缘化的创作领域——但它们因此就不崇高么？——中寻找革命文化产品的原创性。

让我们转向演讲术，在这个新领域内，大革命有光彩夺目的表现。从米拉波的言论到维尼奥和丹东激情澎湃的语言，我们最后看到了圣鞠斯特和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和报告中那惊人的严谨。正是由于这些演说家，法国大革命所传达的信念有了自己的语言形式。被视为文学载体的报纸，也刊载了德穆兰和马拉数以千计的文章和众多以其格调而超越其时代的作品。仍为当代很多历史学所青睐的上个世纪的风格，为什么是来自马拉呢？他那至为狂放的激情一直是一个文笔恣肆的报人所看重、乃至炫耀的。也许应该归因于埃贝尔的那份大杂烩般的《杜歇老爹报》，它那深受百姓喜爱的热情奔放的风格也值得重视。在一个没有悲歌的位置的时代（但还知道抑扬格），谢尼埃显得太遥远了，至少安德烈太遥远了；根据浪漫主义的传统看法，他兄弟玛丽-约瑟夫不是很讨人喜欢，但对他应作新的考察；也许他那学究气的诗作中最有价值的探索是与音乐的结合。

---

① 安德烈·谢尼埃（André Chénier，1762—1794），一般被认为是18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后被送上断头台；其弟玛丽-约瑟夫·谢尼埃（Marie-Joseph Chénier，1764—1811）也是诗人和剧作家，并长期担任议员，包括国民公会的议员。

② 这句话是1794年审判拉瓦锡时一个革命者说的。拉瓦锡因担任过旧制度时代的包税人而被指控为叛徒，当时他要求暂缓行刑，以便完成自己的实验，革命法庭的主席回答说：“共和国不需要学者，也不需要化学家，正义的法庭不可能延期。”

通过梅于尔谱曲的《出征歌》、特别是戈塞克的作品（《忧伤之旅》、《最高主宰颂歌》以及令人赞赏的《觉醒吧，人民》），我们可以考察一种追求并最终找到了革命的表现形式的艺术的新面貌。在这些露天表演的作品中，木制乐器让位于铜管乐器，其突出的特点是大胆使用了宏大的群众合唱，正如戈塞克说的，音乐“有了自己的须髯”。如果脱离革命节日的整个壮阔背景，我们就不能对这种音乐作出全面的评价。大革命短暂的创作留给我们的只是宏大演出的画面——有时是这样。

另一方面，大革命期间装饰艺术的相对衰落使得人们寻求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绘画表现手法。它的出现很突然。大卫不就是因为积极参加革命而成为介入派画家、并通过他的作品而成为 18—19 世纪之交法国绘画界的一位大师的吗？由于他的努力，法国绘画艺术过早出现了新古典主义革命，这对他、对这一时期的法国艺术来说，也许不是件好事：《贺拉斯兄弟的誓言》在 1785 年取得重大成功；受古典人文主义滋养的法国资产阶级在这种“英雄主义的幻象”中发现了可以用来对抗贵族轻佻的表达方式。革命节日正是在罗马人“华丽的旧服饰下”举行的；新的普鲁塔克式英雄正是在拟古的大会讲坛上发表演说的……大革命也正是通过学术想像寻求自己的艺术的。幸亏不总是这样。大卫和他同时代的革命者留给我们的肖像作品无疑使法国肖像画的传统传诸久远。就官方绘画来说，大卫描绘那位在浴缸里被刺杀的英雄的作品带有学院派色彩，如果说这种风格有时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那么大卫留下的那幅关于少年巴拉的素描则表明了真正的革命绘画的失败：这个美丽的少年把仅有的一件衣服——三色旗——紧紧抓在胸前。但席里柯很快以他的《轻骑兵军官的冲锋》让人们领略了真正的革命艺术。正是因为这种清晰可辨的新古典主义的英雄主义色彩，大革命看来在艺术方面并不构成一个集体感受方式的转折。但怎能在 10 年之内就改变生活环境呢？ 542

十年之内可以改造人吗？

这些视觉诉求和叠加的危机因素所留下的，难道只有挥之不去但又

苍白贫乏的集体记忆么？作为一次把人们拖入一种全新运动的集体精神震荡，大革命改变人了吗？在探讨那些为危机表象所不能掩盖的深层变化之前，我们不能认为这个问题是关于大革命的心理表征的总结而将其弃置不顾。

就上述问题来说，革命崇拜的经历及其失败所给出的答案看来是否定的。理性崇拜是巴黎人在共和 2 年雾月创造出来的，随后的几个月中，这种崇拜在外省也开展起来——或者是自发的，或者是在特派员的鼓动下兴起的；在宽容派被镇压、罗伯斯庇尔派掌权后，这种半自发的群众活动被为时甚短、程式化的最高主宰崇拜取代；此后的热月和督政府时期也许是每旬公民崇拜最隆重的时期，虽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所有这些新创举延续的时间都只有新历法那样长——这部历法是一次改造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时间节奏的大胆而令人震惊的尝试，它的命名来自法布尔·德格朗丁——它们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应该避免过于草率的结论。问题至少在于——且问题已经被提出——要了解，革命危机在何种程度上没有以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来激发“狂热”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对此人们会想到那些成为自由殉道者崇拜之对象的革命和民众偶像：“哦！号角耶稣，哦！号角马拉”，这样的声音响彻 1793 年……认为外省在这方面落后的看法是错误的：外省很早就出现了革命崇拜仪式，甚至那个带三色翅膀的圣女芭朵德也是旺代革命者的珍爱。大革命的这个方面不应被遗忘。

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大革命在人生态度方面带来的普遍性转折，它打断了千百年的陈习，今天的人们无疑仍受惠于大革命的创造。但在这里，革命危机远非只有一个。其中可以分辨出两种趋向，它们先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新人观念。在雅各宾革命中，新人也许就是阿尔贝·索布尔为我们描绘的无套裤汉形象。这种新人并不年轻，他已经 35 岁了，已婚，有孩子。他梦想着一个平等主义但绝非集体主义的世界，在那里，每个小生产者都拥有最低限度的物质幸福，这就是他的理想。

高人应该缩短

矮人应该更高，
所有人都一样
这就是真正的幸福……

他们摆脱自身的偏见了吗？要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一场真正平等的运动，那确乎是很困难的事，至少在政治领域是这样，虽然有时他们的个人世界观中也有某种自由联合的、带有卢梭特色的观念。已经有某些研究指出，他们开始摆脱那种一直制约着其生活和家庭平衡的自然生产的影响，但这种趋势要到帝国时期才最终明确下来。

在大革命的另一个侧面上，热月的花花公子与无套裤汉恰成对比。他们以另一些方式表达了纯粹个人性质的解放诉求。他们还没有驱散父辈们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情景，但各人的行为各人自己负责。他们享乐和发财的欲望表现在对奇装异服的追求中，其中妇女那不顾廉耻的卖弄风情具有挑衅色彩；他们的自由完全只是为了自己，是挣钱的自由，是因时局而变得特别有利的社会流动的自由。只是他们要以自己古怪的语言与无套裤汉和平等主义的自由风尚保持距离。两张画像，两种表象。大革命究竟赞成哪一个呢？或许可以排除资产阶级金色青年的反叛行为，因为这属于危机结束过后的一种发泄。但是，无套裤汉形象既来自梦想也来自现实，"新人"既面对过去也面向未来。

543

革命危机中的这些形象，无论是悲怆还是辉煌，都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泡沫，现在该超越它们，去认识革命的历史影响和历史成就了。

确定的价值

革命主张

大革命首先试图以普世主义理想来改造现实，所以它要以言论来宣扬新的真理。从大革命的头几个月起，主要文献均在成形。国民议会通过公民权利和人权宣言是在 1789 年 8 月 26 日。1791 年宪法赋予这份具有普遍效力的文献以具体实施的纲领，并对其进行了补充。一切都确定下来了吗？当然没有，1793 年的山岳派宪法带给上述文献的

不只是润色：它表达的是新的信念和精神，我们稍后再谈这一问题。不过，作为1791年体制的捍卫者，共和3年的宪法对制宪会议的主要成就所做的只是肯定和小修改而已。这并不是说大革命的创造力就此枯竭了。革命的理念不断得到丰富和明确：制宪会议期间，在有关黑人和黑白混血人的权利的热烈争论中，一些人表达了大革命的解放使命；从孔多塞到圣鞠斯特再到拉卡纳尔，一种理想教育模式出现了；格雷古瓦则通过派往滨海阿尔卑斯地区的代表团阐明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理论。虽然各种想法不尽一致，而且存在各种现实的隔阂，我们还是应该强调当时表现出的某种共同信念的重要意义。在这个发生过多次革命的时代，还有其他的宣言和主张。但从未有哪种信念具有如此坚定的力量和如此广阔的普世意义。

平等

“在权利方面，人生来并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差别只应以公益为基础。”旧制度也有自己的自由，但它断然没有大革命宣称的自由之根本特点；旧制度建立于等级社会的结构之上，从本质上说它是不平等的。在从封建主义向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大革命宣称的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

从消极方面说，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它的破坏性中：它标志着等级制社会的终结，摧毁了古老的贵族特权，不仅从社会方面、而且从经济方面沉重打击了教士，在农村，它解除了领主制的奴役网，在城市，它结束了一切形式的垄断，从行会体制到特许商业公司。这种焕然一新的局面首先表明大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新确立的平等原则被资产阶级到处传播。

公民平等并没有造成什么大问题。无论是事实还是假设，起点机会的平等是正在成型的新世界所必须的：任何人都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当然，各种限制和意味深长的保留很快就出现了。从立宪会议开始，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制问题就已表明，部分革命领导人试图给公民平等设置限制条件；直到山岳派国民公会才断然采取解放政策，但为时甚短。此外，思想自由原则的确立的必然推论是，所有平等的公民最

544

终都要接纳那些因宗教而被旧制度所排斥的人：新教徒和犹太人。

不过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革命对于自己宣称的平等是有限制的。这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很明显。制宪会议采取的、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区别，将 1/3 到一半的人民排除出政治领域；这种为成为选民而必须交纳的“公益捐”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评论说，这种限制使得让－雅克·卢梭也不能进入立法会议。政治限制是由社会限制而来的。当然，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革命时代的各种纳税选举体制，若从其动员的那部分人民的情况来看，仍比 19 世纪的纳税选举体制要自由得多，而且这些体制是处在一个普选制尚未成为集体诉求的时代（请看革命选举中大量的弃权现象）。同样，制宪会议和热月期间的资产阶级也想对他们建立的民主制加以限制。自由、平等、博爱[①]，这三个后来成为经典的革命口号中，第三个是随后出现的。对革命资产阶级而言，安全稳定和财产权是首要的。

自由

在大革命奉献给世界的所有观念中，已经争取到的自由最得人心。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对攻占巴士底狱的物质背景喋喋不休，但这一集体行动的历史象征意义是确定无疑的。旧制度所有的专横都随这座堡垒一起崩溃：自由的共和元年开始了。

个人自由是大革命取得的首要的、最无可争议的成就。恐怖及随后帝国的权威都只是改变了其具体的实施，而非它的原则。制宪会议没有走到颁布英国式的人身保护法的那一步，但它的一系列保护措施至少禁止了非法逮捕和拘禁。公民在受到司法追究时不再受无端的虐待。启蒙运动宣扬的人道主义主张废除酷刑，大革命遵循这一道路，设法取消一切无益的处置罪犯的严酷方式：断头台在成为镇压工具之前，曾是对旧制度的野蛮酷刑的一种反应。在 19 世纪保守派的史学传

① 法文写作：Liberté，L'Egalité，Fraternité.

统中，嘲笑吉约坦医生的人道关怀①和制宪会议议员罗伯斯庇尔废除死刑的建议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当前的历史学较为平和，能够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可调和人道的革命与流血革命之间的矛盾。

观念自由看来是个人人身自由的自然发展；旧制度在其最后的几年中曾因恢复新教徒的民事权利（1787 年）而对此有所犹豫。不过新局面的出现为时尚早，大卫在《网球场宣誓》中把格雷古瓦神甫、唐·热尔勒和拉博·圣艾蒂安牧师放在一起②，既象征着新的平等，也意味着古老的信仰对抗的终结。但是，立法、特别是实践再一次与理想产生龃龉。虽然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新教徒完全的平等，犹太人的平等权利则来得较晚，且有某种保留，这就表明了革命特有的原则特征。既然已经宣布信仰自由，那么其中暗含的结论就是要结束天主教会在信仰方面的指导地位，这注定要成为造成革命和教会之间重要的分裂因素之一。随着分裂的加剧，热月革命终于采取了政教分离政策，今天看545 来，这一政策是国家世俗化的自然延续，是信仰自由的结果。但它是个昙花一现的举措。我们应为此感到奇怪吗？“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其观点——即使是宗教观点——而感到不安”，这一大胆宣言中其实包含着某种克制，如果对这个时代具有历史意识，我们就不会奇怪了。

观念自由的一个必然推论是言论的自由，对革命者而言，这是他们最“珍贵”的，也是最令人担心的成就之一。“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发言、写作和出版，除非是对这种自由的滥用”，言论自由以带有缓和语气的措词写入法律中，这就表明了一种矛盾态度，此种态度后来一直延续到纳税选举君主制时代，并有所强化。但大革命至少见证了言论自由的发展历程；充满活力而富论战性的革命出版物的激增，充分反映了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成型——如果不是已经诞生

① 断头台一词（guillotine）来自吉约坦（Guillotin，1738—1814）医生的名字，他在担任国民议会议员期间曾建议采用一种更为简便迅速的处决死刑犯的机器，这一建议最初是出于人道和有效性的考虑。这种装置建造于 1791 年，次年开始使用。

② 这三个人分别是天主教在俗教士、在教教士（多明我会修士）和新教牧师；在大卫的那幅绘画中，三个人聚集在一起，格雷古瓦在中间，热尔勒在左，拉博在右。

的话。

除个人自由之外，这个新社会在宣称政治自由的同时，还提出了结社自由的基本原则，虽然此事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它像从业自由一样有效。人民主权原则、一切领域内的选举原则、基于分权之上的代表制，这些就是人权宣言的主题，也是1791年和1793年宪法所采纳的基本原则，而共和3年的宪法很大程度上重申了——有时还有所夸张（如关于分权）——这些原则。其中的某些原则在革命期间没有被遵守；执政府以后，中央集权制开始回归，这使得人们以某种可笑的高傲态度看待那种梦想着选举法官、甚至教士的制度。但是，人民主权的原则，以及继承自孟德斯鸠的、基于权力平衡之上的政治自由，在经历了各种限制和变迁之后，依然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观念，在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若把经济自由列入大革命赢得的自由当中，可能较为麻烦。随后一个世纪的经历将会表明，经济自由当中存在诸多矛盾，企业自由的原则与给予所有人以均等机会的社会思想之间是多么难以调和。根据勒夏普利埃法，制宪会议禁止任何形式的联合，正如其禁止垄断一样；该法律已经把企业自由列为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但从那时候起，资产阶级世界的这些基本要素引起了强烈的抵制。这其中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当时他们的人数仍然太少——还有城乡消费者，他们都从千百年来的本能反应出发，对基本生活品的自由流通感到恐惧。但是，对于革命对抗中真正的胜利者来说，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太宝贵了，以致经受不起对它们片刻的打击。

现代法国的诞生

革命的法国划分为省，而旧制度的法国存在各种管理机构：如财政或司法机构；如果把新地图和旧地图叠放在一起或作一下对照，是件很容易但并非多余的事：我们面前的新法国区划框架焕然一新，而且被简化了。83个省取代了过去的区划，随后还有一些省加入。它们的形式和结构表明，确立这一规划的制宪会议区划委员会的成员们是根据某种方法行事的，这甚至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人们希望抹去过

去区划中那些不协调的东西，正如抹去集体记忆中恼人的负担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处置那么多的地方恋旧势力、裁决城市中那么多的社区争吵的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大革命并不是把一切都推倒了重来。它并非不想这么做，因为确实有人提出，按“美国的方式”划分为一些大小相等的四边形。但最后的方案有所保留，它既考虑到了距离的平衡这个实际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尊重现实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和谐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各地方压力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区和乡镇的轮廓有时就能说明这一点；但在全国层面上，统计上的补偿原则保证了基本的和谐。

546

新的框架之下是新的制度。执政府和帝国时代中央集权大棒的回归最终确定了大革命的遗产，但实际上，大革命并没有遵循它的地方分权理想，亦没有实行行政、司法和宗教职位的选举原则。不过大革命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创新之处。在统一化合理化的结构中，司法机构的组织就是一个明证。新的税收体制是 19 世纪继承的主要制度改革成果之一，这件事看来不值一提。大革命确认的税收平等是从社会方面摧毁旧制度的最鲜明的例证之一。当前法国仍然存在的税收“四老”：地产税、动产税、营业税和门窗税，其设立也在大革命期间，并经历了革命危机困难时期征收中的种种变迁而流传下来。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制度建设的成败进行总结时，我们要避免那种绝对的褒奖。革命历法失败了，但米制作为共同使用的度量单位却取得了成功；新行政区划延续的时间惊人地长久，但司法和教育方面的新举措则不完善，我们研究的这一短暂时期便证明了它们的局限性，尽管当时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如传播了免费义务初等教育的理念。但在这些国家生活的新框架之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一下法国内部在哪些方面有了深刻变化。

新社会

当人们从各种宣言的普世主义转向大革命创造的新法国的真实面目时，也许会感到失望：大革命并没有改变一切，但无疑我们也要防止 19 世纪的人经常陷入的那种双重诱惑，即一方面认为大革命是场全

面的大灾变，另一方面又认为它只是确认此前旧制度的社会演变趋势的一场简单的变故。

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地产资本的层面上，大革命远没有实行彻底的再分配。只需指出如下一点就足够了：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史上，大革命期间法国相当一部分土地——约15%左右——的转移是最重要最迅猛的财产转移之一。我们可以对出售国有土地产生的大规模财产剥夺作一下估算。这些出售的土地首要的来源是对教会的经济清算，这一工作很全面：全国6%—10%的土地因此而转手。对另一个特权社会集团，即对贵族的打击，其成果要逊色得多。并非所有贵族都流亡了，也并非所有流亡贵族都丧失了财产。因此对他们的剥夺远非全面的。不过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过于低估这个数字，为此就应该比较革命前和革命后贵族的产业状况，估计出自愿出售的土地数量，这个数量通常很大，它见证了大革命对整个贵族集团造成的集体危机感所带来的压力。这种压力造成的冲击通常远不是从这些“次要来源”的土地出售所能估量出来的。因此特别要考察废除封建制和领主捐税造成的影响。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如果考虑到其技术上的困难的话；但在革命时代的重大变迁中，我们至少不能忽略贵族这部分重要收入的丧失，即对农民征收的捐税的消失。目前这个领域仍有待研究。

547 这是失财者的情况。如果认为这些人仅限于教士和贵族，那毫无疑问会犯错误。旧制度社会的崩溃带走了各种古老的征收，如地租，一些资产阶级拥有十来种这类收入。虽说这些征收按规定需要赎买，但当共和3年的指券一文不值时，它们都在几个星期之内灰飞烟灭了。国债食利者和地租所有者，整个这一社会阶层都因为大革命而消失了，至少财产上受到了打击。但这远非是最终的局面：这种社会集团又以某种相同或不同的形式重新出现，并马上在19世纪的法国占据重要地位。就食利者阶层而言，大革命更多的是体现在不断加剧的人员流动上，而不是结构转变上。

在这次洗牌过后，谁是受益者呢？问题主要牵涉国有财产。我们

远不能作出全面的回答。受益者主要是两类人：资产阶级和农民；根据一些卓越的开创性研究，如乔治·勒费弗尔的《北方省的农民》，在这两类人当中，农民又是胜利者。后来断断续续但为数众多的专门研究有时则对这种农民相对解放的图景提出了重大修正。由于贪婪的资产阶级对土地的渴求，地方中心城市和普通集市上的交易使得当地农民陷入勉强糊口的境地。有学者曾对萨尔特矮林地带的这种不平等竞争作过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革命资产阶级在获取土地方面的胜利，是导致当地失望的农民转向朱安党人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否有个总体性评价呢？巴黎和外省资产阶级占有了一半（有时更多）的教会地产和部分贵族的产业。对法国农民来说，不管怎样，这场变动最终的结果是盈余的。若从城乡关系来看，不同地区的农村均有不同程度的解放。是哪些农民的解放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大农业平原地区的大种植农——“乡村翘楚”，他们不久前还是贵族或教会的大承租者，在国有地产的竞卖会上碰到他们不会令人奇怪。在局部地区，地位较为低微的农民也会在山岳派时期的土地转移中获益。在某些地方，农民的投机行为——特别是资产阶级买主和投机商将土地碎化之后的再出售——也使得某些土地经过再分配而转入农民手里。这种情况可以解释，在旧制度到 19 世纪农民社区的发展历程中，何以大革命期间业主数量大量增加，对此有大量个案可以为证。大革命是个决定性的转折还只是一段插曲呢？回答因地而异，小业主在革命最初的震荡之后对国有地产碎化的巨大恐慌——巴尔扎克的《农民》中可以找到这种恐慌的回音——并不都是一致的。在平原大农业区，小农的激增没有抵挡住 19 世纪的土地集中运动，而在另一些地区（我们指的是法国南方的平原地带），这则预示着土地的进一步碎化。大革命时期农民的得失，完全是这一时期初显眉目的法国社会在调整中带来的问题。出售国有土地当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因素，但还不是全部，其他一些重要转变也应考虑进去。

最重要的无疑是“业主”团体的形成，官方法令和税收文件中的这一社会术语见证了它的诞生。当然它并非从虚无中产生，我们可以

轻易看出其组成要素。随着流亡者的返回，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重新回到地产所有者的行列，而且其地位往往是首屈一指的；但贵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资产阶级是些过着平民化闲散生活的准贵族，他们毫无困难地加入了这个团体，而且其数量因为新增的资产者而膨胀。对于众多商人、公证人和一些自由职业者来说，大革命把他们从生产性劳动者变成了悠闲的业主；购买国有土地使他们的地位上升比此前一个时期要快得多。在被称为“业主”的社会集团中，旧制度王家官员的流亡数字过大，以致现在成为了一个不太重要的阶层；很多情况下，他们中断了自己的职业而靠固定收入生活。因此他们的位置让给了完全不同的公务员团体。这个新团体直到帝国时代才具有最终的结构和面貌，但大革命已经提供了基本要素。无论是巴黎的官僚还是外省公务员，都与被他们取代的旧制度的公职人员颇为不同，从社会地位上说，前者普遍来说低于后者，其社会和地理流动性也高于后者。不过，大革命的新人当中，有一部分就是进入公务员团体而成功地找到一个社会位置的。新集团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军队，这可能是因为它是唯一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框架内按完全开放的民主形式运作的。由于其大量的招募、快速发展的新局面以及出路的广阔，革命军队为社会突破提供了最为醒目的契机；无疑，那些 20 多岁的将军们——如奥什、马尔索和克莱贝尔等人——将一直活跃到革命结束之后，这些人为帝国军队配备了领导框架。这并非转瞬即逝的现象：军队的中下层军官是自由主义的温床——这样的军队直到 1848 年转折之年还能碰到，但这一年已经预示着 19 世纪末军队的保守主义取向——因而这也是革命的遗产。

548

这些调整和变迁造就了新社会的面目，但我们也能看到它们的局限性：而在法国农村，我们看到的局限性比城市更加明显。城市在革命结束时又恢复了它从前的面貌，生产结构及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明显变化。行会制度的终结和生产自由还只是另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工业革命的潜在因素。“业主”集团的形成更多是一种调整，而非一场革命，它只是英国式“乡绅”的不全面的对应者，地产资本

在新的法国资产阶级当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这比英国更为明显。这里再次出现了两个革命的错位：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新型社会关系的客观基础，而1830年代的工业革命则利用了它创造的潜在性。在这两次革命之间，业主阶层有过一段美好的日子，他们是帝国时代的名流，是复辟王朝的纳税选举人；这种过渡型资产阶级的统治至少无可争辩地维持了半个世纪，外省甚至更长。当然，法国大革命的全部后果远不仅限于造就这样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无论是“侧滑”还是大革命的一个有机构成要素，那段构成革命之核心的充满暴力的经历在法国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裂痕，它甚至导致了名流内部的长期分裂；除了塑造法国社会的新面貌之外，大革命也成为了集体立场选择的指示器，这种情况将长期存在，甚至延续到今天。

从社会到集体态度：法国的统一和对立

在旧制度时代的法国，官方行为的一致性可能掩盖了这个国家社会—地理方面的多样性。这里仅举一例。在这个以天主教为官方信仰的国家，宗教实践的相对一致使得确立一张有关宗教行为和虔诚度的地图十分困难，人们已经怀疑这一工作是否有可能。如果我们从宗教态度转到更不明确的政治态度时，情况更是这样。但另一方面，甚至在陈情书的言辞中，这个旧法国依然到处充斥着地方意识，依然充满各种或真实或虚幻且易蒙蔽人的古老差异。

549

除了一场短暂危机的各种特征之外，大革命还标志着法国人感知方面的一个转折。它以语言和与现代对比的方式揭示了过去的多样性。在这一辩证运动中，经受考验的民族统一是第一阶段；民族统一的揭示分为好几个阶段：从1789年的联盟节运动到1790年7月14日运动的顶点，再到外敌入侵的流血考验、大规模的征兵以及胜利的抵抗——虽然瓦尔密从军事学上说只是一次平庸的战役，但它在历史上是个伟大的日子——这些都是民族统一的象征。法兰西民族的统一在1792年夏天的狂暴氛围中进一步巩固下来。但这种表现当中并不是没有断裂；主要矛盾有三个：流亡者的贵族国际的普世主义；邦联主义，即地方资产阶级反对国家资产阶级；最后是旺代——原始的反叛和民

众的反革命。大革命反对这些离心势力的胜利斗争证明了民族统一的成熟，而且斗争也加强了统一。

但一个新法国的面貌立刻便显露出来，法国选择的多样性完全是现代性的。需要一个证明吗？如果当时的选举磋商只为绘制政治态度地图提供了一些非常不完善的材料的话，一些间接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方法有时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一张共和时期的革命地名比重图看来要比非基督教化的成败图有意义得多，这种比重在各地当然是不一样的。在各地区态度的一致性中，也有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在阿摩里卡丘陵西部，大量居民抗拒新政策，这与东北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情况一致。另一方面，在非基督教化的法国，也就是雅各宾主义深入农村的时候，这场运动是在相对一致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它以巴黎为中心向远方扩展，一直到卢瓦尔河以南的平原大农业区；但它在中央高原周围形成了一条下降曲线，这条曲线从莫尔旺延伸到凯尔西和佩里格尔，囊括了贝里、尼维尔内和利穆赞等地。非基督教化的浪潮在阿基坦再次出现高潮，波及加龙河中游地区，并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脚下；最后，东南部的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虽然情况比较复杂，但雅各宾主义倾向要高于抗拒的倾向。无疑，最引人注目的例外地区（战争中的旺代和洛泽尔）都让人回想起重要革命事件、当地局势和个别举措对共和2年群众态度“曝光”图的影响。不过，如果我们将这样一份材料与20世纪的宗教社会学或选举社会学素材做一点比照的话，我们肯定会对其中表现出来的众多连续性印象深刻。诚然，一些偏爱农村而忽视城市的地图总是强调这些连续性，但我们肯定也应该注意到历史中产生的断裂：1815—1848年东南部处于白色时期，而同期东北部则是左倾的。不过，从这些材料中，人们可以辨别出法国已然成型的各种政治气质。人们已经不能回避大革命在现代法国人的立场选择中的恰当地位的问题：它只是那些已经成熟的立场的简单指示器，还是——更为确切地说——一次产生出各种分裂的集体精神创伤呢？答案不是唯一的。人们也许会想起这样一些地方：大革命只是强化了那里从前的裂痕，历史的伤痕大大延续了集体心态结构；例如，

550 朗格多克和塞文山区就是这种情况，那里交织的社会、政治和信仰冲突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相反，在另一些地方，革命危机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转折，各种长期性的立场观点就从那时候形成；最近关于萨尔特矮林地带保守态度的起源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点，在那个地区，大革命的经历看来是决定性的。

无论是简单指示器还是重大转折，从集体无意识的层次上来看，大革命都是一个重要时刻。也许我们更有理由说，一味强调断裂的重要性是无益的——虽然长期作为法国政治生活中心的一些重大观念（国有土地、封建制、君主制）中回响并凝练着这种断裂。在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从《一桩神秘的案件》到《农民》，都见证了一个人人皆可以从革命时代的标签加以辨认的世界，这个标签曾长期支配着他们的角色。

尝试和憧憬

长期以来，历史学有这样一种传统，即总是喜欢强调大革命的先驱意义，但今天看来，这个说法愈益显得不合适了；由于担心提及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人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置身于革命“进程”的中心，而对随后而来的事物视而不见（或假装不去看）。这种反应可以理解，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正确的。然而，人民革命在其高潮阶段进行了一系列尝试，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新颖性将注入“大西洋”革命的洪流中。革命政府的实践、人民民主的观念、甚至社会民主的观念，所有这些创新虽说并非立刻便有远大前程，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方向上、甚至想像力方面的错误。人们喜欢使用“前瞻”一说，这个词已经是这些创新的称号了。

革命实践：群众和救国委员会政府的自发性

事态的发展，或更确切地说，斗争的急需使得大革命超越了代议制的自由主义，即“和平胜利的自由”体制的框架。1792—1794 年间产生了政治史上的两大基本创造：自发组织的群众运动和革命化的政府体制。这两个事实有时是冲突的。雅各宾派的革命被“冷却”了，但基本观念和实践仍是活生生的。

在革命的整个上升期，人民运动一直在不断组织当中。俱乐部和协会从1792年起特别向普通人民开放；国民卫队是群众动员的有效工具；1792年年初开始成为常设机关的城市社区大会是一个重要的组织机构，其革命军队成为在外省进行宣传的工具。正是在这种灵活的、通常是半官方的、甚至纯属自发的框架之中，成员多样化的无套裤汉们才在革命实践中处于一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这些思想体现在群众口号当中。理论家们的工作有助于这些运动的酝酿和发生。愤激派之前的马拉和随后的埃贝尔派就充当了这个角色；不过除了马拉外，其他人也许更像领袖们的传声筒。

在他们那非常简单的纲领中，首要一条是基于对人民主权某种理解之上的直接民主制的理想。当人民聚集在社区或大会上时，他们便认为有了主权，可以以请愿的方式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也可以采取直接行动，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民意即神意"，这种自下而上表达出来的主权观念，是对代议制体制下的各种机构的一种强烈的不信任，马拉派提出的"委托者监督当选者"的主张就来自于这一首要原则，这个主张要求监督并可撤换当选者。同样，我们在1793年山岳派宪法的导言中看到，法律条文必须以全民公决的方式得到人民的批准，这是该宪法以具体形式来体现雅各宾革命的直接民主理想的方式之一。人民的主动性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果，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发现，这就是发现了革命的作用。这个说法看来有些矛盾：资产阶级是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他们觉得，大革命是唯一的，并且已经完成了。相反，马拉再次表达了一种人民思想，他说，"自由是从叛乱之火中诞生的"。他不是已经在1774年出版的《奴隶制的枷锁》中、在尚未得到经验证实之前就已经提出革命进程理论了吗？只要群众的动力依然存在，革命就会不断重启，总之，就会是"持续"的革命（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开辟了道路。

551

但在当时，这种思想遇到了对手，这就是革命政府结构的成型。1793年建立的革命政府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一种超越，至少是一种否定。当然，它来自于国民公会这个代议机构，理论上受后者监督。

但救国委员会政府远不只是一个执行委员会。如果我们注意到其法令和报告中的普遍问题——如共和2年霜月14日的报告，1793年10月10日圣鞠斯特的报告，以及1793年12月25日罗伯斯庇尔"关于革命政府之原则"的报告——考察这些制度机构的总体特征，那么就会发现，革命政府是一台斗争机器，承担着进行"自由反对其敌人的战争"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它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实际上掌握了全部行政权力；外派代表在其辖区内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在马拉再次作为先驱者的那种政治思想中，革命政府被看作一种为保卫革命而组织起来的集体独裁制：它要求以恐怖的方式行使"强制力"。但救国委员会的独裁不是完全没有根基的，更不乏全体革命者的参与；这就是为什么"美德"对这个体制来说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从技术上讲，为了保障人民革命的持久胜利，这一独裁体制应将作为其支持者的阶层组织起来。但它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人民团体网络和雅各宾分子的支持者本可以召集一个支持山岳派革命的派别。但是，这些团体日益循规蹈矩和"冷却化"，这表明，随着群众热情的上涨，隔阂反而拉大了。

群众热情与革命政府之间的隔阂是导致山岳派革命终结的原因，它符合事物的本质，这并非从某种永恒的宿命上说的，而是说它处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是如此。从人民革命的道路和方式上说，这是两大前瞻性创举的失败。但下一个世纪肯定不会忘记这两个创举。

社会革命的希望

在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看到了重大的社会成果：摧毁了等级制社会，进一步确认了公民平等和财产权，但财产权的范围由于社会的需要而受到了明显的限制，虽说企业自由将成为这个社会中自由成果的主要形式之一。就这些基本信条而言，官方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雾月18日前夕那种著名的说法称："我需要一位国王，因为我是个有产者"，它揭示了新的资产阶级名流在确立某种社会体制——对他们而言这甚至比政治成就还要重要——时所需的代价，但看来没有给全面社会动荡的希望留下太多的想望。

552

但是，这不是说人民革命没有以壮阔的社会运动的形式深入到底层。在农村，大恐慌、也许更重要的是1792年之前一系列的农民暴动最终摧毁了封建制度，但这场运动并没有挑战新的财产制度，而半数情况下，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国有土地而成为从前地主的继承人。同样，在城市，大革命期间的社会运动也有鲜明的限度。有人已经指出，当时的社会骚乱更多是雇佣劳动者和作为“消费者”的工匠反对过高的面包价格的斗争，而不是工人为增加工资而采取的联合行动。在百姓的预算中，工资几乎总是个常量，但食品价格有可能剧烈波动，这种情况可以解释消费者的上述做法。现代类型的劳资冲突在当时巴黎出现的城市革命中还是陌生的，那里的革命只是以洗劫带有制造商雷维荣名字的纸张工场为发端的。在各种非常直接的文献中，如圣热纳维埃芙教堂的泥瓦工给他们的朋友马拉的请愿书中，我们能找到十分真切的回声。同样，在一个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现代类型的阶级斗争条件尚未成熟。马迪厄曾研究过弗朗什－孔泰的铁匠师傅卢沃，在国民公会选举的时候，这位雅各宾派工场主曾带着他的工人们和着单簧管投票，人们不难发现很多类似的情况。我们还可以提到蒙米拉伊（蒙米雷尔）的玻璃匠杜瓦尔兄弟，他们骑马带着工人到各地市场上征收粮食。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不会对那种不成熟、相对贫乏的自发要求感到太惊奇：核定粮食价格是这一要求的首要内容；这也是1792年愤激派要求的主题之一，这个派别曾是群众理想最好的表达者。随着1794年之前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对于富人的攻击性也逐渐发展，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富人都被认为是自私的。从其理论表达上说，这种攻击性很少超越巴黎无套裤汉的平等主义，而对于这种平等主义来说，普通小独立生产者模式的推广与人类理想是一致的。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对已经很超前的雅各宾立法的局限性、对最伟大的革命者在理论上的踌躇感到奇怪的话，那就大可不必了。共和2年的风月法令是山岳派资产阶级社会政策的顶点，它规定没收嫌疑犯的土地，因而是法国大革命所推出的最大规模的财产剥夺计划；按

它确定的分配原则，土地将分成小块分给最贫困的农民，为此应制订民族福利大典，但这些做法顶多只是对农村地产的一次有限而次要的重新分割，只是把巴黎无套裤汉平等独立的生产者的理想移植到农村。这种“农业法”的观念注定要给这一时期形成的整个保守传统涂上“财产均分”的印记，但这并不是任何一位重要山岳派领袖的想法——从圣鞠斯特，虽然他的观点十分明确（分割经营权而非所有权），到马拉，虽说他如此接近“下层人民”，但他在著作中只提到过一次这类想法。

不过，正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平等派密谋的背景下，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社会革命理想被首次表达出来。作为启蒙时代的 18 世纪曾出现过空想共产主义，从摩莱里到马布利再到唯物主义者德尚修士。553 大革命刚开始时，西尔万·马雷夏尔和其他人的著作使得这一思潮得以进入革命思想中。今天人们正认真研究从朗日到多里维埃（莫尚的那位集体主义的本堂神甫）的著作，它们看来是所谓的愤激派社会思想——但这个说法过于简化——的最充分的表达。面对启蒙时代的乌托邦和思想方面通常十分贫乏的群众运动的实践，是巴贝夫和平等派展现出了新的学说，并准备以革命的方式实现这一学说。通过这种“分配的共产主义”（G. 勒费弗尔），这位从前的封建法学家超越了农业法中的平均社会主义，转而宣扬以财产和劳动共同体为基础的土地劳动的集体化组织形式。“享受的平等”是达到这种共同幸福的手段。人们不再禁锢在那种被时代的历史性奴役所束缚的体制中的局限性中了。相反，在提出新理论的同时，1795—1796 年的平等派密谋从其方式上说是第一次革命密谋，19 世纪还会看到这类密谋。在较为广泛的支持者的组织基础上，组建一个可期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密谋核心：这种战斗的少数派的观念从邦纳罗蒂传到布朗基，并一直影响到当代的革命理论家。除了对巴贝夫、对格勒内尔兵营的起事者和旺多姆审判中的被告给予同情外，历史也从他们那里收获了一笔重要遗产。

曲折的未来之路

在流亡者当中，在反革命思想意识中，出现了另一些情感和观念

上的变化，把这些变化纳入大革命本身造成的辩证运动看来并无不妥。在那些既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没有忘记任何东西的人以及巴吕埃尔神甫①这样的人士当中，人们以“共济会密谋”之类的说法编造出一些令人安心的神话，也有一些流亡者，他们受到从柏克到约瑟夫·德·迈斯特的欧洲集体反思的影响，从有关大革命的研究中提炼出一些因素，用以指责启蒙哲学，这种指责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论战的范畴。针对1791年宪法的普世特征，博纳尔（《政治和宗教权力论》，1796年）提出了现实社会中个人主义的多样性、长期存在的社会集团的影响力、以及历史的重要影响。夏多布里昂在他的《论革命》中提出了一个真正的研究集体社会事实的方法论纲要，这也是时代使然。因此反革命的思想成果具有矛盾性。今天，这种思想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了顽固不化的谴责性理论（如博纳尔），不过，当历史学和由这一思想开辟出的社会学在19世纪迷恋上反革命思想时，它竟令人困惑地推动了历史哲学的新路径的探索。

浪漫主义情感与法国大革命关系甚大，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冒被指责为滥用名词的风险，把大革命对浪漫主义的影响也归入走弯了的未来之路的行列呢？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浪漫主义成为全欧现象，实际上要早于大革命的冲击。而且我们知道，欧洲大部分浪漫主义式的回避，实际上长期是反革命的：法国前浪漫主义与夏多布里昂时代根本不同吗？但是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大革命包含的解放价值与崭露头角的浪漫主义价值之间的重大碰撞，这在受革命冲击之后的欧洲比仍处于新古典主义时代的法国更为明显：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就以宏大的气魄反映了这种碰撞。但在这个领域，欧洲浪漫主义重新发现并完全接受法国大革命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但是，对于这场大震荡影响19世纪、乃至我们现在的直接或间接方式的探索，将不会停止。

---

① 巴吕埃尔（Augustin de Barruel，1741—1820），法国教士，大革命期间曾流亡英国，著有《大革命期间的教会史》和《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等著作，主张大革命起源于“共济会阴谋”。

554

第二十章　帝　国

1799—1815 年

十五年中，拿破仑从大革命的遗产中提取了现代法国坚实的骨架。

一、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政治及思想外貌

英雄及其时代

意大利军团的将领，督政们那脆弱的共和国不择手段的征服者，恢复加冕仪式和宫廷排场的皇帝，奥斯特里茨的胜利者，俄罗斯冬天里的失败者：拿破仑·波拿巴以他的魅力迷住了他的同代人，而且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以自己胜利的脚步、乃至自己的厄运不断构建神话时，他也就正如他希望的那样，带着荣光进入了后代人的记忆中。无论是无名小册子作者们拙劣的文笔，还是 1814 年写下《论波拿巴和波旁家族》的夏多布里昂的天才手笔——但不合时宜——都不能压倒圣赫勒拿岛的那些文字，都不能克服一个半世纪以来拿破仑史学及集体记忆中发展出的那些引人入胜的动人形象。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特别的个体、关注那些使他可以产生如此持久之魅力的客观原因，但这并不是要抹煞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也不是被历史中伟大人物的领导作用迷惑。

拿破仑·波拿巴并不漂亮，小个子，生硬粗暴，体态臃肿，衰老得厉害，面容也不精致。但是，他的表情、轮廓、目光却让艺术家们激动不已；雅克·路易·大卫，这位拿破仑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从前的革命者中最坚定的波拿巴主义者，曾赞赏过这个好像来自古代像章上的人物。这个人并不讨人喜欢，没有什么朋友，没有多少亲近的人，成年累月地、越来越孤单地生活在成群的公务员、军官和廷臣中间；跟他很难打交道，对谈话者他很少放在眼里，对所有为他服务的人他都很严厉，而且他还有可怕的心理洞察力——所有这些都让他的伙伴发抖，或更确切地说，感到无所适从。但拿破仑·波拿巴也以其众多不同寻常的品质而受人钦佩，这些品质之所以不同寻常，或是因为它特别突出，或是因为各种品质结合到了一起。首先是智力上的品质：这不是渊博的文化知识或考究的个人品味中产生的品质，而是解决最繁杂的难题所需的一大堆基本能力。出色的记忆力、高度的领悟力、对力量对比关系的卓越的分析能力——它们体现在军事、政治和思想问题上——再加上从大量信息中提取供个人决断之用的基本要素的特殊能力，这一切使得拿破仑远远超出了他那些最勤奋的合作者，使他像某种政治思想唯一的传送中心那样运转，仿佛他是政府推动力的唯一源泉。办公厅是他所有寓所中最重要的房间，他的效率因他的工作强度、因他迅速而准确执行其命令的意志而增大10倍，他努力亲赴战场或亲自出巡，当不能亲临现场时，他也要设法了解事态进展。这一切特别清晰地体现在高层行政和军事领导部门，下层人民当然不会有同等层次的感受，他们主要是感觉到这个人的威力。1840年他的遗骨运回法国时，拉马丁曾说道：“我不能拜倒在这种记忆之下；我不信仰拿破仑的宗教，有人企图用这种对武力的崇拜取代严肃的自由信仰在民族精神中的地位。”他在军事和外交上的成功，他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结束了革命时代接二连三的政治动荡，赢得了对国家的裁决权，凡此种种，无疑把最后一位波旁君主可能从臣民那里得到的威望——如果他能够把崇高的国际声望与实施内部改革的能力结合起来的话——转移到了“革命的国王”拿破仑身上。拿破仑既迎合了这个民

555

族的虚荣心，也满足了弥漫在资产阶级和群众当中的对秩序的渴求。

如果人们保持一段距离，重新评价这个人物的魅力，也许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种是带有传奇般野心的征服者的个人命运的魅力，这个战争人物一步步将自己神秘而矛盾的个人冒险与国家对外政策之必须结合在一起。但在这段浪漫主义的英雄历史中，人们可能更偏爱他作为一个理性化的政治人物的魅力，并更愿意强调其统治的成功之处：他的政治和社会成就正巧符合当时的需要；更确切地说，人们更偏爱拿破仑的天才。

法国等待着拿破仑

在雾月 18 日的拿破仑眼里，这么多年的革命无非是平等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极端行为，眼下的督政府无力巩固温和的共和国，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仍急于找到实现和平及国内稳定的道路。如何维持公民平等以及自然状态的不平等、代议制政府、私有财产及其一切所得，使其既不受旧制度的党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都没有解除武装）、亦不受再次萌生的 1793 年精神的威胁呢？与 1789 年相比，1799 年资产阶级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乐观主义立场的深刻转变。1789 年的开明人士处于进攻态势，他们准备与等级社会决裂。从革命之前开始，他们就不信任下层人民破坏秩序的行动，认为这些人无力恰当地提出和表达自己的要求；他们竭力维护国家改革和开明阶级（即唯一掌握政治科学的人们）领导社会的理念；当时他们有这样一种幻想：作为不久的将来的资产阶级的粗糙前身，大众阶层将会协助建立一个由名流领导的国家，名流们将指引这个国家思想和社会方面的进步，并通过教育把大众阶层逐步融入进来：这在法国历史中是一个非常持久的观念，从孔多塞一直到儒勒·费里。但事实上，群众革命的自行发展注定要使革命资产阶级退回到防守态势，并主张一种只有自己的阶级才会有的政治哲学。从 1789 年曾以全民族的名义提出解决方案的第三等级的热情，到 1799 年期待强有力的政权来一劳永逸地制止革命运动的有害结果的雾月党人那恐惧之余的冷酷，其间的变化是何等无情！1789 年的人们现在只是些明智的革命者，但是，由于在

556

与温和君主派寻求妥协时遭到失败，他们在政治行为的选择上受到了削弱和限制。1791—1792 年的瓦莱纳逃亡和废黜国王使得这种妥协归于破灭，它无法在督政府时期重新修复起来。已经不再革命的资产阶级，正等待着那个可以稳定改革成果并冻结革命的人。需要指出这些政治思想的微妙之处并没有超越“理论家”们有限的圈子吗？——今天我们称这些人为“哲学家们”、或斯塔尔夫人和邦雅曼·贡斯当等作家的追随者。资产阶级大众只是希望安享获得的财富和地位。正如拉纳对波拿巴说的：“那些衷心热爱您的人，那些只要您建立起和平就会奉您为神明的人，他们是安定分子，是有产者，是这个国家的群众。”不过，虽说这时不可避免地要诉诸刀剑的力量，但对不知情的人来说仍是一个突变。从其个人见解和政治方向上说，波拿巴肯定可以成为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的独裁者。但他的冒险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手段，资产阶级的听之任之必定使得他们选择的这个“开明专制者”为所欲为。

议会政治的衰落，个人权力的顶点

大革命是政治势力的公开对抗，甚至是暴力形式的对抗。执政府和帝国要否定这种对抗。革命观念已经过时，反革命的思想也很可憎。圣－尼凯斯街谋杀（1800 年 12 月 24 日）过后，雅各宾派和共和派被大量镇压；但卡杜达尔和昂吉安公爵[1]也上了王党分子的烈士名录。要想熄灭政治激情，只有取缔它们的表达工具。因此，议会辩论也不能为人所知。共和 8 年的保民院是共和派思想的藏身之地，但它在 1802 年受到清洗，并于 1807 年被取消。立法团在整个帝国时期都存在，但其影响微弱至极，且极不稳定。真正的议会只存在于名称中，这就是参议院，其带有头衔、享受薪俸的成员只限于对当局的提议作出驯服的答复，而作为重要立法机关的国务会议——前身是从前的国王议政会——则仅仅被削减了司法权限。波拿巴把 50 名最出色的法学、行政和财政技术人员召入国务会议，他

① 一译“当甘公爵”。

可以在那里听到较为自由地发表出来的意见，并主持制订所有重要文件。这样一种体制自然容易使他产生反议会政治、崇尚专家治国的倾向。他大大延拓了代议制度的发展和政治权利的实施。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的内容被逐步掏空，随之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分级选举体制，在该体制中，人们所做的只是从备选的名流中指定哑巴议席上的议员们。言论自由也被严重压制，1800年，巴黎的73份报纸中，60份被取缔，而剩下来的报纸不得刊登“有悖于社会和睦、人民主权和军队荣誉”的文章；不过，有几份报纸（如《导报》、《辩论报》）还是“颇有想法”的读物。

针对各种“派系”，波拿巴则用以其个人为核心的民族团结理念来对抗之，这是自雾月政变以来的一种新合法性，它体现在个人效忠和全民公决时的大量支持票中。这样，波拿巴主义创造了一种个人权力，它把君主制的传统和民主制的幌子融合到了一起。第一执政的统治像个开明君主，他承认大革命造成的既成事实，但又以各种共和主义的形式作为装扮。但这也形成了一种十分矛盾的局面。从执政府时期开始，他的权力逐步君主化，宫廷生活恢复起来，后来他又宣布成立世袭帝国并举行加冕仪式，这些当然是他所梦想的绝对权力的具体表现，以致最后他还要批上普世统治者的外衣，并复活了古代仪式——拿破仑自认为是新查理曼。但与此同时，宣布成立帝国并不断加强个人权力，也是巩固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反对欧洲反革命势力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冕仪式不能过多地理解为一个暴发户的闹剧，或一个把拿破仑崇拜与法国诸王联系起来的否定大革命的方式，而应更多地理解为一次特别大胆的政治行动，正是通过这一行动，大革命重新获得了反对其敌人的武器。

557

民族团结：威望还是强制？

民族和解，即便它是化身于波拿巴将军身上，也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第一次全民公决中，虽说反对的意见只是极少数，但冷淡和赞成的态度一样很明显。已经变得迟钝的权威机构应给政治激情提供足够充分的转移渠道。战争就是首要的转移方式，勒内·雷

蒙写道："军事上的英雄主义、荣誉已经成为大革命时代政治斗争的后续方式。二者在性质和目标上虽有不同，但造成的紧张可能是同样强烈的：无论如何，战争使政治激情成了过时的东西。相比之下，议会辩论消停了下去……"

胜利接踵而至，而且必要的时候，拿破仑和他的帮手们会把失败打扮成辉煌的胜利，这些在沙文主义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沙文主义的根基在于新近形成的革命传统之中。战争久而久之难以承受、令人生厌，但在当时它被认为是与强大的法国和 1789 年胜利的思想不可分离的；它至少证明了权力的集中和日益绝对的服从的正当性。

还有另一个转移方式：虚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职务，军队的威望、帝国贵族为拿破仑政权提供了大量职位、薪水、头衔以及晋升的机会。一切都似乎表明，名流们暂时放弃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只要这个强大的政权——也许过于强大了——便于他们安享行政职务、保证他们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斯塔尔夫人曾毫不客气但又不无幽默地指出，"在法国，国家首脑们的巨大力量，就在于人们对于拥有官职的奇妙爱好……法国人特别热衷于一切能使某人区别于他人的东西；没有哪个民族这样不适应平等，法国人之所以宣布平等原则，是为了取得先前优等者的地位；因此他们想改变一下不平等状态……"

有个关于服饰狂热症的笑话："从执达员到执政官"，"当时法国连最卑微的官员都佩戴有小金丝带或银丝带，以区别于一般公民。"

众所周知，拿破仑为了引诱、娱乐、消遣并威慑别人而极尽奢侈。1800 年，第一执政入住杜伊勒里宫，此后两年里，他个人出资 100 多万法郎，以重新装点这座宫殿，特别是聘请巴黎头等的细木工雅各布父子从事这一工作。巴黎之外，波拿巴还按他的意愿布置或重新装修了圣克鲁、枫丹白露、贡比涅等宫殿，并命人对法国境外大城市中的十几个其他宫殿进行装修。也许计划比现实的成就更为宏大，如里昂佩拉什岛上修建帝国宫殿的计划；夏约丘陵上兴建罗马王王宫的计划等。这种炫耀还以很多其他方式体现出来，艺术受到了完全的控制，

558 它现在负有动员民意、歌颂国家首脑的任务。而在建筑方面，拿破仑没有见识到克洛德·尼古拉·勒杜的天才，后者一直活到1806年，也许他愿意把最后的创造力奉献给拿破仑；但拿破仑至少得到了佩尔西埃和封丹两位才子的忠诚服务，为他效劳的还有巴黎的工程指挥者们，他们大大推动了首都的现代化建设。雕刻在卡诺文学院派的鼓舞下变得庄重而富有英雄气概。但是官方的艺术导向政策真正取得成功的是在绘画领域。雅克·路易·大卫在国民公会时期就已经是官方艺术的大师，但他认为法国人“在德行上还不足以成为共和主义者”；1805年他被任命为皇帝的首席画师，当时所有重要画家都出自他的工作室。他出色地满足了这位君主的心愿，后者认为“有理由期待法兰西的天才创造出杰作”。正是在庆祝帝国诞生之际，他接到了四项重要的创作任务，并由此达到了他艺术创作的顶峰，与此同时，他巧妙地避免了其他作者可能陷入的平淡和俗套。他从前的保护者维旺·德农是古埃及艺术最早的倡导者，他在官方也享有崇高声望，1803年，他在给法兰西研究院的一份报告中向拿破仑推荐了这种辉煌的艺术风格：“我们生活在伟大的环境中，应该有宏大的建筑作为纪念。”

1802年德农被任命为博物馆总监后，把拿破仑博物馆——或曰国立卢浮宫博物馆——建为囊括欧洲各流派艺术品的宏大收藏馆，它的展厅吸引着各国的参观者，其榜样作用促进了其他博物馆的建立，如普拉多博物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和伦敦国立陈列馆。维旺·德农的卢浮宫曾因督政府时期在尼德兰、荷兰、特别是意大利的抢劫行为而丰富了其馆藏，1802年11月9日，在雾月政变三周年之际，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当时抢劫来的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和布伦瑞克公爵的收藏进一步扩充了馆藏。

第一帝国的省长们

但是，这种关于文化和政治之关系的权威主义观念在其他方面确实是压抑性的，毫无建树可言。在保民院被清洗过后，接着轮到了法兰西研究院。报刊被监控之后，书籍也受到审查。官方机构窒息了文学创作。安德烈·蒙格隆指出，拿破仑在整个在位期间，“试图把赞

赏引向路易十四时代……他让帝国教育团传播最具古典色彩的文化……他企图把亚里士多德和布瓦洛的法则强加给文学”。

1810 年，法兰西研究院颁发了一项十年一度的奖金——为纪念雾月 18 日而设立——获奖者是已经辞世的拉·阿尔普，而故意忽略了斯塔尔夫人和夏多布里昂。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在给国务会议的“关于文学之进步”的报告中，附带对夏多布里昂的新诗歌挖苦了一番，当然也忘不了歌颂皇帝的武功。在帝国豪华的排场之下，对国家反对者的严格监控是个司空见惯的事实。

毋庸置疑，这个国家正踩着先人的脚步前进。以省长制为代表的新政治—行政体制与旧制度时代的督办制度很是接近，它见证了中央权力行动工具之完善，同样也表明了官方宣传和警察控制的强化。在地方上，省长摆脱了所有权力机构的竞争，直接听命于第一执政和皇帝，完全是拿破仑用来稳定思想、控制人民的工具。吕西安·波拿巴曾对省长们说道：“你们的职责，包括一切有关公共利益、国家繁荣和居民安宁之事务。”还说，“为确保你们各省份之安宁，请把大革命运动残留下来的骚动转移到政治经济学观念上来。”因此，省长首先 559 应是一位创造良好的“公共精神”的工匠，为此他应该监控从前的雅各宾分子、恐怖分子、具有独立思想者、从前的流亡者以及抗拒派教士；预防、必要时镇压可能严重破坏城乡生活安宁的骚乱；此外省长还须负责征收间接税，这在葡萄产区是件棘手的工作；负责征兵，有时还须处理开小差和抗拒兵役的事件；处置饥荒产生的危机，因为饥荒会造成可怕的政治后果，如 1811—1812 年正在筹备远征俄国之时爆发的饥荒，等等。从更为积极的方式上说，省长们还可以造就这种“公共精神”，其办法如：监督和解政策——如教务专约——之良好实施，把热情最高的候选人推举到行政岗位上；组织政治生活中少见的游行活动，引导人民或资产阶级的热情，这类举措如组织选举团，筹备执政或帝国领导人的视察，招募荣誉卫队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文牍主义的借口：拿破仑的省长们都是忙于文件和报告的官员，他们也必须成为这样的人，必须根据巴黎各个机构的指令，汇报经济生活各

个方面的统计数字。对于这些职责，拿破仑·波拿巴几乎总是喜欢选用“大革命的孩子”，大革命“沐浴过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这些称职而温和的人能够让他们的主子满意，后者会带给他们好运的。

永久的印记和不满情绪

在当时的法国，这位首脑不仅继承了绝对君主制的各种传统，也接受了大革命在行政体制上的各种创举和内战时期的教训，国家的公民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境况，他们需要和税吏、秘密警察、可怕的乡村巡警以及别动队打交道，但即便在这样一个国家，仍然有可供潜在的反对派思潮和力量发展的空间，而它们所反对的拿破仑国家的某些方面无非是拼凑起来的东西。这个国家维系的时间既取决于其内部反对力量从无能为力转向积极行动的期限，也在于连续的军事胜利在舆论中造成的对该政权前景的错觉。

令人困惑的是，反对派中最无能为力的是其思想阵营，虽然反对派的思想颇为明晰。执政和皇帝权威的最主要的思想对手是邦雅曼·贡斯当。虽然亨利·吉耶曼对贡斯当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涯颇有微词，但这丝毫无损于以下的事实：在19世纪的头30年中，贡斯当的著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他的那些最出色的篇章为捍卫个人自由作出了贡献，并总是为人引用。但是，在拿破仑时代，贡斯当的见解只为少数被其观点中的矛盾所吸引的资产阶级少数派理解：在很多问题上、在利益之维护上，自由派根本就不是一致的，他们不是对雾月的胜利者寄予很大的希望么？实际上，百日政变之时贡斯当投奔拿破仑，这就说明某种思想上的深刻一致：他把现实主义和原则的坚定性结合到一起，并向人们显示，一旦帝国是自由和宪政的，那么拥护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适的。另外，这种反对派与天主教反对派没有任何联系，后者是在拿破仑与教廷的冲突重启之后脱离拿破仑的；它与不时爆发的民间不满情绪更加没有关系，后者的动机是根本不同的。法国并不存在反拿破仑“阵线”的客观基础。对于皇帝来说，真正的威胁毋宁说是来自冷漠和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与政权的

专制趋向和没完没了的战争密不可分。

二、法国的新社会：断裂和延续

560

人

大革命结束时，法国在人口学上呈现出新的面貌。1789 年大大加剧了旧制度末年的潜在趋势，以致我们可以认为，18 世纪末在法国人口史上是个相当重要的断裂。

诚如马塞尔·莱纳尔所言，当时最重要的现象是结婚率的上升和出生率的下降同时出现。1770—1784 年，1 万居民中有 85 桩婚姻；1806—1810 年为 157 桩；1811—1815 年为 171 桩。而另一方面，旧制度末年，1 万居民中新生儿为 390，但在帝国时代这个数字只有 320。这种矛盾显然表明，控制生育的措施在广泛传播开来，不仅是富裕的资产阶级采取节育措施，城乡普通阶层的很多夫妇同样如此。如果考虑到结婚年龄的下降导致生育期也相应延长的话，出生率的滞后就更加明显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局面都在这里体现出来：民事立法提供的便利，离婚的合法化，关于将临期和四旬斋禁令的取消；教士对于良心的道德控制的松弛；征兵（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 1809 年和 1813 年结婚率的攀升）；农村产业的激增。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人口的缓慢增长，其总额从 1801 年的 2735 万增加到 1821 年的 3046.2 万，即年均增长率 0.5% 左右；而到 19 世纪结束时，人口总数还没有突破 4000 万。

但是，这种增长只有在死亡率下降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这个因素同样重要。旧制度末年的死亡率很不稳定，波动在每 1 万人 320—390 之间，但到拿破仑时代，这个数字下降并稳定在 260—270 之间。无疑，这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没有发生过十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些数字还表明，战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并没有在法国人口发展中造成重大影响，这与 1914—1918 年间的情况不同。15 年的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估计为 100 万左右，但从本质上说，它没有改变因生活水平提高、

特别是食物的改善以及医疗进步——总体上比细节上更容易觉察到——而造成的死亡率下降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地理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法国的人口状况与旧制度末年完全类似。季节性和暂时性的迁徙十分频繁，马赛、里昂和巴黎等城市对很多外省而言是巨大的引力中心。但农村人口的大量外逃还没有开始。人口继续淤积在平原和山区，当时一些人口过剩的农村地区的贫困比城市工人的贫困还要严重——因为工业革命才刚刚启动。1789 年，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20%，但到 1846 年，这个比例才达到 25%；更有甚者，由于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曾有过明显下降，它们在 1800—1815 年只是在恢复当中，尔后才开始重新增长：巴黎的情况是这样，鲁昂、波尔多、里昂等城市同样如此，这些城市的人口一度下降了 20% 左右。在革命和后革命年代，法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心态超前于经济，它的人口整体面貌与这个特征十分契合。

561　*城乡居民*

执政府和帝国最忠实的支持者无疑要到农民大众之中去寻找：这个政权使他们不用为购买国有土地、为封建和领主反动的可能性而担忧。基本来说，农村心满意足，尽管农村社会因为其各阶级分享的大革命成果十分不同而空前分化，尽管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定因素。

农民曾想获得土地，但这远非根据某种平等原则来分割，而是依据各自的能力。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愿望。农民购买的国有土地的比例在各省有所不同，可能在 15%—60% 之间波动。地产所有者的数量大大增加，一些短工也获得了产业，拥有 1—2 公顷土地的业主的地产此后增加为 5—10 公顷，农业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牢固确立了起来。但毫无疑问，农业经营单位的碎化更加严重，小型产业数量激增。19 世纪初葡萄种植单位的扩张就是例证，而且从技术和经济上说，葡萄业比小麦种植业更能忍受这种碎化。在勃艮第，粗劣的红葡萄甚至一直渗透到种植谷物的平原和一些低洼地带；“备受资金匮乏之苦的农民看重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共和 9 年约讷省省长这样写

道。确实，小业主们无法从其地产上挣得全部的生计，不管他的土地是“祖传的”还是“国有的”；不过他总能从家庭手工业中取得一笔补充收入，因为当时法国的工业生产结构仍与17和18世纪十分相似。

农民仍然热烈地、有时还满怀愤怒地期盼着摆脱封建和领主剥削，从什一税、实物地租等捐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部分要求仅仅得到了纯粹口头上的满足。从字面上说，这些捐税已经消失，但对于所有被迫承租土地的分成农和佃农来说，它们并未从经济现实中消失。实际上，革命时代的立法，从制宪会议到国民公会再到督政府时期，都在实际中允许出租者加入一些提高租金的合同条款，把从前的捐税转化成自己的收入。因此，从废除旧捐税中得益的只是土地所有者，而非经营者；而且，由于这种局面与地租的持续上涨——这又与谷物价格的上扬有关——结合到一起，我们可以赞同阿尔贝·索布尔的看法，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以某种经济方式强化了封建制度：第三等级中的富裕成员确实可以认为——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革命是一场特权的转移或扩大的运动。除此之外，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一些流亡者重建了其土地上残存的权利，教士在农村的威望也恢复了，特别是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于是出现了一种反动气氛，一种再封建化的严重威胁，以及领主和教士的精神压迫。在只要求生活在保守体制下的农村，这些成为诱发革命骚动的不安因素，这些因素仅靠拿破仑权威的外表是平息不了的。政权本身引发的另一些不满因素进一步激化了小业主的情绪：税收调查是地方动乱的根源，具体到葡萄种植区则是新开征的饮料税；各地征税官员在征收地产税时作风普遍苛严：若不能按时缴纳税款，通行的做法是以服役或实物的形式支付拖欠款项的利息，或派遣催款税吏住到纳税人家中，这让人想起旧制度那些最恶劣的做法。农村短工深受习惯法限制之苦，后者限制他们到公共 562 或国有矮林中放牛，而垦荒运动又进一步缩小了牧场面积。不过，大革命之后农业工资走高的趋势十分强劲，这在评估农村命运时当然是个积极的因素。蒂伊·迪伊利埃指出，根据法官克拉默西的记载，

1814 年，一个有饮食供应的耕地佣人每年工价为 260—300 法郎，1789 年为 80—100 法郎。而手工业者的工资则上涨了两倍，因此处境相对较为宽裕，这位评论者在“他们令人惊奇的衣着和伙食”中看到了证据，并认为这“超出了他们的身份”。

大革命结束时，城市平民处于弱势状态，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政治和思想角度看，他们都被解除了武装。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和严格的警察监管使得工资劳动者处境恶化，因为这些法律和措施让他们无法为捍卫自己的利益采取联合行动。不过另一方面，拿破仑时代的环境与此前的“无套裤汉”时期相比，还是相当宽松的。大革命引发的名义工资上涨趋势表现在很多部门中，而且上涨幅度足以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工资也上涨了，因而人民的饮食状况有了改善，特别是肉的消费量有了增加。城市没有经历类似于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那样的生存危机和物价腾贵现象；1801 年和 1812 年的紧急状况被中央和省地方当局强有力地遏制住了，为此，他们采用了旧政府的办法，而且为了维持秩序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名流的诞生

在实践中，拿破仑社会政策的新颖性在于确定和组织了一个新型的社会精英。共和 10 年设立的选举团就是这一精英阶层的早期形态。这些常设团体由终身成员组成，分设于乡镇、区和省三个层次上，根据纳税标准从旧贵族和资产阶级中遴选出一个名流精英。省级选举团的成员地位最重要，因为只有他们——当被征询意见时——可以对空缺的参议院、立法团和各委员会席位候选人之选任施加直接影响，但省选举团成员是从本省纳税最多的 600 个公民中挑选出来的。实际上，在拟定 600 位最高纳税人名单时，首先考虑的是地产税，这也是最重要的税收。终身执政决定给法国留一个代议制的幌子，它更多的是具有社会意义，而非政治效力；从这个体制中得益的是一个由有产者组成的新贵族，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从前的贵族和依靠地租生活、以地产为主要产业的资产阶级，另外还有一些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官员——他们之所以获得这种资格，更多是由于他们拥有房产和土地，而不是

因为大量的薪金和利润收入。拿破仑说，“真正的法国人民，是乡镇社长和选举团主席们，是军队”，而不是“两三万粗野渣滓……和大城市中无知而堕落的群氓”。在他看来，财产权原则“是一项并不违反平等的根本原则”。不过，地产财富并非是遴选选举团成员时考虑的唯一因素。很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应出身于“最体面的家族，这或是因为他们从前和现在的地位身份，或是因为在该省广泛的家族亲缘联系，抑或是因为他们的优良品格和公共及私人美德”。因此，拿破仑时代的名流是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国家也希望利用他们的人际关系网。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名流这个提法有个方便之处，它把从前特权阶层中的幸存者和前平民中最显赫的成员集结在“名门家族”的旗帜下。 563

贵族制的恢复

但拿破仑很快就走得过远。他坚持应确立一个社会和政治精英阶层，但其标准既非封建贵族的（“不以血缘高贵为基础，那是假想的高贵，因为只存在一个人类”），亦非以财富为标准，“不能把财富变成头衔”：“我觉得这是所有贵族制中最糟糕的一种”，皇帝后来在圣赫勒拿岛说，他一直认为，或假装认为，所有形式的财富，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从其源头上说都与盗窃和抢劫有关。拿破仑深知应适时利用前流亡者，正如应利用自己在国有土地购买者中的声望一样，因而他希望在当时的法国建立一种既不完全符合前一类人、也不完全符合后一类人利益的等级制度。他的计划是一个开明君主的计划；他的步骤让人想起了约瑟夫主义，即把国家提升为超越等级和阶级的仲裁力量。在拿破仑看来，国家和社会都需要贵族制；从大革命中诞生的社会将在其中找到它的支撑点以及个人野心的调控器；国家将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威望和高级服务者，并把贵族制作为向民族传达国家权威的中介：“我需要行动、工作、前进，所以我需要眼睛、臂膀和双足。”另一方面，这个贵族阶层还应调和旧法国和新法国。革命者也应在贵族中占有一席之地：拿破仑在帝国即将告终时曾对伯尼奥说：贵族应让革命者“接受洗练”，这样他们“会产生一种不可复制的活

力”。但是，这位缔造者的天才在于“知道如何利用手中的材料”，旧的贵族世家也要吸纳进来，因为它们“现成的财富”和影响力应该为政府效劳，而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应付所有人”。换言之，帝国贵族的基础有两个：个人成就和为国家提供的服务。“我们的时代是注重成就的时代，应该让农民的儿子通过自己的才能和贡献上升到顶层……我在哪里看到他的才能和勇敢，我就在哪里提升他、给他安排位置。我的原则是给有才能者敞开前途。”因此便产生了一个“历史的”和“国民的”贵族，后者以“出色的成就”取代了羊皮卷证明，“以祖国利益取代了个人利益”。

因此，在拿破仑看来，新型贵族制的创建就像帝国世袭制的确立一样，并不是对大革命的反动或背叛，相反，它是在巩固新制度。“国民贵族的设立并不违反平等”；它“完全是自由的”，“既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也有助于消除贵族虚妄的高傲”。它还是最终使共和制在法国土地上立足的“花岗石”之一。就在宣告原则时的坚定和执行原则时的不择手段之间——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拿破仑在法国人的气质中找到了论证其新头衔等级制的理由：“必须存在荣誉上的差别”，“这是牵引人们的小玩具”。

564

荣勋团

1802 年，波拿巴看来回到了君主制的传统中：他在军事和民事领域创建了一种制度，其具体内容是设立一个拥有自己的装饰、制服、级别、特别津贴并须经过忠诚宣誓的荣勋团。波拿巴认为，这个制度意味着所有为国家增添光彩的人都享有“荣誉上的平等”。宣誓中的话语也许能证实这个制度的共和特征：荣勋团成员宣誓“为共和国、为保卫其领土之完整、为捍卫政府、法律和法律认可之财产权而鞠躬尽瘁；反对……任何复辟封建制度、恢复具有封建特征的头衔和身份的企图；最后，竭尽全力维护自由和平等”。

但实际上，荣勋团在其发展过程中明显改变了它的特征：如宣誓是针对皇帝本人及其家族的，来自军队的成员占了 96%，这些都使得它更像旧制度时代的军事团体了，如圣路易团，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

这个以个人忠诚组织起来的机构的政治意义。

帝国宫廷和贵族

从1804年到1808年，也就是从宣布成立帝国到发布组建帝国贵族的敕令之间，拿破仑社会政策的规模日益庞大，荣勋团也属于一个等级森严的体制的一部分。顶端是波拿巴家族。在它周围，是“一个与皇位的尊严及民族光荣相称的帝国宫廷”，1804年5月18日的元老院组织法令这样说；从法令的措词来看，拿破仑希望它带头实现精英阶层的融合，从而为法国社会定下基调，但这个职责履行得很糟糕。最高一级的军官是18位元帅：他们的晋升既意味着皇帝对于战场上荣膺的封号的奖赏，也说明他很看重军队作为提升社会地位之工具的价值。当他于1807年为第一批贵族授衔时，他把勒费弗尔元帅封为但泽公爵：他还特意提到，“这位元帅以前只是普通一兵，所有巴黎人都认识这个法兰西卫队中的士官”。进入荣勋团最简单的方式是获得骑士头衔，这是其中最低的级别。不过，文官也同样可以获得荣誉，8年之内共有约1500人获得各种头衔（骑士除外）：塔列朗当上了贝内封亲王，贝尔蒂埃称纳沙泰尔亲王；在众多元帅—公爵当中，有奥特朗特公爵富歇、加埃塔公爵高丹；在伯爵和男爵当中有省长、市长、国务参事、高级文官，此外还有将军。

正是在组建帝国贵族的层面上，拿破仑的社会立法表现出最模棱两可之处。实际上，皇帝十分在意让“他的”贵族在外表上堪与旧贵族相颉颃、并最终实现各种因素的混合，但这样一来，他不容置疑地违反了公民平等的原则，并将某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再次引入法国。这尤其体现在如下事实中：贵族头衔的世袭性，带有可由长子代理和转让的世袭封地，以年金的形式分发的俸禄，根据政府决定或应个人要求而设立的长子世袭财产，换言之，设立一种保障贵族头衔所有者拥有足以荣耀其头衔的不可转让的家族产业；等等。但必须指出的是，颁发得最多的头衔，即男爵，并不是世袭的；而骑士的头衔只须证明年收入为3000法郎即可获得；封地和俸禄通常是在附庸国，即外国的土地上设立的。这个制度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及猝然中断的工作中带

有的不完善性。

565　拿破仑时代法国的社会价值观

另外，拿破仑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创举，其重要性要小于他关于社会整体性组织的构想，这种构想的痕迹在今天的法国依然清晰可见。

看看民法典，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资产阶级和拿破仑的共同意志是在财产和权威的基础上稳定革命后的社会。在财产方面，关于它的定义、它的转移、它的各种契约和债务问题，都有详尽的法律规定。商法典进一步完善了对财产权的保护。对于不动产有地籍作保障，乔治·勒费弗尔认为这种地籍是第一帝国最值得称道的创举之一。成为有产者首先就是成为地产所有者。饶勒斯曾在工业和流动资产的发展中寻找大革命的起因，他的做法当然有些简单和夸张，但与此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大革命最终的成功得益于如下事实：它"深深植根于地产、即它自己对手的传统势力之中"。财产，土地，这就是一个由名流们支配的社会的关键词——这些人的相当一部分力量来源于1789年开始的财产、同时也是声望的转让。

权威首先在家庭内部得到巩固：父权和夫权得到确认。因此特别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点是，就妇女地位来说，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与莫里哀时代或18世纪的女性化时代相比是一种怎样的倒退。"我们西方民族因为过于宠爱妇女而败坏了自己……她们不应该被视为与男子平等的人，实质上，她们无非是生孩子的机器……她们最好做些针线活儿，而不要来饶舌"，等等。为埃库昂学校起草的教育计划把女孩视为智力上的弱者；她们能学点什么呢？首先是"最为严格的宗教"，然后是初等教育的内容，但是特别重要的是，她们"一天3/4的时间都要从事体力劳动"。确切地说，波拿巴主要把宗教看作权威原则最好的助手，看作"凝聚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缺少宗教、信仰和教士"：但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也得掌握在政府手中，以便"作为取缔无政府图谋的社会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教务专约在它的缔造者眼里是一个重要政治文件的原因所在。

不过，与旧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的是，教会现在只被敦请来确定

信仰，以及用对永恒正义的期望来为尘世的不公正寻找依据。对于思想问题，教会不应插手，现在它们转归国家控制。因此教育也成了权威当局的事务。拿破仑对于“任何人都可以像开个被单店一样开办教育机构的时代”十分不满，后来他把公共教育事务完全委托给法国教师团（设立于1806年），这个中间机构同样也负责“引导政治观和道德观……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道德及政治见解不应依赖于特定时刻的状况和信息。一切都应该统一化，一代人应该完全在同一模子中铸就……如果没有一个原则坚定的教育团体，也就没有稳定的国家政治。如果不从小就教育孩子们应成为共和主义者还是君主主义者、天主教徒还是不信教者，国家就根本无法培养一个民族；国家的根基将不牢固……长期受到混乱和动荡的威胁。”

但事实上，地方行政当局并没有组织初等教育，深合名流们心愿的是，这一事务很大程度上仍由修士们掌握，后来这些人加入了教师团。在中等教育方面，这些原则得以具体实施，如设立了由获得教师资格者主持的高中。那里接收“宽裕阶级”的孩子，他们在严格的寄宿管制下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 566

三、战时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状况

规训和稳定社会是为完成重大军事和民事计划而进行的能量动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是，要避免以前各政权——王朝政权和革命政权——因缺乏充足的财力而导致的悲惨命运。“财政一直是我考虑的问题。一个大帝国的财政应该为应对特殊局面提供财力，即便国家身处最激烈的战争之中。”财政措施围绕三个主题展开：创设新的税收体制；为国库而建立除借款和私人信贷之外的新的便利条件；为战争提供资金。

拿破仑的税收体制

“要统治一个大国，需要很多法官、很多警察、很多士兵……很多钱。单靠土地税你们就可以征收到国家开支所需的全部收入吗？不

能，这是你们那些经济学家的痴心妄想。为了降低税收总额，应该以各种形式重设之。”拿破仑的这段话是1804年说的，就是设立新间接税的那一年，该税的征收对象是烟草、纸牌、金银器具的商标牌、特别是酒类（如在制造酒精饮料的农民家中征收的盘点税，税吏在作物收割六周后巡查农民的酒窖）。拿破仑的税制虽然降低了土地税，但对当时人来说，它建立的间接税体制让人想起了过去的酒税和总包税所，当时的记忆依旧清晰，在革命前的危机中，它们曾是群众要求中特别关心的对象，1810年重建烟草局的法令称：“朕曾以为，在正常时期，应有为数甚多但对朕的人民负担甚轻的税收，因为这样一来税率会很低，而在特殊时期，税率些微的上升便可提供国库的所有需要。”这就是1806年设立盐税、提高酒类税收和酒类转运费后的情况，1813年又再次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对督政府的税收体制进行了完善和系统化，新的管理结构建立了起来，税收收入、征收速度和其集中化大为提高，当代法国的财政仍然依靠这个管理结构：税务监察员负责制订税册；征收员负责催缴，财政官接管税款。所有这些人都须交纳保证金。

“国库捐”

与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相比，财政管理领域的进展更加令人震惊：其中的抵制和迟缓也特别明显。甚至波拿巴本人也得面临——更何况他在雾月政变之后接管的国库实际上已经空了——预期收入跟不上财政亟需这一由来已久的难题。不过在这个问题上，私人银行的介入方式与过去不太一样，它的意愿是良好的，政府一般也接受其利息率。567 一开始，第一执政不得不求助于资本家大财团，如“联合商团”，“公共财政银行家协会”，当时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全都集中于这些财团中。但他所有的努力都集中于为国家提供短期预支的金融领域，其中的新举措名为“国库捐”，由此筹来的收入转移到各公共机构，后者终于以不太光彩、十分麻烦的方式结束了对放贷者的依赖，正是由于这种依赖，拿破仑曾不得不在逮捕并以贪污罪起诉乌弗拉尔之后，又将这个人释放、恢复其名誉，以便利用之。各省的财务总长首先要签发与

待征税款数额相符、政府可以贴现的付款通知。在法兰西银行之前设立的公债偿还基金负责在财务总长没有必要的财力偿付这些票据时以硬通货来兑现之；不过，这个机构的资金也是财务总长们以硬通货保障金形式提供的。此外，公债偿还基金从1806年起开始发行债券，国家可以利用它来筹集资金，就像付款通知一样，债券的偿还以国家向基金注入的出售国有土地的收入为担保（1801年，国有土地的价值仍有4亿左右，此后它不再出售给个人）；与这个措施相配套的是1813年村社共有产业的国有化，这些财产由公债偿还基金负责出售，由此带来的收入作为1.8亿公债的担保。还是在1806年，预先使用待征税款的做法得到了完善，这得益于国库捐基金的设立，1815年该机构发展成我们现在的基金调拨局。财务总长们须按期向该基金支付发往巴黎市场的汇票，以保证他们所有短期及长期债务的支付。有了这个保障后，国库捐基金可以发行债券，这种债券非常接近于现代的国库券。

然而，如果拿破仑的税制仅仅依靠国内资源的话，预算平衡可能很早就被打破了——后来确实失衡了，尤其是1811年之后。实际上，虽说由于间接税、关税和盐税的增长，常规收入从共和13年的6.84亿增长到1813年的9.87亿，但支出却从1801年的5.5亿上升为1813年的12.64亿：这就是这位法国首脑两项主要荣誉来源的代价，一是他的军事胜利，二是他那些宏伟的公共建筑和纪念性工程。尤其是军费，占了整个收入的近3/4。当然帝国境外征收的捐税提供了支持，但我们不知道准确的数字：这些被称为“特别收益”的收入同样由公债偿还基金管理。这样，拿破仑财政体制的两个基本特点便显露出来。拿破仑没有求助于借贷这个“既不道德且具灾难性”的做法，它是“对后代人的预支”；同样，他也不过多求助于名义通货的膨胀，而且他严格禁止法兰西银行这样做。法兰西银行从来没有为国库提供过支持，除了为国家债券贴现——就是说，为国家提供获取“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取得廉价收入的便利”，其方式是发行比最好的银行纸币都要可靠的债券。因此就波拿巴的财政政策来说，我们没有必要研究这个机构的作用，尽管它有一些吸引人的表象。因此，拿破仑看来是我

们所称的严格的财政正统派的代表，而且坚持流通中采用纯金属货币。只有战争在境外进行、他对欧洲的控制行之有效时，他的财政体制才能维持。另一方面，为了使贮存的金属货币不对整体经济活动产生过多的损害、并使得流通中有充足的货币满足征税和商业需要，这一体制还要求国内信心的稳定，但实际情况远非总是如此。

568

拿破仑一世的经济思想

拿破仑·波拿巴是紧缩型公共财政的信徒，他的经济思想没有质疑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坚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在他的心目中，各种经济活动是“逐级分层”的，其中农业享有崇高地位，它是“帝国的灵魂和首要的基础”，但这种看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理由，而非对重农主义的某种偏爱。拿破仑特别认为，土地收益是衡量利息率的尺度。他十分关心粮食价格，认为适中的粮价是确保公共秩序的一项基本法则。

拿破仑从来没有想到恢复行会师傅、行会管事会和商业特许公司。但正是在工商业领域，他觉得最有必要限制自由主义原则的实施，这种限制既符合政治、战略和公共道德的需要，也与经济利益本身相符。因此，工业发展便首先被认为是同英国的优势地位作斗争的一个方面，也是受传统金属货币政策影响的关税政策的一部分。“要想繁荣本国制造业，应该以禁止性关税法来保护之：需要很多法律，需要更多的条规，这就是统治的手段。”不过，这种主张虽然类似于旧君主制国家的经济管理实践，但拿破仑的另一些做法也许就是后来国家扮演的推动者、而不是单纯的经济生活中的宪兵角色，如加强基本装备建设，刺激信贷，为生产者和商人提供优良的劳动和交换工具。这里仅举数例：有效地推行大革命创设的度量衡体制，尤其是稳定了货币体系和铸币流通秩序；采取各种方式鼓励技术革新；发展水路交通网络；设立法兰西银行，该银行以低廉的价格为商业和私人银行提供贴现，拿破仑曾对这家银行寄予厚望，但其有效业务范围并没有超出首都。

夏普塔尔可以指责皇帝从来“没有考虑过商业交往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如果这种评判意思是说，拿破仑优先注重的是生产，他对经

济活动的认识更多是一种大陆性和国家性概念的话，那么这种严厉的说法无疑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从气质和政策上说，他从来没有想到，法国应像它的那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一样，通过恢复和发展世界性海上贸易网络来致富，说到底，他对这个贸易网的全部运作机制并不是很了解，对于英国消除大陆封锁的某些后果的能力，他在判断上也犯下了错误，其中的原因也是如此；而且，与此相关的思辨问题看来让他头疼。与英国人正在形成中的帝国观点相比，拿破仑的帝国观念更加接近于加洛林或罗马的观念，他认为法国人口众多、仍然很强大，它应位居欧洲影响范围的中心，而在这个范围之内，经济中的等级必须与王冠的级别体系相吻合。但这要求法国经济有一定的可塑性，以及当时并不具有的活力。

569

农业中的缓慢变革

大革命后的法国像革命之前的法国一样，仍然是个农业大国，但新近的社会和财产变化有利于维持极端缓慢的技术和经济变革局面。

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写道："在所有经济活动的秘密中，农业经营的秘密是最难以琢磨的。"而且，我们还不能将拿破仑时代法国农业的生产和收益数字化，这种不确定性的部分原因也许在于没有充分利用这方面丰富的统计资料。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从总体走势和定性印象方面来看，农业产量提高了（这是上个世纪增长趋势的延续），但这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实现了"农业革命"（其基本含义是通过现代化的轮作而迅速提高单位面积的谷物产量）。

谷物产量有所提高，但其成果很快就被两个因素抵消：一是持续的人口增长，这对消费构成了压力；二是播种土地的增长，即耕地面积的增加。另外，小产业数量的激增更加强化了上述趋势。这类现象发生于粗放型农业的背景之下，而粗放型农业的产出不仅是停滞的，而且会走向衰退。我们还是请出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一位大地主、农业经营者兼制造商、开明的农学家，听听他是怎么谈论他在博韦西的一块小产业的吧："自大革命以来，垦荒仿佛受到了某种发狂般的推动……人们砍伐、拔去国家出售的土地上的树木……如果农

民明智的话，他们会认为有的土地是不适宜于耕种的，但这些土地都被翻耕出来，而付出的艰辛很少能得到回报，因为没有任何实际的收益……每个人都想成为业主，大部分人为了追求独立和幸福，不惜放弃在农场主那里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而跑来忍受贫困。”

然而，“农业革命”并没有启动。当然，政治和社会革命明确地肯定了财产自由，至少在法律上确立了农业经营的权利，从而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农产品价格的持续走高、生气蓬勃的农学普及运动可能构成了另一些有利因素。但农业发展意味着投入和风险，以及相关的决心和条件，因为需要种子、农具和牲畜。因此，导致农业停滞的因素中必然有心态的保守和资本的匮乏。所有层次上都存在这些问题：富裕的地产主唯一关心的是从土地上取得最高的租金，办法就是频繁更新租约，以便及时提高租金，防止自己的地产收入固定化，因此他们禁止“变更轮作次序”。佃户通常以承租方式取得土地，但他们自己没有充足的资金；让他们苦恼的是，租金的上涨幅度要高于谷物价格的上涨。小业主们努力巩固他们的家产，但这点家业总是受到平分继承这一“土地分割器”的威胁。因此，蒙昧、贫困和食利者心态都阻碍了革新的进程。

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挡个别地方的发展。一般来说，农村零星的技术进步总得有个辐射中心，即一个明智而开放的业主—经营者，他或多或少起到了榜样作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先进人物是从前的贵族，无论是流亡还是非流亡贵族，其很多成员现在都致力于经营地产。休耕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不过，要让所有农民都放弃休耕，还得等到1817年前后形势出现逆转、农业收益受到严重威胁时。这场难以觉察的变革的后果很严重。农业生产缺乏弹性，有过于严重的家庭自我消费导向，它既不能为农村居民提供充足食品、充分保障其生活，亦不能避免因收成不稳定而导致的饥荒。对于其他经济部门来说，农村人口吸收制造品的潜力太狭小了。1789年的革命结束之后，法国农村带上的一些最落后的特征在19世纪中叶依旧能看到。

570

工业化的困境

乍看起来，拿破仑时代法国工业的作为要“有生气”得多。在督政府稳定通货后的几年中，创办了数量可观的工业企业：难道不可以把 1800 年前后称为法国“工业革命”的第一幕吗？

毋庸置疑，就法国的纺织工业来说，情况确实如此，这尤其体现在棉纺业中——至少在印花和纺纱层次上——更确切地说，体现在工业革命启动阶段的典型产业中。1790 年左右，法国约有 100 家企业拥有印花棉布制造或印染车间，到帝国末期，车间数目增加了 3 倍；在当时，与亚麻布比起来，中产阶级消费者更偏爱棉织品，同时他们还逐步用这种相对廉价的“印度印花棉布”取代传统贵族化的、带装饰的丝绸制品，在这种消费趋向的推动下，茹伊的奥博康夫工厂把图案和色泽的印染技术推向了高峰，铜滚筒的应用也是一种尖端技术，它是由奥博康夫从英国引进并使其在法国生根的。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后序加工业应以“上游”产业来支撑，后者在活力上甚至要更胜一筹：这就是纺纱业，它在 1780 年代的法国还是个新鲜事物，但 1814 年时已牢牢扎下根来。从执政府时期开始，巴黎的纱厂迅速增加，因为这里是消费中心和熟练劳动力市场；从共和 7 年到 1805 年年底，新设立的纱厂有 30 来家。不过在法国的其他地区，飞速发展的局面来得较晚，因为 1802—1803 年前后，英国纱的输入造成了激烈的竞争，因为它的价格持续下降，而且产品质地之精细无法超越。1806 年，法国禁止棉纱进口，接着又禁止从英国及其殖民地（印度）进口织物（尚在大陆封锁令正式发布之前）从此一些省份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工业化，特别是在下塞纳省、北方省、上莱茵省（这里说的只是 1792 年法国疆界内的情况，不包括被兼并的省区，但有些被兼并的省区，如比利时各省，其工业化的势头甚至更为猛烈）。巴黎的印花棉布工和制造商也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同时他们希望巴黎盆地各省能够从事来料加工，纺纱织布，以保障他们的原料供应，或从首都之外更为低廉的工资水平中获益；奥博康夫、里夏尔－勒努瓦以及其他很不知名的人就是从事这类业务的。后来，奥博康夫决定组建一个联合企业：1806—1810 年，他斥资 150 万法郎，在埃索纳建设

并装备了一个纺纱厂和一个织布厂，那里面的车间颇有一番自动化的风貌。在里尔—鲁贝—图尔宽工业区，纺锭数量从1806年的3.2万枚增长到1810年的17.7万枚。一些更现代的设备投入了使用，或者是从海峡对岸进口来的，或者是随便仿造出来的。1813年，在圣-康坦，人们实现了180度纺纱，而织出的平纹布此后便开始取代印染的印度普通棉布。到帝国末期，法国拥有欧洲大陆2/3机械纺纱生产能力，但1814—1815年的条约使它丧失了一部分，而且这整个2/3也只占英国生产能力的1/5。

571

这就是说，法国的工业化图景是有阴暗面的。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技术质量上看，法国与英国的差距都非常大。大陆封锁政策为现代纺织工业的建立提供了方便，拿破仑以经济战迫使英国屈服的意愿和法国棉纺织工业的利益交织在这一政策之中，而对于这个产业来说，拿破仑提供的保护乃必不可少，否则英国的竞争就会迫使法国纺织业折本出售，从而早早地将它从法国的经济地图上抹去。但是，大陆封锁也使得法国制造商在一种很特殊的价格条件下从事生产，而这种条件只有在受到高度保护的体制下才能维持下去：作为对封锁政策的报复，英国于1807年11月禁止中立国——特别是美国——的船只向法国港口运送原料，这就是1808年的美洲禁运；法国只得经陆路从利凡得进口棉花，并规定了输入帝国的原棉价格。上述情况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法国的工业家只得以比其英国同行高2—4倍的价格获得原料，而同时欧洲最高的工资水平已经对他们构成了束缚。这种昂贵的代价当然也反映到织布业和后序工业中。这种局面造成了双重的不安：首先，从短期来说，制造商由于沉重的库存负担而走向破产；从长期来看，一旦和平恢复、禁令取消，这种竞争便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复辟王朝不得不赶紧恢复那种被称为“和平时代的封锁”的关税体系。其次，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国的新工业与其18世纪的先行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新工业是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这个市场至少曾一度徒劳地扩大到130个省的大帝国的巨大规模，并以意大利王国为补充，如果这个消费市场因为价格、甚至因为供应而变得萎靡不振的话，还

怎么能合理地利用它呢?

无可挽回的损失

糟糕的局面还不只这些。在法国的整个工业体系中,棉纺织业只是一个次要部门。毛纺织工业只在诺曼底、北方省和阿登地区的大制造业中心开始了其现代化;如果说它的生产活动尚能令人满意,那是因为帝国告终之前大量的军用呢绒订货的缘故,但它同样也受到来自比利时的激烈竞争,而罗讷河和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村毛纺业则受海外市场隔绝之苦。里昂的丝绸业以向中欧、东欧和美国的出口为导向,它的局势时好时坏,但最好也就是恢复到 1789 年之前的水平。最后,诺曼底、曼恩和布列塔尼的麻纺业则完全崩溃了。如果说毛纺业和丝绸业遭遇的困境,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旧制度末年业已很明显的危机的延续、而拿破仑时代的局势又加剧了这场危机的话,麻纺业的衰落则与法国海外和殖民地贸易的致命危机存在更为直接的联系。

从经济的角度看,有个事件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工业革命的发端,这就是大规模海外贸易——主要是大西洋贸易——逐步而又彻底的断绝,在上个世纪,海外贸易曾是法国西部和地中海沿岸繁荣的基础,这种繁荣不仅是南特、波尔多和马赛的,而且是它们后方地区的繁荣:这些地区是整个省份,也许要占整个王国的一半。因此这不是边缘性的贸易,不是点缀在摇摇欲坠、生气全无的以土地为根本的经济之上的光彩夺目的修饰物:正如弗朗索瓦·克鲁泽指出的,整个经济都与海外贸易有关,无论是港口工业还是"内地"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 572 港口 200 公里的范围内都出现了人口减少的情况,码头上冷冷清清,铺路石中间野草蔓生,农村和城镇都陷入了经济萧条。城市发展停滞,并出现了去工业化和乡村化现象:从西部到阿基坦再到南方,沿途都是一番长期的欠发展景象,这是因为现代工业经济没有成功地取代过去的那种混合物而造成的,这种混合物把西印度、西—葡美洲、北欧、当然还有利凡得和印度洋揉杂在一起。当法兰西帝国大型经济活动的轴心移到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时,法国西部和南部的所有地理的和人为的不利因素都清楚地显露出来:位置偏远,背靠贫困衰落的

伊比利亚半岛，人口密度低，土地条件差，矿产资源匮乏，缺少企业精英。

波尔多提供了一个跟踪这一萧条过程的例证，虽然它的衰落并不剧烈。除了1798—1799年外——当时督政府强化了对英政策——革命战争并没有完全截断港口运输，因为中立国（主要是美国）的船只使法国殖民地与其宗主国之间建立起了间接联系，但条件是中途要停靠一个英国港口。1800—1807年，这里呈现出危机间隔期间的轻度繁荣；1802年，即与英国保持和平的那一年，波尔多大约有200艘船只驶往殖民地，这个数字堪比旧制度末年和平时期的数字；同年有220只运载殖民地货物的船只进港，其中90艘是法国船只；圣多明各出现了生产和出口复苏的趋势，与此同时，在法国所有的海港、甚至在巴黎，人们都在忙于重建殖民地贸易公司。1803年与英国和平的破裂、重新征服那个法属西印度大岛屿[①]的失败粉碎了很多人的希望，有些人转而同波旁岛[②]和法兰西岛[③]开展贸易。不过像从前一样，中立国（美国和丹麦）使得间接贸易再次恢复。但到1807年，局势不可挽回地恶化了，法国的大陆封锁、英国“枢密院法令”确定的报复政策、还有美国的禁运，实际上使得中立国船只无法进入法国港口：1807年进入波尔多的美国船只有127艘，1808年只有8艘。随后的贸易许可证制度只允许同英国的间接贸易（1809—1810年，1812年）。但不管怎样，所有替代办法的经济意义都可谓十分微弱：航运不再由法国船只承担，这就意味着造船业的死亡（除了装备海上巡航和探险船只外）；当时的贸易特别有利于进口殖民地的粮食和原料，但出口条件要差得多，一般仅限于农产品（小麦、葡萄酒、烧酒，主要买主是英国），而前美洲殖民地和美国此后购买的是来自英国的制成品。因此，海外市场丢失，地方工业濒临消失。波尔多的制糖厂从1789年的40家减少到1809年的8家。1780年，托南的缆绳制造业雇佣了700名工人，到1811

① 指圣多明各，即海地。

② 今留尼汪岛。

③ 今毛里求斯。

年，这个产业完全消失。一度面向海外市场的南特的印花棉布业，现在的命运也是如此；马赛萧条到了极点，因为英国掌握着对地中海的绝对控制权，它的出路完全被封锁。这就是为什么港口的资产阶级何以如此反感战争的迁延，何以成为反拿破仑势力最坚定的支柱。

欧洲市场的幻影

573

1781—1790 年间，制造品的年均出口值达到 4.5 亿法郎，而到 1803—1812 年间，这个数字降为 3.55 亿。这就是说，大陆市场并没有填补殖民地市场丢失后造成的真空。虽说各附庸国被迫同意优先进口、有时甚至只能进口法国产品，但德意志各国则出于财政理由而强化了关税壁垒，1810 年底，俄国停止了从法国的进口：拿破仑治下的欧洲仍然盛行保护主义，法国产品所遇到的，不仅有 1789 年之前就已阻碍其销售的合法竞争，还有走私商品形成的非法竞争——这些商品可能是进入意大利王国的瑞士布料和印花棉布，也可能是继续在帝国境内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行销的英国产品，由于这些产品起程时的价格具有明显优势，所以它们能够承受迂回转运及走私风险的代价。此外，帝国与欧洲其他地区缺少拓展贸易所需的技术基础。在拿破仑的体制中，唯一可为国际贸易提供便利的水路联系的是塞纳河水系和埃斯考河水系的连接，它把巴黎和安特卫普联系了起来；但是，由于英国的封锁，安特卫普无所作为，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皇帝本人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个港口，除了把它当作一个战争据点外。贯通塞纳河水系和桑布尔河及默兹河水系的工程只停留在计划中而没有实现。道路工程大多投入不足，很快就需要返工，因而只具有战略意义。1813 年提出的巴黎—汉堡公路（经列日和韦瑟尔）整治计划选择的是拉昂—伊尔松—希梅路线，即最短的路线，这主要是出于行军的考虑，从而放弃了经兰斯、列特尔和梅奇埃尔连接阿登的呢绒和炼铁工业区的计划。在意大利半岛地带，法国纺织品的出口十分艰难，通往罗马和那不勒斯的行程缓慢而危险。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交易会上，大型的法国商团——主要是巴黎的——很少出席。1811—1813 年，拿破仑曾鼓励通过车队和商队建立萨洛尼卡和伊利里亚诸省之间的经常性联系，这既是为了从利凡得进口棉花，也是为了进驻

奥斯曼帝国的市场，但是，面对围绕古老交通线展开的激烈竞争，皇帝失败了，这些线路连接萨洛尼卡和贝尔格莱德、佩斯特、维也纳，它们对奥地利帝国有利：例如，在大帝国时期，这条十分稳定的商品流通线位于遥远的东方，呈南北走向，坐落在法国的关税线之外，而且运送英国的走私货物。

因此，在拿破仑时代，法国工业的发展基本是依靠国内市场。当然，我们可以辨别出其中的一些有利因素：市场范围的扩大——也许可以认为，这段历史及其树立的榜样启发了后来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国家开支的增大；也许还有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但是，这些积极因素不足以抵消出口萎缩造成的消极后果。优势最终倒向了英国一边，它必须以持之以恒地稳步扩大对所有大陆的出口为目标，虽然有大陆封锁造成的壁垒，但由于该体系的不完善，英国可以有效地与之对抗，而且其工业生产在1789—1815年之间增长了一倍。

四、战争

毫无疑问，要理解法国地缘政治的那次重大转折，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战争；在那次转折中，法国放弃了长达百年的同英国争夺海上和殖民地霸权的政策，转而进行一次短暂的尝试，即对欧洲大陆实行直接或间接统治，这一尝试既不符合它的对外政策传统，也与其力量不相称，并引起国民的激烈反应。

574

从雾月政变到亚眠和约

在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拿破仑的早期举措的特色主要在于它们的急就章和快刀乱麻的色彩：主要是以胜利来稳定国内政局，恢复和确认督政府取得的成果，督政府在结束战争及重建和平方面的无能成为这次政变的踏脚石。

1800年初，法国仍面临奥地利两面入侵的威胁。奥地利军队集结于热那亚和施瓦本，在英国资金的收买下，巴伐利亚部队还前来增援，这样一来，德国皇帝的军队可以进逼普罗旺斯和阿尔萨斯。拿破仑命

马塞纳姑且在利古里亚防御，并给莱茵河方向的莫罗配备发动一次牵制攻势所需的资源，自己则冒着巨大风险，带领4万军队、6000匹马和40门大炮及军需品，经瑞士和大圣贝尔纳山口进入意大利（5月18—20日）。热尔韦上尉写道："他对人类没有太多的尊重，命令我们立即充当驮畜牲口，而这个命令竟魔法般地执行了……当地居民曾预言我们将无法通过，但他们完全错了。"这样，驻意大利的奥军的背面受到攻击，而在德国的奥军无法提供任何支援。3—4周之后，波拿巴在马伦哥险胜对手（6月14日），不过他对此很满意：虽说这次战役还不足以迫使奥地利求和，但已经成功地排除了法国南方遭受入侵的威胁，而且它在国内引起的反响正好满足了第一执政的期待，因为他必须在短期内、依靠运气的眷顾谋求一次首先具有政治意义的胜利。当年秋天开幕的吕内维尔和会一直拖到莫罗在巴伐利亚的霍恩林登获胜之时（12月3日），这次战役为法国人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奥地利人试图避免英国人单独缔约的局面，也十分担心在意大利的损失过大，因而只得于1801年2月9日同意签署和约。

吕内维尔和约重申并扩大了康波福米奥条约（1797年）中有利于法国的条款。其中的主要条款牵涉欧洲的两个地区：

1）在法国的北部和东部，执政正式确认了大革命取得的成果：兼并了比利时和莱茵地区各省。合并比利时、以莱茵河——从巴塞尔到巴达维亚共和国——为自然疆界，在这两点上，波拿巴决不退让；

2）在意大利，法国的影响力继续扩大，除了确认山南共和国和利古里亚共和国的存在，还明确了皮埃蒙特对法国的紧密依附关系。奥地利还不得不放弃托斯卡纳，根据一项有利于西班牙的许诺，后将其转让给一位波旁—帕尔马亲王。

但是，这样一个和约并不能自我满足。显然，它把法国的政策引向了新的冒险之路：控制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重组莱茵河以东的版图，补偿被兼并的莱茵河西岸地区。这种情况我们将在亚眠和约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将看得很清楚。但这就构成了对奥地利的新威胁。从历史上说，这个国家是波拿巴试图任意分割的"帝国"的首领；对英国

同样也构成威胁，因为它认为将无法进入地中海的大港里窝那，这个地方是转运和发送部分利凡得商品的据点，而且英国将只能不安地注视着法国在中欧方向上的行动。拿破仑冒险的逻辑、或至少是其步骤，在执政府签署的第一个和约中就已表露出来：波拿巴需要辉煌的胜利来迫使法国人服从和仰慕，并确保大革命各方面的成果；但是他的对手们并不能长期屈就于他所强加的过于苛刻的条件。为了防止对手的报复，这位将军执政的战争范围将越来越大，强度将越来越猛烈。

575

不过，1801—1802年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实际上，英国人也接受了拿破仑自己正在寻求的休战。拿破仑的优势十分明显：全面的和平给他带来了光环，而且，此刻他已经准备把光环转变成皇冠。但为什么英国接受了和平呢？从表面看，没有任何东西迫使它非这样做不可。英国甚至克服了第一执政给它带来的许多麻烦：英军炮击哥本哈根，以恫吓波罗的海各国，这些国家受英国从前的盟友沙皇保罗一世的支持，准备联合抵制英国搜查商船的要求，但英国的行动挫败了这个计划；英国还秘密策划了刺杀保罗一世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与法国达成了谅解；在埃及，英国人的运气很好，被波拿巴委以指挥法国远征军重任的克莱贝尔遭暗杀，这对他们很有利，因为克莱贝尔的继任者梅努十分无能，而且断绝了所有来自法国的援助，只能被动挨打，最后终于向一支英国登陆部队投降。因此，在19世纪的第一年，法国的势力被排除出埃及：在我们看来，这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起点，它预示着此后的漫长竞争。确切地说，正是军事方面、特别是海军方面的优势地位，使得伦敦可以体面地缔约，并抵消因国内虚弱造成的并发症的影响。英国除了丧失大陆上的盟友外，还得面对国内的对手。1800年粮食歉收，再加上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进口减少，城乡各地都爆发了骚乱，与此同时，爱尔兰也发生了动乱。此刻，小庇特的运气往下走，而波拿巴则鸿运高照。

亚眠和约反映了10年战争之后法国力量重心的深刻变化。法国的海上和海外势力已经覆灭：虽然英国把马提尼克岛、瓜德卢普岛和印度的商栈交还给法国，但圣多明各彻底失去了，法军已撤出埃及，这

个地方还给了奥斯曼帝国。但是另一方面，法国迫使英国继奥地利之后承认了它在欧洲的支配地位。但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外交胜利吗？法国已不可能恢复过去的殖民地位，而英国也不会听任波拿巴巩固对日益广大的欧洲地区的控制权。

对英战争的重启与通往全面战争之路（1803—1805 年）

从预备和约签订到 1801 年底，远途商业航行几乎恢复到正常状态，从半昏睡中苏醒过来的法国港口一度梦想着重组开往美洲和印度洋的船队。与此同时，波拿巴已经发动对圣多明各的远征，这次行动的指挥者是他妹夫勒克莱尔将军，他的使命是要迫使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屈服，后者已宣布这个岛屿独立。这次远征只是恢复法国的大西洋贸易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波拿巴违背对托斯卡纳的承诺而迎合西班牙波旁家族的一个亲王，由此换得的报酬是，西班牙于 1800 年把路易斯安那转让给法国，当时这块地方是密西西比—密苏里盆地的一部分。在北美大陆创建一块辽阔的法国殖民地，这个计划当然是美国人不能同意的，法国商业势力在这个地区的衰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至少与带给英国人的好处一样多。无论如何，这个计划 576 的进展都不会顺利，相反，由于重新占领圣多明各的行动失败，一切都化为泡影：1802 年底，勒克莱尔随着他的 2.8 万士兵葬身圣多明各（全部兵力总计 3.5 万，其中 2.1 万人死于疾病，7000 人死于战斗）。编年史家诺尔万评论说，这次行动“以赤道的炎炎烈日残忍地照耀着拿破仑的登基大典，正如俄罗斯的冰天雪地昭示着他的覆灭一样”。在外交官詹姆斯·门罗主持的谈判结束之后，杰斐逊总统以 6000 万法郎购买了路易斯安那（1803 年 5 月）。在印度洋，德刚将军派往法兰西岛的部队已难以为继。1803 年对英战争重启时，法国并没有一支数量充足、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舰队，这最终宣判了第一执政的计划的命运，以及海港资产阶级的希望的终结。

上述计划当然让英国感到不安，不过，英国对波拿巴从和约中得到的好处更感惶恐，因为这个和约似乎可以让他在欧洲自由行动。首先，和约并没有恢复英国人希望的同大陆贸易联系的正常化，从英国

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要重新商定一个类似于1786年英法商约的新条约：但是，自1791年，自由贸易被否决了，当时的制宪会议率先采取了回归保护主义的政策。当然，在政府高层，仍有一些人主张回归自由主义：如夏普塔尔，他的职权囊括了全部经济事务；科克贝尔·德·蒙布莱，法国驻伦敦的商务代表；甚至还有康巴塞雷斯。如果附加一定的保护措施，这样的政策或许会对法国工业产生令人振奋的影响，而同时又有利于维持同英国的和平。这个想法正是后来一些计划的灵感之源，这些计划具有十分大胆的现代特征，但都毫无结果，如有人曾提出，利用大陆封锁来组建法兰西帝国和其附庸国之间的关税同盟。最终是相反的政策占了上风：有太多的官员记着工业危机在引发1789年革命时所起的作用，有太多的纺织业工厂主、特别是棉纺织业主，极力要求保护，以致第一执政很轻易就被说服了，1803—1806年，他重新祭起抬高关税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不是直接来自法属殖民地的产品——先是纱线，随后是棉布——的打击特别大而且力度越来越强。英国立即对这种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作出反应——但就法国来说，这一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要进行无情的商业战争，1806—1807年才发展到这一步——它重新采取海上封锁，首先封锁易北河和威悉河河口（作为对占领汉诺威的报复），接着又封锁位于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口。

其次，波拿巴那种令人不安的德国政策对和平造成了损害，他的做法当然不仅会引起英国的反对——出于显而易见的政治—经济理由——也遭到奥地利的反对，因为它觉得自己将被排挤出德意志，帝国体制将受到致命打击；俄国也同样反对拿破仑，因为几十年来，它一直自认为对德意志事务拥有监督权。波拿巴借口要对因莱茵河左岸地区并入法国而遭受损失和剥夺的诸侯和国家进行补偿，通过1803年的帝国决议进行了一次广泛而深刻的版图重组：由于人为的集中，这次重组创建了一个“德意志”第三势力，位列战败的奥地利和损失严重的普鲁士之间，这个势力由一些中小国家构成，实际上它们是法国潜在的保护国。小庇特于1805年成功组织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其基础

577

肯定在于大陆列强迫使皇帝放弃组建“法属德意志”计划的共同愿望；而奥地利还希望废除1797年和1801年把它逐出尼德兰和意大利的条约。

拿破仑·波拿巴的意思似乎是要一劳永逸地结束这些纷争：派遣一支军队登陆英国，驱逐那里的政府，让这个岛国的人民享有类似于法国的制度，从而最终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某种和解：“这个世界足以供我们两国生存。”但是，登陆需要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的联合保护，并清除海峡中的英国舰队。因此1805年夏天起就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运动，后来的结果是特拉法加的毁灭性失败。皇帝一直对海上行动的推迟焦虑不安，但他的军舰还是冒险驶向了战场；不过甚至在得知这个坏消息之前，他就已经决定放弃登陆计划，把大军主力转向中欧。在法国海岸边集结军队，除了威慑英国、迫使它重开谈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切实的目标呢？不管怎样，这时法军必须调整部署，以应付再度进入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军队的威胁。1805年10月全面战争重新开始时，局面是符合法国的对手的期望的。

从奥斯特里茨到提尔西特（1805—1807年）

但当时拿破仑拥有更为出色的战争工具；他的军队人员配备充足。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后，第四次同盟也分崩离析，期间法军取得了多次胜利，虽然获胜的条件日益困难，但它们仍然构成帝国军事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在奥地利的历史上，1805—1806年的冬天肯定是最悲惨的。它在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连遭失败，乌尔姆的军队被迫投降；而在拿破仑挑选的奥斯特里茨，奥地利投入了最后的兵力，结果连同其俄国盟军一起输掉了这场战役。普雷斯堡和约确认了它的惨败，并为法国人的皇帝在德意志大肆扩张的政策打开了道路。后者再次拾起延续两百年的法国外交传统，在南德中部建立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拥有王国称号的巴伐利亚，这个王国还吞并了蒂罗尔、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法国军队可以自诩“确保这个德意志主体的独立”，以保证它免受奥地利的入侵、甚至兼并。符腾堡也应成为一个王国；巴登大公国应享

有选帝侯资格，以上三个邦国均与波拿巴建立家族联系。莱茵河右岸的鲁尔地区成立了贝尔格大公国。莱茵地区及德国中部的其他国家被邀请（驻扎在德国的大军是这一邀请的后盾）组成莱茵联盟，其中的各位诸侯脱离德意志帝国，转受拿破仑保护。不久，拿破仑就把他们仅仅看作部队的供应者（提供了约6.3万人）。正是在这个同盟之内，大革命和帝国时代法国的社会和行政制度最显著地推广开来，但并不因此而带有过多的强制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1806年下半年看来是关键性的。与英国和俄国的谈判正在进行，此时小庇特已经死去。但谈判失败了。小庇特的继任者们——特别是坎宁——很快就显示出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的坚定决心，他们不向拿破仑作任何妥协。此后对欧洲海岸的封锁从布雷斯特延伸到易北河。而另一方面，普鲁士国王拒绝担任北德同盟的首脑，并最终决定站在俄国一边投入战争。

578

莱茵同盟的建立迫使弗兰茨二世放弃德国皇帝的称号，改称奥地利皇帝。法军在耶拿—奥尔施泰特的两次胜利使得腓特烈-威廉三世剥去了腓特烈二世带来的荣光。所有的神话——无论是最古老的还是最切近的——都在拿破仑军队前进的步伐中烟消云散。军事胜利让拿破仑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是英国商人光顾最频繁的地方。因此，当法军占领柏林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宣布大陆海岸对英国处于封锁状态的法令，以作为对英国的海上封锁的报复。这宣告了一场尚未成为现实的新型战争：一场空前的经济战，拿破仑试图以此来迫使他最顽强的对手屈服。

普鲁士的崩溃使得法国在莱茵河另一边的影响力发展到了顶点。正如曾依靠夺自奥地利的战利品扶植巴伐利亚一样，拿破仑扩大了萨克森，不久又给它增加了一个“华沙大公国”，后者是通过剥夺普鲁士而复苏过去的波兰的一个成果，但成果十分有限。普鲁士还丧失了易北河以西的土地，那里将组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王国。莱茵同盟一直扩展到奥德河和维斯瓦河。普鲁士国王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

还有俄罗斯尚未被击败。1806—1807年冬天的东普鲁士战役很像

是1812年灾难性的俄国战役的预演：拿破仑应当考虑到路途遥远造成的难题，考虑在被征服土地上维持人员和马匹生计的困难，以及追击对手、对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必要性。皇帝似乎第一次对荣誉的生命代价感到震惊；艾劳战役之后，他在给约瑟芬的信中写道（1807年2月14日）："这地方遍地都是死尸和伤兵。这不是战争的美好之处；看到这么多的伤亡让人难受，心里很沉重。"弗里德兰（1807年6月14日：马伦哥战役的纪念日）更富传奇色彩，俄军这一次战败溃逃。三个星期后，两位皇帝，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缔结一项和约，在这个条约中，最现实的安排和最宏大的设想、最出人意料的友好声明融合在一起。所谓现实，就是由已经被残酷肢解的普鲁士支付所有费用，与俄国的一纸和约就让它同意法国的势力扩展到东欧。所谓幻想，就是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以英国为首要贸易伙伴的俄国真的会帮助实现全面的大陆封锁，以及假想中的对奥斯曼帝国的分割：俄国刚刚答应大大撤退其在欧洲的势力，这个空想计划就是要对俄国作切实的补偿。这样一个协议开启了一个短暂时期（为时勉强一年），在这个时期内，法国的势力达到了名副其实的顶峰。

战争大师拿破仑

1807年之前辉煌的军事荣誉，历次胜利得来的轻松，这些都容易掩盖作为战争天才的波拿巴将军和皇帝的本来特征。军事领域内的拿破仑像民事领域中的拿破仑一样，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物，他像现代战争的先驱者，但更接近于那些十分古老的传统。当然，他在自如地运用这些传统工具时表现出了罕见的高超才能。

拿破仑忠实于刚刚过去的时代，他之所以成为战争大师，得自他从18世纪理论家那里汲取的全部营养，这些人如吉贝尔（《战术通论》），布尔塞（《山地战原理》），泰尔（《新炮兵战法》），以及其他很多人，1791年的军事条例就是对前人经验的一次综合。同样，拿破仑也忠实于古老的军事指挥传统，在19世纪初，指挥战争首先是一门艺术，在表现这门艺术时，将领的个人才具要比复杂的技术手段之运用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同样是位战争大师。"战争艺

579

术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行动的艺术；其中没有任何含混的东西；一切都是明确的，这里没有任何空洞的学说……指挥官受自己的经验或天才的指引……征服高卢的不是罗马军队，而是恺撒。”我们可以引用很多拿破仑的话来证明他那经验主义的、个人特色的军事艺术观念。这样就可以解释，作为军事大师的拿破仑·波拿巴何以是孤独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他一个人的脑子里成型的；参谋们无须履行今天派给他们的任何职责：他们的角色就是传达者，即便是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也是如此；贝尔蒂埃就是当时参谋人员的典型化身，他只是其首长的意志的被动的体现者，没有任何自主行动。

从这种经验主义的方式出发，拿破仑·波拿巴总是认为，每次战役都是由一堆独特的条件构成的。不过，他总是根据一定数量的原则采取行动，当然，这些原则的运用总是服从于他拥有的行动自由度之大小。在他看来，一场战斗应该迅速而坚决：拿破仑是个打几星期战争的人，这样的战争很适合于携带少量辎重的机动部队，也适应于财政资源有限、远程补给或就地获取给养存在困难的情况。在旨在分散敌军力量的行动完成后，便可以决定在一块精心选定的战场上对敌人发起战斗，这时应投入尽可能多的兵力：“战争的艺术就在于，在想要进行战斗的地点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行动突然、打击有力：当然还应该取胜——为此应储备人员和火炮，以备发起决定性进攻——接着要乘胜追击：“取胜毫无价值，应该赢得胜利的果实。”拿破仑的战争是运动战和速决战：一切都得看士兵的脚力和道路状况。拿破仑的战役是依靠判断力、预测能力的智力操练。

拿破仑·波拿巴麾下的军队在15年中有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无疑比战争理念的变化更大。事实上，督政府时期就已采用了职业军队的形式，但是，1808—1814年，当征兵达到最大规模时，军队又接近于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军队，不过，当皇帝为了准备俄国战役而大量征召外国部队时，这一特点又部分地丧失了。兵力的不断扩充、战争规模的扩大催生了一些全新的技术难题，它们在当时都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今天，这些难题已交由后勤部门来处理。不过达吕伯爵已经承担

起了类似的后勤工作，他担任过国务顾问、军需总监等职，后来擢升为大臣，是个严厉而心直口快的官员，但皇帝完全信任他；他在执政府时期就曾参与炮兵辎重队的组建，1805 年底，当军队回国时，他被委以安排行程和提供给养的工作；后来，他创建了辎重车队，负责战争基金的管理，并在各被占领国大力开展工作，以补给和装备那里的人马。军队规模的变化和战争本身的变化必然导致其他的革新，特别是军队的组织和独立自主的军事团体的组建：拿破仑曾于 1802 年授予军事专科学校（1808 年在圣西尔落足）以长期性的法律地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必将与自己那一套僵化的体制发生冲突——在这个体制中，一切都依赖于他个人。

大陆封锁：理论、实践和反响

580

提尔西特和约之后，拿破仑觉得可以转过头来对付英国。正是在这时候，大陆封锁真正开始实施了。拿破仑的大军进驻北欧海岸的阵地；一支法军穿越西班牙北部，前去攻占里斯本；米兰敕令（1807 年 11—12 月）强化了柏林敕令的措施，明确禁止以中立国为中介同英国进行贸易。1808 年初，英国对其出口的下降深感担忧：如果有一天它被压缩到自己的国内市场，它的工业如何能适应这种局促形势呢？但是，拿破仑并没有成功地彻底关闭欧洲。在北方，瑞典拒绝实施大陆封锁。丹麦支持封锁政策，但英国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袭，成功地俘获了丹麦的舰队。意大利半岛防范森严，因为那不勒斯王国从 1806 年之后就成了法国人的，教皇国于 1809 年被兼并，但西班牙海岸仍是个漏洞。确切地说，正是西班牙成为了矛盾的焦点。1808 年 3 月 27 日，拿破仑写道：“毫无疑问，除非我在大陆采取一次大的行动，否则我跟英国不可能有稳固的和平，我已经决定，把一位法国王公扶上西班牙王位。”但是，这次行动意味着拿破仑的大军必须再一次作出重大调整，这次是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同时撤离北欧海岸，这些地方很快就出现了繁盛的禁运商品的走私贸易，这些货物从黑尔戈兰岛和哥德堡等基地出发，一些政府十分乐意与之串通。一方面，西班牙战争是在皇帝未曾亲临、缺少其有效指挥的情况下进行的：1808 年夏天遭受

两次失利——贝伦和辛特拉——虽然其军事影响相对较小，但心理震荡却要大得多，尤其是在德意志各邦国和奥地利。另一方面，法国人侵西班牙以驱逐那里的合法王朝为开端，这在人民当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在这里，拿破仑不能指望法国的原则给他带来的同情：阶级矛盾暂时被搁置了起来。民族问题超越了阶级矛盾。类似的局面也将在俄国出现，而且在较弱的程度上出现于德意志和奥地利各地。这是一种新出现的重要事实，但皇帝肯定认识不清。

1809 年，英法斗争的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一方面，奥地利试图采取第二次复仇行动——它一直得到英国的资金支持，法俄关系的冷却、西班牙的人民起义也鼓舞了这一计划；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领们还想激发一场类似于西班牙的运动，他们以复兴“帝国”的观念为中心，展开了广泛的官方宣传运动，而那个帝国就是尚未诞生的、大德意志民族的神秘的历史中的祖国。另一方面，从 1809 年春天开始，法国的经济困难迫使皇帝颁发与英国贸易的许可证——我们在别处已经看到，他是出于税收方面的考虑才这样做。此后，大陆封锁便摇摆在两个想法之间。当然，奥地利在瓦格拉姆再一次遭受失败之后，强加给它的新和约中依然体现了最大限度地直接控制海岸线的愿望：这一次，奥地利丧失的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带。次年，拿破仑占领荷兰王国，接着吞并直到汉堡的德意志海岸地区。但是另一方面，1810 年的三个敕令——圣克鲁、特里亚农、枫丹白露——在严厉打击走私的同时，又扩展了许可证制度，并回到了对某些产品课征重税的老办法上，从而实际上鼓励了进口。

581

从膨胀到失败（1812—1814）

但是，最初的大陆封锁观念一直萦绕在皇帝的脑海中，当他决定强迫俄国在它自己的土地上遵守对英国商品的禁运原则时，便明显体现了这一点。莫莱曾说拿破仑是一个看不到可能性的界限的天才。对此拿破仑在他的《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中回答说：“如果我成功了，我将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事实上，俄国战役动员的军队规模太大，以致当时的技术条件只能让拿破仑失望。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

如果他在莫斯科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成功，进行一场他所追求的摧毁性的战役，英国肯定会经历远比大陆封锁期间的两次危机（1808 年和 1811 年）更加暗淡的日子。

自从 1808 年拿破仑和亚历山大在埃尔富特会晤上重申他们的联盟关系之后，法俄关系开始缓慢地恶化。1809 年与奥地利的战争期间，俄国的支持明显是微弱的。1810 年，拿破仑选择与一位奥地利公主迅速缔结婚约，而不愿跟圣彼得堡宫廷进行一场前途不明的谈判。是年年底，俄国决定对法国商品的进口实施禁令。俄国对它的西侧有可能重组一个大波兰感到不安，拿破仑则难以容忍他那显赫的盟友利用与土耳其再次开战的机会向君士坦丁堡推进。1811 年，拿破仑已经决定发动战争，并着手有步骤地组建一支新的“大军”——这是继 1805 年和 1809 年“大军”之后的第三支——并在德国和波兰筹备补给基地。对俄战争失利的首要原因很可能在于糟糕的日程。从季节上说，战役开始得过晚，而且迁延的时间过长，因为拿破仑不得不追击一支回避战斗的军队；后来，他在莫斯科再次浪费了时间，从战略的角度看，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是一段真正致命的时光。冬天提早来临，但气候本身可能只起了辅助作用。第二个危险毋宁说在于无法在军队撤退途中补充给养、而非敌军的骚扰——因为它穿越的俄国几个月前就实行了“焦土”战术；马匹饿死，部队行动放缓，或干脆瘫痪。第三点，拿破仑在俄国碰到了同西班牙类似的情况，不得不面临一种部队难以适应的战争形式：大量伤亡是由哥萨克骑兵和农民辅助部队造成的。

1813 年是拿破仑体系真正遭遇危机的一年。由于波罗的海海岸实际上已经对英国商品重新开放，大陆封锁迅速失去了效力。甚至还在法军撤到莱茵河西岸之前，法国在德意志的政治势力就已经崩溃了，奥地利皇帝在长期的踌躇和谈判的尝试过去之后，终于决定站到他女婿的对手一边，而普鲁士国王甚至呼吁“民族”起义：对他而言，这场战争实际上只是为了收复失地、重建王朝，但他试图把它扩大为德意志的解放战争。中欧的局势一下子变得十分复杂：奥地利皇帝弗兰

茨二世和他的首相梅特涅之所以重新站到强者一边参加角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很担心重建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担心因 1812 年胜利而上升为欧洲仲裁者的俄国的介入；奥地利需要获得发言权，另外，它必须尽可能地维护拿破仑建立的中间国体制，这个体制实际上符合奥地利的利益。最后，在军事方面，虽然拿破仑通过对年轻人进行规模空前的动员而重新组建了一支人数众多（但没有经验）的军队，他还是没有夺回胜利。在他亲临战场的历次战役中，如在吕岑、鲍岑和德累斯顿，他还能打出漂亮的胜仗；但是在 10 月的莱比锡大会战中，他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对手击败，这一次，他成了自己惯常使用的集中兵力围攻敌军之战术的牺牲品。这场空前的惨败迫使法军退回国境之内，反法盟军坚定的推进步伐威胁到了法国，这是 14 年来未曾有过的事。与此同时，法军完全撤离西班牙，最终成就了威灵顿的英军在维多利亚的胜利。

1814 年头几个月，随着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军队越过莱茵河，法国开始了一场民族危机，也许，只有持续的胜利和权力的不断强化才会使得危机成为不可能。绝对主义列强军队的逼近是欧洲封建主义反扑的代名词，这给拿破仑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群众力量，但他只是从军事上利用这一力量——逃兵和投敌行为并没有伤及部队的士气，即便是在最后溃败的日子里——但根本没有在政治方面加以利用，尽管他从自己的权威中得出的观念完全没有了革命政府的色彩，但在当时危机迫近的局面下，组建这样的政府应该成为考虑对象。另一方面，皇帝时运的恶化鼓励了那些潜在的、或很早之前已经缴械的反对势力。此刻，皇帝和名流们分裂了，他曾把这些人安置在自己的体制下，但又堵上他们的嘴；在这个时刻，甚至帝国家族及军事贵族内部的团结也出现了松动。约瑟夫在失去西班牙后，更关心的是早日实现和平，而不是去保卫首都。元帅们已经厌倦了战争。拿破仑，这个在俄国战场上已显露出疲态、表现得优柔寡断的人，这时再次焕发出了军事天才。1814 年三个月的法兰西战役，给人们留下的是一段眩目的回忆：十来万人的部队与从四面八方进逼这块充满敌意的土地的敌人周旋。

法军在香槟和布里等地一系列的胜利最大限度地延缓了敌军的推进，但通往皇帝身后的首都的道路还是缩短了。这一次，胜利者要打击的已经不是法国在欧洲的势力，而是法国在大革命中兼并的领土和它本身的体制。

拿破仑之后的拿破仑

在第一次逊位将近一年之后，这位已经成为厄尔巴岛王公的从前欧洲最强大的君主，试图恢复他的个人地位及法国的地位——他认为二者不可分割——这就是百日传奇。而此前法国经历了第一次王朝复辟，这使得他可以以不同于失败之前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国家。

他以革命士兵的身份登陆儒昂湾。他向法国人民宣布："我在流亡中听到你们的呻吟和誓愿：你们祈求你们自己选择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向军队宣告说："拔去那被民族摈弃的旗帜吧，25 年来它一直召唤着法国所有的敌人！扬起三色旗吧！在我们那些伟大的日子里，你们曾高举着它……再次戴上你们在乌尔姆、在奥斯特里茨、在耶拿佩戴的鹰徽吧……"他自己在解释"雄鹰翱翔"时强调人民和军队的支持："如果当初皇帝认可并支持人民运动，他本可带着百万农民到巴黎……皇帝将在一大群军官和农民的簇拥下到达杜伊勒里宫……" 583 但是拿破仑真的在一年之内发生转变了吗？1816 年，他在圣赫勒拿岛写道："我完全可以成为宪政与和平之下的君主，正如我曾经是独裁的、喜爱大事业的君主一样。"事实上，他更情愿委托邦雅曼·贡斯当起草一份"帝国宪法补充法案"，以扩大民族代议机构的职责，而不是去复活共和 2 年的幽灵：这是一个失算的计划，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要去试验一个失败政体之变体的愿望。至于和平，就算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真的会放弃"大帝国的想法"，但和平并不取决于他，而在于盟国，而对后者而言，拿破仑的复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当皇帝进入巴黎时，情形与 15 年前一样：他必须获得一场胜利，但结果是滑铁卢。"不可理解的日子！各种闻所未闻的厄运接踵而至！……真是一场古怪的战役，一个星期内，法国曾三次有把握取胜并掌握自

己的命运，但结果胜利都从我手里溜走了！”我们只能说，这个独裁者、战争征服者，其经历就是这个特殊体制的根本但又脆弱的生命力所在。

作为现代恺撒，或现代的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一世并没有建立一个王朝，也没有确立一套持久的政治形式。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他只是一颗没有在天空中留下任何痕迹的彗星。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筑起了一道抵御旧的社会制度回潮的堤坝，即便是 1814—1815 年的失败也没有撼动这道堤坝，而这里我们还没有触及另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他把大革命的震荡波几乎传遍了全欧洲。帝国是一个过渡体制，大革命通过它在法国扎根。从更为实际的角度看，皇帝留下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将成为整个法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这份遗产将在 1815 年之后展现出来，它以拿破仑传说的形式不断得到丰富：法国人对战争价值、对权威的个人化、对以等级趣味为调剂的平等主义的持久眷恋，无疑深得帝国荣光的浸润。



第二十一章　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国 584

1815—1848年面对失败、波旁王朝和流亡贵族的回归、显贵政府，怀念自由和辉煌。

1815年至1848年法国所经历的立宪君主制，为法国带来的首先是和平。

当经济上的旧制度依旧存在——面对以机械纱厂、铁路和银行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也已缓慢衰退——的时候，作为活跃的少数派、革命成果的继承者和革命要求的捍卫者，资产阶级逐渐获得了权力，而这在复辟王朝时期还曾为贵族所禁止。正是在资产阶级身上，自由主义得以体现，新的政治惯习开始出现，新的观念产生。

针对资产阶级这种上升趋势的反抗，更多的是来自于拒绝与现实妥协的思想和艺术愿望，而不是其他社会团体——尽管无产阶级的最初反抗正在缓慢形成，但它的组织依然像以前一样。资产阶级和浪漫主义的法国是同一社会的正反两面，这一社会试图在秩序和自由之间、乡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逐渐为工业动力所渗透的社会之间、人际关系的等级社会和功能关系社会之间寻求平衡。

虽然资产阶级的发展——通过运用自由和充分发挥个体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增长，但这一增长在使得农业人口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民众的社会与心理结构产生动摇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对立。经济

发展的缓慢——即使到 1840 年前后，仍难以称法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代——与思想和政治运动的沸腾形成了鲜明对比。革命传统、拿破仑式的中央集权、源自宪章的代议制政体都使巴黎的地位得到增强，虽然等级制推翻了、在 1830 年和 1848 年改变了政体，通过巴黎的报刊、作家和议员们对各届政府提出质疑，但它也认可了新领导阶层的权力，并与国家日益增长的权力融为一体。由此，巴黎成为一个为稳定而担心的法国的革命首都。

585

一、复辟王朝

对战争和塔列朗之流帝国政府高官的阴谋所激发的反法同盟国家的外交手腕的厌倦，成为 1814 年波旁王朝复辟的主要原因。第二次复辟之后，即 1815 年，路易十八的任务变得更为艰难；法国经历了更加彻底的失败，签订和约的条件更为苛刻：法国领土的一部分将被占领。第一次复辟的失败激怒了保皇派，而百日王朝这一插曲则唤醒了蛰伏于有关革命时代之记忆中的思想分裂。

立宪制的建立

1815 年 7 月 8 日路易十八回到了巴黎，随行的是以塔列朗为首的政府。对塔列朗来说，当务之急是在各地确立其政府大臣及下属官员的权威；派往各省的特别委员会被取缔，行政法院被重组，帝国教育团得以保留，贵族院则进行了清洗。借自最富有者的一亿法郎的特别税用以满足最紧迫的财政需要。

在第一次复辟之初匆忙拟订的《宪章》，虽然断言君权可追溯至最古老时代，但是也承认制宪议会时期立法的主要成果：世俗平等、公共自由（虽然有所限制）、国有财产获得者的所有权得到确认。通过继续实施《民法典》和使新政权从帝国中央集权化的工具中获益，它也认可了执政府对社会的重组。《宪章》建立了一个没有任何议会制特点的立宪君主制；国王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而且借助《宪章》第

14 条，他甚至可以越过议会两院，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发布敕令来立法。

与由国王任命的或是继承席位的人组成的贵族院相比，众议院的代表性也不很强。众议员们的权力来自《宪章》，因此也就是来自国王；他们通过一种限制性很强的纳税选举制来选出：约 10 万选民（交纳至少 300 法郎的直接税）选举众议员，后者必须年满 40 岁，交纳 1000 法郎的直接税。在这些含糊和不确定的前提条件下，代议制政府仍然得以发展起来，而运用第 14 条则最终导致政权的崩溃。这一立宪演进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发展和对《宪章》的解释，而不是来自于《宪章》本身的规定。1815 年时没有任何可以预见到这一演进的东西。

1815 年的反革命

在百日王朝期间拿破仑试图恢复革命传统，而他的第二次退位则导致了反革命的胜利。反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地出现：为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归所激怒的保皇派集团，利用旧有仇恨在法国南部，如马赛、阿维尼翁等地煽动民众反对波拿巴派，在阿维尼翁，布律纳元帅被群众杀害，在尼姆，则是天主教徒残害新教徒。当保皇派当局进行干预时，他们也受到恐吓，拉梅尔将军就是因为在图卢兹试图保护波拿巴派而被暗杀的。 586

在政府中，确保了路易十八回归的塔列朗—富歇内阁，以同盟国强加的苛刻议和条件为借口退出了政府。事实上，这一过渡政府的领导人自身就是如此可疑，以至于既不能制止白色恐怖，也无法得到极端保皇派的支持。极端保皇派们认为《宪章》是对新思想，也就是说革命的让步，并指责它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他们依靠的是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即未来的查理十世。极端保皇派赢得了 1815 年 8 月的选举，在路易十八不无讥讽地称之为“难能可贵的议会”[①] 中，他们占据了 398 席中的 350 席。在他们的首领中，有来自图卢兹的维莱尔伯爵；拉布尔多纳耶伯爵，科布伦茨流亡者军队的前军官；夏多布

① 一译“无双议会”。

里昂子爵，他于1816年写成最为敌视立宪政体的著作《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这些人汲取了博纳尔子爵的社会是由从家庭至国家的各个等级集团组成的传统主义哲学思想。教士和乡村贵族使得极端保皇派具有了毋庸争辩的影响。在南部各个城市中，地位低下的手工业者和工场主们追随保皇派首领们，后者在帝国末期已建立整个秘密社团网络，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宗教协会“圣会”名义成立的“信仰骑士团”（Chevaliers de la foi）。

极端保皇派对政府施压以达到撤换大批高级官员和将领的目的；曾主张处死路易十六的国民公会议员们被流放，军事法庭判处那些在“百日”期间归顺拿破仑的将军们死刑；内伊元帅就是因此被贵族院判处死刑，并于1815年12月7日被枪决的。从10月31日起，紧急安全法令取消了个人自由；特别法庭——重罪法庭建立，有近7万名嫌疑犯被逮捕，大清洗涉及到四分之一的官员。他们往往被曾是流亡者的贵族所取代。

反革命在作为最早加入神圣同盟的国家之一的法国的国际地位层面上也取得了胜利。1815年9月24日选择黎世留公爵接替塔列朗—富歇是俄罗斯影响的新证据，因为这位大领主就是从俄罗斯返回法国的。

然而，众议院发现该内阁并不非常支持极端保皇派；对自己的影响深信不疑的众议院，鼓吹的代议制政府，要求控制政府，并将地方行政交还给大地产主和教士。它想要的选举法将扩大选民群体，其目的是借助更为广大的农村选票数来遏制被怀疑是同情革命思想的资产阶级的选票。极端保皇派报纸，是当时惟一能出版的报纸，对各部大臣横加指责。针对源自1789年的新法国的反动行为，阻碍了内阁的活动，并引起了同盟国的担忧，他们害怕波旁王朝再次被推翻。

1816年9月5日路易十八解散了“难能可贵的议会”，这一行动更多地是出于现实考虑，而不是个人意愿。复归旧制度的一切希望因此化为乌有。然而，完全敌视自由主义观念的极端保皇多数派，已使得《宪章》中有关代议制政府的规定的实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复辟势力

1815年的全欧各地，反革命、针对拿破仑的胜利都是依靠关注于为自己保留生活必需品的国家市场的土地贵族，以及对以王权和教权联合为基础的传统的维护。

教会

天主教传统为君主制传统和家庭传统提供了基础。因此，拿破仑时代即已开始的宗教反动突出了反革命特点。1815年的天主教会不仅仅是一支宗教势力，其教士们渴望恢复组织和25年来被剥夺的社会影响。 587

个人回归宗教信仰——夏多布里昂是18世纪末最著名的例子——为整个天主教国家的官方虚构所取代。由此，教会的精神影响不仅为政权服务，也成为政治趋势；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教权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同时出现互为补充。

教士的物质状况得到改善；教堂和教会建筑被修复，神甫的待遇获得提高；在神学院里，享受奖学金的学生数目倍增更有利于教士的招募；复辟王朝时期数目众多的新一代年轻神甫在法国教会中出现；他们的智力教育无甚新奇，但是，在往往是贵族出身的主教、"信仰之父"（Père de la foi，耶稣会以此名字重新出现，未经许可，但却被容忍）和罗藏修道院长的"法国传教会"（Missions de France）的推动下，他们为宗教生活的复兴付出了巨大努力。传教士们依靠的是民众的感觉，往往唤起妇女的热情，宣讲上帝是严厉的，运用人们对地狱的恐惧。最终他们禁止了舞会和戏剧，而在此之前，他们还增加了对革命时代反对宗教的侮辱行为的赎罪仪式，以及纪念路易十六和恐怖时期受害者的仪式。他们的演出往往重新激起有关革命时代的刚刚平息的争论，或是引发更多的是导致政治骚动而不是道德皈依的热情。虔诚的协会必须保持这种热情；慈善团体、虔诚集会将教士的活动与那些通常来自社会上层阶级的年轻人或是成年人联合起来。

至于社会下层，虽然正是学校使得教会得以更好地施加其影响，

但是公教要理会修士数量不足，而且在农村地区入学率依然较低。对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星期天的弥撒和讲道依然是主要的社交活动，这一点在西部省份尤为明显。

贵族

在农村，贵族并没有完全丧失威望，村庄的本堂神甫往往还默默地依赖领主。失去了司法特性的贵族，无论其是真实的或虚假的，依旧是一种社会存在，但是，由于它能将运用土地财富与姓氏和家族传统结合起来，因而更具影响力。对帝国时期贵族的认可、复辟时期为奖励在帝国时代效忠波旁王朝而大批授爵、真正贵族家庭中年幼者篡取称号的情况增多、“德”这一前置词的滥用和唬人，这些都重新构成了贵族阶层，后者中的最新成员们在贵族要求问题上并非是最妥协的人。

在贵族中家族传统依然非常强；这导致一种将过去（而且是最遥远的过去）理想化的现实观；它继续保持对革命的恐惧，因为革命时期的逮捕、流放甚至处决一个或几个贵族的行为，使其成为贵族的家族史中最阴暗的遭遇。

拿破仑时代已剥夺了贵族最为传统的声誉来源，即军事威望。但是从1815年起，贵族，尤其是前流亡贵族，渗入到国家、议会和政府之中。贵族院似乎已由他们构成：他们在“难能可贵的议会”中占54%；有9个省的众议员完全由贵族组成。

588

因为整个复辟时期行政中央集权化继续发展，将贵族安置进省政府或是财政部门、法官体系（在那里它重续旧制度传统，并使之与新法律相适应）就更加具有强制性。

贵族在社会和文艺生活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引领时尚，且自浪漫主义运动伊始就对其予以推动，阿兰库尔子爵（贵族和僭越能力的绝佳例证）尤其热衷于此道。但是，他的影响，就像其绝大多数收入一样，是来自于其拥有的大量地产所继续赋予他的对乡村世界的统治能力，而就像司汤达所指出的，当时已不再是一个大地产繁荣兴盛的时代了。

农业经济

农村世界——某些地区，如诺尔省、阿尔萨斯，从出售国有财产中获益——出现了非常大的差异性，这是一个缺乏现代交通、仍有待统一的国度的特点。不过，在几乎整个法国，城堡依旧是政治和社会中心；在大地产主中居主要地位的贵族，不仅重建了自己的领地，而且表现得更加同质。在议会中拥有影响力的贵族，促使投票通过一项有利于农业的法律；1819 年 7 月 16 日法令确立了有关谷物价格的浮动标准，目的是保护法国产品，而阻碍敖德萨的小麦进入。重商主义的怀旧心理占据了生产小麦的大地产主和加工厂主的头脑；在法国还占主导地位的用木材作为燃料来进行铸造，导致为了生产而将大片森林的所有者——在其中人们依然发现大量贵族——和锻造师傅联合在一起。

进步力量

在如此多年的思想压抑和因循守旧后，复辟时代经历了一场文化沸腾，虽然由于知识教育的范围狭窄而限制在有限的社会环境中，但是它受到了“难能可贵的议会”解体之后法国逐渐学会使用的思想自由的激励。

科学思想

科学思想的发展依然持续，并没有受到政治动荡的过多影响。拥有综合工科学校的法国，直至 1840 年一直是数学研究的主要中心。数学方法首先被引用到力学和天文学，然后是整个物理学中。它也延伸至自然科学，后者通过拉马克和居维叶的研究，已超越编写术语表阶段，而进入到对活的物质和确保生命机能的那些法则的系统分析。甚至社会和道德现象也通过数字来加以理解，起初是拉普拉斯的概率论，随后是夏尔·杜班对这一理论的应用。

越来越和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研究，不再是业余爱好者从事的活动，或是哲学思辨的副产品。它已成为物质进步的基本要素；

尽管自大革命时期开始的对各大机构的援助在1815年以后有所减少，但是通过诸如科学院、法兰西学院[①]、自然史博物馆等重要机构，科学成果主要是在巴黎产生；它得到了工商业资产阶级中最具活力的成员的支持，如佩里埃家族、德莱塞尔家族，也得到了受《水星报》、《密涅瓦报》等自由派报刊之启发的公共舆论的支持。与形而上学决裂的科学，力求使经验占主导地位；与传统决裂——新生的自由主义和名称各异的浪漫主义与传统相互竞争——就开启了通往个体主动性的道路。

589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使得遵从个体主动性的优先权获得了理论上的证实；事实上，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依赖于根据个体自治而提出的对自由的解释。它既反对革命或拿破仑的专制，也反对1815年之后的极端保皇派理论。它吸取了国外和新教徒的影响，对此人们可以在基佐和邦雅曼·贡斯当那里找到，后者于1819年写道："现代人的目的是在私人快乐中拥有安全，他们将制度赋予这些快乐的保障称为自由"；自由主义思想认为这种保障可以实现，条件是复辟时期的政治制度必须更加注重保护个人行为，而不是权力的组织，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已经深受个人性作用的影响，技术商业、工业领域都先后发生了重大革新。

维护促进自身解放的个人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职责。依旧是邦雅曼·贡斯当最好地阐释了这一"中庸"特点，他写道："通过自由，我理解了个体对试图进行专制统治的权力机关，以及宣称有权以多数的名义奴役少数的民众的胜利。"

巴黎

虽然反革命以外省为基础，但正是巴黎为其确定了基调，并赋予其力量。巴黎地位的独特不仅来自于它的大量人口：复辟王朝之初有

① Collège de France，一译法兰西公学。

70 万居民，这是刚刚超过 11 万人的马赛或里昂所无法比拟的。财富以各种形式在巴黎积聚；这座文化都市，它的学校、学院、作家和报刊——它所拥有的杂志比我们今天的日报数量还多——使它成为思想和文化中心，其影响甚至已传播到法国之外。正是在巴黎，文学和艺术创作、科学发现以及围绕着《宪章》的施行而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不断出现。但是，巴黎还有旧制度残余，尤其是在中部和东部居住区，那里聚集了大量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来自邻近省份、诺尔省、东部或是奥弗涅地区。他们在这些居住区继续他们原来的生活，没有哪个地方反差会比之更为明显，人们在那里看到了社会的各个等级，有时他们甚至就住在同一幢楼的不同楼层中。巴黎汇集了复辟势力和进步力量等各种力量，确保了政府的运转，为变革作了铺垫，影响了未来发展。

战后

随着和平的恢复，大多数法国人重新继续传统生活，不再担心受到征兵的威胁。人口数量显著增长；1815 年后不久法国人口达到 3000 万。城市人口刚刚超过 1/10。拥有将近一半可耕土地的农民，其数量超过了劳动力人口的 2/3；建立在农业经济（更确切地说是粮食生产）占优势地位、廉价运输方式不足基础上的旧经济制度，依然为大多数的法国人提供了衣食和收入。收入可谓微薄，而且食品占了居民家庭开支的 2/3 还要多。

战争的沉重遗产和巴黎条约的财政条款都重重地压在地产主身上。然而，当财政捐税最为沉重的时候，土地收入减少了；这甚至是极端保皇派失败的深层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的政策中有关土地均分的设想是与经济的趋势相违背的。 590

盟国强加的战争赔款和拿破仑留下的预算赤字使得财政问题成为首要事务，并赋予银行家们以重要地位，这从他们的政治角色中得以体现。1816—1817 年，一场源自英国的经济危机席卷欧洲大陆和法国，造成经济形势的恶化；随后出现的农产品价格的降低同时影响到

农民和地主。关税保护主义已不足以在恢复和平之后所开始的经济竞争中保护本国产品了。在庇卡底和安茹地区，垦荒扩大了耕地面积；在最富裕的地区，如法国北部平原，由种植甜菜所产生的新农业技术增加了农业收益。

法国工业获益于充足的且价格不高的劳动力，这使它无须非得（像英国那样）进行迅速的机械化。手工业者依然在建筑和纺织业这两个主要工业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与米卢兹的情况一样，在充满活力的、往往是新教徒出身的雇主的推动下，一些现代工业中心在上阿尔萨斯（棉纺和织物印花）和色当地区（呢绒制造）出现。银行或商业、制造业工厂依然是家族企业，它们从商业或工业活动中获得远甚于土地收入的利润。拥有这些企业的活跃的大资产阶级，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活力，难以忍受极端保皇派贵族统治社会的企图。将国家看作是维护个人自由创造性的渴望，使他们赞同《宪章》的自由主义运用。

《宪章》的宪政解释

从1818年起是使盟国占领军撤出所占领土的黎世留公爵内阁执政时期，1789年原则的拥护者和那些承认拿破仑时代国家重构成果的人，所依赖的是国王的权力；其中最活跃者组成一个名为“空论派”的小团体，虽然他们在议会中无所依靠，而且尽管名为“空论派”，实际并无明确的理论，但是他们始终关心如何将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环境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包括罗瓦耶－科拉尔、卡米耶·若尔当、基佐在内的空论派对多位大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几位大臣分别是：黎塞留公爵内阁的内政大臣莱内，掌玺大臣塞尔伯爵和警务大臣德卡兹，德卡兹后来还担任过内政大臣，虽然只是在1819—1820年间的几个月中被指定为首相，但却长期在政府中占据支配地位。随着1817年2月8日莱内法的颁布，他们的主张也取得胜利；与极端保皇派通过维莱尔所要求的两级投票法和降低获取选举权所需的纳税额不同，空论派主张一省一个选民团的直接选举，选举时所有年满30岁并交纳至少300法郎直接税（包括营业税）的选民们齐聚省首府。此种选举形式

对资产阶级有利，因为乡村选民们为了投票必须走出家门。

众议院议员任期5年，每年改选1/5。从1817年起，这一法律的首次实施就对极端保皇派不利，相反却使得当时人称“独立派”的一个包括25位自由派人士的小团体构成左派，这引起了那些最为温和的大臣们的担心。1818年3月12日通过的古维永－圣西尔军事法，规定了征召新兵的条件是志愿和抽签，并且可以雇人代替应征，这一法律一直沿用至1872年，它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另外，它还规定了军官的晋升标准，这使极端保皇派们感到不满，因为从此以后贵族不再能直接成为军官了。

1818年12月，由于德卡兹拒绝同意修改选举法而产生了一场内阁危机，并导致黎世留公爵意外地被撤职。在德索尔将军名义上的领导下，因其才智和灵活性而深受国王宠信的德卡兹，推行了一种机会主义政策；由于国王的恩宠而掌权的他，试图依靠左派的支持来继续执政。取消警务大臣一职是新内阁自由主义导向的象征；免除极端保皇派省长的职务，用前帝国官员取而代之，任命60位贵族院新成员，从而改变了贵族院的多数，使之有利于立宪政体，并且终结了修改选举法的要求，以及对发展物质利益的要求和路易男爵对财政的有效管理，凡此种种，都使得资产阶级转而支持政府。但是，使内阁的自由主义导向最终得到认可的却是1819年5—6月通过的塞尔新闻法。从此以后，新闻犯罪（其数量已减少）将提交由更为独立的业主组成的陪审团而不是轻罪法庭的法官们审理；创办一份报刊只需声明即可，不过仍还是有资金方面的限制：缴纳一笔依据城市不同而数目不等的高额保证金，以及依印数而定的印花税。通过布罗伊公爵、巴朗特和基佐制定的这些措施，政治报刊出版得以发展，这种政治报刊把法国政治生活建立在了皆为公共舆论体现的新闻出版和选举之间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之上。就这样，甚至在其功能得到制度保障之前，议会生活的基石就得以形成。在巴黎，在外省也，各种报刊不断增加，它们更多的是对极端保皇派右派和自由主义左派有利，而不是对政府有利。

591

德卡兹和空论派们也想将代议制扩大到地方机构，为此，他们打

算在招募市参议员和省参议员时引入选举制。但是，1819年的选举使得德卡兹停止了这一政策。9月的部分改选结果表明，不仅极端保皇派的数量有明显的减少，而且身为内阁成员的候选人也是如此，而左派则从中受益，赢得了近2/3的席位；格雷古瓦在格勒诺布尔的当选引起了轩然大波，他是前国民公会议员是曾经拥护《教士的公民组织法》的前主教，这表明对所谓恐怖时期的恐惧依然强烈。从那以后，争取到塞尔伯爵支持的德卡兹，转而赞成修订选举法，这使得自由派的大臣们和空论派彼此疏远，并使他在1819年11月担任了首相一职。德卡兹在提出能使极端保皇派感到满意的修改选举法上所做的无效努力，只能激怒自由派资产阶级。正是在舆论的这种不安状态下，1820年2月13至14日之交的夜晚，突然发生了刺杀贝里公爵事件，而后者是能够确保王朝连续性的惟一的国王侄子。

这一孤立的犯罪行为，是与几个月来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相关联的，它引发政界的恐惧情绪，并破坏了五年来为建立温和立宪政体而作的努力。国王在其弟阿图瓦伯爵和极端保皇派的压力下，被迫牺牲德卡兹，尽管后者已经和自由派决裂。当黎塞留公爵于2月20日组成新内阁时，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获胜的反革命与在消失或复兴之前已成为革命者的自由派左派之间不再有暂时的缓冲空间。

革命运动的失败（1820—1822）

刺杀贝里公爵所引发的反动浪潮使得大量反对派人士面对有关个人或公共自由的要求毫无成效时，重新转向非法和暴力的解决办法。在巴黎，青年示威者们——高等专科学校或法学院、医学院的学生，年轻律师和商业人士——聚集在波旁宫前，热烈欢迎自由派众议员，或是对右派演说者喝倒彩。一个名为拉勒芒的大学生于6月3日被一王室卫兵杀死，这一事件发展成为骚乱，并为军队所镇压。在雷恩、592 格勒诺布尔、卡昂和图卢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新闻审查使得最敌对的报刊一一消失；但是，诸如保尔－路易·库里埃所写的小册子、埃米尔·德布罗和贝朗热所写的歌曲，尽管有警方阻挠，依然在迅速传播。1821年5月拿破仑去世，一部分自由派转而鼓吹拿破

仑神话；波拿巴主义者、前共和派和青年自由派以拿破仑崇拜来反对黎塞留或维莱尔政府以及神圣同盟。从此以后，拿破仑被他们塑造成民族的保卫者，在他身上体现了大众的民族情感。

暴力反抗行为是由那些秘密社团组织的。在年轻的入市税征收员巴扎尔的推动下，青年共和派们与拉法耶特将军和瓦耶·达让松、马尼埃尔这样的著名极端自由主义者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这些青年共和派与拥护波拿巴王朝的军官们的关系逐渐密切，后者是加的斯军官或卡波利烧炭党起义式的军事密谋的信徒。原定 1820 年 8 月 19 日起事的阴谋的失败——只有一些次要人物被捕，虽然使得右派得以通过夸大革命危险来在随后的选举中增强力量，但是，它也使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们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由此，他们组建了法国烧炭党。烧炭党首先是由青年共和派（大学生或商业人士）组成，同时也包括一些律师（如巴尔特、梅里路）、医生、迪布瓦和茹弗鲁瓦这样的教师，以及米卢兹的克什兰这样的企业家。它由被称为“支部”的小团体组成；这些团体主要在巴黎、东部和西部地区。1822 年它已在 60 个省中出现；在它们之上，有一个领导委员会，由人数更受限制的委员会领导，拉法耶特虽然是领袖，但是巴扎尔、特雷拉这样的年轻人是其中最活跃者，他们推动其采取暴动行为。

在该组织的国家首领和急于行动的地方支部之间存在着分歧。只有那些最激进的人自愿领导起义，这些发生在索米尔、拉罗歇尔、科尔马、贝尔福尔的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逮捕，有 12 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贝尔顿将军、卡隆上校和拉罗歇尔的四位军士，这四位军士于 9 月 21 日在巴黎被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镇压并未涉及极左派众议员，他们在运动中所持的是妥协立场。

革命活动的失败使得烧炭党解体，而在阴谋活动中曾起核心作用的波拿巴分子的影响也随之消失。军事政变对法国政治发展已经不会再起什么作用。议会或是合法的反对派的缓慢重组，将以新一代资产阶级和自由派为依托。

《宪章》的保守派解释

刺杀贝里公爵、多个大城市中的大学生骚动、失败的密谋，这一切，都使得内阁和极端保皇派得以轻易地宣称，存在广泛的革命阴谋活动，并由此从不安的舆论中获取对采取确保保守势力胜利之措施的支持。1820年3月28日法令剥夺了阴谋嫌疑犯的个人自由；3月30日，新闻出版被重新要求获得事先许可，并进行审查；最后，6月30日的新选举法令建立了对各省中纳税最多的人（往往是贵族的大地产主）有利的双重投票制。这些措施，加之军队、政府和大学中进行的大肆清洗，以及利用贝里公爵的遗腹子——所谓"奇迹之子"的波尔多公爵的出生来宣扬支持君主制情感，都使得极端君主派和最保守人士在1820年11月的选举中获胜。路易十八和黎塞留公爵不得不将内阁领导权交给维莱尔和科比耶尔这两位极端保皇派首领，他们使得政府向右派倾斜，但后者依然不满足。1821年12月13日，黎世留辞职，因为日渐衰老、看破一切，并越来越听任身边亲信摆布的路易十八不再支持他，阿图瓦伯爵公开批评他，甚至众议院的请愿书也指责他。

593

新政府在阿图瓦伯爵的影响下组成，维莱尔任财政大臣，科比耶尔任内政大臣，蒙莫朗西公爵任外交大臣，这事实上意味着查理十世的统治业已开始（尽管路易十八直到1824年9月16日才去世）。维莱尔伯爵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政府首相，然而这并未使他所属的党派心满意足，因为后者觉得他过于温和。不过，正是在该王朝这一持续时间最长的内阁期间，法国国际地位的恢复和国家力量的增强得以实现。

外交地位的恢复

极端保皇派想恢复（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的统治，这是由于他们关注于将使法国成为反革命领袖的威望政策，并决心对自由的西班牙进行直接干预，而不是听任神圣同盟在西班牙行动，因为相关行动必然要穿越法国边境。在维罗纳会议上，尽管赞成维莱尔所反对的干预政策的蒙莫朗西已去职，但得到议会多数支持的新任外交大臣夏

多布里昂，却公开表示了法国的责任，并促使政府于1823年1月底和自由的西班牙断绝关系。由国王侄子昂古莱姆公爵指挥的法国军队的干涉行动，被说成是一项民族事业，而并非是神圣同盟的行动。法军很快攻进马德里（5月23日），在8月31日攻占特罗卡代罗要塞后，又夺取了加的斯，并释放了斐迪南七世，后者随即进行了血腥镇压。尽管有自由派众议员们的激烈反对（马尼埃尔正是因此而被驱逐出众议院的），占多数地位并控制政府的极端保皇派依然在1824年的大选中利用了法国军队的这一毫不费力的胜利；于是就有了“重获的议会”，其中自由派不到20席，而有一半以上的众议员都是听从政府指令的官员。来自左派的威胁解除之后，维莱尔只担心极端保皇派中最激进分子的不满，而夏多布里昂的被免职为他们提供了一位能面对国民的代言人。

国家力量的增强

尽管维莱尔在复辟王朝初期曾要求非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但是，在他自己担任首相期间却仍然推行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以政府官员作为其政策的工具，甚至还将国家控制扩展至地方政权。依靠其财政方面的才干，维莱尔使法国具有了一个现代和议会制的国家所应有的财政制度，但其他方面并未做相应的改进。他确立了预算规则，进而使预算专门化，在1822年至1826年间的预算中有了盈余。

受益于其前任的良好管理，维莱尔继续发行公债，并使其保持稳定；物质繁荣促进了间接税的增值，从而能够实施数次减税，这尤其减轻了地产主的负担。同时，它也满足了远征西班牙和补偿流亡贵族10亿法郎所产生的具有政治特点的开支。

贵族的反动

此前同时在议会层面（皮埃会议）和以隐秘形式（“信仰骑士团”）组织起来的右派，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宗教纲领，并试图利用流产的革命活动在公众舆论中所引发的恐惧而将之强加给维莱尔政府。事先，它就得以采取了巩固自己政治胜利的措施。1824年6月9日颁 594

布的七年任期法，确保了“重获的议会”能有一个较长时期。在要求官员们严格服从政治指令的同时，维莱尔政府将越来越多的法官和行政官员职位交给外省的贵族，这样就增强了极端保皇主义中的外省因素。大革命时期的流亡经历成为当时获取公职的一个能力标准。

维莱尔内阁认为舆论自由能够颠覆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因而对其甚为畏惧，对新闻出版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管理。自1822年起，有关报刊的诉讼被提交给轻罪法庭，后者比陪审团更为严厉；针对新闻出版的诉讼因为所谓的意向诉讼而变得便利，这就是并非控诉某一确定的文章，而是针对发表这一文章的报纸所体现的精神；这最终威胁到了那些并不完全听从政府的报刊的生存。

就这样，政府获得了为实施其纲领而消灭一切反对派所必须的手段；首先是巩固贵族的优势地位。这些贵族并不甘心丧失在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而国有财产的拥有者们也担心索回要求。维莱尔提出一项对其财产被没收和变卖的逃亡者加以补偿的计划；经过一年的讨论，达成了1825年4月28日法令，它给与这些逃亡者3000万公债（这意味着大约6.3亿的资金，而不是传说的10亿）；这一法令高估了属于那些前国有财产获得者的地产价值；但是，那些贵族很少用公债购买土地，而这曾是维莱尔所希望的，因为其关心的就是增强作为社会等级制基础的大地主的力量。出于同样目的，他于1826年提出一项恢复长子继承权的计划，但被贵族院议员们否决。这一政策似乎对源自大革命的新社会制度产生了威胁。

宗教反动

上述的贵族反动依靠了天主教会所具有的优势地位。1825年5月查理十世的即位和兰斯加冕，恢复了旧制度下的宗教和君主制的盛大仪式，并唤醒了民众热情。由大贵族组成的主教团控制了法国教会，并恢复了法国天主教传统，即将对民众意识的培育和控制交给教士。弗雷西努主教，起先是帝国教育团总监，后于1824年任宗教大臣，利用拿破仑时代遗留下来的教育垄断而试图将教育重新置于宗教影响之下；教士被任命为初中校长；主教依据1824年4月8日法令，可授予

任教许可证，并有权对初等教育进行监督。那些小神学院得到特别关照，其中有一些系由耶稣会士领导，尽管耶稣会在法国还在被禁止之列。

宗教事务危害了政治稳定，并导致了多数派的分裂。蒙洛西耶伯爵，一位拥护法国天主教会自主的老人，1826年间在多部回忆录中揭露圣会和耶稣会士。这位老贵族担心“教士帮”凌驾于君主意愿之上。

维莱尔希望通过良好的财政管理和物质繁荣，赢回因其所属的多数派推行的反革命政策所丧失的舆论支持。但是，1827年的农业和商业危机使得民众心生忧虑，并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其更容易地就接受了对政府“挥霍”的指责，认为政府应对财政困难负直接责任。以尽可能地减少大革命的遗产为目的的六年政治活动，其结局是政府在1827年的选举中遭遇失败，维莱尔也被迫下台，当然，后者也与极右派的“背弃”、宫廷阴谋和自由派的反对有关。通过牺牲维莱尔这个替罪羊，就使得国王威望未受前者不得人心之影响，此后，查理十世将对与新法国愿望相悖的政策负直接责任，期间曾经历短暂而无效果的马蒂尼亚克内阁。 595

二、新愿望

维莱尔的最终失败并不只是经济和财政困境的结果，或是在党派压力下妥协的当局权力衰退的结果，而是表明完全回到旧制度，或是完全与主流舆论相逆的政府统治都是不可能的。

从1824年选举至1827年选举期间，在选民和形成公共舆论的仍很狭隘的社会阶层中发生了一场深刻转变；新一代的思想、情感及其表述语言都已焕然一新。

新一代

在1827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已在政治经济学中引入统计学的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和自由派众议员夏尔·杜班，指出法国2/3的人口

出生于 1789 年之后，甚至自 1824 年以来，选民（只包括年满 30 岁的男子）中的多数是大革命开始时还不到 20 岁的人，而且其数量还在不断增长。依据这一人口统计学事实，他得出更为一般的结论："新一代人观念的特点是尊重法律并且对我们生产与商业力量的需要表示同情。"同时代的自由派已感觉到法国社会中的深刻变化。新一代——在老左派和空论派试图调停王朝并对《宪章》进行进步主义应用时的失败或是无效努力中，还没有到承担政治责任的法定年龄，但是已经参与或至少是目击了相关活动——已经成人。当各代人将他们过去的对抗又在现实重演时，这一代新人渴望没有恐怖的自由、没有不宽容的秩序。这一代人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他们将使意识形态、文学和政治焕然一新。诚然，如果将之与缺乏生气的大众相比，或是与当时统治阶层或有文化的阶层相比，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他们的愿望，就会发现他们是占支配地位的少数派，他们将推动社会的发展，尽管当时乡村的和僵化的法国步履沉重。

思想的激荡

多为法学院或医学院学生、商行职员的新一代摒弃旧习，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导师，或是在官方认可的名人之外选择。

圣西门伯爵（1760—1825 年）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他使自由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自由主义并非往往是新教徒的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由派的自由主义——其灵感来源是个人主义者和说教者——而是 18 世纪的自由主义，即亚当·斯密恢复了劳动价值的作用的自由主义。他构思了一个以"工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预感到了法国尚未经历的工业社会。在《工业家问答》（1823 年）一书中，圣西门竭力提倡削弱国家，并主张以"生产者"的统治取代传统政府。此后，他在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1825 年）中，关注于通过引进一种以追求幸福为基础的新道德来改革宗教；他反对神圣同盟，主张民族之间的联合，由此预见到了欧洲议会。他的思想影响了一批青年精英，由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金融家和学者组成的这批人于 1825 年创立了《生产者》杂志，并强调劳动组织的作用。

596

热尔贝和萨利尼这两位年轻教士于1824年出版的另一著作《天主教回忆录》，标志着在拉默内修道院院长影响下传统主义思想的革新。面对革命遗产，拉默内批判了个人主义；在《论对宗教的冷淡》中，拉默内的浪漫主义将信仰与理性相对立，以使其获得普遍赞同；这就是他所称的一种新的反宗教改革，并说为此可对教皇和人民寄予信任。

最后，这一新兴时期的第三种潮流是自由派机关报《环球报》所体现的思想，该报在1824年刚由皮埃尔·勒鲁和迪布瓦创办，其撰稿人中包括司汤达和梅里美；它的撰稿者共有50多位，他们在10年或15年之后将进入议会（如夏尔·德·雷缪萨、迪沙特尔）、担任高级公职或是进入法兰西科学院（如圣伯夫）。在追求自由和进步的共同意愿的激励下，他们深受维克多·库赞的折衷主义唯灵论和基佐的历史哲学影响；尽管他们是对《宪章》进行自由主义应用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宣称“并不依赖任何导师的话语进行思考”（雷缪萨）。只采用合法手段对自由派运动进行重组的思想即源自于他们。

新的感觉：浪漫主义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主导1815年之后法国的反动行为的并非复辟。在之前的19世纪头25年中，在思想层面，18世纪的理性主义得以延续，在形式层面，古典主义确立的规则继续存在，这一切使得人面对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震动，以至于反革命只可能是革新者。针对既是革命的又是古典的理性主义的反动，使得一种新的形式和语言出现。在法国，它的形成更晚，不过却比英国或德意志更适宜称之为“浪漫主义革命”，因为古典的希腊—拉丁传统曾经在诗歌、戏剧和艺术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浪漫主义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这是动荡世界中的一种新的不因循守旧。突然从传统框架中解放出来的人的这种不安，产生了一种表达怀旧情绪、“世纪病”的个体激情的文学。在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的预告下，浪漫主义斗争在嘈杂声中强行传播新的口味：首先是在绘画中，1819年展览中席里柯的《美杜莎之筏》；随后在文学中，1820年拉马丁《沉思集》的出版；再往后，1830年，在戏剧舞台上，

维克多·雨果深受欢迎的《埃尔那尼》，而在音乐领域则是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通过与古典规则相决裂和将各种形式融合到一起，浪漫主义文艺团体形成自己的理论和宣言；浪漫派不再在人身上寻求自己的理想，而是在表述和解释社会的那些原则中寻找；由此，维克多·雨果1827年在《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出一个与过去决裂的青年法国的宣言。

对绝对的渴求和浪漫主义想象，首先是通过对改变了最不为人所知的过去的世界的解释而得到满足。在德意志浪漫主义的影响下，“野蛮的”中世纪被发现是一个信仰、幻想和激情狂热的时代。浪漫主义是反理智主义和反理性的，重新发现了情感的力量，而此时正是拉默内的宗教信仰也显露出反理智主义的时代。来自《欧洲检查者》、《密涅瓦》，尤其是《立宪报》的自由派的敌对，促使法国浪漫主义初期的天主教和极端保皇派特点显现无疑。但是拒绝现实，以及连带地寻求有关美、真、正义的新观点，使得浪漫派对生命中各个领域的自由都大加颂扬。《克伦威尔》剧本的序言就标志了从浪漫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一转变，同时并没有中断传统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艺术中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这是所有彻底的和有逻辑的人应该追求的双重目的。我们已走出陈旧的社会模式。我们怎么会走不出陈旧的诗歌模式。”此后，浪漫主义对现实的拒绝转向了未来，诗人应该成为民众愿望的指引者；青年思想家或是艺术家似乎接受了司汤达的思考：“这一代人没有任何要延续的，他们一切都是创造”。但是，浪漫主义并没有停留在自由主义；它的不因循守旧使其在1830年以后成为革命者、民主主义者、爱国者和社会主义者。它渗透进小说、历史、宗教和社会问题中；它传播了这一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信念，即进步并不停止，它通过跳跃、危机和革命而前进。当它从自己的神秘主义和空想特点中获得了使大众的或是民粹的浪漫主义——数年后由欧仁·苏或乔治·桑所代表的——产生的灵感时，它将这一特点赋予乌托邦社会主义，即圣西门主义与傅立叶的社会主义。

597

浪漫主义使其所处时代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得以发展，由于拒绝相

互妥协，因而它加剧了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它提出一种关于现实的悲剧观，夸大荒诞，丑化资产阶级。它将1832年霍乱引发的恐怖夸大为镇压骚乱的严酷；杜米埃的《特朗斯诺南街》即是例证。它促使人们认识到工人的苦难。

浪漫主义也形成了一种史诗观。夏多布里昂和维克多·雨果对亲希腊运动有贡献，画家德拉克洛瓦也是如此。浪漫主义氛围形成了对于1830年以后的波兰人以及那些渴望解放的民族的同情。它尤其促进了拿破仑神话的充分发展；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和画家们所颂扬的皇帝崇拜，事实上是民族情感的大众表达。

在德拉克洛瓦以及后来为维克多·雨果辩护的巴尔贝斯看来，1830年起义者是值得钦佩的人物，他们是浪漫主义英雄。但是，1830年以后对外省感到厌倦、忠于贝里公爵夫人——其1832年的鲁莽行动有如一场情节剧——的青年正统派，在文学表达中找到了对现实的拒斥；与资产阶级的“中庸”政策不同，这些青年人中的一部分只热衷于谈论“现实的恐怖”。但是在1830年前夜，青年一代还没有耗尽热情。他们不再想要传统。

不可能的传统与波旁王朝的垮台

青年自由派，作为“自助者，天助之”社的推动者，已对1827年选举中反对派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选举产生的多数派，足以迫使维莱尔辞职，但却不能支撑一个实施更为自由政策的内部一致的政府。新任内政大臣马蒂尼亚克调解资产阶级和查理十世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国王随即将其免职。

1829年8月8日组成了新内阁，其中包括波利尼亚克亲王——其名字使人想起即将逝去的旧制度所犯的错误，曾在战场上抛弃拿破仑的布尔蒙伯爵，以及拉布尔多纳耶—— 一位最狂热的极端保皇派，这仿佛是在挑衅。1830年3月2日，当国王宣布议会开始开会时，他在国王演说中公然威胁众议员们道：“如果应受谴责的行为对我的政府产生了我所不想预见的障碍，那么我将动用武力克服它……”众议院依惯例在会议伊始所作的回应致词是一强有力的反击：“毫无理由地

598 猜疑法国的情感与理性，是今日政府的基本思想，这使得你的人民深受其苦。”这一致词得到221位众议员的多数支持而获通过。震怒之下，查理十世解散了众议院，并求助于选民，因为正是后者决定了内阁的候选人。他希望因针对阿尔及尔的惩罚性远征而得到满足的民族自尊，能使其与选民的意见相一致。5月底进行的这一干预行动，还与这样一种军事胜利的愿望，即以国际道义的名义制服柏柏尔人海盗行径的愿望相吻合。

选举于6月底展开，而在巴黎和大城市中甚至延迟至7月。已展开支持在致词上签名的221名众议员（几乎全部重新当选）的反对派力量再次得到增强：成为拥有274名众议员的多数派，而属于政府派的只有143人。由此遭到否定的是政府而不是国王的权力。然而，查理十世将这一结果看作是对自己权力的反叛。有关路易十六的让步的记忆、确信革命力量和复辟力量间意料之中的冲突具有全欧意义——这是巴黎众多使节之共识，以及宣布夺取阿尔及尔（7月5日突然攻占），凡此种种，加速了国王的决定。发给内阁的各项报告使人相信存在一个巨大的阴谋；《论坛报》、《国民报》之类的反对王朝统治的报刊的出现，加深了这种不安。

七月敕令和光荣三日

7月25日，也就是在一份强调革命威胁以及被指责为“混乱和暴动之工具”的新闻出版的危害作用的报告出来之前，四项敕令中止了立宪政体，取消了最近选举的结果，调整了选举制度，并对新闻出版进行严格审查。运用（《宪章》）第14条有如一场政变；但是，因为选举而尚处于分散状态的议会反对派，首先是觉得惊愕。巴黎的一些自由派众议员在其中的一位银行家卡西米尔·佩里埃家聚会，但也没有立即做出决断；26日，正是一些记者与梯也尔在《国民报》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提出了第一份抗议书；在同一地点，一些巴黎选民集会，并考虑拒绝纳税。

对敕令的有力反击来自于民众的反抗：在动乱的三天，也即1830年7月27、28、29这“光荣三日”里，巴黎骚乱变成一场革命，迫使

查理十世退位，其王朝也被驱逐。青年学生和印刷工人领导了群众集会，那些工厂在骚乱伊始就已关闭。工人们的参与使这些集会的规模得以壮大；甚至有时，如果他们去游行示威，其老板们还会愿意支付他们的日薪。巴黎街区筑起了街垒，如圣马尔索区、圣安托万区、圣德尼门和圣马丁门。任命不得人心的马尔蒙元帅为军队首领则进一步加剧了不满情绪；应该撤走军队，让起义者成为巴黎的主人。前往镇压的军队受到了青年共和派所主张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打出的三色旗的影响，他们事实上已与闹事者友善相处，而在后者中也有一些拿破仑军队的老兵。

一场革命始终是以当权的政体崩溃为第一阶段的；在巴黎起义的攻击以及第一次革命之记忆的困扰下，查理十世很快被事件的发展抛在身后，他所采取的各种让步措施——撤换波利尼亚克、收回敕令、任命奥尔良公爵为摄政官，最后就是他本人于 8 月 2 日让位给其孙波尔多公爵——都已为时过晚于事无补了。8000 至 10000 名起义者已然推翻了王权。但是，革命的胜利果实并非总是由革命者来获得。权力的真空并没有由青年共和派或波拿巴派予以填补，后者希望以国民卫队临时指挥拉法耶特将军为首领。在一段时间的犹豫之后，一些自由派众议员决心组建一个有拉菲特和卡西米尔·佩里埃参加的市政委员会。7 月 30 日张贴出一份支持奥尔良公爵的匿名布告（事实上是由梯也尔起草的），它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在自由派众议员看来是避免恐怖代名词的共和国的最后希望。构成一个真正的临时政府的市政委员会，于 7 月 31 日任命奥尔良公爵为王国摄政；同日，拉法耶特在市政厅阳台上将奥尔良公爵介绍给民众。通过这一重续 1789 年传统的象征行为，拉法耶特维持了国家的君主制统治，并使得共和派的目标落空，后者曾经只寄希望于他本人。在获悉民众进军在即时，查理十世先是退到朗布依埃，然后前往瑟堡，在那里他登船逃往英国。

599

不可能的革命与路易－菲利普的即位

奇怪的革命：对解散敕令自然是置之不理的议会两院，于 8 月 3 日召开会议，而这是原先由查理十世确定的开会日期。会议伊始即宣布王

位空缺；随后，在最激进的自由派的压力，同时也是在街头持续动荡的压力下，众议员们决定修改宪章，并交由布罗伊公爵和基佐负责。一切都进展得非常迅速：8月7日，修改完的宪章和指定奥尔良公爵为法国人的国王在议会进行表决，结果是众议院219票赞同，33票反对（众议院共有430位众议员），贵族院89票赞同，10票反对。8月9日，路易-菲利普一世来到波旁宫宣誓效忠《宪章》，以此作为加冕礼。

由此，革命就将一位57岁男子扶上已不再属于波旁王朝的王位，而当时的歌曲作者和漫画家热衷于将此人描绘为一个和善、精打细算的资产者。他的自由主义名声源于其出身。他的父亲是赞同处死路易十六的国民公会议员，与吉伦特派一起被送上断头台；他本人曾加入革命军队参加战斗，他参加热马普战役一事屡被提及，以至很快变为陈词滥调。随后，他流亡于瑞士、美国和那不勒斯宫廷，正是在那不勒斯他娶了玛丽-阿梅丽公主为妻。他与复辟王朝的反革命政策保持一定距离，并且自1815年其名字在某些掌玺大臣那里被提及以来，就被怀疑具有篡位野心，他的晋升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后者相信这位“国王公民”代表了自己。他的家庭生活、其就读于王家中学的诸子的青春活力，以及其长子（在七月革命后获得奥尔良公爵头衔）因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风流韵事和喜爱炫耀而深受欢迎，这些都使得路易-菲利普为巴黎资产阶级所接受。国王能够听取公众意见，这使他在统治初期能够采取人们所期待的行动。他首先注意将那些在1830年底仍占据街头的革命者中保有影响力的人拢聚在身边：拉菲特，拉法耶特，奥迪隆·巴罗；随后，他又通过将拿破仑崇拜官方化来满足民族自尊心的需要。但是，我们此后将看到，这种与公众舆论相妥协的能力，在未来将成为他的弱点，因为这使得他口是心非，并且扭曲了议会制。

事实上，七月王朝的模棱两可在其伊始就已显露无遗。支持查理十世的正统派的无能（其对于自己君主如此迅速的垮台惊愕不已），以及共和派或波拿巴派的无能（其未能推行自己的决定，掌握唾手可得的政权），并没有隐藏1830年8月起在新王朝的支持者中出现的深

刻分歧。七月革命的两种趋势、两种解释在8月11日路易—菲利普组建的第一任内阁中就已体现出来。“抗拒”派——并不是1849年秩序党的鼻祖，因为它缺乏教会和大地产主力量的支持，后者绝大多数都是正统派和持敌对态度的——还依然满怀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对于它来说，1830年7月并没有发生什么革命，而只是对查理十世之敕令所体现的政变的有力反击。它以布罗伊公爵和基佐为理论家，卡西米尔·佩里埃为领袖，《辩论报》为喉舌，大资产阶级为拥趸，后者关注于理性进步、经济扩张，以及依据财富多少来限定政治责任；这一派别“因为波旁王朝”而接受路易-菲利普，它的纲领是与以前众议院中占多数的221人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相一致的。 60

对于运动派——改革主义运动——来说，确实存在一场1830年革命，1830年的改革或是已经承诺的那些改革只是迈向公共生活更大程度的民主化的起点。它想保持与民众运动的联系以避免任何反革命威胁，而它的拥护者们对向法国发出帮助请求的外国民族抱有同情心。作为年轻一代的成员，如奥迪隆·巴罗，或是像拉菲特、拉法耶特那样受民众激情感动和受他们的名望驱使的自由派领导人，他们都依靠民主和爱国情感，而这些正是在巴黎、各大城市和法国东部地区激励小资产阶级和国民自卫队的情感。《国民报》和阿尔芒·卡雷尔依然是他们的主要喉舌，而且受益于查理十世下台之后所出现的政治报刊出版的飞速发展，他们得到了巴黎乃至外省绝大多数报刊的支持。但是，在众议院里他们还是少数派，为此，他们想予以替换；不过，当维系一个分歧重重的内阁已无可能时，正是拉菲特于11月2日成为政府首脑。曾经确保了政府地方官员更新的基佐，以及恢复了与他国的外交关系的莫雷，虽然都促进了新政权在各省的确立，但是，由于他们在巴黎甚是不得人心，从而只能自愿隐退。

革命力量与民主愿望

对于未能从胜利中获益的青年共和派来说，革命并没有结束。他们尽力试图重演第一次革命：这体现在先后于1830年10月和1830年

底对查理十世的大臣们进行的诉讼过程中；1831年2月洗劫总主教府；再晚些时候，因霍乱而引发的不正常的骚动，使得拉马尔克将军的葬礼演变为1832年6月5日至6日的骚乱；最后，1834年4月，里昂和巴黎的共和派发动起义，反对旨在限制各种协会和严格维护秩序的新法令。

这一革命骚动，直至审讯4月起义的参加者和1835年9月禁止一切共和宣传才终结，其推动力来自于一部分资产阶级青年、大学生和青年雇员，他们对与墨守陈规和强调稳定的思想决裂的各种新观念都持接受态度。他们惯于不承认法律，首先是1830年的法律，随后是拉菲特内阁时期的法律，认为它们含糊不清且会迅速过时。虽然共和派协会很快衰退，但是，它们通过在巴黎、里昂和法国东部地区动员起数量越来越多的参加者而面貌一新：成立于1830年之前的“自助者，天助之”社，藉此变得激进，其影响涉及到35个省；“人民之友”社，更为巴黎化和充满社会关怀，尤其是“人权”社自1833年起，倚仗雅各宾传统，将自己的小组命名为“罗伯斯庇尔”组、“巴贝夫”组、“1月21日”组，但同时也满怀社会主义愿望，而这种社会主义愿望系由圣西门主义者不无纷乱地体现出来，并由傅立叶主义者加以普及。由此，劳动组织、限制私有财产、累进所得税等思想渗透到共和派小组中，这些小组自阿尔萨斯至罗讷省聚集了约1万名成员（其他省份有同样数量的成员），他们都是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期待着从巴黎传来口令，但未如愿。因为共和派只是通过共同拒绝（自1832年起的）七月王朝及其内阁政策而团结在一起的；其领导人在原则、方法、组织上的分歧使得青年成员的热情逐渐衰竭或是消耗殆尽。1830年的青年共和派，被享有政治权利的资产阶级孤立在外，后者被他们报刊的极端言论所吓坏，遂转而投向保守派。与此同时，他们也孤立于大众阶层之外，因为他们理论的不明确甚至矛盾使其根本无法吸引后者，因此，尽管这些共和派具有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但依然是狂热的个人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革命往往是一场游戏，即使他们为革命牺牲了亦是如此。1835年以后，最坚定的共和派将在更易受

601

并没有现实牢固基础的乌托邦影响的秘密社团中，继续保持革命热情，甚至更加激进化，而这一热情到1848年时重新显现出具有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色彩。

议会制的建立

修改后的宪章已将立法提案权赋予众议院，此后，它将和国王共享这一权力，而拉菲特内阁时期制定的多部法令使代议制得以发展：1831年4月19日法令将选民获得选举权所需的纳税额降至200法郎，众议员由各选区选举产生；1831年3月21日市政法将选举制扩大到市镇议会成员的选拔中，由此就将这一层面的投票权给予了两百多万公民，这些人都是每个市镇中纳税最多的人；1831年3月21日法将国民自卫队向所有纳税人开放，此后他们能选举自己的军官。1833年6月25日的另一部法令将选举制（始终是纳税选举制）扩大到省议会的选拔中。废除贵族院中的世袭制，减少它对内阁所具有的独立性，这一切都增强了众议院的重要性。新领导人希望在正统派反对者——1832年贝里公爵夫人（正统派的王位觊觎者的母亲）的未遂尝试同时显示了他们的影响和弱点——和共和派骚动之间建立一个“中庸政府”。正统派反对者有一个他们无法执行的计划；而共和派骚动虽然体现了一种力量，但是也看来它无法带来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

拉菲特内阁不得不在各种困难中挣扎。它无意间促进了部分革命力量的意志消沉，并通过展示实施更为自由主义政策的不可能性，而使得1831年3月13日卡西米尔·佩里埃上台成为可能。通过这一新内阁，在卡西米尔·佩里埃病逝之后则是1832年10月11日组成的汇集布罗伊公爵、基佐和梯也尔的内阁，自由派资产阶级掌握了权力，并寻求在秩序和自由之间保持平衡。新一代——当他们还没有投票权时，他们在复辟王朝时期的自由派小团体中得到锻炼——占据了正统派退出或是被清洗所留下的空位；他们获得国家和议会职位时一般更为年轻，占据的时间也更长，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也逐渐具有保守特点。掌权的法国自由派保留了中央集权的本能，并且继续给予政府以主导作用；面对当时的各种困难，他们提供的是

政治解决办法，但是，他们将法国的利益与那些政治团体的利益相等同，而后者从其依据纳税额角度的界定来说，本质上是社会的。

社会问题

混乱局面的持续，报刊、文学和思想——包括在拉默内焦虑性格下的宗教思想中——所反映出的不安，对最为自由化的制度、国民自卫队和市镇选举很快感到不满，凡此种种，都表明 1830 年提出的政治解决措施并没有解决七月起义所提出的问题。确实，其他困难也显现出来：针对资产阶级与贵族冲突而制定的解决办法使得资产阶级分裂；资产阶级是由不同利益、情感和心态的人组成这一点已昭然若揭。当大中资产阶级保有政治控制权，并争夺国家职位时，小资产阶级和青年大学生（尽管也出身资产阶级）在大城市的群众中唤起了对显贵权力的抗议。

602

经济困难

失业将没有工作的劳动力抛至巴黎街头，这些人在骚乱中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在七月起义之后，他们的数量仍在增加。从外省各处都发来有关商业萧条、工场或建筑工地关门、乞讨与贫困现象增多的报告。由于害怕战争和银行倒闭——从拉菲特的银行开始——而出现的对外贸易的混乱从巴黎传播到了外省，使已不稳固的信贷和整个商业陷入瘫痪，危机大大恶化了，尽管这一危机是发生在革命之前，但它显得好像是革命的结果。政府与市镇当局不得不进行干预：发放救济品、开设慈善工场、支付商业贷款。间接税继续存在；由于收入下降，负担变得更为沉重。

社会动乱

自 1830 年 8 月起，罢工、砸碎门窗或是捣毁机器（在鲁贝、南特以及稍后的圣艾蒂安）、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发生的针对外国工人的运动，都体现了对受到机器和外国劳动力竞争威胁的工作的艰难维护。拥护新政权的新闻界指责正统派或是“教士党”的秘密行为。1830 年 9 月 6 日，为了维持自己的薪水和将日工作时间固定为 12 小时——当

时是14至15小时，达内塔尔的纺织工人甚至逼退了国民自卫队。

但正是1831年11月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最为悲剧性地揭示了工人的苦难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后者将“以劳动求生存，抑或战斗而死”作为口号。这一运动起初没有任何政治动机，而是因为丝织业中的手工业者有关报酬税率的要求，这些人虽然是依赖于批发商获得原材料和销售他们的产品，但是仍然是自己劳动的主人。已组成互助社的克洛瓦－卢斯区的这些劳动者，在守卫街垒时曾经从省长那里获得对税率的承认，但省长很快被免职；在5天的时间里，他们控制了政府当局和军队已撤离的里昂市，他们没有实施任何抢劫，也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对军队的回归造成任何障碍。“威胁社会的野蛮人并不在高加索或是鞑靼大草原上；他们就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区里”，《辩论报》如此总结道，并且指出在那里存在“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这些最早打出黑旗的人，他们起而反抗更多的是出于抗议自己地位低下而进行的维护自尊的行为，并不是由于饥寒交迫。

1832年霍乱

霍乱在因经济危机发展而营养不良的人群中肆虐，由于它影响的是过度集中在拥挤的城市中的人群，而且它在那些已然通过起义展示自己的力量，但却没有改善生活状况的人中持续了很久，所以显得尤为动荡不安和猛烈；正如《悲惨世界》中的巴黎的景象，在此书中，维克多·雨果描述了各种人间苦难。法国的其他地方也未能幸免：波尔多、里尔、马赛都遭受了瘟疫，随即出现灾难和骚乱；但正是在巴黎（在那里，霍乱不仅席卷了圣阿瓦耶街区和骚乱者的街道，而且首相卡西米尔·佩里埃也染病身亡），瘟疫最为充分地揭示了使资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生物学和社会层面的敌对。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霍乱是该归咎于工人们的一个额外灾难，工人们被指责应对由持续骚乱所引发的商业萧条负责：面对瘟疫，资产阶级最后的解救办法就是逃离巴黎。虽然1832年4月初因此离开首都的资产阶级只有几百人，但是这足以加剧了人民群众的想像，后者正在寻找责任者，指责当局

603

人士投毒，而教士或正统派报刊则急忙宣称，这是上帝的愤怒和对革命的惩罚。由此，不理解和仇恨不断加深，骚乱也在6月转变为起义。1832年的霍乱和骚乱进一步增强了资产阶级对劳动群众的不信任，觉得后者有朝一日将可能成为危险阶级。

贫困

法国此时尚未走上由铁路建设推动的迅速工业化道路但其负面效应之一却已显现。流浪的失业者，霍乱患者或是贫民，不再是慈善事业中的“善良的穷人”；贫穷不再是基督教社会中一个不可避免但又值得尊敬的组成部分了；相反，贫困成为一个社会缺陷，它使资产阶级社会感到不安，并且威胁到城市预算，因为它是一个集体现象。在统治阶级中最早注意到工业进步与工业劳动者的迅速贫困之间存在的这种脱节的，往往是天主教徒正统派，他们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穷困的发展归咎于自由派意识形态、七月王朝政府和商业资产阶级；维尔纳夫-巴杰蒙子爵，复辟王朝时期曾任诺尔省省长，于1834年出版了《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或是有关法国与欧洲贫困问题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他阐明了马克思将称之为“封建社会主义”的思想，提出了“针对资产阶级的起诉状”。

对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说，贫困的扩展是由精神原因引起的，为此，它鼓吹精神解决办法——发展宗教教育，这属于不会动摇社会体系的解决措施。但是，这一措施仍然非常依赖企业主个体的自由创始精神，而且，它是与严格运用立法和司法工具以确保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统治结合在一起的。不过，工业无产阶级在1830年的法国尚为数甚少，米卢兹、里尔、鲁昂等地无产阶级的处境在维耶尔梅博士调查之前仍然鲜为人知。旧经济体制中的一些古老职业，尤其是建筑工人，依旧构成了群众骚乱的主力军。

艰难的和平

复辟王朝政府垮台之时，正值其刚刚通过促进新希腊王国建立、征服阿尔及尔以迎合关注军事威望的舆论而增强了自己的外交声誉。

它的倒台还是一场民族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的结果。1830 年初创办的一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新报纸《国民报》如此自称，梯也尔是其最初的编者之一。在革命发生后不久，“爱国者”一词重获其在第一共和国时代的流行地位：法国的例证已然撕碎了 1815 年的欧洲法令，并且推进了维也纳会议曾经感到不满的活动。自其伊始，比利时起义就得到了七月革命者的大力支持。

爱国者的失望

604

1830 年 11 月底的波兰起义和意大利骚乱在法国激起了广泛同情，这使得新政权面临采取何种政策的棘手问题。其王权源自于那场不甚符合众多欧洲君主，尤其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意愿的革命的路易 - 菲利普，已经由于巴黎街头持续的革命骚动而得到各个宫廷的支持，后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担心共和国的来临。“奥尔良始终不过是个无耻的篡位者”，沙皇在致其兄弟的信中如此写道。路易 - 菲利普——从一开始就在外交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和他的外交大臣，先是莫莱，然后是塞巴斯蒂阿尼将军，致力于使欧洲各国政府相信法国的和平意愿。但是，群众游行示威和绝大多数巴黎报刊所具有的民族主义思想，仍然使得法国被认为应对欧洲骚乱负责。因为法国政府并不想冒与共和派骚乱所引起的好战激情过度抵触的风险；它对其他国家内乱的不干涉政策只能是在所有大国也奉行这一政策时才得以实施，例如波兰起义就是如此。尽管舆论压力很大，但法国并没有进行干预，而是满足于为大量流亡的起义者提供避难所；这些波兰移民促进了沙皇俄国在法国的进一步不得人心，并且通过钢琴家肖邦和诗人密茨凯维奇而使浪漫主义焕然一新。

然而，当 1832 年 1 月奥地利重新占领罗马涅以镇压烧炭党人暴动时，卡西米尔·佩里埃（尽管是保守派）不顾路易 - 菲利普的担心，坚决派遣远征军前往安孔；这一举动并非支持革命运动，而是抵消梅特涅的干预。虽然 1831 年 8 月法国军队已经干涉过比利时，但那是在国际法规的框架内进行的。1830 年底后不久，年轻的帕麦斯顿和年老的塔列朗就在伦敦召开外交会议，决定了比利时的命运。使合并谣言

破灭的路易－菲利普，拒绝了比利时国民大会提供给其次子的王位，转而接受英国心仪的候选人利奥波德·德·萨克森－科布尔，后者成为法国人国王的女婿。当法军进入比利时以迫使荷兰人撤出安特卫普时，这既是法国自由派舆论所喜好的民族理由的成功，也是一个意味着欧洲和平的成功，因为比利时问题的解决是通过并未在其中引发冲突的各大国实现的。

与英国结盟

比利时国家的建立已成为急于摆脱外交孤立局面的七月王朝所希冀的法英接近的契机，对于这种孤立局面只有青年共和派表示赞同，他们仍然怀念帝国、受浪漫主义梦想激励，希望通过战争和欧洲革命使他们的反抗延续并永存。

但是，七月王朝时期的法英和解——人们有时甚至称之为第一次法英协约——是一个不考虑两国公共舆论的政策设想。因此，同盟依然是不确定的；政治与经济对抗继续使得法国与英国在西班牙、希腊和东方等地产生利益冲突。拿破仑神话的充分发展使得民众对“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的敌意继续，而对奥康内尔和爱尔兰的浪漫主义迷恋进一步激起了敌视英国的情绪。在公共舆论和保守派领导人所影响的舆论之间存在着罕见的更大分歧，这些领导人确立了1688年英国革命与七月革命之间的相似性，并希望在政治体制（相对）相似的基础上建立两国同盟。以国家利益为托词的理由——尤其是空论派的理由——确立了一种既非革命也不好战的理性和自由的对外政策；但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也面临与此种政策相背离的危险。

605

阿尔及利亚或受限制的史诗

在并不很清楚该如何处置的情况下，新政权接手了阿尔及尔问题：“我们继续待在那里，是鉴于民族意愿而做出的一种牺牲”，莱昂·布隆代尔稍后几年如是写道，他在征服的头五年里曾任财政总监。但这究竟是征服还是占领？七月王朝并不担心惹恼对这一事业很不赞成的英国。而且，支持占有阿尔及尔的首要理由就是担心放弃它会被认为

是对英国的让步。赢得多数法国舆论对扩大征服的支持并不费力。占领奥兰（1831 年）、波尼，以及布吉、穆斯塔加奈姆（1833 年）已提供了一条沿海地带。尽管如此，“北非法国属地政府”的建立要等到 1834 年 7 月，含糊的表述反映了历任大臣和军事总督在仅占领海岸地区和深入统治内陆地区的选择上的犹豫不决。

另有一些难以使人感动的理由促进了继续占有阿尔及尔：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城市，主要是马赛，希望恢复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即插手新征服的军人们，将战争看作是获取和平时代必须很久才能得到满足的升迁机会；此后路易 - 菲利普的儿子们的介入，表明它可以使新王朝从这场当时法国军队进行的惟一战争中获取军事声誉，而这在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眼中是惟一真实的。这不仅是排泄好战激情的一个方法（路易 - 菲利普的大臣们往往被迫批准将军们在阿尔及利亚自行做出的各项决定）；首批警察局长之一博德，就曾在七月革命的参加者中招募了数千名新战士：“他们将原本可能在国内纷争中陷入歧途的勇气和胆量转而对付阿拉伯人”。就这样，通过避免采取明确立场，七月王朝政府几乎是在无意间将法国引上了现代殖民主义道路。

三、奥尔良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的种种矛盾

1834 年后革命震荡逐渐平息，仅剩下针对路易 - 菲利普的孤立的个人暗杀行为和 1839 年 5 月秘密组织“四季社”发动的失败起义。此后，七月王朝的主要困难来自于其自身。源于革命的这一政权，希望通过确保和平与繁荣来实现自身的稳定；但是，繁荣只可能产生于经济增长，而这是与当时虽进展缓慢，但却已动摇惯例和祖先习俗的工业化运动相联系的。由此，保守的政治演进与商业资产阶级——虽只代表具有政治权利的人中的少数，但却是其中最具活力的——的进步的经济发展出现了矛盾。

政治矛盾

消除正统派和共和派威胁已使得曾支持反对革命运动政策的议会

多数派精疲力竭；1834年6月的立法选举——共和派在选民中的支持率暴跌——虽然产生了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支持路易-菲利普的议会，但仍在采取何种政策上犹豫不决，导致不断批准相互矛盾的政策。选民团的狭小使得选票个体化，而且往往使当选众议员感谢几个富裕家族或是省政府。众议员中公务员所占人数越来越多，扭曲了议会机制。奥尔良王朝的政治是尤为机会主义的政治，这体现在它的不同方法，以及虽不断变化但往往由同样一些人组成的内阁上。内阁的不稳定（除了1836年底至1839年莫莱伯爵任首相期间）和议会不稳定(1837年和1839年议会在任期满之前被解散)，使得国王得以发挥对于议会制国家元首来说过于政治化的作用。正是他拥有的在莫莱首相看来是过度的个人权力，产生了反对莫莱的这一奇怪同盟，即在政府反对者这一边将奥尔良党的各派代表人物基佐、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联合起来；在1839年选举中这一同盟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就此形成一个内部一致的多数派。

606

国王的伎俩是否能够得逞，完全得视卡西米尔·佩里埃去世之后使主要大臣们相互对立的个人矛盾情况而定。由于对奥尔良派领导人和代议制不存在重大争议，这就导致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促进了个人冲突的产生，这些冲突更多的是利益之争，而非原则对立。当它涉及到基佐和梯也尔这样的在发生对立之前曾经长时间合作的人时，议会雄辩中的经典名篇遂应运而生。

在个人敏感性——比因为缺乏有组织的党派而得以延续的政治个人主义更为持久——之外，还有地区对立。领导阶层在以所有权的完全自由、意识形态分歧的减弱为基础的社会体系的价值问题上的基本一致，使得他们的经济和地区分歧变得更为重要。不过，在选民团中居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仍然受那些相互矛盾的愿望所推动；它既关心自由——使其与天主教会相对立的思想自由，以及使它与国家可能表现出来的相当有节制的朦胧愿望（例如在1841年有关童工劳动的法律的缓慢制定过程中）相对立的创办企业自由——同时也关心保护，也就是面对农民或工人骚乱以及外国竞争时的保护措施，甚至在经济

危机时期通过申请国家订单来保护他们免受经济困境的影响。

中庸政府的机会主义

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是这样一位知识分子，他并非出身于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居主导地位的显贵阶层。此人就是梯也尔，他是典型的“七月王朝人物”，作为来自马赛的记者，一位寡廉鲜耻的外省人，他因为《法国革命史》而大获成功，该书不仅给他带来财富，亦使他效仿起了革命者；1830 年以后，他曾同时支持拉菲特和卡西米尔·佩里埃的政策；任内政大臣期间，他下令逮捕了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使得正统派永远不会宽恕他；同时，也正是他促使摧毁共和派报刊的 1835 年 9 月法令获得通过。然而，1836 年和 1840 年他领导的两届内阁，表现出自由和议会制政府的样子。尽管梯也尔爱慕虚荣、能说会道，但是并未深陷于其所说的蠢话中不能自拔。他加速推行面向未来的政策；他明显关注舆论，控制《立宪报》，并且在掌权时竭力博取新闻界的好感。他懂得迎合民族情感，其领导的两任内阁——每次都以依赖更替的多数派的迂回曲折政策为特点——都没有被众议院推翻，因为两次他都通过表现为民族荣誉的捍卫者、不惜任何代价迁就主和派而成功地使自己被国王解职。最后，梯也尔——尽管起初针对铁路发表过令人不快的讲话——具有很好的商业头脑，预感到了工业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1836 年的第一次内阁，体现了通过公共工程和交通工具政策促进经济活动的国家意愿；迫使市镇当局承担养护地方道路的 1836 年 5 月 21 日法令即致力于此。1840 年，对缓慢产生的大资本主义加以支持的政策的显著表现是：法兰西银行的特权获得提前延长以促使它增设外省分行；通过不同法令为巴黎—奥尔良和巴黎—鲁昂铁路建设公司的股份提供最初担保；法国和美洲之间的轮船航线也已建立。始终坚持关税保护主义既反映了梯也尔赋予商业界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他从后者所获得的支持度。“梯也尔先生”，作为法国人中最不罗曼蒂克的人，利用了民众激情；七月王朝时期，虽然他反对任何选举改革，但是通过筹划将拿破仑遗骸运回国内，点燃了民族热情。他铤而走险并遭到失败——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失败，这是在

607

1840年，而他内阁的垮台使得王朝左派名誉扫地，因为他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已然连累了他们。老实说，他直至1848年还是一个暴发户，能够立即被他吸引住的资产阶级，已然不能认清自己；资产阶级还是过于接近地产，而梯也尔则无视农民。

乡村法国

1840年的法国依然是一个乡村占主导的国度；3/4的法国人生活在居住人口不足3000人的市镇中，而且在大多数省份（86个省中的57个）里，此后十年中也鲜有变化。虽然法国农民往往是地产主，但是，他们的土地经常是被分成一小块（1842年有1150万份土地），总是不足以养活自己，因而他们得作为佃农——分益佃农或是日工——利用属于资产阶级或是贵族的土地。后者虽然1830年后已被排除出政治权力，仍继续在外省社会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拥有相当数量大地产主的西部或是巴黎盆地省份更是如此。有时甚至与1789年之前相比，地位反而获得增强，例如马延省就是这样，而它在整个奥尔良王朝政府体系中的缺席，导致相当一部分正统派贵族退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将新的作物和耕作方法引入其中。在1840年法国纳税最多的512人（当时地产税是统计获得选举权所需纳税额中最为重要的税收）中，有300多人是贵族或是姓氏中有贵族标志的人。与特别重视购买新土地的小地产主不同，非农民的地产主拥有更多资金，并将它们投入于购买工具或肥料。农业工具的改进——马迪厄·德·东巴斯勒有详尽阐述，对硅质土地施用石灰、对过于湿润的土地进行排水，这些往往是在农学会和农业促进会推动下采取的活动，使土地取得了更好的收成。糖甜菜的种植在佛兰德尔、诺曼底和利马涅等地起到了刺激作用。最富裕的地产主，尤其是诺曼底和中西部地区的地产主，他们在养牛业上的利益增强了保护主义；未来的布若元帅，一位来自多尔多涅省的大地主和众议员，在众议院中成为牲畜进口关税的坚定的且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维护者。但是，在众多像利穆赞一样的地区，打破仿古和忠于传统的农业实践，几乎只是通过推动农村手工业者涌入大城市的临时移民来实现的。

没有革命的工业化

然而，工业活动获得了最为迅速的增长，在1835年至1845年间，其增长速度是农业活动的两倍。但是，工业生产的增长与技术革命的关联不如英国那样密切；来自农村的充足劳动力，使得对新制造方法的研究动力不足；水力机阻碍了蒸汽机的使用，并且在冶金工业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虽然1840年以后现代化开始加速，但只直接涉及工业活动的几个部门。在米卢兹企业主的推动下，棉纺厂迸发出最大活力：克什兰家族和多尔弗斯家族进行了最早的大规模纵向积聚，使印花棉布的制造现代化，建造了他们的新机器，并且很早就对建造铁路感兴趣。诺尔省地区也开始将其原有的以家庭作坊为单位的纺织业进行机械化。在下塞纳省，现代化更多的是通过摧毁乡村和家庭制造业来进行的。不过，相当局部化的棉纺织工业，其带来的变化则使毛纺工业无法与之相比。后者在地理上更为分散，工场也更不集中。尽管机械纺纱在埃尔伯弗或色当取得了胜利，但是，分散于整个法国的毛纺中心依然延续手工制造传统，并从对外贸易的发展中获益；毛织品的出口价格在七月王朝期间翻了一番。工业现代化对于它所涉及的劳动者来说是没有什么益处的；1839年危机时，人们第一次看到纺织工业的罢工在法国比手工业和建筑业的罢工更为严重，尽管后两个部门仍是使用工人最多的部门。

608

交通工具上的怀旧和运输费用的高昂，促使旧工业形式在法国广大地区持续存在；地下埋藏的资源不够充足；土法炼铁炉在中央高原地区继续存在。不过，铁矿石的开采量在七月王朝时期成倍增长，蒸汽机的数量也从1839年的2450台增加至1847年的4853台；焦炭生铁在1836年时只占法国生铁产量的36%，而到1847年这一比例则上升至44%。冶金业的这一发展自然是与农业需要（尤其是对新犁的需求）和纺织工具的进步息息有关，而铁路建设的需要则尤为重要。

铁路在法国的发展缓慢：1837年建造了175公里铁路线，1841年是499公里，七月王朝末则是1900公里。这一落后情况，一方面是由于银行和国家——主要以矿山、桥梁和道路工程师为代表间长期存在

的对立。如果说铁路建设在法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其影响在第二帝国时期尤为明显，那么，这也是因为国家在法国经济活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尽管官方认同自由主义。法国资产阶级在三个方面依赖国家。首先，通过一种因为萧条的威胁而变得更为现实的古老传统，货币紧缺的结果对经济和利润产生影响，从而使得国家宣布进行税保护，这是一种经典的补救办法且并非毫无作用；因此，1842年至1843年间锻造厂主和纺织工厂主通过组织冶金业利益委员会、机器制造商委员会、亚麻委员会，以及福尔西洪会议重新聚集众议员，从而使得与比利时建立关税同盟的计划搁浅。相反，它从执政府以来所有政权都设置的严格的立法和司法机构——为了避免对企业主在其企业中的自由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束缚——中获益。这一自由使得压缩薪酬成为可能，由此，即使是在相对萧条的时期里，也能获得足以满足工业设备现代化、积累新财富所需要的利润；严格执行针对法国工人集会的禁令，相当于对工业资产阶级有利的国家内部保609 护主义。但是，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并非只是统治阶级的简单反映，况且后者由于地区和产品的敌对而在经济方面存有差异。政府机关——已成为国家力量中心，并由于行政法院或中央政府中有众多人在两院占据席位也得以参与到政治指导之中——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了指导作用。通过增加针对省长和商会的调查表、出版有关各种经济活动的统计、在高等教育中引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将塔拉博这样的最具活力的工业家召入制造业总会，国家就推动了经济生活的运转，在交通线这一领域表现尤为明显。1836年乡村道路法促使乡镇走出了孤立局面，而借助1837年起越来越多的拨款，道路网也得到修缮。主要的着力点是航道：七月王朝时期修建了1440公里水道。至于铁路，出于政治原因，它们似乎是过于重要以至于其建造不能委托给国家；众议院于1837年表示反对，1842年6月11日法令则找到了一个将国家与金融资本主义结合到一起并且地方当局更为积极参与的迟到的解决办法。

铁路建设的落后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舆论，尤其是议会舆论的干预，它们过于受到反对者和墨守成规者的利益的影响；其二是流

动资金的缺乏和银行组织的不足。1840 年以后，英国与瑞士资金起了决定性作用，并成立了一些大公司，如巴黎—奥尔良、巴黎—鲁昂、诺尔……它们在七月王朝的最后几年中吸收了一部分曾受投机诱惑的法国储蓄。这一迟到和过分的迷恋促使最早的（也是昙花一现的）大商业银行产生，如拉菲特银行，并将资本的活动与大资本家的活动相分离。铁路建设改变了经济权力状况，加剧了有利于最富裕省份的地区不平衡，而且大致从长远来看，解除了显贵们对地方经济的控制。

显贵们的政权

不过，七月王朝，尤其是 1840 年 10 月 29 日苏尔特—基佐内阁成立以后的长期稳定期，表现为是显贵们的统治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代。这些显贵们——大资产阶级或是贵族——首先从他们的财富，特别是土地财富中获得权力；正是土地决定了是否可成为显贵人物，因为它将人选议会的资格给了支付 500 法郎直接税的人。在商业、制造业和自由职业活动中发财的人遂购买地产。但是，七月王朝时期的显贵并不只是一个富裕的人（确切地说应该是逐渐变富，由此使他可与暴发户区分开来），而且也是一个家族的成员，这一家族的定居往往超越了地方框架。家族传统的生命力促进了社会、职业和政治的稳定。婚姻联盟也参与其中；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是一个家族事务，其中男女爱情很少能起主导作用；这可能是以爱情梦想来慰藉全然不同的现实的浪漫主义成功的原因之一。虽然当时统治法国的显贵们只是在年纪很大之后才获得高级职位（很少有早于 40 岁或 45 岁之前者），但是，由于他们寿命长——这是与当时人口总体预期寿命还较短所不同的——从而巩固了其社会权力的稳固性。此外，他们的家庭出身使得他们能在比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更年轻的时候获得高级职位；由于在职位上待得更久，因而显贵们的领导活动所具有的长期性就影响增大，并解释了为何他们能一直掌权。 610

因此，第三个组成部分在于显贵对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或是由于他们领导经济、行政活动，或是由于他们的选举而产生的。区选民团的狭隘、个人或家族影响的优势地位、政治派别的缺乏组织，这些

都使得选举个人化。缴纳选举税的选民投票给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而不是给自己观念的代言人。显贵的特点也因地而异：一方面是来自蒙福尔的（正统派）众议员安迪涅伯爵，另一方面是米卢兹的大工厂主尼古拉·克什兰或埃尔伯弗的厂商和（自由派）众议员维克多·格朗丹，在这两方面之间不仅存在政治观念上的不同，而且他们分别是两种不同社会的代表。

如果我们细究这一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同时表现出来的权力，我们首先会发现，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建立在司法基础（已不复存在）和农业主导地位（在众多省份依然延续）之上的旧制度社会的贵族，向1840年左右已在一些孤立的中心出现的工业化社会的资本主义企业负责人集团转变。不过，在这两种人，即安迪涅伯爵或是克什兰之间，并非只有不同；他们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农民或是工人身上——的特点就是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力在那些相互间认识的人手中混同在一起。18世纪领主对农民的权力、19世纪末大工业或商业公司的董事长的权力并非是被接受的，而是在行使权力者和承受权力者之间没有经常联系的情况下强加于人的。相反，显贵们的世界是一个人际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其中权力被那些承受者所接受和赞同。赋予社会关系以活力的家长式统治概念，也为这些承受家长式统治的人所认同；确实，这一状况取决于经济力量关系——它们通过纳税选举制而得以确认和享受优先权，但也依赖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学，它的特点是阶级意识不如从属于以显贵为代表的同一地方或地区共同体的意识发达。

显贵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中间作用。首先是国家与居民之间的中间作用，这就是当选者——众议员、省议员、商会成员——以及法官和高级官员，他们将与其姓氏或财富相连的个人影响添加到与其职能相连的匿名权力当中的原因：例如，加亚尔·德·凯伯丹，不只是雷恩的王家法院的首席院长，还是一位大地主、支持七月王朝的众议员，并曾是复辟王朝时期——当时他是共济会完美联盟（Parfaite Union）的分会会首——雷恩自由派的首领。加亚克的专区区长贝尔蒙，也是

一位前元老院成员、七月王朝之初的自由派众议员的儿子，以及省议员的兄弟，而其家族的财富在选区中是位列第二的。通过自己的关系、职位，显贵就可以使自己同胞的请求或意见得到表达，并为他们获得某些利益。他也是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世界与城市——人口虽为少数，但却是社会的动力——之间的中间人。显贵不仅是“有产者”，即拥有财产、家庭、关系，而且也是“有知识者”：在某些偏远省份，他是能够用法语和方言同时表达的人。

611

他也是生活在长时段中、拥有过去和未来的人。显贵是其所处时代的主人，他的收入（尤其是地租）的起伏要比其他社会阶层的收入起伏平缓得多。由此，我们从不同方面发现了存在于经济—社会状况和心态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在同一些人中的混同反过来又造成地区影响的扩散。显贵的国家领导权并未受到其他社会集团的直接威胁，但其自身却由于不同的过去、未来观或利益而分裂。意识形态、地理或个人对立揭示了那些使他们分裂的因素，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身所共有的因素。因为显贵统治的社会对应的是一个中央权力薄弱的时代；这一薄弱状态的产生是由于自由主义的蓬勃发展所致，后者拒绝国家在社会关系中扮演主宰角色，使得统治阶级和他们的内部分歧联系在一起；另外也是由于同一些群体拥有的地方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混同，从而使得地方影响同时依赖于中央政府和议会多数，这更多地体现为利益联合而不是对符合实际的计划的赞同。由此，显贵政体在一个变迁社会，也就是处于运动中的社会里形成了一个保守体制。

基佐和保守体制

当1840年10月29日新内阁在年迈的苏尔特元帅领导下组成时，毋庸置疑的是，内阁的真正领导权属于外交大臣基佐，其被任命该职是为了以不过于伤害民族激情的方式防止战争。害怕战争和由社会混乱、若干“宴会”——已发表了一些革命言论——引起的恐惧，使得基佐成为尚缺乏组织的保守派的领导人。这位清教徒大学教授、主张立宪的保皇派、复辟王朝时期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空论家”，在

政治联盟中则是机会主义者，他是兼具以下罕见才能于一身者：赢取听众理解和兴趣的出色演说家，能够制定严密计划并使之成功实施的政治家。他作为高级公务员和政治家的长期经历，使其获得了政府内阁和议会策略的双重经验。含糊不清的民族主义——其中有极端反对派，如正统派和激进派——对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和平的公开指责，其结果就是使得保守显贵确信基佐正是自己最好的领导。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知道如何获得路易-菲利普的宠幸，后者将外交和军事事务中的重要部分交给了他。由此，这位人们认为将任期短暂的大臣，一直任职到王朝结束，而这一王朝的崩溃也正是他引起的，不过，基佐正式担任首相一职则迟至1847年。

基佐带来了和平、秩序和金融稳定，而这是与其计划相一致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三个政治条件。对物质利益的这种满足——概括在“通过劳动和节俭而发财致富”这句话中——确实只适合资产阶级。不过，它也起到了麻痹选民的政治情感的作用。有关对外政策——也就是关于议会行动最少影响到的领域——的大争论，以及影响选民决定的经济与技术问题，这些都使得议会争论非政治化，相反却使得中央政府的决定政治化。由此，对于这位大臣来说，1842年铁路法的实施成为交易的合适手段；不过，就反对派认为他不可避免地会将投票支持自己的众议员所在地区的铁路置于优先地位的指责，则可谓有些过分了。更为严重的则是政府在推进那些总是会触犯与既得职位相关联的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时面临的困难；在不改变政体构成（基佐始终拒绝选举改革）的情况下不可能实行更具活力的政策的不可能，内阁因此而延长了，并逐渐由起初受欢迎的内阁稳定转变为固步自封。基佐懂得利用政权所面临的威胁来巩固自己的多数地位。例如，1842年7月13日，年轻的奥尔良公爵因马车事故身亡，这一事件激起了同情国王的大规模游行，而当时立法选举中内阁刚刚获得非常微弱的多数；统治者与丧事中表达出的舆论的一致促进了内阁政策的延续。不过，就此认为王朝舆论已与七月王朝君主政体相一致则是错误的。由于无视巴黎新闻界——其中绝大多数是持反对立场的——越来越敌对的批

612

评，基佐就过分倾向于将针对政体的越来越大不满的征兆，与加剧了他的不得人心但其本人却漠不关心的争论混淆在一起；而在广大反对派中出现的这种不满源自于奥尔良公爵之死，他具有比其父和基佐更为自由的声誉。当这些反对派因指定以非常保守而著称的涅穆尔公爵为可能的摄政一事，而对政权依照自己意愿发展定位失去希望之后，他们与立宪君主制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

基佐也想从正统派的骚乱中获益。他利用其觊觎王位者——年轻、谦逊的波尔多公爵——1843 年底到达伦敦的机会，组织了一场欢迎游行。上千名正统派贵族前往伦敦这一事实使得七月王朝的悖论突出显现：最猛烈反对当政君主的是那些信服君主制原则的人。基佐政府希望通过给予当时由国家控制的教育以自由来取得天主教会的支持；作为教育自由问题上的最强硬派，正统派通过公开重新集结而阻止了教士归附新王朝。

基佐低估了议会外舆论的力量。确实，议会反对派的无能在历次会议中都显现无遗，但是，社会中最具活力的成员、大城市中的居民已与政权关系疏远。这在巴黎尤为明显。作为权力之都，巴黎吸引了显贵们，同时又无视他们；巴黎的大多数报刊和众议员都敌视保守政治。思想活动的发展是脱离政权的，而且根本不顾各学院慷慨给予政客们的官方许可。在一部分青年大学生和民众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表现出对自由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不满，这在巴尔扎克和欧仁·苏的小说中也有体现。巴黎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引发了变动，而且包含了最强烈的激情，它在暗中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七月王朝只重视那些拥有政治权利者的意见；然而，它所主张的代议制由于以下原因而被扭曲了：同一些人过长时间掌权所出现的权力衰退；内阁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选民和议员的结合问题；在相对立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其立法提案中立化。

1846 年 8 月的立法选举使内阁又因为所获得的过度信任而麻痹大意。七月王朝时期没有哪一届议会曾取得如此压倒性的多数：支持内阁的众议员有 291 位，各种反对派代表一共只有 168 人，而后者还曾

经依靠大多数报刊进行了一场活跃的有组织的选举运动。

613　1846—1847 年危机和政权崩溃

由于 1846 年选举结果而得到增强的内阁稳定，是与经济增长及持续和平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法英协约的破裂使得基佐在 1846 年与梅特涅逐渐靠拢，并采取了反对民族运动的政策，这在瑞士尤为明显。七月王朝的法国与那些专制君主国逐渐靠拢之时，正值这些国家在欧洲的影响越来越难以维系。至于经济繁荣局面，也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自 1846 年秋起被中止了。这场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由歉收而引起的传统困难；1845 年时马铃薯的收成（一般来说它在重要性上要超过小麦的收成）已然不好；1846 年谷物和饲料的收成也严重受损，先是由于酷热和过分干旱，随后又由于秋季水灾对耕作者的命运产生了严重影响，例外的只有地中海地区与西南部地区，前者未受水灾影响，而在后者玉米可以替代小麦。即使在那些未遭受直接影响的地区，小麦危机的公布也唤醒了旧有的对缺粮的恐慌。害怕缺少种子，或是希望由于匮乏而卖得更贵，使得大量地主停止出售。在西部，尤其是伊勒－维莱讷、马延、曼恩－卢瓦尔，农民阻碍谷物流通，因为他们不想看到谷物运往城市；相反，在安德尔这样的地方，他们则想强迫拥有谷物者出售，而且大力在住宅搜查，在比藏塞甚至转变为骚乱。危机接踵而至，并在乡村地区产生了没有政治目的的革命局势。

民众收入只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这使得面包价格飞涨，以至于几乎各地都拒绝再给面包定价。结果造成人们不再购买服装和其他物品，工人，尤其是纺织工人面临失业威胁，而这又正值面包涨价使获取工资变得更为紧迫之时。歉收扰乱了商业；外国小麦，尤其是俄国小麦的进口，打破了贸易平衡。新一年的丰收不足以带来繁荣，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刚刚使得 1847 年持续的危机恶化。对于铁路公司股票的迷恋，尽管有些迟，但也扩展到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使得直至当时在商业或制造业中非常合理使用的资金转向投机。对资本化技术的拙劣运用，以及铁路公司——已经发行其认股权只能在以后分期实行的股票——要求增资，造成交易所行情暴跌，尤其是诺尔铁路公司股

票，它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持下，已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股票。铁路建设工地的停工使得失业人数增加，冶金工业的订单也因此中止。就这样，灾难进一步积累：失业、破产、倒闭带来一系列苦难。

面对危机，舆论开始寻找责任人。反对派轻而易举地就揭露出首相，他在几周的时间里一直犹豫不决。在接到省长们将要歉收的报告，他先试图将形势的严重性降至最低程度，随后又在1847年1月同意特别降低国外小麦的关税和提高贴现率，从而使得舆论一片恐慌。媒体对投机者的揭发进一步突出了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

危机暴露出对信贷机制不适应的心态。流通现象（涉及谷物、货币、国际运输）的特殊重要性使得1847年的工业与金融危机表现为经济转型和法国经济——部分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结果。《新闻报》于1847年7月25日写道："我们的金融体系是符合经济科学的，就像家庭纺车属于纺纱机一样。"但是，危机也表明国家必然要进行干预。各市政当局为了救济失业工人而在国家资助下开办的工场逐渐增多，意味着国家提供工作的责任，而这恰逢一部分资产阶级舆论认为社会主义学说应对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民众暴动负责之时。　614

道德与意识形态危机

如果说围绕着维护个人所有权在正统派和保守或自由的奥尔良派之间出现了重新聚集，那么相反，人们也看到对统治阶级的真正控诉。1846年选举期间，各报刊大量揭露的腐败现象和选民们所施加的道德压力，已然使得政治阶级的名誉大受影响。对经济危机期间投机或囤积行为的指责，造成相当一部分商业资产阶级的信誉扫地，并使得"资本家"一词进入争论的术语中。1847年发生的几桩丑闻使元老院成员丧失威信：如针对曾任大臣的泰斯特与居比耶尔的贪污指控，以及舒瓦瑟尔－普拉斯兰这样的杀死自己妻子的杀人犯。虽然道德下滑涉及所有阶级，但是，统治阶级伤风败俗的印象促使显贵们开始怀疑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这是辞职的最初迹象，是与他们在得知这些事件的那些城市群众中的名望衰退密不可分的。作为受害者和目击者，资产阶级已经在各个层面和以不同形式感受到了经济动荡的影响。经济

转型弄乱了价值层次，并使不同的政治纲领混杂在了一起：自由反对派为保守原则辩护，指责内阁使这些原则失去影响；正统派陷入分裂，一部分人加入支持教育自由的运动，这使他们与大部分保守派接近，同时，另一部分人则加入激进派，与热努德修道院长一起赞同普选制。在二月革命爆发前几周，托克维尔在众议院表示："不稳定的感觉是革命的先兆，它在这个国家已达到非常可怕的程度。"

宴会运动

1846 年选举之后王朝反对派已丧失了通过正常议会选举而掌权的任何希望；1847 年，它曾徒劳地试图以选举改革（降低获取选举权的纳税额）和议会改革（要求众议员和带薪职位之间不能兼任）来控制议会。夏天的时候，请愿在整个国家重新出现：各种宴会将国民卫队和激进资产阶级在请愿中联系在一起，不过，这些请愿还不是革命的。但是，逐渐地，激进派，甚至像路易·勃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在使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并缓和其反对者的情绪中起了主要作用。首相基佐拒绝任何让步和改革，并禁止原本应于 1848 年 2 月 21 日在巴黎结束的改革派宴会，他认为已在法律规划问题上使反对派屈服。王朝反对派的领导人似乎已经甘心顺从，但是，几乎可以宽慰的他们被自己的追随者抛弃了，这些人此后将听从更为激进者的号令。拒绝议会对话将反对派推上街头进行示威活动。2 月 23 日，基佐被迫辞职，因此造615 成的权力真空使路易 - 菲利普愈发犹豫不决。已是老者的路易 - 菲利普从起初的过度自信到完全气馁，2 月 24 日宣布退位。在 1847 年 11 月 7 日致奥马尔的信中，茹安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到了这个岁数，已不再能接受批评（……），但是又缺乏采取果敢决断的能力。"短短几个小时，在采取自卫措施上犹豫不决的七月王朝政权就因为缺乏保卫者而灰飞烟灭了。

第二十二章　第二共和国

616

1848—1852 年首次推行普选，
这是社会共和的一次过早尝试，它在四年后导致专制政治。

一、革命与和解共和国

1848 年 2 月—5 月

革命的原因

在法国的历史里，第二共和国始终与普选的最终采用和多次实施紧密相连。

大革命在 1789 年时就已放弃了普遍选举。当时，人们相信，公正和自由将首先通过中间阶级的努力而逐渐推进，对于这些崇高的价值来说，大众的干预往往意味着威胁，而不是益处。当时，小民百姓不仅体现了无政府、无法控制的暴力、希望经济倒退的危险；而且在两次发怒之间，他们也显然易受传统权力、反革命者、贵族或是教士的诱惑与操纵。这一分析证实了左派有关纳税人寡头政治的解释，并在共和 3 年、共和 8 年、1814 年，以及严格意义上在 1830 年时重复出

现。但是，及至1848年，这一分析却明显失效。至少一代人以来，由于没有出现严重的国内问题、交通工具的明显进步、有关初等教育的基佐法的初见成效，以及新闻舆论的有限但确实增长的传播，凡此种种，都改善了大众的教育程度。寡头政治本身也提供了负面证据。垄断政治生活的那20万选民明显过于利用这一权力仅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此外，他们分裂产生的城市、区或议会选举区的各个选民团体——每个都包括几百人，很容易就滋长了阴谋和小团体思想，而牺牲了舆论交锋。简而言之，政治道德与社会公正的相互结合促进了选举改革。

社会问题，更确切地说各种社会问题，显得极为紧迫，亟待解决。在装备了蒸汽机和瓦斯灯的工厂里，此前一直尚不为人所知的劳动节奏与时限被引入，而工人对此却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企业主的自由、617 国家的不干涉与禁止工人联合被奉为信条。剥削男、女劳动力乃至儿童，压缩工资、工作的不安全，以及这种不幸带来的各种后果：又脏又乱的房间、疾病，犯罪，在40年代所达到的程度可谓史无前例，至少在法国是一直如此。但是，“社会问题”并不只涉及工人。在人口数量前所未有之多的农村，尽管经历了大革命，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平等与和过去相象的现象。补充收入（家庭手工业）受到了大工业的威胁；其他进项（各种使用权：例如在以前领主的私人森林上放牧、采摘、免费获取木材等等）则被那些越来越迷恋于自由和农业现代化的大地产主们所否认；而国家依据森林法，将致力于保护市镇和国有的森林。简而言之，在1848年时还存在农民问题。

已为人熟知的这些承受苦难的普通民众，并未引起恐惧或是怜悯。那些有教养的旅行者们出于对自然、原始力量、回归起源的浪漫爱好，带着同情目光发现了乡村独特性和民间传说。通过一种在欧洲其他地方唤起某些理论家有关国民特性的类似情感，很多法国年轻资产阶级的人在这一“普通民众”中看到了蕴藏着的各种价值和再生的机会。

以上就是革命意愿混合扩散中的某些成分，而1846—1847年的危机将使得它们迅速凝聚。首先是经济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两场危机的

结合：一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亦即生产过剩和投机引发的危机；另一种则是古已有之的危机，即歉收和食品匮乏引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还是席卷欧洲的危机，如果说当时从波兰经瑞士到意大利的整个欧洲都经历了骚乱浪潮，那么，它或许并非纯属偶然。但是当危机使得政治改革与社会改良的要求变得逐渐增强时，因六年稳定而变得自负的基佐政府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却只是在外交上与那些反对革命的列强套近乎，以及在自己的多数席位中掺入一部分右翼反对派（1846 年选举）。面对难以动摇、“僵化不变”的基佐，一场大规模的反对运动已在 1847 年形成，它以“改革”为目标，以那种著名的政治宴会为手段。在这中间，革命将找到了它的偶然动因。

巴黎的二月事件

1848 年 2 月中旬，政府有关一切此类宴会的禁令，在巴黎激起了一场抗议活动，其组织者是些自称“王朝派”（奥迪隆·巴罗语）的温和反对派，但他们很快被最为激进的分子所超越。2 月 22 日，一场民众游行示威取代了被禁止的宴会，其中汇集了大学生、手工业者、工人……共和派秘密团体。决定性事件发生在 2 月 23 日：身穿国民自卫军服装的巴黎小资产阶级作为巴黎公共秩序的控制者，因为最终厌倦了基佐以及重要的纳税选举人毫不妥协的寡头政治的排外主义，转而要求改革。国民自卫军的倒戈令老国王幡然醒悟，首次同意牺牲基佐，将权力交给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但是，这一让步为时已晚：示威仍在继续，并且有一次与部署在卡皮森林荫大道的军队发生了虽属偶然但却流血的冲突。于是，在 2 月 23 日至 24 日之交的夜晚，人们竖起了街垒；布若指挥的军队已无力招架；新老大臣们亦完全动摇；国王宣布退位，并离开了杜伊勒里宫，进而“像查理十世一样”，离开了巴黎乃至法国……年轻的继承者巴黎伯爵，还是一个 9 岁的孩子，立刻被他的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带往众议院。但是，示威游行群众已先涌入波旁宫，他们要求彻底改变政体。反对派的众议员们——只有他们的意见能被这些群众所听取——顺应了这一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由一个具有自由派声望的公爵夫人摄政的可能被排除了。但是，618

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国已由巴黎的郊区与平民居住区所控制……拉马丁、赖德律-罗兰及其同伴因此匆忙离开波旁宫，赶往巴黎人民的传统政治中心市政厅，在那里的众多示威群众中，所有堪称运动的共和派骨干分子都已自发地会集起来。正是在此地，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它是在融合了两份相互竞争的名单（不过，其比例并不均匀）的基础上成立的。其中一份名单出自自由主义和温和的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办公室，其中包括极左派的议员；另一份则源自《改革报》，这是一份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共和派报纸，而且与非议员的骨干分子联系更为密切。绝大多数成员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份名单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有 7 名成员（不包括另一份名单中也有的两个人）入选；而第二份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只有 4 人（包括前一份名单中亦榜上有名的弗洛孔和赖德律-罗兰）入选；此外还有社会主义者与作家路易·勃朗，机械修配工阿尔贝。让一位无产者进入政府这一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提升行为——依照当时舆论的看法，此举属于象征性的或是丑恶的——并不能使人长久忘记，在这个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资产阶级。因为，虽然这 11 位成员一起充当了国家元首，共同商议如何行使行政权，但是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全部，尤其不是社会主义者——承担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任务，而另外的部则交给多数派的其他同道。我们随后将回过头来看这些人和派别，考察他们的行为。此时，在 2 月 24 日夜和 25 日白天，市政厅里人群拥挤、骚动不安，总是被热情而又警惕的群众团团围住的临时政府，通过最初一系列决定的匆忙和大胆的举措，补偿了其内部的失衡。未及向整个民族征询意见，人们就宣布共和国为法国的新政体。即将成立的国民议会由普选产生。奴隶制在殖民地被废除。政治犯的死刑被废除。由此，在某些法令中，人们通过抛弃曾使相关记忆蒙上阴影的恐怖行为，又重新回到了第一共和国时曾更为慷慨地做过的事。

外省的欢迎态度

通过灯火通信器，共和国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外省。它甚至还赶在了新政权的很多省长到任之前，他们即使迅速动身，也需几天才能

到达省会所在地。远离巴黎的地方由此处于空位时期，省长和专区区长们犹豫不决，有的则是故意躲避，权力实际上在市镇长官手中，他们尽其所能地去应对各种事件。不过，并没有多少事件发生，因为在所有那些通常能够激起民众示威游行的人中，共和派已得到满足……而那些反革命者也同样感到满意：因为对于很多正统主义者和教士来说，路易－菲利普和基佐虽然百般努力，但仍远远没有能够把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1848 年是对 1830 年的一次出乎意料的报复。共和国因此赢得了大量的归附者和很大程度上的善意中立。奥尔良派的真正支柱——性情温和的年金收入者、公务员、企业主和商人，是人数众多但懦弱的中产阶级，即使他们支持路易－菲利普，他们也不会上街去构筑街垒。因而，往往是倒台的君主制的市长或是专区区长本人宣布了共和国成立，同时伴以他们恳切要求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告。

在距离巴黎不远的纳伊和苏莱内，国王路易－菲利普和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的豪宅被人侵入，且在被洗劫一空后付之一炬。对于不臣服于任何君主的人来说，这或许是适合在那里大肆劫掠的天赐良机。但是，这可能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在郊区，还有其他富人的宅第遭抢。这些房主的身份也使人想到，在这些远征活动中至少具有某种程度的象征性的处决——因主人并不在场，所以这一处决针对的是他们的财产；与郊区发生的这类事件可相提并论的是在革命过程中在巴黎市中心发生的对杜伊勒里宫的洗劫，但是除此之外，巴黎几乎没有其他抢劫。 619

在外省的某些市里，就像 1830 年时的遭遇一样（似乎更为经常），有人焚烧了入市税登记簿或是酒税登记簿。但是，这还并不是外省最有意思的事情。

在一些偏僻的村庄中也发生了骚动，当地那些曾经共同参加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森林冲突的头脑简单的农民们，首先在共和国中看到了对其有利的解决办法的希望：此地的人赶走了森林看守，彼处的人占领了有争议的土地，有时还洗劫了所谓被侵占的种植园，凡此种种，都充满着欢乐和伴随着鼓乐声在进行。人们想从权力真空时期镇压力

量的削弱中获取好处吗？人们是否还保持了对允许农民在有争议的森林自由行事的第一共和国的模糊记忆？或者他们已经接受了（但又是通过何种渠道?）这一观念，即共和国本质上是人民的政权，满足卑贱者的要求是它存在的原因？在这一无人怀疑其正确性的精神状况下，人们提前采取直接而无需任何手续的行动，让自己的希望得到满足。发生这些事件的地区分布广泛，而且事件本身并不严重；在新政权发布首次警告之后，秩序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恢复。当局毫不犹豫地作出种种许诺，而未来将证明，它们的这种做法实在有失谨慎。这属于应当克制的症状。一如在城市的郊区，在外省的某些农村地区，人们只认为，共和国必须与先进的社会纲领相一致。这里存在一种根本性的误解，对此，我们接下来还会予以考察。

临时政府：各位成员

此外，甚至在临时政府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含混不清。激进共和派的赖德律－罗兰与弗洛孔，与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阿尔贝属于一个阵营，而拉马丁这边则包括六位自由共和派，律师杜邦·德·厄尔、马利、克雷米厄，天文学家阿拉戈，批发商加尼埃－帕热斯和记者阿尔芒·马拉斯特。纯粹荣誉性的领导地位当属已届耄耋之年的杜邦·德·厄尔，此人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就已经是众议员，但是，他日益衰弱的精力使其无法再发挥实际的政治作用。工人阿尔贝，沉默寡言，而且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路易·勃朗的附庸和应声虫，而弗洛孔则是赖德律－罗兰的应声虫。马利、克雷米厄，阿拉戈、加尼埃－帕热斯和阿尔芒·马拉斯特组成了一个几乎是清一色的自由共和派的团体，也就是说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团体。马利负责公共工程部，加尼埃－帕热斯（几天以后）负责财政部，由此，他们很快获得了实施经济方面的正统观念的手段。与他们的观点最为不同的路易·勃朗尽其所能地代表和维护了包含深刻社会变革的共和国的理想；他的处于少数派的立场比其显现的更为坚定，以至于他被视为紧紧盯着临时政府的工人和失业群众的代言人。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位处于核心地位的人物：赖德律－罗兰和拉马丁。赖德律－罗兰曾经是路易－菲利普的众议院

中为数不多的共和派少数派的主要发言人。作为一位成功的律师，其个人财富往往用于资助共和派报刊的富人，赖德律－罗兰是共和派中既最引人注目又最不专横者；尽管根本不赞同社会主义原则，但他接受合法的博爱行为，这使他与纯粹的自由派区分开来，并且有时与《改革报》志同道合。若要指出此公的特征，那么，我们不妨说在他身上明显体现出了20世纪上半叶的激进社会主义党（简称激进党）的特征。当时，他接受了内政部长一职，这使赖德律－罗兰本人、其周围最亲近的人（其中最著名者当推乔治·桑）以及他的行政人员，与新政权的一切使命和苦难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些人认为他已过于革命，而另一些人则觉得他还不够革命。 620

拉马丁的地位与赖德律－罗兰相仿，不过——如果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话，前者是在最高层。没有人怀疑诗人是临时政府中的主要人物。他之于年迈的杜邦·德·厄尔，有点像1840年后的基佐之于苏尔特元帅，亦即名义元首身边真正的负责人。与基佐一样，拉马丁也具有外交部长这一最富盛名的部长职位。在他以及同事中，只有他与学者阿拉戈一起，其部分声望的取得与政治毫不相关。在这一团队中，他是绝无仅有的贵族、职业外交官、院士、上流社会人物。简而言之，他也是凭借自己的才能脱颖而出的。对于他来说，其声望或许还可归因于他曾远离共和主义，直至1830年，他都还是一个纯粹的保皇派。另外，也因为他最终认定旧制度不符合时代潮流以及路易－菲利普的中庸政策令人蔑视。最后，是否还应该加上正是由于拉马丁的文学成就和亨利·吉耶曼，他才比他的那些临时政府同事更好地为我们所认识？总之，结论来自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工作：应该摒弃所谓“迷失于政治的诗人”之类的陈词滥调，当时，在这一冒险政权的实践中，没有人能比这位诗人（或是前诗人）更为自在、熟练，并在需要时巧施手段。当然，他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态度，因为他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记住了他关于坚持将三色旗（只是在旗杆上饰以红色的玫瑰花结）作为法国的旗帜的著名演说。但是，他也反对思想狭隘，不久之后，他又反对保守派，首先是马利集团中他的同事们的反动念头和报复思

想。凡此种种，既与中产阶级无关，亦与其严格的理性主义精神世界——那时往往导致最严格的经济方面的正统观念——无关，作为前基督徒、前浪漫派作家的拉马丁，一度迷恋圣西门主义，情感丰富、充满好奇、开放的拉马丁或许比赖德律-罗兰更适宜于认识到当时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价值，至少值得进行和解尝试。

临时政府：社会与政治使命

在此，我们不可能对1848年3—4月间成为法国政治之特点的几乎每天发生的各种变故的细节加以描述。包括街头示威和政府决策之间的复杂互动在内，一切都发生在巴黎。不过，就本质而言，一切都围绕着两个问题：其一是经济与社会危机问题，其二是制度的政治前景问题。

革命之前就存在的工业与银行危机依然在延续，甚至因各种事件而有所恶化。对于混乱状态、社会主义的担心，破坏了企业主的信心。当时就有人说富人们“紧缩了他们的资本”，复兴所需要的各种要素由此难免大受影响。严重的商业萧条对国家提出了严峻问题，它威胁到了国库收入，并对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的社会构成了威胁。针对第一种危险，确切说就是经济危机，政府采取了及时措施（货币强制流通、发行小额纸币、鼓励在信贷机构远远落后于需要的外省地区设立贴现银行）。针对第二种危险，也就是国库收入困难，政府选择了技术上较为容易的解决办法，即增加45%的直接税（著名的“45生丁税”），但以后将证明，此举在政治上极为危险。最后，针对第三种危险，即使得成千上万人在巴黎流离失所的失业问题，政府也想有所作为，在此可供选择的是两种彼此对立的解决办法：要么是传统的解决办法，在等待危机过去的同时，让接受救济的失业者们从事次要的公共工程，例如整修道路，这就是旧制度下设立的“慈善工场”的做法；要么依据路易·勃朗的愿望，采取社会主义解决办法，即利用私人工业的这种衰退而鼓励工人们（他们并不都是挖土工人！）通过合作去从事他们自己的职业：这就是设立“社会工场”的做法。事实上，第一种解决办法以“国家工场”的名义得到了采纳；其具体的实

621

施交由公共工程部长马利负责，而且刚一开始大量招募巴黎的失业者，就给他们配以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青年学子。马利在如此构建的国家工场中看到的，不仅是它不会损害私人企业主权利的好处，而且它还可以使大量巴黎失业者免受上街游行、政治俱乐部和社会主义者示威的诱惑。在社会主义者这一边，人们很快就看穿了这一企图和政府的保守取向。群众通过示威游行要求建立劳动部，也就是说他们明确地将社会改革作为政府的责任。政府以同意采取远低于这一要求的措施，成功地摆脱了这一职责，这一措施就是：建立一个由工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将庄严地坐在卢森堡宫原法国贵族院的议员席位上研究社会问题，领导该委员会的自然是路易·勃朗和阿尔贝。正如卡尔·马克思两年后语气严厉地描述的那样："在卢森堡宫里人们寻找点金石，而在市政厅里人们打造流通的货币……"的确，路易·勃朗始终是这一拥有最高行政权的临时政府的成员，但除了他毕竟是少数派，还由于他始终没有负责管理过政府部门，因而根本无法起任何实际作用。在卢森堡宫，人们确实研究了各种问题，并针对较小的社会冲突作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仲裁。此外，人们还在这里详尽、公开地陈述了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这使资产阶级非常害怕。

使资产阶级感到害怕的还有诸多纯属于政治方面的其他事情。首先是新闻和集会的完全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报刊和俱乐部的大量出现，这些报刊和俱乐部宣扬的观点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但其中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那些最激进的观点，提出这类观点的有最激进的社会批评家（卡贝，拉斯帕伊，蒲鲁东），刚出狱的永远的造反者（巴尔贝斯，布朗基），女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等等。另一令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问题是公共秩序；当时它并没有受到威胁，巴黎仍还显得平静，但是，他们不安地看到一位"粗野的"共和派科西迪埃占据了警察局长一职，而且工人们被招募进国民自卫军。事实上，现实的"危险"并没有如此之大：工人们只是在国民自卫军很少的几个团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科西迪埃所更为过从甚密者是赖德律－罗兰，而不是路易·勃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内政部当时设想建立一支常设的和拿军饷

的“机动国民自卫军”，以便通过让年轻失业者们获得较高的报酬，摆脱上街游行与加入俱乐部的念头，并充当一支真正的警察力量。

上述一切冲突都以被一个囊括这一切的新政治问题盖过而终结：这就是选举日期问题。总之，在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这两个使巴黎和临时政府分裂并时刻处于互相对立状态的阵营之间，将由外省通过其选票来做出裁决。然而，人们很早就感受到了这一困惑，即这些选票所支持的将不是革命，裁决将由缺少文化，或是受显贵们操纵的农村大众做出，其注定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因此，革命的口号就变成了：推迟选举，从而让乡村人民有时间觉醒。我们知道在很多其他复杂的曲折变化中，3 月 17 日示威游行是如何仅仅使政府将选举日期做了微不足道的延期，而 4 月 16 日的游行又是如何被击退的。选举定在 4 月 23 日，复活节后的星期天。

622

临时政府统治下的外省

在 3、4 两个月里，外省已由共和国的特派员们控制。这些人本应替代君主制时期的省长，但是由于环境的原因，他们享有了比大革命时期的特派代表更广泛的权力。作为内政部长的赖德律－罗兰在这些人的选派上起了主要作用，由于他只想挑选那些确定无疑的共和派，这就迫使他任用了很多能力和经历与其信心并不相称的人。派往马赛的埃米尔·奥利维耶竟然刚满 23 岁！这一选择本身无可非议。在这位未来的自由帝国的大臣工作的同时，在法国的另一端，未来的巴黎公社领导人夏尔·德勒克吕兹在里尔担任特派员。这些人都得面对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地方事件；他们为了解决经济困境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由此很多人仿照巴黎模式开设了国家工场）；尤其是他们在行政领域确立了共和制，这是通过更换专区区长，或至少在主要市镇用临时市镇委员会替代市镇议会和招募更多的平民而完成的。在公共职能的其他方面，他们并没有进行类似的清洗，而且所有人都已宣称是共和派了。正是那时在政治语言中出现了“革命前的共和派”（那些在二月革命前就已表明是共和派，并参与斗争的人）与“革命后的共和派”的区分。天主教士处于这些归附者的前列。在那些几乎都是庆祝共和

国成立的节庆活动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些教士。在这些仪式中，种植自由树通常都占有重要地位；伴随着游行队伍、歌曲和演说，当地的教士为自由树祝圣。可以将此与1830年七月革命后的情况进行比较，七月革命后人们也种植自由树，但是没有教士，而且更确切的说是作为一种世俗象征，以此来有意识地反对1830年前竖立十字架的行为。相反，1848年时，自由树不再是反十字架的，更确切地说它将成为一种雏形、一种方法——如果人们敢于这样说的话。此外，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教会在1848年时已从七月王朝时曾经历的某些烦扰中获益；其中的某些人已致力于揭露工人苦难令人震惊的增加；而且在经历了浪漫主义影响的共和派年轻人中，自然神论的唯灵论思潮往往重新盖过了前一代所接受的打上伏尔泰标记的文化。不止一个人将通过一种真正的意识形态来延长二月时期的政治博爱。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

然而，并不是所有特派员都有相同的反应，他们的经历最终表明他们是很不同的人。第一个检验是在他们不同的任命中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或是拒绝）“革命后的共和派”的地位。第二个检验则来自于社会主义：在那些存在工人群体和某些重要的社会主义者俱乐部的城市里，他们能得到特派员的保护，他们被看作是新社会共和国的激进派或是受偏爱的孩子们；特派员也可能会以秩序的名义——已然常常被宣布的首要词语——和他们斗争（仍然还是谨慎行事，以免把他们推到对手一边）。由此产生了众多相当不同的地区状况，有时是冲突，甚至是免职。

但是很快地像巴黎一样，选举的临近也使外省的政治生活深受影响。

赖德律-罗兰延长了他的特派员们——他们确立共和制的任务总体上业已很好地完成——的使命，他同时通过一份著名的通报，要求他们阐明观点，并且（事实上）支持革命前共和派的选举。由此，人们很清楚地知道了政府的希望所在：反对郊区工人，不要社会主义，同时也反对乡村外省，不要君主派的反动活动。事实上，选举宣传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在这种每家报纸、每个俱乐部、每个集团都想提出和传播候选人 623

名单的真正纷繁热闹的时期，不同名单往往提出了相同的名字。

首次选举：4月23日

为了与个人利益和小集团政治决裂，新的选举法放弃了在区的层面实施的单名投票。而在省一级投票，因此要有一份候选人名单（但是名单并不是“封闭的”：选票的统计将依然是按照个人），这些候选人数量众多，因为与大革命时期一样，议会将有900人。另一个革命精神的标志是：当选者将不再被叫做众议员，而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是所有年龄在21岁以上的男人中的当选者。人们还不敢将民主制的逻辑推进到让选民在市镇投票：必须前往区政府所在地（或至少是在一个被选作相当于区政府所在地的市镇）；不过，此时的男人们都是善于步行者，即使有人发出一些抱怨，那也不是因为走了两小时的路，而是因为有些地方的激流上没有桥梁。人们一同赶路；4月23日正是复活节后的星期天，这一天的大弥撒使人一致行动。此外，本堂神甫有时与市长一起走在那些为首次行使自由权而前往市镇的村民行列之首。有时也有一些城堡的主人参与其间，他们的出现提醒我们得想到对这一自由的具体限制……但是，在这个几乎到处都洋溢着和解的春天，人们并没有怎么感觉到这些限制。选举结果很难予以解释，因为根本还不存在任何界限分明的政党，至少在整个法国范围内是如此。一些少数派将进入所谓“民族的和制宪的”新议会：在右派这边，一些保守派，事实上往往还是君主主义者，而且常常是纳税选举制议会的前议员；在左派这边，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落选：右派这边是梯也尔的落选，左派这边则是拉斯帕伊、布朗基和巴尔贝斯的落选。整个法国是根据临时政府中的多数派的路线来投票的，这一路线就是自由共和，也就是说既不要社会革命，也不要君主制的反动。在塞纳省，临时政府的成员们统统当选，拉马丁获得的选票最多，随后是他的温和派同伴，这些人排在了赖德律-罗兰和社会主义者前面。这一路线也是《国民报》的路线，这一报刊名字有时也用于指获得选举胜利，并将在以后几个月中统治法国的那个政治集团。在外省的当选者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是共和国的特派员，这一

点很自然，因为他们——或至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时代表了当地的行政机构和使人放心的共和理想。人们原以为特派员们制定的官方名单中会给工人留出席位，以象征获得胜利的博爱；然而，这一象征物在这方面却只显示了甚为有限的象征意义，名单上几乎没有什么无产者，而且，在工人中选择的是为数不多的这一阶级的出类拔萃者，例如一个改革后的手工业行会的理论家，自学成才的机械修配工，搬运夫诗人，这些人的名声都来自于社会地位的晋升，而不是阶级斗争。在1848年春，工人代表也属于（像我们所说的）“中左派”，而这是无数律师、医生或记者也想选择的派别。在极左派这边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以及拉科尔代尔。

第一次流血：鲁昂

选举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最初的流血事件。它自然而然地发生在饱受危机折磨的大工业城市：鲁昂，那里的失业问题既普遍又严重。共和国的特派员德尚，曾经组织了国家工场以救济工人，他在工人中很受欢迎，也是少数几个倾向社会主义的人；资产阶级，其首领是总检察长塞纳尔，一位观点与《国民报》略有差别的共和派，他被征收旨在用于支付国家工场开支——事实上很少是生产性的，基本是慈善性的——的新税所激怒。争论在选举中获得了断：塞纳尔及其同伙当选，而德尚及其朋友落选，整个省的选票轻而易举地淹没了省会城市的选票。26日，选举结果揭晓，工人在市政厅前举行了示威游行。那么，劳动者们是如同有人所说的那样想质疑选举的结果，甚至要求任命德尚呢？还是更为可能的，使人注意他们的要求，预防性地抗议取消国家工场（他们惟一的收入来源），而取消国家工场是维护秩序的人获胜后可以预料会采取的措施。示威游行者被仍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粗暴地驱散。针对拥挤的人群响起了混杂的枪声，随后是骑兵队的冲锋，这一切被工人们看作是一种挑衅，他们在结束了自己的总游行后，涌回自己的社区，在那里修筑了街垒。当晚和翌日，塞纳尔动用了军队，甚至还有大炮，街垒被拆除，当局的武装力量无人伤亡，而工人却有10多人死亡。

624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一事件，并不是由于它所体现的双方在伤亡方面的不成比例：这一事件本身就至关重要，这当然不是因为它是共和派之间的第一次冲突（4 月 16 日发生在巴黎的事件也是共和派之间的冲突），而是因为它是第一次流血冲突，它以阶级斗争中止了新博爱的温馨局面。它的重要性也在于——我们不妨预先这样说——这一围绕着国家工场而产生的冲突，预示了将在巴黎发生的事件，后者并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方式结束。选举结束后不久，也就是 4 月末，共和国幸福、和谐的时期即宣告结束。

革命时代的结束

从其他角度看，这也是临时政体的结束。因为通过普遍和自由的选举，共和国的合法性已然确立。由此，当 4 月 23 日选举的当选者们于 5 月 4 日齐聚巴黎，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他们相信有责任重新宣布共和。他们在会议厅里一致这样做了，甚至随后又在波旁宫的阶梯上再次“公开地”加以宣布。人们相信“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有 17 次之多。这一轶事可谓人所共知。而不为人所知的，是此后赋予这一日子的重要性。在 1849 年、1850 年和 1851 年这三年里，共和国的官方节日是 5 月 4 日，而不是 2 月 24 日。在这一更替中包含了这样一种政治哲学：政体想在合法选出的议会中诞生，而不是在街垒中诞生。在此出现了令人好奇的重复：路易 - 菲利普也曾降低光荣三日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性，宁愿庆祝圣菲利普日（而且它恰好是 5 月 1 日，吉利的民间日子）。七月或是二月的街垒，虽已被历史赋予了真正的地位，但那些受益者们有时感到羞愧。

二、保守共和国的形成与经历

1848 年 5 月至 1851 年 11 月

执行委员会与 5 月的政治转变

与始终是参照物的大革命时代一样，制宪议会也负有两项使命：

首先是制定一部宪法，其次是在此期间确立总的政策——因为宪法是这一政策惟一可能的源泉。与此同时，如同国民公会这一没有国王的制宪议会，它要在其内部确立一种集体行政机构，后者将选择和领导被看作是技术专家的各部部长。这一执行委员会只有5位成员，从而排除了临时政府11位成员全部连任的可能性。此外，在他们中进行有利于保守派的挑选的时机业已成熟。《国民报》派成员的怨恨（更别说右派了）一直延伸至赖德律-罗兰，他被认为已过于激进；毕竟难道不是他该为在鲁昂任命德尚之类的人而承担责任吗？但是拉马丁，尽管他承认应该牺牲那些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却为赖德律-罗兰进行辩护，认为把他排除在外将会有过于意味深长的反映。大多数人不敢反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意见，因为4月23日的结果已是一次有关他个人的真正的全民投票（在巴黎他是得票最多的当选者，此外他还同时在其他10个省当选），最后，执行委员会由阿拉戈、马利、加尼埃-帕热斯、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每人获得的选票数量以这一饶有意味的顺序排列）组成。政府（各部部长们）也已相应地组成。路易·勃朗已只不过是业已大大削弱的左派反对派的首领。 625

此外，如果应该相信——没有任何人曾真正否认它——亨利·吉耶曼就5月15日事件所作的解释的话，那么，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很快将走上奇特的道路。民众的巴黎在这一天应举行支持波兰的示威游行。事实上，这是革命左派针对新政权在面对席卷整个欧洲的各民族反对帝国的斗争时所持的消极态度的一种抱怨。2月24日至5月4日期间负责外交的拉马丁本人在指导外交时，或是基本遵循和平主义，或是奉行现实主义，或是出于对内政的关心……他几乎只关注——而且还是谨慎地——意大利事务，后者是法国最近的邻国。更何况他对波兰事务没有任何积极性；拉马丁尚且如此，遑论继承他任外交部长的巴斯蒂德。由于巴黎人心中认为自己是与处于斗争中的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情感很强烈，支持波兰的游行示威可能是激起革命群众反对正回归保守主义的议会的好时机。那么，是否应认为革命群众更普遍的想法是为他们领导人的落选复仇、要求解散议会、重新开始革命呢？

这很可能，因为波旁宫被他们占领了，在政府军队赶来恢复秩序、驱赶和逮捕闹事者之前，巴尔贝斯有时间在那里宣布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但是，社会主义者们根本没有事先考虑过类似情况，其最初采取的创举就是使俱乐部成员对警察的服从态度得以证明。人们确实可以认为，由于议会所在地恰好处于毫无防备的地步，遂让巴尔贝斯、布朗基、阿尔贝以及其他人陷入了声势浩大的怂恿之中。行动不力的错误在路易·勃朗身上也同样发生，煽动闹事者们已对他欢呼，并在他无可奈何的状况下将他抬起欢庆胜利。他勉强能够证实自己是善良的。在此期间，所有社会主义派的活动家、秘密组织的老战士、巴黎激进俱乐部的领导们再次被送入监狱。至于拉科尔代尔，他于17日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代表席位。

一个月来政治气候突然发生的彻底转变在6月4日举行的补充选举——4月23日出现的大量多重选举令其变得必不可少——中也体现出来。这些选举已不再呈中间化趋势，而是向两极化发展：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那些4月23日的落选者重新获得了席位：梯也尔和尚加尼埃将军，科西迪埃和蒲鲁东，在此只限于列举这些最能说明问题的人。在这些新当选者中，还有一位奇怪的重新冒出来的人，此人就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六月起义

在这一日子里，清理国家工场成为多数派关心的主要问题。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想结束已步入歧途的社会实验，而且它们还花销巨大。其次是因为这些工场的政治中立的次要功能已越来越不重要：工场工人和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在日渐紧密吗？在他们的某些集会中，人们不是听到了“拿破仑万岁”之类的叫喊吗？第三，也是最后一个担心的理由则是，在拉马丁的亲信中，有些人提出了将国家工场问题与铁路问题绑在一起的大胆想法：人们将在因危机而中断的铁路修建工程中使用这些工人，但是由国家承担费用。人们感受到诗人在这一解决办法中发现的优点，主要有二：人道主义（不会使清理工场变得过于悲惨）和经济进步主义思想（铁路的点金术，对于

626

他们来说，拉马丁可以说具有圣西门主义者的情感）。但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不想要国有化，因为后者多少过于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不过，也有可能他们本来就不想避免悲剧。

通过阅读当时的一些宣言和回忆录，我们不难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如同卡尔·马克思或亨利·吉耶曼所说的那样，悲剧不只是被接受，而且是被煽动起来的：解散工场，肯定会引发起义，而镇压势必也接踵而至，这就使得最终摆脱街头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威胁成为可能。不管怎么说，即将展开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国家工场问题是由一个以法卢伯爵为报告人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的，该委员会拥有议会多数派的名义，而在这一多数派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右翼君主派。在政府这一边，人们更依靠各部部长，尤其是新任战争部长卡芬雅克将军，而不是执行委员会。卡芬雅克当时成了知名人物。他是一位十足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反对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维护现有秩序，与其他将军相比，他还有另外一个优势，那就是他的父亲是国民公会成员，其兄长是30年代一位著名的共和派积极分子。然而，考虑到议会的组成，共和国是秩序的保证，这使得它还不可能被放弃。

所发生的事件可谓众人皆知：6月21日，工场宣布解散（工人们只被允许加入军队，或是去满是沼泽的索洛涅地区开荒），失望的工人们先是通过集会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接着就走上街头游行，6月22日和23日，人们筑起了街垒。于是，一场持续三天之久的可怕战斗开始了，以市政厅为界的一条南北向的界线将西部的资产阶级巴黎与东部的工人阶级巴黎区分开来。别动队，资产阶级社区的国民自卫军，尤其是军队行动了起来，但却是以一种可能预先考虑好的缓慢行动（根据维克多·雨果在其《见闻录》中所讲述的私人谈话，拉马丁曾明确地指责卡芬雅克放纵骚乱发展，目的是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6月26日中午，战斗宣告结束。这一战斗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但是跟往常一样，两方的伤亡并不成比例，因为有很多起义者是在战斗结束之后被杀害的。在维护秩序者这一边，他们将起义看作抢劫和野蛮行为的爆发，因而，他们对镇压丝毫不感到内疚。更有甚者，他们不仅

把两位将军的死归罪于起义的工人们，还把巴黎大主教阿夫尔之死归咎于工人们。阿夫尔是在试图进行调解时被一位离群索居的无名氏从郊区的一座房屋内射出的子弹击中的。

政治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从6月24日起，议会要求解散执行委员会，并以卡芬雅克将军取而代之。二月事件的束缚由此得到了摆脱。

当这出悲剧在巴黎上演之际，外省处于等待之中。然而，在有些城市，国民自卫军被动员起来开往首都，以挽救合法秩序和消除巴黎的并且是革命的无政府状态。应该指出巴黎与外省之间存在的这种差距，因为它不久将发生重大改变。与之相反，6月22日和23日在马赛也发生的“六月事件”，并没有被看作是一场声援巴黎工人的起义，也不为人所熟知。同样源于国家工场的这一事件，有着自己的发动方式，而且更确切地说，它与我们已看到的两个月前在鲁昂发生的事件更为类似。虽然已经被镇压，但是它给了当局制裁年轻的地方行政长官埃米尔·奥利维耶的机会，后者被指责对无产者过于纵容。由此，奥利维耶将离开政治舞台，与此同时，他的导师拉马丁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离去。

627

卡芬雅克政府：反动和巩固相结合

因此，从6月到12月，国家又经历了一个新形式的临时或立宪前的政体：在使命没有变化的制宪议会这一边，卡芬雅克将军是惟一掌握行政权者，同时行使着国家元首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权。

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反动的时代。虽然从部长到地方行政长官的政治人物们，总体上仍属于《国民报》派的共和派，但是，为了阻碍革命者的宣传，已开始削减自由。有关俱乐部管理的首批限制性法令和有关新闻出版的首批法令纷纷出台，后者大大增加了一份报纸的运营成本（对此拉默内曾做过如此简洁的表述：“让穷人闭嘴！”）。一个专门调查六月骚乱起源的调查委员会宣布成立，该委员会以极为过分的方式，将道德甚至是刑事责任归之于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为避免坐牢，路易·勃朗去了伦敦；已有了自己的监狱犯人的共和国，现在又有了第一批流亡者。

但是，我们不应将 1848 年夏天的情景简化为这种反动行为；这种过于巴黎化的看问题的视角，最近已被一种“外省”史学编纂学（其中有菲利普·维吉耶的研究）所重新平衡，缺少后者，就将难以理解事件之后的情况。事实上，在表达自由减退之时，民主教育却通过新机构的努力而得以继续推进。8 月也是要求以普选来更新省议会、专区议会和市镇议会的月份。它涉及同时替换 1848 年以前通过与时代不符的纳税选举制而当选的人和 2、3 月间临时任命的市镇委员会。因此，整个法国在以保密的选民会的形式重新投票。如果说富裕的显贵往往依靠对民众的影响而轻易地重新当选，那么，也有一些地区民众的选票已经转而反对他们，以马蹄铁匠替代公证人进入市政厅，或者更简单地，“红色”公证人替代了“白色”公证人。因为在这时已经有了一些红色公证人。不管怎么说，普选已深入人心。

当时的第三个，而且并非最不受关注的关注点，是制宪议会的立宪工作。宣布此项工作的结果的日期是 11 月 4 日。权利宣言被置于法律条文之前。该宪法中包括教育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但是缺少“劳动权”，因为后者所具有的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有悖于当时现实的新潮流。政治体制由三种区分明确的权力组成：其一是设有一个特别最高法庭的司法权；其二是通过普选选出的任期三年的一院制议会体现的立法权；其三则是由总统掌控的行政权，作为国家和政府首脑的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四年，不得连任。在最后这一明显具有决定性的权力的选举上，飘荡着某些幽灵：其中当然有乔治·华盛顿的幽灵（整个美国模式的幽灵，其涉及到民主、自由、公民责任感），但是，也有更为熟悉的幽灵，亦即那些可能当选者的幽灵。

总统选举

对于绝大多数制宪议会议员来说，法国的华盛顿非卡芬雅克莫属。但是，卡芬雅克是共和派，而统治阶级中的绝大多数还没有决定拥护共和国。这一次，议会中的右派遂与《国民报》派分道扬镳，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普瓦提埃街”（他们开会的地点）委员会，并开始垄断秩序党的表述。对于这些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他们更容易结盟，但 628

两个王朝中没有一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王位觊觎者，或是能够在普选中试试运气的人——来说，君主制依然是一个严肃的保守政体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我们知道，秩序党是如何在梯也尔的建议下决定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的。他的冒险家经历、所欠的债务，甚至他的外表，使其相当不讨人喜欢，没有什么会在一开始就能显露出他的才智或意愿，凡此种种，都使人相信可以一直对他进行操纵。而他的名字在大众中的广受欢迎，尽管本身有点令人担心，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明显成为有利的因素。除了某些对第一帝国的记忆仍是令人厌恶的地区（尤其是普罗旺斯地区）外，都作了这一选择，而卡芬雅克只得到了少数富裕和有影响的显贵的支持。尽管他代表了现有政权、行政机构、连续性和著名人士。共和派“知识分子”中的最温和派支持他，特别是报界，大部分都支持他。

但是，由于他的反动行为过多，以至于无法再成为所有共和派的候选人。而正是由于他所开始的反动行为，使得赖德律－罗兰着手进行一项新的事业：在春天时，内政部长在抑制社会主义方面没采取什么行动，到了秋天，他成立了一个名为“共和派团结一致”运动，参与该运动者将成为卡芬雅克政府中的左翼反对派。此外，他也通过参与总统竞选来与卡芬雅克唱对台戏。路易·勃朗的某些社会主义者友人也刚刚参加了“共和派团结一致”运动。共和派团结一致由此将成为法国民主的一种悠久的政治传统的起点，这就是自由共和派中的最激进人士和拥护社会主义者中的最温和派之间的结盟。当然（这也将是一个传统），社会主义中的强硬派，人们有时称之为“共产主义者”，拒绝这一重新集结；他们让拉斯帕伊出面参加竞选。众所周知，拉马丁自认为是二月革命伟大时刻的最好象征，也坚持要试试运气，真是个高傲的孤独者。1848 年 12 月 10 日，选民们以 5434000 票选择了波拿巴；随后依次是卡芬雅克（1448000 票），赖德律－罗兰（371000 票），拉斯帕伊（37000 票）和拉马丁（8000 票）。

12 月 20 日，卡芬雅克交出权力，共和国总统执掌大权。制宪议会把前者当作新的辛辛纳图斯（传说中的早期罗马共和国的英雄。据

历史传说，他在公元前458年被推举为独裁官，率军援救被埃魁人围困的罗马军队，打败敌军后即解甲归田）加以欢呼，并肃穆专注地接受了后者的正式宣誓。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郑重宣布将忠于宪法，该宪法以正式的形式迫使他在四年后重新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公民。在参加这一仪式的众多人中，有一位塞纳省的代表，当时他坐在右侧，而且他还在12月10日投票支持拿破仑，此人就是维克多·雨果……

新总统很快就组织起了内阁。他自然而然地任命那些秩序党人加入政府。其中最著名的是奥迪隆·巴罗和法卢伯爵。在各级行政官员中都发生了真正的人员变动，其变化程度比夏天时更为彻底。以下是两个互为补充的例证：年轻的地方行政长官埃米尔·奥利维耶，卡芬雅克还仅是将其从马赛调到肖蒙（上马恩省），却在1849年1月被免职；同时，年轻的奥斯曼男爵，曾是路易－菲利普时期的专区区长，自1848年2月后一直赋闲，此时却被任命为省长。所谓的反动行为，此时已不再是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而是明显地变为反对共和派的行为。

立法议会选举和1849年6月危机

为了完成立宪政体各机关的布置，就不能缺少立法议会。老实说，其共和多数派对局势发展感到担心的制宪议会，还想延长一段时间以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毕竟它的制宪任务已经完成，延长期限的想法依据不足，于是，它只能以接受解散而告终。因此，立法议会选举确定在1849年5月13日举行。 629

人们往往将1849年5月13日的这些选举与1848年4月23日的选举进行比较，要么众口一词，要么众口难调；事实上，第一次两个有组织的大“党”（虽然它们的组织还与我们所说的20世纪的“政党”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代的政党是法律意义上的社团；但是结社自由在19世纪还没有被定为法律，整个自由派舆论甚至对它持否定态度，这一舆论总是立刻怀疑任何有牢固联系的集团是在搞阴谋，这是当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不久还将看到）在互相对立。一边是“秩序党”，另一边是“山岳党”，双方都是既无章程，也没有明确纪律的团体，但是却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围绕一些领导人、报刊和原则聚集

在一起。山岳派（名字借用自1793年的国民公会）是共和团结一致派的延续，后者在明确地作为社团存在几个星期后就被禁止了。他们的理想是“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公众称他们为“社会民主派”，而他们的对手则谴责他们为“赤党”。温和共和派处于这两个阵营中间，他们在1848年几乎占据了整个政治舞台，现在则根据他们的倾向重新组合，或是倾向保守派一边，或是民主政治一边，抑或像拉马丁一样，躲避争论。很少有人能够在他们的省份中因持中间派立场而当选。

鉴此，5月13日选举是一次两极化的选举。正是在这次选举中，产生了首张法国政治舆论的稳定的地理分布图，对于这一观点，人们已司空见惯，但它却依然非常重要，直至今日，有关它的评论者们仍乐于在全民投票后重新发现这张地理分布图的某些轮廓：“激进”（广义上的该词）的外省依然还是“激进”，投票给极左派的那些省份，即使它们都是乡村省份，仍会继续投票给极左派，例如，瓦尔和下阿尔卑斯、洛特-加龙、多尔多涅、谢尔和阿利埃省等等……总之，这只是少数：在总共750名代表中，大约有200名山岳派当选者，而保守派却有将近500人，至于中间派，则不到100人。当时，人们只可能知道这一红色外省的地理分布将在几十年内都是大致稳定的（因此亦是居少数地位的）。人们相信——不管是为此哀叹或是感到高兴——它只是一个开端。总之，人们感觉到——毕竟这值得指出——社会主义亦能吸引城市无产者郊区以外的选民们。乡村版的社会民主制是可能的，这确实是1849年5月选举的最重要启示；这一点将影响（正如菲利普·维吉耶已有力而正确地强调的那样）整个第二共和国的历史。而在当时，这一点使得保守派们感到恐惧，就像它在反对派中所燃起的希望一样，这使得新选出的议会异常紧张。

不过，第一次爆发是由于外交政策而起。在这一领域反动行为也有体现；在意大利，共和派（马志尼、加里波第）已在罗马取得胜利，教皇庇护九世落荒而逃，一支法国军队首先开往那里，其主要是为了防止奥地利借机牟利。但是，新政府扩展和加重了法国远征军的

使命：要求他们夺回共和派手中的罗马，并与教皇一起恢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红衣主教们的统治。在议会里，赖德律-罗兰代表左翼的山岳派发言进行质询，但因为他们是少数派，未能取得任何结果；6月13日，山岳派匆忙决定上街游行，但以惨败告终。当军队出现时，赖德律-罗兰及其同伴们几乎是大街上仅有的人。侥幸逃脱逮捕的赖德律-罗兰来到了伦敦，这里的流亡者小团体由此得到了壮大；其他代表则被投入了监狱。人数有所减少的山岳派将由居于次要地位的人领导，如律师米歇尔·德·布尔日或是泥水匠马丁·纳多。但是，已与1848年6月大相径庭的是，这一与巴黎人的起义有相像之处的事件在外省产生了一些反响。6月15日在里昂，山岳派的游行示威发展成一场持续数小时的街头战斗，冲突造成双方各有几十人死亡。其他一些城市，甚至是村庄（在阿利埃省）也发生了骚动。 630

1849—1850年在中心，反对社会主义的运动

在一些省份，戒严是对这些骚动的回应。从1849年夏天到1850年夏天，政治越来越处于镇压的影响之下。尽管在总统、内阁——先是巴罗，然后是多特普尔——和议会多数派之间也存在一些小分歧，但是，整个这一年度的情景是各种权力之间相互协调，以共同压制民主舆论：始终全面清洗行政与教师队伍；投票通过有关俱乐部的新法案；针对反对派报刊的诉讼，凡此种种，导致有人厚颜无耻地将其称作“国内远征罗马”时代。正是在这种协调一致和总体氛围中出台了著名的法卢法：它不仅不打算兑现教育自由这一自由主义承诺，而且还将所有世俗教育机构置于行政和“道德”当局（事实上就是教会）的控制之下。不过，这一反动行为并非未曾遭到反击：有关法卢法的争论表明，随着维克多·雨果加入到山岳派阵营，山岳派有了新的雄辩家，一位享有盛誉者，即使此人不是十分胜任。

为了填补这些由于1849年6月13日实施的镇压而空缺的席位，1850年3月10日和4月28日举行了补充选举。由于相当一些尚在监狱中的山岳派被选上，秩序党遂对普选横加指责。1850年5月31日法令对选民资格的认定增加了一些仔细计算过的条件（交纳直接税，

在当地居住 3 年），从而排除了那些最贫穷的公民。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如果不再现当时推动保守派法国的道德运动的真正精神，那么人们将难以理解这些过分的措施、这种王位——如果能这样说的话——与祭坛之结盟的回归、这种回归限制性选举。“宗教、家庭和财产”构成了整个文明生活必不可少的神圣的三位一体。社会主义，当它批评资产阶级婚姻中女性地位的极端低下时，就被怀疑是在鼓吹没有限制的自由、一夫多妻制或是男女混杂；当它批评富人的恶习时，它又被认为是为偷窃作辩护；至于它对整个现实世界的批判，则使它回归野蛮。确实，“社会民主派”的社会主义是混乱的，而且是并不同质的；例如，关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消费资料所有者之间的阶级区分可能已有所认识，但相关阐述却颇为糟糕，这一缺陷明显使得所有者们更为担心……无论如何这些所有者们并没有努力去理解，而那些“社会民主派”以自己的品德、节制甚至福音主义——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依然放弃唯物主义，并倚仗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所作的各种保证被看作是虚假的谎言，这更使他们的处境趋于恶化。

法国政治中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对话可能更似聋子间的对话。此外，福楼拜在其令人拍案叫绝的《情感教育》中完全复活了这一时代的精神。

1849—1850 年外省，巨大希望

631　但是，外省，乡村外省再一次地成为关键所在。

农业已成为最不幸的经济部门。这并不是因为大危机在其他地方已完全得到克服。例如，强有力和现代的信贷机构的缺乏、政治局势的尚不稳定，使得大的公共工程和铁路建设依旧停滞，而这又影响到了冶金工业的生产。但是，1849—1850 年间在很多其他工业制造领域，恢复已经开始，商业活动也重趋活跃。与之相反，在农业领域，萧条依然在持续：谷物、酒的价格——仅举这些最主要的产品为例，仍然处于最低水平。无论原因是什么（这一领域的发展通常滞后、特别容易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丰收带来的产量增加），事实始终是：农

业收入是最低的。在这个农业必须以本质上已陈旧过时的技术养活前所未有密集的人口的时代，乡村社会——人们记得的——尤其显得脆弱。结果就是农民的负债加剧。在某些地区，人们已开始把它看作是当时最尖锐的社会问题。

不管怎样，民主派已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从1849年起，他们已着手在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而揭露“封建”农村的高利贷者则在这一宣传中占了重要地位。因此，在某些地区（并不是全部——历史有一天会告诉我们其中的深层原因——但是在过去，人们并没有预见到这些征服的界限），即在法国南部、中部或东部的某些地区，农民开始将对优惠的信贷或是减少间接税的期望寄托于“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我们前面指出的选举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这些信念。这也解释了山岳党的乐观思想。从1848年12月到1849年5月，有时则是从1849年5月到1850年3月，赖德律-罗兰的朋友们已取得的进展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相信，自己能在预计于1852年5月举行的选举中获胜。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日期：事实上，及至这一时刻，1849年选出的任期三年的议会和1848年选出的任期四年的总统将同时到期。仅仅通过1852年的一纸选举公报就使一个社会主义法国和平出现，这使得这一年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象征，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希望，对于其他人则是恐惧。

让山岳党人形成乐观思想的这一希望也使得他们在面对公共权力实施的不计其数的挑衅时，几乎总是保持一种值得称赞的冷静：我们已提到的针对报刊的各种诉讼只是一场不间断的讽刺战中最突出的事例（因为戴红领带而收到违警通知书，因为唱皮埃尔·杜邦的社会歌曲而收到违警通知书，因为在互助会所在地高声朗读政治报刊而收到违警通知书，等等）。于是，宪兵队在农村变得非常不得人心，而那些偷猎者在1851年并不是惟一受打击的人。这一乡村游击队比当时那些挤满人的村庄更易激动，也比村庄中的那些单纯、幼稚、热情的人更易激动，后者已带着新信徒的兴奋投身于“红色”政治，而同时他们依然与自己的一切习俗、节日和传统保持联系。由此，在民主政治

与民间文化之间出现了一种奇异的自发混合。此外，有时山岳党的领导人们引导了这些联合与这种扎根现象。正是依照《乡村报》——茹瓦纽的报纸，他是约讷省的代表，山岳党的农村专家——的号召，人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村庄，星期天上午所有男子都集合起来去为一位受伤或是生病的同志耕地。把民众团结一致的自发活动重新恢复并系统化，山岳党人想以此表明，他们的集体主义首先是符合道德的、成果丰富的和博爱的。唉！当受这一情感而激励的同志们唱着他们保留曲目的叠句，有时还打着一面红旗，结伴前往田地时，警察对这些骚乱的迹象做了笔录。你们禁止我们从事符合道德的行为，一些人说。另一些人则说：你们以道德为借口进行煽动——相互间的不理解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巴黎报界的实情，而且还是各地普遍存在的真实经历。

632

1850—1851年在外省，组织的时代

人们可以预见1850年5月31日法令在“山岳派的征服”这种令人惬意的情景中所产生的骚动：这一承载如此多希望的普选在事实上被废除，不可避免地又将革命提上议事日程，要么在1852年重新获得选举权，要么甚至在这一日期之前起来反抗其他的反动行为。由此，一些被称作“新山岳派”的民主派人士开始着手将最坚定的积极分子更紧密地集结起来，并且通过秘密会社网络来改善村与村之间，甚至省与省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在1848年前已有一些民众的和外省的政治社团存在，它们的组成所依照的是传统的社团模式（共济会或是烧炭党）。但是，在共和国建立以后，政治合作主义通常是以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如俱乐部、选举委员会、联谊会、互助会等等。随着反动统治的来临，俱乐部被取缔，联谊会和互助会被严禁超出它们特定的职责，并且稍有一点违规就会被解散。及至1850年，公民聚集在一起讨论公共事务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要谈论这一类的事情，除非是在私人住宅中，或者是在咖啡馆中，但是，仍要相当警惕！当然，人们还是在举行聚会，尤其是在法国南部地区，那里喜爱社交已深深地扎根于习俗之中。但是也要谨慎行事。当镇压当局知

道以后就会指责它为“秘密会社”，即使只存在一个因为缺乏资产或有悖于法律而被迫处于地下状态的根本无害的联谊会，亦是如此。公共当局由此认为，秘密协会无所不在——此论以夸大的证据为凭，而自由主义传统的共和派历史学家则陷入了另一种极端，即否认或是降低真正的秘密协会的重要性，从而为其伟大的先辈洗刷搞阴谋的罪行。今天，人们已更好地看到了真实情况，它实际上是介乎于两者之间。

从 1850 年秋天开始，在里昂对一位重要的阿维尼翁积极分子阿尔方斯·让特——法国南方的协会和日内瓦或伦敦的流亡者之间的联系人——的逮捕行为，使得在整个法国东南部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相互串联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里昂阴谋”事件。直至 1850 年末，加尔、德龙、下阿尔卑斯、瓦尔、罗讷河口省的大量有影响的积极分子都被逮捕。即使只能证明存在某些联系，而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起义准备工作，但是，在 1851 年 8 月所宣布的惩罚还是严厉之极：三位领导人被流放至马尔吉兹诸岛（在努库希瓦岛），其他十多位领导人被流放至美丽岛的城堡中。当然，协会和组织又被重新建立，但它们是由那些可能相对缺乏考验的积极分子所建立的。

然而，不能把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看作是同一路人，并一致投身于防御性的政治活动之中。相当一些人似乎从不能利用选举这一现实中产生了以下愿望，即在政治斗争之外，转而寻求实际的社会改良：事实上，在整个 1851 年，社团的餐厅或面包店、生产过程中工人们的合作有了很大程度的复兴。但是，当局根本不去考察政治上的活动主义与工人的经济主义之间的差别。它在后者中即便不怀疑它是阴谋的伪装的话，也只愿意看到其对私人老板的损害。当局的纠缠不清导致民主和民众运动的统一得以维持。 633

1850—1851 年在首都，混乱的时代

自从 1850 年夏天以及那些旨在摆脱红色危险的措施被采用以来，保守派阵营得以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未来了。但是，从那以后，它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对于路易·波拿巴来说，1852 年避免危机的最佳方式是永远大权在握；通过视察兵营，在外省到处巡视，努力在议

会多数派中形成一个真正的“爱丽舍宫派”，他开始培育自己的个人声望。他的省长们更是唆使各省议会发愿、公民们签署请愿书，表示支持修改宪法，尤其是废除有关总统不得连任的规定。他所取得的成果并不大。但是很明显，总统在进行通往专制和帝国的个人冒险。某些保守派对此感到担忧，这或是由于他们珍视自由主义制度，或是由于他们依然希望复辟波旁王朝中的一支，或是由于和那些寄希望于波拿巴主义的小集团、工商业集团之间存在的个人利益或经济冲突。秩序党因而分裂成两派，至少在上层政治领域是这样。自1850年末起，直至1851年全年，整个国家政治就是总统与议会保守派多数中的反波拿巴派（尤其是在梯也尔的推动下）的斗争。在一系列曲折变化中，首先发生的是1851年初的尚加尼埃事件：总统免除了这位将军的职务，而他是保守反对派的希望之一，曾禁止士兵们呼喊“皇帝万岁！”的口号。反过来，在7月份时，波拿巴在修改宪法方面遭受了挫折。议会只有在达到3/4多数票的情况下才能决定修改宪法；然而，山岳派和反波拿巴的保守派加在一起要远远超过反对所需的1/4票数。

看不见的哨兵

于是，在10—11月间，总统突然采取了一项狡猾的措施，它预示了政变的诸多要素之一，这就是建议废除1850年5月31日法令。这自然遭到了保守派中大多数人的反对，后者之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维持对普选权的损害。至关重要的是保守派反对者和民主派反对者之间的分裂重新出现，这在当时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人们由此就明白了议会总务官们所提建议的决定性意义。修宪被拒绝后，总统只有违背宪法才能在1852年继续掌权；因此，政变极为可能发生，而它的准备工作亦非常明显。属于反波拿巴派的保守派的议会总务官们，建议通过一项法令来允许议会组织起自己的军事防卫力量。但是，由于这些保守派曾是如此的反动和反人民，以至于山岳派们难以相信这是自由主义在这些人身上的重现。由于担心梯也尔之流搞政变，绝大多数的山岳派在投票时站在了爱丽舍宫派一边，拒绝了总务官们的建议。米歇尔·德·布尔日，这一导致议会策略出现致命性错误的主要领导

人，曾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来证明这一行为的正确，他指出“看不见的哨兵”，也就是人民，为议会和自由提供了充足的护卫。这种一本正经的蠢话导致了街垒的出现，激起了民众的呼吁，它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效力，但实践将证明，这种效力所起的完全是一种负作用。

三、反对“好”共和的保守派秩序

1851 年 12 月至 1852 年 12 月

政变的筹备

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位波拿巴主义者：在媒体和议会的辩论中，他看到的只是毫无用处的长篇大论和混乱；至于人民的愿望，他能感觉到其中的原因，并且为它们辩护，但是，他需要强大的权力来安排（并且限制）这些满足措施。对于他来说，波拿巴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学说或是精神状态，它还是有待恢复的遗产，一种家庭和个人使命，对此他似乎始终坚信不移。选择 12 月 2 日——1804 年皇帝加冕和 1805 年奥斯特里茨大捷的周年纪念日——为政变日，足以证明这种神秘主义和迷信。不过，意识形态和迷信并不等于就排除了肮脏的动机，对此当时就有很多议论：确实，总统以个人名义欠了很多债，回到普通公民的身份对他来说相当困难。 634

同样的动机也不同程度地在家族亲信中体现出来——某些人已提升至要职，其他人还只是心腹，这些人甚至瞒着某些部长，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帮助总统进行准备工作，他们当中主要有他的同母异父兄弟莫尔尼，军事部长圣阿尔诺将军，警察局长莫帕。莫帕和圣阿尔诺被逐渐提升至指挥军队的关键岗位，加之我们已经提到的议会中的阴谋、在军官中进行拉拢和清洗的极端秘密的行为，这些都构成了政变准备的主要部分。莫尔尼是这一切的主要统帅，就像他是那一天或更确切地说那一夜来临时，发动政变的真正领导人一样。

政变

事实上，在12月1日至2日之交的夜晚，主要的行动已经进行：在首都的各战略要地部署军队；在严加看守之下于国家印刷厂印制即将张贴的公告；在那些有影响的议员家中逮捕他们，其中有梯也尔和尚加尼埃。这些逮捕旨在消除议会反对派的领导，公告的目的则是使反对派民众保持中立。这些公告中所包含的声明针对的是军队和民众。后者明显是主要的对象。它宣布了一些重大决定：解散立法议会，实行公民投票，制定新宪法；为了证明这些措施有其必要，在波拿巴派有关执政府的丰功伟绩和评议会的无能之类的传统主题之外，它还通过宣布废除1850年5月31日法令来重新实施普选。由此，这些政变者们一开始更倾向于煽动群众而不是暴力，他们巧妙地使自己处于左派位置，而不是被解散的议会一边。

巴黎保持中立——至少人们如此希望，外省随即亦复如是。我们知道有多少政治骨干已被流放或是监禁；其他的当选者则聚集在巴黎以参加议会会议。当局信任那些地方官员：将军们依照军事部长的命令控制军事区域和各省。至于省长，他们将听从莫尔尼的命令，后者自12月2日黎明起就任内政部长。新的行政领导只做了为数有限的变动：1849年以来安置的全体省长往往已受爱丽舍宫的直接影响（奥斯曼的《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而效忠波拿巴主义在他们中也已非常普遍。此外，在反对“红色”宣传的三年激烈斗争中，绝大多数省长已习惯于采取毫不顾忌法律的猛烈措施，而这又为政变做了铺垫，并已预示了它的出现。对于所有这些公务员来说（我们将看到，对于一部分舆论来说也是如此），从共和国到专制这一步很容易迈过，因为这一明显缺乏有关集会、结社和新闻出版的有效法律的共和国，已然甚少自由。

巴黎的反抗

635 1851年12月2日上午，绝大多数没有被逮捕的议员穿过巴黎的街道，前往波旁宫，此时的巴黎只有寥寥无几的行人在阅读公告，他

们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愤怒。而这些议员的愤怒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权责被中断了，他们的同事在家中被闯入的军警逮捕，除此之外，在资产阶级的法律文化和教育还是高贵的和稳固的时代，这反映了国家元首的叛逆和违背誓言。但是，当讨论在不堪这一责任重负的杜班的有气无力地主持下进行时，一团士兵出现了，他们的任务是清空会议厅。由此，12 月 2 日遂越来越像雾月十八日（或十九日），但是，这一给议员们的愤怒更添理由的新插曲，也使得言论表达变得更不容易。

被驱逐的议员有约 200 人在邻近的一个公共场所，即第十区（现在的第六和第七区）政府重新聚集。他们在那里商议了很久，试图找到最佳的法律对策，但是却根本没有想过，理所当然地要征集一支只可能是由群众组成，从而是革命的力量。当中午军队抵达第十区政府时，议员们虽然高声抗议，但却束手就擒，带着某种程度的慰藉（从那时起就已有详细记录）：逮捕表明他们并不是政变的同谋，而且剥夺了他们重新加入骚乱阵营的可能，即使他们曾经这样想过的话。由此，他们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信仰和保守派的谨慎同时得到了满足。在马扎斯待的时间并不长；在法国以外至多流亡了很短一段时间以后，法国政治精英中的右翼庄严地准备在阿梵丹山度过二十年。

不止一个巴黎人，即使只是小民百姓，都面带嘲笑地看着将这些外省的重要人物送往监狱的马车驶过。为什么要为这些人而战？他们在 1848 年 6 月曾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冷酷对待无产阶级，并且在 1850 年 5 月又剥夺了后者的选举权。巴黎街头随即出现的消极状态对于政变来说是一种成功，就像它一开始被认为是煽动群众的和反议会的一样。一小群逃脱逮捕和蔑视其同僚们的空泛议论的山岳派议员正是试图扭转这一状况：米歇尔·德·布尔日、维克多·雨果、维克多·舍尔歇（主张解放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和其他名气较小的人组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决定号召东部革命的老郊区的劳动者们拿起武器。事实上，在 12 月 3 日那天，圣马丁街、波布尔街区、圣安托万郊区建起的街垒，证明头脑清醒的先锋队拒绝将人民幸福的愿望与传统政治自

由主义的愿望相分离。工人与共和派名人之间的对话存在的艰难程度，从一则轶事中可见一斑，即使它并非完全真实，但却能说明问题，这就是有关议员博丹死于圣安托万郊区一个街垒的轶事。当时议会津贴是每天25法郎（而一个工人每天能挣5法郎就是很高的薪水了），于是，民众中的一位男子对那些号召他们去战斗的议员们说道："我们不想为了维护你们的每日25法郎而去送死！"博丹回答道："你将看到人们是怎样为了25法郎而死去的。"博丹遂跳上街垒，随即被前进的士兵射中身亡，这实际上就是自杀。博丹之死或是迪苏布（另一位议员的兄弟）之死，增加了这一议会左翼抵抗行动的影响。在此种形势下的这一死亡，自1868年起被甘必大的朋友们树为象征，体现了一个自由的、人民的共和国已经诞生的理想。而在当时，巴黎东部街道上的战斗依然进行得并不激烈，这首先是因为起义者未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另外也是因为莫尔尼依据传统方案，直至12月4日中午都听任运动扩大，以此来实现更广泛的镇压。政变计划只能说是进行得过于成功。事实上，一到12月4日下午，尽管群众的街垒依然存在，但是大林荫道上惯常的散步人群又恢复了行走，他们对于一场相对缓慢的斗争可能造成不确定的局面感到好奇，对经过的军队抱有敌意。不知在哪突然发生的事件导致骑兵部队发起冲锋，并还开枪射击。于是，12月4日晚上，巴黎被制服了，但是在由群众居住区提供的惯常伤亡之外，"大林荫道上的齐射"增加了一份资产阶级人士更多的伤亡名单，对于他们的回忆将一直持续。

636

外省的反抗

当这一艰难甚至是含混不清的斗争在巴黎结束时，我们知道某些地区不再像世纪初以来似乎成为外省注定之命运一样处于消极状态，而是拿起武器反抗政变。

但是，并非所有地区如此，而且即便在起义的地区里，也不是所有的市镇如此。在国家领土的四角，从里尔到里昂、马赛，从波尔多到南锡、斯特拉斯堡，各大城市都以简化的形式经历了巴黎的命运：因为它们都驻扎有大量军队，因此12月3日走上街头的共和派游行示

威并没有发展成为骚乱。相反，警察几乎马上就以在家中或是报刊所在地逮捕著名的积极分子作为反击。一些人逃到附近的市镇，在那里他们——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发动反抗斗争。因此，它将成为那些地区的特点，在此民主派远不是仅限于大城市的工人群众，而是已经知道在小城市、乡镇和村庄为其事业赢得相当数量的信徒。因而这种反抗重新体现和证实了法国政治舆论的地理差别，后者在 1849 年 5 月 13 日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已得到最初描绘。在巴黎北部的平原地区没有出现反抗，在西部阿尔摩里克丘陵地区同样如此（除了萨尔特省的共和派边缘地区，拉苏斯镇举行了起义），在中央高原中心没有反抗，在东北各省除了汝拉省的两个小城市（波利尼，阿尔布瓦），基本没有反抗。反抗是三个地区群的事。第一个横穿法国中部，在中央高原北部，从安省和索恩－卢瓦尔省到上维埃纳省，穿过约讷省、拉涅弗尔省、卢瓦雷省、阿利埃省和谢尔省。此外，它远没有覆盖这些省份的全部地方；只有一个，即克拉姆西的专区政府被起义者占领，并出现了流血事件；此外有一些零星的乡村聚集，但是，在攻击省会之前就被驱散了。第二个起义的区域是阿基坦盆地：塔恩－加龙省、洛特省、洛特－加龙省、热尔省，尤其是多尔多涅省和阿韦龙省。这个区域也是不连贯的；不过，有多个专区政府被占领，如内拉克，马尔芒德，米朗德等等，阿让和欧什的省政府也差点被占领。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区域，是东南部的地中海与阿尔卑斯地区：东比利牛斯省、埃罗省和加尔省、瓦尔省和沃克吕兹省、下阿尔卑斯省、德龙省和阿尔代什省。正是在那里，起义往往规模甚大，尤其是在埃罗省的中部、瓦尔省的西半部分、下阿尔卑斯省的西部和南部、德龙省的南部；正是在那里，暴力有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在埃罗省的贝达里厄）；正是在那里，人们看到不仅有大量专区政府（贝济耶，布里涅奥勒，锡斯特龙等等），而且迪涅的省政府被占领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这在法国实属绝无仅有。最后，正是在那里，通过各大城市的军队恢复秩序导致 12 月 9 日和 10 日在奥普斯（瓦尔省）、梅城（下阿尔卑斯省）、克莱斯特（德龙省）出现了一些类似对阵战的战斗。

这些事件的相似性和同时性令人惊讶。但是，这是因为政变是可预见的和预料之中的，所有共和派积极分子都有时间认识到这一点和
637 相应的法律对策：宪法第 68 条已对总统违反法律的情况做了明确规定，规定在这一情况下总统将丧失权力，而第 111 条则以更笼统的语言将“保卫宪法托付给所有法国人的爱国主义。”由此，人们很自然地就可推断在 12 月 2 日之后继续服从波拿巴总统的行政当局是波拿巴总统叛逆的同谋犯，同样应被处以免职的惩罚，由那些坚定遵从宪法与共和国的公民取而代之。机缘巧合，通过宣布恢复普选，波拿巴本人似乎无意地增强了这一思潮。“人民恢复自己的权利”，在 12 月 3 日、4 日和 5 日的地方反抗中人们听到有这样的说法，而要鉴别民众有关事件的这一解释是否与对第 68 条和 111 条的解释或废除 5 月 31 日法令有关，则往往有点困难。不管怎样，根本上是合法的人民权利应该被恢复和重新行使，这一概念在各地都已出现。运动在各处也都首先是市镇范围的。人们前往市镇政府，如果市镇议会拒绝担任运动的领导，人们就组织临时市镇委员会来取代它。当市镇当局已经存在争吵时，运动就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例如，像中央高原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当一个市镇由保守派的市镇参议员——他已被省长任命为市镇长官以取代被撤职的民主派市镇长官——管理的时候就是如此。于是，起义就是恢复人民选出的真正代表的地位。仔细考察运动的起源，尤其是它在各地的经历，人们会发现，它在以下情况时尤为强烈：当存在地方争执——政治的或是社会的，我们将回过来看社会的——需要解决时，当巴黎的政变为对几个月来省长和某些显贵实施的无数地方政变进行报复提供了机会时。就任市镇长官后，共和派们首先想的是武装自己，以金钱武装或是以国民自卫军的枪支武装——如果他们能夺取的话（假如人们没有意识到当时国民自卫军这一根本制度的存在的话，就无法理解 1851 年 12 月夺取武器行为的广泛，以及完成这些行为时所具有的法律上问心无愧意识）；他们也想解除自己对手的武装：宪兵队的营房，如果当地有的话，被包围和占领，夺取其中的武器；秩序党的资产阶级成员的住宅往往也因为相同原因而被搜查。

人们还将那些被认为是最好斗的宪兵和显贵监禁起来，当然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在市镇政府之后有待夺取以用来阻碍政变的权力机构是专区政府和省政府。这是艰难的征服：这些政府所在地往往有一小支驻军，而且围绕着公务员、资产阶级和业主，秩序党在那里通常是最强有力的力量。正是为了向这些政府所在地进军，民主派经过仓促协商，组织了由数个村庄的人员构成的纵队。阿利埃省的村民向拉帕里斯进军、下阿尔卑斯省村民向迪涅进军，以及左拉在《卢贡家族的命运》中使之永远被人记住的——以毫无秘密可言的化名——纵队穿越瓦尔省的行军，这些都是最轰动一时的进军。人们也知道它们的不同命运。

这一总体场景——有必要被提及，因为它揭示了运动的本质——因各种非常不同的地方情景相互补充而变得完整。远没有达到血流遍地的程度；流血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在宪兵试图反抗缴械的时候。平民间的叫骂打架和“资产阶级”的凶杀还是非常少见的（克拉默西，贝济耶），这些事件的具体情况如何往往还不清楚，而且人们不能排除误解或是私人报复的假定。至于运动的结局，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是对阵战，最为常见的则是自发地散去。在起义的几个小时或是几天的进程中，还存在另一差异，这就是有时——但并不是到处——有针对一些制度（例如，在中央高原，反对酒税的某些声明，以及销毁“间接税”征收簿）立即行动的企图；有时也有带社会请愿色彩的行动（洗劫某个业主，强取罚金），此外，更多的是针对村庄中的高利贷者，而不是商业或工业老板。 638

的确，这些出于原始暴力或是经济怨恨的事件是惊人的，但是它们是零星的，而且即使在起义中，某些领导人也曾试图加以阻止。由此，它们与确切地说是政治—法律行动所具有的普遍和一致特点形成了对比。

重新解释

但是，地方发生的暴力和社会反叛事件并不是由于它们的相同特点而最为引人注目，对于反对共和的宣传来说，它们是最适合的，它们正是由此马上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一起义，并不是发生在大城市，

而是发生在外省的乡村和偏远地带（都是些怎样的省份啊！阿尔卑斯或莫尔旺的“野蛮”山区，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的古老“迷信”地区），它不可能是一个进步的运动，而是迟钝的征兆；它是“扎克雷起义”。“扎克雷起义”也迅速成为1851年至1852年之交的冬天法国报刊的常用词语。它佯称在其中看到了颠覆和怨恨的爆发，赤党被认为在担心1852年的选举胜利成疑之后就以“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的名义筹划了这一起义。我们已经说过秩序党关于社会主义的夸张讽刺形象。保守派想在12月的外省事件中得到证实的正是这一形象。为此，他们必须——经过一个世纪的史学考证，今天人们已对此很清楚——对事件加以严重歪曲：省略整个政治过程、将某些具有流血或是破坏公物特点的事件大规模普及，有时纯粹是发明施虐狂式或下流细节，尤其是各种系统的重新解释，其中最简单的就是将那些相当广泛但事实上具有军事特点的活动归为“抢劫”（因此是偷窃，因此是……社会主义），如夺取武器、在经过的村庄中征用（仔细结账）面包和酒或是控制邮局中的电报。在12月泛滥的这种扎克雷起义的传说中，被迫处于缄默的左翼报刊没有进行反驳（原因自不待言！），自由派的保守者和波拿巴派保守者则热烈竞争……并言归于好。事实上，重建秩序党的统一正是共和运动的结果，尽管是完全无意识的。红色威胁使得听任政变发动的人和发动政变的人的行为都得到证实。因为扎克雷起义的神话使得路易·波拿巴及其亲信很巧妙地转变了他们的宣传：正是为了从革命威胁中解救社会，所以他们必须强化国家机器。由此，波拿巴主义者的政变在12月2日的巴黎发动时还具有模糊的左派成分，到了12月10日则变成完全是保守派的事业。一直要到将近十年以后，波拿巴主义才恢复它独有的双重性。

作为骚动的四年的结果与综合，1851年12月的共和派起义必然是复杂的。所谓的“扎克雷起义”传说将经不起共和派政论家从1860年代起所从事——为大学历史编纂所延续，几乎一直到今天——的批判考察。阐明了根本的法律动机，恢复了那些争论事件的真相，并且明确地指出这些事件是很罕见的，强调那些领导人的严守法规、迟疑

639

与稳重，这些是此种必不可少的历史编纂反应的最终结果。但是这些反应往往又走得过远了，“粉红色传说”并不就比“黑色传说”更好地体现历史智慧。试举一例：当不公正是体现为某位行为过分、令人厌恶的乡绅、公证人或是警察分局局长这样的熟悉形象时，那么人们根本就不是如此强烈地为宪法第68条、权利与共和国而战。但是因为保守派为了支撑“扎克雷起义”的论点，已经以地方轶事和阶级斗争而作了过度解释，所以共和派在很长时间内必须降低此类动机的重要性，甚至是予以否定。同样地，因为保守派夸大了密谋社团的作用，所以共和派就降低它的重要性。有关12月运动的一种平衡看法形成的时间并不很长；此外，它并非像初看起来那样，是相对立的两种传统中的有用部分折中总和；它是想对维系经济—社会愿望与纯粹政治理想的那些关系作深入思索。

不过，目前记者和作家们有另一章历史等待撰写，这就是镇压的历史，共和派提出的主要辩护论点是将他们暴力行为（合法或不合法）的稀少，与当局实施的暴力的惊人规模作比较。在战斗中有死亡者；在群众溃散后进行的神秘的“追捕赤色分子”中有死亡者（无疑是数量众多的），在充满仇恨的诉讼之后的断头台下有死亡者。但是主要的极不公正之处在于暗含其后的论点，即12月的“扎克雷起义”是“红色”宣传的自然结果，所有宣传者都是暴动匪徒的道德上的同谋者。由此，当局逮捕和起诉了大量甚至没有参与起义的共和派，而起义后进行的镇压则为在一些年里抑制共和派提供了机会（这只是通过警察监视或软禁这样的温和形式）。最后，由于一个旨在将这一巨大猎物分类的超越常规的法庭——著名的“混合委员会”，其中司法、省长和军事三种权力相互合作——的建立，当时的司法精神遭到粗暴践踏。移送军事法庭、重罪法庭和轻罪法庭，终身放逐圭亚那、阿尔及利亚（软禁或是不软禁），流放国外，在法国国内不同程度的监视，这些就是各种可能的结局。由此，英国、比利时、瑞士、皮埃蒙特涌入了大量积极分子，他们或是被流放者，或是逃亡者，其中最有名者将以其著述而使放逐永远被纪念。1848年的共和国至少在这一点上是

浪漫的，即它有一个拉马丁来为其春天欢呼，又有一个维克多·雨果来为其漫长的冬季提供抚慰。

走向帝国

12月21日，结果是几乎一致同意的全民投票——在某些省份是在恐怖气氛中进行的，而且在各地都完全没有争论——认可了既定事实。它使得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实现了在宪法方面的愿望：一个总统居优势地位的共和国，其元首（此后叫做亲王—总统）只是有了一个可以转为皇帝的称号。1852年1、2月，各种法令最终限制了尚存的出版、集会和解释自由。

不过，在一个基本点上，人们并没有回到第一帝国：政体保留了普选权，这使得它依旧是现代的和大众的；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有利于民主派的结果，它寄希望于两种预防措施：首先是取消所有自由的保障，重新将全体选民分割。与基佐时代一样，人数已然减少的议员是通过在划分适当的选区中以单名投票的形式选出的。这一选举体系延续了几乎整整十年（只有5位反对派当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经历：因此普选并不一定是反对显贵的武器，甚至也不一定是反对君主的武器；它可能被专制的保守主义所吸收，从而赋予其现代性的保证。在1848年2月实行普选后，1852年1月继续实行普选这一点再次证明法国政治已进入了大众时代，但它并不必然就是自由时代。

640

在另一领域，当局于同年初打出的另一张牌，表明它与传统保守主义有一些不同，并在一段时间里使传统保守主义的支持者们感到担忧。这就是当局将奥尔良家族的财产收归国有，并打算将它们捐给慈善机构。这是“社会主义”，基佐如是评论道，而杜班则以尖刻的文字游戏称之为“雄鹰的第一次飞行[①]……”正如人们看到的，奥尔良主义者仍然没有放弃把社会主义与偷窃相等同，只不过他们把这一行为看作社会主义是搞错了，况且这一行为依旧是独特的，它将报复和煽动混合在了一起。始自1852年春天，经济生活的新发展高潮——部

① 法文中飞行与偷窃是同一个词，而“雄鹰（王）”曾是拿破仑的绰号之一。

分由于世界局势，部分由于“1852年”赤党掌权可能的消失，部分由于统治者及其周围亲信的鼓励——反过来证明新制度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来说将是一个幸运时代。此外，这种迅速感觉到的幸福感确实有助于第二种波拿巴主义转变为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始终想着建立第二帝国。巡视外省时摆出的巧妙姿态（为马赛新的大教堂奠基就是一个例子）和引起轰动的讲话（在波尔多宣称：“帝国就是和平”）都为这一复辟做了铺垫；一次新的公民投票接受了它（11月21日）；最后，一个新的12月2日，亦即1852年12月2日，将它加入到有关拿破仑周年纪念的迷信链中。但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的历史中将始终仅仅是“12月2日”。

共和国小结

但是，这一12月2日本身是一个新的雾月18日吗？卡尔·马克思是最早强调这一相似性的人之一，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这一点后，又写作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不过，这一比较可能走得太远了。他不是没有重新考察“山岳派”吗？对于卡尔·马克思来说，正是第二共和国这一整体——不仅是它的最终插曲——造成了滑稽可笑的重复；赖德律-罗兰步罗伯斯庇尔之后尘，而巴丹盖（路易·波拿巴的绰号）则步拿破仑之后尘，悲剧之后就是闹剧。今天人们已不再如此严厉，而是更好地评价了第二共和国相较于第一共和国所带来的新东西：人们可以说是共和国的深入人心。共和观念已越出知识分子精英——以后雅各宾或新雅各宾社团形式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精英——的范围，旨在赢取——至少在某些地区——任何白色恐怖都不可能消除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而这也使得问题变得愈益复杂，因为要赢得群众，共和观念就必须与人民的其他愿望，如社会愿望、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结合到一起。在伴随12月起义的自发表达的爆发中，有一用语往往反复出现：“好的”、“好的共和国”、“我们将恢复好的共和国”……除了说1848年5月至1851年12月统治法国的共和国，因为使人民继续处于日常生活的艰难之中而不是“好的”、真正的共和国之外，这还能意味什么呢？换句话说，真

正的共和国只可能是一个对小人物有利的共和国？

然而在同一时期，旧党派的显贵们已开始发现，共和制度并非始终不可能维持现有秩序，它甚至提供了避免这个或那个王朝的昂贵要求的益处。众所周知，在新帝国遭受色当惨败之后，支持梯也尔的保守派们是怎样重新经历了1849—1850年的情景，也就是保守共和国的经历，并且最终绝大多数都归附了共和国。

由此，在我们刚刚回顾的四年中，同时诞生了有关共和国的两种相对立的概念和定义。一种是完全否定式的：一切政体如果不是君主制、不是过分专制，那么就是共和制的；另一种，尽管非常有分量，但却更为模糊，内容上也更为丰富：只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愿望被确认是主要目的，真正的共和国才算建立。

然而，围绕1850年而凸现的有关事物，首先是有关词语本身存在的这种隔阂，在我们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不依然还是区分法国舆论中的右派和左派的首要标准吗？

在这一点上，19世纪中叶就已拉开了当代的帷幕。



第三部分

新的时代：从 1852 年到当今

645

第二十三章　一种新文明的演进

1852—1914年机器：金钱的力量和工人阶级的诞生

一、问题和概念

一种工业文明？

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一位名叫儒勒·于雷、同情社会主义的记者曾就“社会问题”对各界人士进行了采访。在与勒克勒佐集团的老板亨利·施奈德的谈话中，这位记者对这位著名的冶金业大王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您认为资本和生产工具的集中已经达到极限、还是仍可继续发展吗？”回答迅速而坚决：“没有什么极限！”施奈德先生大叫道。他用双手绕了一个很大的手势，“永远都在前进，没有限度，就这样！[1]”这番由衷的话正道出了当时的经济局面及其无限的发展趋势；它揭示出了大工商业领导者们的心态，这些人不认为在经济形势的波动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限制”他们事业的扩张、他们的进取意志、他们行动之抱负。

说明：本章原注为章后注，用1.2.3……表示；译者注仍为脚注，用①.②.③……表示。

一旦 1848—1851 年的动荡岁月过去后，法国社会真正走上了一条新的文明之路。说实话，此种文明就是我们今日的文明。就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和社会关系而言，今天的法国与第二帝国时的法国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有人想以长时段的方式去判断我国的历史、如果他认为政治体制过去和现在都不足以造就法国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机器和工厂、铁路和银行系统、资方和工人阶级——当时人们称工人阶级时用的是复数，后来出于概念上的需要而转变为单数——城市及其引起的变迁：城市像抽水泵一样汲取资源、积蓄、以及期望改善其社会地位的农村劳动力……这些新现象、这其中的一些使左拉时代的法国不同于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国的特征，在 125 年前就已表明某种局势已经显露出来，它一经开始便不会止步，这种局势与我们今天的所处并无不同，我们只是生活在它不断的延伸过程中。

646

因此，这是一种新文明，它是与经济社会上的旧制度的法国相比较而言的，这种旧制度中十分缓慢的恶化趋势从 18 世纪末延续到下世纪中叶。这里的文明指的是行为和生存的方式、生产和思维的方式、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包括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方式。

这是工业文明么？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经历过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快速变迁，与此前几个世纪的变化节奏相比。为什么要对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作这样的定性而心存犹疑呢？就这个称呼的传统使用范围而言，相关的思索和观察涉及的是经济和社会变迁中的“尖端”因素，对这些因素本身的思考也有时日了。1860 或 1900 年代，在勒克勒佐丘陵的山顶上、在巴黎的新银行的办公大楼中、在万国博览会（1855 年、1889 年和 1900 年的博览会最为著名）的展厅中陈列着与科学发展紧密相连的最新的技术产品，还有，在大型铁路网的编组中心、在机车的轰隆及其缓冲时的撞击声中：所有这些场景中表现出来的新法国，我们怎能否认它的工业特征呢？我们从外部感知的工业文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工业文明，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切身体验和感知的工业文明，如

果它不是意味着加速的运动、嘈杂的机器声和人与物之间愈发紧密和复杂的关系，它还会是怎样的呢？

显然，法国社会无处不显示出这种新文明。它被这种文明征服，甚至其自身结构也是如此，它被引向同经济运动同样的方向。从此，生产的发展及其成果——产量，已经没有什么“极限”或“限度”了。我们的国家远离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抵达生产过剩、消费和富足的境界——如果人们愿意以百年为时间单位来评论、并给这三个词语冠以“相对”一词为修饰的话。

让·饶勒斯深刻感受到这个新文明的变动性，还是请他来让我们领会一下，工人是如何被工业发展吸引、推动、并卷入其中的。他于 1911 年出版的著作《新军队》中有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彩篇章，这些篇章至今仍未失色，我们不妨摘录如下片段：“确实，由于资本主义强烈而急剧的变动性，由于它对利润的革命般的狂热，资本主义已将现代大生产的法则、将日新月异的壮阔而快速的劳动节拍一直渗入到工人阶级的肌理血肉之中。工人不再是乡村或小镇中的工人，不再是随意放任的手工业从业者。在广阔的市场上，他是与巨大而具有强制性的机器力量相联系的劳动力，他无法想象未来的世界，甚至无法想象那个他将会成为其主人的世界，除了知道他是一种无限的生产力外——这一力量并非阵发性的，亦不会堕入往日的散漫中。”[2] 我们为什么要闪烁其词呢？工业和工业化——我们将对这两个词做一点反思——就是首要的推进器。20 世纪初的法国是个大工业国，它的文明的特征在于工业。

这种说法是对是错？真实情况看来更为含糊：既是对的也是错的。1852—1914 年的法国，其整个历史——无论是经济社会史还是其他方面——的关键问题是，要知道剧烈的表面旋涡在何种范围内、在何种比例和何种深度上影响到社会整体；要了解经济、社会和个人与搅动既定因素和人们的习俗的新力量之间有哪些对抗；要通过与别的工业国家，如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比较——仅以可进行计量比较的国家为单位——来考察法国整体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长速度的相对缓慢，一种根源于我国自身原因的缓慢，如果果真存在这种缓慢的话（因为一个

647

世纪以来人们总是这么说)。对于这些重大问题，虽说我们在20世纪应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历史只给出了部分和不确定的因素。历史学家们——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仍然处在困惑之中；他们的分析具有强烈的直觉和主观色彩；他们的看法经常相互抵牾。为什么呢？头脑中的含糊不清是必然的，因为首先事实就是这样。

根据不同层次的视角、甚至根据对一次大战前法国现实的不同的考察范围，一切都可以是变化和矛盾的，这一点十分明显。在社会的最上层，在经济发展的顶端，借用马尔舍夫斯基的话来说，在那些增长率最快的“明星”产业中，我们在1860或190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最具效率、最名副其实的朝气蓬勃的层次，可以毫无愧色地同国外竞争者相颉颃。这里仅举一例——还会经常被援引——从1860年代起，施奈德公司生产的机车已能同英国的机器争夺国外市场，1900年代，在最先进武器的国外销售市场上，它与克虏伯公司不相上下。从机车到装甲板，从钢轨到钢铸大炮，这就是当时冶金业发展的脉络。

但是，在较低的社会阶层，在法国共同体结构的更深处，在远离大城市和大工厂周边的地方，却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代，它远远落在后面。对此人们不是描述过千百次么？“美好时代”[①] 的法国仍然是具有强烈和浓重的农民和乡村色彩、以及手工业和小业主特征的国家，它在资本主义扩张的严酷逻辑面前逡巡徘徊，依恋那些稳妥的价值标准，当然稳妥一词包括双重含义，一是教义问答和世俗学校——它们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中教导的旧的道德观念，二是交易所中出现的新的投资现象：公债和债券优先于股票，安全性优先于风险性，确定性优先于投机性，这就是当时法国大部分投资人的心理。

1944年仲夏时被德国人枪杀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遇难前四年曾思索法国在1940年春天的溃败的深层原因，当时他写下了一段感人而又令人心碎的文字：“我们应有勇气承认，在我国，刚刚被击败的恰恰是我们所珍视的小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太过缓慢，公共汽车

① 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多指1900年前后法国的繁荣安定时期。

的迟缓，行政机构的慵懒，每个散漫的行动所累积的时间损失，咖啡馆里的游手好闲，短视的政治伎俩，收入微薄的工匠，架子上空空如也的图书馆，对陈旧事物的嗜好，对所有可能扰动绵软乏力的习俗的新奇之事的猜疑：这一切，都被繁忙的德国以它著名的‘动力’所推动的高速车轮粉碎。”[3]

甚至在今天，仍然有许多良师——如商业界人士、经济学家、政治领袖、甚至工会负责人——注意到以下情形并为此而悲叹：虽然经过了约 25 年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法国的工业仍是落后的，我们的生产结构是不完善的，分配机构太沉重，为数众多的冒牌企业家胆小怯懦，各种制约因素限制了发展，它们发端于布热德式①或新布热德式的、维护所有小型的、也即微薄贫乏的事物的运动：仿佛工业文明已经造成、并将继续会给我们带来极端的害处，仿佛这个社会整体上总是拒绝超越极限、突破限制。

648

对于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成了一个衡量的尺度问题。为明确生气勃勃的法国与拖后腿的法国之间的关系及双方的比重，怎样来衡量——或者说衡量什么——19 世纪后半叶呢？比重就是各自的分量，关系则是影响力的问题：卷入工业浪潮的行业、阶层和地区对落后因素的积极影响；相对停滞的地区和群体对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制约性的消极影响。

并不是一切都可以衡量的，因而在进行衡量时就显得很棘手。钢产量的百万吨数、铁路运量、产品价格、公司利润、企业结构、人口和劳动力的分布……所有这些当然都可以估算、可以数字化，而且数字具有合理的可靠性。但对于决定是否进行投资的变动性因素又该如何分析呢？世代因袭的对于创新行为的抵制心态，其影响如何计算？社会滞后于经济、心态滞后于社会，这些如何衡量？那些以前各世纪传承下来的陈旧意识，例如与保守脆弱的乡村主义共生的意识，它们

① 布热德（Pierre Boujade，1920—2003），法国政治家，1953 年创立保障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联盟（UDCA）。布热德运动即指要求保障小商人及手工业者利益的运动。

构成发展的障碍，但它如何发生作用？对冒险和投机——资本主义的灵魂——深刻的拒斥心理，与对金钱利益、对高利贷、甚至对借贷观念的古老的宗教诅咒相连，这种拒斥心理的影响如何？教育制度及其传导的价值观念、在该制度下受益的社会阶层、以及受其控制的个人等等，该如何评价这些因素呢？

上述这些问题是不能测量的。这就是说，历史学家将长期面临更多的无法得出确切结论的问题。下文将试图更好地认识19世纪后半叶——不过其下限是1914年——工业文明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在证明我们论述的合理性之前，有必要对“工业”一词加以解释。

工业和各产业；工业化和合理化

我们知道，对“工业革命”一词有太多滥用。“革命”一词，不管其意义如何，有牵强的意味，对19世纪的法国来说尤其如此。如果革命的概念是转变和转变之强烈等意思的混合，那我们应该谈论的是工业的“演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不和谐的、因时间、地点、部门和产业之不同而呈现不平衡状态的进程；这是几十年间的工业变迁与扩张，是其推进期——第一次、第二次、甚至还有目前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但还有减速期。另外，应以宽泛的方式来理解工业革命；它不只是技术和机械化，尽管它首先是这个；它甚至也不只是经济事实。它伴随着人口在空间范围内的新分布——广为人知而又含义模糊的“农村人口外流”——以及因各“产业”（即“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动而形成的各社会—职业阶层的新平衡关系。同时，工业革命给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面目，改变了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内部的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最后，工业革命还使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发生转变，从而给人类带来新的问题，或多或少地震撼了人们的思想、心态，以及关于生活的观念。

这一工业演进过程以其新颖而富革命性的成果长久地支配了上个世纪和我们这个世纪，但它本身究竟是什么呢？对此，经济学家马尔科维奇在他的宏大研究《1789到1964年的法国工业》的结论中有过精彩论述：“一场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向制造业劳动的一次决定性过

渡——从家庭到手工工场，从手工工场到现代工厂[4]”。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各地区构成的图景惊人地复杂，其社会面貌具有极端的差异性，工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同时并存：依靠手工加工的农村家庭生产依然提供了其部分的——当然其份额在下降——生活和生产的必需用品（服装、鞋子、小型工具），农民就是其产品的消费者，而不是把产品全部投放到市场上，这就是农民工业的自我消费。层次稍高的是融入了工业交换的家内劳作制：一种是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生产，在这里是锁匠，在那里是纺纱工和织布工，而别的地方则是钟表装配工或制桶工，所有这些生产都依赖于原料供应商；另一种是城市“室内工”的生产，它直接源于中世纪的城市生产形式，是“血汗制度”的牺牲品，在成衣和缝纫业中尤其如此，儒勒·西蒙的《女工》便描绘了他们的劳苦和辛酸（1861年）。在这种极度个体化的工业生产形式之外，还有第三个层次，它也是分散的，在某些行业（家具、珠宝、服装、五金业等）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工场手工业：老板及其“帮工”。最后的高级层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生产，这是大中型工厂的世界，生产工具、原料、劳动力、干部、管理机构都被集中到大型厂房中，这些建筑就像是阴暗嘈杂的兵营。生产者就在那里缓慢地、艰难地熟悉集体劳动所必须的纪律：如当时马克思对新时代的现实所分析的那样，这是生产的社会化形式，是生产工具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制。

我们看到了整个工业内部的复杂情形，这特别是因为，工厂工业在其最初起飞的时代是非常个别的现象，当时的局面虽然生气勃勃，但工业企业的规模、其产品类型却大相径庭。因此，尽管大量工业活动“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从计件生产转向了批量生产”（马尔科维奇），工业领域仍是一个新旧并存的博物馆。

由此，我们便再次回到了衡量的标准问题。工业并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或出于习惯和惯性思维而想当然地描绘的那样，只是大工厂的生产方式。工业产品（或收益）包括四个层次，而不仅仅是最高层次的和最现代的产品。因此应该衡量工业总产量及其结构，即各层

次在总产量中的地位。马尔科维奇所致力的正是这一重要工作，它是在由弗朗索瓦·佩鲁和让·马尔舍夫斯基 I. S. E. A. 小组的研究框架内展开的。这项研究十分深入，耗时甚长，至今仍未结束。这项研究应成为工业化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工业生产四个层次（家庭制、室内制、手工工场制、工厂制）各自的格局和规模决定了新与旧、推动性和滞后性等因素的地位，以及法国新文明萌生过程中高级生产阶段和低级生产阶段各自的位置；另外还因为，我们这里论及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个人——而不是各“生产单位”——他们在不同的方向上影响了整个国家的进程。

我们还应该继续考察有关工业进程的一般特征，因为，仓促从事具体研究、探讨经济和社会事实和“引人注目的事件”将会是徒劳的，如果不了解它们的关联性及其意义的话。如何从工业这一概念过渡到工业化概念？如何从后一概念转入另一通常与之相伴的概念：理性化？

在这些问题上，马尔科维奇可再次成为难得的指导者。言工业化者均会论及生产活动的新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过程，以及其扩张与推进。不过，对工业化可以有三种理解方式，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法国就是如此：首先，在整个工业生产的内部，工业化表现为“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取得对手工业和家庭生产的优势地位”。在国民经济层次上，工业化意味着“制造业（或许可以包括采掘业）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商业、交通业等）更为发展”。最后，工业化的标志是“工业方法渗入其他部门，如农业中”。 650

这样说来，工业化伴随着一个“理性化的普及的复杂过程”：社会性的理性化，其标志是生产的个人特征越来越弱，社会性越来越强；为降低成本而导致的经济理性化，公司企业的理性化进程越是向前发展，成本便会进一步降低；技术理性化——这最为人熟知——不仅涉及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涉及原材料的节约和对废料的处理，后两个方面在某些行业（如纺织和化工）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是地理分工的理性化，就法国而言，其工业已逐渐融入到

“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交换体系中。

这样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怎样才能对我国进入——不管是否愿意——工业化演进和新文明的时代进行全面的研究。如果认为我们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可进行度量还是无法进行度量、抑或是度量得很不准确的因素的知识）已经足够深入，以致可以确定法国从第二帝国到 1914 年间演变的可靠图景，那将是很不慎重的。描述一个印象式的、定性的、感性的画面可能是轻松的工作；不过，为深入了解定性因素，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精确细致地进行定量、测量和估算。

任何论证步骤都是可以被质疑的。我们的步骤从人口因素开始，这种因素只被认为是新时代的指示器，但它们与经济变迁是相关的。随后我们将论及工业发展的基本特点；接着对交往和交换生活将作简短论述。最后，对某些行为和心态进行考察也不无益处，通过一个不同于观察人口问题的方式，我们将在这些领域中看到，法国人在面对新时代的文明时的勇敢和踌躇。

二、人口统计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

最近，英国历史学家里格利写道，“工业革命在人口史中的重要意义，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我们看到，人口机制、人口分布、职业结构、城乡人口比重等出现了重大变化。”[5] 这里强调的是工业变迁在人口运动与人口结构中造成的影响：地区性迁徙、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第三”产业中就业人口的增长、死亡率的降低、出生率的降低……但还应考虑到人口状况对工业发展——更宽泛地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6]。阿尔弗雷德·索维坚持认为，就法国来说，人口增长的极度缓慢与 19 和 20 世纪（至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有紧密的因果关系。正如安德烈·阿尔芒戈所指出的，这一说法可能更多地是以“推理而非历史分析”[7] 为基础。这位著名的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看法中包含的这一假说，

还需要通过具体精确的分析来加以检验。

651

不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看起来如何明显，这些作用并不是简单自明的。里格利也认识到这一点："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人口与经济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在这些关系中，尽管有些东西是很明显的……但这仍不可能支持任何关于这些关系的简单化观念。"[8] 当然如此。不过，如果我们采取谨慎的考察方式的话，还有什么比一个长期的经济变动中的人口事实更能说明问题呢？

人口学的事实

过多地重复业已取得的成果看来是多余的。我们都知道，与所有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人口在19世纪—— 一直到1939年——增长缓慢，它在欧洲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普通民众阶层（而不只是社会上层）过早地——从18世纪末，甚至更早——控制生育，年度人口净增额（出生减去死亡的剩余量），每个十年都在减少；法国人口的老龄化，老人所占的比例不断攀升，而儿童和青年的比例在下降[9]。百年间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曲线很能说明问题，19世纪后半叶的总体数据亦然：1850年到1900年，德国的人口从3500万增长到5600万，而法国的人口仅从3600万增长到4100万。

我们不用再重复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了，因为这一点众所周知：它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们改善社会地位的渴望、因而也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运动相联系。杜蒙曾写道，"每个社会成员都在为向上攀升而不懈地努力。"菲利普·阿里埃斯极为中肯地说明了，为什么在19世纪末，"阶级的分野不再能区分出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之安排在所有社会层次都是一样的。"[10]因此，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经济进步、社会进步与出生率的减缓是并行的，无论是在整个国家的层次上还是组成国家的个别单位的层次上，都是如此。

因此这是明显的事实。另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体现在人口的职业变迁方面，正如让·富拉斯蒂埃主编的有关职业性迁徙的著作中再现的那样[11]。人们记录了从第二帝国到1914年之间就业人口的增长（从1856年1420万增至1906年的2070万），人口就业率（就业人口在总

人口中的比例）的增长，妇女在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长（工业化是妇女劳动力的吸收器），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第二”产业基本维持稳定），就业人口结构的变化（各部门和行业中从业人数的变迁）等等。

此外还有城乡人口分布方面的明显事例。可以把“城市”看作人口在2000或5000以上的居民点——不过后一标准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更有根据。以下是城市人口比例的演变情况表：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2]		
年份	人口2000以上的城市	人口5000以上的城市
1851	25.5%	17.9%
1866	30.5%	24.4%
1891	37.4%	
1911	44.2%	38.4%

65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村人口比例仍大大高于城市人口。法国仍是乡村、集镇和小城市的国度……这里我们又想到了马克·布洛赫。当然，城市人口有增长，“城市吸收了……某些乡村。”[13]巴黎的情况就是如此，但这是个特别的例子：1851年它的人口为100万，几乎占法国人口的3%；但到1911年，在经过大规模的人口聚合后，巴黎市的人口为288万，而塞纳省的人口达415.4万：超过法国人口的10%！但法国的城市化还不像德国或英国那样过度。1914年，只有13%的法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万的居民点中。法国有16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而德国为45个，英国有47个。除了巴黎和里昂外，没有哪个其他城市人口超过30万。是工业的推动吗？对于那些工厂集中的城市来说是这样，如里尔、鲁贝、图尔宽、勒克勒佐、圣艾蒂安等等，但对众多中小型城市来说，其发展建设尤其要归因于商业和行政功能的发展。

三大产业中就业人口的比例[14]			（单位：百万）	
	1856	*1876*	*1896*	*1906*
第一产业[15]	51.4	49.3	45.3	43.2
第二产业（工业）	31.1	27.6	29.2	29
第三产业（服务业）	17.5	23.1	25.5	26.1
无法归类者	1.7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三大产业中就业人口总数			（单位：百万）	
	1856	*1876*	*1896*	*1906*
第一产业	7.305	7.995	8.463	8.845
第二产业	4.418	4.469	5.452	5.936
第三产业	2.493	3.754	4.749	5.701
失业者				0.239
就业人口总计	14.216	16.218	18.934	20.721

到此为止尚无争论。我们处于人所共知的确定的领域。城市发展的相对缓慢、大量的农村人口明显意味着，法国工业化的动力逊色于它的两大邻国。

这里便出现了一个问题：农村人口外流的确切意义如何。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两幅画面。

关于各大就业部门的比例，情况很清楚。三大产业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与已揭示出的情况很相符。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考察相对“比重”，而是各自的绝对数字的话，这些观点便要作明显的修改，并需作进一步思索，因为三大产业的从业人口都有增加——当然增幅并不平衡。但是应该指出这一事实，而且据我所知，它还没有引起史学家们足够的重视：1856年到1906年间，农业中从业人口的绝对数字增加了。农业人口净增了150万……

人们是否可以说（也许不无道理），若把妇女考虑进去（我们无

法估量出她们在农业生产中的比例），农业从业者的数字就是可疑的呢？不过，有关第一产业中男子从业者的数据并没有显示出不同的趋 653 向[16]……正如卡昂夫人在她对一个世纪以来的就业人口的著名研究中所指出的，“从绝对值来说，农业中的从业人数实际上到 1914—1918 年的战争之后都仍然是稳定的。”当这些作者在其研究中以相对数据来代替绝对数据时，由此产生的困惑和犹豫显而易见。人们会说，农业人口呈下降趋势，因为其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在降低……

因此，应该重新审视农村人口外流这一观念，以及由此而不断产生的新看法，尽管这些看法通常并不是作者们的本意。就全国范围而言（我们将会看到，在区域和“地区”层次上，情况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并不存在“抛荒地带”。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发展后，法国的土地上仍然承载着大量的农业从业者……当然，如果根据户主的从业情况来考察人口的整体分布状况，依靠农业为生的人口比例降低了：1856 年为 1851.4 万，1896 年为 1743.6 万[17]。这就意味着，确实有一部分农民离开了农村前往城市，他们是超越农村负载能力的过剩人口。但这并不是说土地到处被遗弃抛荒。远非如此。

在首先对宏观人口状况进行考察后，还应进行一些补充。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倾向于把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混为一谈。事实上，问题在于，要知道在 1914 年之前，农民、农业劳动者在所谓的农村人口外流中所占的比例。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一情况。

农村人口包括小市镇的居民，他们基本上属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从业者，此外还包括村庄和孤立的农舍，它们属于第一产业。有谁会把城市（人口在 2000 或 5000 以上）人口的增长仅归因于农民的流入呢？事实上，小市镇（而不仅是村庄和农庄）曾哺育过城市，但具体比例我们仍不知道。因此农村人口外流自然含有多种组成部分。它既包括过剩的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也包括非农业的农村人口、首先是工匠的流动。此外，农村外流的人口中不全然是劳动力，这其中无疑还包括比例很高的年幼者。在考察 19 世纪后半叶农业人口的稳定性

的总体经济意义之前，我们先以一些具体材料——定性的或是计量的——来说明上述评论。

区域与地方个案

在1914年之前，法国某些乡村地区确实出现过“抛荒”现象，尤其是在山区：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18]、中央高原的某些地区。但是，即使是在土地优良的地方，我们不是也能看到，农民的生活长期以来是多么艰辛、生产条件低劣之极且全无合理性可言么？我个人对上卢瓦尔的东北部地区较为熟悉，这地方为花岗石土质，气候恶劣，离产煤区及工业区菲尔米尼—圣艾蒂安洼地只有十来公里。今天，当人们在松树林和草场间漫步时，偶尔能看到的只是些废弃的、通常是破败不堪的农舍，以及空荡荡的小村子。但它们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这一现象开始于1930年代的转折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速度加快。在1920年代，农庄被废弃是很个别的现象，1914年之前更是如此。

最近，乔治·杜波在研究1870—1914年间波尔多的人口增长时，也强调某些论据的重要性[19]。在19世纪末，大约一半的居民并非波尔多当地人；这些“移民”来自围绕波尔多的各省构成的半圆形地区，而这个加龙河的大港口就像是“阿基坦盆地人口的唧水泵”[20]。不过，对吉伦特一省的移民来源的分析表明，他们中间的2/5并非来自农村，而是来自城市（人口2000以上的居民点）。杜波写道，“移民现象并非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简单：它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还有小城市向地区性大都市移民的运动。”

654

一些地方性研究应能进一步表明局面的多样性和事态的复杂性。从这一观点看，菲利普·潘什梅尔对1836—1936年间庇卡底的“农村人口减少”所作的研究堪称一个典范[21]。1872—1911年是“农村人口外流的重要时期”[22]。但是，“农村人口减少”这一概念意味着什么呢？一种“相对于起初状态的人口过剩，或至少相对于特定时期内农业、工业、商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的人口过剩”[23]。不过，除了农民（耕作业者、农业工人、短工[24]）外，手工行业（针织业者、

锁匠）也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25]。在所研究的庇卡底三个地区，农业就业人口从1836年的5469人增长到1911年的6139人，而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从6427人减少到2569人……乡村古老的社会结构的“农业化”和简单化，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无可挽回的分离（工业正逐步集中到城市）……离开的不是单身汉，“而是整户、整个家庭”[26]。

鉴此，本人也依据路易·谢瓦利埃的看法，对农村人口减少的两种类型进行区分，但这只对庇卡底是有效的。一种类型是人口学上的、或曰非就业性的、正态的人口减少，它涉及非成年人、妇女、失业者和老人；这种减少波及过剩的农村人口，其作用相当于人口过剩的农村地区的减压阀。另一类型是职业性的、或曰就业性的、非正态的人口减少，它涉及农村的劳动人口，是工匠和农民自愿离去造成的人口减少，因为他们生计日艰，因为他们受到听闻中的“城市”的吸引。另外，人们还能猜想铁路、兵役的影响，它们开辟了新的空间，打破了孤立和愚昧无知的状态。潘什梅尔写道，“我们的庇卡底乡村并没有经历真正的农村人口外流，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离去是一种常态现象。”土地实际上根本没有被荒废：“富饶”的庇卡底不同于热尔斯或洛泽尔。荒地没有扩大。乡村依旧“为人掌握”。三个地区的农业从业者在1836年到1911年增加了……“由于农村环境的类型不同”，农村人口减少也有许多区域或地方性类型：山区、丘陵地区和平原农业区型的人口减少。各地人口减少类型各不相同，这要看是否存在手工业、土地的肥沃程度、所有制的结构……

我们来看微观世界。位于尼奥尔和帕特奈之间的马齐埃尔-昂-加蒂纳是德塞夫勒地区的一个村社，罗热·塔博曾出色而真实地讲述了该村社在1848—1914年间的历史，这是一个偏僻、封闭的集体的历史，与新式生活的联系——先是公路，很晚才有铁路（1881年）——使其缓慢地、点滴地但稳步地卷入新的物质和精神时代之中。我们关注的只是这位作者关于人口的评述。这个农村村社的人口在184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减少，1841年它有居民约900人，1911年上

升为1162人。耕种面积从287公顷（1849年）增加到1118公顷（1903年）：这是农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还有哪些东西是这个小村社世界中的新现象呢？从人口增长中获益的不是村庄，而是小市镇。后者的居民从1851年的210人，增长到1911年的378人。不过，专 655 事农业的人口并没有减少。因此不存在真正的农村人口外流：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正像在庇卡底一样，我们再次看到了农业人口并未减少这一全国性的重要事实。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被称作"农村的"工匠确实离开了该社区的村庄和农舍。但他们（鞋匠、泥瓦工、木匠）在小市镇中的人数增加了。小市镇的社会结构更为充实和多样化了：增加了公务员、商人（五金商、旅店主、粮贩）和自由职业者（公证人，执达员）。离开的（1880年前这种情况很少，随后20年中更多了）大部分是农民么？不是的。离开的首先是邮递员、警察和马掌匠的儿子，他们前往帕特奈的师范学校学习；还有市镇商人、工匠和公务员的女儿们。另外，大部分服过兵役的市镇青年后来也离开了。他们去了工厂吗？非常少见。他们多出现在铁路部门、宪兵队、共和国卫队和常备军中……有两个农场帮工由于婚姻颇为划算（可能如此）而交了好运，一个在旅馆业中发了财，另一个经商致富。在离开的手工业者当中，只有少数人本来就是技工。

个人和地方性的事实远非画面的全部。农村人口外流与农业荒废不能混为一谈。虽然不同区域和地方存在各种差异，但下述统计学上的可靠性无可置疑：就全国范围而言，与19世纪中叶相比，20世纪初的农业就业人口并没有减少。这是个重大事实，过去人们曾忽视了其意义和重要性。

农业人口的稳定和经济增长

就业人口的水平（或总量），很大程度能解释"实际物质生产"、即农业和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让·马尔舍夫斯基着力指出，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的逐步放缓是其物质生产量被英国超越的"主要原因之一"[27]，尽管后者在18世纪的起点较低。这一普遍性事实在农业中更加如此，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工业缺少弹性。"人口增长缓慢是

法国农业产量增长微弱的主要原因之一。”[28]但看来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事实对工业发展、以至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

农业和工业在物质生产中的比重，及各自在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总就业人口的比例[29]

年代	农业		工业和手工业	
	人口比重	物质生产中的比重	人口比重	物质生产中的比重[30]
1855－1864	66%	46.8%	34%	53.2%
1865－1974	65%	46.9%	35%	53.1%
1875－1884	64%	43.8%	36%	56.2%
1885－1894	61%	41.1%	39%	58.9%
1895－1904	58%	39.2%	42%	60.8%
1905－1913	58%	39.8%	42%	60.2%

656　上表一方面显示了农业和工业—手工业的比例和相对结构、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两大部门的就业人口和各自物质生产量的对比。这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是演变过程，尽管它揭示了农业部门的相对下降、及其在就业人口和物质生产中地位的下降。若考虑农业部门本身，更为吸引人的是，农业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较高）与其在物质产量中的比重（较低）之间的不平衡。在 1855—1864 年间，农业占据了总就业人口的 66%[31]，但其在物质产量中的比重只有 47%。1905—1913 年间，情况仍没有改变：58% 的总就业人口只提供了 40% 的总产量。

“为什么这种局面没有变化呢”？让·马尔舍夫斯基问道[32]。实际上农业表现出两种长期不变的状态：所使用的劳动人口总量居高不下；农业产量在物质产量中的地位维持原状。第二点在某种视野下可能更易于理解，如果不是能得出确切的解释的话。农业整体生产率的低下（如与英国相比较）能说明一系列的效应：农业从业者人数的稳定不变；农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比例的下降；农业产量在物质生产总量中的比例长期维持较低水平。正是生产率的停滞导致农业水平下降，并妨碍农业产量的增长。要解释这种劣势地位，

还需要对农业生产率进行“透视”。但本文并无对法国经济发展作全面阐述的抱负。[33]

关于第一种静止状态——即长期存在大量农业从业人口——是某种提问方式的中心点，但这一方式中的论证法却无法找出问题的关键，尽管它有许多出色之处。让·马尔舍夫斯基提出如下说法：或是“某些障碍阻止农民离开土地”，尽管存在来自工业的吸引力——在这个假设中，工业似应蒙受了劳力短缺和价格昂贵之苦——或是工业无法“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在这个假设中，工业发展“遭遇了销售市场不足”的困境。事实“为这两个观点”提供了“众多的论据”[34]，因而它们都应是成立的……

让·马尔舍夫斯基确实有些卓越的见解。他写道，“法国的农业人口从来没有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土地结构和社会体制也不鼓励他们离开乡村，法国农民对他们的家产土地总是表现出极度的眷恋，而且强化这种情感的愿望总是影响到法国的官方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实际情况。”[35]大革命和帝国时期关于各继承人之间均分财产的立法、以及有利于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延续，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36]。

最后，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总体上说，法国农业中的经济、社会和法律结构大大延滞了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的进度”[37]。而工业（除了短期内的某些部门外）实际上也不缺乏人手。但是工业发展步履沉重，与国外相比缺乏竞争力，因为它的价格和工资结构缺少弹性（比英国更少弹性），而这种情况又是由于“现有的劳动力供应状况”（来自农村的劳力）“不足以改变这一结构”。

另一方面，根据图坦的计算，在 185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靠农业为生的人口的购买力（消费能力）只有靠工业为生的人口的 45%[38]。尽管农业人口比工业人口的比例更高——1905—1913 年间总数分别为 1507 万和 1240 万[39]——而就整个农业世界的总体购买力来说，虽然它在这一时期内有了无可置疑的增长，但“只为工业增长提供了十分微弱的推动力[40]”。

657

最后，农业在人口结构及实际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和影响之所以会产生抑制效应，还有一个原因：所有波及农业的危机都将严重影响法国的整体经济。这在 1873—1896 年间的欧洲农业大萧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法国，萧条又与外部因素（外来竞争）和内生因素（葡萄根瘤蚜病害，某些作物种植业的减退，如茜草……）纠缠在一起。这些对实际生产总量的增长以及工业产量的增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法国的这两项人均增长额都低于英国[41]。

在对我国 1914 年之前的工业化程度所进行的艰苦研究中，在对工业发展状况进行衡量时，在对这种文明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中，有必要给与人口和职业因素以重要地位。它们是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的现象和原因在于它们既是一种强有力的抑制因素，也是强大的发展因素。它们向我们表明，1914 年的法国更接近于 1850 年的法国，而不是 1970 年的法国。但这种说法只具有部分的正确性，有时人们可能会忘记这一点。

三、工业革新

强烈的反差

让我们回到 1897 年，跟随儒勒·于雷一起来到距海滨布洛涅 10 公里的马南让，这个村庄坐落在并未抛荒的地区："但这里一片死寂，崎岖的坡道上见不到车辆和行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日程，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外部世界的存在——除了偶尔送来的免费的《十字架报》，以及女农场主周六偶尔从市场上带回来的几页当地的报纸。在这个被人遗忘的、极度原始的角落，政治斗争和社会变迁完全感受不到，它就像睡着了一样。这块地方相当肥沃，但农民的收成好一年歹一年，沿用几百年的生产方法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改变。"[42]但是，同一年、同一个目击者在勒克勒佐看到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这位记者记录了那里最强烈的特征：外形、色彩、声响，以及与机器联系在一起的大量人口：

"在我脚下是个巨大的深坑，其最深处环绕着一圈幽暗的火光；在坑的中央，一簇熊熊的火焰照亮了那些巨大门厅的玻璃外窗、铁炉

那奇特鬼魅的身影、吊车僵硬的手臂以及成堆的金属；在被滚滚浓烟污染的深蓝的天空下，所有一切都显得不同凡响；这是各种出人意表的、生硬的、粗糙的、不协调的形态的闻所未闻的大混合，人的身影映射到这些形态之上，他们在冶炉的炉喉前七手八脚地忙碌着，穿行于蜿蜒在黑土地上的火流间；火炉的下部不时张开小窗，每次会伸出20来根炽热的火舌，火红的大铁块就从这些地狱之门中次第坠落，然后滚板把它们送到喷水龙头下面。在这但丁式的场景之外，难以分辨的嘈杂声、远处的喧闹声构成的声响非笔墨所能形容，它在飘荡、在呻吟、在咆哮，并有着一种骇人的和谐感。"

"我用一整天的时间走遍了勒克勒佐几公里长的车间。我对这令人惊叹的生产组织、对巨大而驯服的机械的赞叹……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立刻完全关注于我周围的人、被他们的忙碌攒动所吸引。我自言自语道，'工人，原来就是这样！'工人不只是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样，是身穿罩衣、头戴鸭舌帽、其糟糕的教养令人担惊受怕的人，不只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虽不富裕但欲望很大的人；也不只是没有文化、思想粗鄙，总之只靠肌肉劳动来完成其使命和社会角色的人。不！不是的！工人还是成千上万顶着七月的骄阳、在炉火前跳动的生灵；他们瘦削的面颊上沾满尘土，他们用灼热的目光恭敬地注视着我这位造访者，他们汗湿的前额、通红的眼睑、烧焦的睫毛、汗珠滴落的胸膛令我感到好奇；他们坐在离火炉两步远的金属堆上用餐，毫无食欲，双手弄黑了面包，胡椒粉在可怕的烟尘中散发着臭味；他们每天早上6点起床，天天如此，从柔弱的童年时代起就这样，6点起就把自己关到这些唯见黑与红的庞大工厂中……明天、明年他们都将继续这种生活，直到风烛残年，没有半个月或个把星期的休息。"[43]

658

实际上，从1840年代起，大工业中的技术、经济和人的革新就已逐步侵入生产和交换领域。当时的人记录下了这一深刻而又不可逆转的变迁，以及乡村与工厂之间的强烈反差。在他们眼里，工厂和银行、铁路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和"大型商场"都融为一体，而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则称之为资本主义。

饶勒斯，资本主义的审判官

让我们跟着让·饶勒斯一起来看看19世纪资本主义的历程。无可争辩的是，这位抗议者如实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动力以及它取胜的过程，这确乎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从长期来看，这就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变迁。1912年的饶勒斯深知这一点，他说道：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所有国家的统治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但它造成了一个日益广大和团结的无产阶级，从而造就了一个将会取代它的力量。随着新的社会因素的发展和组织化，它将成为一个阻碍、一种抵制力量、一种反动；但在其整个形成时期，它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力量。今天仍然如此，尽管上升的无产阶级已强烈感受到它的压迫和剥削，但它仍然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资本主义产生和组织了生产力，从而增加了人类的财富，这财富将通过集体占有制而成为劳动者自己的财富；随着无产阶级大众的增长，新的思想将会在其中传播，从而使得解放人类的所有制的革命成为可能。任何时刻资本主义都不是纯粹的抵制力量、一种毫无杂质的反动。它既提高又降低、既奴役又解放、既剥削又丰富，是一种不可分割的现象，总是如此。它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有形的残暴而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的……无产阶级十分清楚，他们行动的环境不是因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专断意志而形成的。在这种意志的背后、在资本主义长官的命令背后，他们认识到或预感到广阔的非个人性的法则，这些法则主宰着整个这一段历史，而且通常比其领导人更为强大。”[44]

技术进步的历程

当时的工业家、经济学家和主要政论家们所理解的技术进步无非是机器的进步。从185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技术创新连绵不断，它们总是相互渗透，这里若对这一技术创新的编年史分门别类地进行复述，恐怕并非善事。如果我们忘了的话，各个层次的、有日期和名称为证的各种手册将会告诉我们，其中有几幅画面仍具重大意义：

659 1855年出现的体态肥胖的贝瑟麦转炉开始生产价格低廉的钢材；1869

年 11 月，在工程师阿里斯蒂德·贝尔热斯热切目光的注视下，朗塞地方的一个造纸厂中，一批口径 40 厘米、长 450 米的水管将每秒 500 升的强大水流注入磨浆机中；1871 年，比利时工人格拉姆向巴黎科学院提交了他的小型电动装置，如果向其中注入原动力，这种奇特的机器便会产生电流，如果提供电流它就会做功；1889 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勒努瓦和奥托展示了汽油发动机……这四件发明都是在一系列漫长的摸索和研究之后才取得的，每件发明都标志着冶金、电能的多种用途、运输和传播行业中一连串其他发明的开端。

我们无意为发明做编年。实际上，这种历史虽然光彩夺目，但失之浅薄。1888 年，贝尔法斯特的兽医邓洛普发明了充气轮胎，阿尔芒·珀若（蒙贝利亚尔）出售 29 辆汽车是在 1892 年，克莱蒙·阿代尔首次飞行 50 米是在 1890 年 10 月——这些日期的意义都不大；比利时人索尔维发明苏打制造工艺（1862 年）；英国人托马斯和吉尔克里斯特发现的熔铸脱磷法（1877 年），连同布里耶对矿石的发现，将一起把洛林的冶金业推向高峰——这些也都没有多大意义，尽管这样说颇有大不敬的味道……对法国而言，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尚未被研究过，这就是技术革新扩张的历史、它们在不同行业中的实际应用和推广普及的历史（从哪里开始？什么时候?），以及它们在经济和空间意义上扩张的历史——总之，一种有关“发明”的历史学和地理学。此外，我们知道，19 世纪后半叶是个技术革新爆炸的年代，从蒸汽动力向电力和石油动力的革命性过渡已然开始，此间工程师和学者们所起的作用要比工匠和业余人员更为重要——虽然汽车工业的最初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业余技术爱好者们。我们也知道，技术革命从此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不妨想想，没有美国人贝尔，哪来的电话（1876 年）？没有美国人爱迪生，哪来的留声机（1877 年）和电灯泡（1879 年）？没有美国人伊斯特曼，哪有柯达相机（1888 年）？同样，没有赫兹（德国人）、布兰利（法国人）、波波夫（俄国人）和马可尼（意大利人），又哪来的无线电报呢？

历史学家芒图写道，机械就是“一种装置，在某种简单原动力的

推动下，它可以执行过去需要一个或几个人完成的技术操作中的复合运动……要在某个或几个工业部门中实现机械化，光以机器来促进生产是不够的，机器应该成为关键性因素，应该决定产品的数量、质量及其成本”。机器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量的提高，并且由于这两项不可逆转的进步而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

机械化的发展很快便引起了痴迷与恐惧的双重反应。1855年的巴黎工业博览会上，路易·雷博便对那些奇妙的产品、特别是施奈德公司展出的蒸汽锤赞叹不已：“推动这个巨大的榔头的力量是由最简单的机器提供的，当它上升到固定的高度时，便会全速下落——或是在真空中，或是在组合气体中下落。这样，人们便能借助这个器具来锻造铁块或号牌。可以设想，这对制造战争机器将会具有多么大的用处，而后者又将预示着一场进攻和防御的技术革命的来临。”[45]

但是这位评论者也对一个问题感到担心，而这个问题看来是机器建造者们忽视的。后者想到的是力量、速度和利润。而他则考虑到了工厂劳动的安全：“这些可怕的蒸汽机，不管它们是好是坏，都应引起重视。当它们被遗忘时，一种阴森的声音会突然提醒人们注意它们的力量：这是被轧死的或被烧坏的受害者的叫声，这是肢体粉碎、头颅爆裂的声音。谁不感到颤栗呢？谁能不小心提防呢……连杆、制动器、轴、锅炉，这些词本身没有特别的，很难引起人的注意；但是，我们想想，当人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断裂的制动器、出现偏差的轴、爆炸的锅炉时，这些词立刻便有了一种词汇本身之外的含义。”[46]

660

在这次博览会上，机器的高速旋转运动看来极具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安全便更成问题：“对于固定的蒸汽机而言，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旋转运动取代往复运动几乎成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这确实是一场革命，是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摆动和摇晃的机器到处都在引退；水平的机器取而代之；摆动的机器只能提供不规则的功效，而且，蒸汽泄漏、频繁的维修、传动机构持续的损耗，都破坏其功效；而水平机器能提供更为连续、更为稳定、更为廉价的功效。”[47]

但是，路易·雷博在比较英国和法国的产品和工具时，对法国在

工业上的落后——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技术方面——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这种落后是由于法国的工业不能有效地满足大生产的要求（从1855年起）而造成的：

“国外工业的特征是，在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中，人们关注的只是为使产品使用方便而必须的要素，产品根据统一的模式来加工，生产的规模很大，这必然导致价格的降低；另一特征是，他们始终关注销售市场的拓展，并通过降低价格和业务上卓越的可靠性而达到这一目的。英国的一流企业的成功之处在就于此，而我国的企业正努力沿着它们的足迹前进……必须承认，在主要消费品（如棉毛织物）、金属器具、机器和航海设备的制造、家用物品、煤炭、陶瓷、搪瓷和普通器皿等方面，它们明显领先于我们，我们远未达到它们的水平……相反，对于法国居于领先地位的产品，更多地是要求工艺技巧而非工业化生产。”[48]

机械化……这就需要继续建造机器。机械制造业——它为工厂而生产，同时也为铁路和航海而生产——是技术发明扩张的首要受益者。1862年，政论家图尔冈在《法国的大工厂》头几卷中有一篇颇有意义的文章，它是关于卡伊公司（生产制糖设备、机车、各种车床和工具）在巴黎的工厂的：

“卡伊公司的生产设备是最新的，问世最多50年，都是19世纪初期未曾见过的。德罗内和卡伊的工厂既不是单纯的铸造厂，也不是钳工车间、锅炉厂或建筑工地，所有这些它们都有，而且还有其他业务；就它们生产的产品来说，几乎无所不包，它们为60年来因为科学之应用而出现的工厂而生产工具——不只是复制已经出现的、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机器，而且根据学者头脑中的思想、发明者的意图，以铁、铜、木材、玻璃来实现最不可思议的效能，并最终创造了当前的工业所依赖的新的机器世界……正是在制造各行业所必须的工具的车间里，工具系统才得以顺理成章地改进。”[49]

三十多年过后，机器数量猛增。1889年，沃居埃在为《两个世界评论》的读者们描绘博览会展馆的机器展厅时欢呼道，“工业和科学革命……是这个世纪的首要职能……它超越了国家生活、欧洲生活中的所 661

有事件”[50]，他进一步指出：“只有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高度，才能把握成批的自动装置的复杂运动；每个连杆和活塞都在这巨大的嘈杂和忙碌中遵循各自的运动目的……人隐藏在机械奴隶的后面，他只需一个小小的动作来掌控它。他通过这些铁制器具和铜线来获取强大的自然力；他操纵这被驯服的力量，按自己的意志来变换和分配之……正午时分，这些笨重的机器还处在昏睡状态，一切都是那么安静。随着一声汽笛响，机器产生的动力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几秒钟之内，动力从展厅的这头传到那头，所有轮系都摆动起来！……这种运动很有节奏，柔和悦耳，但柔和之中又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这是现代化的工作场景，它靠自然来实现，但自然力量是为人服务的。这也是由现代化的工作造就的一种社会景象，是机械化的无情规则构成的‘铁律’的表现”。

作为献给机器文明的永恒的纪念物，埃菲尔铁塔俯瞰着整个展馆。这个由铁制工字梁拼接起来的建筑就是技术力量的象征。但埃菲尔铁塔只是一座丰碑，而更加吸引沃居埃的无疑是“伟大的、无可置疑的创新——电力”，他写道：

“尽管这种新动力的主要用途还是照明，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它将在所有其他工作部门取代旧的动力……你看这机器，它的外形让人想起船上的舵轮，不久，当这种舵成为所有工厂的动力来源时，这种比拟将更为激动人心。这就是发电机，电磁机中最常见的类型。一台发电机能提供250马力的电能，而另一台可以提供500马力。我们到处都能在看到柏油导线电枢下或大或小的耦合线圈；它们开始和笨重的蒸汽机结合，渗入飞轮中，与传动皮带组合在一起，仿佛一支意志坚定的军队，要去侵占、去征服这些庞然大物。这就是电能当前的趋势，征服蒸汽机，直到人们不再需要后者——我们要注意这一重大事实；电能将剥夺蒸汽机的生命力，把它限制在狭窄的使用范围内，并将它转变为更为灵活、更易于操纵、更全面地接近于人的精神力量的动力……由于具有多种工业用途，发电机已经取得介于蒸汽发动机和专门化工具之间的地位。它驱动绞车、绞盘、锻锤、铆钉机和打孔机。电能焊接金属，推动我们头上的桥式起重车；此处它驱动翻斗车，别

处它又驱动船只的螺旋桨。我只需提醒注意电在听觉设备，如电话和留声机中的应用，以及在爱迪生先生的陈列室中开始运转、但现在已为人熟知的设备上的应用。自从马塞尔·德普雷先生的试验以来，电工专家们的实际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机械能的远程传送。今天，发电机已能从蒸汽机那里获得能量，但这种电能是短暂的……理想的电能是能直接从巨大的自然动力资源、首先是水流及其落差中汲取能量……这一理想已在瑞士和我国多菲内的几个地方实现。”[51]

进入汽车时代

铁路发端于1840年代，当时的编年史家把当时的新局面称为铁路“狂热病”。从1890年代开始，富裕阶层开始迷恋汽车，汽车生产厂家大量涌现，以致形成了企业间的真正的竞争态势。1900年，法国共有私人汽车3000辆；1905年为2.2万辆，1914年为10.8万辆[52]。很快一些评论者就大胆预言，汽车工业将会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这里我们应该引述埃内于1905年在著名的《1899—1905年法国汽车业发展的报告》中那段富有前瞻性的话：

662

“一种投入了大量资本、汇聚了众多优良设备的工业，一种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已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就的工业，一种养活了如此众多的工人的工业，它不可能是昙花一现、瞬间衰败的。它有一流的工程师和出色的商人来捍卫它的利益，前者为降低成本而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后者高超的经营最终会战胜对汽车的发展持犹疑或抗拒态度的人，并使汽车用户持续增长……另外，汽车业不再只是一个我们研究的课题；作为个人使用的交通工具，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乐趣、便利，或以开车为业，但它还有其他的意义。它能囊括路上和水上运输，既能运送货物也能运送旅客，因而从这个观点看，它的使用领域是无限的，甚至可以说还未得到利用。法国城市的公共交通，迟早都会由公共汽车来完成，而这在伦敦已部分实现；机械牵引的车辆迟早都会取代马车……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在法国中部，稍微快捷一点的运输工具，要么完全没有，要么十分稀缺或不足，我们难道不可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众多的汽车将能提供有效的服务么？当然，我们

可以设想，在很多情况下，对于铁路运输来说，汽车取代目前的车辆并不是必须的……但当汽车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用于货物运输的工业车辆的制造时，我们不也可以说它就也打开了巨大的销售市场么？

汽车的到来是文明的正常现象……电话、电报和轮船取消或缩小了距离……这是现代生活最具特色的方面之一，这种生活的强度已增加了十倍。追求更高的速度已是十分普遍的、明显的现象：在交通运输中、在各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中、在货物的装卸和交付过程中、在各类交易中，都是如此。时间从来没有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显得如此珍贵……汽车业只是这一重大转变、这一不可遏止的机械化的扩张的表现……因此我们所作的一切评论都支持汽车数量在长时期内的增长，如果这一上升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话。”[53]

典型的大工厂：勒克勒佐

位于经济力量和技术进步的顶端的是大工厂。让我们回到勒克勒佐。1897年，儒勒·于雷对在那里遇到的机器和人员，感触尤为深刻。对于这个实现了生产原料、机器和劳动力的集中的工业企业，于雷之前的其他访问者对其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描述则更为精确。1866年，图尔冈曾这样表述道：“勒克勒佐之所以能取得今天所享有的广泛声誉，特别得益于它的制造车间……车间的巨大厂房耸立在工厂其他部分中间；这使它可以从各方面源源不断地接收到所需的各种原料。尽管它在人员和设备上受中央部门的高层领导，但其本身构成了勒克勒佐内部的一个真正的专业化工厂，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会计机关……它本身又可根据产品性质而分成两个组成部分：铁路设备部和海运设备部；这并不是说，一个分部只生产机车，而另一个只生产汽轮机，而是说每个分部的设备只用来专门生产一类机器、以及那些从用途和形制上说接近于该分部通常业务的产品……车间中央是中心设计室，由总工程师领导；任何设计中的机器首先都要在这里进行生产可行性研究，在机器的形式上，还必须探讨如何解决下述问题：如何以最小的体积、最低的价格提供最大的功效，产品的外形如何才能简单而优雅，尽管这样可能会使其可靠性受到各种考验……降低单位马力的重量、从而降低体积和价格，这一

663

直是勒克勒佐坚持不懈的研究课题。”[54]

勒克勒佐工厂组成状况

1867—1868 年度	
工人数量	
铁路和其他部门	850
矿石	650
采煤	1450
高炉	750
锻造	3250
制造车间	2500
夏龙工地	500
总计	9950
工厂面积	
总面积	125 公顷
建筑面积	20 公顷
铁路	
道路长度	70 公里
机车数量	16
年输出量	72 万吨
年输入量	69 万吨
中央车站运量	141 万吨
每天抵达中央车站列车数	152
矿石开采	
两片相邻的特许矿场	15 平方公里
共计 6 台蒸汽机	90 马力
年产量	30 万吨
采煤	
一块已开采的煤田	64 平方公里
总计 6 台采掘机	350 马力

2台水泵	400马力
7台其他机器	50马力
年产量	25万吨
高炉	
水平焦炭炉	150
阿波特焦炭炉	10
总计7台鼓风机	1350马力
10台其他机器	150马力
年产量	13万吨
锻造	
总计85台蒸汽机	6500马力
锻锤	30
成套搅炼轧制设备	15
铁器和板材轧制设备	26
搅炼炉	130
再加热炉	85
年产量	11万吨
制造车间	
总计蒸汽机32台	700马力
锻锤	26
工作母机	650
产品	
航海设备	
固定机器	
机车	
桥梁结构	
其它各种机器设备	
锅炉、模塑品、铸件	
年产值	1400万法郎

664

其他生产	
15 台蒸汽机	160 马力

我们可以注意到，1866 年的勒克勒佐仍主要从事民用品生产，但并非完全只生产民用品。而到 19 世纪末，它将大量从事军工生产，正如亨利·施奈德对儒勒·于雷证实的那样。这一点我们随后将会看到。

雷博是位出色的工业事务评论家；在 1860 年代后期冶金工业的进步中，经验主义的东西一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雷博对此感到十分吃惊。科学和技术的结合在书本中比在车间中更容易实现。他写道："最奇特的事情是，在一个有如此多的学者涉足的工业部门，人们在细节问题上仍靠经验主义的摸索。比如在高炉的填充工艺中，更多的是经验性操作而非遵循有序的条理；铁的搅炼同样如此。一种固体物对另一种固体物的作用并不比铁对整个混合物的作用更具有确定性。意外情况接二连三。若以同样的用量比例装填同样的原料，有的高炉会产出很好的熔流量，但有的高炉产量却很微薄。同样的熔炼法在有的搅炼炉中能生产出质地优良的铁，但有的高炉的铁质量却很差。工人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可能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设备状况同样也有影响。"

不过在机械制造车间，细节化、也即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知道，这是此后工业进步的可靠证据。路易·雷博评论说，"厂房仿佛是在魔术师的魔棒的指挥下一样振动起来，在这种有规则的振动中，金属会以各种可能的形式出现在生产线旁边。没有哪件工具不具有精确性。这件工具可切削机车车轮，那件可以为汽缸内表面抛光，另外一件则为连杆和曲柄作精加工。每个部件都有其加工装置，任何零件只有经过五六个工具的加工后才算完工。打孔、拉丝、车槽、刨削，都有专门的工具；当看到工具打磨铁器就像加工木材那样时，眼睛是不会感到厌倦的。这时工人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在工具运行时控制它，当它变钝时磨快它。其他的事都由机器完成，它的工作的完美程度，是再灵巧的人手也无法超越的。"

665

工业化：军事化和劳动组织

最近的研究[55]正确地强调了大型企业中劳动的军事组织形式：等级制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秩序，严格的服从和纪律，精确的时间表，层次化的惩罚制裁体制，劳动者与上层领导机构的日益分离，中层干部作用的上升。工人阶级变成了一支“军队”。铁路工程师一直乐于使铁路组织向军事组织靠拢，在调动方案上，双方的确很有一致性。矿山工程师的看法并无不同。而在冶金业中也有同样的发展趋势。

实际上，人们很容易忽视这一点：数百万劳动者逐步进入工厂，这意味着学习劳动纪律、新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艰难过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离开了田野或作坊、村庄或集镇，离开了旧日的劳动环境和家庭空间；他们须抛弃所有其他的工作，特别是长期结合在一起的田间劳动与手工业劳动；他们须投入一种规则化的体制中，作为计量单位的时间在这一体制中具有头等价值；他们须适应单调的、千篇一律的细微工作；他们须遵守新的时间表，须适应新的进餐方式……

对这些新事物，法国工人曾进行了长期抵制。这些农民、村夫、工匠以他们相对自由和独立的地位为荣，当他们在大工厂中受到监工和小头目的看管时，他们总是觉得很不舒服。在20世纪，必须以泰罗制和“流水线”来强迫他们服从、使他们屈从于“科学化”生产率的要求，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反抗这种“片段”性和“重复”式的劳动，1914年之前的雷诺公司便已出现这种情况。

1860年后，一位机械制造业的大工业家向英法关税条约调查委员会透露了以下实情：“我在工人中间生活了40年，我所指挥的工人成千上万。我曾详尽考察过英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工厂车间。我发现英国工人和法国工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一般说来，英国工人从15岁时进入车间当学徒，直到他因为年老而离开工厂，会一直甘于从事同样的工作、生产同一种部件、在同一工种中劳作；某种意义上说，他成为了活的、有思想的机器，因为他总是从事单一的、同样的工作。而在法国，情况完全两样。工人曾不下百次地对我说：‘先生，三个月来您一直让我浇注这个直径的齿轮，我快成机器了，我可不想再当模

塑工了。'英国工人则能接受这种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他比法国工人技艺更高超的原因所在；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劳动力价格远低于法国的原因所在。曾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我说，他们从学徒时候起就一直从事同样的工作。我同样注意到英国工人对劳动的热爱，以及他们为所在企业的成功所作的贡献而感到的自尊。英国没有我们在法国看到的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敌对情绪。"

七年之后，路易·雷博使用"规训"一词来形容勃艮第的农村劳动力是如何适应施奈德公司的生产劳动的："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隶农，勒克勒佐是靠借贷和向所有自由劳力敞开大门而生存的。劳力来自勃艮第和弗朗什-孔泰，但来自崎岖的莫尔旺地区的尤其多，这地方离勒克勒佐最近，它为矿山提供了第一批雇工……来自莫尔旺的工人体格既不够健壮，思想也不够开窍。必须让他们接受某种训练才能唤起和发展他们的才能和体力。为开发他们的才能而办起了学校；为改进他们的体力而制定了食谱。这样，目前从业的第二代人已经与上一代人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件事情上，像其他事情上一样，工厂采取的是专断的做法。通过施加这世界上最惯常的影响力，即不断增加工资，工厂制服了家庭的统治力，也战胜了公社的统治力。这是它运用的唯一的强迫性措施。良好的工资待遇可以使工人改善自己的餐桌，可以为他的孩子支付学习费用。所有这些都是源自事物本性的本能现象，工资的运动方向与勒克勒佐的发展紧密相连。"

666

不过我们还是来听听勒克勒佐的领导者德塞利尼本人的说法吧！他写有一部关于工业化导致的社会问题的有趣著作，该书于1868年由阿歇特出版社出版。关于饮食问题，他如是说道："我们知道，在法国刚开始修筑铁路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来自英国的工人在工作上更为出色，而且他们在法国时仍保持他们吃肉的习惯。法国人的伙食要差得多，干的活儿也少；但是他们慢慢地学习英国人的饮食方式，从而在干活的力气方面与后者相差无几了。工地上发生的小变化在整个法国衍生出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工人的效率都有了提高。不过这种转变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农村，因为那里因循守旧的观念十分顽固。

那些习惯靠微薄食物为生、习惯于轻微劳作的人，要让他们适应繁重的工业劳动有很多困难，我个人就有这方面的例证。给他们更高的日工资也是徒劳，只要他们想稍微增加一点劳动量，他们那糟糕的饮食就无法给他们提供体力，只有等待机会来让他们改善伙食。很多工业中心已经开始有了转变，并改善了工人家庭的生活状况，但这一工作仍不完善。”[56]

这三份文献都来自资方，其中后两份看来只注重物质方面——饮食——的因素，当然这一问题确实很重要。但在自由感和与劳动的关系方面，大工厂的工人越来越感到他们正在变成“机器”。在几十年的“规训”之后，对新的劳动形式的适应确实带来了巨大的进步，罗兰德·特兰佩雄辩地证明，卡尔摩的矿工在 1900 年代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矿工。而在 1860 年代，从工作职业、饮食和心态上来说，他们仍是半个农民。

20 世纪初是法国工业组织的军事化在各部门的工人中、在劳动大众中全面确立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领导、管理、干部配备成为企业领导者面临的首要问题。1913 年，泰勒的《车间管理》被翻译成法文，该书强调了某些部门中招募中层干部的困难：“生产各类机器的大型机械制造企业是最难以组织的工业部门之一……在实践中，所有这类车间都按照所谓的军事等级化原则进行组织。将军的命令通过上校、少校、上尉、中尉及下层军官传达到个人。同样，在工业企业中，总经理的命令由部门经理（主管）、车间主任及其助理、工段长而传达至工人。在这类企业中，车间主任、班组长的职责十分繁杂，他们须具备全面而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才干，因此，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这些职责的，就只能是具有非同一般的才智、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的人。我们在招募车间主任和工段长时会遇到很大困难，几乎不可能碰到称职的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新型的大型通用机械制造车间在其早期发展中很少能取得成功。”

667

这里至少从一个方面提出了职业培训的问题。我们在更高的技术层面、即工程师的层面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亨利·法约尔本人就是工程师，1888 年后他担任了科蒙特利－福尔尚博－德卡泽维尔（一个冶

金企业）的总经理；他在其1917年出版的《工业及管理概论》一书中总结了他的看法。他考虑的首要问题无疑是企业管理。他认为，在工业企业中，职位越高，其所需的管理素质就越高。他建议说，应设立某种金字塔式的企业管理层次，它应像军事中的金字塔体制一般严格。法约尔的构想反映了工业企业和公司规模的增长——在某些部门是如此。但法约尔并没有忽视工程师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这些问题完全不是管理方面的，毋宁说它们是由于过分狭隘的理论训练而造成的。即使在今天，他的“对于未来工程师的建议”仍然值得一读：

“你们将要付诸实践的才干，并不完全是让你们在学校里名列前茅的那些东西……你们的教育目标不是为了领导一个企业、哪怕是个小企业。学校没有教给你们管理思想、也没有商务观念、甚至没有对于一个企业领导者来说所必须的会计观念。你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中缺少人们所称的实践知识、经验，这只有在与人员和事务的接触中才能获得。同样，你们还不足以立即去领导一个大型技术部门。任何一个企业的领导人都不会冒失地马上就把挖掘一口矿井、指挥一座高炉或操作一台轧钢机的职责交给你们。你们应首先学习你们尚不了解的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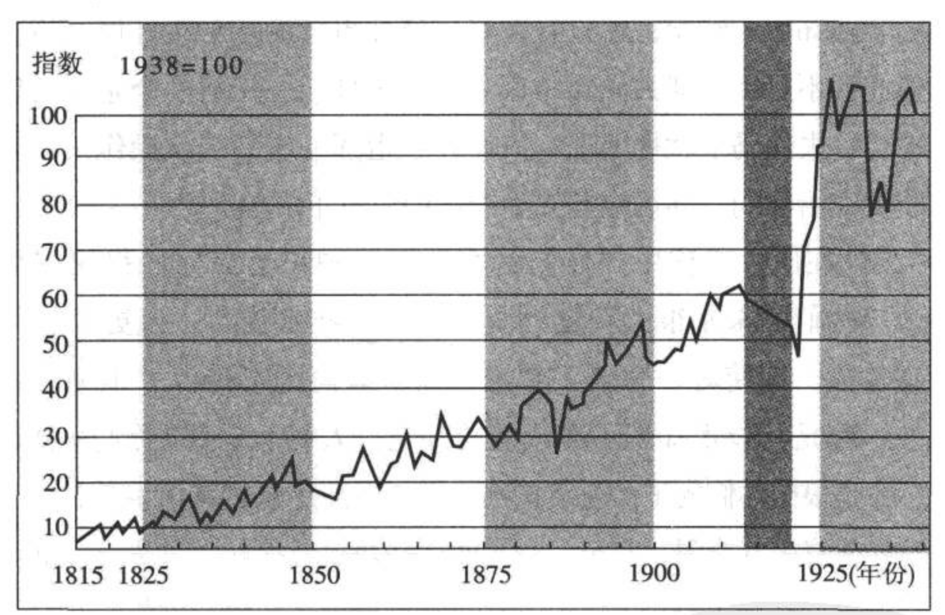
“无论在何种工作中，你们具有的理论知识会使你们很快领会具体细节。你们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看你们的技术能力，但更要看你们的管理才能。即使对一个新手来说，知道如何进行指挥、预测、组织和监控，都是其技术知识不可或缺的补充。人们不是根据你们所知道的东西、而是根据你们的工作业绩来判断你。不涉足众多其他事务，一个工程师的成就将极其有限，甚至一开始他就必须广泛接触各种事务。通晓人事管理业务具有直接的必要性……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工段长也具有当工人的经历，以及你们所缺少的车间经验……请记住，与他们的接触会让你们获得宝贵的、不可或缺的实践知识，这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57]”

因此，在理想的工业企业中，还有某种不能完全与“军队的主要力量”混为一谈的纪律。就在法约尔勾勒理想管理学的纲要时，工人夏尔·贝多（1888—1944年）则提出了一种劳动计量的高明体制——以分钟为单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体制将把劳动者与机器

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熟练工人"（简称O.S.）的命运在20世纪初便日益清晰，这远在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年）中把此类工人当作他可悲的主人公之前。通过以分钟来精确计时，工业中的时间越来越成为金钱。

668　**工业化：节奏、结构和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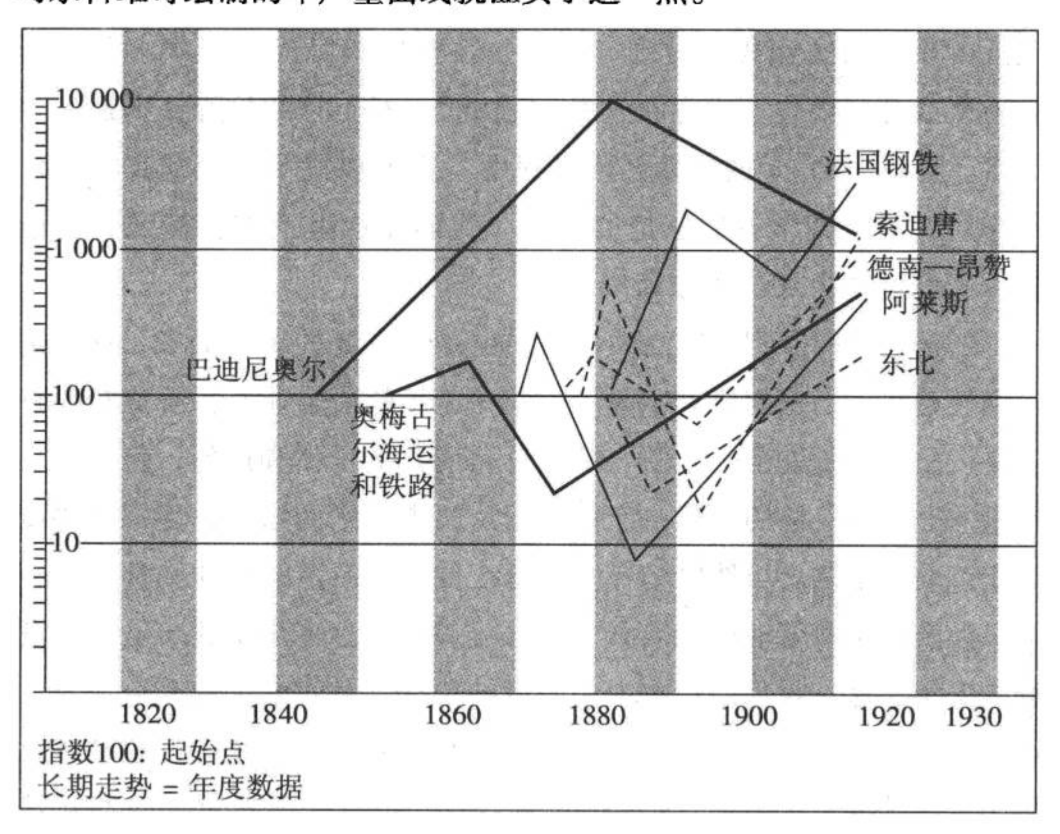
工业（各工业部门）的进程并不是完全规则化的；工业运动也根本不存在一致性。首先，有两种长期性运动的方向是明显的。作为工业增长的全面的、最终的后果，它们无疑最具决定性：这就是产量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而价格的降低本身又与产量和生产率的发展相联系。根据马尔科维奇关于工业生产（包括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研究，可以提出以下指数。若以1938年的工业产量指数为100，则1815—1824年为9.4，1845—1854年为19.5，1913年为67.9：因此在19世纪后半叶，工业产量足足增加了



工业产量指数。（T.J.马尔科维奇："法国的工业周期"）

两倍。在工业品价格总体指数方面（以1905—1913年为100），前述各时代分别为117.1、119和100：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降低了1/5[58]。工业文明正在于供给的大量增长和价格的降低。

除了这些大范围的波动外，还有其它的节奏：最著名的节奏就是十年循环期，即十年之内会相继出现繁荣、危机、萧条和复苏。1857、1866、1873、1882、1890、1900、1907 和 1913 年都出现过危机，不过最后一次危机因为战争而幸运地没有酿成。人们经常能在价格史中发现这些剧烈的波动，繁荣时价格一路走高，萧条时陷于低迷；人们还以此来窥视工业利润水平，甚至把价格走势当作工业产量水平的表征。马尔科维奇绘制的年产量曲线就证实了这一点。



冶金公司：利润指数。七家公司中，六家公司的利润在 1913 年达到最高值（J. 布维叶，F. 孚雷，M. 吉莱：《19 世纪法国的利润走势》。

不过，从 20 世纪初到今天，弗朗索瓦·西米昂、康德拉季耶夫、马若兰和安贝尔等人一直在以计量方法描述一种新型的节奏，他们强调的是跨度为 20—30 年的经济周期：周期 A 是 1851—1873 年和 1896—1913 年；周期 B 是 1874—1895 年；位于这种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之间的是中间周期，对中间周期的价格研究尤其受重视，但这并不排斥对收入运动（工资和利润）的探讨，亦不排斥生产运

动的研究。在 A 周期内，尽管有各种起伏情况，价格和收入的总体趋势是走高的，工业增长速度很快；在 B 周期，收入和价格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工业增长速度不振——当然还是有增长的。因此，从 185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850 年代到 1870 年代初的快速增长期；第二个阶段是随后 20 年的困难时期，经济和社会都处于紧张状态；第三个阶段是战前 20 年的"美好时代"，经济活动、利润、其他收入以及技术都面目一新。最近的研究确实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整体国民经济层次上，还是就地区或部门而言，都存在这种"长波"。对于长波的解释则是另一回事。在 A—B—A 的周期转换过程中，货币和技术因素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对这类学者们争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准备涉足，但请允许我们遵循上述的大致路线。

还是让我们回到更广泛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上来，这就是长期性趋势。当我们研究 1850 年到 1913 年的冶金业时，若比较四种主要产品（钢铁制品、生铁、铁矿石和钢）的价格和产值，就会发现产量的上升和价格的下降：产值由于这两个因素而增加，尽管其幅度小于产量的增幅。虽然价格导致产值走低，但产量的增加弥补了这一点。但产值是和营业额吻合的（基本上如此），而营业额才是工业利润的来源。这一收入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关键，它就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收入，虽然二者并不总能混为一谈，但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这种收入是法国和其他先进国家工业化的一大收获。最近一项名为《19 世纪法国的利润走势》的研究揭示了如下事实：在所有被研究的大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和银行）中，1850 年到 1914 年间的最高利润水平出现在大战前夕：最常见的是在 1913 年，有时是在 1912 年。通过简单抽样，我们可以给出几个冶金企业的长期性利润走向的实例。

670

可以设想，冶金业并非特例，而是所有部门、至少是作为工业化的主要受益者的那些部门的通例。有朝一日，对于化学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力工业的研究将会证实这一通例。但煤炭工业特别值得一提：由于生产率发展缓慢，煤炭价格在 20 世纪初要高于第二帝国时代。不

过煤炭业的产量和利润还是符合上述通例的。

但是，工业发展只能是千差万别的。就工业增长率而言，各部门的幅度该有多大差异，而工业收益的结构又有多少变动！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借用马尔科维奇确定的“工业结构”图式中的某些部门的材料为例，提出某种不尽完善的看法。

工业结构（产值增加值中的百分比）

1845—1854 年到 1905—1913 年间某些工业部门在总产值中的地位演变[59]

部门[60]	1845—1854	1905—1913
电力		0.7
固体矿物燃料	0.5	2.7
金属制造	0.9	2.4
金属加工	3.9	12.7
纺织工业	19.8	16.5
食品工业	16	14
服装和纺织品加工	20.1	14.9
建筑和公共工程	23.2	13.2

671

	总产值增加额（百万法郎）	年增长率（%）
驱动性工业		
1855—1864 年到 1865—1874 年		
食品	1357	1
纺织	463	2
服装和纺织品加工	453	2.5
皮革	441	
总计	2714	
在总产值增加额中的比例	71.6%	
1895—1904 年到 1905—1913 年		
纺织	2752	1.9
食品	2027	0.04

服装和纺织品加工	1398	2.7
金属加工	1250	3.2
总计	7427	
在总产值增加额中的比例	65.3%	
明星工业		
1855—1864 年到 1865—1874 年		
煤气	35	6.7
煤炭	80	4.8
印刷出版	55	4.5
造纸	82	4.2
总计	252	
在总产值增加额中的比例	6.7%	
1895—1904 年到 1905—1913 年		
电力	884	14.5
金属制造	537	11.2
金属矿石开采	43	9.6
化学工业	101	4.7
总计	1565	
在总产值增加额中的比例	13.8%	

资料来源：让·马尔舍夫斯基，《计量史导论》。

相对而言，某些工业在发展，另一些则在衰退。我们不应感到太多的意外。马尔科维奇正确地强调这一经常被遗忘的事实的重要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就工业结构中的地位而言，传统工业仍对新工业部门占据明显优势。后者无疑有了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在产值增加值方面，它并没有取得对普通消费品工业（纺织、服装、食品）的优势。冶金业的净产值（按当时的法郎价格计算）从 1847 年的 8900 万增长到 1908—1910 年的 34700 万——几乎增长了三倍。纺织工业同期从 146900 万增长到 256700 万——增加不到一倍。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部门在 20 世纪初的“分量”上的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让·马尔舍夫斯基对“驱动性工业”和“明星工业”的区分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前者指的是“总产值（该时期内的营业额）按绝对价值计算增长最大的部门[61]”，后者指的是“同期内增长率最高的部门”。[62]不过，这位经济学家呼吁对过去的观点作一点修正。他说：

“一个工业部门的总产值比其年增长率更能反映它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通过构成增加值的各要素收入、而且经常首先是通过向其他部门的购买行为而扩散开……总产值是规模效应和增长率效应的综合……应用这一新标准自然会动摇关于各工业部门的滞后性影响的传统看法。总体来说，决定经济增长节奏的不是日新月异的新产业，而是缓慢发展的旧产业，仅头四个旧产业就占据了全国营业总增长额的75%。不过，驱动性工业一概念虽‘失去了诗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几乎可以忽视具有较高增长率的新工业的作用。他们的出现预示着未来的经济发展。”[63]从让·马尔舍夫斯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提取下述材料来说明从1850—1870年到20世纪初之间“驱动性”工业和“明星”工业之间的差异。在赞同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的同时，也应该指出，明星工业（新工业）对驱动性工业（旧工业）的增长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在20世纪初，电力、金属制造、化工等“明星工业”为纺织业、食品业、以及属于“驱动性工业”的金属加工业提供了能源、染料或原料，从而成为旧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星工业也具有驱动作用。经济增长伴随着工业的各种不平衡状况，如部门、产业、区域、地方之间的不平衡。

672

另外，应该指出，手工业、小生产行业和小规模生产单位具有巨大的抵制力和生存力，这种“民间生产的抵制力”[64]（拉布鲁斯）通常以其节俭、较长的工作时间、对顾客和传统需求的适应性为基础。在这方面，各地乡村冶铁业的历史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很久之前这些小作坊就好像要销声匿迹，但直至今日它们依然没有完全消失[65]。

工业差异在技术集中的层次上更易于考察，技术集中的指标之一就是工资劳动者在各种“规模”（即雇佣的工人人数）的工厂之间的

分布状况。无疑，在重工业中，这种集中对当时的人来说印象极为深刻：这就是“大工厂”的剧增。1867年，路易·雷博在其关于勒克勒佐的著作中以论述这一问题作为结尾：“在制铁行业中盛行大规模集中之风。面临最严峻的生存条件的小作坊无力支撑，而大企业则努力增强它们的力量。我们刚刚在索恩-卢瓦尔看到的景象正以不同的强度在摩泽尔、卢瓦尔和阿尔代什地区重演。到处都在建立集中体制。依然屹立的高炉瓜分了那些倒闭的冶铁炉的残骸，在上马恩和阿维龙就是如此……当这一问题明朗后，所剩的难题便只有一个，这就是：当这些幸存的企业之间发生冲突或瓜分时，它们会如何施展其霸权，这种过度的集中体制对依靠制铁业为生的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但是，这些大企业仍被中小型、甚至微型规模的工业企业包围着。与第二帝国相比，这一情形在1914年之前变化甚小。确实，我们缺乏细致的研究。1954年9月在《研究与动态》上发表的出色研究所涉及的只是1896—1936年[66]。但其中的某些指标仍相当清晰地说明，法国技术集中的程度十分微弱，“大多数情况下，法国是个微型生产单位的国家”。1906年，若以企业（包括农业在内）规模而论，工人和受雇者的分布状况如下：57.9%在雇佣1—10名工资劳动者的企业中工作（49.2%在雇佣1—5名工资劳动者的企业中……）；11—50人的企业：14.3%；51—100人的企业：5.2%；101—500人的企业：11.8%；500人以上的企业：10.8%。[67]同期雇佣1—5人的工业企业共计532646家（运输和装卸业除外），6—50人的企业67889家，51—500人的企业8497家，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611家[68]。最后补充一点：在1906年，28.7%的工业劳动力属“非聚合者”，就是说，他们要么是单独工作，要么是两人合伙而不雇佣工人……

673 当然，在20世纪初的这一原子化的工业世界中，除了技术集中外，还有另一些集中、控制和支配形式。这些形式如金融方面的集中、企业对企业的控制、大工厂向小企业的分包制、各行业的“巨头”之间的卡特尔协议——这种协议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日渐增多。这些现象对于未来的“经济权力”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对它们的研究目前

尚付阙如。在20世纪初，法国工业的技术结构仍相当滞后，企业规模参差不齐，难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生产能力也缺乏弹性。某种程度上说，法国的工业是陈旧的生产形式的博览馆。

国民生产中的工业

最后，我们还需要借助于一些数据，以便更好地从整体上考察工业在全部物质性生产、以及国民生产中的地位的演变。

从19世纪中叶到1914年大战期间，农业和工业—手工业在以价值计算的物质性生产中的比例有了很明显的变化（如下面第一个表格所示[69]）；1847—1910年之间，国民生产净产值的结构总体而言可以分为如下阶段（表格2所示）。

遗憾的是，以目前的研究进展状况，我们还不能对工业—手工业生产结构的主要层次（工业、手工业和农民面向市场的生产）作精确的透视。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1847到1910年间，农业产值和工业—手工业产值之间的差距拉大了，第二产业地位提高了——不过第三产业是文明的整体性演变的主要受益者。我们将会看到，1872到1892年间，物质性生产处于怎样明显的停滞状态，而农业生产甚至经历了显著的衰退。这再次证实了十年期的运动状况。

在增长率方面，农村世界与工厂和作坊之间也存在速度上的差异：

物质性生产

十年期	农业	工业和手工业
1845—1854	44.9%	55.1%
1905—1913	39.8%	60.2%

国民生产净值[70]（百万金法郎）

	1847	*1872*	*1892*	*1908—1910*
农业净产值	5153	8267	7132	10088
工业和手工业净产值	8194	10059	10555	15548
第三产业[71]	3636	5583	7920	10560
总产值	16983	24209	25607	36196

674

农业及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72]年平均增长率[73]

	农业总产值	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
1845—1854到1855—1864年	1%	2.3%
1855—1864到1865—1874年	0.6%	1.6%
1865—1874到1875—1884年	0.3%	1.6%
1875—1884到1885—1894年	0%	1.5%
1885—1894到1895—1904年	0.8%	2%
1895—1904到1905—1913年	1%	2%

四、新的方式，新的节奏及经济关系

我们知道，国民生产中“第三产业”的显著增长——并与该产业就业人口的增长相对应[74]——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和事实。它反映了由国家、企业和个人提供的各种“服务”的扩展。服务业尤其反映了经济交换（产品交换、资本交换）层次上的重大变迁，这些变迁与工业的发展联系紧密，于是有了铁路网、银行网的说法。

铁路网和银行网

这两个网络在它们的发展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存在紧密关系。它们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传送人员、商品和资本。1828年到1913年的铁路网长度曲线、1878年到1913年间里昂信贷银行的两张网络图能够清晰地说明它们流动量的增长和空间上的扩展。这给两个部门带来的结果是一致的：流通要素大量增长，流通成本降低。我们了解铁路方面的情况。不妨从弗朗索瓦·卡隆的论文《北方铁路公司》中提取例证：1849年，每吨1公里的运费为10.15生丁，1873年为5.48生丁；而在1860年代，马车的运输费用根据速度不同而在25到45生丁之间，而且运输能力要小得多。1873—1877年，铁路运量（五年平均值）为82亿吨/公里，1908—1913年为230亿吨/公里。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银行。从第二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

行的整体发展十分可观。北方信贷银行的存款曲线和里昂信贷银行的资产增长都说明，两类银行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一类是与当地工业界联系密切的地方性存款银行，另一类是具有全国和国际规模的大型信用机构。因此，经济生活中的“银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和信贷——的供应越来越充足。四大银行的供应水平从1869年的4.26亿增长到1913年的56.61亿。而法兰西银行的贴现率曲线也表明，货币价格、短期借贷成本（货币的租金）在降低。银行业中的这种走低趋势与铁路运费的降低是一致的，二者都归因于资本和商品流动中规模和速度的不断增长。

1865—1869年间，银行网络——常设分行、临时性代办处——开始发展，这方面兴业银行堪称楷模，里昂信贷银行很快就予以效仿。它们以铁路为依托，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步步随铁路扩展的足迹而发展，并逐渐在各地建立起法兰西银行的分支机构。除了这些分支机构外，各银行还通过对商业票据的再贴现而几乎确保能获得支持和援助。新的铁路和银行网络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这几十年中，铁路就是那些装备优良的工业的重要推进器：冶金、采煤、机械制造和公共工程。在铁路曲线和冶金业曲线中，我们能发现钢产量与钢轨的生产动力之间的某种关系，以及铁和铁轨产量的峰值与衰落（1860年到1880年）之间的关系。我们也能在这一近似曲线中发现轨道价格的急剧下降，这与轨道消费的增长有关。

675

铁路对电力输送问题的解决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1886年，在克莱伊—拉莎贝尔56公里的铁路线上，首次实现了电力的输送：两台机车（无轮）在克莱伊控制一台发电机的运动，输往拉莎贝尔车站的电流可以驱动绞盘、锻锤、轿车和指针。另外，由于改变了流通条件，铁路也深刻改造了过去的生产条件：它打破了孤立隔绝状态、统一了市场、拉近了各区域和地方之间的联系、加速了价格的下降、使得新的工业企业的建立成为可能，某些行业、某些地带、某些地点因它而处于有利地位，而别的地点则因而处境不利……皮埃尔·莱昂在其有关多菲内的著作中已经十分出色地阐述了这些不平衡局面。铁路为农

业带来了肥料、机器和报刊；它运走了农村的收成和储备，促进了农业的地方性选择和区域性的专业化。我们不能忘记公路和乡村道路，它们也对流通和格局的变化起了作用——比运河和航道的作用更大，因为水运网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鲜有改进。

确实，铁路使用者对于铁路运输的某些不便之处的感受，要比对铁路在经济中的决定性角色的感受更深。当时的一位见证者图尔冈在 1879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醒我们，铁路的英雄时代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今年的博览会上，甚至法国展区都展现了一些重要进步，一些展品很有前途，但现行的车辆一仍其旧，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车辆发展停滞不前或仅是改装而已，这实在令人遗憾。前几天我曾乘坐奥尔良公司的头等客车——第 91 号车旅行，这真是最令人厌恶的交通工具，坐在里面人们会觉得旅行是一种痛苦。一路颠簸的 91 号让人想起马路上小跑的两轮车，甚至比后者犹有过之。玻璃抖动得都要碎了，整个木壁板在晃动中呻吟，至于座垫，我想它们从未被修理过。要是人们只利用这种旧货色作短途旅行就好了，但是像图尔这样的小车站要做改进简直是不可想象和不可能的，那里的转车盘太短，这家公司的新型大车无法转开，因此当人们被迫用型号完全一样的旧车辆编成快速列车时，它的缓冲系统甚至无法与转车盘的直径相吻合。"[75]

银行与发展

关于银行的发展与工业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情况仍不很明朗。自 1900 年代以来，法国的银行系统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以不同的机制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起到推动或抑制作用，这一直是个激烈争论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完全没有定论。早期私人家族式的银行（罗斯柴尔德型）、新的商业银行（巴黎与荷兰银行，1872 年；巴黎联合银行，1903 年），拥有全国网点的大型信贷机构（典型的如里昂信贷银行，1863 年；兴业银行，1864 年），1860 年代之后蓬勃兴起的地方性银行（如里昂储蓄银行、马赛信贷银行、北方信贷银行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机构，它们的业务如何运转？它们在各类经营中是如何"运用"其"资源"的？简言之，这就是银行战略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即使

676

对有关的争论作一点总结都是困难的。笼统而言，这再次涉及如下问题：对外投资和转移——法国从 1850 年代起就成为资本输出国，并在 1930 年代之前一直保持这一地位——是否损害了国内工农业的发展？迄今为止，人们给出的肯定和否定的简单答案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过人们又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回答。但我们应再次提出程度的问题：在多大范围内是肯定的或否定的？标准何在？

无论如何，我们应着力强调一个事实：19 世纪法国工业的发展，不管是何种规模的企业，都主要是依靠持续而艰辛的自筹资金来支持的（即把尽可能多的利润直接用于再投资），无论是家庭纺织业还是像化工和冶金这样的“垄断性行业”，情况都是这样。为了不依赖银行，或为了不受其程度不一的控制，法国的工业家一直在进行着最顽强的努力。当然他们有时也在金融市场（债券）和银行（中期贷款）借钱。但这总是万不得已时才会采用的下策。为了阐明这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下面的表格中给出了 1896—1915 年里昂信贷银行从证券销售中赢利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与国外——首先是俄国——的业务占据很大份额，而对法国企业的证券投资比重偏小。不过，如果据此认为法国工业资本不充足的话，那将有失偏颇，因为企业自筹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里昂信贷银行在“特别业务”和“证券认购”方面的赢利结构表，1896—1914 年

（单位：百万法郎）

年份	年度总赢利额	法属殖民地业务	国外业务	（俄国业务）	法国政府和集体借款	法国公司的业务
1896	6.766	2.249	1.222	(0.184)	0.166	3.129
1897	6.309	0.217	4.491	(1.282)	0.107	1.494
1898	6.236	0	4.734	(1.955)	0.060	1.442
1899	9.959	0.242	6.109	(4.078)	2.426	1.182
1900	5.802	0.066	3.666	(1.762)	1.008	1.062

1901	5.024	0.420	3.385	(1.831)	0.113	1.106
1902	7.210	0.587	4.308	(0.972)	0.661	1.654
1903	9.372	0.455	7.009	(2.992)	1.332	0.576
1904	10.779	0.037	8.943	(7.961)	0.506	1.293
1905	4.914	0.613	3.623	0	0.136	0.542
1906	19.076	0.382	17.111	(12.623)	1.252	0.331
1907	7.772	0.560	5.206	(0.473)	0.524	1.428
1908	9.375	0.514	7.208	(3.876)	0.235	1.598
1909	19.953	0.493	16.414	(12.082)	1.414	1.632
1910	13.451	0.800	11.308	(0.041)	0.249	1.094
1911	9.081	0.245	7.298	(0.013)	0	1.538
1912	15.800	0	10.636	(5.493)	2.062	3.102
1913	15.136	0.398	8.452	(4.613)	3.191	3.095
1914	12.865	0.248	9.122	(7.350)	1.342	2.153
1915	14.087	0.002	0.281	0	13.723	0.081
1898—1914 年*						
合计	194.880	80526	140.199	(69.581)	16.784	29.451

* 不含 1915 年。

1896—1914 年里昂信贷银行“特别业务”和证券认购赢利结构。俄国的贷款确实在法国找到了其特选的市场。(见 J. Bouvier、F. Furet 和 M. Gillet，《19 世纪法国的利润运动，穆东出版社，1965 年》。

人员、商品、资本……但交往活动及其新鲜局面并不完全局限于这个三部曲之中。下表给出了邮政和电报业发展的简单轮廓。

677

邮政和电报[76]（五年平均数）

	1873—1877	*1908—1913*
平信和保价信（百万）	366	1576
邮政业总收入（百万金法郎）	116	274
电报发送量（百万）	8.3	49.2

邮政的发展也反映了交往生活的一个方面和新的习惯：个人之间及家庭之间的交往（教育的发展），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交往及商业联系。商业也进入了大变革的时代。商品化的产品数量在增长；交易变得日益迅速和繁忙，而交易的方式也日渐增多。商品涌向四面八方，又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因此商业的结构和习惯不可避免地在发生转变，但速度很慢。报刊上的广告越来越多了。1900年之后，广告的阵地日益牢固：《彩绘集》和《插图世界报》就是明证，携带样品的商业旅行成倍增长；旧式的集市（如博凯尔）走向没落，古老的商栈濒临破产。当铁路和电报使"根据需求"来及时配送产品成为可能时，何必将商品和商人汇聚到一起呢？销售方式也必须服务于日益广泛的顾客的需要。商家也变得更为活跃，他们给商品明码标价，并越来越关注顾客的需求，甚至设法制造这种需求，如通过橱窗来吸引顾客，以打折和广告攻势来招揽生意：这就是第二帝国各大城市中的"大商场"革命，对于这场革命，左拉的小说《妇女乐园》大概是篇无与伦比的报道。当然这并不在于小说那有类于《草庐夜话》[①] 的可笑结局：那位普通女店员竟然嫁给了雄心勃勃的老板。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两方面的描述：招揽顾客的技巧和追求效率的老板强加给女职员的军事化纪律——这里同样有军事化——这些描述仍具有社会学价值。

当然，"小店铺"也表现出惊人的适应、抵制和生存能力，它甚至还有所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左拉对社会现实确有点睛之笔。可能也是在这方面，古老的氛围和家庭气息维系得最为持久（比手工业更甚），至少众多小城镇是这样。今天我们仍能看到旧式的乡村"日杂店"，它们给人一幅恒久不变的印象，还有工人郊区的"小酒馆"，那里的"吧台"不知用了多少年。小商人是小农的表亲、小手艺人的兄弟，他们在小城镇中读着小报，易于感染反对"大商人"的激进情绪。他们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因而是某些"第三产业"进展缓慢的见证。 678

无论是关于人口问题，还是关于工业和国内贸易问题，我们都没

---

① 19—20世纪之交法国的一份通俗读物。

有对以前的发展作全面的论述。我们的目的只是更为清晰地揭示新文明诞生过程中的一些主要的新特征。但到这里为止，我们一直偏重于数字和曲线，而且我们有时还过于看重具体指标。但还有一个有待研究的广阔领域，这就是行为方式和心态。在这些只能作定性分析的问题层次上，人们对工业及其法则的开放程度如何？他们对新文明的适应能力如何？在多大范围内对后者持拒斥或融和态度呢？

五、对工业文明的拒斥

乡村主义与对工业的适应

一些法国人曾亲身体验过从让·季奥诺[1]的早期小说到维希政权的青年园地[2]中乡村主义的复活，这种复活时而动人心弦，时而滑稽可笑；这种复活就是回归土地，赞美农民的价值标准——“土地，它是不会说谎的”，贝当元帅曾说过这样含混的话——以及对工厂、城市和托拉斯的全面谴责和拒斥。尽管这些论调有些人为的色彩，尤其是与催生和引导它们的政治背景有关——有时这是某些自然的歌颂者和青年组织的倡导者所不知的——但意味深长的一点是，这些论调时常颇为流行，甚至在 20 世纪仍能赢得一些听众。此外它们具有明显的持久性：1905 年，物质利益的抗议者梅利纳议员不是写过一本名为《回归土地与工业生产的过剩》的奇怪论著吗？因此，适应工业文明这一难题与法国的现实不可分离。

行为方式和心态：个人的、职业群体的、社会阶层的、地方和区域集体性的——谁会否认它们在面对工业文明的新特征时，对态度和选择导向所起的决定性影响呢？大众的热情和排斥可以有助于或阻碍他们的适应过程，以及发展的加速。心态能够解释行为方式。但心态本身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并非自成一体，也非永恒不变。它自身就是历史、结

① 1875—1970 年，作品多歌颂乡村生活与和平主义。

② Chantiers de la Jeunesse，一译“新兵作业所”。

构、环境和制度的产物。它可能是凝固的，但并不是不能变化的。应该破除心态的神秘性，就是说，应该意识到它的相对性。把心态当作历史的*天外救星*、而不注意考察其根由和制约条件的倾向——当前的时尚——与那种只考虑事物的经济方面的倾向一样，都是危险和缺乏说服力的。

一般而言，按欧内斯特·拉布鲁斯的话来说，“心态滞后于社会”，“社会滞后于经济”。让这位评论者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心态似乎为1914年之前（及以后）最先进的工业生活方式在法国的推进设置了障碍。诚然，结构的影响（人口结构、所有制结构）是巨大的，农业和工业中都是如此。但心态的这种特殊的、在某种程度上属自为性的效应是在同一方向上运作的。

679

我们知道——谁会不了解呢？——工人对工厂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率的努力一直是抵制的。近来关于1914年之前劳工史的所有研究业已对这种抵制作出了解释：出于对失业的恐惧而对机械化持保留态度；反对强化劳动程度的斗争；对非人性化的生产行为的理性化的敌意。由于农村人口缓慢流入城市，因而对相当一部分工资劳动者来说，适应工业劳动的难题始终存在——因为农村人口外流一直在继续，这样一来，工人的抵制就更为激烈了。

资方的反应和反动

但问题牵涉的不仅是工业演进中的劳动大军。干部和资方——老板们的作为如何呢？很难描述资方在面对经济增长时的态度。我们的了解仍是不充分的。另外，法国的老板们隐瞒自己，隐藏档案材料，因而很难对他们进行分析。有什么要保留的，甚或有什么可怕的呢？这恰恰是我们该思索的。人们看到的是怎样的心态特征？对这些人而言，追求“差额”、即利润的诱惑力，要比经济学上的论证和计算的诱惑力更强大；总体而言，他们经济学的修养十分薄弱；他们对安全十分担心，对外部竞争感到恐惧；他们缺乏想象力，缺少开拓和占领市场的“冲劲儿”；当国家试图进行某种控制、或自行对企业进行规划时，他们会谴责国家；但他们又向国家要求（一直这样做）保护、

补贴、免税以及丰厚的合同，并希望从与政治领导层的亲密关系中获得各种好处：情报、与后者勾结以施加压力和影响等；他们善于利用工业结构和规模的多样性所带来的“局势收益”：某个部门的工业成本会向最薄弱的企业的最高成本看齐，这样那些最现代化的、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就能获得超额利润。

法国“中小”老板数量庞大，他们对安全比对展望未来更为关心，他们只关注国内市场，宁愿以控制工资、而不是通过投资和现代化改造来降低生产成本；不过与此同时，还是存在一些头脑清晰、锐意进取、具有现代精神的企业家，但即使在大型工商业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在 19 世纪的第三个 25 年中，马扎梅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上的几个工业家曾一度使该地成为一个国际规模的羊皮去毛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无疑将具有特别的价值：格扎维埃·罗热和卡米耶·卡维利埃在大战之前曾先后是蓬塔穆松的领导者，这家公司著名的铸铁管在国外市场上取得了出色的销售业绩。很难说米其林或雷诺、埃菲尔或施奈德是缺乏进取心的企业家……

但是，该如何衡量推动效应和抑制效应各自的分量呢？在所有情况下，不同的企业主在面对“社会问题”时的立场通常都表现出同样的特征：对于工人的抗议都感到恼火；都没有认识到工人问题的复杂性；都希望将工人大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最残酷的镇压到最专横的家长制，各种方式均可采用；都一直把慈善和正义混为一谈；都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联合，哪怕是基督教色彩的工会。当时的资本家看来还没有认识到，社会问题上的胆小怕事和防御策略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进取的姿态是矛盾的。资方的社会心态——即非社会性的心态——应被看作发展的一个阻碍因素。它延缓了工人阶级融入工业制度、认可该制度的标准和价值观、并有效地参与该制度的进步的进程。这种局面自然促进了——是促进而不是创造，因为其中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工人阶级的理论家和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抗议和谴责。

680

关于资方在社会问题上的拒斥态度，以及他们思想方面过于频繁的狭隘性表现，此类例证不胜枚举。这里只举两例。说真的，让人们

去阅读某些过去的文献从心理上说是件残酷的事……我们来听听1896年亨利·施奈德对儒勒·于雷所说的那段极为直率的话吧：“你觉得要使这样一个企业运转起来不需要钱吗？究竟是谁向工厂投钱呢？除了经理和头头之外，还有资本家，是他带来了大笔资金……没有资本什么都不行，就是资本养活了工人！难道它不是一种应分享利益的要素、一种应参与分红的不可或缺的合作者么？……如果你们取消资本的利润，那么当你们需要资本时，你们就无法获得它！拥有资本的人将会维持资本，显而易见！

“但怎么能阻止私人资本的形成呢？或者说，这种（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资本不是已经社会化了么？所有流通的钱不是都回到工人那里了吗？

“……在这个问题上，该说的教皇都已经说了；我觉得他的上一份通谕很了不起，很有道理，很明智。他在通谕中说，老板对工人应尽自已的职责，确实这样……我向您重复一遍，在这里，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

“危机是一种必要的恶，对此人们根本无能为力！生产依行情而定，或者取决于某种潮流，但这种潮流我们无法预计，也不知道它持续的时间和发展走向……几年前，当弗雷西内先生当公共工程部长的时候，曾希望把铁路铺设到各地，于是一大批冶金业主开始生产铁轨和各种牵引器材，但生产过剩了。弗雷西内先生走了，但之前所有已完成的生产都归生产者来处理！今天，一切都是为军事服务，人们只生产钢铸大炮和装甲板；明天，这一趋势或许会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而终止……所以，市场产品过剩时，生产就会停滞，工人就会失业，必然要失业，这不可避免！”

我说，“是这样，不过在抓住有利时机的同时，您是否从您的产业的角度考虑过，万一裁军会如何呢？”

施奈德先生回答说：

“哦，那将是一场大灾难……我不知道那时该怎么办。”

短暂的思索之后，他接着说：

“毕竟还可能会有平衡。我们现在养活了50万人，包括您和我，到时候都会无事可做，朝夕之间都会失业；他们会排着队来到工厂门口，降低要求来寻求工作；这样工资就会下降，我们就可以不必像现在一样，每人每天付20个苏……

——那国家的干预呢？

——十分糟糕！十分糟糕！我完全不赞成在工人罢工时派一个长官来；妇女和儿童劳动的规章也是这样，人们设置了无用的、过分狭隘的桎梏，它尤其损害人们试图保护的当事人的利益；这样就会阻碍老板雇用他们，并几乎总是达不到目的。

——那八小时工作制呢？

——“哦，我很想这样。”施奈德先生说，并装出一副很无私的样子。“如果所有人都赞成，我将是第一个受惠者，因为我自己经常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只是工资将会降低，或产品价格将会提高，这是一回事！您看，八小时工作制其实是个可爱的想法，一种布朗热主义。五六年之后，人们不会再想它，人们会想出其他的东西。对我而言，实际情况是，一个体质良好的工人每天完全可以工作10小时，而且人们应允许他干得更多，如果他乐意的话。”

681

——简要地说，在目前状况下，您认为可以做点什么？

——“那份教皇通谕！请看那份通谕！这就是该做的一切！自称是天主教徒的德·孟先生，当事情牵涉到是否成为共和主义者时，他是服从教皇的，可是他竟把教皇的指示置之度外，成了社会主义者，真好笑[77]！”

此前30年，即第二帝国末年，勒克勒佐的经理德塞利尼就极为担心工人阶级低下的道德水平，为此他找到了补救之方，这就是根据良好的原则施行教育：“工厂经常被集中到大工业中心；当它们孤立分散时，它们自己便形成一个真正的小城市……工业有它自己的风险。大量人员集中于车间里，其间总是会汇聚一些具有恶劣影响的糟糕人物；这是一种专业化的、规范化的、范围狭窄的生活；人们经常议论工资，言谈之中产生对上司的不信任——所有这些都对工人阶级的道

德造成不利影响。某些工厂中，男工与女工或年轻姑娘混合在一起，这种情形更加危险……大工业，当其推动者对它作自由主义的理解时，它就会带来道德方面的补救措施，这些措施来源于救济机构的设立、大工业本身发展出的保障基金、以及它在推动教育事业方面的努力。当学校运转良好、甚至学徒们在从业之初就经常学习、如此年轻工人便受到思想教育时，当宗教教育踏实可靠、并深入人们的灵魂之时，当人们为培养未来的贤妻良母而对年轻的女孩进行教育时，工业便不再是产生道德危险的源泉，而是一个文明开化的因素。"[78]

我们先别为这番话感到好笑，在同一个人的下述言谈中，我们在保持恰当的批判性的阅读距离的同时，仍能发现某些看来与当今思考方式并无太大不同的思想——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他已能够采取一种灵活的工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无限制的工资政策："如果家庭曾传授孩子以权威原则、如果他知道正义和荣誉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他在学徒时期能在称职的师傅手下继续这种生活，那么人们对于未来的恐惧将会少得多。我们将能防止那种向往特立独行的不良倾向，这一倾向败坏对一切既定的组织的尊重，并不断引起革命的恐惧，从而阻碍自由的发展。……确实，更有教养的工人也经常会对他们的工资表提出质疑，但这种对自由原则的合法运用并不存在危险。更令人担心的是那些在没有见识的工人中毫无目的地传播的骚动不安，是那种并非来自工人本身、而是来自某个以自己的影响力而把工人置于无知境地的头目的不满情绪，是被人操纵的、通过灌输而被歪曲成正义的各种偏见，是那些良好的工人所谴责的可怕暴力——无知的人们所进行的所有罢工都具有这一可悲的特点……随着教育的进步，工人将会以合法的、自由的工资协商方式取代无益的、破坏性的怠工做法。"[79]

资产阶级的投资

工资劳动者，企业主。但储蓄者呢？

19 世纪法国的储蓄者被指控犯有一个重大罪过：损害了经济增长。一般的投资者更青睐于国家公债、土地和房地产，这种做法可能

是非常欠考虑的。他在盘算投资流动资产时显得极为小气，因而最终放弃这种投资。当他受广告和许诺的推动，下定决心购买这类证券时，有人曾告诉我们说，他十分偏爱的是带有固定收益（利息）的债券，而不是具有变动收益（股息）的股票。股票、债券或公债的认购者以交易代理人为中介、通过银行代理处或“证券推销员”等渠道进入证券交易市场，此外，他们更加热衷于外国、而不是法国的证券，他们更愿意去填补俄国的财政赤字，而不愿帮助法国的企业去扩建工厂。

682

这种印象式的描述是相当真实的。另外，更具普遍意义的是，在我国，信用货币和支票的使用只是十分缓慢地在社会上推广开的。甚至在今天，在日常采购中以支票支付仍很难让商家满意。“纸”，无论是纸币还是交易所的票据，总是显得很不牢靠。当时的人们认为，不应该相信美好时代的某些政论家所说的一切，如内马尔克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他曾写了上百篇文章来歌颂“资本的民主化”。在 20 世纪初，银行和交易所的业务还没有深入普通百姓阶层。只有中上层资产阶级熟悉这些事务，而小资产阶级并不总是如此，他们在纸币、票据和投机面前往往显得畏首畏尾。农民对钞票和债券也并不是趋之若鹜，把积蓄存入银行也并非农民通常的做法：土地和金币是他们的最爱。很遗憾，我们无法精确地估量银行货币、票据和债券在社会上的传播。目前关于法国财富的分配和演变的历史研究还不够深入，我们还不能准确地谈论这些问题。但这里可以作一点猜想：法国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信赖工业发展和经济流通中出现的新的银行和货币形式。历史研究将很可能会证明，在储蓄存款的层次上，为资本主义提供资金支持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像有人暗示的那样，是城市和农村的普通群众：毋宁说，在 1914 年之前，消费倾向才是群众日常生活的本质所在。

可能存在一种有害的储蓄导向。当然，在 1914 年之前的 40—50 年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态度上的转变：对于法国工业债券的投资明显活跃起来，这是经济增长导致的客观上的转变的确切表征，也是储蓄者主观转变的信号。但是，由于缺乏有关储蓄者的准确的社会学认

识，人们可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相当不可靠的判断。在所有情形下，这些投资导向根本不是他们自己的业绩：他们只购买国家、工业企业和银行集团向他们提供的债券。这里不妨举俄国的公债为例，它是送上门的东西。由于缔结了这样一个美妙而有益的同盟，俄国的公债怎能不牵动人们的钱包、乃至人们的心灵呢？

不过，谴责“剪毛工式的票息食利者”是徒劳的，因为，他们的选择说到底是理性的——或至少他们力图、他们希望使其成为理性的。最近有一篇十分有趣的经济学论文，研究的是“从1815年到今天的法国储蓄者的投资”。[80]它提出了一种有关放款人的三维类型学。并不只是存在两种对立的储蓄者类型——投机者和食利者——而是有三种，因为还存在“中间投资者”，而且看来这是一种主要类型。这种类型的投资者既不像投机者那样不停地套购，也不是像食利者那样坐享其投资。他们在投资时，既注意收益也看重安全，信奉流动性优先的原则，即主张投资的灵活性和可转换性。食利者“投资时以保险为原则，排斥风险”，[81]投机者“愿意以投资下赌注”，[82]但中间投资者的投资是多样化的，在不同的时期，他会把资产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他的策略是调换而不是套购……这是处于守势的赌徒的策略。”[83]

19世纪后半叶与前半叶相比，储蓄形式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地产、不动产、抵押债权向证券和“金融资产”（储金会和银行的存款，国库券）让步。1890年到1895年间，国民财产结构中的流动资产超过了不动资产。在流动资产内部，流动证券在活力和地位上居于优势地位。1851—1855年，它在国民财富总额中的比例为7%，1911—1915年上升为39%。在1915年，外国证券占法国证券总额的34%。这就意味着，2/3的证券是法国证券。而在法国证券中，从1892年到1913年间，年金公债的比重下降，债券的地位没有变化，而股票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它在法国证券总额中的比例从21%上升为32%。因此，在美好时代，储蓄者的态度并不像人们此前认为的那样令人失望。 683

这里可能又回到了上面提到的问题。由于国内的压力，一部分存

款投向了国外。但这究竟是因为法国国内资本需求不足——与工业扩张受阻有关——还是因为法国金融集团的深思熟虑所致呢？——这些集团认为向外投资可以方便地筹集到大笔资金，而且出售国外证券会轻易获得利润。“究竟是向外投资导致法国经济不振，还是经济不振引起资本外流”？[84]米夏莱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种自发的资本外流—经济萧条机制”[85]。也许是这样吧……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法国的资产阶级是唯一大量储蓄的阶层，他们并非不知道也非不愿意为经济增长提供资金——即使他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应该避免那些习惯性的简单化认识，不应将所有罪责都归咎于“食利者”，因为他们并不是投资市场上唯一的顾客类型。相反，在为普通储蓄者恢复了一点名誉后，对于学校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应持严厉态度。

教学和教育：为了谁？为了什么？

安托万·普罗斯特的出色著作《法国教育史（1800—1967年）》，引起了人们对学校体制与经济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的关注。有两个事实被着力强调：一方面，“法国的教育体制”无力“承担起培养生产者的任务”[86]。无论是中学还是高等小学“都不认为培养适应职业需要的劳动大军是它们职责的一部分”。[87]

各类学校好歹为经济生活培养了高层和中层干部，但并没有培养出适应某种职业的工人大军。在20世纪初，私立和公共的职业学校每年送出的学生只有9000人，这就好比“就业海洋中的一滴水”。“大批劳动者在开始工作时没有经过职业培训。”[88]

1911年1月7日的《工业评论》刊载了一篇题为“学徒培训的危机”的文章，其中对这一棘手的问题作过精彩论述——当然，人们能注意到，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篇幅相当薄弱：“学徒培训学校（公共的和私立的）目前已经有很多了，但设立这些学校真的是解决这一危机、提高职业教育水平的合适的办法吗？这些学校可能营造出一种人为的环境，但那里的生活与工厂生活是有差异的，那里无法让人适应

劳动纪律、乃至职业劳动的危险性……机器和工具早已过时，设备也不齐全。教师与工业实践已然失去联系，他们不了解生产工艺的发展……一方面，贫苦家庭的孩子无法进入学校，另一方面，教育成本确实太高。在巴黎市的学徒学校，一个学徒每年的培养费用需要800法郎，还不包括场所折旧费。因此可以看到，这样的学校不可能推广开来，应该限制其数量，使其只须培养我们的精英工匠。实际上，如果学徒不能在外面获得所需的技术教育的话，就应该在车间内进行培训。各种协会、雇主或工人联盟在劳工联合会组织的众多夜校职业课程，目的正在于此。但它们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倡议在工作期间开办学徒课程的原因。目前在巴黎举办的两个课程（1908年归市政府管理）就是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面向机械学徒工，另一个面向白铁工和钣金工。企业主舍弃一个工作小时，学徒5点离开工厂，7点回家……希望这样的榜样能有人效仿，希望各工业中心能有充足的资助来开办类似的课程。老板们的合作对这一事业的成功是必须的；不过，他们总有一天会从中获益。因此，工业家们无疑将支持这些施惠于学徒的重大努力，何况这些努力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各种协会或市政组织来实施的。”

684

于是，为了解决学徒培训的危机，《工业评论》宣扬的竟是取消学徒学校！此外，它所设想的只是对精英工匠的培训。它把希望寄托在零散的培训课上，这样的课程安插在劳动时间与工人从工厂下班回家时间的间隙中，它还请求企业主——对这些人来说，并不存在从整体经济发展来考量学徒培训的问题——认清他们的利益所在……因此，当1969年的人们得知技术教育仍是我国学校体制中的“穷亲戚”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1868年，德塞利尼曾有过这样令人欣慰的说法：“机械的改进只有依靠有学识的工人才有切实的可能性。”但是，依据这种看法，教育培训应严格服从于某个工厂的要求，它完全由工厂掌握，完全服从工厂领导的思想意识。

而思想意识中也存在各种层次的教育（或不教育）的问题。可以

十分确定地说，思想意识是与社会等级、领导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相对应的，这种价值观是由现实利益维持并产生的。但是此类思想意识与经济增长的要求和适应工业生活形式的要求极不相称。维持权势、地位和身份与促进经济现代化、提高经济效率——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作为领导阶级的资产阶级，看起来是毫不迟疑地认为安全优先于变动，传统优先于创新想象。这种思想意识通过各级教育机构传播开，这在社会意义上说是有效率的，但在经济意义上说则是贫乏的。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在试图使存在依附性和自卑感的社会关系固定化的同时，也就不断再生出这些社会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学校传播的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灵活的可变的关系模式，或社会机体中的一种积极进取的工业化形象，而是一种提倡服从和墨守陈规的社会道德。所有学校都是如此，不管它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初等”的还是“中等”的。

“名流学校”和“大众学校”——安托万·普罗斯特已经说明，“社会分层”是如何“反映到教育体制中”的；“教育中的不平等与社会阶级的不平等相对应”。由于名目繁多、或明或暗的壁垒，由于中学招生中的马尔萨斯效应——其人数从1880年到1930年间竟没有增长！——由于拉丁语在教学中的地位，所有这些使得资产阶级特别想“同普通大众区别开”。“教育体制是优越感和特权的积极维护者。”[89]在名流学校，资产阶级毫无顾忌地继承了旧贵族的古老价值观念。安托万·普罗斯特曾指出，比松将“造就人的智力才能”与“造就工人的实际能力”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论调——奴役性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地位卑下，17世纪初的法学家卢瓦索就曾这样说过。没有什么比国家未来的干部所受的普通教育更具“反技术”色彩的了。人文知识是确认社会地位的标志。精英们学习拉丁语，而所有人都学习其他课程。安托万·普罗斯特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种风气不利于经济增长。”[90]学校在培养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个人主义的同时，“它并没有教给人们如何融入必不可少的团体生活的习惯”，因而这种不利的影响就更加确定了。

但我们还想指出更糟糕的事情，这就是初等学校体系向民众阶层的孩子们灌输的道德观。从这一观点来看，1880年后的世俗化、义务性和免费原则是领导阶级的思想意识支配城乡工人阶级或中等阶级的决定性进展。

安德烈和于连：孩子们的榜样，模范劳动者

我们应该重读一下两部极有启发意义的著作，但这只是因为它们在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曾长时间地广泛流传，它们的作者是布律诺，她是知名的大学学者的女儿和妻子[91]，这两部著作名为《弗兰西内》（Francinet，第一版问世于1870年），《两个孩子的环法旅行记》（简称《环法旅行记》，1877年首次出版），第一部是第二部的提纲。1904年，《环法旅行记》出了第411版[92]。尽管人们称它“重新审视了一切”，但其文字从1877年后并没有修改，仿佛法国经济不曾有一丁点儿的演变、完全处于昏睡状态。书中完全没有增长和发展的观念。附加的一篇后记中说，巴斯德的发现、殖民地上与蛇的斗争，潜艇，“法国的移民地”，电气设备（电话、无线电报、留声机等等）——所有这些确实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但在书的结尾，1904年圣诞节的家庭团聚发生在一个农庄中，而于连的儿子“小让”最后回想起的法国是“我们的村庄，它是法国的一个小角落”。[93]

此外，这部著作通篇都是对古老的职业和手艺人的赞美：木鞋匠、锁匠、制干酪者、钟表匠、锅匠、花边女工、鞣革工人……整个半农半工的、古老的乡村式的法国，都以一种虔诚之心被展现出来。充塞法国乡间的农庄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安德烈，我们会设法使你成为邻村的锁匠的，在这之前你帮我们种地吧。”[94]因此，当1872年这两个孩子结束其行程时，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们只能在马厩和小作坊之间生活。真是一幅完美的田园画卷：“如果安德烈在小镇的锁匠那里失去工作，他可以到农庄干活。”[95]这就是有关法国农业与小手艺之间那虚假的平衡的脆弱理想，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人们就向工人、农民和小店主的孩子们灌输这一理想。

确切说来，大工业并没有被遗忘，但是它完全被弱化了。对于勒

良第的描述以葡萄农为开端，以参观勒克勒佐为煞尾，开篇便是苏利论述农业的一句话：农业是“真正的秘鲁矿山和宝藏”。煤矿只能占据很短的篇幅[96]，勒克勒佐的工厂亦然。有关北方省和佛兰德尔的章节很乐于描绘罂粟苗圃，但提到勒克勒佐的只有一行文字……

686

不过，这部有关道德风化的著作所宣扬的伦理道德更值得一评。说真的，书中大段的伦理说教有时太过分，以致让人反感。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安德烈和于连不只是道德楷模。他们是尽善尽美的活化身，甚至可以说他们因此而成了傻瓜。但是按照当时道德上的金科玉律，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道德，纪律、服从、驯良的道德，这些道德品质首先是面向雇主的等级和权威的。人不应该撒谎、出言不逊、饮酒、狂暴、怠惰。谁对此不会鼓掌称庆呢？但是应该首先服从老板和监工的命令，应满足于诚实劳动挣来的几枚钱币，应恪尽并固守自己的职责，应尽量少消费、多节俭、以备时运不济，应像逃避瘟疫一样避免借钱，而且不应嫉妒富人。“勇敢热忱的人依靠的是自己的劳动所得，而不是指望向别人借钱。”[97]这就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小资产者、工人和农民，几十年间一直对投资收益的预期和贷款消费再三踌躇的原因所在。一般的法国人是不借债的。他的生活圈子是封闭的。他不会觉得悲伤不幸，因为当他看待在他之上的人时，他会这样想：“财富的美好之处就是，它可以减轻其他人的痛苦。”[98]

我们顺便提一下，凯恩斯爵士后来在对19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平衡进行颇不恭敬的反思时，也证实了《环法旅行记》向我们揭示的东西。他写道：“这种非凡的体制导致的增长是同时建立在谎言和欺诈之上的。一方面，对于劳动者阶层、自然要素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那块蛋糕，劳动者只能分享到极小的一部分，他们只能接受这样的境遇。他们这样做或是因为自己的无知，或是因为没有力量，或是因为习惯、成规、权威和既定的社会秩序强迫他们、欺骗他们、使他们相信只能如此。而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有权要求分享大部分蛋糕，而且理论上说他们可以自由消费之。但实际上，一种潜在的约定使得他们只是消费很少一部分。‘储蓄’的责任构成了美德的90%，而扩大蛋糕才

是完美宗教的目标……于是蛋糕在变大……人们常说，应该为你们的晚年和孩子而储蓄。但这只是一种理论，蛋糕的恩泽在于它永远不会被吃掉，无论是你们还是你们身后的孩子都不会这样做。"[99]

自然，我们的两位小主人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剥削劳动和劳动者的观念。当他们来到克勒佐的工厂时，于连说：

"这工厂真像一座城市。它发出的噪声真大！上千盏灯在眼前闪过时，真让人头晕目眩，可能还有一点害怕。

——安德烈说：于连，我们进去时，不要放开我的手，以免你受伤。

——那另一个小孩说：哦！绝对不会的。我们周围有太多的机器在转动。我觉得我们会被卷进去碾碎的。

——不会的，小于连。你看，有很多孩子正在努力干活，他们比你大不了多少[100]；但他们必须全神贯注。

——于连一边挺直身子、竭力恢复镇静，一边说道：是啊，他们真勇敢！"[101]

因此于连可以成为一个好工人。只要他激发自己的个人勇气，只要他自己能"全神贯注"。这样工厂就只会变得更好。

从法律上说，工人是特殊类型的公民，这一事实并没有让布律诺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感到不安。对于他们，对于所有读者而言，"小册子"——工人的特别身份证，是一种很自然的制度，那册子上记录着各种老板（和市长们）的评语。"安德烈和于连都知道，工人应该有正式的证明。"[102]只要这是份"良好"[103]的证明就够了。为了避免含混不清的情况，该书第62页还复制了安德烈的小册子，艾皮纳尔市长在上面写道："他的品行无可指责"。工人阶级天然就被认为是危险的。这两个孩子顺从地接受了别人的监视。

687

在这种道德中，作为个人"良好举止"的基本规范，与旨在培养普遍驯服精神的严厉的工厂规章和社会禁令被巧妙地混淆在一起。我们还是放下这种道德，来读一首诗歌吧！我不想进行评论，我担心这样我会收不住笔。这首诗是善良的布律诺夫人的另一部著作的结束语

（它的所有版本都是这样），该诗名为“穷人之歌”，可以为它加上一个副标题：“受了委屈，但很满足”：

从摇篮到坟墓
我的辛劳之旅何其漫长！
但劳作铸就高尚的灵魂，
游手好闲致使心灵卑劣。
主啊！请你给我明示：
我是劳动者的儿子！

那山坡上古老的肥沃土地
是劳动使其丰产；
那珊瑚，那珍珠，那宝石
是劳动让它们从水底展现于世人面前。
这世界归于劳动，
归于劳动者，归于他们的孩子！

我那无所事事的富家兄弟，
我和你一样是神的儿子！
筵席为所有人而开设
但你我是不平等的宾客，
但爱会激发起力量；
如你愿意，我的兄弟，让我们相亲相爱！

既然我们都有同样的起源，
为何还要彼此仇恨？
不幸源自你的傲慢，
我为怨恨而在梦中泣血。
愿两颗灵魂合而为一；
神都把我们称作他的孩子！

如你愿意，让我们一起向前，永不歇足，
手挽手，心连心，
忘掉那让我们互感不快的一切
以手足之情而共同努力；
我愿有一个名字：力量，而你：慈爱！
兄弟，爱是天国之子！

结论

推动因素和制约因素

我们的论述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中心问题：在19世纪后半叶的法国，新的文明——工业文明渗入到了何种程度；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只是有针对性地给出了一些零碎的解答。关于推动因素和制约因素的整个问题体系仍是不完善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知识本身仍是有限的，这是由于历史研究的滞后造成的，当然，我们正在弥补这种滞后，但它还没有被消除，远没有。我们仍有广阔的无知领域，我们的方法仍是经验主义的，因为既要度量可以度量的问题——这种工作没有尽头——然后还要估量没有“有形”影响的因素，然而，定性分析仍期待着它的研究队伍。

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无论是法国的还是国外的——如大卫·兰德斯，卡梅隆，金德尔伯格等人的研究——占有支配地位的一点是，它们都强烈意识到20世纪初的法国在物质、人口、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落后，当把法国与英国、德国的文明和经济增长作比较时，便能感受到这种相对的落后——与美国相比就更是如此。弗朗索瓦·佩鲁、让·马尔舍夫斯基和他们的小组已经强调了制约性因素的影响，而我们则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这些看法，就像帕尔马德曾所做的那样[104]，但我们的工作要细致得多。

要避免布律诺的描述为我们设下的陷阱，就应该来一个转向。1914年前也存在一个领先的、充满活力的、现代的、高效的、拥有经

济和技术成就以及个人成就和社会成就的法国。这个法国还没有经历科学分析的手术刀的剖析，它仍处在某种阴暗之中，因而就被忽视了，或至少被低估、被弱化了。无论是 19 世纪末新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汽
688 车、航空、电力和电器制造、化工、炼铝，等等），还是自 1890 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波动，都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不过，各大学中孤立而缺乏组织性的研究已有一些零散的成果，看来它们都在逐步揭示出一个新法国的面目特征，这个新法国摆脱了结构上和心态上的传统主义的制约。至于我们而言，在有一项有关大企业利润的集体研究中，我们业已看到了这些新特征。马尔科维奇和弗朗索瓦·克鲁泽对于工业生产指数变化的最新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1914 年的前十年中，法国经历了一个同第二帝国初年一样快速而重要的工业演变期——如果不是更胜一筹的话。马尔科维奇、弗朗索瓦·瓦尔特、佩热等经济学家都已注意到，若把人口数字联系起来看，工业生产的绝对值和国民产值——换句话说就是人均产量和产值，这是衡量增长的更为准确的尺度——和其年增长率，都经得起与德国和英国的同类数字的比较，至少 20 世纪初是如此。马尔科维奇在有关 1789—1964 年的法国工业的宏大研究的结论中写道："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差异，法国的工业增长在好几个时期相对来说（比英国的增长）更为显著，因为它是在人口增长明显受抑制的不利局面下实现的……如果以年人均国民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计，我们可以确定，19 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的增长要高于英国、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持平。"[105]

因而应该修正阿尔弗雷德·索维（但愿他能原谅我们）的那种悲观主义，他对人口和工业的缓慢增长的解读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这并不是说人口造成的抑制效应不起作用。但这些效应不总是阻碍真正的全面增长：我们对美好时代开始获得的认识相当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研究者们被某种视角错误困扰。因为就"分量"而言——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可支配的地下资源等——法国的经济是

中等规模的，就“素质”而言——人口分布状况、微型一单元式的经济结构、不利于适应新经济生活的心态和行为方式——法国的经济存在明显的制约因素，它们都是导致法国经济发展缓慢和滞后的原因，但只强调这一点是过分的做法。不过对我们而言，指出18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文明中的矛盾性、以及对此进行分析的各种困难，这就够了。争论会继续，我们应提防它停滞不前。

【原注】

1. J. Huret, *Enquête sur la question sociale en Europe*, p. 32（Perrin et Cie, 1896）.

2. Edition de 1932 p. 336.

3. L'Etrange Défaite, p. 167（Ed. Franc-tireur, 1946）.

4. 总结论，*Cahier de l'I. S. E. A.*（novembre 1966, n. 179; série AF, 7, p. 312）.

5. *Société et population*, p. 146（Hachette, 1969）.

6. 见 A. Armengau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Clio, 1968, Bruxelles）.

7. *Id.*, p. 36.

8. 同上前揭，p. 152.

9. 见 M. Reinhard, A. Armengaud et J. Dupaqu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Monchrestien, 1968）.

10.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et de leurs attitudes devant la vie depuis le XVIIIe siècle*, p. 562（Société d'éditions littéraires françaises, 1948）.

11. *Migrations professionnelles*（P. U. F., 1958）.

12. Georges Dupeux,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1789—1960*, p. 20（A. Colin, 1959）.

13. A. Demangeon, La France économique et humaine. Cité par Georges Dupeux,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 20.

14. 见 Jean Fourastié 的著作和 Cahen 夫人的论文：《Evolution de la population active en France》（*Etudes et conjoncture*, juin 1953）.

15. 农业、林业、渔业。

16. 第一产业中男子从业者数字：514.6 万（1856 年），577.7 万（1876 年），571.4 万（1896 年），551.6 万（1906 年）。

17. 卡昂夫人的研究。这些数字不包括 1892 年到 1945 年这一时期。1954 年这一数字为 953.1 万。J. C. Toutain（*Cahiers I. S. E. A.*，1963）以十年为单位，重组了整个 19 世纪的数字序列。

18. 在这方面，Georges Dupeux、Pierre Léon、Pierre Barral 和 André Armengaud 的研究提供了鲜明的论证。

19. 见 *L'Histoire de Bordeaux. Bordeaux au XIXe siècle* 第四卷，集体论著（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Ouest，Bordeaux，1969）。

20. *Id.*，p. 418.

21. P. Pinchemel，*Structures sociales et dépopulation rurale dans les campagnes picardes de 1836 à 1936*（A. Colin，1957）. 对 Rue、Hornoy、Rosières 三个地区的研究。

22. *Id.*，p. 63.

23. *Id.*，p. 65.

24. 短工只有小块土地，并受雇于他人。"

25. *Id.*，p. 99.

26. R. Thabault：*l'Ascension d'un peuple*，*1848—1914. Mon village. Ses hommes. Ses Route. Son école*（Delagrave，1944）.

27. 《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comparaison avec la Grande-Bretagne》，见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quantitative*（Genève，Droz，1965，p. 110）.

28. *Id.*，174 页注。

29. 根据 T. J. Markovitch 和 J. C. Toutain 的研究（*Cahiers de l'I. S. E. A.*）.

30. 农民自行消费的产量不计在内。

31. 不应该忘记，这些比例只是在就业人口内部、只在物质性生产（实际生产）总量中计算出来的。"第三产业"被排除在外。

32. *Id.*，p. 113.

33. Jean Marczewsiki 强调"城市为农业产品、为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提供的市场不足"（*id.*，p. 113.）。因此导致农民收入不振，缺乏投资和现代化的动

力——“除了相对短暂的个别时期外……（1850—1870 年，1905—1913 年）”。但我们看到，例外情况很为可观。在所有情况下，“非农业性因素”将对长期农业发展的缓慢产生影响。只是在短期之内，“法国农业的自身因素才会发生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农业无法对暂时扩大的需求迅速提供相应的供应”。

34. 前引研究，113 页。

35. *Id.*，p. 115.

36. 在法国，自由贸易为时甚短，仅从 1860—1881 年间实施。

37. *Id.*，p. 118.

38. *Id.*，p. 136.

39. *Id.*，p. 136.

40. *Id.*，p. 125.

41. *Id.*，p. 183.

42. *Enquête sur la question sociale en Europe*（pp. 142—143）.

43. *Id.*，pp. 14—15 et pp. 22—23.

44. *L'Armée nouvelle*，pp. 303—304.

45.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上的文章（décembre 1855，p. 1291）.

46. *Id.*，p. 1295.

47. *Id.*，pp. 1300—1301.

48. *Id.*，pp. 1318—1319.

49. Turgan，*Les Grandes Usines de la France*（Tome II，Lévy Frère，1862，pp. 1—4）.

50. *Revue des Deux Mondes*（1. juillet，1889，p. 190）.

51. *Id.*，1. août 1889（pp. 696—698）.

52.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Partie rétrospective（p. 72）\ [1929 \ ].

53. *Rapport*...，pp. 97—103.

54. Turgan，*Les Grandes Usines*，Le Creusot，pp. 1—53（Lévy Frère，1866）.

55. 这些研究有：Rolande Trempé：*les Mineurs de Carmaux*（1848—1914）（Ed. Ouvrières，1970），et François Caron：*Histoire de l'exploitation d'un grand*

réseau français, *la compagnie du chemin de fer du Nord de* 1846 *à* 1936（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73）.

56. *De l'influence de l'éducation sur la moralité et le bien-êt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pp. 244—245（Hachette，1868）.

57. *Administration industriele et générale*，pp. 127—129（Dunod et Pinat，1917）.

58. Les Secteurs dominants de l'industrie française，*Analyse et Prévision*（mars 1966）.

59. 同上。

60. T. J. Markovitch 区分了23个工业部门，这里我们只保留了8个。

61. *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 前引书：*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quantitative*（pp. 146—148）.

62. *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de* 1789 *à* 1913. 前引书：*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quantitative*（pp. 146—148）.

63. *Id.*，p. 148.

64. Préface à l'ouvrage de Pierre Léon（p. x.）.

65. 见 Marthe Chollot-Varagnac，la morte de la forge de village（*Annales*，mars - avril 1969）.

66. La concentration des établissements en France de 1896 à 1936.

67. *Id.*，p. 851.

68. *Id.*，p. 859.

69. 根据 T. J. Markovitch 和 J. C. Toutain 的研究，农民自我消费的产量包括在内。

70. 即扣除了折旧投资之后的产值。

71. 商业、自由职业、建筑地产等。这里依据的是 T. J. Markovitch 和 J. C. Toutain 的研究（*Cahiers de l'I. S. E. A.*）。

72. 即设备折旧前的数值。

73. 根据 T. J. Markovitch 和 J. C. Toutain 的研究。

74. 我们可以看到，从1856年到1906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249.3万增长到470万，其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另两个部门。

75. J. Turgan，*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78. *Wagons et Moteurs*，p. 99（Paris，

1879）.

76. *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France*. Partie rétrospective（Berger - Levrault, 1929）.

77. 儒勒·于雷，*Enquête sur la question sociale en Europe*, pp. 24—35.

78. *In* A. P. Deseilligny, *De l'influence de l'éducation*..., pp. 175—176（1868）.

79. *Id.*, pp. 223—224.

80. Charles-Albert Michalet（P. U. F., 1968）.

81. *Id.*, p. 335.

82. *Id.*, p. 338.

83. *Id.*, p. 345.

84. *Id.*, p. 223.

85. A. Colin, collection, U2（1968）.

86. *Id.*, p. 293.

87. *Id.*, p. 310.

88. Article d'Albert Marnier.

89. ouvrage cité, p. 326.

90. *Id.*, p. 342.

91. 哲学家居遥（Guyau）和福耶（Fouillée）。

92. 1968 年，柏林又出了新版。

93. *Id.*, p. 318.

94. *Id.*, p. 296.

95. *Id.*, p. 299.

96. *Id.*, p. 115.

97. *Id.*, p. 193.

98. *Id.*, p. 128.

99. 99 Cité par Bedarida, *Histoire du peuple français*, t. V, p. 296（Nouvelle Librairie de France, 1965）.

100. 于连当时 7 岁。

101. *Id.*, pp. 110—111.

102. *Id.*, p. 13.

103. *Id.* , p. 37.

104. *Capitalisme et capitalistes français* (A. Colin, 1961) .

105. *Capitalisme et capitalistes français* (A. Colin, 1961). *Cahiers de l'I. S. E. A.* (AF 7, n°. 179, novembre, 1966, p. 316) .



第二十四章　第二帝国

691

1852—1871 年，从 12 月 2 日到巴黎公社墙

1840 年，托克维尔以一个身处地狱般的恶梦者的口吻预言道，我看到，不可胜数的彼此相似和平等的小民，他们总是翻来覆去地折腾，为的是获得那些充斥着他们灵魂的卑微的快乐。他们中的每一个对他人来说就像是一个陌生人，漠视他人的命运……他只为自己而存在，一切都为了自己……有一种巨大的保护力量凌驾于个人之上，以确保他们的快乐，保护他们的命运。这种力量是绝对的，实实在在的，合法的，深谋远虑的，惬意的。它就像一种来自于父亲的力量，为孩子的成长作好了准备；但与之相反的是，它只希望他们停留在孩童阶段。它乐意让公民们感到高兴，但前提是他们乐在其中。它主动为他们的幸福而努力，但它只愿意成为唯一的参与者；它为他们提供安全，在他们处理事务的原则方面进行指导，帮助他们管理企业……平等已经使得他们能够忍受这些，很多时候他们甚至把这些看作是一种恩惠。

就这样，在 1851 年 12 月的公民投票中，法国人民，法兰西的“民众”“宽恕”了（此乃这位君主的原话）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当时有 750 万张票赞成，而反对票则仅有可怜的 65 万张票。一年后，差不多有 800 万“相同而平等”的法国人，再次投了他们皇帝的票。托克维尔的恶梦是否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呢？

692

反自由的平等？

政变，或者说是1851年12月2日的“事件”，就短期来看，是解决过于年轻的共和政体所经历的危机的一种应急措施，一种应对具有乌托邦色彩的1848年宪法所造成的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之间显然可以预见的必然冲突的解决办法。人们对暴行漠不关心，因为这个民族已经厌倦了和自己无关的争吵。行政机构取得了胜利，亲王不久变成了皇帝。这是权宜之计吗？不，在当时那些真正的政治家看来，它属于长久之计。对于基佐这位认为资产阶级的地位上升乃不可抗拒的历史学家，对于他的那些“有教养阶层”中的自由派朋友来说：“我们用士兵清除了一场骚乱，我们让农民们参加了一场选举。但是，无论是士兵还是农民都无法成为统治者。这应该是一场上层阶级之间的竞争，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统治者。”马克思，这位法国事务的积极观察者，其看法与所有人的看法均大相径庭——他从自己的老师黑格尔那里得到的教诲是，历史只是一场不断重复的闹剧。继伯父之后，是所谓的侄子的荒诞插曲。马克思甚至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的最后篇章中斗胆断言道：“当皇袍最终披在路易·波拿巴的双肩之际，拿破仑的铜像也将从旺多姆柱上倒塌下来。”深谋远虑的托克维尔也不禁感到怀疑，他在1852年向好友博蒙坦诚相告：“我总是担心这场漫长的法国革命会导致平等和专制之间的妥协。我们会看到这些预言的实现，与其说这是一个被建立的政府，还不如说这是一种冒险。”

然而，这场冒险将持续20年之久，直到1871年5月，旺多姆柱上的铜像才在巴黎公社的起义中倒塌。从长远来看，12月2日事件不正是迈向必然的平等主义的终点吗？它是漫长的法国历史进程的终点——托克维尔对此洞若观火；而平等那无法逃避的伙伴不正是专制主义吗？获得普选权之后，法国的新公民们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了皇帝的怀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缓慢的民主化的历史或是体现在其实在性上，或是体现在危急时刻从某位最高监护者那里寻求庇护的渴望上，这里仿佛有一种规律。当然，我们不能进行牵强附会的比喻或不切实际的类比。历史学家们透过迷雾探索的这一

冒险事件，拿破仑三世成功的原因和可能性以及他的失败和各种波折，总是包含着权力的运用。但为了更好地解释，更深刻地理解这一事件，就不应该相信这样一种规律，它脱离了托克维尔的政治理想：因而平等和自由对法兰西的辩证法来说是必需的。

一、从一个“一二·二”到另一个“一二·二”

波拿巴体制在迅速地得到确立。波拿巴首先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确立其统治的基本内容。确实，他要皇袍加身还需等上五年。这位侄子可谓亦步亦趋、原封不动地“模仿”了其伯父的冒险行动。为了能在1852年12月2日这一注定和其伯父的传奇业绩联系在一起的日子里戴上皇冠，他甚至加快了政变的进程。当然，他首先得在长达两年的行事不便的总统期耐心等待。

各种制度的确立

四个月的“独裁”足以建立起政体的主要部门。如果我们以它在罗马时期的含义来理解“独裁”一词的话，那么，此种独裁之举在当时可谓绝无仅有。该词在罗马时期的含义是：在为期不长的非常时期里，在民众的赞同之下，暂时取消所有合法性的东西，以便某位有如救星一样的人物得以拯救国家。1852年3月27日，亦即议会举行首次会议的前两天，当主要权力机构建立之后，独裁统治停止实行。

693

一如共和八年的宪法，新宪法的制订是在几天内匆忙完成的。除了让自己任命的咨询委员会缓慢起草之外，总统还把宪法的起草工作托付给了其亲信鲁埃，而他一个人，或几乎是一个人在24小时之内就完成了这项任务。1852年1月14日，相关工作准备就绪。为了使宪法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便于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修改，宪法的条款极为简短，得到全民支持的12月2日的《告人民书》构成了宪法的基本提纲，并精确地对宪法进行了概括：1）负责任的首脑之任期为10年；2）各部部长仅对行政权负责；3）由最知名人士组成的参政院负责法律的起草，并在立法团讨论时进行解释；4）立法团成员由普选产生，

而不是通过会歪曲选举的名单投票产生，由立法团负责讨论和投票通过法律；5）由全国的杰出人士组成第二院（元老院），他们对权力起到了制衡的作用，是基本的法律条款和公众自由的维护者。新宪法的很多条款显然是共和八年宪法的翻版。鉴于它亟待投入使用，以至于无需民众的赞同。不过，它在未定型时已经得到了民众的赞同。

救世主

亲王有言："民主的特性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实际上，作为救世主的这位任期10年的新执政，已经几乎成了独裁者——在此是根据其现代含义来理解此词，他掌控了几乎所有的权力。他借助各位部长、国务会议、元老院和立法团，用十分粗暴的手段来进行统治。他单独掌控着行政大权，随意任命和罢免官员，那些部长只不过是工具和高级技术人员而已，因而他往往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感受。他积极参与立法："共和国总统、元老院和立法团共同行使立法权。"尽管立法团是唯一通过普选产生的机构，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也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人们说立法团已不再是国民大会，他的代表也不再是人民的代表，因为只有700万法国人选出的路易·拿破仑才能自称"代表"国民的意愿。各部长再也没有出现在日益式微的立法会议中，因为他们只是对总统负责的工具而已，只有他才能"站在法国人民面前"。立法团的主席和办公机构均由总统任命；立法团一年只有三个月的会议期，总统可以随意召集、延迟或解散会议。它只能对国务会议提出的法律进行投票，国务会议由那些声名显赫的高级公务员组成，但他们一律由总统任命以确保绝对的服从；法律的修正案首先得获得国务会议的同意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讨论。立法团唯一可用的反抗武器就是对预算的审查和投票；然而，这种权力也减弱到了几乎不值一提的地步。

与之相反，从表面上看，元老院拥有更广泛的权力，这些权力几乎让人感到畏惧。它在审查过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之后对其进行批准；因为它是宪法的解释者，并能通过元老院通过的决议来修改宪法。不过，鉴于这些参议员是由拿破仑三世挑选出来的，虽然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们既不敢也从未用过这些权力。

这是一个强大的个人政权，也是一个有秩序的政权。众所周知，在这样一个政体下，应当是“好人安心，坏人害怕。”这个政体是建立在不朽的1789年的原则上的（至少本人这么认为）。我们无法忘却宪法开头的一段大胆的断言：“宪法承认，确认并保证了1789年宣告的那些伟大原则，它们是法国人民权利的基础。”未来的皇帝很喜欢说这么一句话：“我属于大革命。”这难道只是一个简单的托辞吗？ 694

使公众舆论就范

四个月的独裁建立了一些政治机构，与此同时，它也通过一系列的嫌疑法案，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政变之后，32个省进入了戒严，戒严一直持续到1852年3月27日。1851年12月8日的法令规定：任何人被发现或只要有参加某一“秘密”社团的嫌疑，那么就可以通过简单的行政手段把他流放到卡延。在这之后，所有的集会和社团都属于“秘密”之列。1852年2月3日的一则通报宣布，在各省建立“混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省长、将军和检察长组成，他们有立即处理的最终决定权。据官方记载，有26884人遭到当局的追捕，其中15033人被判刑，9530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239人被流放到卡延。在我们看来，这个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真实的情况。

在四个月中，实施这场大规模镇压的是一个集合了救国委员会和白色大恐怖时期特点的奇怪混合体。经过政变之后官方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解释”，今天要再来进行解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恐怖镇压的主要对象是革命力量。但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呢？12月的阴谋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我们不太清楚他们的真实意愿，尽管我们看到了一场规模庞大的镇压，他们通过镇压轻而易举地消灭了革命力量的威胁。事实上，舆论曾普遍认为，1852年时共和派已然看到了曙光。然而，他们却成了最早的受害者。

消除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障碍——议会——并非难事，议会右派由一些顽固的城堡伯爵组成，左派则由一些真正的共和派组成。他们中有一些遭到逮捕，有一些突然被流放，但这种现象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久。除了几个街区之外，巴黎并没有太多的抵抗。外省则有一些突

发的起义，尽管规模不大（主要在南方），但也让人感到恐惧。这些麻烦都是可以预料的，但它们的规模皆出乎人们的意料。政变的始作俑者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们完全可以依靠大众的麻木，从城市和农村的反议会情绪中得到好处。他们相信，自从 1848 年 12 月的选举以来，这场“乡下人的二月革命”即便没有得到外省农村的完全同情，得到的至少也不是冷漠，而是欢迎。这场“乡下人的二月革命”影响之巨大，我们可以从共和派的积极宣传中窥斑知豹。小农对大地产主的斗争难道不是从拿破仑一世的传奇以及人们对他的回忆中获得了原动力吗？这位皇帝巩固、扩大并使他们获得了永久的土地所有权。如果说，正如同一时期粉碎贵族的政治架构必不可少一样，粉碎共和派的政治架构同样必不可少。那么，人们是否能在反对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利己主义时，指望这种波拿巴派和共和派之间的长期友好呢？

白色恐怖

695　人们完全低估了共和派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影响力，没想到后者能够调动如此之多的人马，展开如此激烈的抵抗。诚然，这些反叛的规模必定是有限的，而且在各地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但是，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到，这种镇压显然首先是针对左派的；它的白色恐怖的一面压倒了有人希望赋予它的另一面，即类似于救国委员会采取的惩戒行动的一面。以下数据说明了这一点：在 26884 名被逮捕的人中，5423 人是耕作者，当然都属于耕作小户，1850 人是记者，剩下的都是或者几乎都是劳动人民：1107 人是鞋匠，888 人是细木工匠，733 人是泥瓦工，688 人是裁缝，457 人是铁匠……或许在不同地区会有细微的差别。并非所有的混合委员会都会表现出这样的残酷性，他们针对的目标也不尽相同。不是有人说在埃罗省掌权的正统派把几位地地道道的波拿巴主义者流放到了阿尔及利亚吗？人们也夸大了政变对工人组织所产生的影响，此前共和派的立法业已基本摧毁了工人组织，当局只是在里昂有组织地追捕工人组织的积极分子。但总的来说，在惩戒行动中受到残酷迫害的主要是共和派左翼、城市或农村的下层人民。“有教养阶层”中的显贵们虽然也遭到了迫害，但是其数量不知要少

多少，其程度不知要轻多少！被一下子剥夺了政治特权的他们，在由政变转向社会大清洗之后，不由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基佐公开承认说："我们没能照管好自由政府，但可以支持必不可少的政权；这一政权当今负有进行鞭笞和赎罪的使命，以及只有它能够完成的制止无政府状态的使命。"真正的正统派们欣喜若狂，例如，极端维护天主教的弗约宣称："那些掌权的人是充满善意的。他们虽然不是基督徒，但都是些好人。"

反动的天性

在所有人看来，从此之后，新政体已染上了一种如吉拉尔精辟地指出的"反动的天性"。新政体也许并不想让自己显得反动色彩过于浓重，但是，这种反动的天性却并不容易摆脱。无论是在当时的人们眼里还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它甚至从来没有能够完全地摆脱这种反动的天性。

但是，一切障碍最终得到了清除。"旧的派别的顽固分子"及其毫无结果的游戏，几乎均已不复存在。所有微弱的反对愿望，都在襁褓中遭到扼杀，至少从长远来看受到了遏制。为了让已经获得的优势不致出现任何丧失，它只采取了老套的措施，此前所有过的许多做法，均足以完善其统治手段。大学遭到清洗，尽管受到了损害，但也变得更为驯服。1852 年 3 月 25 日颁布的法令加强并增加了省长的权力。市长和镇长由行政权力机构选定，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在市镇议会成员之外选人担任市长和镇长。同一天颁布的一项法令，在丝毫未改变其实质的前提下，强化了在集会和结社权方面的现行法律，集会和结社活动在一定时期内将不复存在。2 月 17 日颁布的关于新闻出版的法令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它只是综合了此前的相关法律中种种限制性的条款。所有"涉及政治事务或社会经济事务"的报纸，必须先获得批准才能发行。而且，事先得支付一定的保证金：保证金的金额在人口超过 5 万人的城市为 2.5 万法郎，在巴黎地区的三个省以及罗讷河流域地区则为 5 万法郎。报刊一旦有违法行为就会受到当局的谴责，两年内若因为轻罪或违法行为受到两次谴责，将被完全取缔。

696 此外，如果刊物有三次严重的“过失”，将受到“警告”，凡受到两次警告就要停业整顿，而停业整顿超过三次则将被取缔。处于这样的监管之下，还会有何种配得上“反对派”之名的反对力量能找到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呢？

“行政选举”

然而，根据1月25日的法令，任命了50位国务会议成员，第二天又任命了84位元老院成员——其中12名为当然的成员（分别是红衣大主教、元帅、海军上将），其余72名则由亲王圈定。剩下来的就是选出立法团，相关选举是在1852年2月29日和3月1日在高压下进行的。

第二个执政府的创新之处是保留了普选制。2月2日，它甚至完完全全地恢复了普选制。凡年满21岁并拥有6个月以上的住处，均可以成为选民。由此，在1852年，法国的选民达到近1000万。议员的权责与其他一切公共职权不得兼任；因此，人们将不再能看到由那些集议会议员与行政官员于一身者组成的多数，在七月王朝时期，这类人日子过得极为惬意。像在1793年宪法所规定的“每个选区直接选举议员一人”那样，人们用单名投票制取代了名单投票制。

这确实是普遍选举。但我们切莫忘记这一点，即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实行全民表决的民主政体，但这种政体首先是某个人的化身。真正重要的只是全民投票，立法选举处于次要地位，它选出的是国家首脑的普通辅助者，后者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而且，议员只是国民选出来的在国家元首身边的人，并不就是国民的代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应当说，这些选举表明了一点，即至少它们肯定了在全民公决中获得成功者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这些选举类似于小范围内的公民表决，人们在那里通过单名投票制选出一名议员。七月王朝时期，人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当局利用官方候选人的程序——对此政府几乎从未进行过任何改革。对于官方候选人来说，他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便利与当局的支持，后者包括上至有权有势的省长，下至小小的乡村警察，中间还包括小学教师与本堂神甫。当局还利用各种手段，为其候选人

大作宣传。在1852年，候选人的名单只是简单地登在《通报》上。对于反对派来说，这样做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而对当局来说，他们在推出官方候选人时往往如此地不加掩饰、直截了当，丝毫不顾及颜面的问题：官方候选人是一种同其他制度一样的制度。内政部在1851年2月发给各个相关行政部门的急件中宣称，“人们应该有能力辨别哪些人是刚刚建立的政府的朋友，哪些人是它的敌人。”在1857年的选举中，人们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信条：“如同政府向议员们提出法案一样，它将给选民提供候选人的名单。”在这一问题上，多尔多涅省省长的下述言辞堪称提供了最好的注解：“政府希望其候选人获胜，就如同上帝希望善获胜，让每个人从恶中摆脱出来一样。”不久，反对派就不再出现于这种“行政”选举的名单之上。

1852年选举

由于实行了压制和推出了官方候选人，当局自然而然地在选举中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在261个议席中，反对派人士只占据了8席，他们分别是：2名独立派人士，3名不折不扣的正统派分子（系在西部省份当选），3名共和派人士（卡芬雅克和卡尔诺是巴黎选区选出的议员，而埃农则来自里昂选区。这三名共和派议员没有就职，因为他们拒绝宣誓“服从”新宪法。这样一来，就只剩下5名反对派议员，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谈论自己。不过，此次选举仍然没有此前的公民表决那么成功。反对派获得了近60万张的选票，完全少于公民表决时否决票的票数，但是，官方候选人却只获得了560万票，而在此前的公民表决中，赞成票高达750万票。投弃权票者增加了一倍多，其比例从17%提高到了37%。人们知道，公民表决的得票率同普通选举的得票率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此外，法国的选民尚处于其初步摸索的阶段：他们显然更喜欢那些简单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共和派影响较大的大城市，投弃权票者特别多：在巴黎，弃权票的比例竟然超过50%，在图卢兹……

697

然而，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这些“行政”选举滑稽可笑的一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会在此类选举中发现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这

就是早就存在一个波拿巴主义的团体，或曰波拿巴派（如果愿意的话也不妨称之为波拿巴派的阴谋）。公民表决是一回事，而且，仅凭波拿巴这个姓氏就足以赢得那些盲从的民众。但是，这只是最初的阶段；如果他们想要让这种状况长久持续下去，那么就有必要在舆论中，乃至在国民中间培植一个“党派”。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忽视了推出官方候选人的行动的意义。内政部的佩尔西尼对那些官方候选人予以大力支持，而且他并不缺乏政治嗅觉，但从方式上来说似乎过于粗暴。此前一度占据内政部长职位的更为狡猾的莫尔尼，所说的也是同样的事情。比佩尔西尼更有手腕的他，建议政府应该有系统地去寻找那些新人，认为不仅可以依靠这些新人完成赋予他们的不那么重要的立法任务，而且还可以依靠他们来巩固政体。他认为，当局应当尽可能地在传统的政治“阶级”之外来选择人才：“当一个人能通过劳动、工业或农业来致富，能改善工人们的境遇，正确地使用自己的财富，那么这个人就适合被称作政治家。”这一行动取得成功了吗？我们不太了解帝国的立法人员以及他们想要招收的新显贵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面对那群老练而难以取代的老显贵，这种方法很可能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在没有更好的人选的条件下，它只能拉拢他们并加以控制。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相信让佩尔西尼醒悟的一句话：“在下层人民中并没有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把立法团交给上层阶级。”然而，重要的是，人们还是充满了幻想，妄想结束传统精英的统治。

帝国

10 年的执政期对于波拿巴家族的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当然，对于舆论和亲信来说，他们开始建造的大厦只可能随着帝国皇冠的加冕而大功告成。然而，路易·拿破仑在人们只叫他亲王—总统时显得有些踌躇。这是出于一种谨慎，还是出于一种技巧？一贯作风果断的佩尔西尼开始抱怨路易·拿破仑过于畏畏缩缩。既然人们说他衰老了，那么路易·拿破仑自然得依靠他那些忙里忙外的亲信，而且首先就是依靠佩尔西尼本人。亲王打算在 1852 年 9 月赴外省进行一次“巡游”。

他想要借此广泛接触群众，为此，他还特意把地点选在了曾在1851年12月时最为敌视他的南部地区，这种做法不无威风。绝对忠心耿耿的佩尔西尼（也正因为过于绝对忠诚，以至于经常显得有些笨拙）为此斥责了下属。到处都是军队和捧场队的叫喊声，以显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口号是一种有技巧的递进，先是“总统万岁！”然后是“皇帝万岁！”最后是“拿破仑三世万岁！”这种做法显得如此的寡廉鲜耻，甚至连亲王本人都感到局促不安，于是粗暴地赶走了过于热情的部长。但从一开始就有组织的这种热情似乎具有感染力。带头的是圣艾蒂安的工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公民表决中投了反对票，并刚刚选举共和党人儒勒·法弗尔为市镇议会的议员；但在这里，他们却给皇帝候选人献上了最为热烈的掌声。巡游在各地都受到了称赞。如果说路易·拿破仑在布尔日尚未作出决定，在里昂时仍犹豫不决，那么，所谓的红色南部的热烈欢迎却让他获得了信心。10月9日，他终于在奥斯曼省长引人瞩目地调动起了民众的热情的波尔多作出了决定：他接受这一“法兰西似乎希望恢复的”帝国。为了让民众放心，他允诺说：“帝国就是和平。”他还允诺为人们带来秩序并宣称：“我将以宗教、道德和富裕来征服这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其具有信仰的国民中尚有为数不少的人才刚刚了解到基督的信条。”他还为人们展示努力的方向、描绘繁荣的蓝图道：“我们要大规模地开垦荒地，建造港口，铺设铁路……”

698

元老院1852年11月7日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是恢复帝制。其在12月12日通过的第二项决议则对国家元首的种种权力作了补充：“只有国家元首有权批准同外国缔结商业条约，并通过简单的法令决定建造各类公共工程。”法国人立刻在11月21日的公民表决中接受了这一结果：“赞成票”为782.4万张，即比1851年12月差不多增加了40万张；“反对票”为25.3万张，即比1851年12月差不多少了40万张。再次只有17%的人弃权，弃权者主要还是在城市，以及革命势力较为顽强的南部地区，不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还包括了西部的几个正统派占上风的省份。但是，这绝不是全民赞同，而只是权利的放弃。

皇帝

让我们稍后再来仔细观察法国刚刚将其奉为主宰的这位反复无常，仍然难以捉摸的人。他或许和他的许多亲信一样，是个腐败堕落之徒。但是，我们对广为流传的一些说法，诸如他遭受了金钱方面的损失或在私生活方面声名狼藉等等，须加以提防。并非一切都像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18 日》中所嘲笑的“克拉普林斯基式的英雄”那样……这是此人的一个方面，但并非唯一的方面。总统曾经显得难以理解，局促不安，目光呆滞，但这一切自 12 月 2 日事件以来均已成为过去。他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绝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种笨蛋。他能够建立一种真正的威望，并让人们乐于接受。人们可以寄希望于他——这多亏了其伯父的威名以及独一无二的功绩。他在其富于幻想的青年时代，利用被囚禁时的闲暇时光写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虽大多平淡无奇，但并非统统都不值得关注。他具有“拿破仑式的想法”，并以此作为 1839 年问世的一本小册子的题目。显然，这些想法实际上是对其伯父的种种想法的回顾，有时候也稍有自己的发挥。第一位皇帝巩固并延续了大革命，若没有他，这场大革命就“只能是一场给人们留下了诸多深刻记忆的大悲剧。”“他充当了两个彼此敌对的世纪的调解者，通过恢复旧制度的一切好的东西来消除旧制度，通过保留大革命的好处来扼杀革命精神。”“人们是多么怀念‘我属于大革命’的说法啊！”如同托克维尔再次发现的那样，拿破仑一世作为一种最后的同时也是最好的工具，将整个法国历史引向一种更为强大的政权，而且惟有这种政权才能让自由只能处在次要的地位。1853 年，拿破仑三世在立法团前有力地重申了这一点：“自由从未帮助建立持久的政治大厦，它只是在时间巩固了政治大厦时给后者加冕。”尽管确信程度有所降低，他还是从伯父那里接受了欧洲应当和平安宁的想法。在这一和平安宁的欧洲当中，彼此不和的民族将会重新聚集，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将会盛行。这也是他在建立伟大帝国时要追逐的目标，但是这个帝国却过早地崩溃了。

强烈主张在未来得让人们享有自由的他认为，国家还必须高度重

视社会问题，他在1844年问世的30来页的小册子《消灭贫穷》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今天，特权等级的统治结束了，国家只能由大众来统治。"因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通过开垦新的土地来解决就业不足问题，对900万公顷的土地的开发利用应该交付给集体的农业移民。通过合理的干预来终止工业发展的无政府状态；支持工人阶级的组织，让他们通过选出来的劳资委员会的代表有条不紊地代表其利益。凡此种种，让人感到困惑不解，除了表面现象之外，它与拿破仑的想法已有所不同。尤其要指出的是，革命，民族，经济干预，"通过大众来统治的"政府等观点，与建立"秩序"的纲领几乎格格不入。那么，究竟后来为何会使得这些观点被建立"秩序"的纲领所压倒，从此以后，新皇帝不得不首先依靠秩序党，甚至伙同秩序党一起来摧毁这些他曾力图运用的观点呢？看来只有将此归因于他在年轻时的一些想法过于天真了。 699

得力助手

在路易·波拿巴身边有一个团队——也许使用"团队"这个字眼并不十分恰当，因为起到凝聚作用的只是他们对路易·波拿巴本人罕有的忠诚。其中有些是始终如一的波拿巴主义者，比如前已提及的佩尔西尼，大多数人则属于新的波拿巴主义者，而且他们或多或少是从奥尔良派转变过来的，这一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变革中仍能有一定的延续性。比诺和马涅先后在财政部任职；以下三位著名的律师被证明是出色的技术专家：比奥在1854年接替佩尔西尼执掌内政部，巴罗什担任国务会议主席，鲁埃曾担任国务会议副主席，并从1855年起担任商务及公共工程部部长。阿希尔·福尔德则确保了政府和高级银行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我们不妨大胆地称其为"政体的技术专家"的圣西门主义学说的信奉者，他们虽上了年纪，但仍有力地为新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这些人分别是米歇尔·谢瓦利埃、伊萨克兄弟和爱弥尔·佩雷尔……最后，还有一些人属于路易·波拿巴家族的成员——其中有些是嫡亲，但多数系私生子：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儿子热罗姆·拿破仑，以具有共和派特征的冒失言行著称，当时是元老院

成员，也是王位的推定继承人；瓦勒夫斯基是教士的代言人；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莫尔尼是拿破仑三世同父异母的兄弟，不仅是一个靠不住的唯利是图者，还是一个喜欢寻欢作乐的人，一个“举止优雅的有钱人”，不过，他也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政变策划者，接着又成了立法团非同寻常的主席，他既能令人赞叹地预测政治局势，又能不时地提出高明的建议，尽管他的建议不一定都能得到采纳。这是一个奇怪的多元化的团队，而这一点也正是拿破仑所希望看到的。他只需对这一团队加以掌控足矣，在这一过程中，他无须拥有多数，只需要让每个大臣都有替换人选即可，因为这样就能够让他们互相倾轧，以避免某个人过于位高权重。

二、强硬的波拿巴主义的时代

人们通常把帝国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从拿破仑三世即位到 1860 年为“专制的帝国”时期，之后则为“自由的帝国”时期。这种历史分期只是一种从政治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而且即便从这一点来说，它也不具备说服力。普塔斯曾着重指出：尽管从 1860 年开始确实出现了几次改革，但若就此断言自由的帝国已经出现则仍有失偏颇；只是在 1867 年之后它才向这一目标靠近，并在 1869 年的宪法改革之后才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从另一方面来说，“专制”时期也远非铁板一块。在波拿巴主义的各种多变而模糊的形象中，至少固定住其中的两种形象以及区分出“专制的”时期的两个环节，对我们来说是颇有助益的。首先是“强硬的”波拿巴主义的时期，借助政变的力量往前推进的这一时期使已经具有的“反动的天性”的特点更加明显，这一以维持“秩序”为上的时期一直持续到 1857 年。在此之后，则是更具有创新意味的“拿破仑式的思想”时期，这一时期注定会遭到失败。

在路易·波拿巴还只是总统之际对皇帝所作的简要概括，足以用来界定“强硬的”波拿巴主义时期：“拿破仑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只是一项纲领。对内，它代表着权威、宗教和人民的幸福；对外，则代

表着民族的尊严。”这其实是波拿巴主义的第一副面孔，在秩序的两大传统支柱——政治镇压和宗教争论之间寻求平衡，此外，它还得到了繁荣和民族荣誉这两种麻醉剂的补充，后者同样不是一种新方法。

权威

权威首先并且完全属于个人。皇帝独自对国家进行统治和管理，在运用皇权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害和阻挠。无论这些大臣如何能干，他们也只是皇帝的“工具”而已。皇帝亲自确定会议议程，每周召开两次会议。对于大臣们来说，这是一次相互碰面、相互打探消息并向他们的主子报告的时刻。大家在一起讨论发言，但是，却没人能做决定，决定权归皇帝独有。拿破仑三世往往同一个能干的大臣讨论并决定某个重要的问题，等皇帝作出决定之后，其他的大臣才和民众一起得到消息。有时，皇帝甚至会粗暴地绕过相关的大臣。这种做法也特别适用于对外事务领域；无论是重大事件的决定还是重要的外交转折点，外交大臣有时竟然会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各部大臣之间显然不存在任何连带责任，因为他们的主人对他们可谓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至少在帝国的前期，掌权的团队还是引人瞩目的“清一色”，但也有一些官员被秘密辞退或调任。一般说来，重大的人事任命都是由皇帝本人决定的，其中的一些情况，对于当事者本人、公众有时甚至是历史学家来说都不得而知。

700

皇帝在外省

一直不过是皇帝的普通工具的法官们不得不宣誓效忠，那些外省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在他们当中职位最高的省长们，就好像是当地的皇帝一样。对于帝国时期，尤其是帝国建立之初这一在国家权力机器运行中作用重大的团体，人们还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它的权力在帝国建立后不久得到了加强，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帝国保留了大多数在奥尔良王朝立过战功，经受过考验的执行者吗？在总统制共和国的体制下同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一时期当中，那些既能干又可靠的人被安插在各个岗位上或受到拉拢。这些高效的公仆拥有全权，

但是，他们也知道如何在运用权力时把握分寸。省长们的首要任务是充当皇帝和下层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好好领会皇帝的意思，不要有其他想法，同时省长也是一道阻挡前朝权贵的屏障。1854 年，上加仑省的一名省长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他的行政职责：排除一切可能给党派或集团首领带来威望的可能，紧紧依靠不容许任何中间人的人民。除了行政等级制度外，任何寡头制、庇护制的企图都是邪恶的，眼前看来是强有力的东西很可能不久就会成为一种危险。尽管皇帝临时还会用到他们，他还是消除了旧势力的影响，使他们无法在他和“他的”人民之间插上一杠。之后，他运用各种手段赢得了民众的归附，并对此加以巩固，从而获得了他们对“皇帝”的归顺和尊重。很少有一个政体得到过如此之好的服务，这些杰出的执行者们懂得灵巧地运用一系列的方法。首先是在各地采用简单的强制性措施——不过这种做法并没有延续多久，继而是通过巧妙地对政体进行正面的宣传来获得不那么粗暴的征服，稳定最终得到了恢复，并因此带来了繁荣和荣耀。在教权主义盛行的地区，省长变成了教权主义者。在旧的显贵曾经统治，后来受到共和派强烈冲击的地区，省长会帮助后者来粉碎旧的显贵的势力。而在共和派势力过于强大的地区，省长会表现出更愿意与保皇势力联手。最突出的成就无疑是一些南方省份，如伊泽尔省和热尔省等省份的省长们，在 1851 年通过红色宣传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宣传号召小民百姓去反对那些强烈地仇视政变的权贵们；这些省长们能够巧妙地宣扬波拿巴主义中深得民心的方面，从而使得小民百姓对“人民的拿破仑”产生了持久的爱戴之情。

701　**党派的终结**

因此，昔日的显贵应当被削弱，党派活动不可能继续存在。共和派已经被除去首脑人物和打压下去；然而，它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依旧是镇压的主要对象。它成了省长们和法官们的主要关注目标，他们在报告里不断提到它，一开始这些是真实的，但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通行的做法，“秘密社团”和“民主和社会的根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这是事实吗？曾经发生过几起针对皇帝的刺杀事件，但并非每一起都

和共和派有关。有一些阴谋，如1855年的“玛丽安娜”事件，据说当时在整个卢瓦尔河流域，直至巴黎都有刺杀者的分支机构，不过，很可能是镇压机构自身夸大了事实。因为镇压本身就是一个事实。不分青红皂白的镇压自动地从针对共和派真正的成员或干部，扩展到了针对包括那些不太顺从的工人的整个城市人口，以及扩展到了针对力图在工人组织中存活下来的共和派残余势力身上。各个联盟在1853年时的数量还足够多，但到1855年时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帝国只能容忍那些互助性的工人社团，前提是它们不能支持停工，因为这样很容易演化成对罢工的支持。1854年6月22的法律强化了身份证制度，并将其推广至全体工人，因而使得劳动者变成了次等公民，他们只有在出具某种由雇主和警察签发的许可证时才能迁徙。共和派和工人运动一样，已只剩下一堆灰烬。

政治舞台的前台上还活跃着几个演员，但这似乎只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共和国的致命弱点。这几个演员被彼此分开，各行其是。当一些流亡者的抨击言论见于舆论时，并非对舆论没有影响，不过，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这些言论显得遥远而徒劳。存在着一些人们开始称其为“老家伙”的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人，这些人如同在1852年当选的共和派人士那样，拒绝同他们痛恨的政体妥协。但是，在他们的身边，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考虑部分地进入体制内部，以便更好地进行斗争。这是一场表面的游戏吗？历史很快就会作出评判。然而，这些灰烬盖住了炭火，因而人们无法很好地看清里面的火焰。共和派受迫害的想法被秘藏在了他们的心里，这种观念一直存在着，直到帝国的末年，它那可怕的力量才重新得到了恢复。

权贵的终结

那些“社会的高层”、“足智多谋的阶级”又是怎么样呢？经历了最初的精神紧张之后，他们的反应可谓多种多样，真正的正统派毫不掩饰他们对厌恶的共和国倒台的喜悦之情，后者曾赶走了篡位者奥尔良公爵。为什么不等待保护者的再次复辟呢？创建了帝国的全民公决已经让他们深感苦恼；在保王党势力强大的地区，弃权者也不在少数。

亨利五世已经要求人们以轻蔑的态度不去理会这一第三次出现的篡权行为。此后，很多人没有太多的怨言便走上了这条内心流亡之路，亦即身在国内，但心已在国外。七月王朝时期，他们已经长期处于这种流亡状态。但并非所有人都会保持盲目忠诚，因为这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正统派的一些具有见识者，如法卢、贝里埃之类的人物，对此还是采取了保留态度。此外，教会因受到了波拿巴派的一时许诺的诱惑，没法给正统派提供传统的支持。然而，总的来说，正统派坚持了自己的原则；除了极其罕见的归顺之外，正统派以缺席或奉行一种"撒手不管"的政策来表明自己。但是，它没有因此就显现出公开的敌意，它所采取的毋宁说只是一种不怀好意的中立。

自由派和奥尔良派的坚定性显得要弱一些。他们的首领自从社会平静重新得到恢复以来一直心境平静，但现在又开始关注起政治来了，更确切地说，他们再次痛苦地觉察到，他们已不可能推行任何政策。于是，他们通过某种傲慢无礼的抨击来逃避现实。他们对当局展开猛烈抨击的地点既有各种各样的沙龙，也有法兰西研究院和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堪称是属于他们的"领地"，基佐、梯也尔、米涅和托克维尔之类的人物们一有时间就来到这一防卫得很好的"领地"碰头。他们傲慢地发表着种种议论，其中不乏入木三分的高谈阔论。难道人们用农民来进行统治吗？基佐很有学问地断言道："路易·拿破仑的权力基础从本质上说是革命的，民主的，激进的。"这仿佛是知识界举行的一次罢工，这个阶层深信，任何政权都不可能长期不需要这一"天然的统治者"阶级的合作。显而易见，这个政权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漂亮的政治话语来说，到底有多少衷心的或口头上的归顺者？多少满腹牢骚或志得意满的将就者？多少是受到诱惑者？

702

自由派曾以为立法团这个唯一通过选举产生的统治机构能够成为某种自由精神的庇护所。托克维尔写道："这个由有产者组成的团体，要么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解散，要么摆脱宪法给与它的屈辱地位。"它什么也没做；顺从已经成为了官员们遵循的规则。不过，它并非是消极被动，完全没有意义的。结果就是政府提出的一些法案相继遭到了

否决，有一位历史学家所进行的细致统计表明，首届立法团提出了1924个修正案，其中842个被接受。并非所有的人都服服帖帖；那些制订预算的官员们低声地埋怨过多地给政府拨款购买各种设备。就真正的高端政策来说，唯一能够偶尔进行自我表达的伟大发言者是蒙塔朗贝尔，他也确实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他是官方的候选人。“取消一切控制，削弱法国政府中唯一现存的选举团，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857年，当他因为自己无意之中所说的唐突之辞而丢掉了议席之后，他痛苦地下结论道：“一群卖身投靠的肮脏牲畜。没有人知道六年来我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窖中同这帮卑躬屈膝者作斗争时遭受的痛苦”。

宗教

1848年的事件已经表明，自从实行普选制以来，教会经受了多大的政治压力。这位通过全民公决产生的皇帝绝对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人们也想起那令人吃惊的波尔多诺言：以“宗教和道德来征服”这一“刚刚知道基督的告诫”的人民；这样的承诺对皇帝来说确实让人吃惊，因为虽然他自称是天主教徒，但用拉戈尔斯的话来说，他至少是一个“在德行方面有许多瑕疵”的天主教徒。不过，这位“好的魔鬼”深知，强大的教会的支持还应以广大的人民为依托，而且他知道如何在这方面付出代价。它比之前的共和国付出了更多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1852年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预算达到了4000万，1861年则接近5000万。实物形式的支出尤其可观。教会组织受益非浅：1851年法国有4000名修会会士，到1861年已经增加到了近18000名修会会士。天主教的报刊享有某种特别的宽容，甚至当它也卷入政治时，例如像轰动一时的弗约的《宇宙报》案那样，亦同样如此。法国与罗马教廷建立了更为诚挚的关系，后者显然对政变的成功感到欢欣鼓舞。对教会神职进行了任命，在新选主教当中，至少有一半是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拥护法国教会自主者勉强保留了一些位置，政府不准人们谈论拿破仑和教皇签订的教务协定。

这是一个为教会祝福的时代，于是，教会果断地把影响力扩展到

了教育部门。人们发现了《法卢法》的可怕后果，这项法律是根据一种妥协精神而非自由精神来制订的，但却“注定是以弗约的精神来实施”。教会同时脚踏两只船。它利用所获得的自由积极创建自己的学校来与公立学校竞争，在教育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女子教育方面，教会所办的学校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深深地渗透到了国立教育之中。已经被清除共和派人士和自由派思想家的教师队伍，直接受到了“穿黑袍者”，亦即教会人士的监控。主教们在学术委员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大学校长和公立男子高中校长都是神职人员。教育大厦的根基——小学教师必须经过宗教当局的同意才能由省长任命，在其任教期间，小学教师时刻受到本堂神甫们的监督，后者显得好像是前者直接的助理人员：他首要的职责不正是“给孩子们提供宗教方面的教育，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刻下对上帝的崇敬之情”吗？这还不够，教会学校并未满足于同公立学校进行竞争，它还希望能够取而代之，得到人们的认可，并取得如同公立学校那样的优先权。政府曾一度让教会为所欲为，并深信这样做符合自己的利益。

703

代价如此之大的这种行动会有利可图吗？回答是肯定的，或许形势因地区不同会有所差异。例如，在阿基坦地区，教士多次对教会的归附，以及断绝同正统主义的传统联系表示不满。有好几个主教未能被说服，如应该在1856年“解职”的吕松主教大人，还有在1857年因滥用职权在国务委员会受到审讯的穆兰斯主教大人（此人系德勒－布雷泽人，并过于严格地信奉正统主义）。实际上，当某时某地出现困难时，教士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保留态度而非敌意，选择的是弃权而不是战斗。当主教们态度犹疑时，帝国就到下层教士那里去寻求支持，而后者真正的主教——几乎可以说是教皇——则是弗约，此人已经完全皈依反对赤色革命的波拿巴主义。于是，对于教士和帝国的支持者来说，他们之间的联盟对双方来说均富有成果；在诺曼底、佛兰德尔和庇卡底，强大的教会成为行政当局的支持者；在罗讷河谷、普罗旺斯、朗格多克，行政当局则支持根基不甚稳固的教会，同时它也得到后者的支持。帝国最大的胜利或许就是获得布列塔尼的归顺，那里的教士完全了控制了农

村的大众，他们害怕受到共和派控制的城市的影响，于是抛弃了正统派的阵营，投奔到帝国的麾下。为了嘉奖这一胜利，皇帝于1858年在奥雷圣母像脚下举行了一次奢华的朝圣仪式。

人民的福祉

“拿破仑式的理念将让农业得以复苏。法国会制造出很多新产品；它从国外引进了很多可为自己所用的革新技术。她削平高山，翻越大川，使各地的联系更为便捷，让人们变得更为友好。”这就是年轻的路易·波拿巴想让人们接受的重大纲领！人们将可以说，他已显示出能够让这一切成为现实。那么，这一切的实现是因为政体的推动使然，抑或仅仅是一种幸运局势提供的巨大恩惠所致，还是为了营造一种反映帝国创建初期繁荣昌盛的气象。法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物价也随之飚升，这种产品和利润的同步增长让广大法国民众都享受到了实惠。

首先，经过了19世纪中期的长期萧条之后，工业重新开始快速增长。几项数据足以表明这一切：从1851年到1856年，铸铁的年产量从44.6万吨增加到了92.3万吨，钢铁产量则从25.4万吨增加到了73.1万吨；1851年法国的铁路总长为3546公里，到1858年增加到了8675公里；在奥斯曼的努力下，巴黎和其他许多大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大量的建筑得以修建，于是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土木兴，万物兴。”经济史学家们今天希望能够更精确地了解当时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于是他们创立了工业生产指数。这些工业生产指数表明，从19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初显危机的1857年，经济增长率非常之高，年增长率达到4%，如果我们把建筑考虑在内的话，甚至高达5%或6%。这一切表明，承包商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往往也是他们最主要的利润），而劳动者则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704

确实，与之相对应的整个农业生产指数并没有显示出类似的乐观局面，至多也只是停滞不前罢了。这是1853年和1855年两度出现的谷物歉收造成的结果。它同时也是葡萄种植业因为孢子粉而受灾严重的结果：从1851年以来（该年度的葡萄酒产量为45亿升），葡萄酒这一特别受欢迎的产品产量急剧减少，至1854年和1855年降低到灾难

性的低点（11 亿升和 15 亿升）。法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必须得承认，这个为当时的人们和历史学家们所称颂的帝国的繁荣，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繁荣，甚至不是属于大多数人的繁荣，这难道只是一种虚假的、表面性的幻象吗？

为了更为清晰地进行对比，我们应当不仅考虑生产总量，同时还要考虑价格水平。我们都知道——这也是一种常识——农业歉收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以与这一时期间隔时间不长的 1847 年的灾难为例：物价飞涨，市场萎缩，贫富差距悬殊，民怨沸腾。诚然，1853 年和 1855 年的农业歉收在规模上可以同 1847 年的灾难相提并论，而且无论是产量的下降幅度还是所由产生的物价飞涨程度均是如此。然而，如我们试图指出的那样，情况正好相反，经济事件竟然并没有产生同样可怕的结果。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因此 1851 年的革命意义不可低估），在这个时期，经济机制已不再完全像过去那样运作。在对阿基坦、阿尔卑斯和卢瓦－歇尔等地进行极为细致的实地调查之后，人们便能确信这一点，因为这些调查使得人们可以深入考察一些重大变迁。首先，1853 年和 1855 年这两个歉收年份发生在总体情况良好的 5 年期之中，从这段时期整体上来看，收成和价格都很令人满意，农民在收成好的年份已积累起了抵御灾荒的能力。不过尤为重要的是，对于普通农民、也许还有一些小农（这其中自然不包括小葡萄农）来说，产量下降导致的价格升高有时能够大大补偿因这种产量下降导致的销售额的损失，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谓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以前，利益似乎像特权那样，为“大经营者”和土地食利者所独有，但在现在，利益似乎民主化了。与此同时，帝国也表现出民主化的迹象。从今往后，让生产者感到恐惧的与其说是收成欠佳，还不如说是价格的疲软。此外，今天我们已知道，整个农业世界在 1847—1851 年处于灾难之中，这与其说是农业歉收，还不如说是随之产生的农产品价格的长期疲软造成的。对于农民来说，高价就是“好”价钱，极为巧合的是，帝国带来了这一切！这也正是帝国得以巩固的主要原因。

其次，农业危机不再自动地与商业及工业危机同时发生，这一点

也许能够说明一切。人们注意到，从1853年下半年到1854年初，工业活动有所减速，但为期甚短，而且这样的情况在1855年和1856年再也没有发生。1857年到来的危机纯属另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新的机制，它让人预感到某种深层的结构变革，旧的危机模式已经作古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应考虑到巨大的工薪阶层的命运。物价水平在1851年至1856年间飞涨，这使许多人获利，但却对消费者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事实表明也证明了这一点。人们观察到物价水平最高的1853年和1855年，也是罢工次数最为频繁的年份。然而，这里还产生了一个新现象，人们的工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从1853年开始，城市工资增长了近10%，农村的工资水平或许增长得更多一些。工资的增长速度确实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但是，它毕竟还是使人们的痛苦有所减轻。经济的繁荣——皇帝许诺的幸福——终于在帝国初年得以实现。它甚至让所有人都享受到了。然而，这种分享并不是均等的。工薪阶层和无产阶级始终感到自己受到了损害。

705

商业政府？

帝国在其初期受益于一次非同寻常的经济发展良机。那么，它只是满足于接受这样的时机吗？绝对不是！随着新班子的建立，新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新班子宣称，政府将“成为整个社会机制有益的主使者”。我们很清楚，它并不会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干预主义行事。不过，波拿巴主义国家试图成为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辅助者，而且，拜时机所赐，国家起初在这方面还是成功的。人们知道，宪法赋予皇帝的经济权力作用重大。在此我们只提一下成就的主要方面：在新精神的指导下，资助投向了经济发展的两大推进器：交通和信贷。

国家倾尽全力支持铁路事业的发展，因为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危机，铁路建设曾一度停顿，铁路部门成为新工业发展的龙头部门。政府增加了铁路部门的津贴，为铁路公司提供高额的利息担保，并推动铁路公司的合并，而原先国家为了避免铁路公司相互妨害、彼此相争而允许众多公司的存在。及至1857年，法国只剩下6家铁路公司。

在很大程度上，加速完成的 9000 公里的铁路干线应该归功于国家，这些线路在 1858 年组成了不久被人们称为老铁路网的第一个铁路网。国家的支持在 1859 年 6 月达到了顶点，是时，国家与铁路公司之间签订了《弗朗克维尔协议》。公司负责建设一个新的铁路网，扩展旧的铁路网并在沿线增设车站；作为交换，国家则斥巨资提供各种便利和担保。

新经济的精神还体现在信贷方面。原有的信贷框架显然已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触发和延长了 1847 年的经济危机。1852 年 2 月 28 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批准在巴黎设立一家不动产银行，接着很快又在马赛和内韦尔增设了另外两家类似的银行。这三家银行最后合并成一家信贷银行，提供长期贷款和抵押业务。这样的新业务对于农村的负债人来说很有帮助，或许这就是银行创立的首要目的。银行特别为城市的有产者服务，在复兴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皇帝统治时期的伟大创举”中，应该包括在 1852 年 11 月 18 日设立动产银行。该银行的创立者是佩雷尔兄弟，我们知道他们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与新政权毫不迟疑地加以反对的畏首畏尾的旧式银行不同，这类银行开始了一桩冒险事业。这项事业规模惊人，新银行不仅提供一般性服务，它还打算成为拥有广泛业务的两合公司，其规模远远大于属于上一代人的拉菲特能够设想的程度，达到了从前约翰·劳曾设定的规模，后者被佩雷尔兄弟视为自己的先驱。这家新银行将通过发行债券来吸收人们手中不能增值的积蓄，债券发行总额将达到 6 亿。它将汲取大众最菲薄的家底，通过“资本的普选权”将信用和利润民主化。这些原本呆滞的资金将哺育不断萌生的新企业。为什么发行的债券不能当货币使用呢？何况货币需求量一直在增长。在此，我们可以发现给这个“皇帝统治时期的伟大创举”设定的界限。尽管人们慷慨地给了佩雷尔兄弟种种好处，但他们的抱负很快就显得有失过分。有一些旧式的银行，亦即旧的垄断势力需要照顾，法兰西银行掌握并垄断着纸币的发行权。佩雷尔兄弟没有大规模地发行短期债券的权利，而这一点对于他们的银行

706

体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帝国初年时他们依然要求进行分红。1855年，每500法郎一份的债券竟然得到了17850法郎的分红。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很多大铁路公司中，既包括法国公司也包括外国公司，他们对各类私人和公共项目进行投标，参与了巴黎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大工程。凡此种种，他们凭借的都是自己的资本，这对其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制约。他们的冒险事业同样也是一种新精神的表征，是第二帝国想要赋予商业活动的新型推动力的表现。

外交领域，民族的尊严

帝国已在波尔多庄严地宣称："帝国就是和平。"但是，如果波拿巴主义不能给它的臣民提供一点外部的荣耀的话，那就太过平庸了。"从他的身世来看，拿破仑三世就应该让法国重放光芒。"一切对内实行专制统治的政体难道不都在寻求某种独具一格的对外政策吗？

这并不仅仅是对其伯父的行为的模仿。我们知道，正为欧洲的和平而忙碌的皇帝，实际上是在为民族问题而担忧。欧洲的一切革新之路都必然要经历废除1815年耻辱的不平等条约这一关。那么，该如何来废除呢？首先要同信奉自由主义的英国结成联盟。在众多的对手中，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俄国，在他看来，俄国是在维也纳会议上一劳永逸地建成的欧洲秩序的基石。一直难于解决的"东方问题"，恰好为突破起先小心翼翼地掩盖，继而公开化的敌对状态提供了契机。对于沙皇尼古拉来说，土耳其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夫。"俄国主动地加入到了早有图谋的对土耳其的丰富战利品的掠夺之中。这并没有让伦敦方面感觉不安，英国关注的是地中海的安全问题。法国对此也同样关注。法国难道不已是"圣地"的天主教保护者吗？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地盘之中的"圣地"，难道不是存在于信奉东正教者与罗马天主教之间，以及受俄国保护者和受法国保护者之间的一个老的争论主题吗？1850年，这一昔日的争端再度被挑起，1853年年初，双方勉强达成妥协。俄国要求对波尔特的天主教臣民享有完全的保护权。为了让事态更加明朗化，它在7月间经由多瑙河大公国侵入奥斯曼帝国，并在11月在锡诺普击沉了奥斯曼帝国古老的木船舰队。法国没费多大周

折就让英国进行了干预。1854年3月27日，一场对拿破仑三世来说非常及时的战争爆发了。1815年的联盟已被打破：英国站到了俄国的对立面，而此时奥地利犹豫不决，普鲁士则宣布中立。就国内而言，法国政府轻易地就获得了国人的支持，由真正的基督教民族对鼓吹教会分立的基督教民族进行一场十字军征讨，这让天主教的右派深感满意，不过，自由派，甚至是共和派，却并不接受这次远征，而是主张以大革命的原则来反对斯拉夫的野蛮行径。对军队而言，这如同是一次复仇；沙皇本人也把这一问题提到了这个层面："俄国将在1854年重演1812年的那一幕。"

确实，从军事上讲，这次军事行动并不理想。英国军队已经老化；法国军队尽管经过了很好的休整，但如果不把内战或殖民地的战斗考虑在内的话，也已经很久没有参加真正的战斗了，因而指挥不当，缺乏战略，补给不足。根据皇帝的提议，法军选择了在黑海与俄军开战，9月14日，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登陆，直指塞巴斯托波尔的军火库。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人们在塞巴斯托波尔要塞前毫无进展。尽管也出现过英军和法军的英勇行为——前者表现为英国轻骑兵一度冲击要塞，后者体现在阿尔玛之战以及麦克马洪率军夺取和守住马拉霍夫高地，但是，法军因为感染了伤寒和霍乱而大批死亡。塞巴斯托波尔最终还是未能攻克。1855年9月8日，俄军从要塞撤离并把它付之一炬。不管如何，如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这场战争只"打瞎了俄罗斯熊的一只眼睛。"舆论的厌战情绪，军队所经受的严峻考验，奥地利的积极调停，最终导致了和平。

707

这场战争对于帝国来说是一场最好的胜利。法国不仅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当然，英国也同样如此），而且，1856年2月25日，正是在法国人瓦勒夫斯基主持下，在巴黎召开了由欧洲的一流强国参加的和会，此次和会不仅讨论了3月30日签署的一项条约的条款，还讨论了与欧洲秩序相关的一些重大问题。皇帝或许并不能一直让自己的目的得逞：例如，他提出的合并多瑙河诸公国的建议就遭到了拒绝。但是，在维也纳会议后50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是一种莫大的复

仇之举！“法国在没有损害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重新在全世界的面前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而拿破仑三世的明确干预，使得在众多被提出的问题中冒出了个皮埃蒙特提出的问题。这个很小的国家曾派遣部队与英法一起参战，此时，它在大会上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意大利必须统一这一可怕的难题。于是，便出现了意大利问题。波拿巴主义的强烈影响还远没有过去。

三、拿破仑式观念的时代

19世纪50年代末，帝国出人意料地突然改变了它的风格，其结果表现为一系列的战绩，以及没什么人再低声埋怨政变。1859年，它帮助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反对奥地利；1860年，它与英国开始自由贸易；不久，它又开始向工人阶级伸出了援助之手。最后，则是开始为政治自由化作准备。蒲鲁东为此指出，“帝国开始向左倾斜。”这是第二种波拿巴主义的第二张面孔，人们差不多可以从中了解到“拿破仑式的想法”的本质。我们并不认为这种波拿巴主义就比第一种波拿巴主义更为“真实”。它对波拿巴主义作了补充，揭示了这一政体，这一首先是专制的制度的其他维度，让人知道不能完全将它归结于专制；至少它希望人们不要把它仅仅归结于专制。

重大的转折点

帝国为什么会向左转呢？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看法，即便并非完全是，那也主要是因为皇帝个人想这么做。这位主宰突然决定采取新的方针（事实上，这几乎违背他所有近臣的意愿）。在个人专权的体制下，这种解释是说得过去的。此外，一切都表明，对于“拿破仑式的”思想，拿破仑三世是真诚地信守的，这些思想绝非仅仅是一个实行高压政策的政体用来装饰自己的蛊惑性的工具；当皇帝认为时机成熟时，他会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不过，人们感觉到，这一说法还不足以解释这位皇帝主动改变做法的理由，还应当去寻找其他的理由，至少是要对他采取这一做法的时机与方式作出说明。

是否是帝国内部的困难迫使帝国去寻找新的办法来恢复它的活力呢？人们几乎看不出这一点。1857 年的选举见证了帝国的稳定，550 万选民将选票投给了官方候选人，66.5 万人投了反对票；在 267 名当选议员中，只有 12 名属于反对派，这同 1852 年的选举结果相近。确实，提案可能会被推翻，这次选举的情况并不比 1852 年好。在历经 5 年的执政之后，帝国并没有赢得新的选民，弃权者的数量依旧保持在 300 万，共和派也压根没有减少。在中部和东部，共和派依旧是不容忽视的少数，他们在那些难管束的大城市中的力量也很强大：在巴黎的 10 个议席中，共和派占有 5 席，在里昂和波尔多则各占有 1 席。但总的说来，他们并不具有危险性，更何况反对派力量比 1852 年时更为分散了。在这些人中，拒绝在宪法前宣誓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则愿意在宪法前宣誓。在一些议员辞职以及重新选举之后，在立法团中只剩下 5 名真正的共和派，他们分别是：达里蒙，法弗尔，埃农，奥利维埃，皮卡尔。他们有时会发出某种不同的声音，但既然他们已对宪法宣过誓，那么他们多少会有所妥协。让人感到恼火的仅仅是这一“老派别”的这种畏畏缩缩的坚持。

708

奥尔西尼炸弹事件

人们传统上将奥尔西尼炸弹事件作为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统一事业态度转变的原因，这一事业当时刚刚步入新的道路。1858 年 1 月 14 日，几位意大利的密谋分子在原先的马志尼派人士菲利切·奥尔西尼的领导下，在皇帝一行前往歌剧院的路上投放了三枚炸弹，皇帝本人安然无恙，却造成了 8 人死亡，150 人受伤。行刺者对拿破仑三世进行了谴责，说他还是路易·波拿巴的时候，曾经参与捍卫意大利民族的利益，而在其成为法国人的皇帝之后，却抛弃了他曾属于的那个派别。故事于是变得令人感动。被判处死刑的奥尔西尼给拿破仑三世写了一封绝笔信（此信由警察局局长皮埃特里得到或强行获得），他在信中恳求皇帝能够为实现意大利的独立而努力。这一遗言被刊载在《通报》上，有人说道，为此而感动的皇帝听从了这位死囚的遗愿，最终决定对意大利进行干涉。

不言而喻，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长久以来，皇帝一直想为意大利做些什么。意大利是他用来打破 1815 年形成的欧洲格局的计划中的一颗重要棋子。奥尔西尼事件至多只是给公众留下了戏剧性的印象，并为皇帝宣布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作好了铺垫。

当时帝国刚开始向左转变，但是，奥尔西尼炸弹事件立即就让帝国变得更为强硬。帝国的高层人士，也许包括皇帝本人，似乎对这种弑杀暴君的行为感到了恐慌。皇帝会突然离世吗？他的儿子还不满两岁，帝国没有为摄政作好任何准备。人们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一个“后波拿巴体制”，帝国的稳固完全建立在皇帝和他的姓氏之上，而这一切很可能会灰飞烟灭。于是，他们遂通过镇压来逃避这一现实，他们假装相信存在一个针对国家的巨大阴谋，而这个阴谋自然是由革命分子所策划。“社会机体已经被害虫所侵蚀，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加以清除。”这是新任内政大臣埃斯皮纳斯将军的纲领，此人在 1851 年曾经受了种种考验，并通过下达和执行 2000 项左右的逮捕令来再次经受新的种种考验。1858 年 2 月 27 日，国家颁布了一项新的普遍安全法，允许新建立的混合委员会在各省追捕嫌疑犯和一切政治犯，尤其是 1848—1852 年间的政治犯，400 人被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帝国又重新退回到了 6 年之前。

在保皇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共和派

不合常情的是，也许应当在此寻求皇帝态度发生巨大转变的确切原因。不断的惩罚和镇压既不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能称之为一种政策。公众并不喜欢普遍安全法，也根本不相信高层所揭露的这种巨大的阴谋。镇压活动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埃斯皮纳斯将军于 1858 年 6 月 11 日被解职。不管怎样，共和派已经没有太多的令人害怕之处。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帝国进入了真正的困难期，现实的困难让帝国政体深受其害。帝国似乎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但其实却并不那么稳固。它一直保持着“反革命的天性”。皇帝喜欢处在党派之外或凌驾于党派之上；但他仍然是被他从政权中清除的右派的俘虏。帝国成功地施行了秩序党所希望但却没能实现的社会镇压。 709

帝国自称是大革命及其原则（忠实或慷慨）的继承人，自称无论如何是一个进步和在“变动”的政体，但它却不断地在帝国内部让“抵抗派”占了便宜。它依仗教士，获得显贵的赞同；它看上去只是一种代表既得利益和现存秩序，但稍微有点特殊的政体。在 6 年的时间里，波拿巴主义仅仅显示出负面的特征。对拿破仑三世来说，是到了通过摆脱这些讨厌的右派来恢复其正面的特性的时候了。奥尔西尼刺杀事件或许是某个新进程的开始。我们看到，这只是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

意大利计划

正是通过意大利问题引出了新的进程。拿破仑三世装作是欧洲各民族的捍卫者，我们必须充分看到这种姿态背后的含义。在 19 世纪，民族问题，在对人们的情感以及政治的影响力上几乎可与 20 世纪的非殖民化等量齐观。欧洲所有的左派都热情地捍卫这一事业，右派则对之横加阻挠。意大利计划是法国皇帝的断然行动。且不论这一冒险行动存在的巨大危险，单单提出意大利问题，就必然会导致与奥地利这一亚平宁半岛北部霸主的战争。法国的这一举动将既不会有任何盟友又得不到任何支持。俄国禁止任何人染指它的保护国那不勒斯王国；普鲁士也尚未同奥地利完全脱离关系。英国即便不反对意大利的民族主义事业，也会担心此举将打破欧洲的平衡，遂对法国在意大利民族主义解放运动中的监护人的位置冷眼旁观。而且，此举又引起了可怕的罗马教会问题，不可避免地让法国的天主教舆论反对皇帝，而此前，它们一直是帝国最忠诚的支持者，但是一旦触及圣父的权利，它们就会变得桀骜不逊。

皇帝首先还是在暗中行事，这是他一贯的做法。1858 年 7 月 21 日，他在普隆比埃尔秘密地接见了皮埃蒙特的首相加富尔。没有一位大臣知道此事，尤其是不能让亲天主教的外交大臣瓦勒夫斯基知道。两位对话者在一起重新勾划了新意大利的版图。皮埃蒙特通过牺牲奥地利和教皇的领地来扩展自己的版图，形成了一个上意大利王国，其几乎等同于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意大利王国。托斯卡纳获得了教皇国的部分地盘，将形成一个中意大利王国，至于这一王国的王位，拿

破仑三世则看好他的侄子热罗姆，此人是拿破仑三世身边的人当中屈指可数的支持意大利事业的人之一，而且在法国遭到人们的唾弃。那不勒斯王国会继续维持下去，依然由波旁家族占据其王位，除非缪拉的某个后人有机会——怎会没有机会呢？——当上国王。侄子继续坚定不移地模仿伯父。领地大大缩小的教皇只统治罗马城及罗马平原，并获得由三个王国组成的邦联总统的称号。为了实现这一美好的梦想，皇帝许诺出兵20万来对抗奥地利；作为对此举的回报，他将获得萨伏依和尼斯。

不幸的遭遇

这只是设想，尚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实现。大臣们在1858年底才得到通知，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反对态度：这是一场仓促的冒险行动。因而，在普隆比埃尔预先作出的部署得到确认的法皮条约，直到1859年1月才得以签订，而且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为了对舆论加以试探，皇帝通过他授意的政论家来散布有必要对意大利进行改革的观点。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实业界人士，都对此颇有微辞：商业利润下降。一次，罗斯柴希尔德男爵以人所尽知的强调语气对此作了一个漂亮的总结："帝国就是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帝国。"列强都感到不安，俄国建议召开新的欧洲会议。此时，我们又在拿破仑三世那里看到了在他身上多次出现的致命弱点——在作决定时优柔寡断。面对各种困难，他开始犹豫，甚至几乎都要放弃了。被激怒的奥地利理所当然地决定断绝同发起挑衅的小国皮埃蒙特的关系，因而在1859年4月29日引发了意大利战争。 710

意大利战争并不比克里米亚战争打得精彩。既然这场战争事关皇帝理想的实现，他当然要亲自指挥了。当他从里昂火车站[1]登上开往意大利的火车时，至少得到了圣安托万郊区支持共和派的民众真诚的欢呼。他最终还是获得了"底层朋友们"的热爱和信任吗？有时人们谈起皇帝的时候，并不认为他是一个那么糟糕的军事领袖。但这次军

① 此为设在巴黎市区的一个大站。

队的备战还是不够充分，因而也未能免除克里米亚半岛的厄运。幸运的是，对手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然而，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6月4日的马让塔战役几乎是一场灾难，6月24日的索尔费里诺战役则是一场屠杀。战争的不幸是否让拿破仑三世变得更为谨慎了呢？不管怎样，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冒险行动已经走得太远还不算太晚。在法国，天主教徒们公开表示不满。意大利则刮起了一股令人不安的革命之风，这股风让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在普隆比埃尔商定的范围。列强让拿破仑三世意识到他们希望他到此为止。皇帝没有同皮埃蒙特的盟友商量，就在7月12日同奥地利签订了停战协定，11月11日签订的《苏黎世和约》也几乎没有包括在普隆比埃尔作出的诸多承诺，皮埃蒙特仅仅获得了奥地利的伦巴第地区。

这是一桩亏本的买卖，它给各方带来的只是失望。法国的对手们可以为法国的削弱而感到高兴。拿破仑三世过早地妥协了。意大利人不愿原谅他的背信弃义，独自取得了自己的统一。一个意大利王国（不再是三个）在从那不勒斯到都灵的地盘上建立了起来，该王国还缺少威尼斯，因为它仍旧还属于奥地利。教皇依旧拥有罗马，只是被革命者剥夺了对意大利王国其他地区的统治权。这一切都没有皇帝的参与，对他来说，得到的只是失望和沮丧。天主教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再一次达成了和解，他们毫无保留地对皇帝糟糕的政策予以指责，指责皇帝导致了教皇对意大利统治权的丧失，那些最大胆的人甚至把拿破仑三世称作彼拉多①。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也并非毫无补偿。左派的形势变得更为有利了，但它抱怨说，当人们在法国剥夺了他们的自由之际，却前去为意大利的自由战斗，这岂非咄咄怪事。简而言之，损失是惨重的。然而，并非完全都是损失，因为在1860年，意大利不情愿地根据约定把尼斯和萨伏依割让给了法国。

商业政变

对于享有等级特权者以及既得利益者来说，皇帝还试图给他们另

① 彼拉多（Pilate，？—36？），罗马犹太巡抚（公元26—36年），主持对耶稣的审判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外一个不好的意外：放开对外贸易。这是另一个拿破仑式的想法：但它并非受到了其或许是重商主义者的伯父的影响。路易·波拿巴是在英国流放期间了解到“自由贸易”的好处的，这个词只有在近期才传到法国。新近才接受圣西门主义的公共工程和商务部大臣鲁埃积极地推进圣西门主义在法国的实现。法国经济过早地依赖于胆怯的保护主义带来的优越但脆弱的环境。谷物种植业主在闸门价的保护下过得很惬意，因为这种价格机制保障他们的产品不会降价，但一旦边境上筑起关税壁垒，抵制进口并保证他们独占国内市场，谷物生产业就可能不思进取。通过一整套进口禁令或几乎是排外性的税收政策，工业家们也免受竞争者的威胁，主要是英国人的威胁。当法国的周边国家都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这难道不是要让法国陷入一种危险的麻木状态吗？

711

要改变一些有利的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1853年以来，每次提出类似的尝试，都会遭到立法团的抵制，如果说立法团在政治方面无所作为的话，它却百般阻挠对公众利益予以保护，只有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了。人们知道，皇帝依照宪法拥有签署商业条款的权力。这一事件又是在暗中进行的。谈判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在国务委员会成员、圣西门主义者米歇尔·谢瓦利埃和英国特使科布登之间进行的，鲁埃在乔装改扮之后前来与他们会合。抗拒者在1860年1月23日才获知法国和英国之间将签署一个为期10年的商业协定：法国取消一切针对英国的商业禁令，把原材料和工业产品的从价税减少到30%（实际的税率更低）。而英国方面则免征法国的奢侈品、丝织品，尤其是葡萄酒的关税。这一条约是接下来若干年中法国同欧洲诸经济强国签署的一系列条约中的第一个。此外，1861年6月15日颁布的法律废除了谷物的最低价。

这是一场政变，一场革命！反对派如是叫喊。这有些夸大其词。鲁埃有理由反对他们：“这里牵涉的不是贸易自由的问题，而是采取何种明智举措、在不损害发展的前提下推动工业进步的问题。现在不是有了最高保护关税为30%的自由贸易体制吗？”不过，这确乎是一次

迸发，猛然动摇了法国经济中的某些陈年积习。要理解这一点，只要了解它所引发的抗议的激烈程度就行了。

一场合理的革命

要解释为何皇帝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如此的冒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援引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拿破仑三世走在了其时代的前面”，他（或支持他的人）比那些经济贵族更了解他们的真正利益。我们无法否认这些创新措施及其创始人的大胆，似乎这一切只归功于某几个真的具有非同一般的才能者。面对一种饱受指责的保护主义，这样做也赋予了自由贸易以各种进步主义的美德。正如当今的计量经济史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此前的保护体制下，法国经济发展很协调，其速度也比后来自由贸易体制下的速度更快。

实际上，1860年的这一决定揭示了法国经济当时达到的水平以及所面临的困难和矛盾。首先应该强调的是，皇帝或他的“技术精英”，即那些圣西门主义者在为“自由贸易”而战的时候并非孤军作战。很长时间以来，港口的外贸商，葡萄种植主，某些工业产品的出口商，里昂的丝绸厂主以及米卡兹的棉布商，一直要求自由贸易。撇开表象不说，自由贸易的反对者的人数或许并没有那么多，力量也没有那么强大。1851年开始了一个价格上扬期，农业不像从前那样严重依赖于闸门价，1853—1859年间，当农业歉收、必须进口粮食时，闸门价曾数次被取消。实际上，自由贸易来得正是时候。法国的工业已经突飞猛进地发展了40年。它既有落后的部门——以木材作燃料的冶炼厂和诺曼底的纺织厂，这些部门强烈地需要保护主义以便能够生存下去。但它也拥有一些先进的部门——用焦炭作燃料的冶炼厂和东部的纺织业，它们很快就实现了设备的现代化，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能够经受国内市场乃至国外市场甚至是英国的竞争。它们在此时依旧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因为这个系统所维持的高价能够产生超额利润。但是，价格保护既不是经济保障也非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他们得去适应自由市场的新环境。勒克勒佐的冶炼业巨头施奈德的反应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例证。1862年，他宣称：“我不喜欢这个条约，因为我不

712

喜欢任何形式的革命。”及至1864年，他则承认道，皇帝“有理由把公共舆论提前几年实现。在它们的努力和牺牲下，我们的工业经得起外国的竞争。”无论如何，法国经济如此轻易地转向自由贸易体制，这本身就表明它对此并非准备不足。悲剧只是对最弱小者而言的，他们被前进中的强者无情地抛弃了。

从另一方面来讲，全面的经济增长会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后者日益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增长动力。1830年，法国的出口占国民经济的13%，到1860年则达到了29%。至少我们的出口从1840年以来就得到了迅速增长，自1850年以来的增长更为迅猛。我们出口农产品，但主要还是制造业产品，工业品的出口也在不断增加：1830年占国民经济的近7%，到1860年至少是翻番了。1860年的条约正是在法国外贸产品不断增加的大趋势下签订的。他并没有强迫生产商接受这个条约，只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适应市场。因为从长期来看，倚仗人为的保护，法国商品的价格对国际市场来说过高了，这抑制了产品竞争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让商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话——1855年至1857年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进口额超过了出口额——那么让企业主直面现实应该是刻不容缓了。“真正的价格”，即突然取消关税壁垒后的价格才是要达到的手段。

其他原因和影响也对此起到了作用，我们在这里只提两个，它们是“短期的经济形式”所迫。1857—1859年爆发的严重的经济危机打断了帝国初年的繁荣景象，所以有人说它对于巩固帝国政体起到了作用。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开发或许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经济复兴”。从另一方面来看，借用一个现代词汇，我们说1851—1856年的法国处于“通货膨胀”之中。商品的涨价对于我们的出口来说只起到了损害的作用。涨价还给大多数人造成了损失，如果说涨价让有些人获利的话，那只是对农民而言。涨价主要体现在城市物价水平的上涨，然而，工资的上涨速度之慢却让人无法生存。竞争所导致的物价的下降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实惠，这是自由贸易论者的典型论点。担心引发不满的皇帝发现工人阶级对此并非无动于衷。

最初的遮遮掩掩的政治自由

1860年的条约招来了众多的不满，对自由派——其主要是政治上的自由派，而不是经济方面的自由派——来说也一样，他们对帝国的专制早已心存芥蒂；天主教的反对派则是对皇帝的意大利政策表示不满。尽管皇帝多次说过要建立一个“保护贸易的天主教政党”，但官方代表们却显得不那么顺从，有些官员甚至敢在某些场合上公然进行抨击。不过，这还不至于形成公开的背叛，最好还是通过一些让步来平息他们的怒火。1860年11月24日的决议规定，立法团和元老院可以针对国王在每届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表决一份请愿书，它们可以在政府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辩论，后者将全面阐释政府的政策和意图。713 不管大臣和国务参事将为提交给立法团的法律提案而辩护。三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了这些职位，他们是巴罗什、比奥和马涅，这表明他们还是认真地对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1861年2月1日颁布的元老院法令明确规定了两院辩论的程序，还规定了需要对议程进行完整的速记，并在第二天的《通报》上刊出。1861年12月31日的第二次元老院法令大大增加了立法团在财政方面的权力。今后政府禁止在休会期间划拨临时经费，预算决议不能仅通过大臣，而应该通过各部门来批准。这一措施满足了商界人士和预算代表们的要求，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行政部门的过度预算心存不满。

某些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纯粹表面的微小让步。但事实上，法国离议会制的正轨已经不远了。我们也不应忽略即将重建的请愿权的重要性。它曾是立宪君主制下代表们强加于议会制规则的最有效工具。不久，在1861年3月举行的对第一次请愿展开的讨论，为意大利政策的反对者提供了表达不满的机会。他们提出的修正案在立法团以158票对91票，在元老院以79票对61票被驳回。我们从未看到过如此大规模的反抗。

在作出这些让步的同时，少许的强硬也并无不可。天主教“党派”将为其反对立场付出代价；要想见证人们一直有除去这些权利的坚强意愿，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弗约的《宇宙报》先是被停业整

顿，继而又被取缔。极端拥护天主教派的宗教部大臣鲁朗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难以忍受的入侵表示谴责，因为后者把真正的宗教事业和意大利高级神职人员的世俗利益混为一谈。自1860年起，法国教会的主教就不再接受教皇的任命，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此感到自豪，有关集会的法律又被严格地制定出来了：任何宗教集会，尤其是带有教育性质的集会都必须经过当局的批准。为这些集会出力的自然首先是耶稣会士，那些无害的圣文森特保罗会议也出了部分力气，但后者因为拒绝向当局获取批准而自行解散了。

1863年选举

新的进程开始了！这一进程不愿意产生令人痛苦的困境。在外交领域，帝国希望不再陷入罗马的困境，这一困境是它违心地帮助了其意大利盟友，后者宣称以罗马为首都，但是，1849年的条约又迫使法国军队继续驻扎在罗马周围以保护教皇的利益。对于国内事务来说，风平浪静的政治生活和波澜不惊的行政选举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863年5月至6月的立法团选举是一个验证拿破仑式的思想是否成功的机会，但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欢欣鼓舞。

各党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抗。之所以说是对抗，那时因为在这一时期，各党派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是同一个党派内部也产生了分化。首先是共和派这一最早的反对派，在共和派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关于宣誓效忠的争论到现在已变得毫无疑义，因为从1858年开始，不仅要求当选者，也要求候选人宣誓；只要参加选举就必须得宣誓。“五人组”已经证明，他们能够有效地提高调门，而且跃跃欲试的年轻一代已经压倒“六七十岁的老人们”。分歧看来更多是在以下两类人之间存在：一些人主张坚定地保持距离——虽然可以对新的进程有所想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在某些方面对当局予以积极支持，甚至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如《世纪报》的奥利维埃、阿万，《民意报》的格鲁就属于后一类，虽然他们没有十分公开地表明过。新的反对派天主教派已经准备投入战斗。七位主教发表了一份宣言——执笔撰写该宣言的是具有自

714

由主义思想的奥尔良主教迪庞卢，该宣言宣称：他们只投票给那些“天主教派”的候选人，也就是那些首先对教皇的权力表示尊重，其次赞同完全的宗教自由，最后赞同广义上的“自由”的候选人。以梯也尔为首的自由派和奥尔良派提出建立一个“自由同盟”，这是包括共和派在内的各个反对派的统一阵线和联盟，但梯也尔没能说服他的所有朋友。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一些正统主义者，他们为了天主教会和他们自己的利益，可以置王位觊觎者的指令于不顾。

每一种特定的策略差不多均以失败告终。但“对抗”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由派联盟在巴黎和马赛取得了成功，梯也尔和8名共和派人士在巴黎获得了7个议席，共和派的马利和正统派的贝里埃在马赛获得了两个议席。7位大主教并未获得身份相同者们的追随。赞同弗约的下层教士或许愿意投天主教派候选人的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担心革命力量的发展，于是，他们宁可把选票投向官方的候选人，只要后者公开承认信奉天主教。不管是否有其他反对派的支持，共和派依旧在主要的大城市独自发展，但他们在城市获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农民们对帝国的长期忠诚给抵消了。

在这次选举中，当官方候选人的选票同以前一样达到接近极限的500万票时，反对派却得到了近200万票；弃权票下降到了选举人数的26%，这表明国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了。32名反对派人士当选，其中17名属于共和派，另外15名“独立派”则分属自由派、保皇派、天主教派和主张保护贸易主义者的阵营。人们不甚清楚他们是如何得到任命的。他们占据的议席超过了1/10：根据当时的情况，这已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人们不妨问道，有多少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或后台可疑的官员，将禁不住开始变得有利可图的反对派的诱惑啊。皇帝并不掩饰他的不满。他首次对内阁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这是一次模棱两可的调整。在选举中失利的佩尔西尼在接受了公爵头衔之际被免去原职；不过，他是唯一一个认真考虑过建立波拿巴主义的“派别”的人。信奉自由主义和教权主义的瓦勒夫斯基从1862年起就被免除了外交大臣一职，改任职责不是很明确的国务大臣一职，他最终还

是受到了排斥；但是，拥护法国天主教会自主的鲁朗也和他同时走人。对于意大利政策和天主教政策的后果，究竟该作何结论呢？尤其是因为一名极端主张法国教会自主的历史学家维克多·杜律伊受命执掌教育部，更让人对此感到困惑。事实上，拿破仑三世换上的都是一些无条件地支持他的人，巴罗什被任命为司法和宗教事务大臣，比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负责处理同议会之间的关系，以替代那三位被解职的不管大臣。1863 年 10 月比奥的过早离世使鲁埃得以继任。鲁埃稳重而有责任心，虽然他没有演讲方面的天赋，也没有宏伟的气度，但他勤奋能干，这使得他渐渐成为政府的首脑和多数派的领袖。这正好为那些嘲笑这位奥弗涅人的恶作剧者提供了良机，他们说："我们虽然没有政府，但我们至少有鲁埃"。他是否成功地在局势恶化之际重建了秩序呢？

此时此刻，已经从立法团那里传来了梯也尔那刺耳而又具有超强煽动力的声音，在巴黎当选的他于 1864 年 1 月 11 日要求"必要的自由"。这些自由共有 5 项内容，它们互为补充，"五个条件构成了我所谓的必要的自由'，前四个分别是个人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自由、国民代表的自由，而最后一项也是'国民代表的自由'的目的，这就是让在此以多数得到确认的公共舆论，成为政府运行的准绳。"　715

工人们的皇帝

既然丧失了"上层人士"的支持，帝国不就应该求助于被遗忘多时的"底层的朋友"吗？吸引工人阶级的是 1848 年的波拿巴的威名，而并非 1851 年的那个漠不关心的人，工人阶级在社会上遭到镇压，实际工资水平不断下降，它们是强大的波拿巴主义时代的牺牲品。毫无疑问，这些经历增强了他们对共和主义的信念。从 1860 年开始，局势产生了变化。帝国开始"向左转"，这难道纯粹是一种策略吗？不！拿破仑三世相信某种权威与"社会的"民主的效力。他已经把农民阶级召集起来并为他们带来了秩序和繁荣；当年，他也倾向于通过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消灭贫困"，他一直想要实现这个目标。

收买工人阶级的任务专门由一个叫"罗亚尔宫"的组织来负责，

它是一个由圣西门主义者阿尔勒-迪夫尔、米歇尔·谢瓦利埃等人推动成立的俱乐部，这些人会让人想起他们过去曾经也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人们时常可以看到那些真正的工人光顾那里。这个团体在信奉共和主义的波拿巴主义者，喜欢喧闹的热罗姆亲王那里得到了安身之处，并服从他的领导。

1861年出现了一个由五位工人署名的题为《皇帝、人民和旧党派》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直接出自“罗亚尔宫”，也是这一系列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它流露出某种新的宣传论调，它提醒人们，同其他的统治者不一样，皇帝并非是统治者，而是一个国民和大众的君主，我们都可能通过选举成为皇帝。人民应该给予他信任，而不应该受老式资产阶级党派那些自私无聊的政治伎俩的引诱。有人已经暗中许诺（只要存在这种信任并公开表明），不久将取消使工人处于衰弱状态的法律。接着，“罗亚尔宫”建议，并部分地出资派工人代表团前往伦敦参加工业博览会。这一姿态表明了帝国开始承认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事实。实际上，在大城市已经开始了各主要行业代表的选举，此前因镇压而分崩离析的稳固联系重新得以建立。巴黎派出了183名代表，里昂则有60名代表，他们回来后发表了报告，尽管还带有明显的帝国保护的色彩，但这是法国无产阶级表露苦衷的最早的陈情表。所有的报告都通过以英国工人为参照强调了法国工人的悲惨处境：微薄的工资，过长的劳动时间，许多行业还要求得到在芒什海峡对岸已实行的工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结社权。

《60人宣言》

微笑攻势是否奏效？一小群工人精英可能一度受到了诱惑，即使不是真的被吸引住的话。更何况复苏的工人运动和共和派之间显得关系冷淡。前者指责——颇为正当——后者在纲领和实际斗争中很少关心其无产阶级选民的状况和利益。共和派以工人们在拿破仑三世政变时的消极无为作为反驳，认为他们是同谋，而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在巴黎，这一争论相继在1863年的大选和1864年3月的补充选举中变得更为激烈。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已经决定，要在某些工人区选出

他们自己的议员。此举具有象征作用；认为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多么的微不足道，这种看法毫无意义。不过，及至 1864 年 2 月 17 日，塞纳省的 60 名工人发表了一份宣言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普选使我们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但是，我们还需要在社会方面解放我们自己……先于我们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在 1789 年摧毁了不正义的特权……我们也应行动起来获得同样的自由……如果不否认事实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还存在某个需有直接代表的特殊公民阶层……我们并不憎恨他人，但我们想要改变某些东西。"共和派粗暴地断言，这些代表和他们的宣言是为了维护拿破仑三世的事业和利益，是在皇帝的指使下进行的。事实上，如果 60 人中的某些人有时和当局接近的话，那么，他们很早就懂得划清他们之间的界线了。正如铜匠托兰在 1861 年明确指出的那样："来自上层的动议在工人中间只能引起不多的信任……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你们是自由的，组织起来，完成自己的事业。"《60 人宣言》是法国工人运动走向独立和成熟的第一个阶级宪章。

716

罢工权

当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局给他们的宽容。与传统的互助性社团相比（应该指出的是他们并非无可指责），从 1859 年开始，行业协会就出现了一种以"互信和节俭"为核心的新模式。它们旨在建立一种行业的共同资本以达到互助的目的，尤其是通过建立消费型和生产型的合作社来同老板的企业和车间竞争。此外，一些行业协会已经朝更不具有攻击性的工会的"抵抗"发展，那时，节省下来的钱就可以用作资助罢工者的资金。

罢工活动确实在 1861 年和 1863 年间增加了。最为引人注目的罢工运动当推 1862 年巴黎印刷工人的罢工。它们的"印刷协会"是政府批准的完全合法的组织，此次罢工差不多召集了印刷业的所有工人。罢工者要求增加近 20 年都没有变动的工资，企业主丝毫不愿妥协，并号召女工停止罢工。1862 年 3 月，罢工爆发，差不多所有的工人都参加了大罢工，但罢工最终还是失败了。罢工的"主使者"被判重刑，

但皇帝出面干涉，赦免了犯人，以表明这是一个新时代。在经过了一番实力的较量之后，皇帝的这种态度等于是为结社的自由提供了保证。

虽然主动性来自上层，但这不能纯粹归结为皇帝的善意，因为工人阶级难以抑制的咄咄逼人的力量迫使他作出决定。1864年5月25日的法律大幅度地修改了《刑法》第414至416条：结社本身并不犯法，除非超越了一定的界限，尤其是——不太清楚为何要用这个词，但法官对此颇为欣赏——各种“损害工业和生产自由运作的举动……凭借暴力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这项法律的报告人、官方的律师竟然是共和派的奥利维埃，此人是莫尔尼劝他“表明姿态”的。右派人士、实业界的代表显然不愿接受：共和派的左派觉得这一法律“既无用又具有危险性”；而工人们似乎很满意，他们毫不迟疑地着手体验他们的新武器。

帝国派的自由主义

人们不愿此前的事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帝国刻意地“向左”开放或倾斜，即便这只是为了更好地逃避右派。问题牵涉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前面所引的蒲鲁东的话并不符合实际。帝国既不能也不愿被说成是左的或是右的，它自称“别有不同”。同样，追问——正如很多历史研究中所做的那样——1860年后的帝国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由”帝国，则是一个假问题。对这些说法的意义应该有717 一定的共识。一方面，确实存在“自由派”的自由。他们的自由主义是一个确定的体系，它在君主立宪制政体下经历了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它的基础是对“个人”自由的尊重，但实际上是以精英的政治优先为基础的，它伴随着议会制政体的建立达到其顶峰。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与之完全不同的“自由”：拿破仑式的自由，贸易自由，罢工自由（甚至还有变了味的普选制）。这些自由同样重要，同样“必不可少”，但它们却是自由派所坚决摒弃的。自由派不承认这些自由，这些自由不在他们的“自由”范畴之内。从这个词的首要意义——也是它在当时的意义——上说，帝国没有变得自由，它甚至没有开始向自由的方向转变，即便赐予了请愿权也是如此。但是，确实有一种独特的波拿

巴主义的自由主义，如果要更好地称呼它，最好说帝国派的自由主义，而不要说自由的帝国。

……它的界限

由于在其他方面和在根本上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帝国的体系还是建立在它的两大最重要的基础之上：内部的权威和外部的荣耀。说到权威，在负责宗教事务的主张法国教会自主者巴罗什，以及主管公共教育的在俗教徒杜律伊的监督下，天主教徒们对此深有体会。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和教会组织是他们担心的对象。在杜律伊的不断打击下，教会开始丧失其在教育领域所获得的巨大利益；既然国家已经没有理由再照顾它，那么就需要慢慢收复失地。同过去相比，立法团是唯一一个抱怨有所增加的机构，鲁埃则控制着大多数的官员。尽管莫尔尼不断努力，但直到 1861 年后才出现新的政治让步。向来颇有远见的莫尔尼是唯一能够用权威来解决问题的人，但他在 1865 年过早辞世。

外部的荣耀在不断出现，它成了安慰民众或缓和矛盾的托词。今后，帝国确实应该征服那些遥远的土地。这是殖民活动的荣耀。在已被平定的阿尔及利亚，拿破仑三世称自己“也是阿拉伯人的皇帝”，并且声称，让土著免遭外来民的过度入侵。这是他的自由主义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但他在这一点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功。法国人还开始在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这可谓是圣西门的宿愿。法国人还开始插足远东，参与了让中国开放通商口岸的行动。1859—1867 年间又在交趾支那建立殖民地，1863 年迫使附近的柬埔寨王国接受法国为它的保护国，最后一直推进到老挝。凡此种种，使人们几乎将忘记费德尔布在塞内加尔进行的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才能完成的任务，费德尔布是位因失宠而被发配到那里的上校，也是共济会会员。

但是，此时此刻，堪称“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最伟大的创想”的毫无疑问是 1862 年进行的墨西哥远征。这是拿破仑式的创想，也是最后一个创想。掌权的自由派和保守的天主教派之间的纷争让墨西哥处于分裂状态，并时常面临爆发内战的危险。墨西哥外债累累，濒临破产。这是一块用来表现帝国主义不择手段的行径的绝佳场所！拿破仑

三世一直在考虑平衡美国在美洲不断增加的力量，趁当时美国正处于内战的困境中，法国就有可能在中美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恢复秩序（和教士的利益）而对墨西哥进行干涉，也是一个安慰近期倍感失望的法国天主教徒的良机。最后，与西班牙和法国一样，英国也是墨西哥的债权人，因而这也是一个加强同英国的联系的好机会。确实，整件事情涉及的都是一些谈不上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的利益，其中牵涉到可疑的瑞士银行家杰克，此人很早就使莫尔尼对远征墨西哥产生了兴趣。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决定通过共同干涉来迫使墨西哥清偿债务。实际上，由于它的两个盟国难以承担相关的沉重负担，法国很早就已单独行事。但是，远征墨西哥对于巴赞将军率领的远征军来说，并不只是一次练兵。1864 年 4 月，拿破仑三世为奥皇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提供了墨西哥王国的王冠，这对于缓解同奥地利的紧张关系来说不失为一个好招。

718

外部的失算

但是，这种遥远的光荣较之那些真正的问题，亦即欧洲问题实在算不了什么。皇帝梦寐以求的是彻底撕毁“可憎”的 1815 年条约。正是在这个战场上，他的运气开始不佳，而这一点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863 年，孤立的法国无力援助起来反抗俄国的波兰，各列强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召开大会来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建议。但是，此时此刻，德意志的民族问题却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普鲁士准备对奥地利开战。拿破仑三世决定要进行干预，这既是出于对民族原则的忠诚，也是因为在莱茵河彼岸组成一个新的国家令人感到担忧，新生的德国不应该变得过于强大。于是，他又玩起了巧妙的游戏，并且一如既往地让这一游戏充满神秘色彩，不管怎么说，这又让法国的舆论迷失了方向。1865 年 10 月，他向俾斯麦保证法国会保持中立，他甚至还赞同意大利和普鲁士签订结盟的条约。但是，他打算以其所称的这种“热忱的中立”来获取丰厚的回报。法国遂向普鲁士提出补偿要求，比如说要德国在成立时重新调整 1815 年以来同法国的边界。与此同时，它又同

奥地利进行谈判，而奥地利为了能利用这一中立，承诺把威尼斯割让给意大利。实际上，法国的版图得到了扩大。所有人都认为，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必然漫长而艰苦，当双方都精疲力竭之际，拿破仑三世就可以乘机担当调停者。

一切都出乎意料。普鲁士在几天之内就击败了对手。1866 年 7 月 3 日，普鲁士在萨多瓦战役中击溃奥军，这对法国的外交来说也是最为惨重的失败。或许拿破仑三世急于出面进行调停，但当时的条件差到了极点，俾斯麦几乎实现了他所有的意愿，意大利获得了自 1859 年起就应归于它的威尼斯，但对法国却毫无感激之情。而对于补偿——拿破仑三世知道永远不会得到承诺——以及如他无耻地所称的“小费”，俾斯麦根本不愿提及。

祸不单行。1867 年，罗马的局势再度恶化。11 月 3 日，法国军队不得不在门塔纳阻挡向罗马进军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夏斯勃步枪的效果不错”，但不幸的是，这一天它指向了意大利的友人。在世界的另一端，墨西哥事件变成了一场灾难。马克西米利安无法让他的新臣民接受他的统治。只有那里的法国远征军才能让他保住宝座。可是，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法国远征军被迫撤回法国，这也意味着墨西哥帝国崩溃的日子的到来，1867 年 6 月 19 日，马克西米利安在克雷塔罗被当地的游击队员枪杀。

国内的不满

这就好像是一场溃败的开始。1863 年后，皇帝依然优柔寡断，反对派则得寸进尺。在立法团，鲁埃坚持不懈地工作，为抵挡正在为法国外交政策大发雷霆的梯也尔的进攻而操心，奥利维埃则痛苦难忍地拿自己“没有责任的副皇帝”这一角色开玩笑。以梯也尔为首的派别已在议会形成，人们戏称其为第三派。梯也尔既不赞成共和派采取宗派主义的反对态度，也不同意无条件的服从，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鉴此，他选择的是合乎情理的反对。他并不反对帝国，他只是希望帝国能赋予那些“国民代表”更多的权利，能够让“1860 年的伟大法案进一步发展”（其中包括请愿权）。简言之，就是让帝国成为真正的自

由帝国，而此处“自由”的含义乃是自由派所理解的“自由”。人们也不再为天主教和教皇而费心劳神，而是想到国外去寻求一种具有危险性的荣耀。第三派的人数尚不多，但其自由主义的观念在不断发展，要不是受到鲁埃的严格控制或者因为担心下一次的选举，不知有多少官员会投入到这个阵营中来？

719

外部的挫折并非是引起诸多困难的唯一原因。经济的繁荣曾令人略感欣慰，也“麻醉”了诸多的不满者，但此时，经济正走向衰退。由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棉花荒导致了纺织业的衰退。尽管法国在 1860 年实行了经济复兴政策，并对出口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扩张的速度减缓了。1866—1867 年法国出现了一次大的危机，金融业方面，佩雷尔兄弟宣布破产；就工业来说，因棉花短缺，生产能力出现过剩。此外，1867 年的农业歉收又造成了生活成本的上升。有什么比把这一切困难都归咎于自由贸易的罪行来得更为方便呢？这也是第三派确信要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所在。

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

通过家长制的统治来增强工人的好感的企图再次失败。劳动者很好地接受了给予他们的自由，但并没有表示过多的感激。相反，他们马上表达了行动的意愿，诚如托兰所说的那样，通过他们自己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在 1862 年派出的代表们已经同伦敦的工会代表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联系，这些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1864 年 9 月，国际工人协会①成立，它的口号清晰而自豪：“解放劳动者的应该是他们自己。”国际工人协会也在法国设立了支部，及至 1867 年，它在法国的主要城市设立了 32 个支部，这还仅仅是在“一个瘦小的躯体里植入了伟大的灵魂”。第一国际只有几千人的规模，但重要的是它囊括了如此热情而有影响力的精英分子，他们总是渗透到工人中，并进一步地推动工人组织的发展。这些最早的积极分子受到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因其导师向他们反复灌输不要把政治辩论，甚至是共和派的

① 1889 年第二国际成立后，国际工人协会开始被称为第一国际。

政治辩论当真，使得他们有时候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同情者。这种指责显然有失偏颇，所有的工人都是充满热情的共和派，但是发自他们内心呼唤的“真正的”社会共和国并不是以前那种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要像给帝国去除标记一样给共和国去除标记。对他们来说，首先要进行的是一场经济战；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带有一点乌托邦的意味，其立足点是不断地发展工人组织和开展互助，增加生产和交换合作社。

与此同时，劳动者兴高采烈地来体验他们新获得的结社权。在1864年和1865年，接着是在1867年，罢工活动不断增加。尤其是巴黎的铜匠协会，它一直处于战斗的前沿。1865年，它成功地获得了争取“10小时工作日”的胜利。1867年，它举行的第二次罢工提出了更为可怕的问题：如果没有建立工会的权利，那么罢工权毫无意义。铜匠们建立了互助信用社，虽然它是非法的，但却获得了当局的容忍。该组织成为了工人抵抗运动的推动者，雇主们决定把这个社团的所有成员统统清除干净。但是，所有同行业的工人以总罢工予以反击，并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工人们注定不会就此满足，于是，工会的自由问题遂提到了议事日程上。1867年，在巴黎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工人们选举了新的代表团。同1862年一样，代表们起草了报告，只是这一次的言辞更为激烈。他们揭露工资菲薄乃至不断下降，揭露法律在结社问题上设下的各种“陷阱”，要求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大多数代表还要求结社权。在博览会结束后，政府并没有追究这些代表，于是，他们继续聚集在一起建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869年。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议会，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讨论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棘手问题。在它的保护下，各个工会建立了起来。第一个公开宣布其名称的是1867年巴黎的鞋匠工会；此后，其他的工会亦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720

尽管如此，第一国际还是积极地发挥着它的作用。它一如既往地支持罢工运动，它最优秀的活动分子都来自那些新工会的主要组织者。此外，一种更为强硬、更为革命的态度开始取代运动初期的那种更为

谨慎小心的蒲鲁东主义。它也不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的同情对象。1867 年 11 月，为了对当局在门塔纳采取的行动表示抗议，巴黎支部的成员参加了共和派组织的在意大利爱国人士马南墓前举行的示威运动。政府以未经允许自行结社的罪名对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进行了起诉，并勒令解散巴黎支部。

自由的帝国

总而言之，那些想使帝国的面貌变得积极而独特的拿破仑式的创想都破灭了。此时此刻，皇帝自己也年老多病，并且受到那些自相矛盾的念头和影响力的折磨。他时而赐予帝国能够赋予的东西，时而又强行收回重要的让步，这些重要的让步不可避免地通向“自由派”的帝国，而这一“自由派”的帝国与帝国的自由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并且只可能在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1867 年 1 月 19 日皇帝刊发在《通报》上的一封信宣布开始采取第二轮的自由主义措施。请愿权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质询权；相关的大臣需参加辩论。根据 3 月 14 日的元老院法令，元老院的权力得到了增强：它可以在某一项法令颁布之前，把该法令重新交由立法团再进行审核。法国开始逐渐走向两院制的政体。1 月份发表的这封信件还许诺将放松新闻管制，并宣布了某种有限的集会权。这两项措施属于踌躇和抵制的混合物，它们一直要到 1868 年才出台。5 月 9 日颁布的一项同新闻出版有关的法案，取消了预先审查制度和警告制度。6 月 6 日颁布的一项法案规定，只要不是政治性集会，均可以自由集会（大选期除外）。1868 年 3 月 31 日，内政大臣在《通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最终宣布给予工会性质的结社以极大的自由，另外，8 月 2 日颁布的一项法律废除了《民法典》中的第 1781 条，亦即关于在法律面前企业主和工人不平等的条款。

帝国已经不像帝国了。反对派们会感到满意吗？对于“自由派”来说，这还不够，因为法国尚未实现真正的议会制政体，而且，关于自由贸易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共和派的反对者利用新的自由来宣泄不满，他们把老一辈首领们的温和的智慧抛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激烈的、毫不妥协的反抗。“法国有 3500 万臣民，这还不包括那些对政

体不满的臣民"，罗什福尔－吕塞侯爵的杂志《明灯报》创刊号如是开头，罗什福尔－吕塞侯爵虽拥有贵族的头衔，却思想激进，他所创办的这一刊物的发行量达到12万份。人们敢于公开地谈论政变。泰诺的两本小册子《1851年的外省》和《巴黎在1851年12月》，讲述了共和派对政变的抵抗。

1868年11月2日，共和派前往蒙马特尔墓地，在1851年12月3日死于街垒的博丹议员墓前举行示威，并为给烈士竖立纪念碑而发动了一次募捐活动。他们的行为受到法庭的指控，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莱昂·甘必大控诉说："这个国家的所有政权都以其诞生的日子而自豪。唯有两个纪念日从未进入这些庄严节日的行列，这就是雾月18日和12月2日，因为你们知道，如果要把它们列在其中，会引起公众良知的反感。"

721

四、终结还是重新开始

帝国在各种攻击之下——为数尚少的共和派的喧嚣较少，压力更大的是"自由派"那些颇为阴险的威胁——缓慢但又无法逃避地被推向自我否定。这个融合了强硬及现在应被称作"拿破仑式的幻影"的"专制帝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帝国已经遭受了太多痛苦的失败，也作出了过多的让步。波拿巴主义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它已经存在了20年，是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它能否改头换面获得重生呢？

1869年选举

1869年5月至6月间的选举，确认了我们即将描述的那场缓慢的失败。尽管帝国施加了各种压力，采取了种种努力——力量的对比还是发生了变化，帝国前所未有地受到革命力量的威胁，选举对帝国来说是一场失败。政府只得到了443.8万票，反对派则获得了335.5万票：两者几乎只差100万票。当然，从席位来看差异要显得更大。根据《通报》的统计，有292人获选，在支持政府的216名议员中，118人属于"官方人士"，98人属于"支持政府的自由派"；在与之相对

的74名反对派议员中：49人属于自由派，19人属于民主派，6人属于激进派。

同以往一样，数字、特别是党派的类别并不能确切地反映现实。让我们更好地来观察一下局势。反对派的选票和席位都翻番了，尤其是共和派，他们在高唱胜利的凯歌，他们在各大城市都击败了政府的候选人。尽管如此，他们只在立法团中取得了25个议席，如果我们加上几个所谓的温和的自由派，如在瓦尔省当选的奥利维埃的话，那么也只有30席左右。共和派只是在农村和少数地区——总是在南部和东部——失利。他们虽然激进，但也并非铁板一块，年轻的野心家试图推翻那些老家伙的统治，共和派之间也相互争斗，以巴黎为例：罗什福尔差点儿就让法弗尔栽跟头，奥利维埃被邦塞尔无情地击败，卡尔诺则被甘必大击败。甘必大在首都革命势力较大的东北部一带，尤其是在贝尔维尔一带取得了胜利。他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维尔纲领》，要求各种自由、真正的普选、世俗和义务的教育，政教分离，各级公务员由选举产生，永久地废除常备军，取消经济垄断——这些要求同1871年巴黎公社提出的方案很相似。他特别提出，绝不对帝国表示妥协。他的这番红色信仰的表白令他最开明的同事也感到不安，并把某些平庸之辈推到了自由化帝国的倡导者怀中。25名共和派议员表现得同样与帝国"势不两立"，虽然他们的声音不如甘必大那么高亢。他们同其他同样也遭到削弱的反对派保持距离。确实，甘必大就在这个时候在马赛参选，并得到梯也尔的支持。甘必大表现得像是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这种民主制度"正因为其激进性而更加忠实于作为社会之基本原则的秩序"。甘必大凭借其威望选择了马赛的贤哲委派的职务，而不是贝尔维尔给他的那个灼热的席位，这一席位后来由罗什福尔占据。

人们注意到，在支持政府的这一边，将近一半的当选者并没有带着政府的印记参加选战，这些人被称作"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事实上，他们表现得像是拥护皇朝的候选人，但同时又属于自由派，某些人甚至还自称"独立派"。他们是些讨人喜欢的半官方的候选人，虽

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确实，这些困难的选举是件操作起来十分麻烦的事情。当无条件支持政府的候选人——这类人已变得越来越少了——看上去不可能当选时，政府会明智地作出妥协，它会支持一个往往并非完全靠得住的较友好的人士与公开的反对派候选人唱对台戏。但是，在一位支持政府、拥护皇朝的自由派人士，与一位属于反对派——这个反对派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公开质疑过皇朝——的自由派人士之间究竟又存在什么差别呢？这种差别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两位当选者获得的票数会近乎相等。而且，既然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威胁，那么当涉及与一位绝对不会妥协的革命分子竞选时，省长若不让一位属于反对派的自由派人士过关那又有什么样的选择呢？相反，为了对付同样的革命分子，天主教自由派的反对派人士、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者难道不情愿把票投给一位支持政府的自由派人士，甚至是一位官员吗？在许多情况下，在许多地方，旧的秩序党会时而为了帝国的利益，时而为了反对派的利益而重组，或者说，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会为了一个极难确定的介乎于帝国和反对派之间的利益而重组。

722

这些党派和数字最终并没起到多大作用，应考虑到立法机构内部各派别重组的方式。组成极左派的是 25 名（暂时）不可制服的共和派人士，与之相对的是粗野地与专制制度绑在一起的 80 名货真价实的波拿巴派分子，我们称之为“马穆鲁克”。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一个“沼泽派”或曰“中间派”，其中较难被辨认出来的是那些受到自由引诱的官员、受到“参政”前景诱惑的属于反对派的自由派人士，以及得到承认和讨人喜欢的独立派人士。在沼泽派中还产生了一个中间派：从 7 月 6 日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共有 116 人“要求就满足国民情绪之必要性质询政府，并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把这个问题与施政方针联系在一起”。透过此前的各种阴影和伪装，人们已经看到第三派的崛起，这个突然变得强大的派别的言论以议会纲领为中心，它排在两个可能的首脑之后，其一是宣扬基本自由的老律师梯也尔，其二是苍白的共和派人士奥利维埃。

退位？

除非再发动一次政变，否则对帝国和老皇帝来说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最终的妥协——放弃。对于这 116 人来说，必须“组建一个向皇帝和议会负责的政府，立法机构应有权协调自身的工作组织以及与政府的关系”。7 月 12 日，鲁埃在立法团实行质询权之前宣布解散内阁，副皇帝（指鲁埃）退位，他以其主人的名义许诺将进行被要求的改革。1869 年 9 月 6 日，元老院通过决议从根本上修订了 1852 年 1 月的宪法。从今往后，立法团将和皇帝共同分享法律创议权，它将成为制度的主人，获得选举自己领导机构的权利。它将对预算进行逐项表决。两院将享有不受限制的质询权。只有根据法律来收取关税。大臣们终于被认为是“负责人”，并且是集体地充当这一负责人。他们既可以是参议院的成员，也可以是众议院的成员，但要明确的是，他们只“对皇帝负责”。

历史学家们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帝国真地实现了议会制了吗？是“准议会制”还是“主张自由的议会制”？毫无疑问，大臣负责制尚未明确确立。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记得，以前的宪章也不见得更为明确。“自由派”所谓的议会制政体依旧在运行之中。事实上，拿破仑三世已准备向议会提出退位。12 月 28 日，他在写给奥利维埃的一封信中的一些语句可以作为佐证：“我请求您能够让我帮你任命一些人，可以和你一起组成一个能够忠实地代表立法团多数人的内阁。”

这也满足了已经去世的自由派莫尔尼的心愿。奥利维埃曾经是他竭力想要收买的对象，但这位共和派人士的声望不断减退，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波拿巴派中的左翼分子。1870 年 1 月 2 日，他组建了一个多数派的内阁。要费力地把中右派（在政治上更拥护波拿巴主义而非议会制）和中左派（在政治上更拥护议会制而非波拿巴主义）捏合在一起不无困难，但这恰恰正是议会制体系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有着“良好意愿的内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没有时间去实现任何愿望。但在这些愿望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1870 年的自由帝

723

国和1860年的帝国自由主义恰恰相反。1860年的自由主义是同天主教妥协的产物，而1870年的帝国则恰恰相反，是向日益激进和迫切的工人运动公开宣战的产物。这很可能会回到贸易保护主义。显然，在同英国签订的为期10年的协定到期之后，法国并不打算续约。这是法国追求过度而代价巨大的国际威望政策的终结——至少对于自由派们的美好愿望而言是如此。奥利维埃具有这样一种倒霉的才能，即在不合适的时候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而且这些话还流传了下来：他说道，“我们至少可以让皇帝安度晚年。”这难道不是对皇帝想要退位的一种说明吗？

回归本源

1870年4月20日颁布的最后一项元老院法令完成了议会制帝国的建设工作。这一次人们不再对法律进行修正而是对1852年的宪法进行了决定性的大修改。改革得到了确认并走上了正轨，此外还增加了两项重要的新措施。根据第19条款，“皇帝任命和撤换大臣，大臣们是负责人。”这也正是1814年宪章的原话。元老院成了第二个立法院，亦即贵族院，但因此也就失去了制宪权。“宪法只能根据皇帝的提议，由人民进行修改。”人们认为，普选制并没有回到七月王朝的美好时光。

确实，皇帝的特权依旧存在，而且恰恰是因为普选这一因素，这种特权变得比以往的君王所具有的特权更大更危险。皇帝，以及那些悲伤地看到波拿巴主义的一切均被人嘲笑的主张实行专制的帝国派们，他们要以自己的方式对高奏凯歌的议会制要弄最后的花招。既然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4月的元老院法令也必须经受1870年5月8日的全民表决。这里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似是而非的：“人民赞同皇帝根据1860年的宪法框架提出的自由改革。”谁会不同意那些他们已经赞同的自由呢？如果表示赞同的话，那么就会增加皇帝的特权和权威。对此，共和派表示反对，极左派劝人们投弃权票。自由派则感到不安；梯也尔倾向于投反对票，而基佐则倾向于投赞成票，内阁本身也产生了分化，几个中左派的大臣退出了内阁。但法国

人民则予以积极响应：735万人投了赞成票，153.8万人投了反对票。皇帝欣喜若狂："我又重新获得了这个票数。"实际上，这次投票的结果同1852年一样，超过700万人投了赞成票，反对派失去了一半的票数。左派目瞪口呆，"帝国比以往更为强大了。"

矛盾之处正是在这里——这并非内阁责任制问题，说到底这只是次要问题。议会制的帝国已不再是帝国，波拿巴主义者的政体已经不复存在；但皇帝还在那里，法国人民没有背弃其对波拿巴这一姓氏的忠诚之情。关于皇帝的特权和议会特权之间的争论该如何了结？这是结束还是重新开始？当时尚未对此作出回答。

1869年和1870年："社会年"

然而，一种危险，亦即革命的危险出现了，大选期间，人们曾不无道理地挥舞过这一吓唬人用的"稻草人"。

经过了1868年的短暂平静之后，罢工运动在1869年和1870年卷土重来。它几乎席卷了所有的行业和主要的工业城市。1864年有关罢工的法律颁布后不久出现的第一波罢工浪潮主要出现于巴黎；但现在这一波罢工浪潮则主要发生在外省。起先是1868年底到1869年初诺曼底纺织工人的罢工，继而是1870年阿尔萨斯纺织工人的罢工。1869年6月，中央高原的矿工举行的罢工招来了军队的干预，并造成人员伤亡：1869年6月在里加马里死了13人，同年10月在奥班死了14人。1870年1月和3月，在议长施奈德的"封地"勒克勒佐相继爆发了两场罢工。所有的罢工均以失败告终，因为无论是鲁埃还是奥利维埃主持的政府都决定镇压罢工。但是，这些罢工是工人运动的活力不断加大的佐证。工会组织的不断增加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从1867年到1870年，巴黎成立了70个工会，里昂和马赛分别成立了40个工会。各工会协助建立了地方性的劳工联合会，这亦是30年后的劳工联合会的雏形；1869年初鲁昂出现了第一个劳工联合会，12月巴黎劳工联合会成立；接着，里昂劳工联合会和马赛劳工联合会分别于1870年3月和4月成立。

经过了1868年的诉讼之后，第一国际在法国的影响力曾不断减

724

弱，但它在此时卷土重来，而且这次的势头更猛。1869年，它在各主要城市均重新建立了支部；它们的领导者来自于新的团队，其成员是坚定的集体主义者、共和派与革命分子——在巴黎有装订工瓦尔兰和染布工马隆，在鲁昂有石印工奥布里，在里昂有里夏尔，在马赛有巴斯特里加，后两人均为商行的雇员。较之在1866年或1867年，这些第一国际的成员进一步充当了正在发展中的工会运动的真正推动者的角色。他们到处组建劳工联合会，他们是几乎所有罢工运动的幕后组织者。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很快增加到了不只是某位深感不安的警察所说的数以百计，而是增加到了成千上万人。

不断加强的工人运动在法国政治中的地位让人前所未有地感到困惑。那些第一国际的成员，工人社团的积极分子重新加入到了激进的反对帝国的共和派运动之中。“有人说劳动是受制于政治的，所以我们必须参与政治。”那是蒲鲁东所宣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的年代，但是，此时的工人运动的发展远远超越了温和的改革派的预期。人们看到的是法国的首个革命性的工团主义。工人们想要消灭帝国。他们从心底召唤共和国，它能带来并保证一切政治自由，也可以巩固并实现他们即将获得的自由，共和国将让生产者自己来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因为每个行业的新工会不仅仅被赋予了维护本行业直接利益的任务，它们还想逐步控制工厂和车间，他们相信取代那些剥削人的工厂主是为了让工厂更好地运作。

共和派的接班？

自从1869年大选以来，在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增援之后，激进的共和派的反对派决定乘胜追击。它在议会的演说家，以及越来越多地施加的压力让帝国难以忍受。它还不断在巴黎举行一些复仇性的集会和游行。1870年1月12日，当10万人在罗什福尔和纳伊的带领下，参加因同皮埃尔·波拿巴亲王发生争执而被打死的共和派人士维克多·诺瓦尔的葬礼时，巴黎几乎处在了暴乱的边缘。奥利维埃应当“将革命拦腰抱住”，他在1870年6月下令逮捕了全国各地的第一国际的领导人，并重新解散这个组织。与此同时，他还发现（或是捏造）了一

个威胁到皇帝性命的阴谋，并以此作为囚禁革命领导人的借口。

这是否说明了共和派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准备，革命已经近在咫尺725了呢？不，革命还很遥远！有人已经强调指出，共和派其实是城市中，尤其是各大城市中的旁观者。此外，还需要补充的是，他们只是在巴黎这一富有造反传统的城市里才真正拥有人数众多的革命分子。崇尚武力的极左派和激进的革命分子，即那些人们还以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相称的人，他们纪律严明，意志坚定，但是从数量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第一国际的成员无论是在共和派内部还是相对于共和派的舆论而言，都只是占了微不足道的少数。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多数，甚至在有可能采取激进行动之际也是如此。这些人对于这种可能带来可怕后果的过度动荡以及这种依靠工人积极分子进行的危险的社会计划不无担忧。即便是在战斗的阶段，也无法统一所有人的意见。在此存在着人员或组织之间的对立，例如，布朗基派和第一国际派就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布朗基派指责第一国际派为伪装的帝国分子。从更深的层面来看，恪守旧的传统者和年轻的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前者生活在对 1793 年和 1848 年的回忆之中，后者则怀有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新思想。后者的计划对于前者来说过于“现代”，以至于无法被过于“古典”的前者理解和接受——我们还将在巴黎公社时期看到这一点。

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向战争？

让帝国走向死亡的并不是共和派或社会主义者发动的革命，它是在拿破仑式的最后幻想和冒失中灭亡的。自从萨多瓦战役以来，法德两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就法国而言，皇帝为了平衡德国日益增长的力量而要求俾斯麦进行补偿，以此作为对法国在 1866 年的不确定的中立地位的“小费”，但俾斯麦的拒绝让皇帝感觉受到了侮辱。法国每次都不断降低自己提出的要求，先是提出恢复 1814 年的边界，而后提出归还比利时，最后只要求得到小小的卢森堡。但这一切均属徒劳！于是，法国人开始同奥地利人和意大利人进行认真的谈判，以防止德国有进一步的举动。在莱茵河的彼岸，为对付“世仇宿敌”而把德国人

重新聚集起来，为增强他们统一的决心提供了契机。俾斯麦用尽了一切办法。难道不正是法国阻止了德国的完全统一吗？1866 年和约只允许建立以美茵河为界的北德意志联邦。

当霍亨索伦王室的利奥波德亲王在俾斯麦的提议下成为西班牙王位的候选人时，法德之间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1870 年 7 月 3 日，消息传到了法国，仅仅 4 天前，奥利维埃还宣告——这是他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的又一例证："和平的维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法国无法容忍一个德国人坐在"查理五世的皇位上"，它要求德国撤回这一提名，并于 7 月 12 日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同意。奥利维埃又说，"我们保住了和平。"他确实想要和平，但是，他忽视了主战派的存在，他没有看到那些身处局外的主张专制的波拿巴派正很自然地团结在皇后的身边。他们重新看到了巩固已受到动摇的帝国权威的机会，并力求恢复帝国的真正含义。同以往一样，一场外部的胜利就足够了。身体衰弱的皇帝也认为这不无益处。他们要求普鲁士保证将来也永远不支持霍亨索伦王室成员作为候选人。普鲁士国王威廉满足了这一由法国大使伯纳德蒂提出的过分要求，但是，俾斯麦对埃姆斯电报作了带有侮辱性的解释："陛下拒绝接见大使，并命副官通知后者，他没有任何可与大使交流的。"全巴黎人，甚至是巴黎的共和派，尤其是巴黎的民众和爱国人士都感觉受到了侮辱。立法团不顾梯也尔的反对，投票赞成进行战争。7 月 19 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奥利维埃道出了他最后的不合时宜之语："对我和我的同事来说，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将以轻松的心情接受一项重大责任。我想说的是，即使是将来的悔恨也不会破坏我们的这种心情，因为战争既然是我们选择的，我们也应承受之。"历史会牢记这个爱好和平者将带着轻松的心情来迎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726

法国军队在这最后的关头还是没做好准备。立法团在 1868 年大幅修改了旨在为职业军队建立庞大的后备人员的军事改革方案。普鲁士灵活而现代的战争机器远胜过法国方面。8 月初，三个军的普鲁士军队突破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前线。8 月 18 日，巴赞率领的法军主

力在梅斯被普军包围。在经历了第一波的连续失败之后，奥利维埃内阁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为可以复仇的实行专制统治的内阁。但人们无法忍受这一内阁，因为法国还剩下的由皇帝亲自指挥的军队，竟然笨拙地被普鲁士军队围困在色当盆地并于9月1日投降。当军队溃败和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帝国就崩溃了。9月4日，巴黎的民众在一小群机敏的布朗基派革命者的带领下冲入立法院。由巴黎的共和派议员组成的临时政府在市政厅宣布成立。如同在1830年和1848年一样，外省忠实地进行了响应；里昂甚至早于巴黎几个小时就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在几个月之前还貌似强大的帝国，已不再有任何捍卫者。

五、1871年事件

共和国就这样草草地宣布成立了，专门用来写第二帝国的本章，也许应该在此画上句号。不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就是说已经属于共和时期的巴黎公社依旧得由我们来记述。帝国的债务并没有完全偿清。如此糟糕地进行的这场战争还在延续，而因为指挥不当，法国已经几乎不可能再取得胜利。只是在原则上起来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其保障仅仅是巴黎人民的一致欢呼。在1871年2月8日进行规定的国民议会选举之前，掌权的不过是个临时政府。只有国民议会才能以法国的名义，亦即不仅是巴黎的名义，同时也是外省和农村的名义，在3月1日宣布帝国的真正灭亡。同样在这一天，它还将接受令人屈辱的和约条款，巴黎公社成员的起义是受到侮辱的爱国主义的一场大爆发。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在遭受帝国压迫的年代成长起来的巴黎工人阶级的最后一次斗争。让我们在此暂时信奉马克思说过的这句话："巴黎公社与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防政府

刚掌权的这个班子缺乏团结。首先，它的年龄层趋于老化：11个成员里有7人，即便没有超过60岁那也是年近花甲。另外，它也不够

协调：里面有许多1848年或更早的“老家伙”，如加尼埃-帕热斯、格莱-比祖安或阿拉戈，还有两名在1869年是绝不妥协分子的年轻人罗什福尔与甘必大。特罗胥将军被选为政府首脑，因为他是巴黎卫戍部队的司令。这个来自布列塔尼的军人，如果说他曾经是一个有所保留的波拿巴派分子的话，那么他现在同样不能算是一个共和派人士。这个班子承受着巨大压力，巴黎人在把他们推向权力顶峰之后不久便指责政府卖国，直至当时的某个历史学家曾严词斥责这个“儒勒们的共和国”[①]；不过，这些人当中只有三个人的姓名中带有这个不幸的名字，而且，这一政府内部还包括三名未来的“第三共和国”的政府总理，他们均非等闲之辈。当然，这只是艰难局势下的一种不正常的情形。

这个班子很快就产生了分化。首先出现的问题是它自身的合法性。其中的一些人，如法弗尔，费里等希望立即进行选举，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稳固而强大的政权。甘必大和西蒙则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在如此危急的情形下诉诸选民是不合适的，而且这样的选举对共和派来说也不会成功。几个月之前，法国的农民不是刚刚在全民表决中把票投给了重新获得活力的波拿巴主义了吗？他们准备推迟选举，但这个政府却对于自身的合法性感到担心。它既不是正常的政权，也不敢成为革命的“救国委员会”。“这个政府并不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政府，而只是一个负责国防的政权。”

727

国防？总的来说，政府的成员根本无法确认胜利的可能性。只有甘必大一人相信这一点。10月初，他乘坐热气球离开被围困的巴黎到达图尔，试图在那里发起一场靠不住的外省的抵抗运动。但与之相反的是，临时政府并不愿放弃首都。这是严重的失误吗？或许如此。但令巴黎人无法容忍的是，这个他们刚刚为之欢呼的政府竟可耻地寻找借口。让我们来看看巴黎：尽管巴黎人民的革命热情高涨，但形势却

① 此处的儒勒们系指费里、格列维和法弗尔，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皆为“儒勒”(Jules)。

近乎令人绝望。9 月 19 日，普军越过塞纳河，到达卢瓦尔河，巴黎被团团包围。法国的整支军队成为俘虏。10 月 27 日，巴赞在梅斯背信弃义地不战而降，交出了最后一支法国军队。他们没有等来任何的援助；梯也尔以新生共和国的名义（他能感受到这个共和国的倾向性）向欧洲各国求助，但都遭到了拒绝。政府方面只能停止战斗，但是他们又不敢这么做。普鲁士人的要求过于粗暴，但是，还得考虑到巴黎人民的极端情绪，他们在 9 月 4 日宣布共和国成立的同时也宣布要进行"殊死战斗"。政府消极抵抗，只等巴黎人民弹尽粮绝，放弃抵抗。

应该指出的是，甘必大的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是一种年轻人的热情的表现。他的同僚们带着轻蔑和不安的态度称其为"图尔的专制者"（事实上，他被看作是 1792 年的丹东）。甘必大建立了一些军队，共计 60 万人。军队是在仓促中建立的，因此，这些人也不那么服从指挥。人们不可能强迫他们去夺取胜利。从 11 月到翌年 1 月，相继来自卢瓦尔省的两支大军徒劳地想来给巴黎解围。他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却一无所获！他们还能继续坚持下去吗？看起来这个年轻的保民官并无法得到他所追求的那种民族精神的大爆发。不管怎么说，临时政府没有同甘必大商量，就于 1871 年 1 月 28 日在巴黎向普鲁士投降。

俾斯麦要求由一个正常组成的政府来签署和约。人们将在 2 月 8 日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国民立刻作出了回应，其结果超出了共和派的最坏估计。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想要和平，由他们选出的代表充斥设在波尔多的国民议会，在 650 名当选者中，绝大多数，具体地说是超过 2/3 的人是主和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分子。甘必大的政策被正式否决。有理由等待自己在 26 个省份同时当选的这一天的梯也尔，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权力首脑"。这个在 1870 年最后捍卫和平的人，却参加了就这项灾难性和约的条款进行的谈判，并于 5 月 10 日在法兰克福最终签署了这一和约。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区。而且只有在法国偿清了 50 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后，普鲁士军队才会从法国撤军。

城市

但巴黎对此并不表示认同。巴黎是法国的首都，是她的“头脑和心脏”，正如一首古老的诗歌所说的那样，“巴黎是独一无二的”，很久以来她都一直决定着法国的命运。她发起革命，然后由外省跟着响应。这座在人们看来过分骄傲的城市，即将接受其悲剧性的惩罚。

巴黎在19世纪成了名副其实的“怪物”，它是生长在法国上面的一颗巨大的寄生毒瘤。历史学家谢瓦利埃向我们展示了这座城市在19世纪前半叶如何疯狂地生长，以至于问题丛生，积重难返。巴黎在1801年的居民人数为55万，到1850年左右竟然超过了100万，人口的过度增长与狭小的城市空间显得极为不相适应。总是大量地涌入这座城市的“劳动阶级”的可怜之人，趋向于同“危险阶级”的犯罪分子们混在一起，后者不仅存在于资产阶级见证人惊慌的头脑之中，也存在于确实是病态的现实之中。这种现象在1830年或1848年的革命动乱中并不罕见。即便这一说法有几分夸大，但这个城市绝对是病态的。尽管奥斯曼省长为此采用了“猛药”，但这种疾病在帝国时期还是在不断恶化。从1851年到1856年，巴黎及其近郊增加了25万人。有如中风病人的这座城市的病情继续在恶化：1860年，巴黎将其近郊并入市区；及至1870年，新巴黎的人口已接近200万。

728

在此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事实。奥斯曼已经对老巴黎的中心城区进行了治理，尽管他采取了一些外科手术般的措施，但新移民还是不断涌入巴黎，在这一过程中，此前初露端倪的不同群体之间的隔离，时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富人们依旧住在中心城区，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人民则总是被赶到郊区。从此以后，中心城区将被革命力量所包围。有句老话说得好，“把胖的和瘦的分开是不好的。”而一位同时代人则写道：“人们在巴黎内部建立了两座截然不同、彼此敌对的城市，一座是奢侈之城，另一座是悲惨之城，前者被后者包围……在这里，我们让各种诱惑和贪欲相互争斗。”居住在蒙马特尔和贝尔维尔的平民，确实对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富人构成了威胁。“从贝尔维尔路过”，这是让资产阶级感到恐惧的事情。“巴黎公社”在一

定程度上意味着那些被赶到郊区的人重新夺回了巴黎的中心，亦即真正的巴黎。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平民，什么样的民众呢？在 1866 年统计出的 180 万居民中，有超过 100 万人靠赚取工资为生，其中有 73 万是工人。在 37 万名雇主中，有一些是小企业主，我们很难把他们和他们的雇员区分开来。在 12 万靠房租生活的人中，又有多少人也因为贫穷而被归入穷人之列呢？这些人不属于无产者。大工厂、大制造车间并不多见，普遍存在的乃是中小型作坊。而且，从事传统行业的人占了大多数：从事服装业的人员有 30 万，建筑业有 16 万，卖艺为生者有 16 万，而从事金属冶炼业者则差不多有 10 万。不过，手工艺人已不复存在，他们都已成了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人们已经看到了巴黎工人组织的力量和活力。

被包围的城市

病入膏肓的巴黎发觉自己即将陷入一种特别的境地。当时担任巴黎市长的费里在"沦陷的疯狂"中看到了一丝起义的理由。这种解释不无理由：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巴黎无论是在物质和心理方面均与外界隔绝，巴黎物资匮乏，许多人遭到饥饿的威胁，死亡率是平时的三倍。但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最早向巴黎袭来的热情是爱国主义的热情。人民拿起了武器，并加入到政府原先不允许有大量平头百姓加入的国民自卫军中。人们组建起了 250 个营，但政府在尽可能地避免调用他们，因为对于力图维持秩序的政府来说，武装起来的城市始终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过，在国民自卫军中所弥漫的只是一种战胜敌人的狂热气氛，人们试图冲破普军的封锁"突围"。这又再度让人想起了大革命，想起了 1792 年的那些名词：群众起义、救国委员会、胜利的组织、如果有必要就采取恐怖措施。不久，"公社"一词也冒了出来。

借助 9 月 4 日的事件，革命力量再次得到了组织。每一个区都有革命分子的俱乐部，这是一次言论自由的大释放。从 9 月 5 日至 10 日，在第一国际的积极分子、激进的革命派和雅各宾派的推动下，巴

729

黎的各个区都建立了“警惕”委员会。随后，这些委员会又建立了“20 区中央委员会”。9 月 15 日，该委员会提出了一项纲领：与普军战斗到底，直至取得胜利；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民主和社会的政府；眼前，该委员会则通过定量配给和征用的办法来平均分配基本的生活用品。

人们并未从一开始就如此怀疑政府，它的种种举动都是为了帮助政府，即便是布朗基本人也号召各党派捐弃前嫌，以便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激进的爱国人士注定更为“警惕”。政府很早就显示出其在国防方面的热情不够。它尤其反对选举产生一个巴黎的市政当局，因为后者很可能会摆出另外一个政府的架势，会变成 1792 年和 1793 年时的“公社”，以革命的方式对常规的议会施加种种压力。谣言四起：有可能是中央委员会先采取行动，各俱乐部随之响应。市政当局，或者说是公社已不再是一个“临时政权”，它是一个直接来自于人民的政权，并将取得胜利。它的力量同时既明确又模糊，而且它还承载着下层人民的各种含糊不清的社会期望。

但是，人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围城期间革命者的听众是何等稀少。9 月是他们的幸运月，在此之后，除了几个革命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他们的力量在不断减弱。鉴于对临时政府中的“投降派”越来越公开的意图感到担心，这些爱国人士试图在 1870 年 10 月 31 日将它推翻。贝尔维尔动手了，但巴黎并未随之跟上。与之截然相反，政府在 3 天后成功地进行了全民表决：反对者刚刚达到 6 万人，而支持者却多达 30 万人。于是，政府可以同意在 11 月初进行市政当局的选举。选举并没有产生公社，革命力量只在 4 个区获得了胜利。之后，革命力量进入了枯水期，俱乐部的活动进展不顺。翌年 1 月初，中央委员会徒劳地通过第二次发布的红色布告，充当企图夺取政权的“代表团”。该份公报宣称：“席位归于人民！归于公社！”但遗憾的是，他们在第二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亦即 1871 年 1 月 22 日遭到失败。上述的一切证明，在巴黎确实存在着一个革命“派”，但是，它只是一个没有多少人马的指挥部。“公社”一词应运而生，并在巴黎被围期间缓慢

地传播开来。但是，公社并非诞生于巴黎被困期间。

反叛的城市

战争的失败将引发起义，这直接对共和国构成了公开的威胁。此时的费里是一个头脑清晰的见证人："每个人脑子里想的都是战争，而这场五个月之久的斗争却通向一种巨大的欺骗，全体法国人都陷入了其根本不会想到的最大的幻觉之中。"1月28日的投降把巴黎搅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国民自卫军战士，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人民大众都感到义愤填膺，接着又传来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投降派和君主派人选国民议会。整个巴黎都把选票给了共和派——最先当选的那些人是路易·勃朗、雨果和甘必大。有人传说奥尔良亲王刚刚返回法国，尚博尔伯爵正在准备即位。先是战败，继而是复辟，这同1815年别无二致。于是，巴黎准备发动起义。

领导这次起义的并不是巴黎被围期间的革命组织，而是一股在2月选举的动荡时期崛起的新生力量——国民自卫军各营联合会。这股新生力量自发地从人民中产生，后者包括工人、工匠、窘困的小资产阶级，因而都属于爱国的共和派。始自2月中旬，每个营都选出了各自的代表，以便更好地适应联合会组织的章程，该组织的纲领简单而坚决：法国只能是共和国，共和国至高无上，甚至高于普遍选举。3月，开始选举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将成为联合会的领导机构。

730

巴黎沸腾了。国民自卫军的各个营每天都相继来到巴士底广场，既为了表现共和派的愤怒，也为了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中牺牲的革命分子。第一国际，另一个中央委员会，也就是巴黎20区中央委员会，对于这一竞争者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轻蔑之情，但最终亦同意加入到他们之中。国民议会拒绝留在首都，而是迁到了凡尔赛。这一为了"国王们的城市"[①] 的利益而取消巴黎首都地位的做法，对巴黎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冒犯。此后，任何一个轻微的事件都会引发一场剧烈的冲突。

---

① 此指凡尔赛。

由此，发生了1871年3月18日的事件。

3月18日

事实上，梯也尔的政府试图结束这样的局面。对他来说，威胁首先来自依旧处于武装状态的巴黎，后者以受到威胁的共和国的名义顽固地拒绝解除武装。国民自卫军的装备很差，只有227门大炮，分别存放在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卢森堡公园一带，他们小心翼翼地看守着这些大炮。3月18日凌晨，梯也尔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准备不足，部队在执行任务时缺乏积极性。人们，尤其是妇女，在蒙马特尔高地公园对军人们进行劝说，士兵们遂拒绝作战。蒙马特尔人抓获了两名将军：勒孔特和克莱蒙·托马斯，并立即对他们执行了枪决。人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这次快速执行的任务的负责人是谁：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叫民众。

这本来只是一桩严重的突发事件，但到了白天，它已演变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事件。战鼓声响彻在各个工人区，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暴动。政府迅速撤出巴黎，逃到凡尔赛。在这一政权突然撤出巴黎后，巴黎只剩下一个机构能够恢复一些秩序，控制某些局面，这就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它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3月18日成为了巴黎的主人。

人们谈论着这样那样的阴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一直受到阻碍，它甚至还没有最终得到建立；它的成员中只有少数人参加了3月18日的事件。同9月4日一样，只有布朗基主义者在起义中按照既定的方针采取了行动。他们知道要通过参加起义来控制政府刚刚丢弃的重要中心。那么，梯也尔是否真的老谋深算，其离开巴黎只是为了更好地夺回并征服巴黎呢？这位小个子男人成了一个传奇，他以自己的军事艺术自夸，并在随后的日子里让人们相信了这一点。更为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一度出于恐慌，不顾其多位同僚的强烈反对而仓皇出逃。他没有预料到首都会产生如此剧烈的变动，尤其没料到军队竟然会倒戈。

3月18日的事件并非一场革命，充其量只是一次起义，中央委员

会在其出乎意料的胜利后不久所处的困境，也只能说明这一点。接着开始了奇特而不确定的一周。巴黎赖以生存的中央委员会勉强占据并管理着被丢弃的行政和内阁机构。但是，它强调自己“并非一个政府”，似乎只是在不停地为当前的困境寻求一种合法的解决办法。人们通过巴黎的一些区长和议员同凡尔赛方面进行谈判。巴黎只希望共和国获得正式的保障。它只要求进行市政当局的选举（也可以说是“公社的”选举，两者的区别似乎不大），但要求拥有“可靠的市镇特权”。经过长期而混乱的讨论之后，选举定于1871年3月26日举行。这些选举最终确立了“公社”。

巴黎公社

731　在47万名选民中，只有23万人参加了投票。2月，投票人数曾接近30万：这大大超过了1870年11月3日全民公决时的人数。即便我们把巴黎解除包围以来那些富人区选民撤离巴黎的因素考虑在内，较之2月的选举，此次选举中未参加投票者仍颇为可观。此外，这23万票并非全部投向公社的成员，有18名“资产阶级人士”当选，但他们拒绝就任。巴黎公社的当选者只代表了巴黎人口的一半左右。

其他所有当选者几乎都属于在围城期间无法达到自己目的的各革命组织，并且主要属于20区中央委员会。这些人包括雅各宾派、布朗基派以及热情的革命者，在革命完成之后，他们并没有想要停下来。布朗基不在他们之列，在3月18日的前几天，这个永恒的“坐牢者”再次被关入监狱。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几名第一国际成员，这些人的存在可能使这次冒险具有更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

由此，人们正走向冒险。刚刚选举出来的公社的性质究竟如何呢？仅仅是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巴黎市议会吗？还是一个与凡尔赛政府对抗的“唱对台戏的政府”呢？从一开始，公社委员会就摆出一副政府的姿态，并任命了类似于小型内阁的各个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司法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甚至还有外交委员会，而且，同1793年一样，还建立了救国委员会。但是，公社委员会难道不仅仅只是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吗？事实上，公社不得不，而且也希望同时承担起各种职责。

它担负起了首都的市政管理职能。与此同时，它自认为是一个“临时”政府，根据既定的事实，以“真正的”共和国以及等待“真正的”选举的名义，否认了叛逃到凡尔赛的议会及其伪政府的权威。在2月份受到愚弄的法国要当机立断；巴黎，这个总是把法国引上正确道路的城市，很清楚自己的权利。

自由的城市

但是，在此期间，一个只统治着一个城市的政府究竟算什么呢？即使这个城市是巴黎。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势下，某些人——蒲鲁东派的社会主义者——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支持。不久前，蒲鲁东派的导师还宣扬过联邦制，废除中央集权，把法国分成很多个同样大小的自治市镇[①]，然后让这些市镇自由结成联邦。“自由的巴黎”——这是当时的一句口号——是否是“公社”的首创，从而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作出榜样呢？这一蒲鲁东式的辩解首先体现在公社的宣言，尤其是4月19日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巴黎需要的是什么？公社的完全自治，并扩展至法国的所有地区……巴黎的公社同依附于契约的其他公社一样，只有有限的自治权，公社的联盟将确保法国的统一性。”最大的悖论是马克思从他的死对头那里借用了巴黎公社，并通过巴黎公社确立了他认为有必要废除国家的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对各类事件的评述中不断得到发展。

法兰西内战

这些理论架构显然不对大多数雅各宾派成员的口味，对后者来说，革命首先是回归1792年和1793年的传统，建立国民大会，在“救国委员会”无情的决心的鞭策下——必要时实行专政——把巴黎和法国引向革命的胜利复兴。这样，巴黎人就会发现，共和79年的共和国的公社成员同共和二年的无套裤汉同样充满热情。种种矛盾就来自这里——所有宣言中最富有“联邦主义”色彩的宣言最后都一成不变地

① communes，一译“公社”。

732 以高呼“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万岁！”——这有多么地不和谐啊！

这个奇异的公社，说到底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那么它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当然，它“首先想到的是自我防御”。4月2日，凡尔赛方面已经发起了反攻，巴黎面临着再次被包围的危险。不过，它还是再次受到了围困。巴黎公社首先要确保共和国的巩固。巴黎公社此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后来在第三共和国时期都得到了实现：政教分离，世俗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接着，公社迅速解决了压在巴黎人民头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决定着他们是否会成为无产者。对小商人来说，他们长时间没生意可做，他们希望到期的票据可以延期支付。对于大量的贫穷的租户来说，他们希望取消自1870年9月以来的所有欠租。对于赤贫的人来说，他们希望能够免费归还抵押在当铺里的物品。公社成员是社会主义者吗？马克思给了我们否定的答案：“除了他们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某个城市发动了起义之外，大多数的公社成员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但公社曾有过这方面的想法。且不论公社禁止面包店在夜间工作——这是一种不得人心的举措——或取消车间的罚款制度，教育委员瓦扬提出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计划，尤其是劳动委员会的紧张活动，受到了第一国际成员的推动，并与正在迅速恢复的工会存有联系。根据劳动委员会的要求，公社在4月16日发布了一项法令，将逃离巴黎的工厂主所丢弃的工厂“置于公社的管理之下”，并交由工人联合协会组建的合作委员会管理。不过，人们只来得及让十来家工厂如此运行。第二帝国垮台以来工人社团提出的“工会化”，以及自行管理生产资料的纲领，开始得到实施。

血染的城市

显然，冒险只是导致了最为悲壮的失败。首先，公社成员内部就不团结。随着凡尔赛军队的迫近，“自由法国的自由巴黎”这一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人们心头变得模糊起来，它只是几个空谈家的幻想罢了。雅各宾派的声音总是在公社大会内部占据优势，它以为，凭借昔日的响亮口号，可以奇迹般地祛除危险。但在1871年，这类建立能够“决

定胜利”的救国委员会之类的口号，已不再具有当年的号召力。公社大会此后分裂成“雅各宾”多数派和社会主义少数派，前者徒劳地匍匐在昔日的偶像前，后者虽然意识到这另一幕滑稽剧中可笑的虚荣，但它的表现也不见得好，而且巴黎人民也没有追随它。

但是，特别要指出的是，当公社方面所能支配的只有国民自卫军的队伍，而公社负责军事的所有代表，甚至连参加过起义的爱国志士罗塞尔也无法让这些军队服从纪律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有效地抵抗耐心地聚集在巴黎城门之外的梯也尔的大军呢？巴黎公社之所以注定失败，尤其得归因于它仅仅是“巴黎的”公社。外省的农民对公社感到恐惧和憎恨，因为公社的成员很容易被看作“平分财产的人”。几个城市发动了起义，里昂、马赛、纳尔榜、图卢兹、勒克勒佐等地建立了公社，但都是昙花一现：别处的运动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运动，还不如说是激进的共和派运动。过于特立独行的巴黎孤军作战，由于它走得太远了，所以无法再引导法国。这座城市刚刚丧失了自1792年以来一直行使的至高无上的革命“领导权”。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19世纪法国的最后一次革命。

镇压是残酷的。5月21日，凡尔赛方面的人进入了巴黎，战斗一直延续到5月28日。在流血周的那八天当中，我们很难说这一周如此漫长究竟是因为公社成员抵抗程度之激烈，还是因为凡尔赛的军队故意拖长了镇压的时间。死亡的确切人数将永远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不会超过3万人。有4万人被捕，其中有1万人被判刑，绝大多数获刑者被流放到了新喀里多尼亚，其中很多人在那里一待就是10年。

733

军事法庭为被逮捕者所建立的一些统计数据，可以让我们对1871年的起义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起义者主要是工人，但也有其他职业的人：被逮捕者中有8%为雇员，8%为小企业主、小地主以及自由职业者，5%为佣人，但短工（15%），粗俗的建筑工人（16%）和有文化的冶炼工（12%）构成了巴黎公社战士的主体。无论是从职业来看还是从他们的劳动方式来看，他们并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但从数量来说，他们远远超过了巴黎的家具匠（8%），裁缝（8%）

和各种手工艺人（10%），反过来，在起义时，公社从这些人当中招募到了数量最多的干部、军官和士官。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巴黎的工人阶级的构成：巴黎公社运动正是一场工人阶级的起义。

这一血淋淋的创伤对法国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对于一代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言，他们的内心蒙上了某种残酷的空虚感，终身忍受记忆的残酷煎熬。从长期来看，某种强烈的憎恨把受害者和刽子手断然分开，即将诞生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不是革命的，否则将是对1871年的牺牲者的背弃。社会主义者恰如其分地编造了公社的神话，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者的第一次革命。此言有失偏颇。巴黎公社起义，它只是骄傲但又是孤独地起来对抗共和国所有敌人的一座城市中的激进共和派的起义，公社成员几乎没有时间成为社会主义者。

六、20年帝国之后

大政治家经常会搞错，他们所犯的错误也不在少数。巴黎公社让马克思看到了国家这一不可思议的社会的早产儿的灭亡，他相信他所憎恨的帝国就是国家最坏与最后的体现，但国家还是取得了胜利并存活了下来。1871年的起义同样为公社的信奉者提供了光彩夺目（和神话般的）榜样。托克维尔的辩证法在此再次被颠倒过来；这一次战胜既民主又专制的平等的竟然是具有保守色彩的自由！人们觉得似乎是回到了20年前：帝国推翻了一个它所接替的秩序共和国。同样，路易·波拿巴也让那些重返政治舞台的政治力量相形见绌，后者包括那些梯也尔们，奥尔良派，正统派和信奉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普瓦提埃大街的老人们”。帝国难道只是一个漫长的“空位期”么？但是，辩证法表明它绝不仅限于此。在这20年中，无论人们是感受到了还是没有感受到，很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变化。

经济和社会的变迁

人们不久以前将法国的“工业革命”，或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

"法国的经济起飞"置于第二帝国时期。这几乎不再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经济模式：法国经济在整个19世纪是渐进地发生演变的。近期的一些经济计量学数据表明：和人们想当然地作出的评判相反，第二帝国并不是19世纪中法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它的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之前的数十年——它的年增长率大约在1.5%，而前几十年的年增长率则有2.5%。

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但是，这些数字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事情的全貌。经济就总体而言，或许其增长的速度要慢一些。但是，法国最现代的一些部门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它们发生了翻天覆地 734 的变化。它们所取得的进步可谓极为惊人！1847年的煤产量超过了515万吨，而1869年则达到了1351万吨；1847年的生铁产量为59.1万吨，1969年达到了138.1万吨；与此同时，尽管出现了棉荒，棉花消费量从1847年的不到6万吨，增加到1969年的近12万吨。这绝对是巨变！1845年法国使用焦炭和木柴的高炉分别为79座和353座，到1869年这个数字变为199座和91座，此后90%的生铁是通过焦炭高炉产出的。据统计，1847年法国工业界有4835台蒸汽机，共计61360马力。1870年则有27088台蒸汽机，达到了33.6万马力。在冶金业和纺织业，机械化和行业集中度的发展依旧十分迅猛。在1847年，400多台高炉共产出59.1万吨的生铁，及至1869年，不到300座高炉就产出了138.1万吨生铁。1862年，鲁贝－图尔宽的29家纱厂平均每家拥有9000个纺锤，到了1869年，这个数字已成为1.8万。同样是在鲁贝，据统计，1863年有3900家纺织厂，到1869年则达到了1.2万家。这只是我们在帝国时期所看到的普遍现象中的个案，在今天，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工业的工业化"。当然，手工业和小工业企业远未消失，巴黎就是最好的见证。在各地（自由交换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大型的现代化企业超过了小型的传统企业，城市的劳动力（尤其是在纺织业）比农村劳动力更赚钱，工厂（尤其是在冶金业）比作坊更赚钱。并不唯独工业如此。在商业领域出现并增加了许多大商店：在巴黎，1853年出现了"便宜"（Bonmarché，或"廉价"），1856年

出现了“美丽的女园艺师”（La Belle Jardinière），1865 年则产生了春天百货。法国的现代银行网络不仅遍布巴黎，而且扩展到外省，这些网络曾经是各地极度缺乏的。佩雷尔兄弟的出色冒险或许在 1867 年就不完美地结束了，但是一种年轻的，充满活力的银行又出现了。虽然它比原来的银行更为谨慎，却比后者更有魄力。这类银行分别是 1863 年亨利·日耳曼兄弟成立的里昂信贷银行，1864 年成立的兴业银行。此外，这些银行还建立了全国和地区性的网络，加速了资本和货币的流通。1851 年时，法国仅有 3552 公里的铁路，现在则达到了 1.75 万公里，它把全国的市场连接了起来。即便是农业部门也发生了缓慢的变化：单产得到了提高，收成的地区性差异减少，各地区的农产品开始朝专门化方向发展。某个计量经济学家曾否认了法国经济的“起飞”，强调了法国经济从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减缓，不过，他仍然为在帝国时期的经济复苏恢复了声誉：“这个时代的工业化进程规模空前……信贷、交换、生产及消费组织等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正是在那个时期，大工业开始走在了小企业的前面。”那么，为什么不简单地把它归于经济革命呢？

哪些人在这些转变中获利呢？考虑到各阶层、各部门以及各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我们应该再次强调这一帝国时期的繁荣的民主特性。首先，帝国或许是那些巨大利益的一次盛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年份可以超越它：它是煤炭、钢铁冶炼、银行业利润的一场盛宴，近期的一些调查可以让我们推测这或许是各行业的一次盛宴。马克思写道，“摆脱了政治顾虑的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了一个它未曾料想的发展阶段。它的工商业达到惊人的规模，金融欺诈因世界性的豪宴而欢呼雀跃。”如果说大资本在无节制地膨胀，小业主也从中“受益”，而不仅仅只得到些残羹剩汤。人们曾长期争辩，且在今天仍在争辩工人物质条件的演变状况。人人都在谈论贫困化，但是往往很夸张，且证据不充分。从最坏的情况来看，生活成本的增加抵消了工资水平的增长，这是显而易见，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新事物。此外，人们往往忘记了这

735

样一些事实：就业变得更为充分和确定。在人口众多的巴黎，三分之二的巴黎人领取工资，人们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在七月王朝的末期，巴黎人在经历了长期而缓慢的食物短缺之后，巴黎每年人均消费60公斤肉，120个鸡蛋，7公斤黄油，不到100升的葡萄酒；在帝国末期，巴黎年人均消费量为75公斤肉，156个鸡蛋，8—9公斤的黄油，差不多200升的葡萄酒；相反——但这也是其生活水平改善的另一个特征——面包的消费量从190公斤减少到150公斤。我们在外省看到了同样的消费水平的变化，只不过幅度更小一些。的确，并非一切都十分完美：仍有人惨死在里尔地窖的“石头顶板”下；库波最后到了医院里，而热尔韦丝则得到街上出卖色相。但是，尽管工人们还有许多怨言，但他们却恰恰生活得更好了，他们无论是在法律上、物质上还是身体方面均变得更有保障或强壮了，很难说还存在着“贫困化”的局面。

那么对于人数众多的农民来说又如何呢？大量的事实表明，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至少物质方面的痛苦减少了很多。农民们在吃、穿、住等方面都得到了改善；皮鞋出现在了木屐边上，石板房和瓦房取代了茅草屋。文盲的人数不断减少。农民们的购买力增强了，农村人口的出生率也下降了。零工的工资有所提高，以至于大地主对此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或许是因为城市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缘故吧。只有劳动力的人买上了一块园地，一小块葡萄园或其他土地——地产民主化了，或者说，农村短工“去无产化”了——虽然范围有限，但仍不可忽视。在并不那么重要的卢瓦-谢尔，一个同其他省份类似的省，杜波估计在帝国前后，那里任何一个种植谷物的农民的收入差不多都翻番了，葡萄种植者的收入甚至还要多一些。佃农的收益也超过了100%，不过，靠地租过日子者、自己不耕作的地主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享受特权的人，其收益却只提高了40%。这都是一些地方性的数据！它们不仅更加可靠，而且肯定可以更好地（通过细节）反映出农村发展的总趋势。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农民们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了更多的收益，地位也得到了巩固。帝国兑现了——或者说

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帮它兑现了——其曾许下的造福人民的诺言。

一场无声的政治革命

我们将和托克维尔一起预测专制民主对自由的毁灭。1851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一文中进一步确认了他的分析，并明确指出了这一点。那些相同而平等的人，彼此互不相识，委身于一种巨大的、能提供保护的政权，这些人就是农民。他说："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群体，他们境遇相同，但是彼此之间却如同一盘散沙。一小块土地上住着一户农民和他的家庭，另一块土地上则住着另一个农民和他的家庭。法国的民众由有着共同的伟大名称的普通人组成，就好像一个装满土豆的袋子构成了一袋土豆一样。数百万的法国农民生活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之下：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兴趣和文化使之成为一个阶级，并与法国社会的其他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民之间所建立的只是一种地方性的联系，他们在兴趣方面的相似性并没有使他们建立任何的团体、国民联系或政治组织，这就是为何他们不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来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却需要找其他人来代表。与此同时，736 他们的代表似乎成为了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上级，成为了某种绝对的政府力量，这些人保护他们使之免受其他阶级的侵害，但同时也对他们作威作福。"两个政治伟人[①]之间的那种一致委实令人钦佩，正是有鉴于此，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波拿巴主义的真正基础以及它得以成功的真正原因。

但是，以往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历史并不会就此停顿。帝国的专制主义既不是国家的最终形式也不是自由的最后化身。帝国也是人们可以称之为"农民们的无声革命"的时代。城市很久以前就最终信奉了民主与共和制，但我们却很难察觉到农村，这一帝国的支持力量，已经在步城市的后尘，而帝国，无论其违心与否，亦并非不在乎这一点。尤其在中部，我们更是可以在1847年的选举中看到这一现象，那

---

① 此指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

里与其说是“红色的”乡村，毋宁说是“共和派的”乡村。结果就是蛊惑人心的波拿巴式的民主得以并非在表面上争取到了这些人的支持。不过，这种支持只是暂时性的，除了个别例外（例如在热尔省），这些乡村很快又回过头去支持共和派。但在别处，在卢瓦尔省北部和阿基坦，农民们还没有那么快成熟。帝国意味着小产业者的兴旺，文盲人数的下降尤其是普选制的正常实施，这一切都在缓慢而明显地发展着。当然，普选制已有一点走样和贬值，以至到最后时刻，还是全民表决的诡计起了作用。不过，我们注意到民众的参政热情提高了，这标志着法国民众尤其是农民参政意识的成熟，法国人已承担起通过选举来表达意愿的职责，弃权人数的不断减少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把全民表决的人数考虑在内的话，1852 年的弃权率为 36.7%，1857 年为 35.5%，1863 年为 27.1%，1869 年则为 21.9%。此后，弃权率就几乎没有超过最后的那个数字。选民们慢慢地在政治生活中得到训练。不合常情的是，波拿巴式的官方候选人制度本身竟然起到了某些教育作用和积极的作用。人们应当还记得莫尔尼和佩尔西尼所操心的事情，为了使波拿巴主义更好地扎根于农村，省长们以把传统的地方显贵和旧派别的小官员们拉下马来为己任，使后者都像其主子一样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特权。波拿巴主义——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群众基础——在得到巩固的大革命的传统之上确认了“人民”这个概念。尽管农民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对政治漠不关心，但是，他们还记得大革命给他带来小块土地的好处，这就使他能够感受到这种大众式宣传所带来的兴奋感。雷蒙对这一现象作了精彩的描述：“波拿巴派在农村的胜利，是农村的微不足道的民主对外省的权贵寡头政治的一次反叛。把选票投给官方候选人，或许就意味着投票反对贵族和神甫；听从省长的建议并不是农民的一种依赖性的行为，相反，它表明了农民摆脱了数个世纪以来对他们的政治控制。”农村的波拿巴主义有时候有些左倾的味道，比如在中部，但有时候的政治倾向则更为模糊，如在卢瓦尔省北部就是如此。各种地方性和地区性的调查表明，帝国时期是“显贵的终结”的时代，我们可以在 1871 年后，

从农村这一政治建筑的最底层来确认这一现象达到了顶峰。"大众的选举发生了关键性的变化；你所见到的不再是一群目瞪口呆的人，他们一会儿把选票投给帝国，一会儿投给共和国，一会儿又投给教会……他们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达尼埃尔·阿莱维）。是的，事实上，他们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帝国时期，这一群被称为农民的人，缓慢地或难以觉察地，完全地或不尽完善地把自己从政治奴役中解放了出来。这一演变是悄悄地，隐隐约约地进行的。在 1870 年 5 月，他们仍满怀激情地把选票投给了波拿巴派；1871 年 2 月，他们又严重偏离正轨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以为他们将像过去那样，重新回到旧的显贵的庇护之下。但是，在经过了 20 年之后，他们毕竟已经长大。对于刚刚诞生的共和国，他们确实尚未始终、处处和完全地做好准备，但是，他们是可资利用的力量，只是其前提是共和国给他们保留了权利、秩序、繁荣和发言权，也就是帝国曾向他们许诺并赋予了他们，而且他们还希望能继续保留的一切，共和国不久将做到这一切。

737

帝国已经垮台，但是，它留给接替它的共和政体的并不仅仅是该予以否定的东西。从 1870 年 3 月以来，自由派们拥有了他们所期望的议会制政体，梯也尔也重返政治舞台的前台。自由派从未承认也不理解普选制，但是，人民的意愿今后将迫使他们接受普选制并向它低头。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平等和自由将"言归于好"。



第二十五章　第三共和国

738

1871—1914 年资产阶级民主的孩子

在确保帝国得到了绝大多数人拥护的 1870 年 5 月 8 日的全民投票过后不久，所有的法国人，包括最狂热的共和派都确信，帝国已经固若金汤。然而，四个月后，帝国却让位于共和国。这一作为权宜之计的推出，且在初期饱受严重威胁的共和国，实际上却持久地存在，且几乎持续了四分之三个世纪。

新生的共和国在其初期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她是由一个君主派占多数的国民议会建立的，这个多数派因其内部过于分裂而无法建立复辟王朝。在经受了战败的屈辱和阿尔萨斯、洛林的割让之后，共和国还得面对内战，即面对巴黎公社起义及其对它的镇压。为了确保秩序和重建国家的权力，梯也尔确立了一种专制政体。共和国的真正价值要从 1879 年开始才真正显现出来。在重建了公众自由和世俗教育之后，儒勒·费里的政府致力于殖民地的扩张，以此显示蒙受了战败的法国依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第三共和国逃过了布朗热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巴拿马丑闻事件的影响，在经历了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分裂之后，她度过了 20 世纪初最美好的时期，这一时期直到 1914 年才结束。

739

一、新政体的出现和建立

认为第二帝国是被推翻的说法并不确切，帝国是在色当之败引发的风潮中灰飞烟灭的。

诞生于战败的政体

人们习惯上所称的“9月4日革命”几乎难以看成是一场革命。皇帝沦为战俘，皇后遭到众人唾弃，王子年幼无知，议会摇摇欲坠，帝国自身难保。虽然共和国已按照传统的要求在巴黎市政厅宣告成立，虽然一个临时政府已经组成（其成员为在塞纳省获选的共和派人士），但这一政府仅仅拥有国防政府之名，因为，当时的当务之急并非赋予国家一种新的政体，而是保护她免受普鲁士的入侵。诚如某个历史学家所言，九·四事件“与其说是一次出生，还不如说是一次死亡的见证”。事实上，巴黎，或者更确切地说，某一部分的巴黎人，再次在没有与法国的其他民众商量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了他们。

如果说共和国的宣布成立是一种自发的政治意愿，还不如说其是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导致的后果；与其说是某种有意识的行动，毋宁说是某种偶发性的事件。新的领导团队中最优秀的“政治首领”甘必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有必要大力巩固新政体。他在国防政府中获得了内政部长的要职。在他看来，这一职位能够让他控制行政和警察系统，从而巩固共和派的这一脆弱的胜利果实。正因为如此，他迅速物色了一些忠实的共和派成员出任省长，并要求把原先确定的选举推迟到新省长任命之后，以便有足够的时间为选举作准备。

军事形势的恶化让甘必大得以展现他的能力和精力。从1870年9月底他担任战争部长开始到停战协定签订（1871年1月28日），甘必大竭尽全力说服人们为国家的利益效劳。对于他来说，只有一次军事上的胜利，一次新的瓦尔密大捷，才能不仅让法国摆脱普鲁士的侵犯，而且还能够让共和国最终深入人心。但是，临时采取的防御措施的失败，让这一希望终成泡影。

一个让人恐惧和有争议的政体

在1870年底，共和制实际上远非大多数法国人所希望建立的政体。首先，当时在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实行共和制。欧洲大陆仅有的共和国是安道尔共和国、圣马丁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在时为19世纪末的当时，谨慎者会认为，共和国只适合于蕞尔小国。那些最博学的人则使人们回想起希腊的城邦，或者是中世纪时期意大利的那些共和国，而这些记忆总是不那么令人安心。

而且，尤其是对大众而言，共和国的形象还是停留在第二共和国的形象上——这个共和国因无法走出导致它产生的危机而声名不佳，除此之外，第一共和国的形象亦不是很好。人们担心恢复共和国是否会出现另一个“1793年”，是否会招致新的罗伯斯庇尔式的专政和新的大恐怖？对很多人来说，共和派几乎等同于“嗜血者”。

此外，这一让人感到害怕的政体从一开始就受到革命团体的威胁，他们不断抗议，并于10月5日、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多次试图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在10月31日的事变中，政府成员甚至还一度成了阶下囚。战争的延长为这种动荡的局势提供了合适的土壤——740 而自从甘必大在招募军队方面受挫以来，战争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令人绝望。国防政府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故此，它从1月22日开始就同对手进行谈判。1月24日，俾斯麦接受了巴黎方面的乞降，并同意签署一项停战协定，该协定将允许法国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以便产生能代表法国签订相关和约的新的国民议会。停战协定于1月28日签订，国民议会的选举则定于2月8日举行。

1871年2月8日的选举表明，选民中的绝大多数人对共和制不以为然。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省份当中，共和派和保守派（亦即君主派）的候选人均在分庭抗礼，但后者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尤其是在农村。的确，由于属于君主派的候选人公开地宣称赞同缔结和约，他们获得的选票或许更多地可归因于他们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的意愿，而不是恢复君主政体的意愿。尽管如此，共和派的候选人虽然一般避免在缔结和约还是继续战争的问题上公开表态，但他们却高调宣布其支持

新的政体。他们在新议会中只获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共和制看起来只是少数法国人所希望的政体。

恐惧的蔓延：巴黎公社

2月12日在波尔多召开的国民议会须完成其所由产生的任务，这就是缔造和约。在简短的辩论之后，3月1日批准了和约的预备性条款：向德国割让除贝尔福之外的整个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很大一部分，支付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款，让德军入驻巴黎。这些苛刻的条款，尤其是阿尔萨斯—洛林的割让，将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对法国公众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不得不准备最终抉择将要采纳的政体。在其组成之际，它就接到并同意了国防政府的辞呈。2月17日，它任命阿道夫·梯也尔为“法兰西共和国行政权力首脑”，并明确指出，这种政府体制只是临时性的，“最终采取何种政体尚有待裁决”。梯也尔并未试图利用自己的权威把某种解决办法强加于人。这一临时性的制度安排可以说是两种权力，即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达成的所谓“波尔多协定”的结果。

一个月后，3月18日的革命爆发。公社表明了巴黎拒绝接受普选的最终结果，拒绝承认其视为“乡巴佬的议会”的新议会，它同时也是对共和制度的质疑。但是，巴黎公社的首领既无法把巴黎人民武装起来，也没能凭借自己的权威把他们组织起来，因此，它自然无法抵挡住梯也尔迟缓发动的反攻。内战以及镇压的恐怖，长时间地留在了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

共和国的敌人曾在惶恐不安中如是断言，这次起义——它是巴黎或局限于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城市的起义——会摧毁共和国。但是，其产生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在所有人看来，“法兰西共和国的行政权力”似乎能够维持秩序，粉碎革命。人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自1789年以来政权首次敢于抵抗的巴黎群众起义。同时，政权经受住了考验，并获得了所有感到受威胁者的信任。共和国成为了人们可以给予某种“信任”的政体，人们甚至开始自忖，至少在维持秩序方面，共和国

是否同君主制同样好。因为法国民众实在是太渴望有稳定的秩序了。

确保秩序的政体（1871—1875 年）

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为梯也尔赢得了巨大的声誉。1871 年 6 月，他的举足轻重的位置显得更为突出——他已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政府总理集于一身。他知道，从理论上说可以终止其权力的议会暂时无法剥夺他的权力，因为君主派的多数派内部，两位王位觊觎者，即尚博尔和奥尔良以及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存在着分歧。由于对此心知肚明，以至于他会向他们发问道："你们向我提议恢复君主制了吗？"当这一多数派对此迟疑不决时，他就会以辞职相要挟。在经历了漫长的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生涯之后，其自由主义难以抵挡其专制个性的梯也尔发现，共和制将是他可以进行统治的一种政体，他呈现在法国人民面前的这个现在他所希望的共和国是一个安定（一个使我们内部的分裂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政体）和有秩序（要么是保守的共和国，否则就不实行共和制）的政体。

741

于是，从 1871 年到 1873 年，法国将要经历一个特殊的政体，一个实际上具备强大的行政权和有效的"领导权"的共和国。行政权力的首脑通过很好地领导一个蒙受战败和士气大受挫伤的国家的重建工作，向公众展示了共和制政体能够很好地迎合法国人的心愿。几个月后，在提前偿清了《法兰克福条约》强加给法国的战争赔款之后，梯也尔使得德军撤离了被占领省份。他通过成功地发行大规模的债券恢复了国家的信用体系；他重建了法国军队并恢复了它们的士气。但他不知道如何在法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而且，出于其保守主义立场，他也排斥了开征收入税的计划。同样，他还结束了拿破仑三世的自由贸易政策，使法国的关税体系朝着僵化的保护主义方向发展。

梯也尔既强悍有力又小心谨慎的行为，使他在国民中名副其实地深负众望，而这也对共和政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补缺选举中，共和派的候选人基本上都战胜了君主派的候选人。确实，这些共和派的候选人都效仿梯也尔，表现出十分的稳重。为了反对君主派，他们抛出了曾在 1871 年 2 月产生过作用的论点，即控告对手试图发动战争，

不过，此次的战争是为了支持教皇而干涉意大利。共和派在选举上的成功，甚至最终影响到了君主派在议会的统治地位。

于是，君主派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摆脱梯也尔，恢复君主制。为此，他们依然需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重新协调君主派中的那两派在由谁出任国王问题上的立场，其二是尽可能在协调期间找到一个可替代梯也尔的人。第二个问题有利于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军队的首领麦克马洪元帅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担任总统。1873 年 5 月，在议会只获得少数人支持的梯也尔提出辞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并以为没有人能够取而代之；然而，结果却是他不得不把这一职位交给麦克马洪。君主制的复辟则是另一回事。首先应当在确定将要出任国王的唯一候选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解决办法就是把君主派的这两支合二为一。波旁家族的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年事已高，且没有后嗣；奥尔良家族的王位觊觎者巴黎伯爵则还比较年轻，并有子女。1873 年 8 月，巴黎伯爵承认尚博尔伯爵为君主制政体的代表；作为交换，尚博尔伯爵承认巴黎伯爵为王位的继任者。

现在的问题集中到了如何确定复辟的具体条件上。大多数的君主派希望能够建立英国式的君主政体：君主只是作为一种秩序和权威的象征，但还是要服从于议会的权力。他们特别不愿意有人从外部把复辟的具体条件强加给自己。

尚博尔伯爵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建议。他希望恢复的是“旧制度”时期的那种君主政体，并于 1873 年 10 月要求以波旁王朝的白旗来取代现有的国旗。“旗帜之争”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那些君主派的首领深信，大多数的法国民众都不会接受白旗（麦克马洪本人也说过军队也不会接受），他们尤其确信，以议会的权利取代神授权利实属必然，于是，他们临时放弃了复辟计划。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等待波旁王族的王位觊觎者的去世上，为了获得更大的安全系数，他们遂投票将麦克马洪的任期延长至七年（七年任期制）。尚博尔伯爵的固执似乎可归因于他长期在奥地利流亡，对自己的国家缺乏了解。在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他生活在一个古堡之中，身边围着一群

742

不断给他灌输诸种幻想的流亡贵族，他的愚蠢行为令其不自觉地成为了共和国的缔造者。

麦克马洪元帅在成为共和国总统之后，召请布罗伊公爵出任政府副总理，意欲依靠议会中君主主义多数派支持的布罗伊，难以在作出过于明确的保证时不致重新激起正统派与奥尔良派之间的对立。于是，他也把“重建道德秩序”作为其行动纲领，这方面的行动往往表现为加强天主教会的力量以及教会机构对教徒的影响力。实际上，这一等待观望与保守主义的政体在外省遭到共和派和波拿巴派的猛烈抨击，共和派通过向农民们展示贵族特权和什一税会被恢复的模糊图景来对其进行恐吓，而往往反对教权主义的波拿巴派则在经历了数月的慌乱之后，重新恢复了对自身力量的信心。

共和国走向议会制……

任由国民生活在临时性的制度之中实属危险。1873 年 11 月，议会任命了一个由 30 人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准备宪法草案。起先，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但温和的君主派开始对共和派在补缺选举中不断取得的胜利感到不安，尤其是对波拿巴派在某些场合表现出来的重新获得欢迎感到不安。相关思路在逐渐得到明确，为了避免冒险，谨慎的做法是为法国制定一部宪法，无论这部宪法是具有共和主义还是君主主义的色彩，这一政体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秩序。鉴此，他们开始为那些“宪法性法律”所由产生的 1875 年的妥协作准备。这一妥协使国民议会中的派别分布得以发生变化。

右派由两个团体组成：其一是人们称之为“近卫骑兵队”的极右派，它由主张复辟正统王朝者组成；中右派则没有那么刻板，其奉行的是奥尔良派的传统。左派则由以下部分组成：由旧奥尔良派成员如梯也尔、卡西米尔·佩里埃等组成的中左派，他们在最近时期已经赞同建立共和国，但前提是该共和国必须是保守的；由温和的资产阶级如格列维和费里等组成的共和派的左派；由甘必大领导的共和联盟；最后，是由一些激进分子组成的极左派。自此之后，对议会中的派别已不能简单地以君主派或共和派来划分。这种划分将更倾向于在极端

的两派之间加上中间派人士，后者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把政权交给“正直的人”，也就是社会保守派的政体。

在缺乏一部宪法的条件下，这些派别在立场上的相互靠拢导致了1875年的下述宪法性法律的出台：《关于参议院组织的法律》（2月24日），《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2月25日），《关于政权机关间组织的法律》（7月16日）。这些法律显然极为模棱两可。立法权由两院行使，其中参议院是在中右势力强烈要求下设置的，其目的在于遏制普选带来的冲动和制约众议院。行政权属于共和国总统和各部部长，前者任期七年，由两院组成国民议会选举产生，后者由总统任命和撤换，无需通知总理或部长会议主席，其职责依据惯例设定。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很大。实际上，它具有一个立宪君主的权力（包括在征得参议院同意后解散议会，宣布重新选举，以及有权要求议会重新审议他不赞同的法律）。但是，1875年的这几项法律建立了一个议会制政体，因为共和国总统在政治上无须承担责任，他需要和某个部长共同签署文件，而部长们则需对议会负责。

743

作为诸多妥协的产物，这一不切实际的宪法颇不牢靠。它并没有明确共和国的总统和部长们之间的权限分配；它对于部长地位的界定仍显得模糊不清，部长对立法权负责，但却可以任由总统任免。宪法开头没有任何权利宣言，也没有宣布任何原则。不过，它也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简短，并在运用时需要注意解决一些不确定性的问题。

这一宪法尤其具有这样一个值得存在的重大价值，即它至少暂时解决了政体的问题。但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君主派控制的议会却确立了共和制呢？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乃多种原因所致。首先，从负面因素来说，1871年时所存在的君主主义的多数派因其内部出现了几乎难以调和的纷争而自相残杀。从正面因素来看，则是共和主义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在过去，每逢共和派上台执政，他们的一些较为温和的做法立即就会遭到一小部分咄咄逼人、吵吵闹闹，具有平均主义或雅各宾主义倾向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会导致各派之间发生流血冲突。

与之相反，从1871年开始，共和主义的发展趋于平和。温和的、主张自由的派别获得了对它的控制。若是激进派夺取了政权，那么就会产生类似于1793年的局面以及大革命时期大权独揽的国民公会，而这样的结果会让保守派，特别是中间阶级不寒而栗。对于保守派或中间阶级来说，那些严肃、庄重、举重若轻的人更让他们感到放心，在他们看来议会里的共和派领袖正是这样的人。共和主义的两大领袖的智慧尤其让他们感到宽慰，他们分别是梯也尔和甘必大。梯也尔是一个七十来岁的家长式人物，他为一个经受了战败和内战，创伤累累的国家提供了一个能干、冷静和坚忍不拔的人物形象。他曾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在现在看来几乎是无法想像的，他对共和国的归附更是至关重要。甘必大则让极左派成为了妥协计划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并实现了左派的共和国。甘必大的态度让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巧舌如簧的煽动家，有时看来他也确实如此。在甘必大的这些直率的思想体系背后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折衷主义，但这也表明了他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政治是一种有关可能性的艺术。”甘必大的这一格言为其真正的门徒开辟了道路，后者被人们称之为“机会主义者”。

最后一个原因是局势：我们都知道，波拿巴主义在1874—1875年重新得到人们的追捧。曾经在第二帝国时期担任要职的候选人在选举中获得了成功，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帝国”情结，这让君主派感到恐惧万分，他们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在法国唯一受欢迎的王朝是拿破仑王朝；但共和派对农村选民的表现不是很放心，这些选民曾长期充当帝国的忠实支持者，而且在1871年2月如此地让人难以信任，如此地难以召唤，竟然把选票投给了君主派的候选人，因此，共和派同样对农村选民深感不安。此时，他们突然发现，一个幽灵浮现了出来：这就是那些痴迷于那位亲切而迷人的年轻的皇太子的选民。为了祛除这个幽灵，他们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就议会中的君主派与共和派来说，恐惧已经使其开始趋于理智。 744

是否有必要诉诸某些历史学家提出的另外一种解释呢？根据这种

解释，1875年所达成的妥协乃是“资产阶级王朝”运筹帷幄的结果。那些“高高在上的家族”在1789年的大革命中获得了财富和权力，在此之后，他们排除千难万险，逐渐控制了国家的要害部门。正是这些家族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家族的最佳代表安插在君主派和共和派之内，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控制新的政权。可以肯定的是，家族之间的紧密联系连接着作为中右派的奥尔良派和作为中左派的共和派的主要领导人：“我们曾一度看到奥迪弗雷-帕斯基埃公爵在领导中右派，卡西米尔·佩里埃在领导中左派，而他们却是连襟，都是昂赞矿产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都住在他们的岳父为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修建的毗邻的府邸之中。”（博·德·洛梅尼）

我们是否需要借助于“奥尔良派”的阴谋说来解释1875年的妥协呢？我们看到，尽管中右派和中左派在根据不同的原则来选择政体——君主制或共和制，但是，他们最终均显示出了奥尔良派的本质：依恋议会制和自由主义。这一点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我们为什么不承认，较之君权神授的君主制，“奥尔良派”更愿意接受议会制或自由主义的政体。对他们来说，后者即便暂时是共和制亦无关紧要，因为在任何时候，只要由某位奥尔良家族的成员替代总统，共和制即可成为君主制。

……走向共和制的法国

在完成了它的使命，清除了1870年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采纳了1875年的宪法性法律之后，国民议会在1875年底宣布解散。鉴于总统任期为7年，所以麦克马洪要到1880年才卸任。为了确立新的机构，需要选出新的议会。

根据1875年2月24日的法令所规定的选举制度（两级选举制，选民由市政议会代表组成，也就是说首先是由农村的市镇议会代表组成），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1876年1月30日选出的参议院主要是由君主派所组成，但是，又乎人们意料的是，君主派只是以微弱的多数胜出。1875年的宪法制定者们所期望的安全机制起到了作用。

共和派期望获得众议院选举的胜利。然而，1875年所采纳的投票

制——在选区内进行两轮的单名投票制——对传统的贵族，往往也就是君主派的当选更为有利。为了降低风险，甘必大要求共和派从第一轮开始就推出单一候选人，但其他的共和派领导人拒绝接受这一意见，因为他们对当选并不感到担心。不管怎么样，选民确保了共和派代表大获全胜，他们占据了500席位中的340席。

共和派占多数的众议院和可望依赖右派占多数的参议院的君主派总统麦克马洪之间存在着矛盾，要不是麦克马洪明智地先是选择中间派人士儒勒·阿尔芒·杜福尔，继而又选了温顺的儒勒·西蒙为部长会议主席①的话，这场矛盾早就已经爆发。不过，在此之后，冲突的出现却变得越来越频繁。众议院往往会把麦克马洪难以接受的政策强加给儒勒·西蒙，而麦克马洪则根据某种对几个宪法性法律文本的解释——这种解释或许与其制订者们的初衷颇为接近——认为，即便他不在议会面前负有一种责任，那至少亦对"法国负有某种责任"。于是，他在1877年5月16日决定解除西蒙的政府总理职务，让布罗伊公爵取而代之。这一被人们不恰当地称之为"5·16政变"的决定，引起了众议院的愤怒。7月19日，众议院以363票的多数对布罗伊内阁投了不信任票，而麦克马洪则在征得了参议院的同意后，以解散众议院作为反击。

由此，这场对制度演进来说至关重要的争论，将得由普遍选举来作出了断。一方面，在麦克马洪看来，共和国总统拥有和议会相等的权力，可以有他自己的政策，并有权撤换他不再信任的内阁部长。在同议会发生矛盾的时候，则由全体选民来作出决断。另一方面，在共和派看来，总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其在任命部长时应与众议院保持高度一致。由于众议院是通过普选产生的，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总统则不然。

对宪法性法律的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由于法律本身有失确切，均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接受。预定在1877年10月14日举行的选举，

① 第一次设立这样的职位，亦译政府总理。

将在就此作出裁决方面发挥作用。实际上，这场争论因显得过于微妙而让选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同以往一样，以麦克马洪为首的君主派和以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之间展开了一场猛烈的选举战。前者借助行政机构来施加压力，而后者则借助梯也尔那依旧在日益扩大的个人威望。梯也尔在选举运动期间去世，巴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较之1876年的选举，1877年的选举结果稍微有失明显。共和派议员离开众议院时是363人，现在则有321人当选（甘必大曾轻率地宣称："回来时，我们将是400人。"），有208名代表的君主派尽管也获得了40个席位，但共和派获得了绝对多数。通过他们取得的胜利，共和派感到共和国再次得到了建立。

要想最后取得这一胜利，接下来只需要获得所有的立法权，摆脱麦克马洪即可。1879年1月5日，在参议院首次举行部分改选之际，共和派达到了这第一个目标。众多市镇议会的代表选举共和派人士为参议员。由此，共和派最终亦在参议院中成了多数派。1月30日，麦克马洪辞职，提前一年结束了他的总统任期，这样一来，第二个目标也很快得以实现。

因而，1879年标志着共和派的大获全胜。但是，1879年只是1877年的结果，也就是当时选民对"5·16危机"所作出的明确反应的结果。对于第三共和国来说，1877年的那次危机的结果至关重要。首先，国民从根本上确认了共和制。但这一转变只是自1871年以来选民本身缓慢转变的结果。共和派知道如何小心翼翼、逐步地取得群众的信任，并采用灵活的手段让选民们把他们看作是既定秩序的维护者、内政外交方面的谨慎政策的支持者。他们做得如此成功，以至于历史学家达尼埃尔·阿莱维描述说，他们在农村市镇的层面上以新的权威取代了旧贵族的权威："于是便产生了一场革命，但这一革命分散到了三万个十分微小的中心，它们如此微不足道，以至单个而言难以一目了然；对于这次革命，历史学家只发现它稀疏的反响，我们后来则称之为市政革命。"

随后，1877年危机的结果无可挽回地对共和制度的某种观念，即

共和国总统拥有可制衡议会的权力的观念作出了判决。麦克马洪一派的选举失败意味着权力平衡的结束。麦克马洪的继任者，刻板的共和派人士儒勒·格列维的行为导致了总统权力的进一步缩减，例如，他从未使用过宪法给他的权利来要求议会再次审议那些令他感到不满的法律。始自1877年，第三共和国开始成为一个以某个议会，即众议院拥有无限权力为特征的政体。 746

最后，由于1877年的危机使得解散议会变为一种不光彩的事情，因而它使得这种议会体制更加难以忍受，风险也更大。实际上，获胜的共和派认为，那位君主派的总统悍然使用解散议会的权力，恰恰使其政治声誉大受损伤。在接下来的差不多一个世纪里，没有一位政府总理再敢于要求共和国总统行使这一有害的武器。

对于“5·16危机”的这一很有争议的解释，势必会产生最令人遗憾的结果。议员们对解散议会的顾虑消除了，他们确信可以在正常的立法任期（四年）内保有自己的席位，不过，当他们拒斥一切纪律，甚至拒绝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时，他们实际上就是在以最恶劣的方式来运用这种豁免权。这种散漫显然是堪称第三共和国的基本特征的内阁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它是如此的致命，以至于最后影响到了共和国的声誉。它无疑亦是法国在20世纪初之前未存在政党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哪位议员愿意像英国的同僚那样，牺牲自己的自由，去服从一位自己选出来的党魁。但是，若没有纪律严明、组织良好的政党存在，议会制度能和谐地运转起来吗？

二、共和国的治理

在麦克马洪辞职之后的20年间，政权在温和共和派的不同派别之间传递，这些派别包括老的中左派联盟、儒勒·费里领导的共和派左派以及甘必大领导的共和联盟。后两派宁愿选择“能够产生结果的政策”而不是“不妥协的政策”，鉴此，人们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

左右两派都有“不妥协者”。就右派而言，君主派在议会中已只

是少数派，至于波拿巴派，尽管前一阶段已经恢复了元气，但随着皇太子在 1879 年撒手人寰，该派从此一蹶不振。不过，右派对行政机构、司法部门、军队和教会都有着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就左派而言，克雷孟梭、卡米耶·佩勒唐、布里松、纳盖领导的激进派人数还不够多，尚无法夺取机会主义者的权力，他们至多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如 1885 年的大选时期，相对于保守派的 200 个议席和机会主义者的 200 个议席，他们增加了几个议席——试图同他们分享一些权力而已。事实上，从那时开始，他们的要求和躁动助长了政府的不稳定的趋势，推动了群众性的反议会主义的发展。

尽管有这些困难存在，机会主义者看起来还是有能力去实施重大的政策。但如果稍有一点想象力，如果稍有一点发展的眼光，他们本来可以通过配备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和组织良好的政党体制，设法为共和制度提供它所急需的增强效率的手段，他们还能够延长从第二帝国时期开始的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确实，在经济领域，共和派运气不佳：747 他们上台执政的时候恰逢 1881 年法国经济危机初露端倪，他们经受了长时期的价格疲软（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的考验，这种局面将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末。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经济政策——他们只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实施之——不能成功的原因所在。修建铁路和运河的“弗雷西内”计划——它本来可以反映在一个富有成效的投资政策中——降格为修建耗费惊人而又徒劳无益的“选举大道”。他们所实行的关税政治并没有阻止价格的下跌，反而给法国戴上了保护主义的枷锁，产生了令人恼火的后果。在政治领域，加强共和政体的尝试也只能停留在重建基本的自由上。很快，机会主义者的精力都耗费在了政教分离的政治斗争之中，后者很快就呈现出了旧式的宗教战争的模式。

机会主义者的目光短浅很快就得到了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过去而不是未来。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共和派和第二帝国之间的斗争，共和派对第二帝国所怀有的仇恨以及后者留给他们的记忆让共和派盲目行事，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同第

二帝国背道而驰。因为帝国曾经想——并非从一开始，而是从19世纪70年代的那个艰难时期开始——借助于天主教的力量，而相当一部分的教会人士则试图籍此机会扩大教会的利益，所以就有了甘必大的那句广为流传的受到共和派拥护的口号，“教权主义就是敌人。”因为拿破仑三世曾经提出过由国家出面来改善穷人的生活，缓和不平等的现象，改进经济结构，所以共和派，包括最先进的共和派在内，重新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这让中左派和同自由主义紧密相连的大企业主欣喜若狂。没有什么比激进共和派对于社会改革的漠视更能够揭示共和派思想的贫乏了。当然，他们也自愿地谈到了国有化（铁路收归国有）和劳动保护法，但那也只停留在抽象的口头表述之上。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对于下层人民的需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他们甚至对经济现象都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

共和国的巩固

巩固共和国是儒勒·费里的杰作，他在1879年2月到1881年11月间先后担任部长与内阁总理，而后从1882年1月到7月，1883年2月到1885年3月期间又重新担任内阁总理。在此期间，他力图“将共和派的纲领付诸实施”。

他首先通过1881年的法律重建并组织了公众的自由。集会自由最大程度上限制了政府对公共集会——即便是政治性质的集会——施行的监控。通过取消第二帝国强加的各种束缚措施（预先授权制，保证金制度，印花税），取消了针对新闻出版的轻罪法庭以及重罪法庭的裁决，对于相关的案件尽量宽大处理，新闻出版自由得以重建。在结社权方面碰到了一个问题：如果给所有团体以结社的自由，那么也就意味着给共和派憎恨的教会团体以结社自由。因此，有关宗教集会的条款被内政部长瓦尔德克－卢梭单独列入了1884年的法律条款。1884年的这个法律促进了工团主义的飞速发展，不过，工团运动从来没有接受这个法律条文，也从来不向立法者规定的限制条款屈服。

作为一个共和派，费里还改进了1875年的宪法。修改宪法的程序是在1879年7月进行的；这一修改使得以下法律得以通过：把议会的

开会地点转移到巴黎，把 7 月 14 日即 1790 年联盟节的纪念日定为法国国庆节。1884 年 8 月重新修订的法律规定，“政府的共和制形式”是不可更改的，曾经统治过法国的那些家族的成员没有资格参加总统选举，并对参议院的组织形式作了宪法的规定。几周之后，一条法律使得参议院选举团再度活跃起来，因为该法律授予人口最多的社区——城市——以更多的代表权。

748

最后，费里还让地方的行政管理变得更为民主。1882 年的法律规定，除巴黎以外的任何市镇议会都有权选举他们自己的市长和副市长（此前他们一直是由中央任命的）。1884 年的法律让市镇议会变得公开化，但是重要决议的实施还得交由省长授权，而且巴黎依旧保留着自己的特殊体制（塞纳省的省长行使市长的权力，警察局长统管巴黎的警力）。

教育的世俗化

教育问题，尤其是针对儿童的初等教育问题让共和派感到不安。这并不是因为法国教育的状况很糟糕。正如我们经常说过的那样，法国远不是一个识字率低下的国家。如果我们以夫妻双方在结婚证书上签字作为初等教育水平的大致标准的话——这一标准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可以量化，我们从现有的文件中发现，在 1871 年至 1875 年期间，这一比率为 72%；成年男人，也就是选民的这一比率为 78%，女人的这一比率只有 66%。当然，在法国也存在一些落后地区（布列塔尼、中央高地、朗德），而法国北部的一些地区男人的识字率超过了 80%，在东部的某些地区甚至达到了 90%。

因此，对于共和派，尤其是儒勒·费里——他的名字是和法国初等教育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来说，问题并不在于降低法国的文盲率，在共和国之前的那些政体已经承担起了这一职责。共和派希望的是从教会手中夺回那些接受初等教育的人，也就是未来的公民（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发展世俗教育，这就回到了基佐和法卢制订的法律上来了，他们的法令允许宗教团体和基督教会的教士确保几乎一半的小学能够得到宗教方面的教育，这就

迫使小学教师（即便不信教）为孩子们教授基督教的教理问答并引导他们投身宗教事业。但是，要确保教育的世俗化，就必须保证教育是义务的，尤其要确保教育的免费，以免将穷人的孩子排除在外。这就解释了儒勒·费里的名言：义务的、免费的、世俗的初等教育，1881年和1882年的教育法将它变成了现实。

当涉及到更高层次的教育时，直接针对宗教团体的内容被补充到了这些教育法之中。获得参议院投票通过的法律条款规定：未经授权，禁止宗教团体在各类学校甚至是私立的中学和大学教授学生。针对耶稣会士，儒勒·费里于1880年3月29日让政府发布了两项政令：要求所有的耶稣会士在三个月内离开他们所在的学校，并同样要求所有其他未经授权的宗教团体在同样的期限内办妥手续。这两项政令严格地得到了执行，5000名宗教人士遭到驱逐，这还不包括那些被反教权主义的市镇当局从医院赶走的宗教人士。

新的宗教战争

共和派已经采取的、以及后来在有利条件下再度采取的反教权主义措施是一场漫长冲突的导火索，这场冲突之激烈以及时而出现的困顿情形，至今仍让我们感到吃惊。这种冲突的根源存在于19世纪世界性的世俗化运动之中，只要是此前天主教会拥有更多的特权，行使更多的权力的地方，这一运动就表现得尤为强烈。但这一运动仍不足以解释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初期的这类冲突的激烈程度。我们应该把另外一个因素考虑在内：如果存在宗教战争，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给这场冲突定性，其必然是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或一种教义和另一种教义之间的冲突。而同天主教相对的，则是理性主义。 749

这种理性主义倾向自19世纪中叶以来即可感觉得到，但是，它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大行其道。其信奉者不仅有法国人，还包括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但是，它在法国表现出了一种最为激烈的形式，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共和派正在狂热地寻求某种学说，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信仰。他们从奥古斯特·孔德那里找到了他们要找寻的体系。在1852年至1854年间出版的《实证政治体系》一书中，孔德提

出了他的“三阶段法则”：人类知识的每个分支都要经过前后连续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或叫假想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叫抽象阶段，最后是科学阶段或者叫实证阶段。因此，要把现代社会组织起来，就必须把它建立在实证政治的基础之上。激进的莱昂·布尔日藉此表达了应该“根据理性的法则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组织社会”。持实证主义观点的孔德的弟子复兴了 18 世纪的一些理念，他们在启蒙主义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一点进化论和达尔文主义。这一哲学适时地为共和派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理论基础，甘必大、费里以及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都借用了这一理论。在某些人那里，这一理论变得冷酷无情，如 1902 年至 1905 年间担任内阁总理的爱弥尔·孔勃，他曾是一个“外省的小资产阶级，坚定的保守派，在某些信念的驱动下，开始朝选区的富人倾斜。”实证主义几乎成了法国思想界（或思想社团）和共济会的正式理论，共济会这个地道的“反教会”组织已经抛弃了早年的宽容精神，而为共和派政治家提供了强大的行动工具，必要的时候它还是一种控诉工具，正如思想自由演变成一股反宗教的冲击力量一样。

与这种反宗教的狂潮相对应的是某种天主教环境下的狂热。基督教民主的温顺倾向在 19 世纪中叶还是受到人们喜爱的，但到 19 世纪 70 年代，这种温顺在梵蒂冈的支持下被一种不宽容的浪潮一扫而光。作为最传统的天主教主义的支柱，路易·弗约（1883 年去世）的思想在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圣母升天修道会的发展壮大增强了弗约的影响力，它知道如何运用现代的手段来控制群众。他们的报纸《十字架报》很便宜，老百姓和下层教士都能够接触到。他们通过有组织的，与众不同的，大规模的朝圣运动营造出某种特别的宗教气氛。这种制造不安的手段让掌权的理性主义者感到害怕，他们怀疑圣母升天修道会士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天主教派和实证主义者之间相互不能理解，这种误会不断加深，最后转变成某种相互的仇恨，使得双方都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双方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

共和派与欧洲

执政的共和派以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法国外交领域的事务：

战败的法国要面对的是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后者在欧洲大陆拥有霸权。法国人当然不会忘记阿尔萨斯－洛林的被割，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但是，政府方面对此表现出态度非常保守。即便是领导过抵抗运动，被人们看作是复仇者的甘必大，也不倡导法国实行好战的外交政策。他知道，法国之所以处于孤立的地位，是因为俾斯麦在搞鬼。而俾斯麦也深信，法国人不会甘心失去这两个省份，很快就想复仇，但他也明白，没有盟国的法国绝不敢这么做。故此，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在孤立法国的同时对它进行威胁。这就是为何俾斯麦总是期望着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他对法国气势汹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挑起让公众感到不安的外交危机（如1871年6月和12月，1873年的11月，尤其是1875年4月）。750

因此，为了避免出现意外情况，共和派奉行的是“韬光养晦的政策”，人们有时候也称其为“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政策，它局限于外交谈判和把军事力量维持在维护和平的水平上。”（瑟诺博斯）

然而，被打败的法国在经济上，甚至在军事上亦未受到削弱。从1875年开始，法国的常备军的人数差不多可同德国等量齐观。爱国主义情感得到了明显的复苏，即便在最激进的共和派那里也是如此。出于谨慎，这种爱国热情不便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公开表露出来，于是，它就在殖民地的扩张上找到了替代品。

殖民扩张

在战败后不久，梯也尔就断言，殖民扩张是危险的。1873年，当弗朗西斯·加尼埃在河内被杀之际，法国政府并没有作出反应，而是撤出了东京三角洲。在此之后，法国人在埃及的势力难以抵制英国人的排挤。19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政策初露端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的一些政客、企业家和当地的商人、探险家尤其是军官等之类的人意欲如此。殖民扩张表明，尽管遭受了战败，法国仍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俾斯麦的纵容让殖民扩张变得更为容易，他认为这是一个让法国人把视线从“蓝色的孚日山脉”转移开去的好办法。在几年的时间里，法国人占据了突尼斯、东京、安南、刚果、

尼日尔，并暂时占据了马达加斯加。殖民征服往往是在不经意之中完成的，尤其是在非洲。法国的扩张经常是探险家或已对自己的职位感到厌倦的军官在当地自发进行的行动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应该夸大这类当地的自发行动的重要性。显然，如果相关管理机构或他们的顶头上司接到命令的话，就会立刻制止这样的行为。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这些行动往往得到了庇护。而对突尼斯和东京的征服行动尤其向我们揭示了一种规模庞大的政策，即儒勒·费里的外交政策。儒勒·费里无疑并没有一下子就形成一种殖民扩张理论，他只是在下台之后，才迟迟提出了一套殖民扩张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无论是出于军事原因（能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获得补给站和海军基地）、经济原因（能够提供巨大的海外市场）和政治原因（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声誉来说是必要的，能把某国的“语言、风俗、旗帜、武器和精神”带到世界各地），殖民扩张对于法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必不可少。在他掌权的时候，费里在采取相关行动时甚为谨慎，并且很重视依赖自己的经验，其具体做法就是：可以扩张的时候就前进，遇到抵抗就撤退。

这样的殖民扩张政策备受指责。右派指责探险和军人的伤亡耗费了国家的财力，而以克雷孟蒙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左派亦对这一政策强烈不满。在克雷孟梭看来，殖民扩张是一种背叛，因为它使得复仇的政策变得难以贯彻，法国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在两边作战，舍弃阿尔萨斯 - 洛林去追逐远方的土地是一种亵渎行为。

儒勒·费里的殖民理论的不确定性，他所受到的猛烈抨击，以及他先后因突尼斯事件和东京事件两度下台，表明了法国的第一轮殖民扩张（1880—1885 年）的混乱特性。从 1890 年开始，法国的殖民扩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与俄国结盟，法国在面对德意志帝国时已感觉自己在欧洲大陆上没那么孤立了。在后方得到保障后，她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政客和企业家为殖民扩张发动了宣传。1889 年殖民学校的创办、1893 年（由职业军人和志愿者组成的）殖民军的建立以及 1894 年殖民部的建立，为殖民事业提供了技术支持。法国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时期由此展开；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法国征服并平定了印度支

751

那，征服了马达加斯加以及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还为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的版图增加了摩洛哥。

这一殖民事业最终在绝大多数公众的漠不关心之中得以实现，它既没有引起民众的巨大热情，也没有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只有极左派的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对其进行了谴责。他们认为，殖民扩张是一种由“资本家的”利益驱动的强盗政策。事实上，经济因素似乎并没有在殖民扩张中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及至1914年，从殖民地进口的原材料还不到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十分之一），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法国自认为对殖民地的征服可以给当地的和平、安全和进步带来巨大的好处，法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殖民帝国主义”会引发良心上的危机，只是认为找到了一种为落后地区人民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法国人以为的）的办法。

三、困境中的共和国

机会主义者在法国政坛的统治地位使得共和制得以巩固，但是，这种统治地位在1885年选举之后不复存在，在这次选举中，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均使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对于前者，有200名“保守派”代表当选；对于后者，则是激进派获得了一百个左右的席位。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保尔·戴鲁莱德领导的围绕着“复仇”主题展开的民族主义者的骚动运动；君主派和天主教人士对共和国推行的世俗化运动的强烈对抗，在他们看来，这一“障碍”的存在使得任何与共和国的妥协都变得无法想像，农民们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对国家不满，而工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已经被共和国遗忘。

因为无法依靠足够数量的多数来组阁，机会主义者开始寻求结盟。出于“保护共和国”的本能反应，他们首先转向了与之较为接近的激进共和派。激进派在议会席位的增加让他们变得态度强硬，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参政的条件是开征收入税，对德国实行更严厉的外交

政策。尽管这样的要求让机会主义者感到害怕，但是，由于他们已经同激进派有了过多的牵连，想要退出为时已晚。机会主义者试图同激进派建立联合政府，但后者只是昙花一现。在此之后，机会主义者又转向了中右派，试图与其建立另一个联盟，但中右派要求机会主义者作出承诺，尤其要求它减少宗教方面的冲突。机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得被迫建立一个既没有权威又没有纲领的政府，而且在左右两派的夹击下，很容易被推翻。

因这种联合组阁所造成的政局不稳开始让公众感到强烈不满，一场反议会的运动应运而生。一些丑闻，尤其是共和国总统格列维的女婿牵连其间的“荣誉军团勋章丑闻”让公众的愤怒达到了顶点。布朗热主义的危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场危机已经威胁到了共和政体本身。

深孚众望的将军：布朗热将军

752　布朗热将军的政治生涯是在像克雷孟梭这样的激进派人士的支持下开始的，激进派把他看作是屈指可数的忠于共和政体的高级军官之一。在中派与左派于 1885 年选举后不久结成联盟之际，激进派就坚持让布朗热出任战争部长（1886 年 1 月 7 日）。他在这个职位上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事实上，布朗热知道，较之以此为职业的老兵，在当时的法国军队中数量极为可观的刚刚入伍的士兵更需要的是关怀而不是严厉的纪律。他通过改善士兵的伙食和部队的生活条件受到了士兵们的拥戴。1886 年，在隆尚举行的阅兵仪式上，长着金黄色胡子的“勇敢将军”显得仪表堂堂，轻而易举地让共和国总统那些毫无生气的随行人员相形见绌，由此，他的名声达到了高点。在成了法国军队的象征之后，因为布朗热曾指责共和派政府弃阿尔萨斯－洛林于不顾，那些爱国人士遂给他取了“复仇将军”的绰号。爱国者同盟的首领戴鲁莱德说服了布朗热，让他相信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领导一场伟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德关系出现危机的时候，布朗热的这种态度让公众以为，他是一个能够击退俾斯麦的能人。但是，机会主义者看出了他的轻率和

不负责任，决心摆脱此人。在弗雷西内内阁倒台之后（1886年12月3日），布朗热在戈布莱内阁中仍旧担任战争部长，但在卢维埃上台组阁之际，他就被解除了这一职务。为使布朗热离开巴黎，他被任命为驻克莱蒙费朗的十三军团司令。7月8日，大批群众试图阻止他们的偶像离开，但是没有成功。此时，布朗热运动还只是一场带有公众情感的运动。

布朗热主义，政治运动

1887年10月在爱丽舍宫爆发的丑闻让布朗热主义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对在台上掌权的机会主义者持敌视态度的各个政治派别，以布朗热的大名为核心，结成了联盟：长期以来，像纳盖那样的激进派一直要求修改宪法；戴鲁莱德推动的爱国者同盟把现行的体制视为复仇战争的阻碍；曾经已经放弃了希望的保皇派和波拿巴主义者则想要再次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夺取政权。1888年3月底，作为对他参与政治阴谋的制裁，布朗热被强制退役。他的野心因受到各派别的大胆妄为之徒的鼓动而大大膨胀，于是，他接受了反共和派联盟首领的位置（他甚至接受了女保皇党人于泽公爵夫人提供的津贴）。他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共和党，并领导了一场反对议会制，并向人民发出呼唤（后者属于波拿巴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建议解散众议院和修改1875年宪法（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的政治运动——他的口号是“解散（议会），召开（制宪会议），修改（宪法）。

为了对执政当局施压，布朗热派采用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策略：让布朗热作为候选人参加补缺选举，一旦当选后马上辞职，通过如此重复，让多个地区的选民投他的票。布朗热先是连续于4月8日、4月15日在多尔多涅省、诺尔省当选，尔后又在8月19日再次以绝对多数在索姆和下夏朗德省当选。他在阿尔代什省的选举中落选，但在1889年1月27日，竟然以领先共和派候选人8万票的巨大优势在巴黎当选。在这次选举中，他以自己的名字赢得了右派、激进派以及社会主义者的选票。在选举获胜的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鼓动他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是，布朗热出于对合法性的尊重，并深信在几个月后，法

国人民会授权于他，遂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753

布朗热的失败

共和派领导人很清楚布朗热刚刚错失了天赐良机，于是发起了反击。共和国曾因布朗热派别出心裁地运用议会的游戏规则而处于危急之中，为了击败布朗热派，共和派修改了选举制度，取消多重候选人资格。为了清除布朗热本人，他们准备在参议院设立高等法庭，并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对布朗热提出起诉。布朗热预先料定自己会被共和派占多数的议会定罪，遂逃往国外。由此，他的声望一落千丈。

在1889年9月和10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除了巴黎之外，布朗热派的候选人被选民们所抛弃。布朗热运动最终只不过让40名左右的主张修改宪法的候选人当选，而共和派则有近400人当选。结局在临近，并因布朗热以前的一位代理人出版的轰动一时的《布朗热主义的内幕》一书揭露了布朗热和君主派代表之间的交易，加速了布朗热运动的灭亡。1891年9月30日，布朗热自杀。

布朗热主义运动是一场极其复杂的运动。在其鼎盛时期，它聚集了各派的极端代表：一边是君主派和波拿巴派，另一边是主张全民投票的激进派和具有布朗基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从根本上来说，它集结了左右两翼政治倾向完全相反，但却均具有专制倾向的选民。这场运动以其复杂的外表掩盖了左右两翼在农村的分歧，在那里，它尤其吸引了保守和支持波拿巴主义的农民；而在大城市，它则将支持激进派和支持社会主义者的工人汇集在了一起，并使这场运动带有革命的色彩。

温和的机会主义者

从政治上说，激进派因为布朗热主义的失败而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因为曾贸然信任布朗热而使自己难以让人信服，而其派别内部存在的深刻分歧——这种强烈的分歧在他们追随布朗热主义的前后始终存在——则更是使其元气大伤。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同他们结盟已经不再是个问题，至少在一段时期看来是如此。

布朗热主义的失败对于极右派，也就是那些好战的，喜欢冒险的，联盟派的右派分子来说也是一场失败。布朗热的过分举动让某些君主派议会代表深感震惊，他们决定归顺共和国，成为了共和派中的保守派。这种归顺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得到了梵蒂冈方面的赞同与鼓励，是时，教皇列奥十三世先是通过枢机主教拉维热里之口，继而又通过以法文发表的教皇通谕《在关怀之中》，要求法国的天主教徒“归顺”。列奥十三世建议法国的天主教徒“接受宪法”，亦即接受共和国，以便“修改法律”，也就是说使敌视教会的法律得以废除。

右翼政治家对于这种归顺确实多持保留态度：大多数的君主派依然坚持他们自己的立场。乍一看，选民们对于这种归顺也不买账：归顺运动的两大最出名的领袖阿尔贝·德·孟和雅克·皮乌在1893年的选举中双双落败，在新一届议会中，归顺派代表不超过30人。但是“天主教徒的选票对于执政的共和派贡献很大”，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共和派获得的311个席位与此相关，“……归顺运动对于选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弗朗索瓦·戈盖尔语）。从此之后，对于属于中间派的共和派来说，已经不需要依靠左翼的激进派或右翼的君主派的支持来统治了。

一个新的丑闻，即巴拿马丑闻事件（1891—1893年）间接地加强了温和派的统治地位。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新意，费迪南·德·勒塞普斯因为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采权而变得闻名天下（甘必大曾称之为“伟大的法国人”）。1881年，他成立了巴拿马运河公司。判断的失误（勒塞普斯一心想在山峦起伏的地形里开挖出一条可以通船的运河）、法兰西银行对他施加的苛刻条件（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个巴拿马丑闻”）马上就让公司陷入了难以应付的困难之中。为了获得新的资金，公司希望发行按期抽签还本的债券。因为发行债券必须得到议会立法的批准，所以公司就买通了一些议员——人数我们忽略不计——以便投票时能顺利过关。当公众知道了这起舞弊事件之后，群情激愤，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应运而生。一家专门刊登爆炸性新闻的报纸谴责了“受贿者”和那些“和巴拿马

754

丑闻事件相关的企业家、金融家和政治家”，这一事件为反议会主义提供了新的养分。

从政治上来说，巴拿马丑闻的影响力并不大。当然，像鲁维埃和克雷孟梭这样被直接怀疑参与丑闻的政客来说，只好离开政坛几年了。但是，大多数受到牵连的议员却于 1893 年再次当选；如果说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落选的话，那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然而，某些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即便再次当选的话，许多政客在今后的政治生涯中也是心存戒备，而且他们的政治地位也远不如以前了。取代他们的是新一代的共和派，他们抛弃了机会主义者的头衔，转而称为温和派（不过准确说来，他们并非“温和克制”的共和派），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行动上的自由度远比其前辈大。这些年轻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普恩加莱、巴尔都、莱格、德尔卡塞，他们同过去并没有太多的瓜葛，并不了解共和国诞生初期的政治斗争，对他们来说，“5 · 16 危机”已经失去了它的影响力。同之前的机会主义者一样，他们并不考虑与极左派紧密联合。但是，他们愿意接受各种归顺力量，其中包括右派。他们甚至宁愿靠近右派而不是左派，因为他们对一股新的倾向，即社会主义倾向即便不是感到害怕，那也至少是感到担心。确实，在他们看来，较之君主制的复辟，社会主义的组织对于现行秩序的威胁似乎更大。

一度因为当局对巴黎公社的镇压而停顿的社会主义运动，在 1879 年政府赦免因参与巴黎公社被判刑的人之后又重新开始发展。然而，在十几年中，派别的分散和领导人的相互对立（儒勒 · 盖德、布鲁斯、阿勒曼、瓦扬），使其无法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但 1893 年的选举标志着议会制社会主义的突飞猛进：40 多名社会主义代表入选议会。这些人往往都是情绪激昂、争强好斗的粗俗之人，温和派对他们恨之入骨。然而，他们依然是各自为政，他们中有一半人分属五个不同的组织，而包括饶勒斯和米勒兰在内的另一半人则属于独立的社会主义派议员。他们的任务是实现统一，要完成这一任务还需要 10 年。

除了属于激进派的布尔热瓦曾短暂组阁（1895 年 11 月到 1896 年 4 月）之外，温和派一直控制着法国政坛。从 1892 年到 1898 年，温

和派先后由杜毕伊、里博、卡西米尔·佩里埃和梅利纳组阁。梅利纳在对待保守派方面显得比他的前任更有技巧，他对于天主教派采取了和解的态度，“不接受反教权主义这一激进派用来蒙骗选民的策略”，因而，他的内阁维持了两年之久。

这一令人赞叹的稳定局面既没有在政治改革领域也没有在社会问题方面产生特别的成果，在这些方面温和派显得缺乏创意。虽然他们在经济领域信奉自由经济，但为了争取深受农业危机之苦的农民的选票，他们在法国严格地实行了保护主义的关税制度。而在19世纪末，法国面对的是物价上涨，经济繁荣的经济局势，在当时的情况下，法国实际上应该做的是向全世界开放市场。法国的公共财政政策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它虽在努力寻求预算的平衡，但同时却一方面依旧保留19世纪初即出现的陈旧的捐税体系，一方面却拒绝征收当时其他列强均已开征的收入税。在工人问题上，他们不懂得如何以立法的形式来处理劳工冲突，建立协商体制，以便有效地制止在19世纪末经常出现的关闭工厂或罢工的事件。

755

然而，在外交领域，温和派成功地摆脱了让他们的前任、即机会主义者深感不安的外交孤立状态。在执著地寻求与某个欧洲强国结盟的过程中，他们从俾斯麦离任之后德国在外交方面的拙劣做法中受益匪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法俄关系的靠近因为沙皇对共和国的敌视和蔑视而受到了耽搁。如果说法国的金融市场向俄国债券开放促进了这种接近，并增加了法国政府在谈判时的砝码的话，那么，布朗热事件则增加了沙皇对共和国的怀疑。只是因为威廉时代的外交断然采取了亲英疏俄的政策，遂使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得不以邀请法国舰队访问喀琅斯塔得港（1891年1月）来表示一种姿态。1891年8月，法俄签订了一项政治协定，尤其是一项秘密军事协定——军事协定在1893年12月得到批准，并成了改变欧洲军事力量对比的至关重要的工具。该协定规定：如果法国受到德国的攻击，或受到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那么俄国就会调动它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受到德国的进攻，或受到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的进攻，那么法国就要调动其所

有的军队来进攻德国。这一同盟关系并不允许法国轻率地发动对德国的复仇战争，因为沙皇拒绝支持主动进攻的战争；同样，法国也不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冒险行动。这一法俄联盟是防御性的，它足以让法国舆论安心。

在这一由温和派政府保障的政治暂缓期中，尽管法国存在着一些困难和危险，但政局却相对稳定。不过，这一局面未能维持多久。从 1896 年到 19 世纪结束，法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德雷福斯事件的危机，这一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们通常称其为“事件”。它以一场司法判决的错误为开端，但是这一丑闻很快演变成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并使法国的政治精英产生了分裂。

一个司法错误，德雷福斯被判刑

1894 年末，法国情报部门有人把有关秘密军事武器的清单寄给驻扎在巴黎的德国使馆武官。经过对清单的调查和笔记鉴定之后，参谋部认定这是德雷福斯上尉——一个在总参谋部实习的犹太军官所为。10 月 15 日，德雷福斯遭到逮捕，在设在巴黎的军事法庭进行陈述之后，他被判处监禁。在诉讼期间，夏尔·杜毕伊内阁的战争部长梅西埃将军告诉军事法庭的法官，情报部门准备了一份不为被告所知的“秘密文件”。这份文件给法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遂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并革除军职（1894 年 12 月 22 日）。1895 年 2 月 21 日，德雷福斯上尉在被革除军职之后，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刑。起先，这一平常的叛国事件并没有引起公众的任何反应，但到了 1896 年 3 月，它却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当时，法国的情报部门截获了德国大使馆给艾斯特拉齐上校的一封电报。情报处新负责人皮卡尔中校对艾斯特拉齐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与德国的武官保持着可疑的关系。756 他重新打开了“秘密军事档案”，并深信艾斯特拉齐就是那份清单的始作俑者。皮卡尔把这一发现报告给了上级，但是总参谋部拒绝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件，并于 1896 年 12 月把皮卡尔派往了突尼斯。为了彻底让这一事件尘埃落定，皮卡尔的副手亨利少校交给副参谋长贡斯将军一份对德雷福斯来说堪称致命的文件。实际上，这份文件是伪造

的，史称“亨利伪造的文件”。

在这期间，参议院副议长舍雷尔·凯斯特内从皮卡尔的朋友处了解到了实情，他深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要求政府对案件进行重审。内阁没有同意这一要求，担心会引起动乱。舍雷尔·凯斯特内遂决定在参议院就拒绝重审提出质询。战争部长比约将军宣称德雷福斯已经得到了“公正合法的惩处”，政府总理梅利纳则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不存在德雷福斯事件”（1897年12月7日）。之后，德雷福斯的兄弟指控艾斯特拉齐为密件的始作俑者，后者被传唤到巴黎的军事法庭，但结果却是无罪释放。

主张重审德雷福斯冤案的派别试图通过他们的呼吁来激起舆论的反响。1898年1月13日，克雷孟梭在《震旦报》上以“我控诉”为通栏标题刊出了埃米尔·左拉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左拉控告了两任战争部长、参谋部的一些主要官员以及重审艾斯特拉齐案时的笔迹专家，指控他们“为把舆论引入歧途而在新闻界发动了一场可憎的战役。”左拉还控告军事法庭“没有给德雷福斯出示秘密文件就给他定罪，这侵犯了他的知情权。”陆军部长以“诽谤罪”为名对左拉提起诉讼。对左拉的诉讼在1898年2月7日至21日进行，对于证人和律师们来说，它是一次对德雷福斯案和艾斯特拉齐案展开唇枪舌剑的好机会，对左拉的诉讼使德雷福斯事件为全世界所知。

7月7日，为了让德雷福斯派哑口无言，新成立的布里松内阁的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在议会的讲坛上宣读了“亨利伪造的文件”。但是，皮卡尔上校提供的证据让内阁的某个成员发现了“伪证”的破绽。8月30日，卡芬雅克让亨利少校承认了他的罪行；第二天，亨利畏罪自杀。

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

德雷福斯事件之所以会成为一场悲剧，乃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司法错误被发现之后，军方仍试图掩盖真相。于是，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掩盖事实，以便不损害作为祖国之支柱的军队的声誉，还是揭露丑闻，以便纠正司法错误。这可能会对“当局”产生何种后

果呢？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一方面我们发现“修改判决派”或“德雷福斯派”不仅仅要为无辜的受害者昭雪，还要抗议军方的领导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拒绝听取任何批评而表现出来的狂妄自大，更要维护正义和人权。另一方面，反德雷福斯派则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对左拉的审判让一些提法被确定了下来。修改判决派想要“为正义和真理”而战，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军队和圣水刷的联盟”进行了谴责；反德雷福斯派则以“军队的荣誉”为由，对“犹太财团”和“叛国罪”进行了谴责。反犹主义通过德律蒙发表的《犹太人的法国》（1860 年）和天主教新闻工具的煽动得到了传播，并成为了反德雷福斯派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要素。从另一方面来说，对军方领导人的错误和手段的谴责，让修改判决派产生了强烈的反军国主义倾向。德雷福斯事件对于法国的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改变了左派的方向，此前，左派还延续着雅各宾派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主义价值观。民族主义将成为右派的固有特性，在民族主义的思想领域还将产生两位思想大师，这就是巴雷斯和莫拉斯。

757

德雷福斯事件让法国的政治舞台、公众舆论和新闻界带上了某种感情。它使法国产生了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联盟，与维护人权和公民权联盟相对的是法兰西国家联盟。这些联盟激发了民众的巨大的热情，让他们赞成或反对修改判决。在经过了诸多波折之后，德雷福斯派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1906 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的罪行，并让他恢复了军职。

在政治领域，德雷福斯事件也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当儒勒·盖德因为把这一危机视为一场“资产阶级的内战”而拒绝介入德雷福斯事件时，饶勒斯却加入了德雷福斯派。温和派内部则产生了重大的分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感于共和政体存在的危机，想要依靠左派。正是出于这一想法，瓦尔德克－卢梭于 1899 年 6 月建立了依靠“左派集团”的“保卫共和”内阁。德雷福斯派取得了胜利，这正好为激进派创造了有利时机，他们不失时机地说服温和派，他们能够把共和国从教士

和君主派的阴谋当中拯救出来。德雷福斯事件标志着温和派或“共和派政府”的结束。中间派的位置已难以为继。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鸿沟泾渭分明。

四、集团和激进派的共和国

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产生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激进派进入了这一届的内阁，并将长久地执掌政权。及至1940年，他们要么直接控制政权，要么通过与其他的政治团体结盟来掌权。

但是“掌权的激进派”是否同他们在世纪之交时接替的“执政的共和派”存在巨大的差异呢？时代不同了，作为从城市，尤其是郊区选举上来的代表，他们摆出了一副雅各宾式的平均主义者的姿态。而作为现代社会的牺牲者的代表，他们的位置却已被社会主义者所替代。随着时间的流逝，支持他们的选民已发生了变化，他们成了农村或受城市化进程影响较少的地区的居民的代言人，成了商人、手工业者、小公务员和雇员利益的维护者，总而言之，他们是甘必大称之为“新阶层”的中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这些属于“新阶层”的人与其说是平均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极端仇视当局和各种社会权威，并且已经深受一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既狭隘又无情的哲学的激励，这种哲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最好的表达者与教导者当推阿兰。

激进派的上台吸引了一些新成员的加入，这些人多为仕途不顺的年轻政治家，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各种结盟的机会，即便此举有时会有损于他们的权利。按照激进派的传统，他们只不过是不太重要的附庸而已。不过，议会中的大多数派别仍然遵循了原有的习惯做法，尤其是确认了共和派“并非处于左翼的敌人”这一原则。因此，激进派开始表现出它的两面性。这种特性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使它能够毫无困难地参与各种各样联合组成的内阁，如从1899年形成的“左派集

团”到1910年之后形成的中间派政府。

无情的胜利

为了“有力地维护共和政体，确保公共秩序”而组成的瓦尔德克－卢梭内阁很快就开始追击那些在德雷福斯事件的幌子下，对共和国造成威胁的人。当局对反犹主义联盟和圣母升天修道会的一些头目进行了指控和判刑，并勒令解散这个修道会。几周后，动乱局势在全国消散。虽然巴黎因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汇聚之地而成了外省躲避迫害的“右派的避难所”，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家存在着被颠覆的危险。

758

但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走出这场危机的共和派并不愿停留在原地，弗朗索瓦·戈盖尔曾指出：“在修改判决派确认了他们的胜利之后，德雷福斯事件的战果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为与事件之初的动机毫不相干的政治目的服务……德雷福斯派的神话逐渐退化为德雷福斯派的政治。”在胜利者看来，作为失败者的军队和教会当时曾让共和派品尝了恐惧的滋味，而今该由它们来品尝这种滋味了。

瓦尔德克－卢梭曾经选择显然属于右派的加利费将军出任战争部长，以免右派有过多的抵触情绪。但是，在几个月过后，加利费即被安德烈将军取代。安德烈对共和国忠心耿耿，尽管他曾受到上司的种种刁难，但他还是艰难地获得了升迁。为了保护同他一样的军官，安德烈对升迁制度进行了修改，将相关权力由总参谋部转移到战争部。为了更好地了解军官们的思想和行动，他设想组建一个监视系统，他的办公室主任将此交付给了共济会。结果，其收集到的情报出现在了共济会所属的“法兰西大东方”编的一些小卡片中。此事表明这一奇特的情报机构的秘密没有很好地得到保守，由此爆发的“卡片丑闻”让安德烈丢掉了部长职位（他在孔勃内阁中重新担任此职）。尽管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但是他却让军队实现了“共和化”，因此，不少对德雷福斯事件结束后不久呈现的气氛感到沮丧的军官宁可选择了辞职。

至于对教会的惩罚，瓦尔德克－卢梭选择的是对教会组织密切进行监视，而不是加以取消。很有可能他并没有授意反对教会组织，尽

管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因为教会组织的狂热而签署过类似法令。但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首先，议会修改了他的计划，并在1901年7月2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任何宗教团体只有经过某项法律的批准后才能建立，现有的宗教团体要建立任何新机构也得经过法令的批准。此后，爱弥尔·孔勃组阁，这一丧失了宗教信仰的前修道士并没有继承任何瓦尔德克－卢梭的温和精神，他采取了极端的措施，由于认为到处都存在着“教士的”阴谋诡计，孔勃从1901年开始严厉实施相关的法律。根据法令，他首先取缔了那些未经他授权的宗教机构，并关闭了数千所“私立”学校；然后，除了五个宗教团体之外，他拒绝批准任何建立宗教团体的请求，并驱散了18000多名宗教人士。最后，他甚至超越了1901年的法令，对已经获得批准的宗教团体横加指责，禁止其成员从事教学活动。

这一达到极盛的反教权主义浪潮在宗教势力占优势的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外部来说，强硬的庇护十世接替了温顺的利奥十三世（1903年8月），它导致了共和国同教皇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孔勃似乎还想废除《教务专约》，但是，由于内政方面的原因，他不得不在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之前挂冠而去。

政教分离

孔勃在推行反教权主义政策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即便废除《教务专约》亦不足以平息人们的狂热情绪。左派集团现在希望的是完全的政教分离。由报告人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所准备的《政教分离法》（1905年12月9日），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作为“平息法案”获得了投票通过。但是，它的实施却遇到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教皇庇护十世的难以理解，其二是反教权主义者的暴力行为。

759

同德雷福斯事件一样，教会财产的分割问题再次让法国人产生了分裂。“清点财产”的苛刻程序引发了新一轮的暴力冲突：正如克雷孟梭所说，被派去“清点蜡烛”的官员在很多地区遭到了天主教徒有组织的抵抗。公开的运用武力激化了矛盾。为了把内战扼杀在萌芽状

态，共和国需要克雷孟梭的高压和白里安的温顺。

政教分离法深深地触怒了法国的天主教徒。他们首先把它看作是一种对梵蒂冈的侮辱，他们尤其把它看作是教会的敌人为了消除教会的影响力和阻止人们入教的一种方法。就短期而言，形势确实发生了如此的变化：从 1905 年到 1914 年，每年参加神职首任礼的人数从 1563 人减少到了 704 人，去天主教小学和中学就读的学生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在某些农村地区，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被淡化，只是因为当地的某些社会风俗才使其勉强得以维持，世俗的婚礼数量激增，而洗礼仪式则逐渐被人们所抛弃。

从长远来看，政教分离措施产生了各种截然不同的影响。教会在任命主教和本堂神甫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教会招收的人员不仅在质量上，甚至在数量方面都有了提高。事实上，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任职的神职人员的数量曲线就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在政治领域，反教权主义失去了它主要的论战根据，这个根据就是，“黑衣人”（指教士）的权力会使国家蒙受各种危险。政教分离运动本应该把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但是，为了让这种分离真正为人们所接受，太多的政客却想把这两个问题混淆在一起。

克雷孟梭：破坏罢工者

左派集团得以提供的政治稳定——从 1899 年 6 月 22 日到 1905 年 1 月 18 日，一共只有两届政府掌权，即瓦尔德克－卢梭和埃米尔·孔勃政府——随着社会党退出多数派而告终，虽然饶勒斯不愿意这样做，但 1904 年的阿姆斯特丹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强迫法国社会党退出。与集团分裂相对应的是法国社会冲突的加剧，这绝不是一种巧合。我们可以说，从 1905 年开始，20 世纪的问题，也就是工业社会的问题被提到了首位。人们可能会思忖，法国的统治阶层是否成熟到了足以应对这些问题。

在这方面，克雷孟梭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此人在 19 世纪 80 年代是一位毫不妥协的激进派，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极左派在议会的领袖和温和派内阁的绊脚石，1906 年，他进入萨利昂的内阁担任内政

部长，后于同年10月25日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克雷孟梭内阁维持了三年左右；他个性鲜明，在任期内向法国人许诺会实现多项改革（在他的任职宣言中列举了17项改革计划）并“明确提出在政府建立民主制度”。

但形势的发展让克雷孟梭无法信守自己的诺言。1906年3月，库里埃雷的矿难造成1100多名矿工死亡，从而引发了一场酝酿已久的大罢工。尽管社会主义议员对此大声疾呼，但罢工还是遭到了残酷镇压。从1906年5月1日开始，倡导九小时工作制的法国总工会发起的罢工运动越来越具有革命性。1907年，法国中部的葡萄种植农因为饱受虫害侵袭和酒价下跌之苦而发动了暴动，被派去镇压的第17步兵团也发动了叛乱。1908年，政府同工会组织之间发生了公开对抗。当年爆发 760 的德拉维-维尔内夫-圣乔治事件是一起罢工事件，起因至今不甚明了。因为局势失控，镇压造成了几起死亡，这让克雷孟梭背上了“法国第一警察”的称号。德拉维事件揭示了克雷孟梭的悲剧：他提出了改革计划，但是社会斗争的发展不允许他这么做，不管怎么样，还没有开始改革，他就发现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法国总工会谴责克雷孟梭为“杀人犯”和“法兰西的野兽”，这一口号的无效性也表明了法国总工会的失败。后者陷入了革命工团主义的幻想之中，因为过分夸张的口号、暴力和轻率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局面之中。“革命的总罢工和为发动全面的社会革命而行动”的口号使之遭到了全法国人的反对。同政府和由激进派组成的多数派一样，法国总工会也无法在那个时代提出一个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民族主义的复兴

革命工团主义的过激行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已日益频繁地带有颇具煽动性的反军国主义色彩——的过火行为，与外交领域的冲突不断加剧一起，使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全国获得复兴。

外部形势的恶化，首先得归咎于德国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德皇威廉二世在泛日耳曼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工业家支持下要求实行

的。但德国的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法国外长德尔卡塞所奉行的轻率的外交政策的一种回击，后者通过同英国缔结《诚意协约》而巩固了同英国的外交关系，并试图侵占摩洛哥。先后在丹吉尔港（1905 年）、阿加迪尔港（1911 年）发生的两次摩洛哥危机，堪称是法德之间非常危险的紧张关系的写照。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思想运动正在法国展开。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统领法国思想潮流的是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唯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们，而在 20 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左拉等人已被一些新人，如巴雷斯、莫拉斯、佩居伊、克洛岱尔等人取而代之，他们当时发动了一场恢复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的运动。“1905 年，这个国家的民意特征和政治走向是冷淡而和平的，但在 1913—1914 年，我们发现它们已经变得积极、坚定，而且，如果不是好战的话，至少也是积极认识到了战争的危险——甚至是认识到了战争极有可能发生”（尤金·韦伯）。在尤金·韦伯看来，1905—1914 年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巴黎的产物，它由以产生的那些情感和偏见，就好比这场运动的前身在巴黎街头上唤起的危险的群众支持一样……即使在这里或那里缔结各种默契程度不一的联盟，民族主义从未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广大居民中取得选举的成功，牢牢掌握这些群众的，首先是激进派，其次是其他政治团体。但是民族主义这种偏见知道如何渗透到巴黎人的生活、思想以及社会之中，并控制和影响那些对此甚少接触的外省代表。”

民族主义的复兴首先会根据民众的需要制定计划，提出一些数年前已经过时的爱国口号，以博取民众的欢心。它唤醒了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让他们尊重军队和既定的秩序，提防德国的威胁。从政治和纯粹是议会的角度来看，它在“三年兵役制”之争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

自从 1905 年以来，法国的兵役期为两年。但到了 1912 年，柏林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计划：追加 10 亿马克的特别经费以增加德国的常备军数量以及德军的装备。1913 年 3 月 4 日，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巴黎的最高战争委员会宣布有必要增加常备军的数量。3 月 6 日，白

761

里安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个法案，要求把兵役期扩展至三年，7 月，众参两院在社会党和激进派的反对声中通过了新的兵役法。

对三年兵役期法案的反对，使左派集团在 1914 年的立法选举中得以重建。事实上，激进党在卡约的影响下，在 1913 年 10 月在波城召开的大会中已经决定采纳一项新的选举纲领，其内容包括：普遍征收所得税制，废除三年兵役期法；1914 年 1 月，社会党也对这一法案提出了反对。在 1914 年 4 月、5 月举行的选举中，三年兵役期法的反对者们协调一致地采取了行动，主要做法就是竞相退出竞选，以便确保别的同道能顺利当选。选举结果表明，他们的这一做法颇有成效，有 300 多名激进派和社会党人士当选，而中派和右派只有 260 人当选。

实际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许多激进派人士不顾波城会议的决定，在选举期间阻止其他人对三年兵役期法进行攻击。这是因为，“他们深知，他们不能反对其选区大多数选民所赞成的法律，否则投票时就会蒙受巨大危险”（尤金·韦伯）。另一方面，巴黎及巴黎盆地的部分地区在追随这场民族主义复兴运动。至于法国的东部，在第三共和国的头 25 年，这里一直是共和派的大本营，而今却完全开始向右转，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军国主义让他们感到惊恐——在这些被笼罩在德军控制的阴影之下的地区，反军国主义是无法让人认同的。结果，尽管三年兵役期法的反对者们一再努力，但还是未能让新议会废除此项法律。

在讨论军事问题时明显感受得到的民族主义的复兴，也在其他插曲中得到显示。1912 年 5 月，普恩加莱决定把圣女贞德节作为法定节日，1913 年 1 月，普恩加莱在右派选民的支持下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发现了一个新的联盟，其参加者有传统的右派、政府的共和派和相当一部分的激进派，这些人对于“团结、纪律和祖国”的口号很能够响应。

民族主义的复兴并不仅限于议会人士和知识分子当中，它很快就扩展到了人民大众。这一点在战争爆发时显露无遗：1914 年 8 月的宣战激起了所有人的爱国热情。8 月 10 日，社会党的《人道报》写道：

“同大小资产阶级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内心一样，人民的内心也充满了热情，他们离开家庭，义无反顾地投入各自的军营，投身于处于危急之中的祖国。”

8 月 26 日，总理维维安尼改组内阁。为了建立一个“国民联合”内阁，他邀请了社会党代表入阁，马塞尔·桑巴和儒勒·盖德响应了他的召唤。正如列宁所认为的那样，这一入阁行为并不是一次错误；相反，通过这一举动，社会党获得了一次融入法兰西民族的机会（长期以来它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并得以在 22 年之后轮到它执掌政权。

结论

从危机到“各类事件”，从各类事件又到各类丑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各种困难和危险。她克服了这种种困难，也经受住了对她来说并非是致命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很难说她已经真正作好了接受胜利的准备，但是，这一胜利至少给她带来了暂时性的荣耀。我们不妨得出这样的结论：自从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经历了种种政体，最终发现共和制最适合他们，或者借用梯也尔的一句话来概括，共和制是“分歧最小的政体”？

762

如果我们来看看第三共和国的制度建设，就会发现，1875 年的那些宪法性法律尽管缺乏充分准备和精心制订，却体现出简洁明了的巨大优点，从而为整个体制提供了一种灵活性。其更大的好处在于，修改的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不幸的是，这个优点却很少被人使用（只有儒勒·费里在 1884 年使用过），而且它体现的精神有失偏狭。与之相反，宪法的实施往往会因为领导人，尤其是像格列维这样的总统的个人行为的影响而受到歪曲。我们无法说这种改动是好事，恰恰相反，它们往往会削弱行政权，增强本不值得加强的议会的权力。议会制度变成了一个糟糕的制度，因为滥用质询权和出其不意的决议导致了议会制度的变质，更不用说议会讨论期间的高谈阔论以及“哗众取宠”了，头脑清醒的领导人能够清醒地感受到这些问题。他们，甚至是公众都能对内阁的不稳定引起的祸患而感到痛心。

但是，共和国最大的缺陷在于在政治上缺乏一个多数派，没有这样一个多数派的存在，议会制政体就必然会动荡不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只有显贵们组成的集团，它们关心的几乎纯粹是选举事务，人们称之为“委员会”。在议会内部，“集团”只是立场大体一致的上下院（参众两院）议员之间十分松散的联盟，而且他们可能是属于某些团体，也可能不属于任何团体。如果说党派的概念已经为人们所了解的话（从第三共和国创建之后，人们先后用到“共和派”和“布朗热派”等名词），那么，他们指的是不具备任何组织联系的有某种共同倾向的模糊的团体。法国很晚才出现真正的政党，第一个政党是 1901 年建立的社会激进与激进党。但是，它的组织结构并不严密，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无法把它在议会里的党派代表聚集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团体。直到 1911 年，它才要求党派内部的议会代表属于同一个团体。

右派则在 1901 年组织了民主联盟，1905 年组织了共和联盟。但这些团体也都无法建立委员会或联盟的网络，更不用说招募到数量众多的党派成员了，更多的党派代表的是各工会选民的利益。

只有左派在更迟一些的时候才建立起了真正的党派，也就是说在地方和全国范围内都拥有有组织的团体，且拥有人数众多的党员和实在的机构，盖德派和饶勒斯派联合起来在 1905 年 4 月建立了统一社会党，也就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一战前夕，它拥有 8 万名党员，在 1914 年 5 月的选举中它有 104 名代表当选，获得了近 150 万票。尽管发展迅猛，但它只是代表了少部分的法国人。

如果我们来看看在 1870 年到 1914 年间的法国政治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话，我们得承认，一旦等甘必大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侧影消失，我们所能看到的人均显得极度平庸。更不要说共和国的总统，他们的当选是因为他们的去留对于议会独揽大权毫无影响。总理的出名往往是因为他们无足轻重，他们当中最出名的一个是瓦尔德克 - 卢梭，人们在他下台之后誉之为“共和国的伯利克里”，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却让我们不无遗憾，某个评论家曾说过他是“一个平庸之辈，碌

碌无为”。不过，1900年之后出山的那一代政治家就要出色得多；人763 们可以提及的有“白里安、克雷孟梭、卡约，当然还有饶勒斯（显然还应该加上普恩加莱），他们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人们无法肯定，这些人在1914年是否还能够得到人们真正的赞誉。

在今天看来，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或许就是共和派的“风格”，也就是他们在面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时的应对方法和精神状态。我们会对相关人员进行严厉的评判，这首先是因为他们往往过度地受到过时的争论和斗争的束缚。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他们为复辟的幽灵，国王回归的可能性以及带有特权的不平等的“旧制度”而争吵不休，然而“旧制度”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寿终正寝了。接着，他们又为政教分离问题而争斗，也就是削弱教士的权力以巩固他们的政治基础，然而回到从前的危险几乎是不存在的。当法国人正面临如何去适应一个19世纪类型的现代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时候，他们却还在为18世纪、大革命之前，或稍好一点的话是督政府的问题而争论不休。

作为同过去斗争的胜利者，对他们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或许是如何来看待胜利。他们对斗争的失败者，如1879年的君主派，1889年的布朗热派，1899年的民族主义者以及1905年的天主教派的态度都是极其严厉而狭隘的。他们随心所欲地想要保持一种复仇的气氛，拒绝接受和解，也不接纳联盟。因为他们的失误，法国人在政治上至今还处于分裂状态，法国的共和政体不为相当一部分的法国人所接受。在战争前夕，如果说真的存在过一种法国式的（共和制）生存和运转方式——也许还是一种不错的生存方式，那么，当时对法国政治制度还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共和派并不希望如此。

第二十六章　知识传播和文化变革

764

1871—1914年，小学教师和受人诅咒的画家的时代

技术和工业革命、城市化、普选制和共和国的建立，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有多少天翻地覆的变革！这些变革对于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学术性文化及文学艺术方面的伟大作品，也是人类学家所指的文化）、对法国社会（或更确切地说，对构成法国社会的不同群众）自身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造成了何种反响呢？要对此作出评价是颇为棘手的事。

当然，最初我们对“高尚”文化的代表者了解很多，我们依然在读、在看、在听他们的作品：如普鲁斯特、塞尚、德彪西。但对于二流作者、对于通俗小说家、对于学院派画家、对于所有在发行量上和在德鲁奥拍卖行里取得成功的作者、对于诸如奥内、德古塞尔、布格罗之类的人，我们又有多少了解？是什么标准将传统准则的赞美者和先锋派的大胆支持者区分开的呢？仅仅是趣味和直觉、社会环境之差异或思想对立的事情吗？最近教育史方面的研究使我们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清晰，但我们仍然很难评估学校在农村世界的传统观念弱化过程中所起的确切作用。而城市平民阶层的文化轮廓也很不明朗。因此，本章不拟盘点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亦不打算为已经澄清的问题提供答案；我们至多只能提出某些假设并尝试提出一些可供思考的论题。

某些框架看来已清楚地浮现出来：首先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表面上的稳定，这种文化表达的是名流们的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文化，不过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贵族残留物，而且还应注意到资产阶级的多样性，每种资产阶级都带有自己独特的格调。这种文化通765 过学校和媒体广泛渗入大众阶层，同时也瓦解了与旧式的乡村社会紧密相连的传统心态结构。最早的抗议来自工人世界，更准确地说，来自工团主义者，这些人试图推动一种真正的、完全独立于上层阶级的大众文化。

但这次尝试戛然而止。更为深刻、更为激进的是“先锋派”的挑战，不过这场运动恰恰兴起于同一些支持“官方”标准的“资产阶级”阶层。文学的抗议是暧昧的，它既表达出怀旧之情，又反映了对新形式的探索。但由印象派开启、并不断走向激进化的造型艺术革命，与 1900 年代的科学发现一起预示着我们 20 世纪的新世界，对于这场革命所酝酿出的文化变革，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其中的效应。

一、主导文化

社会等级和学校组织

名流们之所以能维持其优越地位，不仅是因为财富，也得益于在学校被永久化的文化特权：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主要导师安托万·普罗斯特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证。

确实，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个年龄问题：通过 1889 年开始组建的高等小学，有天分的大众阶层的孩子在取得修业证书后，会走上普通的人生旅途，而名流们的孩子可以进入公立中学的预备班，从此断绝与农民和工人的孩子们的联系，因为公立中学预备班是收费的，尽管初等教育免费。每种教育层次都与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源相对应，它们在声望上的差异反映了社会阶层的等级次序。就读于公立中学是资产阶级的一个象征。中等教育不是免费的，公立中学

的奖学金数量有限（每个年级2%左右），而且优先授予公务员的孩子（小学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作用颇大）。

障碍不仅仅限于物质方面。由于家庭环境难以提供支持，平民阶层出身的孩子要想取得成功就更加困难了。他是个“文化失根者”，必须放弃自己群体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模式；相反，出身优越的男孩接受中等教育则是轻车熟路，因为其家庭很早就在培养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具备的素质——抽象的癖好和精湛的“论说”技艺。

贵族文化？

实际上，法国的教育比别的国家都更自觉地与日常实际和青少年的具体经历割裂开。这方面最明显的标志是希腊－拉丁“人文学科”所占的重要地位，此外还要加上古典文学，因为这被视为“古代人”的继承者。

当然，确实存在一种试图调和“学校和生活”、使年轻人适应“经济生活和实际工作”的“现代主义”思潮。正是由于这一思潮，1880年，人们降低了古代语言的地位，增强了法语和现代语言、科学及历史－地理的教学。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为将来从事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孩子开办的“专门教育”——更具体地说，就是没有拉丁语的教育——成功地建立起来。1902年，专门教育成为各高中的一个现代分支，并摆脱了法律上的低下地位。但是这种趋势仍然十分微弱。任何削弱拉丁语和希腊语地位的做法似乎都是对“法国文化”的质疑，对1902年改革的各种反应就证明了这一点。高中的那个现代分支 766 深受鄙视：招进来的学生是最平庸的，课间休息时，古典班的学生嘲笑“不学拉丁语者”为“牲畜”。对大多数法国资产阶级而言，接触文化的唯一方式是通过某种古典学的训练，因而质疑古代语言的优越地位是大逆不道的。如何解释这种热烈而毫无通融的痴恋呢？

毫无疑问，有些人从中看到了某种社会屏障。迪庞鲁主教曾这样反驳他的政治对手：“领导阶级将永远是领导阶级，因为它们懂拉丁语。”将修习拉丁语看作“上层社会”成员的标志，这就为“新社会阶层”的上升设置了一个附加的障碍。

但是在西欧其他国家，中等教育同样也是名流们的天下，虽然古典人文学科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在法国，领导阶级并非是唯一注重人文学科的，专门教育的一位反对者十分准确地指出，“我们最卑微的市民也眷恋拉丁语和希腊语”，这就道出了前述解释的不足之处。实际上，高中一直在延续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大革命之前。旧制度时代的年轻贵族和年轻资产阶级，如果不是通过完全一样的方式，至少也是以同样的原则教育出来的：拒绝功利性，蔑视“现代性”，崇尚古人（拉丁文的论战已然存在了！）。确切地说，人们的观念与希腊人和拉丁人的文化观念十分接近：鄙视交易（这是贵族式的闲散的对立面）和体力劳动（卑贱的职业）；有教养的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但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改善自己周围的世界。

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部分名流竟依恋于如此“贵族化”的看法，这看起来让人费解。不过，这种悖论只是个表面现象：难道它反映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一个持久而根本的心态特征——面对经济变迁时的矛盾立场吗？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对技术变革充满疑虑并拒绝这种变革，反过来说，他们更喜欢那种稳定人心但僵化停滞的保护主义政策，而不愿去迎接必然会加速变革的竞争风险。这难道不就是让－马丽·梅耶指出的对“法学家的文明、而非对生产者的文明”的眷恋之情吗？因此在这个领域，第三共和国确保了某种传统的延续。不过另一方面，它创办了女子中等教育，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改革。

培养认同共和主义的女生

在 19 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年轻女孩是为了私生活中的私生活而接受教育”（迪庞鲁主教），妇女的“天然”使命是在家中；她只要学会做一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就足够了。从这一意图出发，女孩应在宗教寄宿学校度过 5—6 年的时光，她们须在那里培养自己的虔诚之心，学会读写、算账和待人接物。她们还学习刺绣、针线活儿，甚至可以画画、弹钢琴。这种教育与男孩很不相同，它使得两性分裂为两个文化世界，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交往。有些人对此感到惋惜，儒勒·费

里就曾说："如今，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隔阂，这就使得很多表面看来很和谐的婚姻掩藏着最深刻的观念、趣味和情感上的分歧……"此外，像实证主义者和共和派一样，他也对教会在家庭教育中保持的控制力感到不安，因为"掌握妇女者即掌握一切……妇女要么属于科学，要么属于教会"。对所有自由主义者来说，国家介入妇女教育已显得十分紧迫。

第二帝国时，维克多·杜律伊就在公共场所为女孩开设了由公立中学教师传授的付费课程班，但此举成效甚微：课程班总共只有100来个，学生几乎不超过4000。在此期间，寄宿学校的教学水平有了改善，女学生可以取得较高的文凭，有些人甚至勇敢地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但儒勒·费里的担心得到了证实，妇女并不接受共和国。因此，刚刚掌权的共和派甚至在创办初等教育之前，就于1880年设立了女子高中和初中。一个教师团也随着色佛尔高师的设立（1881年）而建立起来，并举行了女子教师资格会考（1884年和1894年）。 767

这些机会主义者也像保守派一样，深信妇女天然就是低劣的，他们只想"把共和主义的乡村交给共和派男子"，而没有想到要对女孩进行与男孩同样的教育。女孩的学习期限只有五年，然后获得中等文凭。这些女子中学不教授最富盛名的学科，即古代语言，而仅仅教授法语、另一门现代语言，以及少量的科学和史地课。不过，在1914年大战的前夕，一些女子学校引入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这是实现男女教育统一化的先声，这种统一最终在1924年完成。

但长期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一事业的规模并不相称。大多数资产阶级仍情愿为他们的女儿选择宗教寄宿学校，而把男孩送进公立中学。学校的分工亦预示着未来的家庭分工，这一点我们随后还会看到。不过，"1900年开始出现的全新制度，到1902年时变得十分清晰"（梅耶）。这既是反对宗教团体斗争的结果，也是思想演变的象征。人们既认识到女子高中的知识价值，也意识到女孩接受更坚实的教育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结构的确定

第三共和国之前，只有法学和医学这两个有明确职业培养目标的学科组织良好并拥有学生。文学和科学学科的唯一目标就是颁发学位，特别是为中学结业考试评委会提供成员。文学学士学位只是个“高级的高中结业文凭”，一年之内就可以取得，无须特别的准备；真正的科学训练是在各高中的预科班，以及随后的综合工科学校、国立博物馆和法兰西学院中才能见到，专攻文学或科学的大学生还不存在。学士学位申请人总是可以免除勤学之苦，只须在考试之前注册登记。由于缺少学生，大学教师只得面向大众，他们露脸的舞台更像社交大会，而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大学课堂。在当时，大学人士之所以受人赏识，主要在于他的口才和通俗化的技巧，而不是他的研究能力和教学业绩。与德国的大学相比，法国的大学确实很凄惨，法国的知识分子亦越来越把德国在萨多瓦取得的胜利以及1870年后在色当取得的胜利归因于它的大学。

巴斯德、贝特洛、克洛德·贝尔纳很早就对手中资源的匮乏感到愤怒。在维克多·杜律伊时期的一项调查证实，他们的抱怨有其道理。为了推动研究，杜律伊于1868年设立了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不过，这些改革的根本性措施恰好与共和派的掌权不期而遇。这些改革是在一批大学人士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们来自各个学科，聚集在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会中，并以《国际教育评论》为改革作宣传。在这个研究会中，有历史学家（拉维斯和摩诺）、法学家和经济学家（里昂－冈、埃米尔·布特米——自由政治学院的奠基人）、巴斯德和马塞兰·贝特洛，他们与政府和政界保持着持久的联系，媒体对改革也极为关注。 768

1877年，学士奖学金设立（不久又设立了教师奖学金），文学和科学学科终于可以招到学生了。这一公共资助要求接受者必须修习大学讲师开设的学士和教师资格课程，为此，特意设立了讲师的职位。随后，学士学位教育变得更有条理，也更为专业化了（1880年和1907年改革）。同样，在科学教育领域，文凭制度建立了起来（1896年）。学士之后的高等研究文凭势必要进入研究领域。最后，教师资格会考

也于1885年采取了现代形式（包括长时间的笔试和大量教学口试）。至于已经定型的医科和法科来说，人们只须对这一体制进行调整。为此人们加强了科学在医学研究中的地位，设立了物理学、化学和自然科学的文凭，大学生可以去科学系科学习（1893年），而法学博士则区分为法律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两个分支（1895年）。到处都在建立新的院系，例如在巴黎，当时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如比维·德·夏凡纳——进入了现在的索邦，里昂、里尔和波尔多也是如此。

取得的成就相当可观，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和大学声望的上升就是明证。此后，大部分中学教师都出自大学院系，科学研究事业开始出现在大学实验室里，专家取代了汲汲于名利的演讲者；但这些都根本不能阻止大学学者的影响力大大超越其校园的围墙。这些学者对整个教育事业行使着名副其实的道德裁判权。除此之外，在某些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党”、“教授共和国”在1900年前几年经历了一段美好时光，这表明名流们对大学是充满信任的。不过，在资产阶级的法国，文化模式的代际传承并不仅仅依赖于学校。

文化和家庭环境

我们已经提到家庭在高中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家境优越的孩子很早就得学习“正确的表达法”，避免外地土话和地方口音，他要养成阅读和讨论的习惯。这样的孩子已经与其他社会群体判然有别了。不过有个现象可以平衡这种影响：与仆人的长期接触，这种接触是一种与大众社会文化环境的对照，即便仆人这一社会群体因为与名流的联系而有所变化。普鲁斯特给我们提供了最鲜明的例证：通过巴尔贝克大饭店的差役瑟雷斯特·阿尔巴莱，他发现了中央高原民间语言的风味；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弗朗索瓦丝在《追忆逝水年华》中的特殊地位，此人是他祖母的女佣，后来他把她当作自己作品中的见证人；正是通过她，作者懂得了圣安德烈－德尚的中世纪雕刻家想要述说的东西，因为她让他深入到“一个既古老又直接的传统中，这个在口头传承中有所变形但未曾中断的传统，它虽然难以辨认，但又活生生地存

在着”。事实上，很多孩子在倾听他们的奶妈或家仆给他们讲述的故事和传说时，也就接触到了民间文学和 19 世纪末依然活跃于乡间的叫卖文学的深处。普鲁斯特超前于历史学者，他第一个感觉到了相距十分遥远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皮埃尔·吉拉尔和居伊·蒂伊利埃也提供了一些很有启发意义的证据。这些资产阶级世界里的局外人，他们在孩子的意识中有何种价值？他们的形象如何？要回答这个问题，需有其他的研究。

儿童文学：社会融合的媒介？

儿童文学是另一种传递文化模式的工具，有关的研究难度较小，虽然整体性研究仍付阙如。那个时代是这种文学形式快速发展的时期。769 最早的儿童图书出现在第二帝国，当时出版了塞居尔伯爵夫人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并推出了大型丛书，如“蓝色文库”和“玫瑰文库”。没有插图、严厉而富训诫味道的教育刊物（如《青年人报》）让位给儿童喜闻乐见的带插图的期刊。这种风格首先是由夏尔顿在他的《田园杂志》中开创的，该杂志更广泛地面向家庭读者。赫茨尔也采用了这种风格，并在 1864 年对它进行了改造，以便满足儿童读者，当年他创办了著名的《寓教于乐杂志》，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儿童百科全书”，正如其标题揭示的那样，它既注重教育性也照顾到了娱乐性。赫茨尔组织了一个出色的班子，其中有儒勒·凡尔纳、让·马塞、埃克托尔·马洛和维奥莱－勒－杜克。每期杂志都有一章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还有诗歌、一篇儿童生活小说、幽默故事和一篇科普文章。后来阿歇特出版社推出了面向小女孩的杂志《模范乖乖》和针对青少年的《青春杂志》，天主教人士也开办了专门的出版物。

儿童文学的萌生显然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场运动存在联系，这场运动强调童年的重要意义，认为童年是一个应受成人世界保护的自主天地。而在此前，儿童更多被看成尚不完善的成年人，对他们无须特殊的关照。这些书籍的内容值得关注，它并非无关紧要：面向女孩的文学，其世界观与面向男孩的文学中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传统世界

面向女孩的文学首先沉浸在一片宗教的、甚至是天主教的氛围中。社会像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每个人都得安守自己的本分（虽然塞居尔伯爵夫人以神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对这种观念进行了调适）。穷人最重要的品德之一就是不要嫉妒富人，虽然确实存在、作者们也承认有些富人很邪恶。吉拉尔丹在他的一篇小说中为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唱出了颂歌："这些穷人品行端正。在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不止一次地摈弃对富人的嫉妒，从来都只要求他们应得的东西。"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部分来自上层资产阶级，甚至来自贵族；作品中描述的环境是上流社会，以致天主教徒的阅读导师贝特莱昂神甫担心，这种氛围会给来自贫苦阶层的读者带来困扰，他说："就拿泽娜德·福勒里奥来说吧，她某些著作中有一些社交场面的描写，其中的奢侈阔绰可能让缺少教养者和乡村居民感到不安。"这种文学中还有一种对传统世界的留恋之情：人们抱怨因"文明的进步"带来的社会堕落，在《凯基农的继承人》中，卡多克这样说道："我们可怜的布列塔尼，它曾长期幸运地甘居人后，但现在竟大踏步地迈向到处蔓延的平庸趣味，看到这一切我很痛心"。人们赞赏的是农村和外省小城镇中简单而自然的生活。小说家们偏爱的人物是法官、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官员，这些人都与现代经济毫无联系，他们的旧式财富根本不是来自工业和大型商业，相反，商业活动所吸引的通常是些不正经的人，无论如何，他们是些不择手段的家伙。最后，这些小说还有排外情绪，其中的德国人和英国人很少招人喜欢。

进步主义的世界

面向男孩的书籍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宗教中立是其中的一个普遍法则，不过贝特莱昂神甫对此感到伤心，他在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时候如此说道："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他几乎从来没有以自己巨大的时尚影响力来为宗教服务。实际上，他的书总是中立和世俗的。"在面向男孩的作品中，人类的科技成就也受到称颂：例如，当时最受欢 770

迎的题材之一是鲁宾逊漂流记之类的故事（从1840年到1875年，法国版的鲁宾逊共有43个）。这个题材的意义显而易见：论证人类的创造力。特别是以科学知识为支持的创造力。从这个观点来看，在“神秘岛”登陆的那位遇难者的冒险具有榜样性意义：白手起家的人可以逐步重建现代文明。作为开山者的儒勒·凡尔纳为自己时代的工业和技术成就作了一个总结。因此对这个全速演进中的世界并无半点歧视：作家们偏爱的主人公是全身心地致力于改造这个星球的人，是工程师、学者和探险家。这种视野也更为广阔，虽然作品中相当普遍地存在民族主义和仇视德国的情绪，但欧洲人在征服世界方面的团结感也是存在的。不管怎样，年轻的法国人还是习惯于碰到讨人喜欢且富有进取心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就充满这类内容。很多英语作家的译作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梅恩·里德以及该时代末期的杰克·伦敦的作品中。要从这些作著作中提炼出关于法国社会的观念是很困难的；比如，穷人被忽视了，或不如说他们是受怜悯和批判的对象。

因此，女孩接触到的基本上是传统主义的、保守的文学，它的循规蹈矩使其成为社会融合的一个媒介，而男孩面前敞开的是一个“进步主义”的自由世界。当然，我们应对这种对立稍作修正，确实有一些真正中立的作品。姐妹可以“偷看”兄弟的书，反过来也行。有些作品男孩女孩都爱看，例如《马露西亚》。该作品曾有幸在1875年的《时代》上连载，它讲述的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马露西亚的事迹，她曾领着一个乌克兰独立运动的英雄穿越俄国敌人的防线，所以这本书像斯塔尔为女孩写的其他小说一样，也与自由思潮有关。相反，在布雷略出版社最多产的作家——他们经常在《草庐夜话》丛书中发表作品——中，拉默特仍在《殉道者之子》、《死亡收割机》、《卡米扎尔》中捍卫传统主义立场，虽然他也为男孩写了一些冒险小说。不过毫无疑问，“两个流派”之间的斗争将在儿童文学中以另外的形式继续下去，而我们曾提到的对立也与学校的分布状况巧合：为女孩开设的是寄宿学校，而高中是为男孩设立的。

此种文学的持久影响

笃信宗教的家庭对这种“与学校平行的教育”的重视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在一个尚不具备当代视听设备的时代，童年读物留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且以儒勒·凡尔纳为例，他激起了多少人的科学志向啊！贝兰曾说，要不是儒勒·凡尔纳，他也许永远不会从事电讯研究。探险家夏尔科说自己也对这位《80天环游地球》的作者怀有十足的崇拜之情。夏尔·里舍则把他们这一代人对于航空的热情归因于看过《气球上的五星期》；利奥泰、科克托和阿波利奈尔，无一不是这种影响的见证人。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在面对现代世界时是何等踌躇，而儒勒·凡尔纳对未来持一种热情的乐观主义，他很大程度平衡了对昨日世界的留恋。

归根结底，关于这些作品对儿童精神状态的影响，我们仍只有一个十分片面的看法。年轻的法国资产阶级从这些阅读中获得了些什么呢？这种“教育”与公立中学或寄宿学校、以及更为古老但同样很有效的幼年教育（这种教育来自家仆、母亲——如果她有时间的话——且不说祖父母了）之间是如何综合起来的呢？成年人的例证、通常在年迈之时写下的回忆，一般都是根据当下的生活而对过去进行的重构：对我们而言，儿童文化世界的大部分面目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了。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成年人的心理世界中，幼年时光和人生最初的经历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我们最多可以推想，童年文化和成年文化之间应该不会存在深刻的断裂；如果我们根据代际关系来判断的话，在年轻时代，社会融合因素似乎要强于“分裂”因素：冲突是有限的，文化遗产在传承之时没有受到质疑。中学教育中没有什么“争执”，80—90年代成立的大学生联合会，其核心主旨在于获取官方文化世界中的头面人物的庇护，这些人物如拉维斯、摩诺和沃居埃子爵。惟一的骚动形式是学生们的起哄，这是所有人都认可的“安全阀”。文化变迁与年龄段的到来完全不是一致的。在此，我们需要考察一下成年人的世界。

771

巴黎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文化生活丝毫没有逃脱法国的中央集权主义。如果说领导阶级的文化传播到了全国的话，那么这种文化首先是在巴黎形成的。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机构的存在，如国立博物馆、法兰西学院和各高等学校，巴黎在很大程度上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上居于支配地位；优越的待遇吸引了大学和高中的优秀教师（1913年，一个取得大、中学教师资格证的巴黎人比其外省的同行要多挣50%左右）。但在其他文化表现形式上，巴黎的地位甚至更为重要。自《幻灭》问世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一个要想在文学、艺术和新闻界取得成功的外省有志人士必须在巴黎“崛起”。首都拥有很多这类保障其优越地位的机构。

巴黎提供了很多供作家们崭露头角、成就或消解名望的聚会场所。首先是沙龙：“文学青年每天要到时髦的妇女内室中待上五六个钟头，这就是眼下发迹的步骤”，一位评论者这样说道。例如，格勒菲勒伯爵夫人的沙龙支持的是音乐家，卢瓦内夫人的沙龙则为法兰西学院的选举举行预演，而人选法兰西学院通常被视为一个流行作家创作生涯中的加冕礼，至少对那些文风典雅、“思想正统”的作家来说是这样。有些人批评沙龙是“陈词滥调和愚蠢风尚的学堂”，在言辞激烈的莱昂·都德看来，沙龙只会炮制出“罗贝尔·德·蒙特斯丘，以及不可胜数的无聊而滑稽的诗歌”。与沙龙比起来，批评者们更喜欢咖啡馆这种“自由坦率而又风趣幽默的学堂”。但在文学界，咖啡馆的地位较为模糊。大林荫道上的咖啡馆是成功的作家们经常光顾的聚会场所，如那不勒斯咖啡馆和第三共和国初年的托尔托尼咖啡馆，这里讨论的问题和表达的观点与沙龙并无二致。拉丁区的咖啡馆以及1900年以后蒙马特尔的咖啡馆吸引的顾客较为复杂；时髦的作家、梦想成为作家的人以及“受诅咒者”、“反成规者”相互往来；这里也是波希米亚分子们喜爱的地方；人们经常可以在这里争论新艺术和先锋派文学；我们现在已置身于名流们认可的官方文化领域之外了。

另一方面，名流们习惯于去那些有资助的剧院，如国立歌剧院、

喜剧院和法兰西剧院，这些剧院每年收入超过200万，其表演既是艺术演出也是社交盛会，因此，除了1900年之后的国立歌剧院偶尔为之外，它们往往缺乏任何大胆的举措。演员谨守传统，其艺术标准已经在科学院的选举中、在备受操纵的媒体宣传中、或因某个有影响力的沙龙的支持而得到认可。街头剧场专门上演娱乐节目，那些受人欢迎的演员在“法国人”剧场常年打拼之后，更偏爱私人剧场中更为自由的剧目，这些演员如文艺复兴剧院中的莎拉·伯恩哈特，圣马丁门剧场的科克兰，以及沃德维尔剧场的蕾雅娜。某些作品在成为法兰西剧院的演出剧目之前曾在这些街头剧院做过尝试，如1897年12月28日圣马丁门剧场上演的《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曾轰动一时。除了这些剧场外，还存在第三类舞台，但这类舞台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已经没有联系了，它们的不成功首先就说明了这一点。活跃在这里的是一批探索新戏剧艺术的先锋派，先是安托万和他的自由剧院，这个剧院试图把自然主义原则运用到舞台上，接着是象征主义戏剧的捍卫者吕涅-波埃，大战前夕则有雅克·科波和老鸽舍剧院。

772

最后，巴黎还集中了大部分的出版社，特别是主要的新闻机构。巴黎报界不仅仅是个传播当时文化观念的工具，它还积极参与对文化观念的创造和改造。不过，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两种报纸开始清楚地区分开来，一种是发行量很大、仅限于发布消息、面向大众读者的报纸（我们稍后还要谈到它们）；另一种是观点和评论性的报纸，它们面向的是所有自认为“有文化”的读者。这种观点性报纸还是很活跃的：巴黎出版的日报有15种左右，它们代表着各种立场，从社会主义到反犹主义乃至波拿巴主义均有之，有几家报纸的发行量甚至接近10万份。

这些报纸的外在形式几乎一成不变，现代插图技术亦未能使报纸气氛活跃起来，读者关心的不是这个。如果以报纸的内容来评判的话，读者更关心的是文学，而不是经济。在各家报纸中，文学内容占据着重要地位，更不要说那些以文学为主要取向的报纸了——如《吉尔·布拉斯》和最初的《巴黎回声报》。在所有人看来，文学和戏剧评论

跟政治流言一样重要；人们在《辩论报》上阅读魏斯的连载剧，接着是儒勒·勒梅特尔的作品；在《时代报》上，弗朗西斯科·萨尔塞[①]是个令人敬畏的强力人物，而儒勒·于雷就文学演变问题对64位名人的问询则开创了采访调查这一形式。各家报纸在争夺作家，《高卢人报》吹嘘自己拥有16名院士。专门为某个文学事件而撰写的社论也不在少数：《辩论报》的领导就曾为保尔·布尔热的《门徒》撰写文章。在受古典人文学科培养起来的名流们看来，文学就是这个国家演变的写照。《两个世界评论》、《新评论》和《蓝色评论》等大的杂志、甚至还有编年史作者，都呈现出同样的面目，都把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

这些报纸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但它们都捍卫某种古典风格和定义明确的文学体裁，谁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接受这些，不过在造型艺术领域，对正统性的捍卫甚至组织得更好。

法兰西研究院：艺术正统性的保护人

较之其他领域，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在造型艺术方面更致力于控制创作者并防止任何创新。实际上，画家若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跨越某些特定的阶段。首先，他得进入艺术学校；在那里，他须争取进入一位研究院导师的画室，学到该画室的技法，由此，他才会有机会获得供其完成学业的罗马竞赛奖。得奖者会在美第奇庄园小住，之后他会赢得官方订货；同时，他还会在艺术品展览会上呈献作品，这是每年一度的艺术盛事。在得到评审团认可之后，他可以举办画展，接受奖章；媒体开始谈论他；《插图报》刊登他的一幅作品的复制品；上流社会的人士邀请他绘制画像；他的画作卖得很贵；于是，他在私人公馆里过上了优渥的资产阶级生活；他可以去研究院露脸；被选入研究院之后，他也可以招收临摹自己风格的学生。对于雕刻家和其他艺术家而言，成功的道路与此类似。在艺术生涯的所有阶段，艺术家都得依靠艺术科学院。监督艺术学校教育的正是艺术科学院，因而它

① 萨尔塞（Francisque Sarcey，1827—1899）是位专栏作家和戏剧评论家。

也对罗马竞赛奖的初试和最后的结果拥有控制权。艺术科学院的成员 773 也是各艺术委员会和评审会的组成人员，这些委员会就官方订货问题向国家提出建议，而评审会则负责在各艺术展厅中颁发奖章。

但糟糕的是，艺术科学院只捍卫一种美学，那就是古典主义，担任法兰西研究院成员达40年之久的安格尔把这种原则推向了辉煌。学院派画家格莱尔曾向莫奈建议这种风格："因此您要记得，年轻人，每当创作一幅画像时都应该想起古代风格。我的朋友，作为研究素材，大自然是非常好，但它不会提供有意味的东西。"画室中的绘画作品和官方艺术中的题材是有等级的：高贵的题材是关于历史和神话的画作以及肖像画，风景画是个次要门类，而表现民间或家庭场景则被视为趣味低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对"过于革命"的德拉克洛瓦的反动，画师们总是担心"此类可恶的色调"会进入他们学生的头脑中。

在艺术品展览会和这里描述的路径之外，很少听到称赞之声，至少在我们谈论的这个时代的初期，还不存在出售和评价艺术品的平行机制。对此，雷诺阿的解释颇为精到："我想努力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去艺术品展览会。在巴黎，一个没有参加过展览的画家也就有十几个艺术爱好者会喜欢他。对这样的画家，巴黎有8万人对他不屑一顾……我参加展览纯粹是商业性行为。"实际上，公众也完全赞同研究院的看法。1863年就有参观者为官方评审会说理，并嘲笑被排斥者的展览会上的作品。学院派的绘画就是那个时代艺术品味的完美典范。

鄙视现代世界

在建筑界，所有的风格，从希腊神庙到拜占庭教堂，都有人在模仿。在建筑中，技术进步和创作之间的分离现象特别明显。钢铁和钢筋混凝土等新的工业材料有可能提供新的建筑形式，但建筑师们长期拒绝利用这些可能性。只有古代人创造杰作时使用的"高贵"材料——方石和大理石——才值得建筑师们考虑；他们把其他材料留给了工程师们，比如埃菲尔，这些人"不能妄称可以创造美，因为他们创造的是实用性，使用的材料是工业品"。所有思想纯正的人都对1889年万国博览会之际出现的那座铁塔感到愤慨。对于著名的自由女

神雕像，人们记住的只是学院气十足的巴托尔蒂的贡献，而真正的杰作其实在于埃菲尔给雕像设计的内部构架。这种审美性与“实用性”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难道不就是拒斥工业文明的一个新特征么?

私人生活中的装饰也逃脱不了这种模仿趣味。直到第二帝国时，领导阶级中的每一代人都创造出了一种室内装修风格。但到第三共和国，人们不再创造，而是在复制了。人们以亨利二世的餐柜、帝国时代的独脚小圆桌、日本的小摆设和竹制扶手椅来布置房间。唯一的创新尝试是“现代风格”。若从合乎情理的认识出发，应该存在一种与当代各种骚动相关的艺术，但这种努力失败了，因为没有实现必要的决裂。现代艺术将蜗纹和阿拉伯线纹推广到各处，并为我们留下了吉马尔地铁站入口的创作、加雷和拉里克的玻璃制品——以及对于这种艺术的戏谑称号“面条风格”!

逃向过去与一味抬高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的高中教育并非没有关系。但这种逃避也反映了名流们的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作为“文明”的合法继承者，他们当然有权复制古代人的作品。这还是一种防备历史感的手段，创造与过去决裂的新形式就是承认运动，承认演变。资产阶级的法国是逃避时间的，它追随的是一种已然发现的永恒之美的理念，现在只需仿造这种美就足够了。这种美生活在一个凝固的艺术世界中，它没有历史，因为它自身就是“历史的终结”。这到底是高傲的象征还是一种潜在的焦虑的表现呢?说到底，这种审美理念是法国理性主义的表现之一，而这种理性主义又是领导阶级的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特征之一。

774

理性主义文化和科学发展

理性主义（且不说理智主义）的传播工具既有中学教育，也有哲学思想，甚至还有流行文学。人的尊严完全在于他的理性，因此应该努力开发理性的力量——分析能力、批判精神是首要的品质，感性、直觉、自发性都是被鄙视的，外在于“民族天性”的（仿佛是北欧和日耳曼的懵懂）。浪漫主义从来没有被完全接受过，1848年后，对浪漫主义的反动浪潮十分强烈。天主教领导阶层曾在民众当中展开为神

迹和超自然现象辩护的运动，但他们也明显带有某种弥散的理性主义的痕迹。男子宗教学校的教育与高中并无差别，神学院里竟然有人为信仰主义而深感担忧，因此人们教授的总是古典时代的理性化神学。

不过，在法国资产阶级当中，这种理性主义随着实证主义的发展而带上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色彩。1830 年，奥古斯特·孔德便宣称人类进入了第三个时代，即实证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已不再需要宗教和形而上学，因为科学已经取代了它们，科学在解释并改造着现实。科学成就似乎证实了他的预言。科学的发展不是纯粹的民族性现象，但法国学者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嘉当、阿达马尔、普恩加莱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卡耶泰和克洛德成功地将任何一种气体液态化，从而为创建冷冻工业作出了贡献；布兰利参与了无线电报的研制。不过，法国科学研究中最出色的成就无疑是在放射性领域：1896 年，贝克雷尔发现了放射性物质的辐射；两年后，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发现了镭；而莫里斯·德·布罗伊则对 X 射线进行了光谱学研究。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则以巴斯德“革命”为标志——灭菌、防菌和各种疫苗接种：几年之内，医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巴斯德的工作被巴斯德学院的弟子们继续推向前进（1894 年，卢发现了白喉血清）。

但实证主义赋予了科学更伟大的雄心：不仅要解释自然，而且要解释人。在实证主义的推动下，人文科学试图根据决定论的原则进行自我建构。1863 年，泰纳就曾以外在环境、种族和具体局势来解释作家的行为。涂尔干受孔德思想的启发，奠定了最早的关于人类集体的科学准则，即社会学。历史也不能避免这种创新潮流，更何况德国历史学的进步（兰克、蒙森）已经成为一个必须应付的挑战：高级研究机构建立了起来（1874 年的罗马法国学院；1876 年创办了《历史评论》）。崇尚科学的历史学家希望借助于正确的方法——如朗格洛瓦和瑟诺博斯在《历史研究导论》（1897 年）中阐明的那样——来达到“客观事实”，并写出一部摆脱一切成见的“客观”历史来。关于这一尝试的整个思想可能都在朗博的认识论抱负中作出了总结，这种抱负

大概是《实证哲学教程》的作者不会否认的："如果人们以真正科学的精神去处理政治，政治也……肯定会出现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法则一样确定无疑的法则。"

由于左拉及其试验小说的影响，实证主义神话学也影响到文学。整个现实主义美学都与这种实证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虽然其方式较为弥散。此外，理性主义也强有力地支持了对基督教义的批判，从勒775 南的《耶稣的一生》（1863 年）直到儒勒·苏里的那些极端论点，这些批判把基督变成了一个患"脑膜炎"的精神病人！

但反过来，这种理念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主义"的政治立场。当然，儒勒·费里等人所代表的乐观主义认为，科学是进步和幸福之源，如果科学能以越来越民主的方式传播的话。但是，在泰纳那里，实证主义变成了悲观主义：作为群体的人类难道不是非理性的吗？泰纳这种受进化论启发的思潮深信人类永远有堕落的危险，因而重要的不是进步，而是要避免堕落。当莫拉斯构想自己的实证政治体系时，这种情怀一直萦绕着他。实际上，法国所有的思想流派，从君主主义一直到盖德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打上了科学主义的烙印，而就盖德派而言，它的 18 世纪机械论特色比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色更为浓厚。

文化的内部矛盾

不过，这些理性的资产阶级也不是全然与非逻辑性无关。"理性"首先是"男子的特权"。很多伏尔泰式的丈夫倒是很能容忍观点上的差异，与儒勒·费里不同的是，他们会打发妻子去教堂。忙于世俗事务的"积极"男子可以只在复活节那一天做弥撒；"富于想象和浪漫气质"的妇女负责天国的事务。此外，妇女的虔诚还是其忠诚的一种保障，泽娜德·福勒里奥就主张应找一个笃信宗教的姑娘为妻，她笔下的一个男主人公提醒我们说："我要我妻子忠实于她的一切义务，但我不认为她仅仅因为对我的感情而这样，我不会自鸣得意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妇女不能看懂一切，对她们来说，现实主义是毒药，所有人都主张她们继续阅读年轻时候看到的理想主义文学。奥克塔夫·

弗耶、特别是乔治·奥内就是此类文学的时髦作家。奥内的《铁匠师傅》一共出了250版，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受欢迎的主题当中的一个：一个年轻的资产阶级以自己的才华成功地征服了贵妇的心，儒勒·勒梅特尔在评论奥内时说道："这是第三等级对贵族的胜利，美德对于邪恶的胜利……这是资产阶级英雄的楷模，是手执文凭、具备数学和化学知识的古代浪漫英雄。"这部小说所包含的正是理性主义所要求的，即妻子应知道，不能给丈夫的前程制造障碍。

但是，这种文化的矛盾性在二元趣味中体现得甚至更为明显。人们经常光顾"法国人"剧场，但杂耍剧场更受青睐；人们崇敬古典作品，但滑稽剧场的节目更受欢迎。在那些"高贵"准则之外，保尔·布尔热等人发展了一种纯粹的私情文学，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放荡表演：从疯狂的牧羊女到自然主义的四对舞，所有这些都在文化方面表现了某些名流们的家庭行为，这些名流让妻子反复观看朱莉亚·巴尔泰的《安德罗马克》[①]，而自己则在红磨坊与情妇"鬼混"。

1900年虽然是个见证了这种双元行为方式的时代，但当时次等文化活动的声誉从来没有超越过官方认可的活动。在法国人的一般意识里，次等文化活动留下的只是一个回忆。今天谁还知道卡图尔·孟戴斯、莫里斯·多内、阿尔弗雷德·卡皮斯和亨利·拉弗当这些"全巴黎"书店十分成功的作家的名字呢？连保尔·布尔热也只剩下了一个名字。没有被人遗忘的作家也是处于边缘，并"已经闻到了硫磺味"：如长期被视为持怀疑论的半吊子作家巴雷斯，如"十足庸俗的作家"左拉！但是费多德·弗莱尔、卡亚维的滑稽剧和库特林的喜剧一直在上演，阿里斯蒂德·布律昂的歌曲也一直有人唱。

这种主导文化的命运很是奇特。它试图在对古代文化的模仿中、或在心理小说中达到永恒的人，但它没有在下一代人当中继续存在下去，除非是在那些被弃绝者和最缺少学院气的艺术表达中。这与上一

① 这里的《安德罗马克》(Andromaque)指的可能是拉辛的剧作，故事取自古希腊神话，主人公安德罗马克是个保全了孩子和自己的贞洁的贤妇。

个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大商业资产阶级曾积极参与启蒙运776 动。用罗贝尔·芒德鲁的话来说，资产阶级法国的巅峰，恰好就是一个“文化萧条期”。

资产阶级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我们的分析仍然不是很完善，但如果我们抵挡不住简单化的诱惑，那么我们的分析会更加不足。只有一种主导文化整齐均匀地传播到所有领域、所有的名流都浸染在这种文化之中吗？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巴黎和外省的关系：文化上的中央集权也像政治中央集权一样深入了吗？演变的方向不可否认，我们已经指出，资产阶级文化试图成为国家统一的工具。对于地方语言的态度就是一个证据：没有任何保护这些语言的努力，甚至大学也是如此。总体上说，法国的教育否认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可能。1913 年，共和国总统可以探望米斯特拉尔[①]了，但这只是对已然成为一种国际性价值的承认。

然而，所有奥克语地区的文学复兴造成了一个难题，菲列布里什派[②]并不只是普罗旺斯才有的（罗讷河东岸、图卢兹、尼姆和蒙彼利埃也是奥克语文学的中心）。这场运动以人民大众为基础，但其发起人是学者和外省名流们，部分地方资产阶级也支持他们。这是个政治现象么？还是王党主义反对当局的一种方式？普罗旺斯的菲列布里什运动中鲁马尼耶和奥巴内尔等人的主导倾向、莫拉斯的去中央集权主张使人们可以相信这样的看法。不过也存在一种“红色菲列布里什运动”，甚至在普罗旺斯也有皮埃尔·德沃吕这样的代表，朗格多克更是如此（德·理卡尔、弗雷斯）。事实上，这些潮流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某种好古癖，在于对手工业时代和传统农耕生活的留恋之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这都是拒绝经济演变的另一种方式。

① 米斯特拉尔（Mistral，1830—1914），用奥克语写作的法国作家，1904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菲列布里什派（félibrige）是 1854 年在普罗旺斯成立的文学派别，主张用法国南方的奥克语写作。

某些省区的文化原创性不仅仅限于其语言上的多样性。在整个南方，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并不只是表现在政治立场上，也反映在文化方面：各种社团层出不穷，人们热衷于讨论，喜欢抒情艺术，这些就是南方文化的特征。在布列塔尼，对天主教和王党思想的忠诚既表现为一种区别于他人的意愿，也表明了某种体制选择。外省媒体在各地兴起，戏剧活动甚至更为活跃，这些都为地方名流提供了保护其文化个性的可能。但除了上述提到的地区，其他地方从这类现象中受益很少。

即使在巴黎，社交界人士的趣味也并非与一般资产阶级的趣味一致。长期的贵族身份、作为世袭的领导阶级成员的意识，这些都会赋予人们面对这种文化的自由，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文化带来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追赶时髦的风尚鼓励着那些在资产阶级大众中找不到支持的新文化形式。

保皇派的法国和共和派的法国

另外一个可能产生分歧的根源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我们已经数次提及右派和左派、保皇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冲突，对立超越了单纯的政治领域——这是两种世界观、两种思想体系的碰撞。一方的灰暗经历就是另一方的镀金传奇，各方都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法国历史。每个阵营都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表达工具和自己的作家。有的时候，比如德雷福斯案件期间，当时的观察者就能感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随着时空距离的拉大，我们努力揭示的统一性看起来更为合理：“反德雷福斯派和我们——德雷福斯派，使用的同样的语言”，贝居伊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

但是，正是在这个时代，被所有有组织的团体拒绝的贝居伊无法让他的《半月丛刊》继续办下去，塞尚在他艾克斯老乡的蔑视当中走完了人生旅程，而罗丹也无法让作家协会接受他的《巴尔扎克》雕像。当时每年都会出现一批备受嘲讽和诅咒的、但今天又为人所知的文学艺术作品。

777

如果不是缘于从这种文化内部产生的、而转过来又对该文化提出

质疑的文化变迁，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些持久而不可理解的现象呢？表面看来，这一危机产生的时刻，正是名流文化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因为它征服了“新领地”——平民阶层。

二、对平民阶层的文化征服及传统文化的衰落

大众文化从来不是独立于领导阶级的文化的，例如在 18 世纪，街头叫卖文学传播的是一种古老的贵族文化的主题和形象，不过至少人们有种相对独立的意识。但一个新情况是，名流文化现在拥有更官方的影响手段，最引人注目的工具是小学，它的命运与共和国联系在一起。

小学："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费弗尔）

不过创办初等教育的并不是第三共和国。由于基佐和各修会的措施，大部分年轻的法国人已经进入了学校。一个稠密的男子师范学校网负责培养教师。但是，共和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紧密而稳定的体制，今天人们才刚刚开始对它提出批评。

为了解释这一政策，曾有三类因素被提及。在共和派的意识形态中，政治和道德进步牵涉到教育的发展，维克多·雨果说：“人民的头脑，应培养之……开化之……而没有必要砍掉。”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因为它消除了“因出身而导致的最后也是最可怕的不平等，即教育的不平等”，并可实现“因学校凳子上的贫富混杂而产生的最初的融合”。（费里）

但是这种意识也是民间舆论广泛赞同的，而民间舆论在一两代人之间好像发生了迅速的演变。例如在马齐埃尔－昂－蒂纳，在第二帝国初年，农民依然对学识怀有朦胧的敬畏感，但他们并不会因此就把孩子送到学校去。30 年后，农村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有上过学的人都会利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他们取得了小公务员的职务，而且，当他们前去服兵役时，他也不需要第三者来给自己说

情。因此结论是：必须让孩子接受教育。善良的塞居尔侯爵夫人也见证了这种心态变化，在《加斯帕尔的命运》的开头，父亲想把儿子们从学校里拉回来从事田间劳动，但他估量了一下无知带来的种种麻烦，于是要渴望到农庄里给他帮忙的卢卡斯继续按时上课。共和派政策的力量就在于意识到了这一新潮流，而固执于农民的过时看法的人以及大多数保守派没有认识到这种新潮流的深广。最后，一个正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呼唤普遍推广教育。

体制的建立

共和派掌权后，学校立法就已在儒勒·费里和一个自由派新教徒团体的影响下确立起来的。教师的培养工作得到强化，每个省都必须建立一个小学教师师范学校，巴黎地区建立了冯特奈－奥罗斯和圣克鲁学校，专门培养师范学校的教师（1879—1881 年）。随后出台了一些主要法律：初等教育免费（1881 年），这使得 7—13 岁的孩子接受教育成为一种义务（1882 年）。初等教育宣布世俗化，教义问答的官方教育被取消，学校应保持中立，教员不能从属于任何修会。后来，在德雷福斯案件的风波之后，左派集团禁止修会自行举办教育（1904 年）。 778

此后，初等学校的组织牢固确立下来：所有教师都出自师范学校，由国家支付工资，他们在公共建筑中工作和居住，受省级机构（学术监察和省初等教育委员会）的控制和管理。课程和教学步骤是确定的。为了在当时的法国占据一席之地，学生应学习“不能不知道的东西”，不仅包括读、写、计算，还有历史、地理、少量自然科学和简单的农学。教师每年都要复习一下上一年的知识并加以深化（集中强化教学法）。根据 1887 年的指令，当局强调“促使学生参与知识发现”的必要性，就是说要利用直观的积极的教学法。学业完成的标志是“证书”。

初等教育还以幼儿园和高小教育为补充。幼儿园的前身是 1830 年前后设立的收容所，目的是当母亲在工厂里工作时接收她们的孩子。由于各个年级的学生数量庞大（从 150 人到 400 人），因此这只是个简陋的托儿所，人们试图以十分专横的纪律来强迫孩子们稍微安静些。

1881 年，一项法令将收容所定名为“幼儿园”，并把它们改造成像其他学校一样的机构，人们应在这里教给孩子基础读写和算术，但这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心智年龄。幸运的是，幼儿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后来有了演变，这得益于总学监波利娜·凯尔戈马尔的推动及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游戏教学方式最终在 1887 年的方案中以“儿童修习”的形式被确定下来，表达训练取代了课文。这个演变过程直到我们论述的这个时代过后才完成，那时，幼儿园和小学在教学方式已迥然不同。

高等小学与幼儿园同时代产生，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合情合理的抱负而又不激发盲目的奢望，这种奢望对个人具有诱骗性，对社会则会造成可怕的后果”（格雷亚尔）。换言之，就是为优秀的小学生提供一个出路，但不让他们与中等教育中的保王路线合流。高小培养的是办事人员和公务员。这类学校有为期四年的“集中强化”式普通教育，除了普通课程外，还有一些传授技术知识的专业课程，但这类课程取得的成就很有限（1906 年，七个学生中还不到一个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事实上，对于生产者的教育培养工作完全被忽视了。

政策评估

若从数字上来判断，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政策更多是完成、而不是开创了一场运动。在教育法颁布之初，入学学生数量与适龄儿童数量几乎相等。30 年后，总数量提高了 12%，不过孩子们现在可以在 6 岁之前上学，并可在高小中继续其学业。此外，应征入伍者的文盲率从 18% 降为 5%。这当然是个进步，但是个有限的进步，因为它不能掩饰不足之处，农民当中经常有未完成修业年限的情况。

在教学方法上，与过去的决裂并不像某些指令让人推想的那样大。我们可以再次引用 A. 普罗斯特的分析，怀疑教学法（即认为学生忘得太快）战胜了卢梭的乐观主义（认为只要唤醒自然赋予的才智就足够了）。学校的目标不是开发孩子的能力，而是要把他引向成年，为此不必总是顾及他的心理年龄。因此学校教育通常是一种矫正：这就要诉诸权威，要排斥运用自发性，要优先运用记忆，“功课”要优先于

779

实验性练习。这种鲜有新意的教育“从本质上说延续了教会的传统”（勒格朗）。通过这种教学实践，学校把一种权威式的社会模式传承了下来，这违背了学校培养自由公民的政治目标。不过，正是在心态层次上，儒勒·费里的工作才具有最富决定意义的影响。

爱国主义是世俗学校特别有意地培养的首要价值观，这可以调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并有望削弱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其他与世俗学校存在竞争关系的学校也心照不宣地赞同这种做法，它们同样具有爱国色彩。共和主义学校的奠基者们无一不与这一思潮紧密相连。比勒松还是爱国者联盟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让·马塞曾为小学的射击课本作序。小学教师成了军队的助手，至少在80年代是这样，他们组织名副其实的“军事训练”，编制学生营，在庭院里以木枪操练，并在村子里列队游行。

所有课程都在为弘扬民族情感而努力。首先是历史：在一个信奉“客观性”的时代，对过去的叙述并不“中立”。小《拉维斯历史读本》是当时使用的主要课本，它提供了一个民族历史解释的典范，而米什莱就是这种典范的开创者。大学里的历史学家通过王朝变迁和政权更迭、通过各个省的逐渐联合并最终达到“天然疆界”来讲述法兰西漫长的形成史；维尔琴热托里克斯、苏瓦松圣瓶、查理曼、布汶、加莱市民[①]、“伟大费雷”[②]、迪·盖克兰、在鲁昂被烧死的贞德、拜亚尔、亨利四世的白翎饰[③]、巴拉[④]、阿克尔之桥[⑤]、莱希斯霍芬冲锋[⑥]，如此众多标志着法国崛起的历史形象也成为了“所有法国人熟悉的画

① 指的是百年战争期间为解救加莱而献身的六位市民，1885年，加莱市政府请雕刻家罗丹创作了名为“加莱市民”的塑像。

② 百年战争期间的法国民间英雄。

③ 相传亨利四世在伊夫里战役（1590年）期间曾喊出“你们跟随我的白翎毛饰吧！”的战斗口号，此话后来被赋予某种象征国家统一的意味。

④ 约瑟夫·巴拉（Joseph Bara）是法国大革命中为共和国献身的少年战士，著名画家大卫为他创作了《巴拉之死》。

⑤ 阿克尔之桥（le pont d'Arcole）：阿克尔是意大利阿尔卑斯地区的一个小村庄，1796年11月17日，拿破仑突击阿克尔村边的桥梁，击败奥地利军队。

⑥ 指1870年8月普法战争期间法军在莱希斯霍芬的一次进攻。

册”。由于正义战争概念的提出，对军事美德的赞美与世纪初的和平主义竟协调了起来。如果说人有义务击退黩武主义的话，那么他就必须保卫受到攻击的祖国。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丢失证明了法国人对德国人仇恨的合理性。

地理课也以自己的方式来歌颂法国这个比例匀称、“气候温和”的“有规则的六边形”。这个国家物产丰富，分布协调，景色多姿。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散放着温馨平和的气息，这也就是法国的主要特质。在学习自然科学时，法国的年轻人可以在他们的同胞中发现创造性的天才：贝尔纳·帕利西①、丹尼·帕潘②、拉瓦锡、特别是象征着当代进步的巴斯德。另外，阅读和背诵中也满是爱国主义的篇章，它们延续并阐释着历史课本中的内容；例如维克多·雨果的《俄国大撤退》、阿尔方斯·都德的《最后一课》和《当间谍的小孩》、尤其是流行读物《两个小孩的环法旅行》——该书的学校版取得了巨大成功。

按照雅各宾主义的传统，民族统一意味着废除各省的独特性。学校与地方语言展开斗争、驱逐外省的表达方式，从而成为统一化的强大工具。地方历史地理根本不被考虑，即使它可能有助于共和派的意识形态。因此在塞文山区，虽然当地残留着地方特征，但教师们从来不谈君主制时代对新教徒的迫害，虽然从民族层面上来说，这段历史为反教权主义和反君主主义的论证提供了材料。更何况，人们颂扬的是巴黎这个“法兰西的缩影”，它的历史“与我们国家的历史融合在一起”。

课本中反映的法国形象还是很多法国人熟知的世界，但它体现的是一个小业主和手工业者的国家的理想。我们再次以《两个小孩的环法旅行》为例，书中所描述的职业几乎全是从前那个法国的行业：木鞋匠、铁匠、小商贩；主人公安德烈是个锁匠，全书以全面回归土地为结尾：人们可以参观大城市，但生活在农村或埃皮纳尔这样的小城

780

---

① 帕利西（Palissy，1510—1589），法国陶瓷艺术家、作家和学者。

② 帕潘（Papin，1647—1712），法国物理学家，曾发明蒸汽锅炉，为蒸汽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镇里。除了劳动和诚实外，书中宣扬的美德是节俭和储蓄，而信贷总是受到批评的，“借钱就是在铸造苦难和奴役的锁链……”。这种训诫与拉维斯在公民教育课本中的教导是一致的，当时他讲述了拉尔缪索的欺诈性破产。这个小商人的错误在于，他扩大事业的心情过于急切，因而过于依赖信贷，向银行借了太多的钱，而银行家“贷款利率很高”，以致他无法建立一个业绩良好的商店，无法体现一个有活力的经济所应具有的所有特征。历史教育也为警惕货币波动提供论证：在邪恶国王的长廊里有那些操纵货币的人，其中的一个就是美男子菲利普。相反，苏利和柯尔伯这些节俭的大臣受到的是怎样的赞美啊！这既是对挥霍浪费的贵族习气的反动，也是对现代经济现象的茫然。追求“安全投资”的小食利者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安睡在法国的金色坐垫上，依靠严密的关税壁垒为庇护伞。

不过，在这些忠实于其创始者的学校中，推行“进步宗教”也就成了一个不小的矛盾，在这一点上，“世俗”文化与修会的教育主旨发生了分离。但是，进步的主要推进器就是学校本身，它是“新时代信仰的庙宇”（斯皮莱尔），学生要成为“现代思想的小传教士”。

1880 年时，这种“世俗信仰”并没有排斥神的观念，但后者应脱离教会机构和教义的外衣。在随后的一代中，世俗的唯灵论被某种事实上的唯物主义取代。在这个时代，关于神的暗示和祈祷从《两个小孩的环法旅行》中消失了。因此，如果说盘点学校文化是件相当容易的工作的话，那么估量它对大众的影响则较为棘手。

学校文化和大众文化

当然，当时法国人在思想意识中深信学校在心智培养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击败法国的不是撞针步枪，而是普鲁士的小学教师”，这已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后来人们把 1914 年爱国激情的迸发归因于初等教育，由此便产生了争夺这一工具的激烈斗争。

可否论证这种直觉认识的合理性？在目前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仔细斟酌一番。小学教师并不到处都被人接受：在君主主

义传统浓厚的地区，他们受到排斥，那里的修会学校接纳了大部分学生。此外，还需克服农民对教师的偏见，这些人工作稳定，拿着固定薪金，享受着长期休假，而且还就农事横加指点。但是，小学教师通常就是乡村世界的核心人物。例如莫娜·奥祖夫在《不间断的课堂》中介绍了一位叫约瑟夫·桑德尔的小学教师，此人已是市政府的秘书和土地丈量员，但还是不断有其他不带薪的工作："随处都可以看到这个统管学校事务的人……他在各处组织各种群众讲座，内容涉及地理、史前史，还有关于茶、咖啡、葡萄和葡萄病害的讲座……他还给成人上课，开讲素描课程，并给天赋好的孩子开了很多小灶。约瑟夫不知疲倦地传授他的学识，告诉人们如何过得更好，他以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充当了核心人物。他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他的教育，大量学生成为了电报员和铁路职员，对此他非常骄傲。他以父亲般的温情注视着学生们的前程。而学生则给他寄来了满怀感激的信：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自己命中注定的那样成为农夫，那是因为约瑟夫让他们'摆脱了愚昧'。"不过，如果说教师的行为可以如此轻易地渗入人们头脑的话，那是因为其他因素也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因此，我们不能确认为学校是个个别化的角色。

781

其他传播方式

首先是报纸。随着1887年轮转印刷机的问世，我们进入了大发行量报业的时代，因为这种机器每小时可印2万份。1914年，巴黎的四份日报——《每日新闻》、《每日小报》、《早报》和《巴黎人小报》——的发行量超过了100万份。最后一份报纸（1914年的发行量达160万份）从1893年起便在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该报拥有自己的造纸厂，并发行其他期刊，它还为提高发行量而举办过竞赛。《每日小报》在外省有2万多个代销点。1898年，阿歇特书店开办了一个托运处，以便将巴黎的日报送达全国各地。外省报业虽然面临残酷的竞争，但也有了发展。到大战前夕，外省有8份报纸的发行量超过20万份。在马齐埃尔的小村子里，咖啡馆里出售的日报有5种。八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经常看报，这还不包括固定订户。在奥德地区，人们在热

烈地评论佩勒唐[①]在《南方快报》上的社论。大战前夕，在夜间的塞文山区，人们高声宣读议会辩论的报告。报纸成为了现代法国人名副其实的“每日祈祷课”。

大型体育报纸也出现于1900年代。1903年，《汽车报》曾为了打垮竞争对手《自行车报》而举办了第一届环法自行车赛。1914年，该报的发行量能已达32万份。其他的廉价周刊和半月刊也在争夺读者，如《大众休闲》、《乡间生活》、《万有文库》、《时尚小报》和《草庐夜话》等等。在圣母升天修道会神甫的推动下，天主教人士完全懂得这种行动方式的重要性，例如，他们创办了《朝圣者》。最后，1910年，第一份插图日报《莱克斯塞席尔》问世，它系统地利用了摄影术。大众报纸的形式和内容日益有别于观点性报纸的传统。新闻报道的重要性要小于报纸的发行量，一切都得服从于报纸的销售，因此报纸的文风是简朴的、标准化的，标题也“吸引眼球”，纸张变得更薄，插图也更多；花边新闻和专栏连载是吸引顾客的两件主要武器。

连载作品会再度收入廉价的流行小说集中，无论从读者群还是从内容上说，这些小说都是叫卖文学的后继者；像叫卖文学一样，这也是一种消遣文学。它描绘的是领导阶级的生活（而且偏爱16—17世纪的贵族生活），或附和某些成见，或提出一些问题，如其中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就是门第不对等的婚姻。我们可以在这种文学中看到对城市的蔑视，对质朴而自然的乡村生活的赞美：夏尔·梅鲁韦尔、皮埃尔·德库尔塞尔、格扎维埃·德·蒙特潘以及以历史风格写作的米歇尔·泽瓦科和保尔·费瓦尔是最受称道的作家。大战前夕，一种新体裁兴起了，这就是侦探小说，如莫里斯·勒布朗的《阿塞纳·吕班》和加斯东·勒鲁的《鲁尔塔比埃》。随着《鬼影》取得巨大成功，侦探小说获得了民众的认可：这部小说复活了一个蔑视社会的亡命之徒的神话，此人名叫芒德兰或“子弹”，但故事的背景是在现代城市中。

---

① 指的是 Charles Camille Pelletan，即 Eugène Pelletan 之子，前者是位著名的报界人士和政治家，其父是位作家，第二帝国的反对者。

在我们在此论述的整个时期，沉睡的乡村和市镇由于铁路而打开了眼界（铁路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延伸到这些地方）。征兵进一步推动了与外部文化世界的接触。“那些前往普瓦提埃、图尔和巴黎服役的人目眩神迷。很多回来的人试着不再讲土话”（塔博）。另一些人出门后成了工人或小公务员。外乡人在当地定居更容易了；人口融合威胁到地方特性，这几乎是个普遍现象。实际上，这是个与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关联的整体现象，这场革命逐步摧毁了传统文化；在受这场革命影响最深的地区，如城市、工业中心和大型交通路线附近，学校进一步加速了这场业已隆隆启动的进程。

782

传统大众文化的衰落

实际上，昔日文化世界的消失是个很不平衡的现象。由于研究不够，我们还不能进行地理学上的描述，我们姑且满足于几个印象式的评述。“土话”的退却是最明显的标志，这是一个持续了三个世纪的现象，但在19世纪前半叶，大部分农民和很多城市居民讲的仍是土话：所有证据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共和国加速了这场运动。各地教师都在围剿“法语土话大杂烩”；在加尔和埃罗等地的课间休息中，讲朗格多克语的小学生会受到惩罚。父母也支持教师，有多少祖母像塞文的作家安德烈·尚松的祖母一样，责备孙子不说法语啊！——“你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抛弃地方语言与社会上升之间的关系已经牢固确立起来，一个穷人家的儿子能当上邮政职员是因为他能准确无误地书写法语，这种“成就”每天都在提醒人们。

随着语言的统一，一些“古代”习惯也消失了，服饰也统一化了。学者们开始对民间传统和“法国的各种方言”发生兴趣（1885年12月民间传统协会建立），但这并不能掩盖上述事实。这是一个正在瓦解的世界产生的情感，人们需要保留对它的记忆。

有的省区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抵制，或是因为那里的独特性很强固，如布列塔尼，或是由于地理上的封闭，如中央高原的高地地带；这些地区还在等待两个世界的冲突的震荡。一般来讲，城市比农村更快受

到冲击；而在农村，集镇又比邻近的乡村易受影响；商人和手工业者比农民对新事物更为敏感，年轻的男子也比年迈的妇女更为敏感。即使是在新的文化形式内部，也有些微妙之处需要指出来！至少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城市世界和农村世界之间的差异。

乡村文化世界

有人已经说过，第三共和国的基础在于农村，共和国的鼎盛时期恰好也是农村的鼎盛时期。农村的这种局面不完全表现为政治现状上，它也体现在一个完善而和谐的文化世界中。农村已经走出自然灾害的梦魇，它还没有被现代化变迁摧毁，相反它收到了这些变迁带来的积极效应。正像博纳尔曾高兴地指出的，“农村已经克服哮吼病，已经能听到自己的钟声，它已能选举老实巴交的市长，铁路也通到了这里，因而公路只是一条梧桐树下的漫步之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进步，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进步，罗热·塔博的话可以为证，“不妨想像一下：1830 年左右，在一个没有公路、没有商业的地方，在一个人口过剩的悲惨乡村中，此时此地出生的人，当他们在 1885 年或 1890 年看到众多坚实的公路、看到近在咫尺的火车站、看到明亮的房屋，总之目睹这个生活舒适的国度时，他的心里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触手可及、沉重压抑的天空升高了。人们开始做自己的梦，特别是为孩子筹划前程，梦想孩子会有更好的明天，会永远前进。”在这个层次上，进步不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也不是现代经济学家向我们灌输的加速运动。进步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逐步改进，它与维持乡村法国的意愿十分切合，并伴随着大量的传统残留物；所以，人们继续向土法接骨郎中和疗烫伤的巫师求医。

农民已经找到自己的读物——报纸和书籍。某些人还从学校图书馆中借书，不管怎样，他们把自己心爱的书珍藏下来，奠定了小藏书室的基础，有些藏书室甚至保留到今天。他们也许读过杜律伊的《法国史》，看过夏尔顿和亨利·马尔丹（大众版），而且肯定读过维克多·雨果，当然还有埃克曼·夏特里安——这个人的作品 40 年内一直受到欢迎。我们可以理解其中的原因：作者自觉地采用质朴的文风；

783

将词汇限定在200之内，以避免任何令人费解的情况；像雨果一样，他们更喜欢表现强大的力量、观念和情感、正义、革命、旧制度，而不是刻画心理复杂的人物。

最后，他们还有一个与《惩罚集》的作者（即雨果）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表达的思想就是小学所传播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它反映的是乡村小民的经验和向往：转化到贵族身上的对旧制度的仇恨，对教会的不信任，对共和国的热爱，对战争的恐惧，但这种恐惧又不排斥爱国主义、有时还有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在新的心态背景下，进步信念与对共和国的热爱不可分割，共和国是弱者的守护神，人们把已经取得的改进和法兰西的声望归因于共和制度，而这个“自由祖国”受到了绝对主义的、贵族制的德国的威胁。

因此，这种文化具有深刻的政治色彩，若要理解它，就不能脱离其意识形态基础。文化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反映了这样一种意识：正是政治演变为接触学识和“真正的文化”提供了可能。因此，像选举和7月14日的庆祝活动之类的事件，从表面来看完全是政治性的，但它们具有切实的文化意义。咖啡馆里的政治辩论在当时是个典型现象，今天我们只看到这些辩论的修辞和其肤浅的方面，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最受青睐的表达方式之一。正是在政治辩论中，全体人民获得了自我意识，并认识到了自身的变化。讥笑小吃店里的演说者、自修者和那些正在重构世界的“浅薄之人”是件容易事，但这些人的生活达到了某种均衡，他们的思想也不是可鄙的。

正是在这种气候下，邮递员谢瓦尔创造了不可思议的业绩。这个德龙省的普通乡村邮递员，用一把泥刀、一辆手推车和几个水泥搅拌容器建造起了他的“理想宫殿”。这是个民间建筑的杰作，但它不是传统民间艺术的作品，学校教育改造了民间艺术，这座建筑表达的是已经从书本中发现新的现实维度的农村人民头脑中的梦想和意象。

无疑，这种文化仍然依附于领导阶级的文化，它能够为社会秩序服务，因为它给人们这样一种假象——由于义务教育和普选提供的机

会，不平等正在消失；但把共和制度变成“劳动者的政府”也许是个相当天真的想法。当然，我们要提防犯时代错误。在农村，旧式贵族的统治仍然是个威胁，1789年的古老冲突并不总是已经彻底解决；对农民而言，支持共和国，捍卫世俗学校，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进步和解放，他们的孩子将是第一个从中得益的人。

我们刚刚描述的心态状况并非仅限于农村，大的集镇和小城市同样如此，在一些大城市聚落中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中间，我们也能发现这种心态。但是在城市，断裂显得更为剧烈。传统文化的衰退根本不能从新形态和别的平衡中得到补偿，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真正的贫困化，内容低俗的民间小说、花边新闻出版物就是明证。不过，当时文化中的一些颇为重要的新型娱乐就产生在上述环境中。最后，城市还是异议思想的阵地，有人正在努力创建与领导阶级毫无关系的思想模式。

城市的大众娱乐活动

784

最著名的大众娱乐是咖啡馆里的歌舞表演，因为资产阶级也参加这类活动。这种“歌唱咖啡馆”诞生于第二帝国，从一开始它就扮演着“社会二元”角色。埃尔多拉多歌舞咖啡馆的明星特雷莎进入了沙龙，从而开创了“上流”与“准上流”之间融合的传统。

演出大厅的布置体现了观众的多元性：底层包厢是为“上流人士”准备的，二楼阳台是给资产阶级的，三楼是街区小店主，四楼被称为“鸡窝”，留给工人、女店员和小职员。但主宰演出大厅的正是鸡窝，呼喊、口哨、起哄、掌声都是从那里传出的，因此它决定了演出的成败。刻意粗俗甚至下流的语言、“淫秽”的暗示——此类表演自然让“体面社会”的批评家们义愤填膺，如路易·弗约[①]和阿纳托尔·法朗士：“歌舞咖啡馆就是丑恶、猥亵和怪诞的乐园”。但这些批评不能阻止这场运动，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正在优雅地“自甘堕落”。1900年前后，所有大城市都有歌舞咖啡馆，巴黎超过了150家；最著

---

① 弗约（Louis Veuillot，1813—1883），法国作家，曾倡导教皇至上论。

名的首先集中在林荫大道区，如埃尔多拉多、斯卡拉、“巴黎乐团”、阿尔卡扎尔。保吕斯（《胜利老爹》）、博兰（《啊！玫瑰小姐》）、德拉南（《哥尼亚夫》）和马约尔（《女人的手》）就是在这些地方扬名的[①]。当然不是所有歌曲都是轻佻的，1870年后，某些作品还成了爱国歌曲，如《阿尔萨斯的老师》，《愿你记得》和《破碎的小提琴》。最著名的是《伙计和职员的马赛曲》、《布朗热主义之歌》和1886年7月14日保吕斯创作的《巡视归来》；歌曲成为一种行动的手段。从90年代后，巴黎外围的林荫道和蒙马特尔成为了时尚之地，不过这种地理上的位移伴随着一场风格上的变革。

作家和艺术家也利用歌舞咖啡馆的潮流来创建歌手“小酒馆”，这是一种“介乎歌舞咖啡馆和小剧场之间的东西”。这里可以唱歌、朗诵诗歌或表演短剧，这些节目自认为比歌舞咖啡馆要高一个层次。这种小酒馆体现的是一种结合高雅文化和民间表现形式的努力，在世纪末的非正统文学艺术运动中，它们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追赶时髦的风气的推动下，公众很快也变得热衷于交际生活了。“黑猫”、阿里斯蒂德·布律昂的“芦笛”和“狡兔”等酒馆就是最好的例子。

整个文学都产生于作家和普通人的聚会之中，热昂·里克蒂斯和他的《穷人的独白》就是一个象征。在以这种聚会为题材而创作的绘画中，最著名的是斯坦朗、维耶特、特别是图卢兹－劳特雷克的作品。劳特雷克还永久保留了对红磨坊的记忆，这个地方是民间表演的另一个化身。红磨坊的所有者齐德勒和奥雷十分了解这种上流资产阶级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危险诱惑”。他们的主旨是要将“全景巴黎”剧场的表演和“自然主义四对舞”进行对照，后者是爱丽舍－蒙马特尔深受欢迎的群众表演。直到那时为止，各个社会阶级虽然都可以出现在同一个演出大厅里，但它们都有心照不宣的固定位置；但此后，各个阶级开始相互往来和融合，这种混杂现象为娱乐活动平添了别样的趣味。雅纳·阿弗里尔、古律、格里耶·戴古瞬息之间便成了明星。这

① 这里提到的是歌手和他们的作品。

是巴黎这个“现代巴比伦”的神话，它象征着这个城市的种种丑恶，对于很多代外省和外国的资产阶级来说，这个神话的出现既让他们惊骇，又令他们着迷。

其他的表演更贴近公众，如马戏表演，远比今天流行，还有皮影戏。最后，1900 年前后，爱凑热闹的人发现了电影院。

电影：面向大众的娱乐

对一个当代电影爱好者来说，在一个讲述城市大众娱乐的章节中谈论电影可能令人气愤。不过，在 1914 年之前，这种“第七艺术”很少超越这个阶段，如帕戴公司的一篇广告声称：“电影难道不首先是卑贱之人和工人的消遣么?”

785

人们对电影在法国的早期史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卢米埃尔兄弟购买了爱迪生的电影摄影机并对其进行了改进。1895 年 12 月 28 日，他们在巴黎的“大咖啡馆”里组织了一次公开放映。1896 年 1 月，他们发行了短剧《被喷水的喷水器》。卢米埃尔兄弟为题材多样化而进行了各种努力：他们拍摄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时事片，还有历史片，如《吉斯公爵》、《马拉》、《最后的子弹》[①]。但是，尽管如此，公众的好奇心还是减弱了。电影胶片持续时间太短，只有 50—60 秒，而且不能重放。不久，大城市就对电影失去了兴趣。但流动艺人掌握了放映技术，并到农村去上映，这可是个科技奇珍，就像留声机、无线电报、长胡子的女人和双头牛犊一样神奇！

1897—1902 年，梅列斯创立了剧本和导演两种艺术形式，从而拯救了电影。电影的长度从 1 分钟延长到 15 分钟。在这个时期，梅列斯毫不迟疑地触及那些最棘手的问题，如重演了德雷福斯案件以唤醒公众对这个无辜者的同情心。梅列斯原来是个魔术师，他开创了电影特技，并在他的杰作《月亮之旅》（1902 年）中大量使用了这些特技。但是他的作品仍停留在“舞台艺术片”阶段。一般来说，这样的作品

① 《最后的子弹》讲述发生在 1870 年普法战争期间，一支法军英勇抗击普军，最后弹尽的故事。

只是一系列从同一角度拍摄的画面，因为摄影机是固定的。不过，随着拍摄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该行业经济状况的改进，电影逐渐突破了梅列斯的阶段。

梅列斯的时代之后迎来了 1903—1909 年的帕戴时代，这时电影因其多变的拍摄角度而区别于戏剧。在夏尔·帕戴的推动下，电影也从手工制作走向了工业化，这方面他得到导演泽卡的协助。泽卡拍摄并监制了一些受左拉启发的“现实主义”作品，如《酗酒的牺牲品》和《罢工》。泽卡还拍摄了最早的情感片《爱的故事》，并发掘了喜剧演员马克斯·兰代尔。流动艺人仍是唯一能放映付费电影的人，而电影院当时只是一个广告工具。于是帕戴考虑把剧院改造成放映厅，以便经营；放映时间也延长了，甚至整晚放映。到 1908 年，帕戴公司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托拉斯，营业额达 3500 万法郎。

但 1907—1908 年，新的危机又来了。电影在讲故事，但故事讲得很糟糕，因为蹩脚的剧本作者们是在相互抄袭。“文化人”对这种面向赶集群众的娱乐不屑一顾。为了征服这些文化人，记者拉菲特试图制作“艺术电影”。他向科学院的作家征求剧本，运用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并以勒巴尔吉为艺术指导，此人是法国剧坛的“头等角色”之一。1908 年 11 月 17 日，《刺杀吉斯公爵》吸引了“全景巴黎”剧场的注意力。电影首次有幸在《时代》上进行剧情连载，但这只是昙花一现的成功。

为了更新电影题材，帕戴系统地使用了古典作品和 19 世纪的著名小说，如《小酒店》、《巴黎的秘密》、《悲惨世界》和《九三年》等等；他也拍摄圣经题材的影片。但到大战前夕，帕戴面临莱昂·高蒙公司强有力的竞争。高蒙勇气十足，他开办了欧洲最大的电影院“高蒙宫”（有 5000 多个座位），他的艺术指导路易·弗亚德执导了当时最成功的作品五部系列片《鬼影》。从此以后，观众便能在电影院看到准确意义上的电影了。

弗亚德的成就意义重大：正是通过改编一篇著名的流行小说，电影才被人接受；它由此展现了其面向大众表演的深刻本质，这也就说

明了何以上流社会对电影大加挞伐。不过，电影的文化效应还没有完全觉察到。要等到30年之后，电影才最终战胜其他大众表演形式。总的来说，知识分子谴责这些娱乐是在让人民堕落，而不是教化人民。786 难道不应该设法平衡一下这些有害的影响吗？

民众大学

在德雷福斯案件的氛围下，大学人士觉得工人对这次拒绝审判的行为漠不关心，为了“让人民具有使命感”，他们想把人民在学校里不曾得到的文化传给人民。这一观念中汇聚着两种思潮：实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在教授（如里昂的赫里欧）和律师们的推动下，几乎到处都成立了民众大学，这些大学组织座谈、音乐会、戏剧演出和艺术参观。但这场运动没有真正深入工人群众中，它吸引的更多是小公务员、雇员和手工业者，而不是现代工业中的工人。这类工人下班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作报告的人也不是总能适应其听众的需要，报告的内容过于广泛，它们并不是基于对大众文化之本质的思考之上而选择的。人们把法国古典文化类型的大学当作不言自明的公设，而没有考虑它是否符合工业劳动者的需要。最后，部分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运动分子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用来娱乐人民的慈善工作”，对此他们还提出了独立的工人文化的特性问题，这种文化应与领导阶级不存在任何关系。

一种独特的工人文化？

法国工人运动很早就在思考文化问题。先驱者们具有双重意识：一是自卑感，这会削弱他们在雇主面前的地位，故应以教育来克服这种自卑，如果不能获得教育，那就进行自修；二是一种直觉，即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不同的世界观。

在80年代，在工会运动成型的时候，对教育的必要性的意识日益强烈了，但是，对于“无聊而不实用的文化”这样的奢侈品，工人阶级无力买单。接受的教育应是有用的，就是说，不仅是技术性和职业性，也应该涉及经济和社会，以便使工人阶级“对自己的苦难有个认

识”（佩鲁迪埃），并让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以关于经济事实的准确知识取代激情澎湃的演说中那些含混不清的东西”。这应该主要是劳工联合会的工作，也是它的图书馆的存在理由之一，劳工联合会通常还把教育列为其大会的日程。于是，文化被隐约地等同于教育，并成为行动的工具。但与此同时，当时的两大思潮——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战斗性的革命行动是劳动者主要的教育工具，也是他们的大学校。我们离这样一种论点已经不远了：工人斗争具有价值上的创造性，在斗争发展过程中，它将成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和新文化的载体。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为资产阶级垄断的传统的古典人道主义又处于何种地位呢？

对于某些人来说，从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一切都是绝对腐朽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儿童的大脑从资产阶级国家的毒化中解救出来”（1908 年法国总工会大会报告），于是人们提出了创办工会学校的建议，这种学校将负责对从属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各种学校的孩子进行“匡正教育”。而另一些人（吕西安·埃尔、贝居伊、饶勒斯）则认为，应该在超越传统人道主义的同时融合它，正如社会主义运动应吸收 1789 年的遗产那样。事实上，关于文化的争论是一场政治哲学辩论，它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和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提出了质疑。

不过，由于拒绝——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全面接受既787 定的文化价值，工人运动在挑战“普遍文化”的理念，此种理念与永恒的人类相对应，人的永恒性正是名流文化的基础；而工人运动则揭示了这种文化理念的片面性和其历史地位。工人运动的内在意图与另一场运动相契合（虽然对此它并不知晓），而后者以马奈和塞尚等一系列人为中介，到 1914 年在毕加索那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三、受社会排斥者

文学和绘画是挑战既定文化秩序的两支主力军。雕刻曾掀起轩然大波（罗丹的《巴尔扎克》遭拒斥），但它仍然在画家的斗争之后开

辟出一条道路；音乐领域也发生了战斗，不过论战没有那么激烈，断裂感也没有那么强烈。文学处于一场更为广泛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仅涉及表现形式，也牵涉思想内容，这是理性主义的危机。

理性的危机

“世纪末精神官能症”

从夏多布里昂到波德莱尔，烦躁、消沉、对生活的厌倦、对无可救药的堕落的意识，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常见因素，不过，实证主义和现实主义看来已经驱散了这些“陈腐气味”。《恶之花》的作者看来是个幸存者，他是一个幸而被超越的时代的见证人。共和制度的胜利和科学的进步——理性主义的双子不是证明这种陈旧意识已经过时了么？1878 年，《蓝色评论》的批评家欣喜地宣告，“维特不再引领风骚了”。“阴沉的悲观主义……把它的毒药渗入衰老的阶层，但新兴阶层不会受到感染。”

八年后，左拉的代言人、作家桑多兹在《创作》的末尾悲哀地评论说：“这个世纪的破产，悲观主义扭曲了人的心肠，神秘主义迷惑人的头脑。”通过报刊出版物，我们很容易追踪这种突然出现的现象。1885 年之前，这只是几个追逐声望的作家的高雅症状；1885 年以后，“新一代”似乎都染上了这个病症。弗朗西斯科·萨尔塞追问道：“我们的年轻人为何如此忧郁？我完全不理解这成长中的一代的绝望。”布律纳蒂埃尔也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探讨当时“悲观主义”的原因。1886 年，道德和政治科学院举办了一次征文，主题是对各种悲观主义的现代理论进行研究。在克莱蒙费朗、里昂、贝桑松和奥尔良，各地的颁奖演说和社交讨论几乎都在探讨现代青年的危机问题。最高权威机构也对危机深感不安。戈布莱部长在新索邦的工程落成典礼上的演说，有一部分就是专门谈论这个问题的。神经官能症、神经病气质、世纪末、颓废主义、虚无主义，诸如此类的词语突然风行一时。看破一切的业余文艺青年成了很多小说偏爱的人物。

1890 年，关注青年问题的分析家发现，除了悲观主义外，年轻人

当中还有某种“新气息”，用拉维斯的话来说，这是“对神圣事物的怀恋”。阿纳托尔·法朗士认为，“年轻人已经不再是伏尔泰主义者了，他们不会从实证主义的条理中期待任何东西”。儒勒·勒梅特尔的评价更高：“我们已经看到宗教精神开始觉醒”；而《时代》的社论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模糊的福音主义飘荡在空中，各高等学校正呼吸着这样的气息。”在这个“新基督教”时代，人们虽然拒绝在教义中固步自封，但人们也感到内心需要一种博爱的“感性”宗教，它将把所有善良的人团结在一起。保罗·德雅尔丹在创建道德行动联盟的同时也充当了这一理想的解说人。他的联盟中有新教徒、不可知论者，甚至还有一些愿意超越教义纷争的天主教徒，所有这些人都团结在人类苦难的宗教中。整个巴黎都在为弗拉热洛尔的《星之旅》[1] 和达拉库尔的《耶稣受难》欢呼。与此同时，年纪较大的一代人则把这场运动反映到思想领域，或是批判18世纪（法盖），或是揭示唯科学主义社会的危险（如保尔·布尔热的《门徒》），或是宣告科学的破产（布律纳蒂埃尔）。最后，声势浩大的宗教皈依运动也波及到思想界——首先是1886年的克洛岱尔，而1900年的一代则更为醒目，其中有贝居伊、普西夏里、马利坦等人。这些皈依还经常伴随着行动精神的恢复、伴随着对过分的分析思想和唯理智主义的不信任，而且还把“爱国主义信仰”和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因此价值完全被颠倒了，资产阶级法国的整个文化气候都受到了影响。这场危机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它们既是对理性主义的反动的表征，也是这种反动的原因。

788

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和非理性趣味

理性的捍卫者指控外来的影响“窒息了法国的突出优点——思想之明晰，欢欣和轻快”。人们很快就怀疑德国试图以此来削弱我们。确实，悲观主义者所仰仗的是哈特曼（其作品《无意识哲学》于1877年被译成法文）、特别是叔本华，后者在法国的传播为时更早，声名

① 《星之旅》是一出宗教剧，讲的是信徒前往伯利恒朝见新生的基督的故事，弗拉热洛尔是该剧的诗歌和音乐作者；《耶稣受难》是一部神秘剧。

日盛。“颓废派”在叔本华那里发现了行动无意义和虚无情趣的论据，因为“生的意志带来不幸和痛苦”。此外，这位《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作者还是通往佛教的路径之一。

确实，释迦牟尼的学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法朗士证实说，东方学家罗斯尼的课程“听课者十分认真，他们当中既有文人，也有社会名流”，在法朗士看来，“巴黎的佛教徒有3万多”。对佛教的迷恋反映了对“不可见世界”的向往，而许雷的《得道大师》（1889年）一书体现的就是这种向往，他说：“人的灵魂从来没有对不足、苦难和现世生活的虚幻有过如此深刻的意识；也从来没有对彼岸不可见世界有过如此强烈的向往，尽管还没有达到信仰彼世的程度。”与这一思潮相关联的还有对神秘学的兴趣、复兴玫瑰十字会的努力以及“萨尔”佩拉当的名望①。

1886年，沃居埃的《俄罗斯小说》肯定了俄国文学的成就，他的研究是“当年的文坛盛事”，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和道德史上的重要日子”（布尔热）。1884—1888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著作都已翻译过来（1888年，译著竟达25部）。这一潮流的原因很多，从与俄国结盟的期望到对异国情调的好奇心均有之。但新的一代在俄国文学中主要发现了“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永无穷尽的阴暗……一种对无可企及之物……的拷问，虚无之中对宿命的一声遥远的叹息”（沃居埃）。

1890年时，人们的注意力从俄罗斯大草原转向了斯堪的纳维亚的轻雾：戏剧是北方影响力的主要承载体。安托万和他的自由剧院于1891年4月上演易卜生的《野鸭》，从而成为介绍北欧文学的先驱；1893年，安托万又演出了斯特林堡的《朱莉小姐》；吕涅－波埃继承了安托万的事业，上演易卜生的其他剧作。“易卜生热和托尔斯泰热在追求新震撼的浪潮中不期而遇。”在世纪末，另一些外国作家也成

① 玫瑰十字会（la Rose-Croix）是共济会的一支，起源于苏格兰；佩拉当（1858—1918）于1892—1898年举办玫瑰十字沙龙，并自称“萨尔”是一位巴比伦王留给他家族的称号。

为新思想的启示者，如人们记住了尼采的超人崇拜和反民主评论，并从邓南遮那里接受了对意志的崇尚。

象征主义的成功

在此之前，象征主义只局限于几个过分追求高雅的唯美主义圈子中和拉丁区的咖啡馆里，但这时已成为一种潮流；它可以被视为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陈词滥调”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反动，因为“象征主义一词让一些人想到的是晦涩和怪诞……而另一些人则会由此发现难以言明的美学唯灵论，发现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瓦莱里）。但无论是马拉美的《牧神午后》（1876年）还是魏尔伦的《智慧集》（1881 年），都没有引起批评家的注意。不过，在于斯曼 1884 年出版的小说《逆流》中，主人公德·埃森特绅士十分喜爱《智慧集》，还在羊皮卷上抄写马拉美的九首诗歌；这个人物无疑是个“颓废派”，一个“十足的神经质”：儒勒·勒梅特尔从他的文学趣味中找到了证据；不过这些遭人诅咒的诗人这时已经不再默默无闻了，即便他们还是受到嘲笑。在这个时代，克洛岱尔痴迷于兰波，巴雷斯则在《墨迹》中宣称自己对“颓废派”诗人感兴趣。1885—1886 年的报刊中满是关于这种新诗潮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让·莫雷阿关于象征主义的宣言。1888 年，权威批评家勒梅特尔、法朗士和布律纳蒂埃尔等人仍在谴责现代诗歌；不过到 1893 年，这位布律纳蒂埃尔在索邦为现代诗歌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同一年，吕涅－波埃在巴黎滑稽剧院上演了《佩丽亚斯和美丽桑德》，其作者就是“赶时髦者”开始谈论的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1896 年，当魏尔伦去世时，他被誉为“一位伟大的法国诗人”（《高卢人》）。

事实上，今天仍在阅读和演出的一切作品都与这场反实证主义潮流有关，这一潮流涉及的人物有克洛岱尔，他所领导的富有勇气的创作事业可以追溯到 1912 年的《给玛丽的告示》；有贝居伊，这位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德雷福斯派和爱国者不属于任何思想流派；有马拉美的星期二社团；有纪德和瓦莱里，这两位作家的早期作品正是追溯象征主义的足迹；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则是在贝热隆哲

学的协助下酝酿出来的。

确实，象征主义运动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家。柏格森在高师的时候曾是位机械论者，1883—1887年在准备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将数学度量时间与直觉体验的时间绵延区分开来：于是他把科学的、分析的理性主义和直觉对立起来，前者在揭示实在性的同时也分解了实在性，而后者是唯一能完整地达到实在的方式。自从1889年发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以来，柏格森的成就日益为人所知，1900年他进入法兰西学院。1914年，阿诺托写道，柏格森的哲学以“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生命力的积极辩护”回答了“我们时代的呼唤”。

于是，在报刊媒体上、在书店的展柜里、在沙龙的谈话中，我们到处都能感受到对非理性的全面回归和对实证主义的普遍拒斥。但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文献史料。

反理性思潮的深刻性及局限性

与这场运动的第一印象可能造成的判断相比，实际上它既更为广阔也更为有限。它大大超出了法国，成了一个欧洲现象，不过在笛卡尔的国度，它更令人惊讶，因为这里有“启蒙”的传统力量。但无论是非理性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主张限制这种思潮对领导阶级的影响，当然这一点上双方仍有细微差异。在阿纳托尔·法朗士看来，非理性主义仅限于文学类的高师学生，我们不必追随他的看法，但需注意的是，确实有很多名流把这种神秘思潮看作“法国思想品格的病态和及其摧毁者。”

很多自称拥护这一思潮的人也是追随时尚者，但他们未必因此就接受最纯正的非理性作家大胆的新主张。柏格森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其表述之明晰；而于斯曼和莱昂·布卢瓦一直是“边缘”作家，而且最终被排斥了。1912年之前，克洛岱尔甚至不敢梦想他的作品能够上演。沙龙和官方对文学创新的支持时断时续，而且很吝啬；这类支持 790 更倾向于推动流行作家题材的多样化，而不是帮助先锋派站稳脚跟。除了一些“追捧者”和“赶时髦者”之外，新美学风格的作品只能在一些狭小的圈子里得到支持，这些支持者出没于波希米亚式的咖啡馆

中，聚集在《羽笔》、《白色评论》以及稍后的《新法国评论》等杂志的周围。因此领导阶级在文学上的墨守成规根本没有受到文化气候变化的冲击。

我们已经列举了大众阶层非理性主义的几个例证，不过这些例子不能与某些资产阶级阶层的反理性主义意愿混为一谈：获得知识之前的非理性主义体现的是面对一个不能控制的世界的恐惧；随着教育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这种非理性主义会逐渐退去；因此每个学校都是理性主义的摇篮；当高中生开始藐视理性的时候，小学生懂得了理性的力量：一方需要理性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则长期受理性主义的家庭传统的熏陶，有资本享受一下摆脱理性的奢侈。无论从所取得的成就还是从对当时意识的影响来说，世纪末危机都是有限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应该探讨一下它的起源。

一场政治和社会反动?

一种最常见的解释认为，这种反实证主义是我们文化史上持续不断的变换交错的一个自然表现：反理性的理想主义是实证性的现实主义的继承者，正如现实主义曾是对浪漫主义的反动、而浪漫主义又曾取代“启蒙”一样。我们不想否认这种解释的匀称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解说没有说明潮流逆转何以发生在这个时期；而且，这个解说还可能让我们忽视世纪末危机的独特性、它持续的时段长短（我们的文学依然处于这一氛围中）以及它出人意料的特点——科学看来不再能越来越证实人们对它的期望了。

将政治局势联系起来考虑更有意义；1884—1889年是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爆发期，而这是一个共和制度的危机时期。仅仅是巧合么？我们认为不是这样。掌权的共和派没有弄错，他们在悲观主义之中看到的是对现政权的直接批判。这就是为什么戈布莱、狄奥尼斯·奥尔迪内尔和机会主义议员迪·杜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捍卫现政权。对于青年人的抱怨，迪·杜说，“他们有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而我们的民主制是年轻的”。实际上，大部分“世纪末派”属于反对派，领头的是巴雷斯和保尔·亚当等布朗热主义者，随后有无政府主义者

马拉美，这位诗人曾对三十人审判中的被告表示好感。共和派把自己的命运与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混淆在一起，不过它的主要领袖确实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它的相对失败波及到哲学领域。

其他与通史的关联现在可以确定下来。如，在哲学家卢卡契看来，神秘主义和非理性思潮的兴起与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的防御心态呈对应关系；18 世纪和 19 世纪前半叶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期，他们很自信，并利用理性作为他们的进攻武器。当感到无产阶级上升带来的威胁时，他们便逃避到非理性主义和宗教中去。这种理论确实有一些事实依据。巴黎公社吓坏了很多作家，他们当时失去了对进步的信念。布尔热和布律内蒂埃尔首先皈依教会，此举乃是出于社会保守主义的动机，很多资产阶级也纷纷效仿，对他们而言，天主教义仍是现存秩序的主要堡垒，因此他们让民主的传教士和《犁沟》杂志感到愤怒①。

不过，如果要确定思想运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联系（若不否认这一最后的关联的话），我们在悲观主义之中所发现的，更多是对于经济变革和现代化的恐惧，而不是对工人阶级上升的恐惧。当时的一个象征性意象是失去机械师的火车头的形象：这正是左拉的《人兽》的主题，它是这个变革速度过快、且不知道走向何方的现代世界的象征。对于众多关于“不堪重负”的现代生活的论述，人们当然深有感触，现代生活“制造了神经质”以及对手工的、田园的中世纪传统的怀念。另外，这场反理性主义运动早于 90 年代的社会大恐慌；而另一个巧合也令人费解：这就是与 1882 年危机的蔓延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危机的蔓延也是布朗热主义成功的因素之一；在经济萧条的气候下，人们对科技带来的弊端，难道不比对科技进步带来的福利更为敏感么？科技进步难道不应对当前的苦难负责么？于是距离否认进步观念只有一步之遥了，当人们不能完全适应工业社会时，这短短的一步很快就被跨过。

791

① 《犁沟》（Le Sillon）是 1894 年由一批学生创办的杂志，宣扬民主是其宗旨之一。

过时的理性主义

但是这样一场运动的起源是很复杂的：除了外部因素，还应注意内在因果联系，如意识到传统理性主义无力解释科学的发展。1874 年，布特鲁指出了自然法则的偶然性，尤其重要的是，20 世纪初的新科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论——似乎证实了柏格森批判的合理性。普恩加莱的著作《科学与假设》（1902 年）和《科学与方法》（1909 年）也进一步肯定了对传统科学法则的质疑，而维达尔·德·拉布拉舍在奠定法国地理学派的同时，同样指责物理学界的决定论。

心理学研究的革命使人们发现了无意识。1885 年左右，催眠术风行一时；在克莱蒙、里尔和南锡，各地的催眠师都吸引了大量群众。1889 年召开的国际催眠术大会被迫要求禁止公开集会。报刊和书籍中充斥着巴黎学派和南锡学派之间的挣论。在萨尔佩特里埃尔，夏尔科——1885 年，一个年轻的维也纳医生弗洛伊德曾拜访过他——宣称，只有癔病患者才能被催眠；他还认为这是一种治疗手段。南锡的伯恩海姆认为催眠是个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富有启示意义的现象。最后，雅内于 1889 年证明了导致失忆的行为。所有这些医生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具有科学性，因为他们试图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来解释特别的事实，但舆论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神秘性，而这种神秘性正好破除了人由理性引导这一形象。于是难以描述、无以言表找到了它们的基础：人不仅仅是意识清晰的。因此心理分析看来也是粗浅和不准确的。

更宽泛地说，实证主义思潮难道不是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紧密相连，而并且超越了科学领域么？难道它不正像罗曼·罗兰指出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即煤炭和蒸汽机的意识形态么？随着电力能源的出现，试图超越理性主义的柏格森主义更适合这个正在成型的新世界。

因此我们应强调这场抗辩运动的含糊性，没有比这能更好地结束这段分析的了。一方面是一种厚古的观念，即对古老岁月的怀念，在有些人那里甚至是某种明确的社会保守主义。另一方面是适应新世界的意愿，这个新世界既因为技术发展、也因为自然和人文科学进步而变得更加美好。这场抗辩运动的每种表现中都体现了含糊性：例如，

对很多人而言，回归基督教就是逃避变革和“混乱”；在其他人看来，正是这种情感使得基督教理想超越了历史变迁，因而也不再与任何政治和社会制度相连——前一类人的代表是布尔热和布律内蒂埃尔，而贝居伊和马克·桑尼埃代表后一类人，尽管这两个人互相敌视。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思潮催生的很多作品会老去、为什么继续流传的作品在它们问世之时并不总是被认可的原因所在。绘画运动的情况要清晰得多，但它为确立自己的地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792

绘画在法国的至上地位

在19世纪末，每个国家都似乎在一个特定的艺术领域为先锋派保留着一定的特权。如德国进行了瓦格纳革命，不久俄国成为后继者，最后，维也纳音乐家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创立了十二音体系。新的建筑首先在美国崭露头角。法国是绘画艺术的特选园地；半个世纪之内，各种流派起伏相继，而每次新浪潮都不止是对西方传统造型艺术观的挑战。之所以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仅仅是因为画家们的勇气，也得益于某些艺术品买主思想之开明。

传播和销售的平行网络

我们已经看到官方绘画的僵化局面；幸运的是，另外的传播和销售网络逐步形成了；虽然它们还远不足以养活艺术家们，但这毕竟让他们免于彻底的困窘和默默无闻。

这种新机制的中心是画商，这些人当中有些原来是颜料商，如塞尚的朋友老唐居伊。那些与画家共同战斗的商人已经为人熟知，如印象派的支持者迪朗-吕埃尔，对他而言，“一个真正的画商应准备在必要时为其艺术信仰而牺牲自己表面上的日常利益”；还有安布瓦斯·沃拉尔，他是塞尚和高更作品的经销人；有达尼埃尔·卡恩维勒，这位立体主义者的朋友第一个创立专卖合同，即收购某位画家的全部作品并保障其最低收入。与画商合作的收藏家也参与了这场充满风险的事业：收藏家来自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其职业至为广泛，有银行家如埃弗吕西，有医生如加歇大夫，此人曾照料过梵高，还有普通公

务员，如海关职员舒克凯。画商或画家本人可在沙龙之外组织集体或个人画展；当然人们也利用咖啡厅：例如 1889 年，纳比派就在沃尔皮尼咖啡馆举行展览。很快就出现了一个独立艺术家的沙龙，自 1884 年后，它每年定期举行展览，这里没有任何入场条件，也没有监督作品正统性的评审委员会。秋季沙龙（1903 年）后来补充了这一文化机构；非正统艺术家现在也可以广为人知，即使他们的画作卖不出去。

印象派的历程

1863 年，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与 4000 多幅作品一起被评审委员会否决；面对艺术界的骚动，皇帝授权为被否决的作品举办一次展览，这是现代艺术的第一次亮相。但是直到十年之后新流派才获得自我意识。在这段成果丰硕的岁月中，人们曾赞叹北斋的日本木版画——这些作品展现了一种不必为透视操心的空间；人们还在瑞士科学院进行训练；人们也曾在诺曼底的海滩上、在特鲁维尔和翁弗勒尔、在法兰西岛、在塞纳河畔、在枫丹白露的森林中支起画架；在盖尔布瓦咖啡馆里，人们围坐在马奈和左拉身旁，探讨艺术经验，还想方设法让几幅画作进入艺术品展览会。直到 1873 年，莫奈、雷诺阿、毕萨罗才放弃使用灰色，马奈、德加和塞尚等人开始采用亮色。次年，除马奈外，上述所有人都出现在摄影师纳达尔举办的展览上，尽管受到恶意的批评，不过他们在嘲笑声中收获了正式称号。实际上，舆论并没有由此平息下来，1875 年，沃尔夫在《费加罗报》上写道："这是一只在钢琴键旁游走的猫、或一只想要抢夺颜料盒的猴子的作品"。

793 在 1878 年的一次拍卖上，马奈的作品卖到了 583 法郎，莫奈的只有 184 法郎，西斯莱的为 114 法郎（而当时的学院派作品通常可以卖到 1—2 万法郎）。穷困潦倒是那些不能取得个人成功的艺术家们的普遍命运；例如莫奈为了到肉店和面包店付账而向马奈乞求 20 法郎，毕萨罗 1878 年这样抱怨："过去我受的罪闻所未闻，现在我仍遭受可怕的折磨……不过我觉得，如果需要重新开始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走上同一条路的。"1874—1886 年的八次集体展览中始终存在斗争，而这个新流派的特征也凸显了出来。

现代派艺术家之所以反对学院派绘画，首先一点是他们希望在户外进行创作，以便更好地把握现实。“以自然为参照的三笔画作胜过画架上两天的工作”，他们的先驱者布丹曾这样说。于是他们发现，“自然之中没有黑暗”，因此他们决心采用明亮的色调。在他们看来，学院派形式纯粹是墨守成规，而且跟一种认识上的简单化和一种视觉程式化联系在一起。实际中存在的只有光线，光线在白天的不同时刻、以不同的角度变换着轮廓和色彩；画家通过研究水中的倒影来表现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处理不同时刻的同一对象来达到这一效果，如莫奈和他的《大教堂》。因此他们要求观众摆脱自己的视角框架，观察这个世界最初的清新，并自行梳理色彩斑斓的混沌状态。印象派画家一开始还有某种现实主义的考虑，但随后他们远离了现实主义，因为他们证明了现实主义理念的矛盾性，实在物归根结底只是光线的作用带给我们的“印象”。“客体”、即绘画内容的至上地位因此一起消失了；一切都处于自我表现的方式之中；他们已经可以认可稍后莫里斯·德尼给出的定义了：“在成为一匹战马、一个裸女或某段故事之前，一幅画主要是一个涂有按某种次序组合起来的颜色的平面。”因此主题之间也就没有层次；另一方面，历史绘画已引不起任何兴趣，风景画的地位恢复了，家庭和民众场景的绘画也是如此。虽然马奈在 1885 年前后开始被部分批评家接受，但他那些更为“革命”的战友则一直受到鄙视。1889 年，拉维斯把他们与“颓废派、不和谐分子和布朗热将军”列在一起，称他们是令“我们的敌人”称意的“法国的花哨货色”。在 1894 年老唐居伊的绘画拍卖会上，塞尚的作品总价没有超过 215 法郎。到 1900 年前后，情况逐渐好转，但官方团体仍持敌视态度。1894 年，画家兼印象派的朋友卡耶博特临终之时把 67 幅印象派作品赠给国家时，有 25 幅作品被拒绝，虽然已经为此进行了三年的协商。“要让国家接受这样的垃圾，那真得忍受一次道义上的大屈辱”，学院派画家热罗姆叫喊道；几年之后万国博览会之际，这位热罗姆在印象派展厅入口前挡住卢贝总统说：“别去，总统先生，这里是法兰西的耻辱。”不过很早以来，有些艺术家已经在批判“印象派的畏畏缩

缩”了。

当代绘画艺术的缘起

确实，有些人曾批评莫奈和他的朋友们“过于罗曼蒂克”，没有最终完成他们的发现。1886 年，修拉在毕萨罗的协助下为创办科学的“新印象派”而努力，这个新流派将全面运用舍弗厄尔关于色调的分解和重组理论。更为深刻的批评来自长期在印象派中成长的塞尚：“光线吞没了造型”，他曾这样说。他反对完全消解客体，并试图“以圆柱、球体、立方体来处理自然，将一切都置于透视之下”，以便创立一种新的古典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传统观念中，相反是要超越这个莫奈的老朋友们珍爱的“流动斑点”的世界，并严谨地创作每一幅画作。

794　高更指责印象派仍然固守着“逼真性的窠臼”；他想“确立尝试一切的权利”。他倡导说，“不要过于切近地模仿自然，艺术是一种抽象：在梦想自然时抽象出自然的艺术，应更多为创造、而不是为结果着想。”他第一个极力主张“原始”艺术应在绘画观念的更新中发挥作用：“年轻人在啜饮遥远而原始的源泉时会得到拯救。”这就是他远渡塔希提岛的原因。他的绘画“表现的根本不是庸俗意义上的绝对真实”，但通过“线条和色彩的组合”，画家收获的是“和谐和交响乐”，这种效果“必定会像音乐一样引人思考”。梵高一度是高更的战友，他也在实践同样的主张：“我追求的不是准确地再现眼前看到的一切，而是更自由地运用色彩来强烈地表现自我。”塞尚、高更、梵高是我们当代艺术的三位直接先驱，他们实现了绘画主体的解放。此后，艺术家以或多或少的现实性来创造形象，但现实性成为了手段，它本身并不是目的。

20 世纪初的三场运动使先驱者的预感成为了现实，这就是野兽派（1905 年）、立体主义（1907 年）和抽象艺术（1910 年），它们与黑人雕刻的发现、与对原始艺术和大众艺术更公正的评价有关。新的艺术繁荣最终确立了巴黎世界绘画之都的地位；所有外国画家都在这里长期居住，即便他们在国内已经有了活跃的艺术环境，如在慕尼黑和

莫斯科。一些外国流派宁愿首先在法国传播它们的观念，如意大利未来主义就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自己的宣言的。

野兽派

野兽派是在反对体系精神和修拉及其朋友们的“理性”绘画中形成。作为表现主义的法国形态，“笼中困兽”——批评家的一句玩笑成为了光辉的称号——当中有弗拉芒克、德兰、杜菲和马蒂斯，我们也可以加上鲁奥和夏加尔。这些艺术家追随梵高的足迹，推崇“创造性”的直觉，任由自己的想象力驰骋。作为现代浪漫主义者，他们首先试图表达的是自己强烈的情感。因此他们处于宏大的“非理性主义”潮流之中，虽然文学和哲学是这一潮流的主要表现形式。野兽派运动持续时间甚短，很多人后来到别处去追寻他们的理想了，如马蒂斯。不过对所有人而言，这场运动仍是某种让色彩发抖的方式，“被扔到公众脸上的画盆”，当时的这一评论用意不良，而且那个时代对野兽派的认识也一直很盲目。

立体主义的传奇

对我们当代世界来说，立体主义的历程为时更长、更为深刻也更具决定意义。这场运动超越了绘画领域，涉及雕刻和文学——这得益于阿波利奈尔和马克斯·雅各布的全力斗争——以及戏剧、音乐和日常生活装饰等方面。

立体主义与塞尚有着直接的关系，秋季沙龙于1907年为他举办了一次立体主义回顾展；毕加索和布拉克率先决定遵循这位艾克斯的大师的建议，以几何形状来描绘自然。与野兽派不同，他们希望控制自己的感官激情；他们也希望摆脱细枝末节和“描述性”；他们喜爱黑人雕刻，因为“黑人艺术家表达的并不是他们所看到的，而是他们所想到的”。因此，作为一种深刻的理性化的艺术，立体主义的抱负在于勾勒出自然的真实。从传统上说，画家表现的其实只是“视觉幻影”，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或只是透视法，从透视法来看，远处的人就显得要小一些，但这是不真实的。通过在画面上并列出一个物体

795 的不同侧面，艺术家便可指望给出它的全貌。在取消透视时，他便摧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们创立起来的造型空间，并提出了一个新空间的基础。

1908 年再次发生轰动性事件；布拉克在被秋季沙龙拒绝后，到卡恩维勒家中展出他的作品，其中的风景画《埃斯塔克》是由一些小立方体构成的。同一年，第一个立体主义团体在“涤服舟”公寓成立，核心人物是毕加索和布拉克，另外还有朱安·格里、阿波利奈尔、玛丽·洛朗森、马克斯·雅各布和费尔南·莱热。此后又有别人加入，如格莱泽、库波卡、德劳奈夫妇和杜尚兄弟。由于成员日渐增多，这个团体也分成好几个派别。一派是维永·杜尚和他的兄弟等人，他们试图表现现代世界的运动和动力，因而与意大利未来主义的主张有契合之处。相反，蒙德里安等另一派拒绝表现运动，他们的作品偏爱直线条的简约。而德劳奈属于第三个派别，他对色彩的对比很感兴趣，此前的立体主义一直忽视这一点；而毕加索和布拉克则在 1912 年创作了最早的“拼贴画”，把最不相同的各种材料组合到画面中。到 1913 年，阿波利奈尔可以做一个总结了（《立体主义画家》），然而，官方评论仍不为所动，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一昙花一现的几何形危机会产生世界性反响”。

抛开上述差异，我们今天很容易判断七年的立体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它继续了印象主义的努力，最终摈弃了高贵的主题的理念：一个酒瓶、一张餐桌都像其他主题那样值得画家给予同等的关注。因而也不再存在所有“高贵的材料”：撕碎的挂毯、一只旧袜子都可以创作出漂亮的作品，这个结论也有助于建筑艺术摆脱工业材料“没有美学价值”的偏见。此外，与官方绘画艺术相反，立体主义艺术家对现代性怀有兴致：工厂、体育表演、航空盛典就是他们喜爱的几个素材。他们使人们的眼睛习惯于简约而风格化的线条，为现代装饰适应于技术变革作了准备。最后，立体主义还是通往抽象艺术的主要阶段之一。

抽象艺术

这最后一场运动并不完全起源于法国。慕尼黑的康定斯基和克里、

莫斯科的马列维奇也是最初的发起人。但所有人都到过巴黎，或熟知法国流派的创作。事实上，要理解非造型艺术之形成的整个逻辑过程，只要追述一下自马奈以来的绘画艺术的演变就可以了。康定斯基正是通过克洛德·莫奈的“麦垛”发现抽象原则的。而我们已经看到，高更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抽象的，一幅画作应该被比作一支协奏曲或一部交响乐。所有人——甚至那些接近现实主义的人——都认为，真实不在于每个人都能窥见的传统意象中，而在于艺术家的重构中。

在法国，三位来自立体主义的画家阐明了这场变革的全部结论，他们是库波卡、蒙德里安和德劳奈，他们起初代表抽象艺术中的几何派，而受野兽派影响的康定斯基则在慕尼黑创作了第一幅非几何形抽象水彩画。这是法国理性主义的文化氛围与斯拉夫和日耳曼非理性主义之对抗的一种新表现吗？这样的论断未免简单化，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立体主义以及塞尚对整个巴黎流派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绘画与文学变革的分离显而易见：合理性一直是法国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标志。形形色色的现代绘画就是如此，而它的影响涉及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

雕刻，绘画艺术革命之女

很长时间内，雕刻尤其是个“因循守旧”的避难所。只有屡犯众怒的罗丹带来了新的气息：他自认为是个印象派，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与学院派雕刻家不同的是，他试图抓住某一刻的印象，而不是声称要刻画“永恒”的理想化形象。他也拒绝“摄影术”式的精确，因为“应该取得的相似性是灵魂的相似性”。但是，准确来说，作为现代雕刻的先驱者的罗丹并没有弟子。布尔代勒和马约尔仍然忠实于传统，不过他们对传统进行了更新，并认为自己更接近于古朴时期而不是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 796

新观念的出现也来自立体主义，立体主义因此回报了雕刻艺术带给它的一切。毕加索在最初的立体主义绘画中就曾雕刻过人物的脸型（如在《阿维农少女》中），在这一时期的创作生涯中，他在雕刻方面

的成就几乎和绘画一样丰富。毕加索最初受到非洲雕塑的启发，在“苦艾酒杯”中，他把粘贴的原则移植到雕刻中，这件作品使用了一些最出人意料的材料。不久，一些雕刻家——大都来自斯拉夫国家——聚集到布拉克和毕加索周围，雷蒙·杜尚，洛朗、扎德金、利普希茨等人使得雕刻有了立体主义风格。在此期间，处于这场运动的边缘但受其影响的一位罗马尼亚“农民”布朗库西——他还深受其祖国的民间艺术的滋养——创作了一些造型越来越简单的雕刻。布朗库西是个标志性人物，他象征着自布尔代勒以来所有独特性之联合带来的效应：像在绘画领域一样，远古的、原始的、民间的东西恢复了声誉，这样便能更好更有力地表达情感。

建筑艺术的滞后

在建筑领域，“学院作派”的胜利来得更为轻松，何况建筑师对公众的依赖更为直接：要想让方案付诸实践就得找到顾客。在建筑方面，世纪末的法国十分滞后，如果不算埃菲尔铁塔的创作的话。现代风格还没有带来真正的造型革新。在我们考察的这一时期的最后一年，随着托尼·加尼埃和他的工业城方案的出现、特别是佩雷兄弟的到来，一场变革正初现雏形。装饰艺术还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只有海报这一“受人鄙视的体裁”加入了造型革命，此举得到图卢兹－劳特雷克和博纳尔的推动；这两个人还让人们习惯了鲜活的色彩和简约的轮廓。他们创立的风格很容易吸收那些来自于立体主义的形式，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如此。

迟到的音乐革命

第二帝国以来，在音乐领域，代表先锋派和作为矛盾之象征的是瓦格纳。法国的流派很少谈到他。一些重要的作曲家，如拉罗、圣桑、塞扎尔·弗朗克、加布里埃尔·弗雷和樊尚·丹第继续着过去的传统，他们没有想到去颠覆音乐语言。努力的方向是为推广音乐，并在全国音乐协会的推动下教育公众。组织定期音乐会的音乐协会日益增多：

如1861年的帕德卢普音乐会，1873年的科洛纳音乐会，1881年的拉穆勒音乐会；1896年创立的“声乐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和弘扬宗教音乐。当然，音乐家们不可能对文学、特别是绘画领域的变革保持无限的无动于衷；我们在加布里尔·弗雷那里已经能觉察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风格，这是德彪西革命的先声。

德彪西在发现深受民间音乐影响的俄罗斯音乐、并在1889年万国博览会之际发现远东音乐之后，将要对法国的音乐语言进行革新；对于当时的文化氛围，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敏感：孤立音符的使用和旋律线的断裂使人想起色调分割的印象派技法，而对表现手法的斟酌则让人想起象征主义。1902年，以梅特林克的剧作《佩丽亚斯和美丽桑德》为基础而创作的歌剧引起了第一场轰动，并最终确立了德彪西的胜利。这位大师曾以音乐的方式再现了马拉美的“农神午后”，并将他的一部作品命名为“印象”，准备以此来调和诗歌、绘画和音乐。从《法兰西的克劳德》开始，法国的音乐流派开始繁荣起来，1918年以后尤其如此，不过莫里斯·拉威尔和艾里克·萨蒂已经展露了他们的才华。

797

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公众在发现俄罗斯文学之后，还有时间来直接发现俄罗斯音乐；1908年，夏里亚宾在国立歌剧院演唱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哥都诺夫》，随后几年中，俄国的芭蕾舞让巴黎认识了鲍罗金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1913年，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以其《春之祭》再次引起轰动。音乐从“印象主义”变成了“立体主义”。

“美好时代”的最后十年成果十分丰硕，仿佛每个艺术家都意识到了不安的前景，都想尽快推出他们的成果。俄国的芭蕾舞可以被视为这种蓬勃生气的象征。这方面的首要人物是塞尔日·德·佳吉列夫，他在1899年让俄国人认识了法国的现代绘画艺术，接着又在1907年组织音乐会，从而让法国人认识了俄罗斯的音乐。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曾给佳吉列夫以强烈印象，此后他决心使芭蕾舞摆脱学院气派。他实现了德彪西、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预想的整体性表演艺术，在这种艺术中，所有美学形式融合交汇，互为阐释。在俄国芭蕾舞剧中，

音乐和布景实际上不仅仅是舞蹈动作的简单辅助。画家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他们参与编舞设计，而编舞就凸显出服装的价值，因为服装可以强化舞蹈演员的动作效果；任何要素都不能自行处理，一切都服务于这一造型表现艺术。因此俄国芭蕾舞是半个世纪艺术的发展总结。它向我们表明，绘画艺术的革命给整个文化生活带来了多么大的冲击。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意义何在呢？为什么它会不为名流们理解呢？

新社会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艺术？

第二帝国的美术总监纽维柯尔克曾宣称，印象派绘画是“民主派的绘画，是不换内衣者的绘画”。曾有《法兰西共和国》的一位记者，在拒绝雷诺瓦的一篇关于1877年博览会的论文时对后者这样说：“但你们忘了你们是革命者。”造型艺术革命难道不就是与社会变革——比方说，与甘必大所说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同时发生的么？

如果研究一下画家们的社会来源，我们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一些人出身小资产阶级，并无特别资源，如毕萨罗和莫奈；另一些人来自“上层资产阶级”，生活优越，无需出卖他们的画作，如银行家的儿子塞尚和德加。

在政治和社会观念上也没有明显的统一性。像很多象征主义者一样，有些印象派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同情，如毕萨罗；另一些印象派则拒绝介入这些问题，如雷诺阿，或者是保守派，如德加和塞尚。所有人都远离库尔贝关于艺术的社会内容的理论。对他们的欣赏者作一个初步的社会学分析也不会更有启发意义：甘必大是雷诺阿的好朋友，克雷孟梭是莫奈的朋友，但这个左派议员在1914年曾怒斥“我们的殿堂竟用来展出如此反艺术、如此令人反感的东西”。相反，上流社会的某些追赶时髦者却很青睐先锋派艺术家，特别是1900年之后。实际上，对新艺术的理解与社会地位没有关系；我们至多只能提示一下，一些人数很小的社群，比如犹太资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在新艺术的欣赏者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这样看来，确实存在一种纯粹的误解么？民主或革命的绘画之类的说法只是忽视审美而造

成的结果么？不完全是这样。

心态世界的考察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非学院派艺术所传播的潜在价值观，我们便能理解反对派的立场了：法国名流们的一切原则都受到嘲弄。在殖民帝国主义的鼎盛期，在一切人文科学都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艺术家们欣然向日本人、波利尼西亚人和非洲人学习，他们因而也打破了文明的等级秩序。更有甚者，在列维－布律尔确认“原始人的前逻辑思想”的时代，毕加索竟声称黑人雕塑绝对合乎理性。画家们率先指出了我们分类方式的相对性，他们远远走在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前面。在我们文明的内部，他们挑战那种根据所受教育和社会层次来确定趣味等级的“社会－文化秩序”，因为他们为民间艺术恢复名誉，歌颂海关职员卢梭[①]，甚至自觉地在大众娱乐和表演中寻找题材。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法国资产阶级生活在对于稳定的世界的平静而明确的信念中，而在这个稳定的世界中，传统这个避难所可以使他们忘却世界的演变。当艺术家们与停滞的过去决裂并进行革新的时候，他们也提醒19世纪的人们注意自己是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他们让这些人了解到观念视角的相对性：文艺复兴时代的空间只是多种观察现实的方式当中的一种。确定无疑的永恒性消失了。

与此同时，画家们还为我们的工业和技术世界而欢呼：他们赞美埃菲尔铁塔，这与名流们的鄙视恰成对照；他们拒绝将艺术和日常生活以及实用性对立起来，这不同于一切传统的高中和学院教育。他们最早意识到寻找新语言的必要性，以便与学者和工程师、爱因斯坦和埃菲尔创造的新世界协调起来。他们预见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即将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革。当然他们的艺术充满矛盾，它既是乐观的也是悲怆的，这种矛盾性也预示着当代人的焦虑和骄傲，这类情绪通常是因为“科技进步”的矛盾性后果引起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如下

---

① 指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作品以风格纯真著称。

情况的原因：更为开放的、已完全转向现代性的美国社会更早（自 1886 年迪朗－吕埃尔的美国之行以后）接受这种新语言，而处于前工业社会心态的法国领导阶级则强烈抵制摧毁他们那个停滞的世界的潮流。

法国文化气候的反差

简要的总结看来会揭示某些矛盾之处：与知识的开放、文化传播手段的变革相伴随的是文化模式的延续性，而且很多文化模式的根源可上溯到旧制度时代。即使是在日渐衰落的民间文化领域，过去的特征依然保留着，如节日历和嘈杂乐。

从“高级文化”到学校文化，法国的形象都是统一的，这是个“温和平衡”的国家，因为它“坚定的农民美德”，因为仍与土地和小城市保持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的节俭品格。因为蒲鲁东主义的长期影响，社会主义运动也打上了上述品德的烙印。在高级文化中，这种对城市和工业世界的不信任既深刻地体现在法国理性主义的狭隘性中，也同样深刻地体现在对这一理性主义的抗辩中。《崩溃》的作者左拉与《大地在死亡》的作者勒内·巴赞十分接近。

当然我们不能低估教会与共和国的冲突，这不仅是两种政治之间的斗争，也是两种文化的斗争，斗争涉及双方的学校、报纸、出版机构和文学，每一个方面都有一张资产阶级的面孔和一张群众的面孔；这还是两种理念的交锋：在一方看来，一个可能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只有靠强有力的等级制度和合法的权威才能维持下去，而在另一方看来，一个因为科学进步和知识传播而处于无限进步的世界是可以期望达到平等与和平的。我们也不要忽视地区差异和工人阶级为创建独立的文化群体而进行的运动。不过归根结蒂，所有人都承认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便是其中不可小觑的一项；全民动员总是带有某种庄严、有时甚至是欢乐的节日气氛，它也不仅仅是个政治仪式，而且是一次文化表演，其中掺杂着世俗小学的教育、左派和右派的插图出版物、反理性主义运动和实证主义意识形态。

人们马上要去保卫“伟大民族”、“方形草场”、“现代希腊、理性

的祖国、人道主义的传人”，保卫“人类”……文化共识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神圣的团结只是其诸多标志当中的一个。

在法国，唯一真正的挑战来自借用了绘画语言的先锋派。半个世纪期间，一些小团体先后以印象主义和立体主义观念对官方的整个世界观提出持续不断的质疑，并酝酿着我们当代的精神世界。这场文化变革虽然是少数人的事业，但它是唯一真正的文化变革，远比另一个重大事件，即小学教育更具根本意义；实际上，第三共和国只是加速了一场已然广泛兴起的运动，而且学校倾向于让大众阶层接受名流们的文化模式，而不是设法创立新颖的思维和表达模式。学校这一事实对理解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演变和法国农村史具有重要意义；但学校带来的文化变迁很大程度上与技术革命行为牵连在一起。通过海报、建筑和家庭装饰的变革，画家的影响力很快就越出了美学家和附庸风雅者的狭小圈子。当他们改变我们观念的时候，难道不就是改变我们的心态结构么？因此，断言那个时代伟大的革命者是马奈、塞尚和毕加索，难道真有那么不堪忍受么？

800

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1918年，世界末日

大战的爆发

想以寥寥数页的篇幅来概述大战期间的法国人民史会有失轻率。此外，从事这项工作的时机可能尚未成熟，因为在进行类似的综述之前，必须先进行详尽、乃至细致入微的研究，但这类研究才刚刚开始。诚然，当时整个国民生活都深受军事局势的影响。不过，谁要是一味专注于军事局势，其研究势必难以取得真正的成功。还有比1914—1918年的各大战役史更老掉牙的主题么？何况，关于各国军事首领在战略上的得失的争论也为这类历史提供了素材并使其得到深化。

不过，如果说震惊和费解是历史学家带给人们的首要印象的话，那么他们也能为我们提供——这里更是如此——新的表述，并使我们觉察到那些只是表面上被解决了的难题。

但我们不把战争的起源问题列入这类难题之中。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以至于成为当时内外政治冲突的一个因素，但是现在，即使在不同的国家，研究对象也只存在细微的差异。不过就战争起源问题来说，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并不总是很恰当的评论：这就是军事理论和战略计划对冲突的爆发所起的影响。

有多种军事理论么？难道法国和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是一回事吗？1870 年德国对法国的胜利是运动战和持续不断的攻击对于静止的、过分偏重防御的军队的胜利，这样的军队只能相继被困于要塞中，注定走投无路。教训没有被遗忘。对敌对双方来说，现在占优势的是运动战理论：关键不是征服或防守土地和要塞，而是以军事行动、首先是以进攻来摧毁敌军，这才是唯一能决定根本的。当然，并非所有军事首脑——特别是在法国——都是这种理论的拥趸；在火力和防御工事的作用问题上的争论尤其激烈。在战术理念上，虽然尚须辨明一些细微的差别，但基本特征没有变化。

相反，在战略计划方面，法国的情况与德国大相径庭。在德国，1905 年之后占支配地位的是施里芬计划：这个计划的前提假设是德国同时与法国和俄国作战，其主旨是赶在动员缓慢的俄国全力投入战争之前结束同法国的战斗。为此，应以一次动作十分迅速、规模十分巨大的攻势来围歼法军。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德国总参谋部于 1914 年强迫文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当有关战争责任的争论开始之后，这些政策将显得格外重要：对最后的调解努力不予理睬，因为不能给俄国人备战的时间；为取得主动而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因为施里芬的攻势必须穿越比利时；此举也迫使英国参战，而英国一开始对这场战争是持保留态度的。但这又有何要紧呢？如果战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只持续几个星期，英国的作用将微不足道。

801

而在法国，就整体政策而言，军事当局对于共和国的文职政府机构处于严格的服从地位，而文职政府的方针是谨慎的，或是因为其民主制，或是因为它所承担的失败的记忆，或是因为它知道法国需要盟友。因此法军不可能率先进入比利时。法国的总参谋部虽然也喜欢进攻战略，但它认为只有在十分不利的局面下才能发动进攻，因为法德边境——俾斯麦曾精心关照过的边境线——十分有利于德军的防御。但所有德国人都认为借道比利时是可能的，根据这一假设条件，法军参谋部肯定预见到了某种行动，但它没有准确估算出这次行动的规模。

这就是说，法军指挥部处于痛苦的困惑中，这种困惑体现在对

1914 年法军总司令霞飞之意图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解释中，如人们对“第十七计划”的猜测就是如此。根据这一计划，法军主力在战争开始后将集结于洛林地区，从而大大削弱整个默兹河西岸地区的驻军。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准备让法军在一个几乎到处充满艰难险阻的地方发动全面进攻。另外，由于霞飞生性十分矜持，几乎从来不解释他的深刻用意，因此可以提出好几种推测。根据第一种推测，霞飞受极端的进攻理论的毒害，认为一下子就能占据上风，并迫使对手放弃原定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几乎不是什么秘密了）。根据第二种、也是流传最广的推测，霞飞可能料想到了对手将在比利时采取攻势，但攻势不会越过默兹河一线，一是因为对方没有足够的兵力采取规模更大的行动，二是因为这样的大规模行动只有在穿越荷属林堡地区后方能展开（但这就意味着德国同时破坏多个国家的中立）。若情况果真如此，法军在阿登地区的行动路线将不会很多，这是第十七计划中预测到的一个变数。第三种推测也需要提一下：霞飞估计敌军可能横穿整个比利时采取包围行动，但当它的部署变得过于薄弱时，便可以从中间突破，而突破地点正是洛林和阿登。忽略侧翼包围的威胁、实行中间突击，这就是“奥斯特里茨行动”，这个光辉的名字肯定对法军将领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不管怎样，所有推测都认为，霞飞和他的参谋部在判断上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没有考虑到，德军从一开始就安排了后备军团。正是由于后备军团，德军在展开行动时才无破绽可寻。

德军的攻势最初取得的成功——虽然其政治代价将十分沉重——足以确保施里芬计划的成功么？德军即使动用其全部资源，也不能保证自己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它怎能期望在四周之内战胜法军呢？实际上，法国为了弥补人数上的劣势而付出了更大的努力，终于聚集起与即将进攻的德军数目相同的师。因此德国应依靠其质量上的优势：它的部队生来就更讲纪律，训练也更为系统。德军装备也更好——当然这一点上已经应该有些保留意见了；法军部队兵员不足，制服过于显眼，缺乏重炮部队，等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不过法军的步枪和野战炮至少可以与对手持平：对于一场运动战来说，这难道不重要么？

802

但是——这里且不提很久以来某些人所作的种族比较——在德国，人们怀疑法国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应付这场巨大的战争。原因在于它的政治体制。俾斯麦曾预言说，民主共和制注定要使法国处于软弱状态。在那些对法国少有同情心的观察家们看来，随后出现的情形更增强了俾斯麦的这种论见。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法国工会运动的革命暴力与有纪律且相当易于操纵的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强大力量之间的对比。整体来看，法国还没有为一场大战作好精神准备。大战前一年，规定服役年限为三年的法律勉强通过，因为总参谋部很有理由担心德军发动突然进攻，并认为这项法律必不可少。但是，反对三年兵役法的多数派在1914年4月26日和5月10日的选举中获胜。对这项法律的敌视使得里博无法在新的立法任期内维持最初的内阁；他暗示可能的外部危险的做法已经让议会颇感不悦。这难道不是法国准备放弃的一个象征么？

这样的推想虽然很自然，但它同时却忽视了法国议会制度非常特殊的运作方式。以更为崇高的原则的名义推翻一个以具体局势之必要来制造麻烦的内阁，这是向这些原则致以它们应得的敬意。随后，这些原则的坚定支持者掌握了权力，这些人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可以更好地让民众——首先是他们的追随者——理解，应顺应必要的形势。就这样，里博被维维亚尼取而代之，而后者虽继续奉行前政府的政策，但却得到无可置疑的左翼多数派的支持；这个更加符合法国的情绪的政府将毫不气馁地迎接战争。这个国家将全民一致、甚至满怀热情地投入战争，而这一点在前不久还几乎无人相信。即便是象征反战潮流的饶勒斯遇刺，亦未对法国士气之振奋造成严重影响。

最初的军事行动

1914年8月6日，执行施里芬计划的德军部队进入比利时并进攻列日。德军的行动应在默兹河对岸的纵深方向展开，以形成西翼包抄的态势，对法军施加切实的压力。而在此间，因为进攻地带的地形过于困难，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进攻皆以失败告终。但还有更严重

的情况：德军进入比利时后，法军预先已经计划好的反攻遭受惨败，特别是在蒙斯和夏尔勒洛瓦更是如此。这些失利原因何在？当然首先是法军统帅的战略错误，他低估了德军西部攻势的规模。但也许还有法军部队战术上的欠缺，因为它们的战斗准备并不充分。

但不管怎样，为扭转局面，8 月 25 日以后，法军总司令霞飞必须指挥他的部队进行两次行动：其一是法军的左翼和中线要进行收缩，其二是要将相当大一部分部队调往西线，以防止对方西线包抄的威胁。这些行动的成功毕竟为他赢得了更光彩的头衔；特别是在十天的退却之后，部队的组织依然完好无损并保存了大部分装备，这在很多人、特别是他的对手们看来简直是个奇迹。霞飞一直想再次发动进攻，但803 这种可能性随着撤退行动的延续而渐行渐远了。法军参谋部已经规划了一条向上塞纳省撤退的路线，但该路线使法军同设防的巴黎的联系成为难题。

看来这就是被推向极端的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学说的逻辑。基于同样的逻辑，德军从西方折向南方，把安特卫普留在身后，使这个城市成为比利时人抵抗的堡垒；位于战线最西端的德国第一集团军司令冯·克吕克是包围战略中的主要行动者，这时他绕开巴黎——起初巴黎是其主要目标——深入首都以东地区，以追击撤退中的法军：重要的总是要歼灭法军，而不是占领某个堡垒。

但在这时，文官机构首次出面抵制这种军事战略。法国政府同意撤往波尔多，但坚持必须坚守法国的首都；为此还组建了一支特别军队，这支军队甚至对敌人的侧翼构成了威胁。法军统帅很早就从中看到了重新夺回主动权、并在最佳状态下进行一场大战役的机会。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这样的问题：胜利应归功于巴黎军事总督加利埃尼还是其他人，抑或是霞飞本人；各方无疑都进行了出色的论证。但是我们也许不应该忘记那些政治家的作用，他们也许比某些过于教条化的军人更准确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巴黎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国家的畸形发展的首都，它的失守几乎是一场决定性的失败。

不管怎样，9 月 6 日，在霞飞的号召下，全体法军振作力量，掉

转头来重新发起进攻。冯·克吕克很快就发现他的侧翼正面临威胁；当他命令部队迂回行动时，他也失去了与邻近部队的联系。德军的部署一步步走向瓦解，只有来一次预备性撤退才能恢复联系。9月9日，在四五天激烈的战斗过后，德军整体上的进攻限于停顿，部分战线被迫后撤。马恩河战役后，施里芬计划便不可能在预定期限内实现了；最初的意外过去之后，法军证明了它有同可怕的对手抗衡的实力。

但是，这场胜利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德国人看来，这是个意外事故：最高军事长官毛奇对战争的领导不够到位，随即便被法金汉取而代之。法金汉已下定决心重新发动进攻，尤其是要在新的基础上继续西翼包抄的攻势。但是此刻已经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虽然这个变化一开始没有被意识到。马恩河战役凸显出了在辽阔的空间内指挥大军进行运动战的诸多困难：军队时刻有被分割的危险。为避免这种危险，此后德军——实际上法军也在学习它的策略——只在西线部署一支很有限的部队，并以连续的堑壕和掩体网络将中线和东线联系起来。在双方的包围战术失败之后，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向北一支延伸到海边。

冬天到来后，军事行动受到限制，德国的战略计划失败了。但它的军队占领了法国大片土地——而这些地区前不久在战略上还很不受重视。对于法国来说，一部分人口最稠密、经济上最富饶的省份落入敌军之手，这给它的军事政策乃至全盘政策造成严重困难。法国人将被迫重新夺回它的领土，而德国人将可以更轻松地转入防御；法国政府将永远不能指望进行和谈、指望妥协的和平，因为以现状为基础的和约必然要以新的重大领土让步为条件。

804

寻找行动空间

从1914年底开始，一些人——特别是政界人物，如白里安、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认为，由于防御工事连绵不断，今后要想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十分困难。至于某些英国人特别钟情的登陆德国海岸的计划，则明显太不切实际了。因此，寻找新的盟友和新的行

动空间的努力——这两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首先就转向了地中海沿岸。但是，其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不过，1915 年 5 月意大利同奥匈开战算得上是一场表面看来颇为辉煌的胜利。但是，意奥战线位于阿尔卑斯山区和卡尔索高原，这种地形十分不利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意大利的参战造成了一种很快就大大变味的局面：此后大部分参战的协约国对战争其实没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它们也没有倾尽全力、以全部的热情投入战争。

但更大的梦想是重组反对中欧各帝国的巴尔干大联盟，这个联盟曾在 1912 年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出现过。1914 年 11 月，巴尔干各民族的大敌土耳其站在德国一边参战，随后这种梦想便更为强烈了。其实，英国的考虑有点不同：它不太在意俄国人在巴尔干占便宜，相反它一心要把土耳其人排除出苏伊士运河、红海、波斯湾、特别是帝国大道。但是，巴尔干各国更加关心它们的地方性争吵，而不是全面战争，同时，它们也十分注意避免走入一条危险路线，除非能得到西方大国军队的支持。但是，派兵前往巴尔干，会分散西线的宝贵兵力，并使远征军及其补给线暴露在海上风险及奥地利舰队的攻击之下。有个办法看来可以排除困难：以一次纯粹的海军行动进攻土耳其帝国的心脏君士坦丁堡：此举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即同俄国盟友建立远为方便的联系。但这需要突破达达尼尔海峡，这条海峡十分狭长，两岸是陡峭的山崖，因此地形十分有利于防御。海上进攻失败了；当时还以地面部队登陆作为支持，但登陆部队毫无进展，损失惨重。最后，为了援救绝望中的塞尔维亚人，得到增援的达达尼尔远征军转移到了在希腊萨洛尼卡的基地。但在那里，失望接踵而至：希腊最终拒绝参加战争，驻扎在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陷在一个几乎没有交通路线的山区，无法支持塞尔维亚人，后者走投无路，只得从另一个方向作一次悲惨的撤退。人们曾对罗马尼亚的支持寄予厚望，但这个国家 1915 年还没有加入协约国一边参战，而保加利亚却宣布支持德国，虽然为了取得它的支持，协约国曾付出了很多努力。唯一的安慰是——但全然是消极性的——萨洛尼卡的驻军还没有被赶下大海：地形的不便、

特别是缺少足够的运输工具对德奥军队造成的麻烦不亚于它们的对手，而保加利亚人在摆脱了他们的邻居和敌人塞尔维亚人之后，也没有多大热情去进攻那些遥远的大国。

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可以利用内陆线路运送部队，这是他们对于敌军的优势；此外，它们此前就发现了一个运动战的开阔战场，这就是在辽阔的波兰平原上进攻俄国人，它们在1915年取得了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重大的胜利。 805

堑壕战

因此，协约国所能采取的一切钳制行动实际上都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霞飞的看法是对的：只有在西线才能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权。但西线出现了全新的难题，这些难题不仅是军事理论始料未及的，人们在思想上和物质上也都没有做好准备。堑壕战及其战术方法并非全新的东西：且不提日俄战争的先例，甚至不必提美国南北战争，实际上，利用堑壕、交通壕、迫击炮和地雷进行攻守，在几个世纪前的堡垒攻击战中就已是人们所常用的战术了。但新的情况是，这种堑壕战被运用到绵延几百公里的战线上。困难主要不在于防线坚固、难以突破，而在于它的弹性：一条堑壕被占领后，几百米之外就会建起（或重建起）另一条堑壕。

突破行动总是反复进行，但从来没有恢复开阔地带的运动战。造成这些不可解决之难题的不是战术，而是陷入混乱的战略。

那么，当时法国军事前途的负责人——首先是霞飞——如何计划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他们并不怀疑会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深信，协约国——法国、英国和俄国——的资源要胜过德国和奥匈。但是还须动员这些资源，就是说，要给数不清的俄国士兵提供像样的装备，并促使英国下决心组建一支与其实力相称的地面部队；英国军队的作用确实在增强，但进展缓慢，直到1916年英国才确立义务兵役制。另一项长期性工作是要为部队提供新装备和必要的弹药，以便粉碎防御组织，而防御自身也在不断改进之中。

这些因素难道不就是引出一个等待战略么？福熙和贝当这两位禀性大相径庭的将领都是这么想的。但霞飞的看法不同，而他最愿意倾听的军事顾问——“青年土耳其人”则更加不这么想。霞飞起先倾向于低估新的防御战术的力量和敌军的抵抗能力；在这一点上，他与普遍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种普遍看法长期认为这将是一场短期战争。在霞飞及其亲信看来，进攻具有不可取代的精神价值，而且重新开始运动战和军事调动极为容易，这样的战争才是最自然的。需要补充的是，1915 年，法国有责任援助受到德奥进攻威胁的俄国：1914 年，俄国人未等到军队准备就绪便发动进攻，它的努力使法国人得以取得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也就是说拯救了法国。

1915 年的攻势

但是，要想重开地面运动战，怎样才能突破战线并随后展开战斗呢？在这个问题上，霞飞的观念看来基本是经验式的：通过连续不断、持续扩大的攻击，可以指望解决这个难题。在此，我们可以再次发现这位法军统帅 1914 年时的思想状态的延续，当时，他热衷于进攻，但同时又因为必须尊重比利时的中立而首先受累于敌军的战略计划：此后，他决心将战术性进攻转变为战略行动。此外，战线基本是敌军于 1914 年秋选定的，法军通常处于不利的位置，这就使得有限的“矫正”行动总是会有很多理由。在实战层次上，人们逐渐认识到，要攻占支离破碎的堑壕和“观察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航空、伪装和部队掩藏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这样的行动越来越不切实际。最后发展出了对敌军的“啃咬”战术，它对法军造成的损失尤其大。在 1915 年的战斗中，法军战死 34.9 万人，即每月死亡 2.9 万，而 1916 年和 1918 年每月战死人数为 2.1 万，但一些可怕的战役发生在这两年。

806

因此，法国方面在 1915 年尝试过很多次进攻。其中在阿图瓦的一次攻势看起来大有前途，因为它靠近下加莱的产煤带，对于一场消耗战来说，此地可谓意义重大。但在霞飞看来，这次战役始终是辅助性的。这位法军将领主要着眼于——与其运动战观念一致——交通线，

首先是梅斯－伊尔松－梅奇埃尔的“战略大道”。为了夺取梅奇埃尔，他于2月、9月和10月为突破香槟地区的防线而发动猛烈进攻，但是，该地区的地形十分有利于防御。数十万伤亡换来的是微不足道的领土和毫无战略意义的胜利：德军对俄国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明显削弱。

1916年：疲惫之后的平衡

霞飞从这些经历中吸取了一些教训：必须联合——或至少在时间上要协调——协约国军队在不同的战线上发起进攻；为此，他得到了意大利人和俄国人的许诺，但随后的成效却不一样：当意大利人还在伊崇左河畔原地踏步的时候，勃鲁西洛夫在加利西亚的攻势则成为俄军在这场大战中最辉煌的一页。

霞飞得出的第二个教训是：不事先消耗敌军就无法实现突破；为完成这一预备性任务，霞飞起初指望英军，因为它的力量开始增强，最后可以与法军一起发动联合进攻；双方的第一次联合行动是索姆河战役。第三个教训是：霞飞同意检验一下福熙的新战略思想：进攻不必是不顾一切的、多少带有一点突然性的大规模冲锋，也可以是进展缓慢、逐渐推进、每次行动皆以密集而长时间的炮火支援为先导的方式；换言之，消耗战的理念开始不知不觉地占据上风。而7月发动的索姆河战役是法英部队自马恩河战役以来取得的首次大捷。

但是，自2月以来，德军已经对凡尔登发动了一场战役，在德军统帅法金汉看来，这场战役应该是对消耗战理论的完美运用，直至达成最后的结局。但实际上，法金汉认为，占领凡尔登并不那么重要，并不是非得迫使法军宁愿葬身炮火之下也不肯撤退、以保全这个无论从士气和策略上说都必须牢牢守住的地方。但德军的战地指挥官科诺贝尔斯道夫可能误解了其上司的意图，试图攻占凡尔登，以至于德军也遭受十分惨重的损失。而法军的抵抗成了一个英雄主义和坚韧意志的楷模，它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世界，并使凡尔登的名字长期具有象征意义。不过，如果时光倒流，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法金汉的计划是否

像人们长期认为的那样颇为糟糕？而法国政治当局虽然在1914年如此正确地作出保卫巴黎的决定，但1916年它比某些军事理论家还更看重凡尔登的做法是否正确？因为如果从人口状况来考虑，法国远比德国更无法承受如此严峻的消耗战。凡尔登战役之后，法国的自信及对其首脑的信心——即便不包括它胜利的意志——开始出现明显的动摇征兆：物质和精神上的消耗实在太大了。

807

后方

不过在1914年夏，观察家、特别是熟悉最近的历史的人们感到惊奇的是，法国是带着举国一致的巨大热情投入战争的。人们所称的“神圣团结”，其意义不仅是、而且不主要是政府基础的扩大，虽然政府于1914年8月26日进行了完全偏向于左派的改组，两个社会党人由此入阁。毋宁说，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所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法国人都万众一心，投入了为祖国服务的事业中。无论是被共和制度打败的人、受政教分离法伤害的天主教徒，还是试图与民族主义合而为一的君主派、甚至是奥尔良和波拿巴家族的贵胄们，都毫不迟疑地要求为国效劳。战争开始时，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极左派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这种思想团结也反映在内阁的稳定上：维维亚尼内阁几经改组后一直维持到1915年10月29日被白里安内阁取代。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民族的信心和国家命运的主要责任系于霞飞将军身上。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当运动战开始时，这个事实实际上难以避免。当战线稳定下来、公共权力机构的运转几乎恢复正常之后，这一事实也没有多少变化；尤其是当议会于1915年1月不间断工作之后，情况更是如此。这并非是合理而必要的权责分配的结果：“领导战争”是政府的职责，而“指挥战争行动”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并不总是具有总司令的头衔——的专门职责，但这种区分基本是字面意义上的。如果说霞飞从来不能容忍文官机构干涉军事计划的话，他在尚蒂伊组建的参谋部则在不断膨胀，并毫不犹豫地干预经济战和封锁战及战时工业，甚至干涉外交（名曰“对外行动的舞台”）。如果说曾出现过一些政治

集团——当然主要以某些将军为核心，如加利埃尼及随后的萨拉伊，但它们并未真正动摇霞飞的权威，可以说，他个人支配了整个前半段的战争。

信心产生的原因

要解释这种坚定而持久的信心，首先应追溯到战争爆发之初：法国以自己的热情显示了它的自信及其信念的理由所在。在内心深处，也许法国对自己的力量不太自信，不过在一个月的考验过后，它也许还远没有陷入绝望和恐慌；正因为如此，马恩河战役的胜利——一次相当明显的军事成就，但完全不具备决定性——被欢呼为一个“奇迹”。而霞飞则赢得了长期稳定的声望，这是他应得的，不管怎样，他是战役的指挥者。随着战争一周又一周地迁延下去，霞飞崇拜也进入了民众的想象空间。由于霞飞的外在表现、他的风度、他过去的经历都不会引起任何政治上的麻烦，因而他赢得崇高地位就更容易了；人们知道，他不是“教士反动”的代理人，而且谁也不会想象这样一个举止平和的老好人会是个军事独裁者。

但对这种信任的性质不要有错误的认识；它并非 1940 年英国给予丘吉尔的那种信任，丘吉尔在表达战斗到底的决心时，也告知英国人将会有漫长的考验。而 1914 年的法国仍相信战争将为时短暂，虽然战线已陷于胶着。很多军事领导人——某种程度上包括霞飞本人——经常不断鼓起热情，指望下一次进攻取得突破、甚至是最后的胜利。文官领导人——虽然他们有时私下里表现出一些疑虑——同样从这种短期战争的观点着手工作。经济动员的缓慢和财政措施的临时性都表明了这一点。直到 1915 年 10 月 16 日才颁布法律授权征调某些物资，而且征调仅限于小麦和煤炭，1916 年 4 月 20 日才扩展到其他产品。战争的财政支持工作尤其受到批评；没有采取任何新的税收政策来应付新的需求；人们首先是求助于短期国库券的应急措施，接着又于 1915 年发行年限不超过 10 年的公债，而这些公债将在 1925 年以后带来大麻烦。直到 1915 年 11 月，政府才以永久公债的形式举借第一笔战争贷款。1916 年 5 月 18 提出了第一个关于新税收的方案，但这些新税

808

实在微不足道，而且方案直到 1917 年 7 月 31 日才生效，而在法国人看来，这时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

混淆视听和出版审查

每当一个社会处于神经紧张状态时，真相就会经人们的口耳相传而变形，于是，传说也就应运而生。换言之，我们应知道，“混淆视听”起初是并且首先是个自发性现象。它在两种方向上发挥作用：在战争初期，最微不足道的胜利也会被放大，敌人的力量被低估，轻松而辉煌的胜利唾手可得——这种想法本身的矛盾无关紧要。但随着战争的拖延和困难的增多，灰心泄气的情绪可能会像战争热情那样迅速蔓延。此外，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暂时性现象，因为人类并不是绝对自然天成地具有客观态度。既有战争带来的“混淆视听”，也有针对战争本身的“混淆视听”。对于关乎这场战争的浩瀚文献，让·诺尔顿·克吕算得上是苛刻而明察秋毫的批评家，他曾指责多热莱斯和巴比塞强烈地渲染了他们的见闻——这与他们那些著名的先驱者如出一辙。因此，如果说“混淆视听”是 1914—1918 年大战中的一个典型现象，那是由于战争持续的时间使然，漫长的战争把最初的自发现象变成了司空见惯的、几乎是制度化的现象；而“后方”和“前方”逐步增大的心理错位也是原因之一；主要为满足后方需求而创作出来的文献最后在前方战士看来难以容忍，他们认为，那些文字中描述的战争与他们从事的战争不再有任何联系了。

要理解法国的出版审查行为，就必须看到始终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这类现象。对军事消息实行监控的必要性并不是没有任何疑虑：在美国南北战争和 1870 年的战争中，一些战役的失败仅仅是因为敌方能看到报纸，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在法国，出版审查的权限要宽泛得多：“出版审查机关应取缔一切可能令民意骚动或削弱军队及公众士气之物。”“士气”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法国人民被认为很容易气馁，就像它很容易热情高涨一样，因此人们系统地向它掩盖了那些不好的消息。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情况转坏时，民意会马上责怪现存制度，而后者在法国从来就不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一场重大的政治危

机可能意味着战争的失利。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家又经常无节制地运用手中的便利扼杀那些恼人的批评。另外，心理战——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认识到了它的重大意义——需要深奥而高超的技巧，不过此刻的心理战尚处于童年。出版审查由于那些很容易避免的笨拙措施而显得荒唐可笑，而当一个长期被完全隐瞒的真相突然曝光时，恐慌的风险会更为加剧。对于当时显得有点天真的做法进行事后批评固然是很容 809 易的事情，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信心始终是胜利的首要因素。

信心的动摇

老实说，战争初年霞飞背负的如此广泛的信赖从来不意味着民意及其天然代表者是被动的。1914 年底，主题为“大炮！弹药！”的舆论攻势反映了这个民族试图积极配合战争、不愿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军队的意志。但这场运动所支持的只是霞飞的要求，它暗含的批评完全针对民事当局，后者被怀疑没有很好地履行部队补给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不断有人提出要求说，议会应确立某种对军队的监督权，这些要求看来是直接针对那位军事统帅的。霞飞对这种压力进行了有力的抵制：若允许议会调查士兵，则士兵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抱怨也就不再按级别层层传递，在他看来这是毁坏军纪。当然也不可夸大议会的要求的实际意义，不要被那个试图唤起 1793 年的“特派代表”之记忆的词汇所迷惑：崇尚大革命的语言是第三共和国的一个传统，尽管有时这种语言崇拜采取的是最明智的形式。议会只是想与民事机构一道履行自己作为选民（包括穿军服的选民）代表的使命。虽然这样的做法会产生很多摩擦，但还不至于动摇对统帅的全面信任，因为另一些深刻的原因并不会损害和摧毁对他的信任。

第一个原因就是战争的延续。它带来的不仅是幻灭、与日俱增的阵亡所带来的悲伤痛苦和逐渐开始的节衣缩食的岁月，还有更为棘手的麻烦。随着战事年深日久，“前线”和后方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心态。“后方”好歹恢复了接近于正常状态的生活，这让休假的军人十分震惊。在前线，人们也习惯了特殊的处境，士兵们都将有一种不可交流的共同经历，这其中甚至包括那些

“从前的军人”；所有关于战争的小说和叙事作品都将对这些隔阂给出具体的说明，而这种隔阂还在不断扩大。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越是习惯于战争，就越看不到战争的尽头、特别是看不到最后的胜利。

当1915年10月29日维维亚尼内阁下野时，米勒兰也失去了战争部长的职位，可以认为这是对法军统帅的第一次警告：米勒兰之所以受到批评，主要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一味袒护霞飞，而不是监督后者。不过，在米勒兰的后继者加利埃尼及罗克当政期间，霞飞的地位并没有受到严重损害。我们可以说，各种潜在的焦虑和疑惑是围绕凡尔登而激化起来的。

还在德国人对凡尔登发动进攻之前，很多传言即让人预感到这次攻击的到来。但法军统帅认为，这只是诸多可能性当中的一种，他也认为这些情报是有依据的，但是它们也提醒他在其他方面保持警惕。但是，德国人对于自己的意图不像以往那样的谨慎，也许是故意这样做，政治界的注意力也被吸引到凡尔登。有传言说，凡尔登疏于防范，虽然各方面都传来了警报。怎样解释这一疏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回避霞飞自己的解释，否则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看法。他认为，到1915年，重炮部队在堑壕战中起着显而易见的决定性作用。但在这810方面装备不足的法军不能等着制造新装备：应该利用现有条件，特别是利用像凡尔登这样的工事坚固的阵地；同样，堡垒和堡垒的防御战术也得重新审视，因为战争现在是在连续的战线上展开的。当凡尔登正在按照这种新思维重新组织防御时，德军的攻势开始了。但是，霞飞大概不会认为，这样的解释可以安抚当时的文官们。于是，时至今日，他一直背负着缺乏远见、疏忽大意之类的指责。此外，霞飞没有理解法金汉的想法，后者之所以以一个标志性地点为核心发动消耗战，目标是粉碎法国人民的抵抗力量，而不仅仅是法国军队的抵抗。

但是，如果说从军事意义上看，凡尔登战役以法国无可置疑的胜利告终的话，那么从政治上说，法金汉的估算并非那么失败。因为，为了保卫凡尔登，法国人几乎竭尽全力，在这场战役中，法国人开始丧失自信及对其领袖们的信心。报道中首次提到军队士气下降。但还

有更明显的表征。在凡尔登战役之前，议会只以公开会议的形式议事，因而不可辩论军事指挥问题。1916 年 6 月 16 日，众议院第一次组成秘密委员会，以明确讨论凡尔登战役。此后这类秘密委员会不断增加（到 1917 年 10 月 16 日已达 8 个，不久参议院也开始效仿），而且很快就让“秘密”一词徒有虚名；于是知情圈子中的疑虑和不安传播到民众当中。1916 年底，甚至连白里安也决心采取一个尚无先例的行动来牺牲霞飞，虽然后者仍有很高的人气。但是，这个强有力的决策还是没有使白里安免于被推翻的命运，1917 年 3 月 19 日，他终于下野，从此，大战期间的内阁开始步入一个痛苦的不稳定时期。

当然，在此期间，单是对战争的厌倦就足以唤醒和平主义思潮，而物质生活的困难、物价的攀升则诱发了罢工运动的复兴。各交战国的一些工人代表在瑞士开会，1915 年 9 月，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的人数还不多，但 1916 年 4 月后的昆塔尔会议的规模要大得多。1914 年没有发生罢工，但 1915 年有 98 起，1916 年有 314 起。对某些阶层来说，罢工只是表达某种远为广泛的不满情绪的一种方式。焦虑不仅限于极左派，在当局最为激烈的批判者当中还有克雷孟梭和塔迪厄。虽然有些焦虑者梦想着和平，但另一些人则呼吁更有力的战争领导。后一类人将占据上风。

尼维尔

霞飞的继任者是尼维尔，这位将军不久前还默默无闻，但他的晋升出奇的快，这显然与政治上的考量不无关系：政治因素也是排除其最明显的竞争对手福熙和贝当的重要原因。不过，尼维尔本人很是能满足当时人们心中越来越缺少耐心的期待。像霞飞一样，尼维尔也属于“进攻”学派，不过霞飞隐秘而谨慎，尽可能不让别人、特别是文官知道他的意图，但尼维尔却以宏大的见解来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并且激起了快速结束战争的希望。但是，尼维尔还没有军事业绩来证明某种不容置辩的信心，所以，他必须不停地向别人论证、也就是与别人争论自己的计划：不仅与英国人——其作用日益重要——争论，也

与法国政府和他自己的部下争论。这种困难局面实际上就是导致他上台的气氛所造成的，而不久之后这位新总司令的冒险性想法又加剧了困难，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也发生了同样的效果，在当时，这些事件完全改变了战争的基本态势。

811

尼维尔试图解决此前众多优秀军事人才都未成功的突破战线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利用和拓展最初的胜利成果上，而此前人们总是忽略了这个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拓展战果的难题已经在理论上得到解决：尤其是，重开运动战所必须的大规模军事调动实际上还没有完成。特别重要的是，尼维尔过于相信自己在夺回凡尔登的交通壕时的那种便当，但当时已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的尾声，那场战役已经打乱了地形，并彻底摧毁了整个防御组织。霞飞在规划 1917 年在索姆河地区的重大攻势时曾考虑到这种战术上的便当，那场攻势本是作为 1916 年诸次战役的后续的；但是尼维尔反对这次行动，因为敌军已经把预备部队、尤其是重炮兵集中在该地区；因此只能在那里进行一系列连续性的、分梯队的攻击，但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尼维尔几乎没有对阿图瓦地区的英军的任务作任何修改，同时把主攻目标转移到“贵妇之路”① 那些可怕的防御阵地上（人们以为这个地区相对平静），目的在于从这里攻击索姆河一线德军主力的侧翼。为了切断贵妇之路的战线，尼维尔并没有设想出任何新颖的战术：他明显寄希望于进攻的突然性。但是，由于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大攻势之创意的吹捧和宣传，保密的原则愈加难以遵守，因而也就更难以取得突然性的效果。

德国人也首次采取了令人瞩目的预防措施：他们的战线立即在努瓦永附近来了一个九十度转折，而这条战线自 1914 年秋之后一直是巴黎最直接的威胁。德军这样做首先是为了节省一线部队，为此德军统帅已经决定作出这样的牺牲，这也很好地表明，德军的消耗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另外，在 1917 年初，德国已不再准备发动地面攻势，

① “贵妇之路”是埃纳省一条东西向公路，一译“夫人之路”。

它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无限制潜艇战上。在协约国，那些期望战争迅速结束的人已不完全是在镜花水月了。但与此同时，德国人的收缩打乱了尼维尔的计划：预计在索姆河发动的决战前消耗敌军的攻势落空了；而从一个被撤退中的德军系统地摧毁的地带进攻新的阵地则可能十分困难。

还有一个远为重要的新情况——它与西线的军事问题毫无关系——也证明了政府的担忧和对军事行动日益紧迫的干涉的正当性。3月份的俄国革命很快就导致俄国战线的崩溃，一度有过的幻想也归于破灭。但是，1917年的攻势是在一个联合行动——如果还不能说是协调行动——的框架下拟定的，至少法、英、俄三国之间存在长期的合作。但现在怎么办？这个进攻计划象征着一个已经厌倦于等待的国家的希望，全盘抛弃它、连试都不试一下么？政府和尼维尔一样拿不定主意。

贵妇之路的攻势虽然因恶劣的天气而推迟，但还是于4月16日开始了。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去看，我们也可以说，这次攻势只取得了一些代价十分沉重的局部成功，它与1915年香槟地区的攻势颇为相似。不过1917年的心理状态已经大为不同，很多人很快就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失败，更何况此前的期望还更为远大。5月15日后，尼维尔失去了最高指挥权。

贝当与长期战争

812

尼维尔被与其意见相反的人取代。实际上，贝当是当时最坚定的军事防御理论的拥护者，他之所以被任命，不仅是因为他的见解与新任战争部长潘勒韦[1]一致，也反映了领导集团的茫然，所以它才会在几天之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但实际地说，贝当并不认为单纯的防御可以赢得战争。他的一个重大的新颖见解是，炮火的威力胜过运动战的力量，只有火力上占优

① 一译班乐卫。

才能确保有效的运动战："炮兵征服土地，步兵占领土地。"但是这种战术理念实际上排除了连续进攻的战略，而后者此前一直是主流，但它给法军造成的损失却是这支军队所不能无限承受下去的。贝当认为，要想进攻，就得等待在资源上——特别是火力上——占据对敌军无可争辩的优势之时。

不久，这种观望战略还因一场震动军队的重大危机而成为必要，这就是1917年5—6月的"兵变"，它发生在尼维尔大攻势地带的后方：贵妇之路和香槟地区。最近的研究使我们可以看清兵变的性质：它不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和平主义的宣传也只起了次要的作用；兵变首先是身心疲惫的士兵的自发表现——他们在三年的努力和折磨之后还看不到明确的结果，兵变采取的形式不像是一场"堑壕罢工"，更像是"进攻罢工"，像一场对准备糟糕、损伤元气、血腥而又徒劳的攻势的抗议。贝当没有采取极端的严厉措施便恢复了军纪，他首先要求各级军官关照士兵的物质状况。部队平息下来后，他又以几次有限的攻势重建了部队的信心，而在这些进攻行动中，正如他主张的，进攻方拥有压倒性的火力优势：拉马尔梅松战役（10月23—26日）最终确保法军占领了贵妇之路的全部阵地。

不过，此后的战略整体而言是观望战略，如果不是某些重大局势使其可以实施下去的话，那么这种战略可能是不可想象的。1917年初，德国人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其目标是要让英国在六个月内屈服；不过一段危险期过去之后，这种战争从5月份开始减弱，它的最后失败看来大有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潜艇战最终导致了美国的参战，而且美国决心全力投入战争，这与起初很多人的看法相反。但是美国需要一点一滴地创建整支军队，所以直到1918年夏它才能组建起规模可观的部队；不过另一方面，人们估计美国将会在1919年确保协约国在军队数量上占据无可争辩的决定性优势。在那么多令人失望的攻势之后，"等着美国人"的想法当然很在理了。但这个想法中也有某种下赌注的风险意味：因为在此期间，俄国战线受到国内革命的动摇，越来越表现出瓦解的迹象。因此贝当只能这样推想：任何来自西线的努

力都不能拯救摇摇欲坠的俄国战线；当然，与此同时，德国人可以从东线抽调部队来增强西线，但是德军在美国人到来之前将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判断都是有道理的，但当时的人们觉得这些都远非显而易见。

由于战争迁延日久，经济动员措施也显得更为系统化，而此前的措施还没有总体计划，总是在紧迫的局势下尽量拖延。当然，很早以前就应该临时创建整套的战时工业体系，以便制造新式武器，甚或满足突发性的军用需求；为此人们广泛使用了妇女劳动力，让她们完全在通常的生产领域之外劳动；妇女不仅在田间取代了男子，而且很早就成为了纺织工人，现在又充任冶金工人。但是，向非生产部门发放工资以及消费品的稀缺导致物价上涨，对此当局几乎束手无策。1917 年 8 月 3 日的法律扩大了政府的征调权和征税权。但是，如果没有配套政策的话，这样的措施注定毫无效果，而配套政策就是对需求进行系统有序的限制，换言之就是实行配给制，但法国人会习惯性地反抗这一制度。于是在几经踌躇和拖延之后，人们采取了一些权宜之计：比如对饭馆的菜单进行限制。接着又设立了糖卡、面包卡（1917 年 11 月在大城市实行，次年 1 月推行到全国）。直到 1918 年 4 月，配给制度才推广到其他食品上。

813

另一个领域的另一个事实也反映了同样的思想倾向：1917 年 12 月 23 日，众议院和参议院任期延长；这就意味着，直到这时为止，人们还不敢正式承认战争不会在正常的选举日期到来之时结束。

克雷孟梭与胜利意志

在军队出现士气危机几个月后，政治危机也进入了最剧烈的阶段。原因都是一样的：厌倦战争，丧失了胜利的信心。但政治危机既远为深刻，同时也更为复杂，因为俄国革命造成的难题、对手之间的秘密交易以及战争的目标问题都纠缠在一起，几乎理不清头绪。当然，我们这里不能论述这些问题的外交和国际方面，因为这需要作过于宽泛的展开，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局限于纯粹的法国视角。

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社会党的立场。1914 年后，社会党不仅参加了

国防工作，而且加入了政府。然而，在俄国人的鼓动下，1917年5月，社会党国际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大会；各敌对国家的代表可以与会，会议当然是谈论和平问题。像其他交战国一样，法国政府也拒绝给社会党代表发放去斯德哥尔摩的护照。这件事，再加上因工资和价格形势而引发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骚动，逐渐使社会党转入了反对派。9月，社会党首次拒绝加入潘勒韦的新内阁，虽然后者有明显的左派色彩。

但战时政府遭遇的最严重的困难还不是这个：因为社会党尽管地位重要，但它已经明显脱离了这个国家的其他民众。相反，灰心气馁的“失败主义”（这个术语指的不是盼望失败，而是认为很有可能失败）、对妥协后的和平的渴望之情在民众当中广泛蔓延。这类新出现的情绪有可能成为主流，因为它们体现在一个显赫人物的身上，此人有可能掌权，这就是前总理约瑟夫·卡约。

无论是从出身、气质还是从其内心和大部分思想观念来说，卡约都不是左派。但是，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开始成为潜在的左派领袖人物，之所以如此，可归因于他在两个特殊问题上的立场：作为收入税的专家，他被视为“进步主义”的财务官；作为对德和解的支持者，他又与饶勒斯及其门徒不谋而合。不过他对德和解的愿望之中还有尖刻的反英情绪，这可以说是维希体制的先声。因此，战争爆发后，这样一个人物受到德国特工的特别注意并不令人奇怪，再加上他爱冒险的个性、言辞甚至行动上的轻浮，所以注定有很多痕迹可使他受到通敌的控告。但实际上，这件事与其说是个人事件，还不如说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众议院当然很清楚，这件事提供了一个作出抉择的机会，它可以通过公开投票来推翻潘勒韦内阁；这次投票像往常一样行事谨慎，它是为一个纯属次要的事件而进行的。

814

共和国总统召乔治·克雷孟梭组阁，众议院以压倒多数批准了总统的决定（1917年11月20日），此举决定了法国政治的走向，并使胜利成为可能。克雷孟梭本人就是雅各宾共和国的化身。他毫无保留地赞成人民主权理念，并把这种学说推向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民事权力应屈服于军事将领的

权力：当初他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坚定斗争已经证明他并不想这样；担任总理之后，他便能更好地确立其对于军队的权威，因为军队也知道，克雷孟梭无法接受失败主义，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完全能庇护自己穿军服的部下免受来自议会的批评和攻击：各秘密委员会的撤销已明确显示，危机和政治动荡的时代结束了。另一方面，克雷孟梭并不是糟糕的传言里的那种人，他的头脑要灵活得多，性格也更为温和；对于将领，甚至对那些他抱有成见的将领，他都能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他还力图同堑壕里的“小毛兵”进行直接交流。

克雷孟梭政府的第一个举措自然是争取众议院批准对卡约的起诉，而这就要求剥夺后者作为议员的豁免权。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政治事件也走向了司法解决的道路，这就是马尔维案件。不过马尔维案件很不一样：与卡约不同，马尔维不是某种鲜明的政策和纲领的象征，而是法国议会通常受人指责的轻浮放任作风的典型代表。此人自战争爆发到1917年8月31日一直担任内政部长，他一度是尼维尔的支持者，但与贝当这位谨慎而偶尔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将军的关系却很紧张：这清楚地表明，“失败主义”是一种很含糊的说法，它包含很多不同的思想状态。马尔维之所以受指责——克雷孟梭成了这场抨击运动中的明星——主要是因为他在镇压众多叛国案件及和平主义阴谋方面行动迟缓，玩忽职守。

为反对上述阴谋，特别是反对1917年迅速蔓延的灰心气馁情绪，克雷孟梭以其全部的信念和意志的力量表现出了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如果他的对手、特别是卡约占据上风的话，处在那一刻的法国可能发生一场士气和政治上的大崩溃，届时德军统帅部可能会强加一个保留德军战果的和约。不过，内部崩溃的风险虽然被排除了，军事难题依然毫无进展。

福熙和指挥权问题

意大利战线崩溃于卡波雷托战役，甚至在此之前人们就几乎可以确定，德国将利用俄国崩溃的有利时机，赶在对手因美军的到来而形

815 成压倒优势之前在西线夺取决定性胜利。为准备最后的战斗，首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实现各协约国军队指挥权的联合：包括法军、英军、比军和随后到来的美军。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致我们难以理解：为何这个问题争论了好几个月，而且争论几乎徒劳无功，为何它直到1918年3月才在迫在眉睫的危险的逼迫下得到解决。

这是因为，这个问题实际上牵涉极端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联合指挥权不仅与几个实力几乎相等但想法肯定不同的大国有关，而且会挑战各国民事权威至上的原则。在法国，1915年以来的全部政治努力都倾向于结束霞飞将军事实上的独裁，克雷孟梭既过于专断又过于民主，以致难以由衷地接受重建类似的军事权威的计划。更何况，一个同时隶属于各国政府的总司令，可能仅仅以效率的理由就可以摆脱所有政府的监督。因此，人们也可指责克雷孟梭丝毫没有急于解决统一指挥权问题。

不过，劳合·乔治很不信任英军将领，这就减弱了他让将军们服从某个法国人时的反感情绪。至于英国的将军们，他们很是赞赏福熙的人格，他们知道，在极端危险的时刻，福熙曾赶来支援他们，而且行动远比贝当等人坚决得多。于是，这就可以解释下述现象：当英法军队在德军攻势的压力下面临被切断的时刻，英国人建议由福熙协调协约国军队的行动；面对严峻的局势，克雷孟梭也表示赞同。

因此，联合指挥权的出现与其说是某种逻辑发展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局势的产物。不过，它从未有过人们曾试图赋予它的影响力。福熙虽然怀着急不可耐的热情，但他能做的只是劝说各协约国将领，而不是对他们行使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指挥。而且，他只能在不过分远离广泛认可的观念的条件下才能劝说成功，这就意味着，他事实上不可能在战略和战术上有天才的创新。

德军的最后努力

与之相反，德军统帅部不得不尝试新的作战方式：因为德军必须在美军大部队到来之前的几个月、也就是在可能拥有一定优势的几个

月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不仅要求突破敌军防线，而且必须充分利用突破的战果，以便重新在开阔地带展开运动战。然而，这场新战争的物质资源上的优势当时已在协约国手中：协约国实际上掌握着空中优势，并几乎垄断了所有坦克。而另一方面，由于从东线调来了部队，德军又组成了一支习惯于运动战和大开大合的调动的步兵和军官队伍。有了这张王牌，德军统帅部认真发展了当初尼维尔只能梦想而已的战术。这种战术首先是实行纵深突破，一直推进到前面没有有组织的防御体系的地方；为此，应集中攻击有限的阵地，并寻求真正的突袭效果：这就要求把炮兵准备缩短为几个小时，因而，炮兵也就不可能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而仅仅是以毒气弹暂时压制守军。当这样的狭窄走廊形成之后，精于野战行动的精锐部队将快速通过，部队达到开阔地带后向各个方向铺开：这就是曾在里加和卡波雷托实践过的“扇形”展开。如果对方重建起防御堡垒，则不必费力去削平之：可以选择其他通道。这样的攻势没有事先严格限定的战略目标；毋宁说，关键在于充分利用随时出现的战机。 816

1918年3月21日，按这种思路设计的攻势首次在索姆河地区展开：这里是法军和英军的结合部：显然，在这个地方最容易打开缺口，因为不同的指挥部下面的部队难以维持联系。最初的战果确实证明这种战术的卓越之处：缺口在法军和英军之间被打开，亚眠暴露在德军面前，英军第五集团军迅速溃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了1940年战争中的情形，它不意味着有形的消灭战，而是由于对手过于迅猛的行动而导致部队措手不及进而完全瓦解，遭受攻击的部队一下子失去了参谋部、部队之间的联络以及给养，于是只能仓皇溃逃。

不过，最初几天的辉煌过后，德军的攻势放缓并最终停顿下来。“最后一刻”实现的联合指挥权消除了导致缺口出现的某种指挥管理上的原因。仓促赶来的法军预备部队几乎本能地重建起一条直线阵地。但另一方面，德军并没有将他们的新战术理念执行到底；他们过于依赖补给线，但补给线越来越长、越来越艰难；因此，推进最深的部队有遭受侧翼攻击和与基地隔离开的危险。实际上，德军尚不具备执行

其战术理念的手段：他们的精英部队，即步兵和炮兵，其移动速度都不够快，不能充分利用仅仅敞开几个小时的突破口，尤其重要的是，这些部队的行动不够独立，它们无法向纵深推进而不担心其他方面——特别是后勤——能否跟得上。“扇形”突破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十分脆弱的巨型“口袋”。

德军于 4 月在佛兰德尔发动第二次攻势，这次行动主要利用协约国军队的困难，即后者不能迅速将预备部队调往战线的顶端，因为它们的铁路干线已经无法使用了。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挫败，战役很快仅限于对佛兰德尔“山丘”的进攻。

德军的第三次进攻发生在被视为天然强固、因而防御力量虚弱的地带：贵妇之路一带。攻势发起于 5 月 27 日，其成功超乎所有人的期望：德军第一天就推进了 20 公里；埃纳河和马恩河先后被突破。六天之内，德军开辟了一个宽 70 公里、深 50 公里的“口袋”。但德军需要再次依赖铁路枢纽苏瓦松；为使该地免受攻击，应该向西扩大口袋，而不是向南展开大规模的战略行动。法军已遭受严重损失，福熙也一度地位不保，只是因为克雷孟梭的努力及其在议会的巨大影响力，他才得以渡过难关。不过，这位法军统帅还是成功地重建起防线，尤其是加强了苏瓦松以西的防御堡垒，该堡垒也可以用作一个出色的反攻发起点。

此刻，德军已经取得十分辉煌的胜利，但没有赢得决定性成功，而且时间的流逝对它不利：部队不断消耗但看不到补充的希望，后方的士气日益受英国封锁的打击。一些德国领导人认为进行谈判更为明智；但是最高统帅还想作最后的一搏。

“通往胜利的计划”

及至 1918 年 7 月，力量对比关系就像人们预计的那样，已经不利于德国人了：德军共有 200 个师，而协约国达到或超过 210 个师。协约国物资上的优势更为明显：炮兵方面略占优势，空中优势明显，坦克则占压倒优势：不过，虽然坦克已经可以扭转严峻的局势，但还没

有产生一种充分运用坦克的理论，坦克根本没有革新协约国军队的战术。

不过协约国此时已准备发起反攻；根据某些传言，攻势将在具有象征意义的7月14日发动；作战地点已经选好：苏瓦松附近的多米埃高地。但是，鲁登道夫于7月15日发起攻击，进攻地点在贵妇之路攻势中创建的口袋地区。鲁登道夫无疑希望在继续把握主动的同时迫使对手最终接受他的意志。如果他的对手仅仅是贝当的话，他有可能取得成功，贝当在德军最初的胜利面前曾准备取消计划中的反攻。但福熙的性格跟他不同：7月18日，反攻在德军口袋的西线全力展开，当晚局势就被扭转过来。

人们有时过分夸大了这次反攻的战果。德军侧翼遭受攻击，但没有被歼灭，德国人成功地撤退逃脱；配备坦克的协约国军队追击速度要比没有坦克的德军慢得多。

这是因为，整个协约国统帅部，包括福熙在内，都仍然固守着阵地战和消耗战的理念——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它事先就注定了1940年的灾难。从1918年8月到11月，福熙开始利用资源上的优势，他将动用这一优势来发动一系列攻势；但他从来没有设想过突破和展开，而总是限定于有限的目标之上：肃清交通线，削平对方战线的突出部。这种军事思想也反映到地图上：协约国战线的推进从来没有呈现过口袋形状。只是随着优势的扩大而进攻更为宽大的阵地：这正是1915年霞飞的想法。

那么胜利的到来为什么比人们期望的还要早呢？这并不是因为大量美军的到来造成的兵力上无可匹敌的压倒优势。这是因为，在经过长期的消耗战和1918年春的最后努力之后，德军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实际上均已枯竭。8月8日的攻势发起后，德军统帅部开始担心部队会突然“爆裂”，这也是为什么德方突然催促提出停战的要求。但崩溃并没有发生；德军在步步后撤，当11月11日停战到来时，德军根本没有溃散。

鉴于德军没有战败并“从背后被捅了一刀”的传言造成的不良后

果，某些人事后曾抱怨停战来得太早，他们认为，停战协定至少应在法美军队对洛林的攻势发动之后再签订，这次攻势预定于几天后开始，人们以为它将切断德军的退路并包围歼灭之。但是，有什么理由让人相信这次攻势不同于此前的行动、并远比后者更具决定性呢？

但胜利还是奋力争取来的，它与德国的“革命阴谋”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这是一次联合的胜利，虽然这里我们只是很间接地谈到了他们，但英国人和美国人为胜利所作的贡献不能低估。不过，如果考虑到法国的潜力，他所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方。1918年的胜利理所当然首先是法国的胜利。

这首先是法国议会共和制度的胜利，这一制度的外表曾是那样虚弱，但在极端的危险中，它因其灵活性而显得惊人的强大；它在未经深刻改组的情况下应付了非同寻常的挑战。

从更为非理性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相对落后的半手工业经济对当时名列前茅的工业经济的胜利。而且，法国在战争之初就失去了北部和东部的主要基地，但它不仅为自己的军队、而且为其盟国的军队提供了最终优越于敌军的武器装备，这样一个国家何以能做到这一点？最终的巨大成果远比起初的滞后更让人吃惊。当时宏大的战争经济是如何创立起来的？在我们这个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时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目前还远远不够。

818

最后，这也是一个在生活艺术上的声望要远高于在男子气概和斗争意识上的声望的民族的胜利。对运动感到恐惧、害怕穿堂风、披着法兰绒的法国人，他们怎能展现出忍受四年堑壕战而不倒下所必须的动物般的忍耐力呢？这曾让一个杰出的科学院院士感到惊奇。但我们不应忘记，对法国来说，1914—1918年的大战主要是农民的战争；首先是因为法国还是一个乡村占优势的国家，其次是因为很多城市居民被迁往后方以维持长期拖延的战争。“法兰西的狂暴”很久前就只是一个传说了，不过，一直到1940年时，堑壕战在法国人的头脑中仍是唯一可以想见的战争，它完全符合一个农民民族的状况和心态——农

民几个世纪以来就附着于土地，他们习惯于没完没了地为几阿尔庞[1]的土地争论不休，为地界问题弄得面红耳赤。从这个观点看，“大战”确实是一个为保卫其土地的民族所作出的终极努力。这样的努力将越来越困难，不是因为它不可匹敌，而是因为，对于一个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转变的法国来说，它越来越难以理解，随后的几章将会描述这个转变后的法国的面貌。

① arpent，法旧时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20—50公亩。

819

第二十八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1919—1939 年，从胜利的幻觉到“奇怪的战争”

法国胜利了，它也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1871 年的屈辱被一扫而空，阿尔萨斯和洛林得以收复。由于法国为战争作出了主要贡献，因此，所有人都觉得它是欧洲的头号军事强国；由于法国为公正和道义而战斗——它的盟友和它自己就是这样认为的——它觉得自己头上戴着所有古典崇高美德的光环。各种纪念和游行活动接连不断，演讲和致词不绝于耳；1919 年 7 月 14 日，当协约国军队的首脑们及各参战部队的代表走上香榭丽舍大街时，群众的兴奋达到了顶点。莫里斯·巴雷斯呼喊道：“福熙指挥着世间的所有军队。”在这“最后的一幕”中，法国的身份是胜利者。

实际上，这个可怜的国家高兴得过了头。那场规模罕见的动荡已经动摇了它的根基。在进行总结回顾时，难道不应该说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①]吗？

820

战争的代价

140 万人死亡或失踪，占法国劳动人口的 10%：除了塞尔维亚，

① 皮洛士（Pyrrhus）是古希腊伊庇鲁斯的国王，曾率军在意大利同罗马交战，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胜利。皮洛士式的胜利即指代价惨重、得不偿失的胜利。

这个比例在各交战国中是最高的。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损失：300万人受伤，其中75万成了残疾人，12.5万人被截肢。作为青壮劳力和潜在人口增殖者的年轻人损失尤其惨重。20到45岁（以1914年的年龄计算）的男子当中，10人当中有“两个阵亡，一个成了赡养的对象，三个需要一定时期的恢复”（乔治·杜波）[1]。还应该说说那些死亡者的身份。社会的各阶层都受到了打击，但是农民和自由职业者所受的损失比其他阶层受创更重。知识分子的损失尤为严重：入伍的小学教师有一半在战争中阵亡，巴黎高师和综合工科学校的毕业生死亡率也很高，且不说其中还包括了贝居伊、阿兰-福尔尼埃和阿波利奈尔。

实际情况或许更为严重：从1915年4月起，法国的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在一战期间，法国少出生了170万人。1920—1921年间的人口复苏远不能弥补这一严重损失。

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之后，将会在一段时期内产生连锁反应：因为140万阵亡的士兵中大多数是年轻人，所以1920年代法国的人口出生率将会下降；因为一战期间少出生了170万男女，所以到1934—1939年，当一战中的“低谷一代”处于生育年龄时，法国的出生率也会走低。

法国的经济也因为战争而遭受重创。土地荒芜，工厂被毁，矿井被淹，城市萧条：位于交战区和被占区的10个省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法国的生产能力几乎削减了1/5，重建迫在眉睫。生产军需品的工厂也需要转产。不过，法国农业和工业的恢复相当迅速。

但财政状况并非如此，因为这场战争耗费惊人。为应付开支，国家可以采取增税、贷款以及增加通货流量等手段。政府选择了方便的做法：法国的公共债务从1913年的330亿法郎增加到1919年的2040亿法郎，流通货币从1913年的60亿法郎增加到1920年的380亿法郎。国家曾要求法国人奉献热血，但没有苛求他们的钱包，这无疑是

① 一译乔治·杜珀。

出于担忧：对于法国资产阶级来说，还有比财产更神圣的东西吗？

但是，国家不仅仅举借内债，还向外国（主要是美国）借了 300 亿法郎；法国同昔日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因为债务的偿还问题而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932 年。最后，法国在 1914 年前曾大量输出国内的资本、获取高额利润来平衡收支；但战争减少了国外债券投资的收益，因为战时的法国必须支付向国外的采购，而俄国和土耳其等债务国的新政权又不愿意承认前政府的债务。预算赤字，外贸逆差，通货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后果的名称是上个世纪的人们曾一度让人遗忘的——通货膨胀。

精神上的动荡

战争本身几乎没有动摇社会阶级结构，但它影响了社会的精神根基。数百万人成年累月地背井离乡，在堑壕的烂泥中等候战斗的到来：堑壕中出现了一个粗犷但充满友爱的世界、一个没有女人的男子世界。适应这里的生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确能适应的话。保尔·瓦扬-古久里曾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过一位性情平和的公务员，此人总是忙不迭地重复说：“要勒死一个老好人并不是什么难事，你只要套住他的脖子就行了”：因为一天夜里他竟这样不费气力地勒死了睡梦中的妻子！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颇具象征意义。

821

老兵们的协会中一直延续着对死亡的回忆和堑壕中的战友情谊。但这些协会的命运很奇特：它们大部分人滑向了右派，反对现政权。战争既是友爱的学校，也是纪律的学校。协会中的活跃分子是“那些找不到、或根本不去寻找别的行动领域的人。根本不去寻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某种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些很难适应社会的人”（勒内·雷蒙）。“像在前线一样团结起来”，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口号，然而，议会制度不仅容忍各种异议，而且还鼓励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在该制度下，公民被吁请发挥他们的批判精神。但“老兵精神”中酝酿出的却是反议会主义。

妇女在所有领域都已承担了新的角色：她们接替了士兵留下的空缺岗位。战后，即使她们放弃工作，其行为方式也不可能回复到以前

了；很多妇女成为战争寡妇，很多人还承担起了一家之主的重任。在大量男子伤亡的情况下，那些不得不单身生活的妇女境况会如何呢？人口补偿的现象当然是有的：国外的移民是个积极因素，战争幸存者之间也会结婚，但单身妇女主要是与更年轻的男子结合：夫妇之间的年龄差距下降了，而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因此发生改变。

进入大学学习的妇女为数众多，他们还进入自由职业者行列，并开始承担高级职务。当然，对这一潮流的抵制仍是强烈的，但都归于徒劳：妇女在走向解放，资产阶级道德观在演变之中，风尚也有了变化；这是个平头、短裙、无拘无束的"假小子"的时代。男人们忙于战争，女人无人照料：夫妇关系可以轻易地重组，还有很多婚姻解体了。弗洛里奥夫人回忆说，当时每天有10—12宗离婚案："人们在为战争的迁延埋单"。

这不只是个埋单的问题。1911年离婚案为15000例，而1921—1931年每年为23000例：战后结婚率的回升就像出生率的回升一样昙花一现，而离婚则成为一种风尚。

《肉欲之魔》和《奥哲尔伯爵的舞会》[1] 之类的故事到处都在上演。每个街头都出现了舞厅，人们在里面疯狂地跳着新近从阿根廷传来的探戈。爵士乐也开始出现。电影院层出不穷。酒吧间如雨后春笋，1919—1930年，酒精消费量增长了三倍。"有某种无度滥行，某种消费、娱乐和发泄的狂热，人们对一切约束都感到不耐烦，追求标新立异到了乖张反常的地步，从放任自流滑向了丧德败行之境地"（莱昂·勃鲁姆：《在人类的范围内》）。这是和平到来的喜悦、还是希图忘却过去的意愿呢？但不管怎样，当时休闲娱乐之风的蔓延持久而深入。但很少有人对风气的转变感到不安。

---

① 这是两部小说，作者均为雷蒙·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肉欲之魔》讲的是一个高中生与一个有夫之妇之间的恋情，后者的丈夫因战争去了前线；《奥哲尔伯爵的舞会》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与伯爵夫人的爱情。

一、繁荣与幻灭：20年代

胜利总会带来乐观情绪：再也不需要某某大员指手画脚了！1919年的法国人也概莫能外：有些人可以重操战前的事业，回到那个很快以“美好”名之的时代；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有时与前者是同一些人——深入的改革方案即将推出，这甚至会实现一场革命。但所有人等来的都是失望。

难以遏制的通胀

822 战时通胀延续到战后，它的走高主要受信用货币的影响：为了支付重建费用、偿付公债利息及到期票息，国家大量印制钞票而避免采取总是不得人心的增税政策。只是在1924年这个十分不利的时刻——因为选举即将到来——面临通胀危机的普恩加莱政府才表决通过“双十一计划”：将所有税收提高20%；但这一努力仍不足以应付形势，而且社会主义者倡导的资本税也被断然拒绝；1926年，为了“恢复信心”（当然指的是资本所有者的信心），普恩加莱新政府降低了收入税税率，不过设立了一种初次财产转移税。在这种情况下，流通货币增加，需求也随之增加并超过了供给，生产能力跟不上需求增长的步伐：于是价格上涨的机制就此形成，1928年的价格水平比1914年高6.5倍。

通胀带来的必然后果——更确切地说也是通胀的动因——是法郎的疲软。之所以说这是通胀的动因，是因为法郎的下跌通常发生在价格上涨之前。在货币机制之外，心理和政治因素发生了决定性影响。国债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任何不安的经济氛围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资本外逃；投机成风；消费者亦不信任通货，采购比平时更多的物品；生产商“高价位运行”并囤积产品：通胀程序一旦启动便可自行获得内在动力。如何制止这种循环呢？

1919—1929年间，法国经历了两个高通胀时期。1919—1920年的通胀危机由于1921年的世界经济萧条而缓解。1924年初，新一轮的

通胀开始加速，但幅度不如此前。为了强迫德国支付战争赔款，普恩加莱于 1923 年下令占领鲁尔区，此举让英美深感不满；国际金融界部分巨头开始打压法郎，不过普恩加莱向美国摩根银行谋得一笔贷款，加之双十一计划通过及外交上的让步，局面得以稳定下来。在 1924 年春的选举中，左翼联盟获胜，法郎贬值、价格上涨的势头再度显露出来：资本所有者对社会主义者支持的政府心存疑虑，因为后者倡导资本税和结构改革。

乔治·博内是当时众多在财政问题上受挫的政府财长之一，这位颇具激进色彩的部长曾回忆起法兰西银行董事会的一次会议，他曾向该理事会提交过一份财政复兴计划；会上有几位银行界和工业界最有名头的人物："潘勒韦（当时的董事会主席）前来参加这次具有纪念意义的会议，并以其率直、迷人的方式作了开场白：'财政局面很困难，部长已经提出了一个计划，他将就此向你们作扼要阐述。我们将很高兴听到你们的评论或建议，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有经验和威望的……'我于是陈述自己的计划。接下来是长时间难耐的沉默。还是潘勒韦打破沉默：'你们都听到了，先生们。难道你们没有什么建议要提提吗？这又不要你们作出任何承诺。当然，这次会上的所有发言就应当保密。'在这番动人的邀请过后，会堂深处响起一个颤抖的嗓音，'主席先生，应该恢复信心'。我不知道这个平庸的真理是哪个董事说出来的，但我记得他的话引发了董事会主席的愤怒抗议，他对他的同事咆哮道：'这话你已经说得太多了。我们只能断定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都要为法郎而战斗，我们将为法郎而战死在堑壕里。'此后，没有哪位董事敢开口了。潘勒韦和我都试图让这些可敬的专家们发言，但均归徒劳。鉴于大家都不想说话，我们便开始询问：'你们说要恢复信心，可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每次主席都会重复一遍'为法郎而战斗'的口号，看来这个口号让他着了魔。不可能再听到其他东西了……董事们显然不愿大声说出内心深处的想法：'赶跑你们这些多数派的社会党人。'"

823

因此心理因素及政治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价格随法郎贬值而

上扬，而法郎贬值是因为资本逃离这个国家。受困于巨额债务的国家在金融市场上找不到借款者，而短期债券持有人也不愿延长债券期限，政府只得求助于法兰西银行的预支手段，即印行钞票。这是一个恶性循环。1924年12月，1英镑折合90法郎，1925年折合130法郎，1926年5月，这个数字达到了165；惊慌失措的舆论界开始追究责任人：当然是政府，但也有外国人的责任（旅游者受到抨击）。1926年7月16日，英镑与法郎的比值达到1比202，21日达1比240，众议院前面发生了抗议示威。左翼联盟领导人赫里欧随即辞去总理职务，普恩加莱组成"国民联合"政府——但社会党人被排除在外——并宣布了一揽子财政措施。但这些措施已经不必要了，7月23日，英镑对法郎的比价回落到1∶200。对此爱德华·赫里欧进行了一番清醒的总结："应该认为，财政困难部分是人为的政治因素造成的。普恩加莱政府一成立（赫里欧也是其成员之一），一切危险都立即魔术般地消失了……我觉得，政治自由再一次受到可怕的打压。债券持有人、法国和国外的银行家超越了政治人物，他们成为掌控局势的人，虽然他们总是让人看不到，但在法国，他们确实存在。"

1926年底，普恩加莱将法郎的价值稳定在战前的1/5的水平上：这次确实稳定了下来，1928年，当法郎重新与黄金挂钩后，稳定成为法定事实。普恩加莱本人不是通货稳定——这只是通货贬值的委婉语——的支持者，而是主张恢复1914年的金本位。如果这个做法可行，那将对法国的出口造成太大的打击。

1926—1929年是法国此后从未经历过的通货稳定期：当时人们认为，一场噩梦终于结束了。但这场噩梦造成了持久的影响。通胀这一20世纪的弊病，它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根基造成的冲击比战争还要剧烈。在受害者之中，我们首先碰到的是工人、职员和公务员：工资和薪水的增长跟不上价格上涨的幅度。但它们毕竟涨了！典型地反映了战前法国社会的那些食利者、国债持有人该怎么说呢？那些退休老工人又当如何呢？1928年，他们的收入只有1913年的1/6。对于前两类人来说，工作成为必须，不得不"挣工资"；对于后一类人则是窘迫、

甚至是破产；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场苦涩的经历。不过，通胀对生产者有利，其中小生产者获利不如大生产者，因为他们也要采购很多东西。债务人尤其是通胀的获利者，而国家又首当其冲：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大力推动价格上涨，它怎么能清除那么多债务呢？同样，大型工业公司可以贷款来更新生产设备，然后毫无困难地以名义货币偿还之；这样，通胀推动了国民经济某些部门的发展。

通胀造成的精神和心理反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烈。诚然，通胀有利于消费而不利于储蓄，但长期来看，这种效应不如阵发性危机和价格猛涨期间明显。毋宁说，通胀让人们不知所措，它搅动了舆论，让束手无策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们不得安宁，因为很少有人了解通胀的机理和其深刻起因。对于大多数法国人，对于最有影响力的专家——即便不是最称职的——有两个主导观念、也是两种治愈通胀的妙方：恢复金本位，实现预算平衡。右派认为国家支出太多，公务员也太多：1926 年，普恩加莱许诺裁减公务员。更令人吃惊的是一直关心财富再分配的左派的态度：社会党人那几年也主张预算平衡。这是因为没有人能想到别的出路。面对新的事实、面对不同寻常的现象，所有人的想象力都枯竭了。甚至到 1969 年，1925 年时的财政部长乔治·博内在出版他的《回忆录》时还断言，预算平衡才是唯一的万灵膏：不过，这就像西西弗那样，爬得高就会跌得惨。

824

经济的迅速恢复

1921 年，法国的生产水平甚至低于 30 年前的 1891 年的水平。不过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并不必然是孪生兄弟：20 年代价格的上扬刺激了利润率的上升，削减了企业的债务；而货币贬值虽然造成了国内通货膨胀，但有利于出口。1926 年后，由于法郎恢复稳定、外国资本进入巴黎，于是，流动资本充裕的法国各银行可以推行宽松的信贷政策了：法兰西银行的贴现额从 1927 年的 450 亿增加到 1929 年的 1050 亿。另一方面，从 1921 年到 1929 年，世界经济形势一直走高，再加上阿尔萨斯－洛林为法国工业提供了远为坚实的资源基础、以及法国在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政治影响：这些都有利于经济扩张。

首先，重建的步伐相当快。政府的财政援助——人们总是吁请这种援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战争中抛荒的 200 万公顷土地，到 1925 年已经有 95% 恢复生产。工业则借助重建之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例如，北方省的煤矿设备全部得到更新。繁荣的局面由此奠定。所有证据都表明了这一点：生产率、产量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等等；外贸甚至史无前例地出现了顺差，尽管为时短暂（1924—1927 年）。

引领经济增长的是两种全新的动力，二者都与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石油和电力。1913—1929 年，发电量增长了 10 倍，电力工业还带动了金属拉丝、电气设备以及电影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时，法国保有伊拉克石油产量的 23.75%，并在保护关税率的庇护下兴建了炼油厂。其他数字：1913 年的煤炭产量为 4000 万吨，1929 年为 5500 万吨。1913—1929 年间，铸铁和钢产量增长了一倍，法国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钢铁生产国。1929 年，法国的汽车产量为 25 万辆，在欧洲首屈一指。当然，阴暗点还是有的：纺织工业停滞不前，如果还没有衰退的话。但总的局面相当积极：1929 年法国的工业生产水平直到 1950 年代才被赶超。

与此同时，集中化的趋势也在发展，更确切地说，是在强化。在集中化方面，法国的确有很大的欠缺需要弥补：1906 年，只有 10% 的工人和职员在雇员超过 500 的企业中工作，1931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 18%。但与技术性集中相比，金融方面的集中更为显著，尤其是在电力、石油、化学等新星工业部门；三家公司垄断了化学工业：库尔曼、圣戈班和佩西内；两家公司支配了炼铝工业：优吉和佩西内。控股公司、托拉斯、卡特尔、大型银行和公司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其中可以看到一些身兼多重身份的人。欧内斯特·梅西埃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此人是位毕业于综合工科学校的工程师，战后他创办了电力工业联盟；15 年后，他成为 49 家企业的董事长、经理或主管，这些企业在电力、石油、化工和银行等部门都举足轻重（里昂水业公司，阿尔斯通、法国石油公司等等）；他不再是承包商，而是管理人了。像很多同类人一样，他与商界和政界的联系都很紧密：他受到一

825

种强大的热情的鼓舞——将法国变成工业强国——致力于劳动分工的合理化和生产的集中化事业，他相信社会纪律和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并为此创办了法兰西复兴运动（Redressement français），旨在为建立威权体制而战斗。

集中也波及商业销售部门。诚然，小型商业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它日益受到两种新型商业企业的竞争：一是连锁店发展迅速，如兰斯的“码头”（Dock）连锁店和巴黎地区的法米里斯泰尔连锁店；二是1927年后出现的“一口价”（Monoprix）、“平价”（Uniprix）和“普利苏尼”（Prisunic）连锁超市，这类商店货物繁多，其价格因为存货周转速度快而相对较低，因而成为“穷人的商店”。

这种统一化思想当然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从美国引进的自动化和标准化等新技术首先应用于新兴工业中，这样生产率便得以提高。安德烈·雪铁龙是将这些新技术引入法国汽车工业的先驱，他以夸张的方式展现了20年代的勃勃生机。此人同样毕业于综合工科学校，大战期间曾在亚威尔开办了一家炮弹制造厂，1919年这家工厂转产；随后他便投身于民用汽车的流水线生产，建造生产线、对零部件进行标准化、加速产品的周转以保证低价位出售；利润和产品质量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另外，雪铁龙还大力利用广告作为营销手段——甚至做得有些过分了：他的名字在埃菲尔铁塔上熠熠闪光，并且印在了非洲和亚洲的越野车上（“黑色巡航者”和“黄色巡航者”）……1926年后，这家企业受拉萨尔银行控制：工业家掌舵的时代就此结束。

因此，这是一场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扩张。不过，信贷的便利、对股票的投机炒作总会滋生各种丑闻：1928年是《法郎报》女经理、股市小道消息的来源之一玛尔特·阿诺被逮捕；1930年是乌斯特里克事件：这个很不谨慎的银行家在政客们的帮助下从法兰西银行获得了大笔贷款。在那个年代，到处都充满“惟利是图”的气息，对此马塞尔·帕尼奥尔在他的《托帕兹》中作了精彩的阐释，虽然这部剧作反映的范围较小。某些酝酿中的丑闻直到1932年左派重新上台后才暴露出来，它们成为激发反议会浪潮的极佳素材。

但这场扩张运动有它的限度。它既不涉及农业，也不涉及商业，甚至也不包括整个工业："小业主"仍在作英勇抵抗，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在选举当中力量强大，故通常能确保政府对他们实行保护政策。因为法国人对国家的期待太多了："所有自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阶级、特别是那些认为在经济生活的发展中受到威胁的阶级，都要求国家的支持。甚至经济生活中的领袖人物也在其活动中寻求国家的宝贵支持"（夏尔·莫拉泽）。关税保护从未终止过，很多生产部门一直人为维持着这种政策；即便当基础投资数额很高时，一些大公司也要求国家干预——尽管在别国会遭到拒绝：如石油和水电部门形成的联盟就是由私人和政府权力共同发起的。不过，法国人虽然对国家有很多期待，他们给予国家的也很多：尽管有通货膨胀、尽管有过去的教训，法国的投资者还是固执地——这可以谅解——优先选择国债，而不是私人企业，这种情况甚至还有所加剧。于是法国人在投资方面越来越缺少进取精神了。国家愈来愈扮演财富再分派者的角色，但主要渠道是公债红利、退休金、薪金和贷款利息。

826

"繁荣政策"

这个说法是安德烈·塔迪厄于1929年提出的，此人在普恩加莱退休后接任总理职务。实际上，自1926年后，预算出现了盈余并一直维持到1930年。法兰西银行的储备不断增长。议会、舆论都相信法国拥有一座"宝库"，各方都在施加压力，要求分享财富。颇为注重民意形象的财政部长谢隆也曾透露有个"加斯帕尔老爹[1]的金库"，他还徒劳地叫喊道："是的，对这个金库我必须提高警惕，不让它受到任何损失"，1929年到1932年的塔迪厄和赖伐尔右翼政府都以能满足其国民的要求而自鸣得意。

然而，没有比这个所谓的"金库"更虚幻的东西的了：不能将作为财富象征物的货币与财富本身混为一谈。另外，将这些货币投放到市场上有可能再次引发通货膨胀，若生产跟不上的话；如果要想获得

① "加斯帕尔老爹"是谢隆的绰号。

与通货相匹配的生产能力，那就应该鼓励投资，而不是鼓励消费：但国家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准备不足，而“那个时代的司法—审计思维”（索维）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1928年，社会保险制度获议会表决通过，并于1930年开始实行；保险资金有双重来源：5%的工资税，雇主认缴的同等金额的税款——但这一政策让所有人都不满，工薪阶层的收入至少暂时缩水，而雇主甚至对这一法律的原则进行了长期而猛烈的抨击。1929年以后，各种措施连续推出：逐步推广免费中等教育，提高公务员薪水，对老兵发放退休金，减税，对农业灾害的受害者进行补贴，一个仅仅拟定了目标的国家装备计划（道路建设、农村电气化等），以及1932年的家庭补助金。这样，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不断强化：当然这是一场持续百年的运动，但有悖常理的是，右翼政府竟然加速了这一运动。

但这一政策并没有为塔迪厄赢得民意：太多的人觉得受到了损害，或者认为自己比别人得益少，或者因为需要先缴纳税款。另外，塔迪厄在政治上还碰到了十分强烈的抵制：这是因为左派对“偷窃”其部分计划的人的怨恨之情吗？还是对这个颐指气使的傲慢的大资产阶级的敌意呢？抑或是右派因为大笔花钱而产生的深切不安呢？

但社会保险政策失败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经济繁荣时期的告终；人们几乎立刻回到了过去正统的预算疗法，而社会保险政策并不是一种应付危机的手段——无论是反对者和倡导者都持这一看法。不过，塔迪厄的“繁荣政策”和罗斯福的“购买力政策”、甚至还有勃鲁姆的政策之间的相似性并非徒有其表。

“赢得和平：其难度将会更大”（克雷孟梭）

对于遭受重创的法国而言，德国这个战败的巨人仍是个挥之不去的潜在威胁。德国的国土和工业都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在6500万德国人面前，4100万法国人还是显得少了一些。如何进行持久的防卫？如何才能确保代价如此昂贵的和平呢？

827

在这方面，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政策，普恩加莱和白里安是它们的象征者。普恩加莱的政策只信任强硬手段，他认为，不应被德国人蒙

敵，一个民族不会在短短几年内有所改变。如果德国谋求谈判，那只是为了行骗；如果它寻求和解，那只是出于食言的企图，因此凡尔赛和约必须无条件执行。白里安的政策表现出乐观色彩，它信任仲裁的优越之处，相信法德和解的可能性以及裁军的必要性。它继承了威尔逊的向往，主张建立某种国际联盟，该机构将制订并实施国际法。这是两种看待世界和人类的方式，某些人认为从中可以抓住右派哲学和左派哲学的细微区别。

在国民联合阵线于 1919 年的选举中获胜之后，法国执行的是传统的安全政策；而且，当时主张 [illegible] 政策的人很少——社会党人除外。我们不妨对这一政策作 [illegible] ：为了过去，德国应该赔款；为了将来，德国不应重蹈覆辙 [illegible] 必须被包围，在力量增强的法国面前，它必须被削弱。

“德国佬将会赔钱”：这个格言曾是国民联合阵线大笔花钱的根据。1921 年，当赔款数额确定下来的时候，德国表示无力偿付。普恩加莱政府在仅仅得到比利时支持的情况下，派兵占领了鲁尔区（1923 年 1 月）。从技术层面上说，这次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从政治上说，它引起了英美的敌意、触怒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引起渴望和平的法国舆论的不安。这位总理赢得了很不客气的外号：“战争普恩加莱”，“墓前冷笑者”。他接受了鲁尔问题的国际化，他希望这样可以把赔款和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联系起来。1924 年的道威斯计划和 1930 年的扬格计划大大削减了赔款数额，偿还年限很长，但德国也开始付款。1926 年的英法协议和法美协议确定了法国的债务总额，法国也在偿还债务。1930 年时，一切问题都似乎解决了，但怨恨仍然存在；想想偿付要在 1988 年结束，这真表现出某种乐观情绪！

1920 年，除了比利时，法国已经没有盟国了。美国回到了孤立主义状态——虽然威尔逊曾一度艰难地使美国摆脱了这一状态；而英国则希望德国的地位能有所提升，这既是处于商业上的考虑，也是出于大陆政治平衡的考虑。不过，1919—1920 年间签订的诸项条约最终缔造了一些新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领土得以扩张的塞尔维亚

和罗马尼亚。它们是法国潜在的盟友，因为它们比法国还更担心现状受到威胁。法国与波兰（1921 年）、捷克斯洛伐克（1924 年）、罗马尼亚（1926 年）和南斯拉夫（1927 年）缔结了盟约，但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低（除了波希米亚），根基尚不牢靠，因此无法真正取代俄国、美国和英国的地位。

所以必须增强法国的力量。1920 年以后，两个人物提出了两个论点：福煦坚称，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进攻能力的军队；贝当则强调本土防御，他建议设立连续的堡垒工事防线，至少应在东北边境有一条这样的防线。由于预算方面的原因，必须在两种方案之间作出选择。确保法国不受任何侵犯的理念逐渐赢得了军方以及舆论和议会的支持。1930 年，堡垒工事防线的计划获得通过（当时的国防部长叫马奇诺）；1934 年，“马奇诺防线”，这堵从隆威一直延伸到巴塞尔的“法兰西之墙”终于竣工了。这条防线的弱点并不像人们过分强调的那样，在于可以绕过它，而是在于它与法国东方盟友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德国将它 1914 年的战略倒转过来，首先消灭其东方的对手，那么法国该怎样发动攻势呢？当它的盟友在进行战斗的时候，它难道应该徒劳地袖手旁观吗？ 828

所以，还应削弱德国。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军队的规模限制在 10 万人，并禁止它拥有重武器和舰队、废除义务兵役制；一个盟国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莱茵地区实行非军事化并被暂时占领。法国还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吗？它能让莱茵地区脱离德国吗？福熙在身后出版的一系列谈话中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1929 年），而克雷孟梭则在其《胜利的光辉与悲剧》中反驳了福熙：“帕提亚人在大步逃跑的时候还要回过头来放一箭。在没入黑夜的那一刻，福熙元帅看来已经在身后留下了一长串射失的箭，他就像个生疏的射手，手里的弓都拿不稳”，克雷孟梭还说道：“看那，福熙！福熙！我亲爱的福熙！您好像什么都忘了”；他还提醒人们，法国仅靠自己不能赢得战争，而它的盟国反对永久占领莱茵地区，更不用说组建一个莱茵国家了。他自己曾同英美缔结了一项保障法国边界的条约，以作为前一方案的

替代品，但该条约被美国参议院否决。不过，直到 1925 年之前，凡尔赛和约的各项条款仍在照章执行。但 1927 年，监督委员会被撤销；1930 年，随着扬格计划的实施，法国提前结束了对莱茵最后一块地区的占领。

由于 1924 年的单边强硬政策受挫以及左翼联盟的胜利，政府开始对国际联盟——这也是凡尔赛和约的产儿——对仲裁、和解及公开外交的理念更感兴趣。这些理念在欧洲是新鲜事物。它们在公共舆论中引发如此狂热的情绪，以致从 1925 年 4 月到 1932 年 1 月，作为这些观念之化身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成了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从那时起，各种倡议层出不穷，谈判不绝如缕，条约接二连三。在莱芒湖畔，在一群相处融洽的外交官之间、在那些通常既有才能又有教养的政治人物之间、在 1924—1929 年的乐观主义氛围之中、在各个精疲力竭的民族对和平的热切盼望之下，终于编织出一个极端繁复的谅解体系，这些谅解将那些主要的分歧暂时搁置了起来。

1924 年各方缔结了日内瓦协议，但是，由于英国保守党于当年 11 月重新掌权，该协议未获批准，故只能作废；该协议宣扬必须以仲裁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仲裁被拒绝，则可采取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制裁。1925 年诞生了洛迦诺公约，德国与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以及非军事区得到三方的保证，意大利和英国对此作了担保。法国也放弃对莱茵河东岸实行惩罚性军事行动的做法；作为交换——这一交换意义重大——德国承认法国重新拥有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亦担保法德之间的边界。但德国始终拒绝承认东部边界的不可变更性，而英国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承担义务；因此在洛迦诺公约签字的那一天，法国确认了它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关系，但这个象征性行动完全没有解决实质性分歧。1926 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9 月 10 日是马恩河战役 12 周年，那一天，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挤开涌入街道、走廊和宗教改革大厅的人群，穿过会堂，走上讲坛，代表们全都起立鼓掌，那种狂热超越了当初人们欢呼日内瓦协议和洛迦诺公约时的激情……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发表了一个演说以示回应……他的演说让那些惯

于玩世不恭的人也会泪流满面：‘诚然，我们的分歧还没有消除，但从今日起，主持正义的将是法官……把步枪、机枪、大炮都抛在身后吧！让我们代之以和解、仲裁及和平！’”（路易丝·韦斯，《一个欧洲女性的回忆录》）。1928年，《白里安—凯洛格》条约问世，白里安一直设法重建与美国的联系，并曾向美国人民发出一个倡议：两国人民为什么不庄严宣告放弃战争呢？为了回应这一倡议，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则提议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之工具”；该条约共有57个国家签字，其中包括德国和意大利。1929年，从不缺少创意的白里安又提出了一个欧洲联盟计划。

但危机的苗头已经显露在地平线上。1932年2月，有62个国家参加的裁军大会在日内瓦开幕，德国率先在会上提出权利平等的要求，如果短期内不能对其他国家的裁军作出决议，德国将重新武装！会议于是陷入空洞的辩论，随着希特勒的上台，会议走到了破产的边缘。这是白里安时代的终结。1932年1月，这位“和平的朝圣者”被迫隐退，两个月后辞世。

这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两种政策。不过，它们之间的对立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强烈，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对立逐渐模糊了：白里安不是当了三年（1926—1929年）的普恩加莱政府的外长吗？虽然两种政策之间有潜在的矛盾，虽说它们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但在1925—1932年之间，它们并未产生对立。白里安没有试图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修改，马奇诺防线也建成了，而提出最彻底的裁军计划的人恰恰是塔迪厄。人们可能会指责，白里安的政策使得法国在面对德国的威胁时毫无防备——不过我们能质疑的顶多只是这种政策的精神。

工人运动的挫折

1918年到1920年，法国总工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迎来了大量新成员：战争看来已经过去，革命再度成为现实问题。

1919年11月的选举中，社会党进行了最为精心的准备。该党不是长期致力于公民教育、以便为掌握政权和实现社会革命作准备吗？它不是把议会选举胜利看作整个社会的激进变革的序曲吗？期望有多

大，失望就会有多大：虽然选票比 1914 年多了 30 万张，但议席少了 35 个（由于选举制度的影响）。1920 年，“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困境，既然它的革命前景须以选举胜利为前提”。（安妮·克里埃热尔）

1920 年的法国总工会同样面临困难。它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革命，不过它期望以完全不同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在日常斗争中进行教育，这样的斗争或是无产阶级的或非无产阶级的。罢工是革命工团主义的卓越武器。1920 年，法国总工会曾采用过这种手段，但失败了。这场运动的开端很好：1919 年 5 月 1 日，虽然确定八小时工作日的法律在 4 月获得通过，但总罢工的命令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执行；1919 年 6 月，冶金工人的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罢工于 1920 年 5 月达到高潮：从 5 月 1—10 日，法国总工会发起了一轮轮的攻势，就像大战中的某次战役一样：今天是矿工、水手和码头工人投入罢工，明日是冶金工人罢工；5 月 2 日斗争达到顶点：当天，铁路工人提出了一个重大要求——国有化。但斗争还是失败了：因为资方早有防备，部分工人持观望态度，政府采取了司法手段。这是一次苦涩的失败：1.8 万名铁路工人被解职。法国总工会的会员也开始下降。马塞尔·加香评论说：“正如资产阶级政党于 11 月 6 日在政治领域战胜社会主义一样，不久之后它们又战胜了工团主义”（1920 年 6 月 19 日）。

830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越来越多的工人积极分子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这是“法国工人运动中并不认为革命期限还会延长的那一部分人唯一的出路”（安妮·克里埃热尔）：法国大革命不是要酝酿一场作为俄国革命之延续的世界革命吗？“工人大众把目光转向莫斯科，就像凝视着社会主义的圣城一样……各国社会主义者曾期盼、渴望、筹划或徒劳地等待的东西，终于被意志坚定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变成了现实”，弗洛萨尔这样说。此人将成为法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但后来又重回社会民主派的阵营，并做了贝当政府的部长。但布尔什维克对前来投靠的机会主义者并不信任，他们确定了 21 条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显然很苛刻。在具有决

定意义的图尔大会（1920 年 12 月）的前夕，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内部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倾向：选择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的人占了明显多数，不过这个多数派的内部十分混杂；另一派是马克思的外孙龙格领导的中间派，亦即“重建”派，此派倾向于加入共产国际，但又试图继续维持社会党的统一；最后是莱昂·勃鲁姆代表的右派，它声明反对“鞑靼味道的布朗基主义”。图尔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甚至一度介入，他们要求排除龙格和他的朋友，并指责这些人沾染了“改良主义思想和狭隘的吹毛求疵的伎俩”。此后，问题得到了解决：70% 的代表支持加香和弗洛萨尔提出的动议，支持加入第三国际并成立共产党；龙格的中间派获得 20% 的支持票，而右派得票仅有 10%。弗洛萨尔高呼：“我们就要分离……明天我不会发表伤害你们的谈话。我会把你们看作社会主义者，我也会这样说。这里有我相识十几年的人，有像勃鲁姆这样为社会党贡献了才智、渊博的学识并做了大量工作的人，他们为社会党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在此，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应在这里向那些曾先于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战斗的人致以敬意。”但他又很清楚地指出，“我们的抱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我们的力量分散了，我们的精力消耗在兄弟相煎的斗争中。这就是留给我们明天的遗产。”

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党的统一的终结，即使它的成员并不是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联合之后不总是会出现其他的分裂吗？第二年，法国总工会也解体了，但大部分人仍留在“改良”阵营中，虽然共产主义者试图建立统一总工会（C. G. T. U.）。

图尔大会后不久，革命的前景日益黯淡，共产党的势力逐步削弱：1921 年有党员 11 万，10 年后只剩下 3 万左右。统一总工会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1924 年后，共产党为了在法国组建某种新型组织而“布尔什维克化”，其规模也因此进一步萎缩。很多人只是口头上接受了 21 项条件，实际中则全是用的过去社会主义者或革命工团主义者的方式。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法共采取了接近于俄国模式的组织形式：扎根于工厂（阶级斗争的场所）而不仅仅是传统领域（竞选场所），

它注重在党内保持工人的多数地位，建立起严格的纪律，每一级都由下级选举产生，每一级都服从于上级，从而确立起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最后，法共作为共产国际法国支部的角色越来越成为现实了。该党的右翼于1922—1923年分离出去，左翼则于1925—1927年分离出去。它推行“阶级反对阶级”的选举战术，并在第二轮同建立左翼联盟的共和派传统决裂。莫里斯·多列士说：“我们应该对社会党及其领袖发动更为积极、更有步骤、特别是更为彻底的攻势，但同时又要扩展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以争取受社会党影响的工人。在攻击社会党领导人与争取他们的工人群众之间没有矛盾。”看来情况并不那么可靠；不管怎样，这种策略使得共产党在议会的议席降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它把社会党看作自己的主要对手，并愿意被称为“社会法西斯分子”和“社会警察”。虽然法共日益虚弱，但它并未逃脱派系斗争和内部分裂的困扰，其领导层曾数次被清洗。在巴尔贝－塞洛尔“集团”被清洗之后，法共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但党员人数也在持续下降，不过就在这个时候，新一代的积极分子——对他们而言，大战就是“伟大的助产婆”——走上了前台，莫里斯·多列士成为总书记。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国社会主义的嫁接是在痛苦中完成的。

831

左翼改良派的失败

莱昂·勃鲁姆曾在图尔说道：“当你们前去冒险时，需要留人照看旧房子。”话虽说得贴近人意，但谁会留下来呢？大约3万人——人数太少了；不过，虽然社会党的大部分普通党员选择了共产主义，大部分重要人物则并非如此。社会党以旧有的结构为依托，固守着原来的信条，并逐步恢复起来，它接受了从法共退出或受排挤的人，1923年后，其党员数目已经超过了法共。社会党采取双管齐下的路线：它并不排斥革命理想，但比以前更加重视公民教育和改良：在它看来，前者是革命的预备阶段，而改良则是必经的阶段。莱昂·勃鲁姆则在权力的实施和权力的获得之间作了仔细的区分。事实上，援引伟大先驱者的做法掩饰不住理论上的僵化。面对拒不进入垂死阶段的资本主义，某些社会党人开始在自己的周围、在美国资本主义中、甚至在意

大利的法团主义中寻找新的模式：例如，变成“民族社会主义”信徒的马塞尔·戴阿便滑向了法西斯主义。

1924年，越来越注重议会行动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与激进党结盟，不过它们之间并没有共同纲领，而仅仅是为了选举。但左翼联盟获胜后，社会党拒绝加入政府，而仅仅是予以支持。爱德华·赫里欧领导的激进党政府没有实行任何社会经济改革，而仅仅热衷于象征性的表态和复苏那些已经陈旧的争论（赫里欧试图重新执行世俗化法律，将它们推行到阿尔萨斯-洛林，并撤销驻梵蒂冈的使团）。社会党人仍在捍卫自己的理想，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开征资本税、实行外汇管制。但这些言论吓坏了他们的对手，而缺乏行动也强化了后者的力量；天主教的猛烈攻势最终导致反教权措施的废弃，资本外逃和投资者的疑虑引发了财政危机，于是左翼联盟解体了。赫里欧在谴责“金钱壁垒”时不乏激烈言辞，不过随后他还是参加了普恩加莱政府，而社会党人则被排斥在政府之外。

老右派和新右派

1919年，多数派的阵营发生了逆转。国民联合阵线在选举中获胜，除了1924—1926年的短暂间隔期外，右派对政府的控制一直维持到1932年。不过这种多数派的逆转也带有某种人为推动的色彩：激进党人加入了国民联合阵线以及1926—1928年的“国民联合”政府，而且战后的右派也接受这种体制。这是右派演变的标志，也是某些左派集团向右转的标志。过去的共和主义纲领一旦确立下来，其倡导者就只剩下这些“保守派”了。虽然右派在宗教问题和国家职能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他们有几个明确的共同主张，因而在政见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无条件地执行各项条约，信心只能建立在实力之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公共开支的增长及一切增税措施，而本能的反社会主义则是整个右翼的共同立场。这些纲领中没有多少新东西：战争并不构成断裂。雷蒙·普恩加莱担任总统一直到1920年，1922—1929年，他出任总理的时间超过5年：这个颇具连续性的人物是资产阶级法国的化身，这个法国既具有保守色彩又信赖议会制度，普恩加莱注重捍卫军事安全（1923年出兵占领鲁 832

尔）和预算平衡（终于在1926年实现了这一目标）。

法兰西行动曾与共和国保持过短期的和谐关系。作为民族主义的吹鼓手，这个组织在大战胜利后不久达到了巅峰，其成员之多、其宣传声势之强大独步当时的法国：仅作家中就有莫里亚克、纪德、马丹·杜伽尔、马尔罗等人受到它的影响。不过，这个信奉十足的君主主义的派别还不能与信赖共和制的民族交锋。本来，法兰西行动是天主教的捍卫者，但1926年，它受到梵蒂冈的谴责：是因为很晚才发现的莫拉斯的不可知论吗？还是因为教廷想加速天主教徒归顺共和国的进程呢？不管怎样，从那以后，法兰西行动走向了衰落，更有甚者，这场保守派的运动还有另一个令人费解之处：它的几个最积极的活动分子竟脱离了该组织，参加了革命行动：1925年，与莫拉斯及其同伴断绝关系的乔治·瓦卢瓦建立了战士和生产者战斗同盟。[①]

当左派在1924年的选举中获胜后，作为从前的反共和主义的替代品的反议会主义、以及右翼民族主义的陈旧论调又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弹，一些新的组织应运而生。皮埃尔·泰坦热创建了法兰西青年运动，该组织将拥有30万成员，其论调并不新鲜——民族主义，强大的行政权力，不过该组织的具体措施很多——军事化的组织，别具一格的装束（防水蓝色工作服，巴斯克贝雷帽），街头行动。该运动与法西斯主义的相似性立即显露出来，而这种相似性在以乔治·瓦卢瓦的名字为象征的运动中更为明显。那么，这到底是老右派（布朗热式的）还是新右派（法西斯式的）呢？由于20年代的这些运动为时太短，所以难以得出结论。不过，这种趋势还是反映了很多老兵的幻灭感、受通胀损害的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地位下降的担忧、以及资产阶级中蔓延的对社会主义深刻的恐惧感。

资本家寡头对公共生活的介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参议员比利耶的经济利益同盟、欧内斯特·梅尔西埃的法国复兴运动为右派提供资助；化妆品商、百万富翁弗朗索瓦·科蒂则支持各种极右社团，

---

① 一译“束棒”（Faisceau des combattants et des producteurs）。

并创办了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人民之友》。高层行政官员、政界和商界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

1930年，右翼议会完全支持现政权；而天主教和君主主义的法兰西行动则同时受到教皇和觊觎王位者的谴责；在普恩加莱重新上台后，这些极右社团都沉寂下去，局面也随之稳定下来。但变动正在酝酿中：没有经历过为共和国而斗争（如塔迪厄和赖伐尔那样）的新一代开始崭露头角，1924—1926年的危机就已经表现出反议会主义的潜在力量。

天主教的开放

由于神圣同盟的建立和大战的影响，有关世俗化的争论平息了下来。1922年当选的庇护十一比他的前任表现出更为和解的姿态；1924—1925年反教权运动的复兴很快就衰竭了；1926年对法兰西行动的谴责更增强了教会非政治化的潮流。天主教徒放弃了抵御姿态，面向外部世界并实践自己的宗教使命。 833

这样的时机到了。20世纪初以来，修士团体的数目不断下降，世俗学校促进了乡村和工人聚居的郊区的非基督教化。"法国还是使徒的国度吗?"不久，人们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因为天主教舆论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这是加布里埃尔·勒布拉为宗教社会学奠基的时代。一些为了引领青年一代的世俗人士的组织建立了起来，这是教会关切的重大问题之一，这类组织如：基督教工人青年（1927年）、基督教教育界青年和基督教农民青年（1929年）。1919年后，童子军运动开始兴起，它也与两次大战期间相当典型的回归自然的运动颇为一致。1919年，法国天主教工人联合会将各天主教工会团结到了一起。战前的思想活跃势头仍在延续：艾玛纽埃尔·穆尼埃和雅克·马利坦新创办的《精神》杂志都以各自的方式复兴了天主教思想。

依然活跃的创造力

在一场对精英阶层造成巨大损失的冲突过后，20年代的思想成就难免让人感到惊奇。科学研究接连取得辉煌成果：伊雷娜和弗雷德里

克·若里奥·居里、让·佩兰、保尔·朗之万、路易·德·布罗意等人的名字见证了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现。音乐和绘画方面也是生气蓬勃：奥涅格和拉威尔、毕加索和布拉克——要详细列举下去恐怕太令人厌烦了。电影和戏剧也在复兴，对此科波和杜兰功不可没，但加斯东·巴蒂、皮托耶夫和茹维同样贡献卓著。城市规划艺术也重新焕发生机，这里表现出了某种建筑合理化和居住人性化的努力（如勒·科尔比歇）。

但这些艺术创作依然是精英们的专利，而且巴黎的繁荣也掩盖不了外省艺术创作的衰落。只有——且仍然只有！——通过电影和小说，艺术和人民才能走到一起。两个新的文学年代出现了。先是幻灭的一代，战前的宁静已经消失，作品中已经看不到诚实和单纯。“克洛岱尔笔下的女性很虔诚，而莫里亚克描绘的妇女则备受折磨。虽然同是表现带有君主主义怀旧感的天主教观念，莫拉斯的语言激烈振奋，而贝尔纳诺的笔调则更为低沉……即便蒙泰朗也不像安德烈·纪德那样轻快”（夏尔·莫拉泽）。在 20 世纪的头 20 年里，那些 20 来岁的人目睹了杜阿梅尔、马丹·杜伽尔、于勒·罗曼等人描绘的家庭风情画，他们被贝尔纳诺和莫里亚克吸引到天主教世界的冲突以及基督教意识的撕裂之中，并与吉罗杜一起思考法国人灵魂的原动力。所有这些作家都关心自己的时代，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而且很少有人蔑视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他们描绘的那个社会是个资产阶级社会，那里面实际上没有工人阶级。1925 年，埃玛纽埃尔·贝尔就看出了文学中“资产阶级思想垂死”的征兆；他谴责这种“被认可的流派”。

1925—1929 年产生了法国文学最近一代的伟大作家：作为战争的见证者或参加者，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争的影响下渡过的（1916 年的 20 岁的年轻人活得容易吗?）。很多人即将逃离这个破产的社会，去迎接冒险的诱惑——或是文字上冒险，或是去远足冒险——去寻找新的天地、新的刺激和新的表现形式。1922 年，达达的虚无主义热潮退却了，超现实主义兴起。在弗洛伊德的影响力开始广泛传播的时代，这一新潮流的追随者——如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以及其他很多

人——声称要探索无意识、梦幻、疯狂等领域。他们认为，应该任由想象力驰骋，应解放语言。“务必言之有物……尽量让自己处于最消极或最开放的状态。不要去表现你以及任何人的天分和才华。要知道，文学是一条会通向一切的最悲惨的道路。写作无须预先设计好题材，无须为了记录什么，也无须让自己反复阅读之……请相信低声自语中那永不枯竭的泉源吧。”（安德烈·布勒东：《超现实主义宣言》）。作为一场彻底反叛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超现实主义革命”的一些信徒，包括一些最有名的人，最后走向了共产主义。

834

从高棉的寺庙到航空邮政、从西伯利亚到阿拉伯，所有这些都展现了作家们追求新真实性的历程。在这些探索者看来，文学创作通常只是冒险的一个替代品；而在某些人看来，文学还是通往政治介入的一条道路。见证者和“冒险者”的时代过后是战斗者的时代。

生活方式的演变

体育已经成为一个大众现象，虽然吉罗杜和蒙泰朗等人还不屑于去歌颂它。这是城市化不断发展的结果吗（根据1931年的人口普查，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不过，体育事业主要是表演而不是实践。在发行量空前的媒体的炒作下，明星崇拜日益盛行，于是体育成绩引起了大众的痴迷。1921年，一位漫画家笔下的两个看热闹的人这样说道：“这对法国来说真让人失望……——是说把整个西里西亚都给了德国吗？——不，是卡蓬迪埃被邓普西击败了！”① 体育场至少让教堂的盛大仪式——如果还有的话——失去了意义，人们对共和国的重大节日也丧失了兴趣。

自行车、汽车和飞机也是体育项目，但它们已经成了交通工具，并赋予距离以新的意义。速度成了现代世界的一个构成因素；追求高速的热情到处传播。汽车的发展尤其可观：1913年的产量为10万辆，1930年达到110万辆；汽车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这个时代确

① 卡蓬迪埃是法国拳击手，邓普西是美国拳击手，两人曾于1921年6月进行过一场比赛，号称“世纪之战”。

实是娱乐再发现的时代，不过，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这些娱乐。

20年代留给人们的记忆是疯狂年代："疯狂"的潮流和"疯狂"的艺术与战前的表现形式决裂了，"疯狂"的货币孕育了各种各样的投机，但也鼓励了工业家的勇气，推动了交流工具的大量传播，而这甚至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对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来说，20年代是个平静的时期，社会冲突受到抑制，从1926年起，无论是在对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掌握局面的都是温和派。然而，大厦的支柱在倾斜，人口在萎缩，领导阶级仍然固守着陈旧观念而没有表现出革新能力，农民的状况停滞不前，工人的疏离感并未缓解。不管这个社会表面看来多么活泼——或者说不管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盲目——20年代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停滞和衰颓的时期。

二、社会的僵化

"法国人生得太少了"（让·吉罗杜）

人口出生率从1921—1925年的2.02%降低到1936—1939年的1.47%，总出生数从77万降低到62万。这种下降趋势也波及死亡率，但其程度较小：1925年的死亡率为1.74%，1936—1939年为1.52%。出生数高于死亡数的差额在战前已经很微弱，战后一度还能维持，但越来越小，到后来完全消失了。从1935年开始，法国人口开始下降，这在工业化国家和平时期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1931年法国人口为4180万，1936年为4150万。如果考虑到人口减少仅仅波及劳动人口，这种情况就更形严重了：劳动人口从2160万降为2020万。而衡量一代人自我更新能力（即一代母亲拥有的女儿的数量）的净再生率1914年之前就已经降到标准水平之下，但战后能保持稳定（1901—1910年为0.96%，1936—1939为0.89%）。人口不仅在减少，而且也不能维持自我再生。如何解释这种衰退呢？

835

首先是战争造成了人口学上的两个低谷；随后30年代的危机也不利于产生乐观的婚育观：由于失业的加剧，生育率也随之降低；我们

还能指出其他原因：建筑业的逐渐放缓、由此带来的战后持续的高房租的制约，这种滞缓的局面不利于青年夫妇安居乐业；还有妇女解放、现代世界的新追求……但这些都是关乎时局的因素。如果法国人口在1914年之前并未陷入停滞的话，这些解释可能是充分的：但此前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阶级关心如何提高社会地位和保持稳定，因此他们想保障孩子的安逸富足①。人口下降之所以会造成民族灾难，那是因为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它们的后果与长期的马尔萨斯趋势叠加在了一起。

一个无法逃避的后果是人口的老龄化：1901年，60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12.4%，1936年为14.7%。老人数量的增加是进步的象征：人的寿命在延长；但是，人口中老人比例的上升也象征着衰弱。法国的动力只能因此受到削弱。

这种趋势影响到整个国家，不过各社会阶层和地区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各项调查，特别是1926年的调查，表明孩子的数量通常与家庭资源成反比例。不管怎样，在农民和工人阶层中，人口众多的家庭比例更高，但部分大资产阶级也是如此；而"中产阶级"——其数量上和社会意义上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却不能维持自身的再生产。还需要注意地区和宗教方面的差异。西部、东部（洛林和汝拉地区）、中央高原的东南边缘、北方省、萨伏依、巴斯克地区是人口增长最强劲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宗教习俗也是一个因素：基督教信仰较强的地区出生率和繁殖力能维持较高水平。而中部地区、地中海沿岸的南部地区、阿基坦以及大城市的人口则呈下降趋势。

而对于这些情况，当时的法国人几乎没有意识到。1920年的一项法律取缔了鼓动堕胎和宣传避孕的行径；1932年的另一项法律责成雇主缴纳家庭补助金，不过说实话，这笔钱少得可怜：上述措施都很有限，对局面的改善鲜有效果。"当《马提尼翁协定》大幅度提高工资后，有人曾问莱昂·勃鲁姆，家庭补助金的增长为何不至少与工资增

① 故不愿多生孩子。

长同步。他的回答是：'没有人想到此事，也没有人提出建议"（阿尔弗雷德·索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9 年 7 月），一个整体性规划才在家庭法的框架内拟定出来，该法律计划提高补助的金额并扩大其范围，并计划向青年家庭提供贷款等等。

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法国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个移民国家。1911 年外来人口的数量为 110 万，1921 年为 150 万，但 1926 年激增到 250 万，1931 年达到 290 万，不过随后由于危机和失业的影响，外来人口数量开始下降。因此，在战后和 1921 年经济萧条过后不久、在重建和经济增长的那几年，出现了一股名副其实的移民潮：当时的外来移民弥补了法国劳动力的不足。这些外来人口来自何方呢？首先是意大利（根据 1931 年的人口普查，意大利人占外来人口总数的 30%）和波兰（占 20%），随后是西班牙、比利时、瑞士、阿尔及利亚，等等。他们移居到哪些地方呢？在边境各省和工业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呢？其中的粗工多于技术工，工业工人多于分成农和租佃农，他们主要从事的是法国人不愿干的那些不好的工作。他们也造成了难题，融合的问题。很多人加入了法国国籍，入籍归化者 1936 年达到了 170 万，不过融合的过程受到阻碍。或是因为外来人口在某些地区密度大，或是因为他们与政府的某些协议，如保障他们的权益、通常还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学校、报纸、并可继续使用民族语言。移民在法国工人阶级当中并非没有引起不满（他们担心在工资方面会受到竞争），也并非没有造成部分国民的排外情绪。无论如何，移民的增长——如果还有需要的话——显示了人口危机的幅度：外来人口是在填补空缺。

836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这个致力于法德和解、要把"战争置于法律之外"的人，曾经这样说："我的（对外）政策是根据我们的出生率来制订的。"1939 年初，让·吉罗杜也把人口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任何战争，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非洲，宣战就会给我们带来几乎像葬礼一样的感受，这主要不是为法国后代人而感到的焦虑，而是对不愿生孩子的那几代人的不自觉的控诉"（《全权》）。

法国农村的停滞

在安德烈·莫洛瓦的小说《贝尔纳·魁奈》（Bernard Quesnay）中，1920年前后，一群工人要求加工资，“不能活了！贝尔纳先生，是农民，是农民在吞噬我们。您还是到厄尔桥市场去看看吧。”在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日子里，农民看来应对价格的上涨负有很大责任；至少他们看起来像是其中的受益者。

通货膨胀的确有利于生产者和负债人，而农民通常就是这样的人，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变化尤其明显。这种变化烙上了小农身上强烈的保守和个人主义色彩：合作社大量成立，工会变得更为活跃。城市的影响力在扩展，报刊、广播、电影等新的交往手段大大促进了农村的开放。收益更高的畜牧业在发展，而种植业则随之萎缩（法国人开始消费更多的肉，面包的消费在减少），肥料和机械化在推广（1919年有拖拉机2500台，1927年达2.7万台，1939年为3.3万台），产出率也在提高。

但这些变化是何等缓慢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耕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笼罩在古老的氛围中。机械化？当然很好，如果能盈利的话——就是说，耕种面积须达到最小的规模要求。然而，耕地合并仍然十分有限，盈利还需要单产量达到一定的水准：以小麦为例，1910—1913年每公顷的产量须达到13公担，1932—1936年则须达到16公担，而同期英国的每公顷小麦的产量已达23公担。农村在向现代世界开放吗？这个事实几乎不容置辩，但它更多是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外流，而不是促进乡村生活的转变。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依然微弱，远低于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价格的上涨并不稳定，纯粹受收成的支配，而且涨价只是个暂时现象。1930年后，价格开始下跌，而且经济大萧条给农业造成的打击比国民经济的其他任何部门都更严重。

从此，农村的这种尽人皆知的停滞，这种在整个保守派意识形态中被吹捧为国家活力和稳重之根源的停滞，终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名副其实的落后农业、墨守成规的心态、还有众多小业主卑微甚至悲惨的生存状态。“所谓的传统力量、我国农民阶层对陈旧原则的忠诚，

无非是法国农业经济整合失败的一种的虚伪表述。”（夏尔·莫拉泽）

837

巴黎工人家庭食物消费量（公斤）

	1908 年	1936/37 年
面包	900	600
牛肉	128	262
猪肉	12.4	49.5
鱼	8.5	40
黄油	52.8	23.5
鸡蛋（只）	440	629
糖	75	59.5
调味品	–	90.5
大米	8	5.7
面条	4	36.6
奶酪	20	43.6
牛奶（升）	280	490
土豆	190	297
干菜豆	30	25.2
水果	–	211
咖啡	9.3	14.6
巧克力	4.75	12.9
葡萄酒（升）	910	730

资料来源：阿尔瓦齐，“生活方式”，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1939 年。

工人阶级状况

当我们面对工人世界时，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没有被整合的类型。整体而言，工人阶级的社会疏离更为严重。由于日益深入的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影响，某些工作逐渐被分解成一系列的简单操作，而这样的操作无须很长的学徒期，于是，一种新型的无产者——熟练工人诞生了。关于流水线生产、关于“碎化的劳动”——这是乔治·弗里德曼的说法——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已经作过大量分析，所有这些分析

的结论都是工人状况的恶化。劳动者与其所生产的产品完全失去了联系，人们也不要求他预先具有某种技能。生产节奏是唯一要考虑的因素，现在剩下的只有单调和疲惫。在冶金和机械制造工业中，单一工人几乎占了总职工人数的一半。

在其他方面，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几乎没有改变，至少 1936 年前还是这样。诚然，1930 年的实际工资要高于 1913 年。但工作的不稳定性仍然没有缓解：单一化工人很容易被人取代；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这种不稳定性甚至还在加剧，这是很大一部分无产者之所以对公共职务十分痴迷的原因所在。

对于工人来说，接触文化仍很困难。奖学金的数量少得可怜，而且更多是给公务员的孩子而不是工人的孩子。从 1880 年到 1930 年，中学生的数量竟然原地踏步！正如埃德蒙·戈布洛在提及中学结业考试时所说的："这是一道严厉的壁垒，一道由国家作后盾的官方壁垒，它抵挡着外来的入侵。人们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但为此首先要通过中学结业考试"（《壁垒和水准》，1925 年）。这是文化上的隔阂吗？这话说得并不过头。工人街区的少数剧院上演的仅仅是些情节剧，广播里成天放的是谢瓦利埃和提诺·罗西[①]等人的怪诞歌曲，图书馆的开放仍是极其稀罕的现象，即使巴黎也是如此。不过，虽然无产阶级的文化饥渴让所有观察家感到吃惊，但只有少数无产者能得到满足，而且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公务员的名位，对知识的热情，对很多工人的孩子来说，成为小学教师是提升社会地位的途经。而雅克·杜克洛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个职业曾是他的梦想。 838

工人的世界是位于丑陋郊区的悲惨世界，这些地方好像是被城市割除的一样。这个被隔绝的世界所激发的是逃离它的欲望（路易·博丹和让·图沙尔都曾提到"车站和码头的主题在大众文学和电影中的重要地位"）。逃离到神话中，但也有人通过斗争而逃离到斗争中。而

① 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1888—1972），生于比利时的法国演员、歌手；提诺·罗西（Tino Rossi，1907—1983），生于意大利的法国电影演员、歌手。

且，工人阶级的斗争有时会让资产阶级颤抖。

资产阶级状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资产阶级感觉受到了威胁。从财政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撇开局面的多样性而仅考虑整体状况，资产阶级毫无疑问受到了威胁。“从前，很多家庭的财富几乎是单一的，这样的财富也是很多其他家庭的终极期望，它是通往成功的首要阶梯：这就是现已在人们颤抖的手中不断融化的定期投资收益。工资劳动者的抵制构成一个反对挤压工人薪水的压力集团，每到危机时刻，这种抵制力量就会削弱资方利润以及红利”（马克·布洛赫）。在资产阶级的收入中，固定利息收入和分红收入的比例减少了，而工资收入的比重则不断上升。收入税也在逐步上涨。

虽然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资产阶级对新观念的态度却前所未有的保守。马克·布洛赫发现了一种“对求知的懒惰”，他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我们的中学教育太不注意开发智力了……学生疲于考试……有些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一部严肃的书，这样的学生我见过不止一个；相反，在今天，有些又懒又笨的学生，或较为懒惰和愚笨的学生，他们反倒表现出浓厚的文化追求，这样的学生我见到的也不止一个。如果情况属于偶然，那么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也未尝不可；不过，如果还要重复这样的现象，那就很让人担忧了。”中学教育没有、或很少与时代现状对接起来。它轻视技术和专业教育，它培养的是笼统的思想观念，甚至最终还培养了某种古老的心态。这种心态一方面与对体力劳动的贵族式轻蔑相关，另一方面还与19世纪推崇的人文主义传统相关。中等教育尤其如此，由于在30年代之前它不是义务和免费的，因而特别具有资产阶级教育的色彩，并充当了某种壁垒的角色。从各方面看，有关拉丁语的争论均具有典型意义，部分放弃这种死语言的建议遇到了激烈的抵制。埃德蒙·戈布洛曾分析过这种现象：“如果中学教育中没有拉丁语会怎样呢？如果一个聪明而勤奋的学生通过高小教育、或良好的技术教育而完成初等教育的学业，他可能要比中学的平庸学生更

有知识、甚至更有文化。这样一来，区分社会阶级的文化不平等就不复存在了，一切都会混淆不清。资产阶级需要一种普通人所不能接触、并应排斥大众的教育”。而中学结业考试就是对这种教育方式的认可。

虽然总结性的提法总会有弊端，但两次大战之间的资产阶级确实给人这样一种印象：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如果过分关注那些为工业注入新动力的新型资本家——他们大多是因为战争而发迹的——我们就可能忽视问题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对待生活的马尔萨斯式态度颇具象征意味。他们在经济事务上的行为方式同样如此，如那种日益受到指责的倾向性：储蓄优先于投资，而在投资中，被认为安全可靠的国家债券又优先于工业债券。1936 年之前社会立法明显滞后，只要与 20 世纪初作一个比较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人民阵线仅仅剥夺了资产阶级权势的外表。但他们已经感到不安，已经采取防御，其敏感超过了危机的影响，恐惧在他们中间蔓延。两次大战之间的资产阶级“不再是幸福的了”（马克·布洛赫）。 839

墨守成规的政治

1914 年之前，国家很少干预经济和金融事务，冲突是围绕共和制和学校世俗化问题展开的，社会主义者也更愿意谈论社会政策而非经济政策。当然，随着有关收入税的大规模斗争的展开，一场变革已经开始。不过，国家职能是在大战期间才得以真正扩展的。1919 年，重建、通胀和恢复等难题是所有政府关切的问题，国家日益关注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大战期间及战后诞生的深刻变革又在 30 年代的危机中得以巩固，经济进入了政治。

但是，政治几乎没有对经济问题的闯入作任何调整。在制度领域，萧规曹随的作风依然盛行。这是一种变相延续的君主制，一种折中的临时体制，它在战后存活了下来；战争甚至强化了这种体制，而且一小撮人仍在宣扬王党主义。社会主义者桑巴曾如是表述这种困境：“或者实现和平，或者制造一个国王出来”，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困境是一种假象。

不过，在 1924—1926 年的货币危机和财政危机期间、在随后经济

衰退日益发展的情形下，面对政府的瘫痪和议会的拖沓，改革的必要性又提上了日程。人人都赞成改革，然而，极右翼要求改革的极端喧嚣让左派感到疑虑。社会党急于限制参议院的权限，共产党则和激进党一起“捍卫现存体制”。此外，激进党真的希望改革吗？当哲学家阿兰把激进主义定义为“选举人对当选者、当选者对政府的永久监控”，当他为捍卫个人利益而辩护、并把这种利益赞誉为“公民反对权威”的行动时，他便相当准确地表达了激进主义的本质。无论如何，从在1936年以后，安德烈·塔迪厄不再谈论改革，而是谈论“再来一次革命”。一些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也像他一样转向了右翼的极端主义，开始同情威权体制。

政治上的墨守成规同样表现在殖民问题上。但是，马格里布和印度支那已经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有些人主张独立，另一些人则宣扬回归传统，还有人建议与法国融合。不过，无论是阿拉尔·艾尔－法西、梅萨利·哈吉还是法赫拉特·阿巴斯、布尔吉巴、胡志明，他们的要求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更有甚者，这些要求完全不为宗主国的人民所知。因为这是一个殖民观念全面胜利的年代，1931年的巴黎博览会标志着这种观念达到了顶峰。人们对殖民帝国的兴趣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这既表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教育中。另外，欧洲殖民者对任何改革的苗头都极力反对，在他们的压力下，勃鲁姆—维奥莱特计划流产了，这个计划本来准备给予大约2万阿尔及利亚人以法国公民权，而且这些人大部分是老兵。当寄托于人民阵线的希望破灭之后，马格里布的骚动更加剧烈了。镇压行动同样很严厉，骚动首领被逮捕之后，那里的运动也就平息了。1939年，帝国实现了内部和平，不过为时甚短。

与这种普遍的政治守成主义相对应的是选举团的稳定，当然这并不排斥多数派的变更。两次大战之间共进行了5次大选：1919年11月、1924年5月、1928年4月、1932年5月、1936年4—5月。不过，在弗朗索瓦·戈盖尔之后成为习惯性称呼的秩序派党派和运动派党派之间，选票还是有一些转移的情况。1928年从前者向后者转移的

选票为40万张，1932年为15万张，而1936年，在一场激烈的竞选过后，运动派夺走了秩序派18万张选票，但不到选举团总票数的5%。因此不存在、或很少出现选举不明朗的情况，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强大力量，不过还是应稍作区分。两大阵营内部有一些变化：1936年，激进党失去了大约40万张选票，而共产党的选票增加了80万张。不过，这种变化是在政见相近的党派之间发生的，而不是1945年之后的那种“跳山羊”式的急剧转变。在1936年，过去给激进党投票的选民这时会投社会党的票，而过去投票给社会党的这时会选共产党。 840

政治上的墨守成规也会造成不稳定——多数派的不稳定、政府的不稳定。在这方面，激进党的暧昧立场负有重大责任。这个党主宰了议会：两次大战期间的42届政府中，激进党13次组阁，而且激进党人从未被排除出政府，有时这甚至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在1924年大选前夕及1928年大选后不久，正是激进党的首领决定采取“下野疗法”的；而且，在1919—1939年的历次政府危机中，激进党人都曾被吁请主持或加入内阁，没有一次例外。这是因为，这个党在政坛棋局中占有关键位置。作为一个中间党派，它的政见轮廓比较模糊，因而适应相当大一部分选民的标准，在历次选举中，它总能获得15%—30%的选票，没有它政府就几乎不可能运转。当激进党于20世纪初诞生的时候，它是个左翼政党，坚定地捍卫议会制共和国和世俗化，反对权威主义和教权主义的右翼势力。在上述主张上，它是社会党的“天然”盟友，但是在财政、经济、甚至社会问题上，它与社会党又有分歧。它并不主张国有化，也不赞同征收资本税。不过，在两次大战期间，虽然最后两个问题已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激进党在选举上依然遵循过去的纲领。1924年它反对的是教权主义，1936年则反对权威主义体制的危险，并与左翼结盟。但一旦掌权之后，在面对极为严峻的货币、财政和经济危机时，激进党人又在施政方针上与社会党人产生龃龉，于是他们便通过一连串的倒阁行动同社会党划清界限。左翼联盟或人民阵线曾三度形成并在大选中获胜，1924年、1932年和1936年。而就在大选胜利两年之后，多数派又三次瓦解，激进党人转

而与右翼一起组成新的多数派，这样又不必解散议会并举行新的选举，议会可以在封闭的罐子内自行运转。因此，政治方面激进但社会问题上保守的激进党处于一种微妙境地。它是那个畏首畏尾的年迈法国的绝妙化身，既不满足于现状又担心未来，身上还带着各种古老斗争的深刻印记。

不过，政府的不稳定对当时的人们震动尤其大，它最突出地表明现存体制越来越失灵。21年内出现了42届政府，平均每届为时6个月。这些数字让人吃惊，虽然它们并未完全揭示真相。因为，当总理成为共和国总统（如1920年的米勒兰）、或总理因健康原因隐退（如1929年的普恩加莱）、或总理连任之时并未真正改组政府的时候，我们能说政府不稳定么？如果考虑到某些政府寿命相对较长（普恩加莱政府1922—1924年，26个月；1926—1928年，28个月）、并因此压缩了其他政府的寿命，那么不稳定就更加不能视为一个重要事实了。这种不稳定有各种原因，不过其中一项最为根本——行政机构完全依赖于立法机构。不过，这种不稳定因为政治人物的长期在任（从1920年到1939年，克耶曾21次出任部长，A. 萨罗19次，达拉第17次，肖当16次——当然，这四个人都是激进党人）、因为行政机构的连续性而得以缓解。

最高立法当局与虚弱的行政当局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会导致一些非常步骤的采用，这种做法可以让参众两院议员理论上的权威不致受到质疑。在大战期间的白里安和克雷孟梭内阁任期内，议会曾经同意政府以颁布期限明确的法令的形式取得一定的立法权。战后的财政经济危机使得这种非常步骤得以延续到和平时期。1924—1926年，普恩加莱曾两次要求获得全权，卡约也曾提出这样的要求，但遭到拒绝。841 1934—1938年，五位总理曾要求授予全权，其中3位获得成功，而且每次的期限都更长（达拉第竟有4年!）。

不稳定、非常步骤，这个体制在所有人看来都是有缺陷、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但它自身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在1871年之前，46年中出现了13种政体，而此后的65年只有一种政体……从前的政体未曾

衰老就已垮台，而目前的政体虽已衰老却仍未垮台。”（安德烈·塔迪厄，《被囚的君主》，1936 年）。

三、危机中的真相：30 年代

1929 年 10 月的一个星期四，华尔街股市崩溃，这是资本主义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开端。当时的人们几乎没有料到危机的来临，他们认为这只是一次周期性衰退的发端。这样的衰退很早就影响到经济生活的节奏，一年后、至多两年后，衰退就会被克服。1929、1930、1931、1932 年，这些年人们一直在等待经济复苏，但复苏迟迟没有到来，人们开始习惯于危机了，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失业者。从那以后，自由放任的信条已经不可行了。各个政府，即使是最不主张指令性的政府，也开始进行干预了。这次危机是世界性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能逃脱。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法国并没有陷入剧烈的动荡之中。相反，很多人还在危机中看到了自鸣得意的理由，它不是撼动了傲慢的美国吗？而法国则是资本的避风港，在 1928 年 5 月到 1931 年 5 月的三年中，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几乎翻了一番。而且，生产好歹还在维持，虽然其速率比其他工业大国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暂缓期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关税保护政策的效果，不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普恩加莱“稳定化”政策的持久效应，法国的工业品因而在较长的时期内仍具有竞争力。

因此，1931 年 9 月英镑的贬值是个灾难性的打击；事实上，这等于让法郎升值。我们来看一组数字：1931 年 1 月，工业生产指数（以 1928 年为 100）仍达 102，但 1932 年 1 月就降为 80；1931 年第一季度受救济的失业者的平均数字为 4 万人，而 1932 年达到 25 万。

于是，法国也深陷危机的泥潭之中。尖端生产部门受打击最为严重：从 1930 年到 1935 年，钢产量下降了 40%，铝产量下降 50%，出口减少 1/3。破产的数量便反映了局面之萧条，而国家——现在即使

那些诅咒国家干预的人也在请求干预——先后帮阿尔萨斯－洛林银行、国民信贷银行摆脱了困境，后一家银行后来成为了国家工商银行；国家还拯救了跨大西洋总公司和航空邮政公司。不过在法国，生产过剩危机的打击比别国轻，其原因无疑在于法国经济的落后，企业投资有限，生产设备本来就不够充裕——法国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小型企业——因而更能承受价格降低带来的打击。但是，虽然危机的强度较小，持续的时间却是一样长。

因为，在面对衰退的时候，政府和舆论最初都把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混为一谈，预算平衡仍被视为一剂万灵膏。为了弥补因经济萧条造成的财税方面的亏欠，人们拟定了一个又一个增收节支的方案。但是，法国的价格和那些货币贬值的国家的价格之间的落差很快就变得过大。1933年，在美元贬值过后，只有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和南非还继续和法国一起坚持金本位。在1934年之前，历届政府每日都在进行着政策摸索——提高关税率、规定进口限额、限制生产、制订生产商联盟协议。这完全是传统的马尔萨斯式的经济手段。但在这条路上不能走得太远，因为这可能会招致外国的报复行动。因此必须作出抉择。

842

货币贬值？舆论、政界和专家们都反对这样做。1934年后，几乎只有保尔·雷诺支持这一政策。但法国仍然坚持金本位，把这视为经济状况良好的证据、看作其力量的来源和优势地位的象征。因此，现在只有通货紧缩一种选择。1935年7月，赖伐尔政府果断采取这一政策，强制降低价格和工资，国家率先垂范——公务员的工资、退休金和公债利息被强行削减。在社会政策方面，失败是显而易见的，接受救济的失业者人数一直维持在40万以上。在心理方面，危机的打击是灾难性的。像往常一样，人们对价格下降的幅度全然不知，但每个人都在激烈抗议削减工资。政治家们即将从中获得教训，他们将会推动通货膨胀而不是冒紧缩通货的风险。

危机波及所有社会阶层，但首先受打击的是农民。农村爆发了骚乱，各种极端主义运动与法西斯主义并行发展，如多热莱斯的绿衫军。

相反，罢工遭遇到很大困难，经济萧条时期从来不利于工人诉求的成功。另外，工薪者的境况可能要好些，因为工资总是能抵消价格方面的影响。但这里没有提到失业的因素。虽然法国人受失业的打击较小——这导致大量外籍劳工的涌入——但仍有几百万人受到影响，或是完全失业或是部分失业。失业对无产阶级的意识造成严重创伤，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中产阶级同样感到不满，商人的营业额下降，公务员成了通货紧缩法令的主要受害者，而此前他们是价格下跌的主要受益者。中产阶级的不满具有关键意义，这使得资产阶级处于孤立地位。能说资产阶级逃脱了危机的打击吗？当然不能，不过，他们是唯一拥有能更好地应付危机的资源的阶层。不过到1935年，经济开始复苏。这一点无人预料到。

外交危机

在欧洲，没有哪个国家受危机打击的程度有德国那样严重。举一个数字就足够了，1932年的完全失业者人数高达600万。面对这种灾难，美国总统胡佛于1931年宣布，国与国之间的所有债务之偿还延长一年。一年后，德国宣布无力支付赔款。法国议会将赔款和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不顾当时的总理赫里欧的意见，拒绝继续偿还协约国的债务。美国的舆论感到恼怒。这样，1932年后，凡尔赛和约等条约中的财政条款以及有关债务问题的协议都不复存在了——如果不算各方的怨恨情绪的话。

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在德国议会的最近一次选举中（1932年11月），希特勒的党派获得了37%的选票。他的举措将不断打乱外交格局，并让欧洲各国政府措手不及。1933年，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纳粹的代理人刺杀奥地利总理，但是意大利的迅速反应使得德国吞并的企图流产了。德国还违背凡尔赛和约开始重新武装，并以此为荣。

面对希特勒的威胁，法国必须找到强有力的盟友。普恩加莱的朋友、老派的现实主义者路易·巴尔都与苏联进行了互助条约的谈判，1935年5月，赖伐尔虽然在条约上签了字，但条约却失去了原来的锋

芒。与此同时，法国也在与法西斯意大利接近，赖伐尔和英国首相张
843
伯伦还与墨索里尼在斯特莱萨结成了一个“阵线”。看来法国已经不顾及意识形态的因素，开始恢复一战前的外交传统了。但这种情况昙花一现，因为上层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极端仇恨损害了上述努力，有些反共阶层还对意大利政权抱有同情。

1935年10月，墨索里尼入侵国联成员国、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而此时赖伐尔的态度十分暧昧。他想安抚这个新盟友，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违反国联盟约；于是他与英国外交大臣拟定了一个瓜分埃塞俄比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后果是可悲的，因为它表明，民主国家甚至对它们自己捍卫的原则也不尊重。英国舆论感到愤怒，而墨索里尼也拒绝了这个计划。接下来就是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了。但制裁措施并未见效（1936年5月，埃塞俄比亚皇帝踏上了流亡之路），人们对国联的信任也烟消云散。墨索里尼废除法意协定，并开始与德国接近。

法国的右翼掀起轩然大波。一批知识精英——马塞尔·埃梅、皮埃尔·加格索特、蒂埃里·莫尔尼埃以及其他很多人——与16位科学院院士一起抨击“平等化的狂热”，但人们竟以这种狂热为名，“制定出了制裁措施，而这些措施是要阻碍对世界上最落后的一个国家的文明征服……这毫无疑问会引起全面战争，会让所有无法无天的国家联合到一起，反对一个15年使高尚人类的某些重要美德得以表现、升华、组织和强化的国家”。而围绕法苏条约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36年2月，右翼多数派议员投票否决了该条约。

希特勒则以这个条约为理由否定洛迦诺公约，他重新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这次行动直接针对法国。法国应作出反应吗？当总理阿尔贝·萨罗在广播里庄严地宣布：“我们不能将斯特拉斯堡置于德国人的炮火下”时，看来一切都表明法国会采取行动。然而，政府是在闪烁其词，英国人也退缩了。总参谋部认为，要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进行动员，至少是部分动员，而两个月后就要举行选举，因此，这样的举措是不可想象的，何况总参谋部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最后，法国竟向国联求助！今天我们知道希特勒只是在虚张声势，德军当时还

无法抵挡法国的进攻，即便法国只进行一次局部动员的话。但两年后，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当时驻柏林使馆的武官保罗·斯特兰认为，“对纳粹体制进行决定性一击并拯救和平的最后一次良机，就这样从我们手里溜走了”(《历史的见证》)。

民主国家的虚弱增强了独裁者的力量。不可否认总参谋部和政府的责任，而对于后者，没有将军们的担保和英国的支持它是不敢行动的。但是，舆论中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情绪同样负有责任，这在法国是个新现象，至少从其规模而言是这样。当然，和平主义源于大战及其造成的可怕伤亡。和平不仅是人们的渴望，它还成为了最高价值。在《贝拉》(Bella)一书问世9年之后，《特洛伊之战不会再来》中的吉罗杜已经失去了原来美好的乐观精神，他嘲笑国联说：“消灭一个国家根本不会改变它优越的国际道德地位”。为了维护和平，安德罗马克和赫克托尔，这些我们喜爱的英雄，曾建议将海伦交给希腊人，但战争还是不能避免。

因此法国已经受到打击，来自外部的打击——美国的危机、德国的危机搅动了它的相对安宁。当时人理解力之欠缺确实让人迷惑，从当时的媒体文章和政治人物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编纂出一套十分漂亮的蠢话集。政府反应的不得力、随之而来的麻烦使得国内局势再度紧张。

“2月6日的不成功的革命”(罗贝尔·布拉齐拉克) 844

1932年的选举中，激进党和社会党的“卡特尔式”联盟获得胜利。在危机面前，这个联盟表现得同样的无助，内阁的轮换依旧在继续。反议会主义重新抬头，既有右翼的也有左翼的，但主要是来自右翼的。从前的各种极右组织再度活跃起来，新的极右团体也在建立。这样的团体有爱国青年运动和法兰西行动，有马塞尔·比卡尔的法西斯运动和让·勒诺的法兰西团结。这些团体毫不掩饰它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而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运动的声势更是日益浩大，到底这个运动有多少成员呢？1934年2月6日之前肯定不超过15万人。

不满情绪在蔓延，老兵们的失望(“到底为什么打仗呢?”)、失业

和中产阶级的焦虑给这种情绪火上浇油，有些大资本家成了被逐猎的巫师的角色。斯塔维斯基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花边新闻竟演变成这样大的事件！几个政治人物——无时无处不见他们的身影——之间的协议背后开始显露出威权主义体制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刻，由于同斯塔维斯基丑闻有牵连，激进党人萨罗辞职了。继任者为达拉第，他的表现看来足以保证他的坚定可靠，他打算调离警察总监希亚普，后者有宽容极右社团之嫌疑。1934年2月6日，达拉第政府接到议会的授权。与此同时，3万名示威者（其中足有一半是全国老兵联盟的成员）高呼“打倒盗贼”的古老口号向波旁宫汇合，协和广场上的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10人死亡，许多人受伤。在残老军人院前面的广场上，爱德华·赫里欧受到指名道姓的攻击，赫里欧还能听到“滚到塞纳河里去”的叫声，“想到一位里昂市长可能在不是罗讷河的水流中丧生”①，赫里欧觉得是件丢脸的事。不过很少有人玩弄这种反讽艺术。对左派来说，这是对共和制度的威胁。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吗？但这个问题本身有什么要紧的呢！只要左派相信威胁是存在的就行了，而这种信念是人民阵线得以产生的部分原因。而对痴迷于法西斯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罗贝尔·布拉齐拉克来说，“虽然2月6日是个糟糕的阴谋，但这是一次本能的、光辉的反叛运动，是一个勇于献身的夜晚，它将与那晚的气息、冷风、川流不息的苍白面孔、人行道边一簇簇的人群、还有不可抑制的民族革命的期望，一起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的战前岁月》）

这是一场隐形革命吗？确实，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议会第一次向街头的压力让步，达拉第也辞职了，但取而代之的是71岁的共和国前总统杜梅格，在他的右翼是塔迪厄，左翼是赫里欧，而此前贝当已经担任了国防部长。“法西斯主义是青年人情绪的爆发：而右派舆论则殷切地欢迎一位老人的到来”（勒内·雷蒙），就像此前欢迎克雷孟梭、此后又欢迎贝当一样。皮埃尔·诺拉认为，法兰西行动的成员

① 赫里欧曾担任里昂市长，罗讷河流经里昂。

“更关心的是法国的堕落而不是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他们敌视20世纪的社会，而作为工业化的受害者的意识并不那么强烈”。难道不可以这样评论其他极右社团吗、并据此与德国的——就算不能与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画一条分界线吗？法国社会明显更为稳定；它的僵化也许能使它更好地防御法西斯主义。

为了回击2月6日的骚乱，12日开始了大罢工，接着全法国都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些行动的成功让其组织者都感到吃惊。不过共产党的转变是最近的事，6日，共产党人举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示威，不过他们也反对现政权；但法共已经意识到这两个主张之间的矛盾，这也许是受到来自莫斯科的压力，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斗争的灾难性后果无疑让他们心有余悸。12日，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会提出了不同的口号。但在基层，相互敌对的工会兄弟几乎都自发地共同举行游行，一致的反应所产生的力量、近半个世纪的世俗教育培养出来的共和神话，这时终于发挥了重大影响力。2月12日行动是人民阵线在大众中间的先声，如果领导阶层还没有这种前兆的话。

845

左派的领导层联盟逐步建立起来。1934年7月，社会党和共产党决定采取联合行动；1934年10月，共产党与激进党和解；1935年7月，激进党加入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1936年1月，联盟颁布共同纲领，纲领宣布放弃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法国总工会倡导的结构改革，因为激进党出于原则性理由、共产党出于策略性理由而反对这种改革。1936年1月，法国总工会和统一总工会合并。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由此开始。1935年7月14日，在复兴1790年联盟节的庄严誓词中，游行的参加者们走到了一起。1936年5月24日，人们在公社社员墙前面举行了向巴黎公社死难者致敬的仪式。每次活动的参加者都达数十万。

1936年4—5月大选期间，由于人民阵线各党派在第二轮竞选中采取了相互避让的做法，故它们在大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不过各党派的选票有轻微的相互转移现象。激进党的席位减少了，而社会党、特别是共产党席位增加。不过，如果没有激进党，人民阵线永远不可能构成多数派。

“人民阵线：不成功的革命”（达尼埃尔·盖兰）

在左派胜利刚刚取得大选胜利后，法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工潮。这场运动具有相当大的自发性，5月份，它先是在冶金业中蔓延（5月11日，勒阿弗尔的布雷盖工厂），6月初波及化工、纺织、建筑和大型商店等行业，最终涉及200万工人，不过罢工还没有影响公共部门。这是一场新型的运动，即就地罢工，这让资方大为惊恐：明天它会演变成革命吗？不过，除了个别例外，工人的要求仍局限于企业范围之内，老板们也不必担心，不必费心去了解损失、去恢复工厂的生产。因为这次罢工首先是一次气氛缓和的怠工行动。工厂这个劳动和异化的地方开始人性化了，人们在里面吃饭、跳舞、睡觉。法国总工会的一位领导人说：“你们要明白，他们此前一直就像生活在坟墓里。而今天，他们掀开了坟墓上的石板，终于见到了阳光。”这是一次愉快的罢工，其重要意义更多在于罢工本身而非罢工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没有谁的表述有西蒙娜·薇依那样出色：“人们高兴地在一个笑眯眯的工人的许可下走进工厂，高兴地看到有那么多微笑的脸孔，那么亲如手足的招呼声……在各个车间里溜达一圈也是件高兴的事儿，车间里还有人攀附在机器上……在这些沉默的机器中间按照人性化的节奏生活也是件高兴的事儿。当然，那种严酷的生活几天后就会重新开始。但人们不去想，人们就像战争期间告假的士兵那样。不管随后会发生什么，今日的生活将会永远值得回味。”这是解放的快乐，表演的快乐，“除了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外——不管这些要求多么重要——还有别的东西……在经历了长期的屈从、在一切都要忍耐、一切都要默默地忍受的岁月后……终于有了敢于扬眉吐气、挺直腰杆的日子，终于轮到了自己说话的时候，在这几天里，自我感觉终于像个人了。”因为春天的好日子只会来一次。

6月4日，勃鲁姆的社会党—激进党联合内阁成立，这届政府的新气象是出现了三位女部长、设立了休闲体育部、并在马提尼翁宫设立了独立的总理府。6月7日，应资方的要求，法国总工会和法国雇主联合会举行会议，勃鲁姆担任会议的仲裁者。马提尼翁协议承认工

会有权实施自己的权利，规定可以设定集体劳动合同并可选举工人代表，协议还建议将工资提高7%—15%，但每个企业工资总额的上涨水平不得超过12%。“胜利已经到来”，《人道报》打出了这样的标题；《民众报》则欢呼“工人阶级的胜利”。在6月11日多列士发出呼吁后（“应该知道如何结束罢工”），工人运动开始十分缓慢地退潮。无论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双方都不准备将运动推向革命，他们都只想执行人民阵线的方针，仅此而已。而托洛茨基派人数太少，也太孤立，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革命派左翼（马尔索·皮韦尔，达尼埃尔·盖兰）则担心与托派走得太近。

846

随后是接二连三的法律，参众两院大都以压倒优势迅速通过之：集体谈判协议、两周的带薪休假、每周工作40小时。工人的状况有了巨大变化。法兰西银行被改组，战争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并设立小麦局以稳定价格。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14岁。根据政府法令，各种极右团体被解散。在议会休假期间，一系列范围至为广泛的改革措施得以通过。

但人民阵线不仅仅是一串法律名录或一个议会党团联盟。它首先是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大规模介入、是群众无限期望的开端：“希望以及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又回来了”（莱昂·勃鲁姆，1936年12月31日）。对1936年有某种颂扬，它来自对人的信心、对进步的信念、对自然和博爱的回归，这种颂扬还可以在雷诺阿的电影里、在马尔罗的小说里看得到，他叙述了自己在西班牙的冒险，并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作品称之为《希望》。

进入10月后，问题又开始堆积，反对派重新恢复活动，人民阵线内部的纷争日益明显。

对勃鲁姆和他那些受美国新政启发的顾问们而言，生产过剩只是消费不足的后果，因此必须采取“购买力政策”。增加工资、设立小麦最低价格等措施便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这种政策受到各种因素的抵制。由于缺乏改进生产率的特别措施，每周40小时工作制只能对生产造成限制，这个政策甚至也不能遏止失业。1936年9月，政府终

于采取货币贬值政策，但是贬值幅度太小，比1931年英镑的贬值和1933年美元的贬值幅度都要小，而且当时的心理条件也不利。我们不妨看得远一点，购买力政策实际上变成了幻影，因为悲观、犹疑、焦虑的资方不愿冒险投资以迎合需求的增长。不过，这样的政策好歹还是出台了。短期来看，唯一能刺激经济的就是货币贬值，因为数字就摆在那里：1937年5月，工业生产指数为89（以1928年为基数100），而1936年4月为88，接受救济的失业者仍有35万。

资本的外逃——这是资产阶级的总罢工——使得政府的任务复杂化。政府像往常一样，徘徊在强制和安抚之间。1937年2月宣布的"暂停"产生的结果令人失望。1935年5月，勃鲁姆曾高喊："我们一个星期、三天、甚至一个小时都不能再等了，我们要庄严地重申：我们不能再容忍国际投机的法则了"，但现在是说这话的时候吗？不过这届政府至少还知道不能指望资产阶级，它受到的诽谤比任何政府都更厉害，有人还试图再次营造曾围绕这届短命政府的诽谤氛围（内政部长萨朗格罗因受攻击而自杀）。

人民阵线也受到其内部争吵的损害。一度参加政治运动的农民和中产阶级很快就对社会运动、对动荡局面和罢工的持续感到不安。他们最初的同情还是抵挡不住对革命和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他们在选举中选择了激进党。针对资本外逃的局面，勃鲁姆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并建议对汇兑实行监控（1937年6月），但参议院的激进党就要把政府搞下台了。

847

共产党人出于对内阁斗争固有的不信任态度，曾决定不参加勃鲁姆政府，虽然多列士有不同意见。但法共仍在打人民阵线这张牌。这是出于他们战略上的考虑，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主义是当下的首要敌人。这就是西班牙战争何以能造成分歧的原因所在。1936年7月，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试图推翻合法政府，而这个政府也是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阵线政府。勃鲁姆担心发生欧洲战争、甚至引发内战，因此设法与英国保持联系，并无奈地坚持不干涉政策。但佛朗哥不断接到希特勒运来的武器以及墨索里尼派来的人员。因此在共产党人看

来，西班牙是一个反对纳粹主义的战场。他们不能容忍勃鲁姆政府的消极立场。如果民主制不能抵抗法西斯专制，那么同它结盟有什么益处呢？

甚至工人都没有丧失战斗性。已经取得的利益——首先是加薪——一点点地蒸发了。1938 年，达拉第政府甚至抨击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法国总工会于是在 11 月 30 日发出总罢工的号令，但这次行动失败了。这时对外部局势的关注已经影响到所有问题，慕尼黑会议甚至导致了法国总工会本身的分裂。

人民阵线会成为一次革命吗？群众希望发动深刻的变革吗？对此我们大可怀疑。但不管怎样，无论是 1934 年的右派还是 1936 年的左派，各派重要的政治组织都不准备带领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

民族危机

因此，革命没有发生，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几乎没有什么变革；但人们的精神发生了怎样的骚动呢！各派的对立情绪更加剧烈。只要看一下政治组织的例子就足够了。1933 年，法共党员为 3 万名，但 1937 年增长到 30 万人，并成为左派第一大党。右派的变化更为明显。在一个向来不喜欢干部制度的阶层，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群众性党派——法兰西社会党。这只是改头换面的火十字运动，该组织于 1936 年被解散，但拉罗克上校的这个法兰西社会党的成员超过了 200 万人，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尽管这个党接受选举游戏，但它仍然敌视现政权，并且完全忠诚于某个领袖。1936 年还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和民族的”党派——法国人民党，该党受多里奥的严格控制，此人是个悔悟的共产党人。法国人民党可以被看作法西斯组织，成员可能超过 20 万。1930 年代的右派老首领、温和派政治家塔迪厄和赖伐尔等人也对威权主义体制表现出日益明显的同情。什么东西能更好地象征资产阶级的演变呢？马克·布洛赫写道：“富裕阶层、甚至表面看来思想最自由的人们中间的这场骚动，导致了 1936 年人民阵线的上台，这个说法看来并不夸张……资产阶级越来越远离人民，他们不再深入人民中间以赢得人民的同情，这是真正的思想运动，他们

拒绝尊重人民，但随后又会在人民面前颤抖，这样，资产阶级就一下子与法国疏远了，虽然他们并不想这样做。在给现政权施压的同时，他们又会谴责委身于这个政权的民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由于对重现眼前的共产主义威胁怀有深刻的恐惧，曾经欢呼占领鲁尔区、曾经支持白里安的右派现在谋求与希特勒和解。提出论据并非什么难事，如缺少英国的支持、军事准备不足等等。“工会运动中的工人取代了德国鬼子的位置”，从西班牙归来的天主教派贝尔纳诺断言道。另一个阵营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 15 年一直坚持和平主义的左派，现在有部分人转向了民族防御政策，态度甚至十分坚定。早在 1936 年，人民阵线就提出过一个总额 140 亿法郎的再武装计划，这个数字十分可观。不过，一部分左派仍然固守陈旧的理念，即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这样的人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法国总工会和教师工会中特别多。

848

慕尼黑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当希特勒要求获得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该地区有 300 万德意志居民——时，法国，这个曾担保其盟国的疆界的国家，竟同意了德国的要求。不仅是因为希特勒搬出了人民自决权、不仅是因为凡尔赛和约有那么多的缺陷，只有对战争挥之不去的恐惧才能解释如此恶劣的违背承诺的行径。莱昂·勃鲁姆称之为“怯懦的慰藉”。

不过，在 1938—1939 年，一种迟到的民族应对政策初露端倪。由于世界经济形式好转，财政部长雷诺终于使法国走出了危机；1938 年 11 月 30 日工会运动的失败让资产阶级稍许放心。但就在这个时候，意大利要求获得突尼斯和科西嘉，而希特勒则首次派兵占领非德意志人居住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1939 年 3 月）。民族自决权的幌子被抛弃了。从这一刻起，英国舆论开始转向。但法国表现得较为犹豫。

某种失落和萧瑟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国家。工人阶级之所以失落，是因为他们 1936 年的希望很快就烟消云散。资产阶级之所以失落，是因为十分真切地看到了革命的幽灵，以致不能不感到长久的恐惧。这

个民族之所以失落，是因为战争再度成为可能。一种在劫难逃的气氛弥漫在人们的脑海里：《雾中码头》里的逃兵，《游戏规则》里的资产阶级，《天亮了》中的工人，《驳船》里的水手，所有这些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1919 年是凯旋的法国，1929 年是繁荣的法国，1940 年是惨败的法国：最后一个形象只是表面上有些令人费解。法国难道不是已经为了胜利而耗尽精力吗？诚然，胜利的代价太沉重了。但是，人口、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表现得尤其明显：这是 1914 年之前的遗产，但胜利的喜悦掩盖了这些缺陷。当环环相扣的危机接踵而至时，经济繁荣、艰难恢复的财政局面、煞费苦心制定出来的条约，所有这些都破灭了。人民阵线开始重新武装，达拉第—雷诺政府开始重振经济。但部分左派仍沉溺在过时的和平主义思潮中。大部分资产阶级受到“36 年”的创伤，他们有时甚至接受法西斯主义的诱惑，不想看到冲突的到来。前面我们看到了马克·布洛赫的控诉，此处是莱昂·勃鲁姆的陈辞，这位政治领袖在 1941 年曾这样写道：资产阶级“任何情况下都不希望战争，他们并不害怕希特勒，因为他们恐惧的全部容量都被人民阵线、特别是共产主义占据了”。而那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则在 1940 年如是说：“在为我们提供工业领袖、高级行政官员和大部分军官的统治阶级中，很多人……是在保卫一个他们预先就认为没有抵抗能力的国家。结局当然就是‘奇异的溃败’。”



849 #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

1939—1945年：失败、占领、抵抗运动

从1939年至1945年，法国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它经历了战争与失败，而与战争和失败相伴而来的，则是贫困、悲剧、耻辱、领土被占、资源遭劫。更糟糕的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恶劣处境中，其民族统一因内部分裂与自相残杀而受到损害。但是，人们很快地将其冠名为“抵抗运动”的英勇的努力，使法国得以重新积极投入盟国与纳粹德国之间的战争，并为获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这一历史是一段出现崩溃、并经受长时期的痛苦的历史，但它也为更美好的时日以及一种光彩夺目的复兴作了准备。不过，这种光彩夺目的复兴不可能完全抹去这样一场悲剧留下的深刻痕迹。

一、被打败的法国

850 ### 1939年的法国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为保卫曾正式允诺会提供援助的盟国，法国步英国的后尘向德国宣战。对1914—1918年的大战记忆犹新的法国人不约而同地想到，此次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

那么他们是如何准备面对和进行这场战争的呢?

在所有战略家的眼里,法国的军队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军队,魏刚将军刚刚宣布了这一点,而德国总参谋部也作如是观——后者同样对1918年耿耿于怀。从数量上看,若加上波兰军队的人数(人们无法指望英国的军队,其在1939年能向欧洲大陆派出的只有两个师),法国军队强于希特勒手下的年轻的军队——国防军。法军的组织与装备自1918年几乎未被调整。它无疑已经走上了摩托化的道路——虽然还不甚果断。如同人们已过多地说到和重复的那样,它亦不缺乏坦克:人们将发现,在1940年5月,德方的装甲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没有明显优于法方。然而,在其他领域,不足之处昭然若揭。首先是在航空力量方面。1938年,空军总参谋部的负责人维耶曼将军宣称,他手下的飞机"处在无法应对一场战争的状态";而自那以后,状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在1939年9月,空军所拥有的机况良好的飞机大约为700架歼击机、175架轰炸机,它们均非最现代的机型。即便算上英国空军的飞机,法国空军与德国空军的力量对比仍为1比5,德方明显占据优势。用于对空防御的高射炮、用来对付坦克的大炮以及地雷,一律严重短缺。

虽然自1936年以来已进行了某种实实在在的努力,但法国在重整军备方面仍因各种障碍而举步维艰:工业的适应性不够、过于分散、方法与工具方面的落后;军方领导人对军队的实际需求缺乏总体看法;设计样品时未能务实;原材料和劳动力问题……在这几年里,国家的所有军事努力皆围绕着马奇诺防线展开。然而,这条防线并不完整,因为它无法覆盖比利时的边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缺陷最终危害严重。马奇诺防线使得国民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它亦使得法国军队越来越固守一种以防御为中心的理念,后者使军队丧失了所有的冲劲与行动。这是一种在1914—1918的战争给法国带来重创后产生并侵袭国民的僵化症的迹象,人们可在法国所有领导人的身上看到它,而且,它还将很快带来悲剧性的后果。一种与之相同的精神状态使得人们对军事领域中最引人入胜的革新嗤之以鼻:法国没有伞兵部队,

虽然苏联人在几年前就已提供了这方面的榜样；虽说法国并不缺少坦克，但坦克的用途仍与 1918 年时一样，被定位为步兵部队的附属物，而且，总参谋部顽固地反对戴高乐上校与保尔·雷诺提出的组建坦克部队的要求。装备充足的惟有海军：它拥有总吨位为 50 万吨的现代舰艇，而且这些舰艇的品种颇为丰富，从像“敦刻尔克号”那样的主力舰到轻型舰艇和潜水艇，应有尽有。法国的海军可在英国海军执行其盟国所期待的行动时行之有效地提供援助，担负起保卫与殖民地和中立国的联系、以及对德国实行封锁的职责。它唯一缺少的是航空母舰，当时，人们尚想象不到它们后来会在这场战争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至少可以说，法国的战争机器尚未调整到最佳状态。然而，国民对此难道就全无责任了吗？他们的精神状态该如何来解释？也许，希特勒的意识形态、他鼓吹的极权主义，以及纳粹德国领导人为反对由 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与其他针对德国的国际协定确立的现存秩序而采取的强硬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使一些人产生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精神，使另一些人对军国主义和黩武的“永恒的德国”起了戒心，但是，对议会民主制提出批评，将其孱弱无能与注重秩序和权威的体制的高效率对立起来者大有人在，后者难道不是对付社会颠覆的最佳壁垒吗？确实，从这一观点来看，苏联与德国在 8 月 23 日签订的协定或许大大动摇了人们的信念，但是，最为明显且后果最为严重的事实是，法国在参战时缺乏热情，人们只是为服从纪律，或更多地是出于顺从而参战。人们已远远没有 1914 年的动员时曾有过的那种劲头，之所以如此，与这场战争缺乏振奋人心的战争目标密切相关。推翻纳粹制度？但这种制度毕竟是德国人自己选定的。终结希特勒的侵略行径？人们难道不能通过和平协定来达到这一目的吗？“慕尼黑精神”并未消亡。其人口潜力与经济潜力一样被大大削弱的法国，尤其惧怕一场新的考验。

851

显然，在这种状态下参战甚为不利。与此同时，为弥补准备不足的缺陷和利用各自的殖民帝国的资源，法国人与英国人皆采用了一种

等待观望的战略，这也是最符合时任盟军总司令的甘默林将军性格的战略，此人更像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位军事领袖，为逃避责任，他喜欢采取拐弯抹角的手段，或者是按兵不动。人们自以为通过封锁削弱了德国，与中立国结成了一个巨大的同盟（真是天晓得!），并引导着德国人自行抛弃他们不幸的制度。盟国的宣传机构宣称："我们将获胜，因为我们最为坚强。"还应当相信法国的力量以及为之服务的意愿。

奇怪的战争

这一战略让希特勒占据了主动权，他通过为期三周的闪电战，将波兰从地图上抹去，并与其盟友斯大林一起瓜分了波兰原有的领土。波兰政府曾多次吁请盟国施以援手，结果纯属徒劳。法国只采取了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姿态——其军队在萨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直至齐格菲防线的边缘。而当德国的援军赶到此地，法国的军队即退回了原地（10 月 16 日）。导致这种无异于承认自己懦弱无能的无所作为的确切原因究竟何在？还有待探讨。不过，自那以后，以及在漫长的冬季里，与敌军有过接触的军队惟有驻守在巴拉丁边境与莱茵河沿线的部队。这些部队在此实际上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事情，双方只有过一些零星的交火。至于法国主力部队的士兵，则在马奇诺防线的掩蔽所或后方的驻地，通过投身枯燥乏味的操练来排遣他们的无聊之情。兵营里的这种生活烦闷之极。人们寻思着如何结束这种"奇怪的战争"，隐隐约约地设想着有朝一日它会在真正的战斗打响前就宣告结束。在平民百姓那里，情况亦同样不容乐观。在最初的惊慌过后，他们为没有看到任何曾预计到的事情发生，为既没有看到地面的交火，又没有看到空中的轰炸出现而惊诧不已。逐渐地，他们恢复了平常的生活习惯，其感到不便的只是已经颁布的战时条例的某些限制。被征招入伍者的家庭得忍受分离之苦，但是，在大多数行业中，皆可看到一些"被特别派遣者"的归来，这些人将在他们的工作中，而不是在其曾驻守的什么也没发生的前线派上更大的用场。

希特勒以一种人们所熟悉的艺术维持和强化着这种危险的氛围。

在于 10 月 8 日在国会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他发起了和平攻势：既然波兰问题现已完全得到解决，为何还要继续进行战争？在欧洲，任何争端的策源地已不复存在，德国亦不会再提出要求。为了确保所有人的财产，民主国家最好与德国和平相处。无疑，此番言论只能诱惑那些还想听任希特勒愚弄的人，政府总理达拉第立即以断然拒绝作为回应，几天后，英国首相张伯伦也作出了同样的举动。尽管如此，通过对前线士兵发出的呼吁、在工厂里散发的反对军国主义的传单，以及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敌方的宣传还是隐隐约约地起了一些作用。

852

政府与总参谋部并非没有感受到这一种惟有依靠军事行动才能予以消除的危险。但是，该在哪里采取行动，以及该如何采取行动呢？甘默林不认为在东北战线采取行动是可行的，这条战线较为狭窄，若在此采取行动，敌我双方会如同在 1914—1918 年的大战中曾出现过的那样，会在伤亡巨大却毫无结果的阵地战中元气大伤。他想在别处寻求采取行动的地点，但却立即遇到了许多障碍。这一事实亦令人痛心地表明，法国军方在许多方面均未做好战争准备。为最终在地中海东岸以及巴尔干展开军事行动，一支由魏刚指挥的军队被派往叙利亚。不过，此举纯属枉费心机。因为，为了能行之有效地行动，就应当依靠由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几个强国组成的一条巴尔干战线。然而，这些强国的力量以及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的决心，均无法让人产生足够的信任。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准备不足与军事上的准备不足汇合在了一起。

11 月 30 日，力图控制东波罗的海的苏联向芬兰发起了进攻，但让所有人深感意外的是，苏军遇到了顽强而有效的抵抗。盟国在此看到了开辟具有多种良好前景的第二战场的机会。对芬兰提供援助的好处有：符合舆论中对这一爱好和平的小国的同情倾向；可以满足那些因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法共的态度（该党虽已被取缔，但仍在秘密进行反战活动）而敌视苏联者的意愿；间接地破坏德国的战时经济（当时德国从苏联大量地获得原材料与石油供应）。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对瑞典和挪威施加一定的压力，以便它们让盟国的军队与物资过境，并由此抓住机会，使德国无法再通过挪威的

港口纳尔威克获得瑞典的钢铁。然而，盟国再次表现出效率不够，在这次干涉涉及的所有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芬兰已被迫屈服，并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条件（1940 年 3 月 12 日）。

这一失败导致了达拉第政府的垮台，人们指控他在进行战争时优柔寡断。于是，保尔·雷诺登台掌权。头脑灵光、富有远见的他引人瞩目地说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名言："赢得胜利，可拯救一切，而屈服，则将丧失一切。"雷诺表现出是个能驾驭局势的高人，在更好地应对战争方面起了具有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为签订法英协定前往伦敦，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这一协定，两国不得单独签订和约或停战协定。与此同时，他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决定通过向挪威派遣一支盟国远征军来切断"钢铁之路"，不让德国再从瑞典获得钢铁。但是，法国人与英国人再次失算。希特勒获悉了他们的计划，并为远征挪威做了好几个月的准备。在同一时间里，希特勒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丹麦，派兵在挪威的大部分港口，其中包括奥斯陆与纳尔威克登陆（4 月 9 日）。盟国没有拒绝战斗。但是，战局显得对它们甚为不利。就同盟国方面而言，战斗主要由英国的海军和空军进行。法国投入战斗的是由贝图阿尔将军指挥的阿尔卑斯山猎步兵。他们在 5 月底将德国人赶出了纳尔威克。可是，就在此时，在法国，种种悲剧性的事件正在发生，远征军得应召回国：挪威战役遂以完全失败告终。

溃败

事实上，5 月 10 日，希特勒以入侵比利时与荷兰终结了西线漫长的"等待观望"的时期。这一最初定于 1939 年秋天进行、却因天气恶劣而多次被推迟的决定性的进攻，得到了精心准备。根据借鉴 1914 年的经验制订而成的最初方案，德军将从北面展开大规模的包围行动，但希特勒没有采用这一方案，而是强令抱怀疑态度的总参谋部采纳一项可归因于曼斯坦因将军的想象力与希特勒本人的直觉的别出心裁的方案。这一别出心裁的方案计划把法英联军的大部分人马引诱到比利时平原，从中部突破，穿越防守薄弱的阿登山区，一直向海边推进，

853

由此切断法英联军彼此之间的联系，并逐一挫败他们。它的成功乃基于两点：出人意料以及因飞机和装甲部队的联合行动得以可能的快速追击。此项方案堪称闪电战的完美模式，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法英联军的统帅部不可能会为德军从比利时发起进攻感到惊讶。在冬季期间，多次警报已向它提供了足够多的迹象。但是，要在比利时进行防守，则提出了一个甘默林将军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自 1936 年以来，法国的这一邻国畏缩在一种谨小慎微的中立状态之中。它希望通过向反对同法国的关系过于密切的人证明其不会这样做来加强国内的团结，也许，它同时还希望由此使自己免遭正在列强之间发生的冲突的牵连。因此，比利时拒绝接受总参谋部提出的与这一态度不相吻合的预防措施。虽然甘默林一直以为，若要及时向比利时提供援助，此类预防措施不可或缺，但他亦觉得，由于政治方面，同时还有战略方面的原因，必须预先签订一项协定。他没有能够做到让比利时人签订这一协定。因而，法国军队是在甘默林始终认为是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投入与德军的交战的。后果立刻就显现了出来：比利时军队因布防失当而惊慌失措，没有能力保卫作为第一道防线的阿尔贝运河；荷兰军队在抵抗了 5 天后宣布投降；身处没有防御工事的地区，且乱成一团的法国军队及英国军队，根本对付不了德军的坦克与飞机，无法将德军挡在边境线之外……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后果。就在这段时间里，德军最精锐的坦克部队穿越了被认为是机械化大部队难以通过的阿登山区。5 月 13 日，它们又在色当成功地强渡默兹河，并由此在一个防御特别薄弱的地区打开了一道突破口。深感意外的法军统帅部对此作出的反应只能是手忙脚乱，毫无成效。因为它手中既无预备部队可调，又无法利用在上个冬季刚组建起来的坦克部队。5 月 15 日，在伊尔松和列特尔之间开了一道更深的突破口。沿着埃纳河与瓦兹河而下，德军打开了传统的入侵法国的通道，其坦克部队得以直逼巴黎。事实上，德军还有许多别的机会或途径使自己可更彻底全面地利用这一最初的成功。通过沿着圣康坦和亚眠向西挺进，他们经阿布维尔到达了海边，并由此把法国

北方军团与盟军的其他部队隔离开来。德方这一孤军深入的作法风险很大，因为在这狭窄的通道中，他们自己也很容易被人切断与后续部队的联系，并因为受到南北夹击而全军覆没，而这正是被急急忙忙地从叙利亚召来取代5月19日被免职的甘默林的魏刚将军所试图做的。但是，魏刚缺乏手段，难以行之有效地掌控一支开始解体的联军。已在制订初步方案的反攻始终没有展开。四处遭受攻击的北方的军队一边在向海边撤退，一边在变得越来越狭窄的地盘上极力抵抗。但是，比利时军队在5月28日的投降，导致无法再组织有效的抵抗。于是，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多地救出龟缩在敦刻尔克的官兵。从5月28日到6月4日，由于海运和航空部门的人员、尤其是英国人的英勇行为，有33万人（其中包括英军的几乎全部人马和13万法军官兵）被运到了英国。但是，法国军队已失去了其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丧失了它的那几个坦克师，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现代的武器装备。从这一时刻起，法国已经输掉了法兰西战役。 854

也许，魏刚力图依靠索姆河与埃纳河重建一条可与马奇诺防线相连的防线。但是，他只能以人数缩减、装备陈旧的部队去迎战因为连连取胜而士气正旺的德军。他的防线在6月5日受到攻击，在6月7日即被无法挽回地突破。让命运变得更为残酷无情的是，墨索里尼在10日宣布参战。如果说他自开战以来小心翼翼地保持一种中立的姿态，那么在此时，他以为胜负已定，并希望“坐在征服者的座位上”。此举对法国打击甚大。因为意大利人的进攻迫使法方得对付一条新的战线，由此势必大大削弱其对真正的对手的抵抗。崩溃自此开始。10日，政府撤离已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巴黎；14日，德军进入巴黎。从5月份起在比利时、法国北部和东北部省份开始的逃难的浪潮，蔓延至法国绝大部分地区。数以百万计年龄不一、身份各异的难民，为了躲避战火与入侵，壅塞在公路上。然而，战火无处不在，入侵接踵而来。逃难的人流使得最后的抵抗陷于瘫痪，因为它造成了交通阻塞，并让恐慌情绪四处传播。在几天的时间里，德国摩托化部队的踪迹遍布全法。其间，他们只遇到了一些“阻碍”，即有人进行勇敢的

抵抗。对此，德国人往往是不放在眼里或绕道而行。就这样，德国摩托化部队到达了布列塔尼，越过了卢瓦尔河，向波尔多，即法国政府避难的所在地猛扑；往东，他们经由朗格勒高原，直至瑞士的边境线，对已经撤空的马奇诺防线形成包围之势；在罗讷河流域，他们从后面对驻守在阿尔卑斯的法军发起了进攻。实际上，法军已不复存在。这场战役有10万人死亡，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战斗的激烈。但是，也有200万人成为战俘。

停战

因这一巨大的灾难而惊呆的法国人已失去了对事件的判断能力，但是，他们的领导人还得对这一切的后果加以判定。从5月25日起被提出的一个问题，自6月10日后已无法回避，这一问题是：如果像所能预料的那样，法军被彻底打败，领土被完全占领，那么，政府该如何行事？于是，立刻就出现了两个阵营的对峙。魏刚将军指出，已无法继续进行战斗，并请求政府承担起要求停火的责任。他得到了保尔·雷诺总理为提升国人的信心而召入内阁的贝当元帅的支持。但是，雷诺总理否决了想要投降的想法；他希望继续忠诚于法国的盟国，并在无法再在法国本土进行战斗的情况下在北非继续进行战斗。许多部长在这两派之间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他们忍受着外部的压力，尤其是来自支持停火的赖伐尔与达尔朗的压力。最后，已心灰意冷的雷诺在6月16日提出辞职。共和国总统勒布伦一丝不苟地遵照政治体制的惯例行事，把权力授予了贝当元帅。自17日起，贝当向法军各部宣告：“是停止战斗的时候了”，并派人向希特勒转达了停火的要求和签订和约的条件。由于深信在法国崩溃后，英国不会再继续进行一种徒劳无益的斗争，他对马上签订和约抱有希望。但是，希特勒却不想这样，他所要的是确保法国的屈从，以及最终进攻英国的手段。这就是6月21日向被召至停在雷通德林中空地的福煦元帅专列的车厢中的法国代表团提出的停火条件的含义。德国占领了法国一半多的领土，即整个东部、北部，直至卢瓦尔河的中部，以及从敦刻尔克到巴约讷的沿海地带；法国得负担占领军所需的费用；法国军队宣布遣散，交出

其所有的装备；法国只能拥有一支10万人的负责治安的部队，即“停火军”；战俘须待和约签订后才予以释放。这些条件苛刻之极，且不容任何讨价还价：这是一种强迫订立的条约。不过，希特勒后在两点上作出了让步：不向（法兰西）帝国提出任何要求；不要求交出舰队，解除武装的舰队仍留在其停泊的港口。希特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担心会有这样的危险存在，即若提出过高的要求，法国的舰队会与英国海军联手，从而给英国海军带来一种难以估量的支持。

855

于6月22日签订的停火协议在与意大利签订一项类似的协议后才算完善，它们的生效日期均从6月25日开始。这一协议自签订以来就成了以下两派争论的对象，一派认为签订停战协议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另一派则认为，在法国本土之外继续进行战争是可能的。历史研究无法提供可对这样一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争论作出裁决的论据。但是，不管它究竟如何，停火标志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期，而且，在其后的日子里，它还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最初的后果

在外交领域，停火使局势出现了一种让英国极为不安的大转变。当保尔·雷诺还在台上时，在5月10日出任首相的丘吉尔已经发表了许多对被打败的法军表示同情的言辞，并毫不掩饰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将继续战斗的决心。不过，贝当与其以“敌视英国派”著称的出谋划策者，即赖伐尔和达尔朗，却并未因此而对丘吉尔产生任何信赖之情。虽然希特勒曾庄重地宣布，其“无意于在战争期间为德国的目的而利用停泊在处于德方控制的港口中的法国舰队”，但丘吉尔怎么会相信希特勒所说的话呢？在物资匮乏的状态中，以及面对德国入侵英伦的威胁，英国将法国舰队会被德国所利用的危险视为心腹之患。丘吉尔决心极力避免这种危险的出现，甚至不惜为此动用武力：7月3日，丘吉尔责令停泊在奥兰锚地中的麦尔斯－埃尔－克比尔的法国舰队在6小时后要么开往英国，要么驶往一个安的列斯的港口，要么自行凿沉；因法国舰队拒绝服从此令，英国舰队遂向其开火。在短短的时间里，法国舰队失去了其主要力量，有1300名水手在战斗中丧生。

丘吉尔如释重负，而法国民众却因此甚为激愤。人们谈到了复仇。此事至少导致了与英国的决裂，并打开了与德国合作的道路。

在法国国内，大量的平民在逃难，他们没有地方可住，没有食物可吃，还遭受着敌机的扫射；而那些已经不再接到命令、不再有长官管束、与部队失去联系、且已因法军的无能斗志全无的散兵游勇，则怀着解脱之情来迎接停火。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没有抵抗。对于曾经历过 1918 年光荣岁月的老战士，尽管有贝当元帅作出的保证，他们仍极度痛苦。而在雷诺政府最后一次改组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戴高乐将军却拒绝屈服。他来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在 6 月 18 日通过广播发出了注定会载入史册的呼吁：

"……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与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但是，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数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因为，法国并不是孤单的。……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它还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充分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今天我们因机械化部队力量不济被打败了，但我们还能够嘱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正处在危急关头。"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856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听到这些有预见的提法的法国人并不多，而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则更少。在最初的时候，没有任何重要的军事首领、知名的政治家投奔戴高乐。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除了赤道非洲，（法兰西）帝国仍效忠其宗主国。在这段时间里，政府迁到了处在"自由区"中的维希。

在那里，贝当元帅愈来愈多地受到皮埃尔·赖伐尔的影响，后者已把其他所有老资格的议员与权力隔开。7 月 10 日，国民议会在维希的一家俱乐部中举行会议，并以 569 票赞成、80 票反对、18 票弃权的结果，投票通过修改宪法并授予贝当全权，以便制订新的宪法。如同在 1815 年和 1871 年，战败导致了改朝换代。从各种观点来看，法国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被压榨和划分的法国

英国没有屈服，战争在继续。它甚至伴随着德国进攻苏联（1941 年 6 月 22 日）和日本与美英交战（1941 年 12 月 7 日）而成为世界大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法国又怎么可能停留在远离这一已涉及各个大陆，并扩展到地球的各片海域的悲剧性事件呢？不过，至少直至 1942 年底，法国对于种种事件的影响甚微，它在经受这些事件时，既无法引导它们，也无法使其改变发展方向。

德方的要求

停战协议的条款颇为苛刻，它们实际上置法国本土任由德国摆布，而它们的实施，则随着德国在战争中的需要，变得愈来愈严厉。

胜利者最初的姿态清楚地表明了其意图：眼前，先让法国继续处在虚弱无力的状态；未来，再使其成为一个二流的国家。在被占领区，德国军事管理机构在各个领域里均要人们服从自己并进行干预；它操纵着法国的官员，这些官员因实施德国人规定的措施而声名狼藉。对于维希政府，它广泛地运用其拥有的手段来施加压力。“自由区”与“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边境线，这条边境线的管制是如此之严，以至于有时侯就连维希政府的官员都无法从维希到巴黎。但还有更为严重的情况。原来的阿尔萨斯－洛林的三个省立即被并入了德国，并由德国官员治理。在这里，法语被禁止使用，“不受欢迎者”被粗暴地驱逐出境。德方还无视停战协议条款的限定与贝当等人的抗议，进行了一些不甚明目张胆的兼并活动。北方省与

加莱海峡省在行政上被并入了由德国人占领的比利时。在东北，从庇卡底到洛林，被划出了一个“禁区”，在该禁区范围内，那些在逃难时曾出逃的居民不得重返家园，他们留下的土地，则由德国的耕作者来耕种。这难道不是此地将在未来成为德国领土的迹象吗?

随着战争进程的延长与范围的扩大，德国急需更多的物资。因此，它从财政、经济、人力等各个方面来充分地利用法国的资源。此外，与此同时，它还得确保在法国的秩序、驻扎在法国的德军的安全等等。857 于是，德国奉行了一种首先以利益为重的现实主义的政策，法国由此经受了不折不扣的洗劫。它不得不支付每天高达 4 亿法郎的占领费用——这一数目供养 1000 万人绰绰有余，以及签订一项清算协定，该协定导致巨额的钱财从法国转到了德国。德国人用这笔钱购买了种种它无法征用的物品。戈林所收藏的那些著名的艺术品，就是靠这些钱来购置的；而一些德国的企业，则靠这些钱使自己成为法国企业占大头的出资方。后者是经济殖民的一种间接而阴险的形式。

但是，随着战争努力的加强，德国力图利用整个欧洲的各种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同样没有逃脱被强行征调的厄运。法国农民的小麦、土豆或牲畜，被用来供养德国的民众与军队，而各种各样的车间与工厂，则得为德国国防军提供装备与武器。当旨在使“欧洲的堡垒”免遭盟军入侵的著名的“大西洋屏障”在构筑时，法国的企业须在德方的高度监管下提供原材料、设备与劳动力。由此，一种统制经济在逐渐地形成，但它仅仅服务于德国的战争机器。凯特尔将军在 1940 年 9 月曾宣称：“对法国人的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动荡，我们不在乎。”

起初，由于有大量的法国战俘，加之有大量处境悲惨的人——他们当中既有平民百姓，又有军人，既有男人，又有女人——从东欧来到德国寻找工作，德国似乎尚不缺劳动力。但是，随着在东线的战争中损失惨重，为了及时补充健康的人以及提供总体战争所必不可少的物资，需要再到国外征招人员。法国不管其是否愿意，亦不得不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首先到德国去干活的法国人是一些自愿前往的人，他

们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为失业，有的是因为所在的企业因缺煤少电、没有原料而停工，有的则是为诱人的工作合同所吸引。但他们的人数无法满足需要。1942 年，赖伐尔希望以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来避免全面的征招：以 3 位自愿者来“顶替”一名将获得自由的战俘。但在德国人看来，这样做势必无法满足需要。于是，赖伐尔最后被迫在德方的要求面前退让，并通过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即强制劳动管理局充当起向德国输送劳力者的角色，该机构当时准备征招在 1920 年至 1922 年间出生的所有能去德国工作的年轻人。

德国人担心的另一件事是安全与秩序。当然，在被占领区中，军事当局拥有一切维持治安的权力。为此，它既可利用德国的宪兵，同时也可动用法国的警察；它还建立了一个专门执行特殊任务，即从事收集情报与反间谍工作的庞大的网络。除此之外，盖世太保等也经常插手这方面的事务。这些不同的警察很快就着手进行下列活动：搜查、逮捕、监禁，以及扣押人质（一些最早被扣押的人质在 1941 年 8 月被枪杀）。1942 年 3 月，随着警察头目卡尔·奥伯格受命总管这些不同的警察，这一体制得到了加强，德国的警察开始在自由区展开行动。

就这样，为了进行战争，希特勒力图从这个被榨取、监管、且已变得虚弱无力的法国获取其希望得到的一切。因此，他为何要听取有人提出的建议，在军事上与法国结盟，并为此冒险地去重新武装一个只可能极度仇恨他本人的国家呢?

法国人遭受的苦难

858

法国人在 1940 年 6 月抱有许多幻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深信，用不了多久，一切均会步人正轨：和约将会签订，战俘会遣返，昔日的生活会重现。那些人们曾以为是粗野不堪的德国士兵，似乎给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们举止得体，遵守纪律，乐于帮助逃难者与受灾者。这是微笑攻势……但人们很快就泄气了。

最初的忧虑与烦恼是亲人分离，家庭解体。无疑，逃难的浪潮刚一过去，人们即想方设法重返家园。但是，从此以后，在大部分家庭

里，不管是儿子、兄弟还是丈夫，总有人已经因成为战俘而不在家中；人们连续数月无法得到失踪亲人的消息。接着，人们借助其数量被严格限定的明信片来进行通信联络。“占领区”与“自由区”之间的联系，几乎不再是易于进行的事情。人们若要在这两个区域之间通行，必须拥有通行证，而这种通行证只有提出明确的理由才可申领，那些既没有耐心又没有手段的人往往无法得到它们；至于两地之间的通信，其使用的是“区间明信片”，上面只允许写一些简短而刻板的文字。各个家庭不仅仅是在感情生活方面受到打击。没有了已成为战俘者的工资，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而卖主与顾客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无法联系，又如何进行工作？

法国的经济逐渐地陷于瘫痪。除了德国的巧取豪夺，英国人实行的封锁也加剧了这一状况，后者导致种种原料和一些必不可少的产品无法运到法国。英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法国生产出来的东西立即会被德国用来进行战争。也许，法国的煤炭生产直至 1942 年仍维持在战前的水平，直至 1943 年，其电力生产甚至还有所增加，但法国缺少汽油、肥料以及工业原料，如生产纺织品、油性物资和橡胶制品的原料，甚至连生铁与钢材，也因被大量用于德国的战争机器而匮乏。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领域的生产，统统都在大幅下滑。若以 1939 年为 100，那么在 1944 年，农产品只为 70，工业品只为 43。在生产下降的同时，法国还得忍受德国的大肆榨取，这种榨取最厉害时竟高达总产值的 40%。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到交通运输能力的不足。小汽车与卡车因汽油短缺在逐渐消失。已被迫将 1/4 的机车与 1/2 的货车车厢交给德方的法国全国铁路公司还不得不优先运输德国的货物；此种运输在 1944 年占去了该公司 50% 以上的运输能力；年复一年，民用的交通运输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稳定。

于是，法国人得开始学着在供应受到种种限制的状态下生活，而且，这种状况一年一年地在加剧。于是，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若干代用品——不过，若要满意于这些代用品，则需非常乐观才行。在使用煤气发生器的发动机中，木炭代替了汽油；各种各样的纤维，代替

了棉花或制衣用的羊毛；人们可在市场上看到不含任何脂肪成分的奶酪；人们还以“民族的合成品”之名分发用烤过的大麦原料制作的咖啡，以及会让人产生吃糖的感觉的糖精制品……但这一切丝毫无法真正地满足在吃穿和取暖等方面的基本需求。物资匮乏导致了配给制的出台。1940 年夏天，一个负责食物供应的机构应运而生。该机构负责配给面包、食糖、咖啡、脂肪性的食品、肉类、土豆、牛奶、葡萄酒……很快地，可以“自由购买”的食品不复存在。人人都发有供应卡，每领一次食物需撕去其中的一张票。当时还算很幸运的是，只要有票，在排长队之后总能领到食物。不久，冬天取暖用的煤炭，乃至人们穿的鞋子，也实行了配给。配给自然不会是平等的。在富裕的农业地区，以及总体来说是在农村，供应状况要好一些，其原因是当地的农产品由于缺乏运输能力而无法外运。但在城市，以及农业生产遭 859 到严重打击的地区，人们得忍受巨大的痛苦。平均而言，他们能得到的食物勉强达到正常要求的一半的水平。在巴黎，1943 年至 1944 年的冬天，肉类的供应量降至每月 300 克，而脂肪性的食品则为每月 200 克，而且，供应状况还颇不稳定。孩子缺少牛奶，鲜奶的供应经常会突然暂时中断，炼乳则需要医生的处方才能领取。大部分药品无处可寻。因营养不良而变瘦的人们受到了疾病的折磨；结核病患者增加了 30%。死亡率在罗讷河口省增加了 50%，在巴黎增加了 25%。西部农业省份的死亡率或许有所下降，这大概与强制性的限制使酗酒者减少有关。但是，这并足以抵消更大范围内的死亡人数。

物资匮乏，加上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人们承认官方的价格涨了 3 倍，但这些价格只能让人部分地了解当时的生活条件。因为，配给引来了走私、地下交易、“黑市”。这类非法买卖让那些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大发横财；此类非法买卖是堕落的祸根，同时，对于大多数贫困的人来说，它亦是让他们悲惨和痛苦的新的原因。

法国并不是中立国。不管其愿意与否，它得与占领者一起共同面对同盟国。在其考虑发动进攻之前，它首先得设法削弱德国人进行的战争带来的威胁，如盟军对工业中心、造船厂、潜艇基地的轰炸。港

口尤其成了被对方盯住的目标：敦刻尔克、勒阿弗尔、布雷斯特、里昂、南特以及圣纳泽尔，遭到了日益猛烈的攻击，但是，内地的城市亦未能幸免，巴黎即在1943年遭到攻击。据有人估计，在被占领期间，法国分别有6万人和7.5万人在盟军飞机的轰炸中死亡与受伤。那些往往也是处境悲惨的幸免于难的人，则被迫匆匆逃离他们已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城市。

其内心生活、爱情与理想未受到战争影响的法国人很少，但最惨的还是犹太人的命运。自1940年起，德国当局与维希政府对他们实施了歧视性的措施，这些措施力图把他们清除出法国人的共同体，并最终将其灭绝。犹太人被清除出了行政机关，他们的财产被剥夺；禁止他们参与绝大多数的活动；他们得用特殊的标记，即黄颜色的星形来标明自己的身份，从1942年6月起，他们必须佩戴这种标识，他们还会受到德国与法国警察的跟踪。在城市，人们进行了系统的大搜捕。在巴黎，就有13000名犹太人——他们当中有男人与女人，大人与小孩——在1942年7月16日至17日的夜间被逮捕，并被关入临时监狱。许多监禁营在向犹太人开放：在巴黎郊区，他们被关入设在德朗西的监禁营，随后，其中的大部分人被从这里押到贡比涅，又从贡比涅押往设在德国的死亡集中营。在这种种族迫害中受害的人数大约为8.5万人。

合作分子

某些法国人接受服从于胜利者及其要求的作法。他们与占领者进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程度上都存在差别。对于某些从事不正当交易者来说，“合作”就是通过帮助德国人劫掠法国做些赚钱的买卖。他们在黑市交易中，以及掠夺犹太人和被逮捕或逃走的爱国者的活动中充当中间人；他们暴露了自己的庸俗，显得不择手段，但又缺乏度量。而对于许多其他的人来说，合作是一种政治投资。那么，它是忍受胜利者的耀武扬威并屈服于武力的懦弱者的投资，还是把宝押在纳粹德国会最终获胜上，并且认为他们的利益——或许也是国家的利益——与此息息相关的善于算计者的投资，

抑或是那些坚定地谴责无能的自由主义与具有破坏性的社会主义，反对犹太人，反感英国人，并被秩序、纪律与元首的神话所引诱的人的投资呢？也许，上述的各个方面都汇集在了一起。人们当时可以看到，纳粹主义的宣传在战前法国的潜在影响已经到了何种地步，因为从极左到极右的所有派别，都在五花八门的合作形式中有所表现。这些派别虽然始终规模不大，而且彼此敌对，但由于有来自德国的支持，却并不缺乏钱财。他们代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流派。源自战前的一些“集团”的法国法西斯主义传统，尤其同样存在于这样一些团体和人物身上：《我无所不在报》的编辑人员（其中包括从“法兰西行动”出来的罗贝尔·布拉齐拉克），多里奥为首的法兰西人民党，以及像德里厄·拉罗歇尔和塞利纳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与之相对的带有左翼色彩的传统中，则可以列出某些像杜穆兰那样的工团主义者，以及以马塞尔·戴阿最为著名的一些政治家。后者在战前就发起了专制型的新社会主义运动；他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人民民族联盟；在其创办的报纸《事业》中，他不仅强烈地攻击了所有“新秩序”的敌人，而且还在个别情况下攻击维希政府及其统治。这些被德国人牢牢控制的在巴黎的合作分子，自然可以很好地用来对贝当元帅及其政府施加压力。 860

与德国的关系实际上是维希政府的大事。这种关系曾经是，而且还将是激烈的争论的对象。仔细地审视这些争论提出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很有必要。

维希政府

在国内，贝当元帅及其亲信希望采取与第三共和国不同的做法。他们以“劳动、家庭、祖国”取代了共和国的座右铭。他们在大张旗鼓进行的宣传中严厉地谴责已经堕落的制度，以及所有人们认为该对战败承担责任的人：议会制度、各个政党、犹太人、共济会成员……随之而来的是在设于里奥姆的特别法庭中起诉勃鲁姆、达拉第、雷诺、甘默林等人，其罪名是导致了战争或输掉了战争；不过，因为得把对上述人士的指控改为反对希特勒的政策，这一诉讼不得不匆匆地中断，

取而代之的是对他们实行监禁的行政决定，这一决定显示了作为国家元首的贝当的绝对权力。

贝当元帅实际上僭取了所有权力。他任命和撤换政府的部长，无须征求众议院或参议院的意见就可作出决定。他企图同时充当其职责分别是保护与引导法国人的“家长”与“首脑”。

他所建立的制度是一种带有家长制色彩的独裁制度，让他在这方面得到启发的当推葡萄牙的萨拉查。他的抱负是依据最为传统的过去的样式来重建法国，也就是建立一个由乡村贵族领导、处在合作主义和实行等级制度的结构中的农民的与基督教的法国。这场在改变制度的同时亦改变道德风尚的“民族革命”，仅仅产生了诸如《劳动宪章》之类的昙花一现的产物。尽管存在领袖崇拜、青年人在“青年工地”的聚会，以及老战士在“军团”中的汇合，对这场运动影响更大的与其说是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毋宁说是“法兰西行动”。逐渐地，从1942 年开始，尤其因局势所迫，这一体制日益向纳粹的模式靠拢，其突出的表现有加强治安措施，实施“非常法”。不过，它从来没有与后者完全相象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维希法国并未完全与希特勒的德国保持一致。

861　与德国的关系

在涉及维希政府的对外关系时，情况显然有所不同。人们难以知晓贝当在这一领域的真实意图，因为他从未和盘托出内心的想法。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希特勒因无法直接打败英国而希冀建立一个针对英国的地中海联盟，并把贝当元帅的赞同视为该联盟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时，贝当没有拒绝主动接近德国，由此，就有了在蒙图瓦尔举行的法兰西国家的首脑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之间的历史性会晤（1940 年 10 月 24 日）。那么，当贝当向国人宣布：“我在今天迈入了（与德国）合作的道路”时，他是否已经决定该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这种有限的合作是否只是限定在行政与经济方面（停战协定实际上已经规定了这方面的内容），还是走得更远，也就是还进行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合作，甚至最终进行以英国为敌的军事合作？

这种确实模糊难辨、且注定依然如此的约定，难道仅仅是一个走投无路的弱者为寻求生机被迫签订的城下之盟？一种通过哄骗获胜者来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抑或一种同时既诡诈又天真的观望主义的形式？贝当当时的所作所为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姿态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当他呼吁国人团结在其周围时，他因为自己的言行让积极主张与德国合作的人得到鼓舞，同时却让反对此举者感到愤慨，引起了法国人内部的分裂。他曾宣称：“这一政策是我定的，……历史将审判的只是我本人”。此言表明，他愿意对其举动引发的种种悲剧承担责任。

在这一根本问题上，贝当周围的那些人远未达到意见一致。一方面，魏刚将军虽坚决反对与德国合作，但同时又出于对贝当的忠诚，拒绝听从与德国为敌者的种种建议。曾把魏刚置于自己的政府之中的贝当在 1940 年 9 月将他派往北非担任总代表。然而，德国人却要贝当在 1941 年 11 月将魏刚召回。他们随后逮捕了魏刚，并在 1942 年 11 月将其流放。另一方面，两位相继担任政府首脑的人却明确地决定，要在与德国合作的道路上尽量走得更远。前者是曾在维希飞扬跋扈的赖伐尔。他在 1940 年 12 月 13 日曾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突遭解职，却又在 1942 年 4 月重掌权柄。也许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他在重新上台几个星期后，毫不犹豫地公开宣布：“我希望德国获胜”。后者是在弗朗丹短暂地掌权后上台并执政至 1942 年 4 月的达尔朗，他使维希法国日益地站在德国一边重新参战。1941 年 5 月，他同意帮助德国人去支持刚刚起来反抗英国的伊拉克，并为此签订了允许德国人利用在叙利亚的飞机场以及在比塞达和达喀尔的基地的巴黎议定书。这一协定实际上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因为希特勒无法充分地信任法国并同意它重整军备，与此同时，它也在法国遭到强烈的反对。不过，达尔朗的举动导致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为了阻止德国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落脚，自由法国的部队在英军的支持下，把听从维希政府命令的驻军从这些地方赶走。这种悲剧性的对抗是贝当政权赖以生存的暧昧态度导致的直接后果。

这样一种政策不可避免地让法国人深为心神不安。但在 1940 年，绝大多数法国人站在了这位对他们说“我愿为减轻法国的不幸而献身”的老者一边。他们感到幸亏有了他，法国才没有完全地任由胜利者摆布。他在未被占领的南方地区，仍然长期深孚众望。其强调秩序与道德的纲领，让资产阶级与教会心满意足。那些有可能反对该纲领者，皆为迷失方向、无所依傍与没有能力之辈。除了官方建立的组织或团体，所有的政党、工会与协会不复存在。不过，即便当他们是“贝当主义者”时，几乎所有的法国人仍持反对德国的立场。他们将显示出这一点：起初还有点畏畏缩缩，后来则变得越来越直截了当。

862

抵抗者

注定会受到欢迎的“抵抗”一词，由戴高乐在 1940 年 6 月 18 日第一个使用，这种对德国的反抗首先在国外得到显示。在伦敦，戴高乐把那些拒绝投降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并将他们冠名为“自由的法国人”。起初，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随着一些志愿者的到来，其队伍逐渐扩大。这些志愿者均为戴高乐从伦敦的电台发出的呼吁所打动，他们在逃离法国时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人员不足、缺乏各种资源的戴高乐表现出一种难以制服的力量，宣称自己代表一个与不合法的、失败主义者的政府相对的法国，而这一政府则匆忙地让人判处戴高乐死刑。戴高乐曾试图通过在达喀尔登陆在帝国扎稳脚跟，但未能如愿。这一失败突出地暴露了他的弱点。但是，丘吉尔政府始终对他施予援手。逐渐地，归附于他的人越来越多。不久，他得以组建一支军队，这支军队从 1940 底开始投入战斗。1941 年初，勒克莱尔上校率领一支装备严重不足的部队从富尔－拉米出发，穿越了长达 1600 公里的沙漠地带，打败了盘踞在库福拉堡垒的意大利守军，并发出了“库福拉誓言”：“我们只会在法国的旗帜也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上空飘扬时，才停下步伐。”1942 年 5 月，柯尼格将军率领一个旅，在 16 天的时间里，在比尔哈凯姆顶住了隆美尔指挥的德军的猛攻，并由此使在利比亚陷于混乱状态的英国人得以重新组织起来。这些更多地是在精神上而不是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功绩，证实了法国军事力量的恢复。

1942 年 6 月，自由法国的军队已达到 7 万人之多，且斗志昂扬；他们构成了未来的法国军队的核心。

但是，与此同时，在国内也出现了自发产生、没有经验、缺乏组织的抵抗。因为始终得面对敌人，这种抵抗尤其在被占领区变得较明显。抵抗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它们开始时是被动的，后来变得越来越主动。起初，它几乎仅仅是一种不满：人们装作不理解占领者颁布的规定中的条款，或执拗地不把它们当一回事，并对它们加以嘲笑。人们学得不再惧怕高压手段。例如，尽管有德国检查部门的干扰存在，人们仍养成了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 B. C.）的电台的习惯，而且这种收听并非始终只是为了想知道“对法国人说话者”究竟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不久，人们对那些从设在法国的临时营地逃出来的战俘，或是通过秘密的逃跑渠道从德国逃回来的战俘提供帮助。这已经是一种明显的介入和有组织的活动的开始。在这之后，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去帮助所有被当局当成嫌疑分子的人，尤其是犹太人。渐渐地，抵抗形成了更为主动、更加有效，同时也更为危险的形式，如编印和散发传单、报纸。这些传单、报纸力图揭穿柏林的宣传机构、有时也包括巴黎的宣传机构制造的谎言，并通过显示自己在高压统治下的存在以及进行的不可忽视的斗争等等，向人们提供抱有希望的理由。人们还组成了情报网，耐心地，但却是投入地去刺探、收集一切与敌人有关的情报，并通过各种途径将这些情报转到伦敦。最后，则更有了直接的行动：进行破坏、暗杀活动，或在山区、丛林展开游击活动，等等。这些活动扰乱了占领者的部署，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并使其战争机器运转失灵。这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即颠覆性的战争。抵抗者们在缓慢地，而且往往是不是很灵光地学习如何进行此种战争的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早在 1940 年就有了最早发生的反抗德国人的示威游行，11 月 11 日，一些大学生高呼“戴高乐万岁”的口号走遍香榭丽舍大道。深感意外的德国人对此反应乏力。但是，很快地，抵抗者们或是因为看法相同，或是因为工作中的相互联系而聚集在了一起。各种组织应运而

863

生。这些组织有的才初步形成，力量薄弱，有时还因受到镇压迅速地损兵折将，有的则更为巩固，但它们都不甚稳定。这类组织在北方地区成立得要多一些，因为在那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端不断地为此提供新的契机或动力。如在对 1914—1918 年间的占领的记忆依然根深蒂固的里尔市，就存在着“北方之声”、“抵抗者”、“保卫法国”、“解放北方”以及其他许多组织。在南方地区，抵抗运动不像在北方那样更多地向直接行动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眼于未来的组织与问题的方向发展，其抵抗运动更具有一定的结构。它们当中较为突出的组织有“自由射手”、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参与的“解放南方”，尤其是亨利·弗雷内发起的“战斗”。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这些抵抗运动都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首先是因为德国获胜的前景变得更为遥远，同时也是因为法共从此以后有力地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抵抗运动。对于抵抗运动，法共不仅带来了大量的人员，其积极分子的信仰，而且还带来了它自 1939 年遭禁以来形成的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

“在夜间活动者”

抵抗运动成员从事的是地下活动，他们亦被称为“在夜间活动者”。这些人得学会在危险的处境下生活，因为他们的活动往往属于“违法”行为，如伪造假身份证、制作假的食品供应卡，等等。他们一般不得不保留一种循规蹈矩的外表，但实际上却往往为了完成任务或逃避警方的缉捕而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们会因偶发事件、自己的轻率或被人告发而遭殃，等待他们的是监禁、拷问、受刑队，或送到在德国的集中营并在那里被慢慢地折磨至死。根据抵抗运动牺牲者名册的记载，计有 3 万人被枪杀，10 万余人被送进集中营，其中的大多数人死在集中营或在从集中营出来后不久一命呜呼。这是整个民族在进行的抵抗。各个社会阶级、各种意见、各个地区，均交织在一种令人动容的同仇敌忾的场景之中。

在这些互为补充的抵抗运动的形式中，人们所期待的统一迟迟没有完成，必不可少的协调亦一度难以实现。国内的抵抗运动很快具有了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的出现会对抵抗运动的统一产生不利的影

响。因为，抵抗运动在抵抗德国的同时，亦与维希的行政机构、警察部门和司法部门产生冲突，于是，它很快就得考虑在战后该以何种制度来取代贝当的法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的抵抗组织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组织都倾向于保持独立，以便在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和享受成功的果实时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这一切绝非戴高乐将军所愿。在他看来，自由法国不可能仅仅是其难以避免需要外国支持并受其利用之风险的纯军事的运动。对于已遭受战败、其种种利益有待捍卫的法国来说，它应当在胜利到来时显得像一个拥有一切政治、军事、外交特权的国家。为了能让盟国承认其代表法国，戴高乐得把所有的法国人均聚集在自己周围。就此而言，其需操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统一抵抗运动，并让人们承认他是统一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在历经艰难的讨论，以及种种困难和波折之后，戴高乐达到了这一目的。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让·穆兰的努力，因为后者成功地在其领导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中汇集了各主要抵抗运动以及地下政治组织的代表（1943 年 5 月 27 日）。在此之后不久让·穆兰被捕，并被折磨至死。但在他牺牲时，法国的抵抗运动已经具有足够的分量，使盟军在解放法国时不可能把它撇在一边，并足以担负起重建法国的重任。

三、得到恢复与解放的法国

864

盟军在北非登陆及其后果

1942 年 11 月 8 日，一支由 800 艘海船组成的英美舰队所载的 75000 人在北非海岸登陆，法国与德国当局对此大感吃惊。该船队所进行的是代号为“火炬”的行动。这一行动虽然不是根据法国的利益来决定的，但却标志着法国进入重新积极参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

此项行动的准备工作非常不充分，这导致了种种严重后果。盟军当时担心的问题之一是会遭到法国人的武装抵抗，而这种担心绝非没有根据，因为在北非的法军、行政部门以及移殖民都忠于贝当，并极

为仇视英国人和戴高乐。鉴于这种情感因素，英国人遂为美国人让路，同时让戴高乐对此项计划一无所知。为缓解敌意和设法获得支持，盟军的指挥部作了许多努力，但它在为此与多位重要人物接触的过程中，因为担心会传到完全忠于维希政权的军事首领和高级官员的耳中，始终拒绝透露其确切的方案。这一保密工作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当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时，当地一小批忠于盟国的事业的人们觉得很难对他们的朋友提供有效的帮助。美国人觉得应当确保得到吉罗将军的配合。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选择没错。吉罗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这一威望因其前不久从德国逃出来——他从1940年5月起一直被关押在德国——又有所提升。同时，他还以极端仇视德国人著称。但是，吉罗完全缺乏经验，甚至完全没有政治意识。效忠贝当的他一方面公开地赞同民族革命，另一方面却激烈地反对合作政策，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没有让他感到难堪。他瞧不起不具备经典的军事结构的地下活动，并天真地幻想能获得盟军的统帅大权，以便从地中海沿岸出发去收复整个法国。他对等待着他的角色缺乏准备，他与美国人签订的协议既含糊不清又不够具体，这又将增加种种困难。

当登陆行动进行时，法国人与盟军之间的冲突无法避免。但这种冲突至少是得到了限制。在第一天就为了阿尔及尔而签订的停火协议，其适用范围随即扩大到了其他双方产生接触的地方。英美军队控制了从摩洛哥到阿尔及尔的沿海地带与内地，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行动扩大至比塞达，这使他们少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基地。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上，这次行动显得令人失望，并采取了出乎意料的策略。与原定计划相反，吉罗在登陆行动开始时未在阿尔及尔，而是被留在了直布罗陀。在那里，他与担任此项行动总指挥的艾森豪威尔讨论着该以何种组织形态来指挥各个盟国的军队。但是，始终作为贝当被指定的继任者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却因某些偶然的、纯粹与家事相关的原因，出现在了阿尔及尔。于是，美国人临时把他拉来展开停火谈判。达尔朗机灵地利用这一处境来了个惊人的大转变。他在没遇到多大困难的情况下，即排斥了一心只想充当军事统帅的吉罗。达尔朗利用了其与

贝当私下达成的协议，这一协议至今仍争议颇多，因为人们无法肯定地知道，作为国家元首的贝当与他达成这一协议，究竟是为了抵抗入侵者还是为了停止这种抵抗。不管它究竟如何，在美国人眼里，达尔朗显得像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于是，他们急急忙忙地承认他是"事实上的掌权者"。

这一富有戏剧性的"继位"立即引发了重大后果。起初对此颇为惊讶的希特勒在反应略慢后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下令实施了为对付类似的局面而预先制订的"阿提拉计划"。11 月 11 日，德国国防军开进了南方地区并占领了法国全境，毫无战斗力的"停火军"先是被解除武装，继而又遭遣散。法军剩下的唯一兵力是集结在土伦港口的舰队。这支舰队难道不会冒险响应达尔朗的召唤并站在阿尔及尔的那些人一边吗？对此，希特勒疑心重重。尽管他曾允诺不会采取任何有损于该舰队的行动，仍在 11 月 27 日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因不愿投降，整支舰队上演了沉船的悲剧。此举使舰队避免了落入敌人之手，但对法国来说却没有任何好处，而维希政府更是失去了它还保留的最后一张王牌。与此同时，希特勒匆匆忙忙地派兵占领了突尼斯——盟军此前因为有所顾忌以及缺乏合适的手段不敢将突尼斯纳入自己的计划。由优柔寡断的指挥官指挥的手足无措的法国军队依然消极被动。突尼斯与比塞达由此落入了德军的手中，德军还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坚固的桥头堡。在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的同时，维希政权也失去了对整个非洲的控制，因为西非站在了达尔朗一边。既无军队又无舰队，失去了帝国，全部领土被人占领，其首都亦处在敌人的控制之下，那么，维希政府还剩下了什么？它的主权只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虚构。贝当元帅拒绝采取许多法国人希望他采取的姿态：赢得非洲，并站在盟国一边，或至少是放弃一种此后不复存在的权力。为了继续保护法国人，他仍坚持其在 1940 年时采取的态度。事实上，已丧失所有权威的他不得不任由赖伐尔掌管事务，而后者不管怎么说，已纯粹是占领者的意志的执行者。贝当政府将处于一种屈辱和悲惨的境地，这种状况一直要持续到 1944 年 8 月。是时，面对盟军取得象征着法国获得解放的进展，

865

贝当本人亦不得不到德国流亡。

复兴

在二战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发生的盟军在北非登陆，对与法国相关的事务而言，也是个主要的转折点：法国开始复兴。但是，这种复兴的产生并非毫无困难。美国人对在阿尔及尔的达尔朗政权的承认，对于自由法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或许，罗斯福只是将此作为“权宜之计”，但此举亦证实了他的总体态度，即只与地方政权打交道，拒绝任何人，尤其是戴高乐以法国的名义说话。这种态度也许有利于进行他所设想的战争行动，但对法国的利益来说却危险之极，因为它有可能使法国的利益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维护。那些在1940年支持盟国的事业的人，在看到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竟然借助不知羞耻的背弃大权在握，只会感到愤慨。在维希政权的拥护者人数颇多的阿尔及尔，局势动荡不安，有人怒火中烧。12月24日，一位年轻的戴高乐的支持者刺杀了达尔朗，但形势并未就此变得简单明朗。刚刚设立的殖民地总督会议选择吉罗充当达尔朗的继任者，而这一选择只会让美国人心满意足。吉罗的纲领把所有政治问题皆撇在了一边，“以胜利为唯一的目标”，这让美国人可以自由行事。与之相反，在戴高乐看来，形势岌岌可危。在阿尔及尔设立一个与在伦敦的自由法国权力机构分庭抗礼的独立的法国权力机构，让他难以接受。而且，他也无法与拒绝反对维希政权的吉罗和衷共济。迫于丘吉尔的压力（而丘吉尔本人又是迫于罗斯福的要求），戴高乐不得不在卡萨布兰卡当着英美两国这两位领导人的面与吉罗会晤。不过，这两位将军的握手言和纯属表面现象，实际上任何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戴高乐始终觉得，由于自己具有的人格力量、其位置所决定的思考方式，以及抵抗人士的支持，他注定在最后压倒吉罗。在这一过程中，两人之间时有令人难受的争吵，而在英美等盟国看来，此类争吵并无助于提升法国的威望。

866　经过漫长的、旨在强调其共同之处的预备谈判，戴高乐来到了阿尔及尔，与吉罗组成了由他们两人担任双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

会。实际上，同时还保留总司令头衔的吉罗逐渐地在停止发挥政治作用，并最终在1943年11月被完全排除在外。戴高乐于是成了作为名副其实的政府行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为了通过依靠尽可能多的法国人参与来加强自己的权威，他设立了一个有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及各抵抗运动的代表参加的议会。他不仅在自己权力所及之处废除了一切由维希政权采取的措施，而且还为未来作准备，亦即随着全国得到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重建秩序与独立。于是，他清除与惩罚了所有与敌人合作者，设立了新的行政管理机构，并确保内地与海外的抵抗运动之间的合作。他认为，法国应当显示自己有能力立即进行有效的治理，以此避免盟国曾考虑要强加于法国身上的军事管制，后者最明显，也许亦是最令人不快的迹象之一是，美国的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好了占领时使用的货币。他的卓有成效的行动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享有足够的权威，以至于它在1944年5月觉得能够通过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来开启一个新的阶段。

自由法国的军队

这一复兴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法国军队的重生及其参与解放法国的战斗。重新组建一支法国军队并非易事。至少从心理与人员的角度来看，它首先涉及到让来源各异的士兵与军官相互接近，乃至尽可能地融为一体。这些官兵有的是戴高乐最早的支持者，有的是勒克莱尔的追随者，有的是跟随吉罗的维希分子。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曾在叙利亚打过照面，但要他们协调一致却不容易。这一问题此后又因大量来自国内抵抗运动的人员加入这支战斗队伍而变得越发复杂，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尚需假以时日。眼前，创建一支能重新投入战斗的军队成了吉罗的当务之急。这支军队的人员主要来自北非与黑非洲，但要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去统率他们，始终困难重重。至于各种各样的物资与装备，人们只能指望美国的供应，这又势必会引发是否合适的问题。此外，美国人得优先保证自己的需要，同时他们还想把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强加于法国人，即让一小部分人员装备精良，并享受到非常到家的服务。最后，还得加上这一点，这就是在同盟之间展开的战争中，

必然会出现的协调、指挥方面的困难。凡此种种表明，这一任务特别的棘手。不过，事情进展得还算顺利。因为，人们最终在法国本土之外组建和装备了一支超过 50 万人的军队，其中有一半人在后来组成了远征军，加入了在意大利和法国进行的战役。但是，法国军队不可能等到被恢复到足以参战的程度。德军入侵突尼斯迫使他们得立即采取行动。在 1942—1943 年冬天初次参加战斗的那支法军是一支临时组成的队伍。他们是在格外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地形多变，天气恶劣，武器装备匮乏，队伍缺少训练。除此之外，在开始的时候，因为被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法军与盟军之间在指挥方面协调不够搞得手足无措，其指挥官们一度犹豫不决。法军在冬季进行的防卫战在突尼斯山脊顶住了德军的进攻。在这之后，由朱安将军指挥、此时已加入盟军的非洲军，在春季的战役中亦表现出色。这一战役最终导致了轴心国在突尼斯的部队全军覆没。

867

地中海重新变得可让盟军进入。在西西里岛的登陆，攻入意大利，以及巴多里奥政府的投降，凡此种种，开启了新的前景。吉罗遂希望借此在无须盟军合作的情况下，纯粹依靠法国自身的力量来解放科西嘉岛。为此，他甚至故意不与盟军通气。为解放科西嘉岛，人们积极地进行着准备。其中，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的内地的抵抗力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有一支“突击队”参加了战斗。科西嘉岛很快就从意大利和德国占领者的手中获得了解放（1943 年 9 月）。就军事层面而言，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并不大，但在精神层面上，科西嘉岛的解放——它是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宗主国中的省份——产生的影响却非同小可。

从 1943 年 11 月开始，一支法国的远征部队进入了意大利。盟军在中央地区的行动可谓步履维艰。此地地势起伏不平，而且，德军还在此建立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古斯塔夫防线”。所有的正面进攻都以失败告终，尤其是在卡辛山周围发起的进攻更是如此。盟军在整个冬季因这种毫无结果的阵地战被搞得精疲力竭。正是摩洛哥人在被人认为是难以进入的山区实施了朱安将军的计策，才使得僵局终于得

以打破。从侧面发起进攻的德国人不得不撤退（1944 年 5 月 17 日），通往罗马的道路被打开，法国人在 6 月 4 日跟着美国的先头部队进入了这座城市。他们继续往北追击着敌人，并在为准备在法国南方登陆而从意大利撤出前，进入了锡耶纳。解放的时刻实际上已经临近。

解放

对于其联合司令部自 1942 年起就准备攻打欧洲的英美联军来说，解放法国只是其最终将导致德国投降的战役的一个方面。在他们所设想的这一有计划进行的战争中，美国人几乎没指望抵抗运动的帮助。而且，抵抗人士在政治上，亦难以让美国人信任。至于戴高乐将军，他们丝毫无意于去做任何会使他显得了不起的事情，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们才告诉戴高乐将要开始诺曼底登陆行动。

事实上，1944 年 6 月 6 日英美联军在诺曼底海岸的登陆行动所采用的海、陆、空兵力是如此之大，可能使法国人的武装力量显得不值一提。因为英国人在进攻卡昂时进展不大，登陆行动的开局并不顺利。在此之后，美国人突破了德国人在科唐坦半岛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的防线。盟军没有理睬在他们后面混乱地进行抵抗或在一些港口筑垒固守——某些港口的德军一直坚持到德军全体投降为止——的德军，而是以莱茵河地区为目标，用快于其司令部所预计的速度，继续向前快速推进：英国人是通过法国北方与比利时向荷兰和鲁尔推进；美国人则通过卢瓦尔河与塞纳河流域向洛林与萨尔推进。8 月 15 日，盟军在普罗旺斯的莫尔海岸进行第二次登陆，这一回，法国的军队，即德拉特尔将军率领的从意大利过来的第一军参与了行动。此外，这次登陆迅速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德国人不得不通过罗讷河流域撤退。9 月 12 日，分别来自大西洋与地中海的解放者们在奥顿地区会师。当在 11 月份盟军因天气恶劣和供应遇到困难而被迫停下来时，除了阿尔萨斯以及洛林的部分地区，法国已经得到解放。

6 月 6 日，戴高乐将军在诺曼底登陆行动开始时，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向法国人宣布："这是法兰西的战役，这是法兰西的战役。"实际上，无论是对戴高乐本人，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的战士，

868 还是对已经以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冒着生命危险为此进行准备的内地的抵抗战士来说，法国都不可能不参加这一标志着法国获得新生的战役。

内地的抵抗活动随着解放的希望日益明显而增强。它从盟军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帮助。在继续保留其地下活动的特性所要求的个人主义和分头活动的特点的同时，抵抗活动在组织程度上有所提高。无疑，人事或政治上的分歧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分歧在为了解放法国而进行斗争时会显得更加公开。但是，自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成立以来，共同的组织机构已经得到建立。属于内地军的抵抗运动战士须得接受一个军事行动委员会的领导。1944 年 4 月，戴高乐要内地军接受柯尼格将军的指挥，后者则在伦敦对他们发号施令。人们准备了多种行动计划："绿色计划"以摧毁敌人的铁路交通为目标；"蓝色计划"的行动目标是破坏电网；而"紫色计划"的行动目标则是切断电话通讯。人们甚至计划在山区设立集合的场所，并让它们充当动员活动的中心。年轻的游击战士自强制劳动营设立以来人数大增，他们将与所有的志愿者联手，共同参与种种至关重要的行动。要抵抗战士立即行动起来的呼吁实际上在 6 月 6 日发出。这一号召很快显得不合时宜，因为盟军提供的物质手段根本无法满足这种名副其实的"集体征召"的需要。这些力量依然没有得到好好利用，他们的英雄气概被白白地消耗。但不容置疑的是，抵抗运动在使解放者在行动时更为顺利方面所起的作用，超过了后者的预期。解放者们到处有人向他们提供情报，而敌人则吃尽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的苦头。破坏活动与伏击，让德国人步履维艰，倍受骚扰，并使他们因没有安全感而士气大跌。德军准确地掂量出了这种形式的颠覆战在心理和军事上带来的危害程度。他们遂在维希政府建立的"保安队"的配合下，对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称为"恐怖分子"者的活动进行报复。他们在大量地杀害游击战士，如在维尔科尔山地活动的游击战士在被德方误认为其获得过大量的外部援助后惨遭镇压。德军甚至还滥杀无辜，例如，他们在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的情况下，对奥拉杜尔－苏尔－格拉纳的居民实行了大

屠杀。这是一场在全法国范围内展开的残酷无情的斗争，人们很难对它予以总结。巴黎的解放堪称这一斗争中最为壮观的插曲，它将在整个世界引起反响。

迅速解放巴黎并非盟军计划中的内容，后者觉得，巴黎的解放在政治和行政方面带来的麻烦要多于好处。但在诺曼底战役获得成功后，由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发出了起义的号召：它涉及到向盟国和全世界表明，巴黎人民没有坐等外国人来拯救自己，他们能够解放自己。但在巴黎，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内地军缺少各种手段。而且，如果德军司令部真想这么做的话，它可以摧毁这座城市并镇压反抗者。临时政府的代表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同时，他们也害怕会出现一个与戴高乐政府分庭抗礼的起义政府。于是，他们不无痛苦地与正深受失败主义论调影响的德军司令部签订了“休战”协定。但是，国内的抵抗人士并不想尊重这一协定。最后，戴高乐让盟国同意改变其原定部署，以便使巴黎摆脱有可能酿成悲剧的处境。8 月 1 日，勒克莱尔率领的从英国带来的一个师获准向巴黎进发，并在 24 日进入巴黎。首都由此同时在分别来自内地和海外的法国人手中获得解放，而这两类人的会合则更是具有象征意义。在 6 月 14 日即来到首个被解放的城市——贝叶的戴高乐，表明了自己政府首脑的身份，并在巴黎安顿了下来。在此，没有人对他的权威提出质疑。

在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几周中，法国已摆脱了恶劣的处境，并显示出明显的复兴迹象。维希政府及其属下的行政管理机构土崩瓦解。已被德国人带至齐格玛林根的贝当与赖伐尔，此时已被当作没有任何权威的囚徒。在各地，原先处于地下状态的新机构，开始行使起行政管理的职能。为能包括内地抵抗运动的代表，临时政府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临时政府暂时恢复了第三共和国的法制体系，同时等待着与国人商议今后该采取何种制度的机会。在外国人眼里，临时政府不容置疑地是法国的合法政府，盟国于是亦同意承认它。

869

战争的结束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看，形势依然极为困难。尽管出现了令国人

振奋的巨大希望，但在法国人的记忆中，二战的最后一个冬季可谓过得最为艰难的冬季之一。战俘，强制劳动营的劳工，尤其是被关押在集中营者，其处境随着战火逼近德国边境日趋恶化。他们能够坚持到获释吗？这是其家人不能不感到担心的问题。物质生活处于困难的状态，定量配给制度的实行，即便不比德国人统治时更为严格，那也是同样的严格。盟军为登陆和解放战斗作准备而进行的轰炸，摧毁了整个交通系统。由于盟军需要操心的事情过多，以至于无法把保证法国人的食品供应放在一个重要位置。经济生活业已瘫痪。法国的解放也并非没有引发混乱，民众对合作分子采取的报复，有时导致了可憎的暴力行为，而临时组成的地方当局，亦可能试图利用施政方式的不稳定滥用其权力。不过，就总体而言，由于乐观情绪与普遍的热情，以及各抵抗组织表现出来的纪律严明，局势在迅速地走向正常。让某些人担忧的社会动乱并没有发生，而共产党更是率先呼吁法国人去工作。

在军事方面，德国人在诺曼底受挫后仓促地向东撤离。但在此时，如同其在敦刻尔克、洛里昂、罗瓦扬等沿海要地拼命抵抗一样，他们在洛林和孚日山脉亦死死地防守。毫无疑问，法国军队因众多来自内地军的志愿者的加入得到加强，在这些人的身上，热情高涨弥补了缺乏训练的不足，而且，他们亦能轻松地与自由法国最早的官兵打成一片。但是，因缺乏合适的手段，这样一支军队得完全依靠盟军。从罗讷河流域与汝拉山脉过来的德拉特尔率领的部队，在11月份解放了上阿尔萨斯；在其侧翼，勒克莱尔率领的人马在11月23日突破了德军在孚日山脉的防线，解放了斯特拉斯堡。但是，德国人仍在科尔玛一带坚守。在12月，他们在阿登地区发起了令盟军措手不及的反攻。为了收缩自己的战线，美国人打算撤离斯特拉斯堡。为了阻止美国人这样做，戴高乐粗暴地进行了干预。不过，这只是一次持续时间不长的危机。及至第二年的春天，他在盟军的居高临下面前不得不让步。在为穿越最后的障碍莱茵河并将德国置于盟国的控制之下而发起的总攻中，法国人漂亮地显示了自己的作用。德拉特尔的部队在斯皮尔渡过了莱茵河，这是技术难度很大的了不起的壮举。盟军在德国南部四处

出击，占领了斯图加特，解放了蒂罗尔。在巴伐利亚迅速推进的由勒克莱尔率领的师，在 5 月 4 日攻克了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的“鹰巢”。德拉特尔将军还受戴高乐之命，代表法国出席了在柏林举行的接受德国投降的仪式。

在外交方面，戴高乐为了让人们重新承认法国的大国地位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在 12 月，为了抗衡美国的态度暧昧，他与斯大林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但是，他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三巨头”安排了欧洲与世界未来的命运。不过，由于丘吉尔 870 的坚持，“三巨头”同意让法国参与对德国的占领，并如同中国那样，成为与美国、苏联、英国一样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当盟国力图再次在没有法国参与的情况下，在波茨坦会议上解决种种欧洲问题时，战争在太平洋地区亦宣告结束。法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印度支那的命运即有赖于此。日本人在 1940 年打着“共同防务”的幌子在印度支那落脚，并在当地怂恿反对法国的活动。1945 年 3 月，他们通过粗暴地采用武力完全夺取了政权。法国没有出席 8 月 16 日举行的日本的投降仪式，因为美国竭力地以反对殖民主义的名义把法国排除在外。中国的军队与英国的军队分别在越南的北方与南方负责解除日军的武装和维持秩序。

当战争结束时，许多问题的前景依然显得扑朔迷离。战争使法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直接导致了大约 60 万人丧生（20 万为士兵，40 万为平民），其中有一半人死于流放的过程当中。也许，与德国或苏联的伤亡数字相比，这一数字不显得很大，但对于法国这样一个在 20 世纪前半期人口不足的国家来说，这种人口损失的后果非常严重。此外还应考虑到新生人口的严重不足以及成年人口的急剧减少引发的各种问题。经济方面的设施受到严重的影响：港口、铁路、桥梁、工厂被摧毁，物资四处流失或被运到德国。耕地由于缺乏劳动力与肥料而荒在那里；甚至因为飞机轰炸或到处成为布雷区而满目疮痍。在所有的领域中，产量均急剧下滑。因为完全没有贮备，法国没有任何东西可卖到国外，同时却什么都得向外购买。物价与工资在上涨，预算

出现赤字，货币存在危机，凡此种种，均要求人们立即采取措施。

维希政府的失败也是曾经常显得自命不凡的右派的失败。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三大组织重新出现，它们分别是共产党、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后者受到天主教的影响，并直接产生于抵抗运动。上述三党赞同戴高乐将军进行某些社会经济改革，如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抵抗运动由此显得即将实现其在地下状态时萌生的梦想，即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为博爱的法国。但是，抵抗运动无法阻止国家的不幸损害它的各种活力，并动摇法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就（法兰西）帝国而言，它也受到了稍不明显但却不可避免的影响：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至少是暂时如此，民族主义运动在北非得到发展，以及法国不得不承认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

最后，战争，以它所带来的贫困、废墟、痛苦与暴力，纳粹的毒素及其大量的丑行，以及道德败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虽然这些印记的危害性人们颇难估计，但它们却在战后世界产生了不易去除的影响。虽然工业文明的飞跃发展很快消除了战争在物质方面留下的痕迹，但战争在心理和道德方面产生的影响却肯定不会同样迅速地消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丛书名=
作者=
页数=
尺寸=
DX号=
SS号=
出版社=
主题词=
ISBN号=
出版日期=
原书定价=
中图法分类号=
参考文件格式=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